

簡帛研究

(第二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編輯

李學勤 主 編

林劍鳴 謝桂華 副主編

法 律 出 版 社

FH22/02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 第二輯/李學勤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9

ISBN 7-5036-1947-3

I. 簡… II. ①李… ②中… III. ①簡(考古)—研究
②簡帛書(考古)—研究 IV. K877.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6)第 13982 號

1997.5.28
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244.353

出版·發行/法律出版社

經銷/新華書店

印刷/北京宏偉膠印廠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13.875 插頁/4 字數/375 千

版本/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1,000

社址/北京市廣外六里橋北里甲 1 號八一廠干休所(100073)

電話/63266794 63266796

出版聲明/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書號:ISBN 7-5036-1947-3/K·8

定價:55.00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社負責退換)

目 錄

信陽楚簡中的“柿枳”	李家浩 (1)
包山楚簡司法術語考釋	劉信芳 (12)
包山楚簡零拾	白于藍 (35)
戰國時期的遺策	彭浩 (48)
楚帛書“夸步”解	吳振武 (56)
楚帛書中的星歲紀年和歲星占	鄭剛 (59)
青川秦牘田制考辨	祝中喜 (69)
秦漢時期的一日十六時制	李解民 (80)
簡帛所見軍法輯證	陳偉武 (89)
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	趙平安 (102)
讀秦簡字詞札記	劉釗 (108)
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往亡”與“歸忌”	劉樂賢 (116)
《日書》起源考 ——兼論春秋戰國時期的曆法問題	胡文輝 (125)
論天水秦簡中之“中鳴”、“後鳴”與 古代以音律配合時刻制度	饒宗頤 (134)
帛書《陰陽五行》與秦簡《日書》	陳松長 (138)
帛書《易傳》窺管	魏啟鵬 (148)
馬王堆帛書《刑德》中的軍吏	李學勤 (156)
馬王堆醫書釋讀札記	張顯成 (160)
從《奏讞書》看漢初軍功爵制的幾個問題	朱紹侯 (178)
讀《孫臏兵法》札記	劉桓 (188)
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	李零 (194)

讀漢簡札記	裘錫圭	(211)
漢簡中所見法律論考	高 恆	(225)
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	謝桂華	(238)
居延漢簡研究二題	曾憲通	(265)
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		

——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三	邢義田	(273)
關於居延“車父”簡	王子今	(279)
說“改火”	羅 琨	(300)
漢勅制管窺	徐世虹	(312)
漢簡“得算”、“負算”考	于振波	(324)
漢簡《蒼頡篇》新資料的研究	胡平生	(332)
出土簡牘與漢晉敦煌	李均明、劉 軍	(350)
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		

及漢簡考釋	敦煌市博物館	(368)
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曆譜》述考	殷光明	(376)
西郭寶墓出土木簡及其釋義再探	石雪萬	(386)
記建興廿八年“松人”解除簡		
——漢“五龍相拘絞”說	饒宗頤	(390)

簡帛研究評介

評〔日〕堀毅著《秦漢法制史論考》	高 敏	(395)
近年來秦簡《日書》研究評介	張 強	(415)

簡帛研究動態

漢代地方行政文書的重大發現

——連雲港市尹灣漢墓出土簡牘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428)
----------------------	---------------------------------	-------

絲綢之路的防衛綫

——埋在其下的文字記錄·中國甘肅簡牘暨古墓文物展

.....	陳 波	(431)
-------	-----	-------

信陽楚簡中的“柿枳”

李家浩（北京大學中文系）

信陽 2 - 023 號簡所記的隨葬物中，有一種作如下兩個從“木”的字：①

A 柿

B 枳

A 的右旁是“市”字，其豎畫下部加有一短橫。2 - 023 號簡、的“帛”和 2 - 02 號簡的“帶”等字，所從“巾”旁豎畫下部也加有一短橫，與此情況相同。古代“市”、“米”二字形音皆近，可以通用。“柿”字《說文》篆文寫作從“米”而曾侯乙墓竹簡寫作從“市”，②即其例。因此，A 有可能是《說文》所說的“陳楚謂櫝（牘）爲柿”之“柿”。此字篆文寫作“枳”，從“米”。這一意見是否正確，單從文字本身無法作出判斷，祇有把它和 B 結合起來考慮，纔能確定。

B 的右旁還見於信陽 2 - 024 號簡和隨州出土的銅器銘文：

C 𣎵 《信陽》圖版一二七·2 - 024

D 𣎵 《殷周金文集成》9·4661

B、C、D 三者所從的備旁寫法 畧有不同：

E 1 𣎵 (B)

E 2 𣎵 (C)

E 3 𣎵 (D)

區別是中間豎畫的尾部，E 1 向左曳，E 2 向右曳，E 3 屈曲以求字

形的藝術性，E 的字形很像是子子之“子”，但他們不同的地方在於頭部，前者作古文字“兄”字頭，後者作古文字“子”字頭，^③區別甚嚴。舊釋 E 爲“子”，非是。

古文字從“只”的字作如下之形：

𠂔

《金文編》811 頁

𠂔

《睡虎地秦墓竹簡》圖版一一五·一五三背

𠂔

《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圖版二〇·二三三

第一字林義光認爲從“女”從“𠂔”，即“嫖”字。^④第二字是“枳”字，第三字是“𠂔”字。這些字所從的“只”旁皆寫作“兄”字形。E 很像是上揭古文字“只”旁的反寫，唯“只”左側的短畫向左下斜，E 右側的短畫向右上翹。古代文字正反往往無別。頗疑 E 是“只”字的變體。大概是爲了避免跟“兄”字相混，有意把“只”字寫作 E 之形的。根據這一認識，我們認爲 B、C、D 應該分別釋爲“枳”、“𠂔”、“𠂔”。“𠂔”是“𠂔”字的繁體，因爲“𠂔”是器皿名，故又增加形旁“皿”（參看下文）。

如果把 B 釋爲“枳”是正確的，那麼就可以由此確定 A 是否是《說文》所說的“陳楚謂櫝（牘）爲柿”之“柿”了。2-023 號簡說：

（1）□□錦目綬。一錦終枕。一寢莞，一寢筵，屯結芒之純。

六篋筵，屯錦純。一柿枳，錦純，組續。又鼂、縶、枕、枳，皆……^⑤

“柿枳”之前記的是寢莞、寢筵和篋筵三種席，之後綴以“錦純”，與寢莞、寢筵和篋筵之後綴以“結芒之純”和“錦純”文例相同。於此可見，“柿枳”也應該是席一類的東西。

古代的席種類很多，除了莞、筵等席之外，還有一種席叫作“桃枝”。桃枝本來是一種竹子的名字，桃枝席就是用這種竹子編織成的而得名。這裡舉一條《周書·器服》有關桃枝席的記載作爲例子：

桃枝、蒲席，皆素獨（襦）。^⑥

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竹簡把桃枝寫作“逗枳”。竹簡原文說：

逗枳、逗枳錦因（茵）各一。 《考古學報》1993年4期圖

版拾伍·44

“逗枳”與“桃枝”古音相近。“逗”、“桃”二字的聲母都屬定母。“逗”的韻母屬侯部，“桃”的韻母屬宵部，古代宵、侯二部的字音有關。《詩·小雅·棠棣》以侯部的“豆”、“具”、“孺”與宵部的“飫”押韻。⑩此是押韻的例子。《詩·小雅·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陸德明《釋文》說“駒，本亦作驕”。“駒”屬侯部，“驕”屬宵部。此是異文的例子。《說文》說“操”“讀若藪”。“操”屬宵部，“藪”屬侯部。此是注音的例子。“枳”、“枝”都是章母支部字，可以通用。例如：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有“取桃東枳”之語，以“枳”為“枝”；⑪《說文》肉部“𦞙”字重文作“肢”。所以桃枝可以寫作“逗枳”⑫

值得注意的是，信陽楚簡的“柿枳”與江陵鳳凰山漢簡的“逗枳”，不僅都是席名，而且它們的第二個字相同。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柿枳”是桃枝的另外一種寫法；“柿枳”之“柿”不是《說文》所說的“陳楚謂櫝（牘）為柿”之“柿”，而是一個從“關”省聲的字。

“關”字見於《廣韻》去聲效韻，是“吏”字的重文。“吏”字也見於《玉篇》人部，注說“與關同”，可是在該書門部並沒有“關”。《說文》不僅沒有“關”，而且也沒有“吏”，但是新附卻收有“關”，從“門”。“關”、“吏”二字一般寫作從“市”，但也有寫作從“市”的。從有關文字資料看，當以寫作“市”近古。《古文四聲韻》卷四效韻“關”、“吏”二字引《籀韻》都寫作從“米”。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有“直脊關尻”之語，“關”字原文作F：

F **關**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圖版一一·三三
此字的下半與馬王堆三號漢墓遺冊“心肺”之“肺”的右半寫法相同⑬。《說文》說“肺”字從“肉”“米”聲。由此可見，F從“門”從“米”，即“關”字。舊把F釋為“關”，非是。在馬王堆漢墓竹簡中，跟《天下至道談》同類性質的《十問》，有“直脊撓尻”之語。⑭古代“關”、“撓”二字同音，《廣韻》效韻都音奴救切、如昭切二音。徐幹《中

論·貴言》：“昔倉梧丙娶妻而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淮南子·汜論》和《孔子家語·六本》記此事，“倉梧丙”分別作“倉梧繞”和“倉梧繞”。孫詒讓說：“‘丙’與‘繞’、‘繞’形聲並遠，疑當作‘丙’。《一切經音義》三云：‘《韻集》丙，猥也；從市從人。作闌，俗。’蓋‘繞’、‘丙’古今字。徐書本作‘繞’，傳寫或作‘丙’，又訛作‘丙’耳。”^⑩按“丙”即“吏”。從字形和字音兩個方面來看，孫氏的說法無疑是可信的。此是“闌”、“繞”二字可以通用的例子。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的“直脊闌尻”之“闌”與《十問》的“直脊繞尻”之“繞”，顯然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從這一點來說，也可以證明我們把F釋為“闌”是合理的。馬王堆漢墓的年代是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像馬王堆漢墓竹簡那樣寫法的“闌”字，其出現年代可以早到戰國時期。《籀韻》“闌”字寫作從“門”從“米”，與馬王堆漢墓竹簡“闌”字相同。可見《籀韻》“闌”、“吏”二字的寫法是有所本的。前面說過，“米”、“市”二字形音皆近，所以從“米”的字可以寫作從“市”。1957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雜占木簡“闌”字就寫作從“市”。^⑪“市”與“市”形近易訛，故後世把“闌”字所從的“市”旁訛誤作從“市”。“門”與“門”形近，大概寫作從“門”的“闌”是“闌”的進一步訛誤，而《說文》新附所收的“闌”則是根據這種訛體製造的篆文。傳統觀念認為“闌”是正體，“闌”是訛體，顯然與事實不符。至於“闌”字為什麼從“門”從“市”，目前還說不清楚，只好留待以後考證了。

戰國文字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簡體字很多。造成簡體字的方式之一是把文字的某一部份省去，即使是形聲字，也有把聲旁的某一部份省去的。^⑫《說文》所說的“從某，某省聲”的形聲字中，有一部份即屬於這種情況。疑簡文“柿”就是《說文》所說的那種省聲字，應該分析為從“木”“闌”省聲。古代“闌”、“桃”都是端紐宵部字，音近可通。前面曾經指出，馬王堆漢墓竹簡《天下至道談》“直脊闌尻”之“闌”與《十問》“直脊繞尻”之“繞”是同一個詞。《廣韻》

筱韻“磽”字重文作“磽”。“撓”、“磽”二字都從“堯”得聲，“桃”、“磽”二字都從“兆”得聲。可見“開”可以讀為“桃”。所以我們說簡文的“柿枳”可能是“桃枝”的另外一種寫法。

(1)倒數第二字也是“枳”字。這個“枳”字之前的兩個字，分別見於上文“呂”之下和“終”之下。“又鼂、綏、枕、枳”當是重複上文所記之物。“皆”後的文字當在另一簡上，意思是說“鼂、綏、枕、枳”這些東西皆有某物，若上引《周書·器服》所說的“素櫨”之類。古代雙音節的詞可以單說。就拿雙音節的席名桃枝、符簾來說，據古書記載可以說成“桃”、“簾”。《文選》卷五《吳都賦》“桃笙象簾”注：“桃笙，桃枝簾也。吳人謂簾為笙。”《方言》卷五：“符簾，……南楚之外謂之簾。”以此例之，(1)倒數第二字“枳”，應該是上文“柿枳”的省稱。《吳都賦》把桃枝省稱為“桃”，是取第一個字，簡文把桃枝省稱為“枳(枝)”，是取第二個字，其省稱情況剛好相反。不過簡文的省稱情況卻與《方言》所說的南楚之外把符簾省稱為“簾”的情況相同。

(1)“組繡”之“繡”，原文所從“𦘒”旁寫作從“來”從“貝”，與《古璽文編》119頁著錄的0112號印“𦘒”字寫法相似。

“繡”字還見於信陽2-07號簡：

(2)一繡緇衣，綿緇之夾，純德(植)，⑩組緣(緹)，弁(辯)繡。

此簡文自“綿緇之夾”之後，記的都是“繡緇衣”上的裝飾。“組繡”與此“辯繡”文例相同，義亦相近，當是指桃枝席上的裝飾。《廣韻》職韻：“繡，緹也。”簡文“繡”當非此義。

綜上所說，(1)的“一柿(桃)枳(枝)，綿純，組繡”，是說一張桃枝席，其上有綿的緣邊和“組繡”的裝飾。此墓左後室出竹席六，絹緣邊，⑪當是簡文所記的簾筵。寢莞、寢筵和桃枝三種席未見，大概是當時沒有隨葬。

以上對信陽楚簡“柿枳”等的意見，我們早在十年前就已寫出，有人還引用了稿中對上揭銅器銘文器名D的釋法。⑫由於F跟上揭金

文和簡帛文字所從的“只”字字形有一定差別，所以一直不敢自信。近年公佈的包山楚簡中也有從E的字，爲我們這一意見提供了新的證據。

包山 258 號簡說：

(3) 蕓茈二簞，蘇_f二簞，萩二簞。 《包山》二〇二·258

此簡文記的是隨葬的食物，“萩”這種食物在 2:191-3 號、2:202-2 號竹筍所繫的竹簽上作“茈”。前者從“枳”聲，後者從“只”聲，它們當是同一個字的異體。爲了便於比較，現在把這三個字的字形揭示於下：

蕓

《包山》圖版二〇二·258

茈

《包山》圖版四六·19

荳

《包山》圖版四七·2

其所從“只”旁的寫法與 E₂ 相近。

在進一步討論“萩”字之前，先對其前所記的“蕓茈”和“蘇_f”畧作點說明。

“蕓茈”之“蕓”，原文寫作從“艸”從“佳”從“九”。“九”的左側一畫與“佳”的左側一豎公用，右側一畫的中間加有一點。這種筆畫公用和加點的情況，在戰國文字中常見。金文“𩇛”所從“鳥”旁作“佳”。^②於此可見，簡文此字應該釋爲“蕓”。《包山》釋爲“葦”，謂是“蕓”字之誤，非是。《玉篇》艸部：“蕓，音符，蕓茈。”蕓茈即葶薺，字或作“蕓茈”、“符薺”。《後漢書·劉玄傳》“王莽末，南方飢饉，人煮薺入野澤，掘蕓茈而食之”，李賢注：“蕓茈，《續漢書》作‘符薺’。”包山 2:52-2 號、2:188-1 號竹筍所繫竹簽蕓茈作“符茈”、“符薺”。^③“蕓”、“蕓”、“符”、“符”都是並母侯部字，“茈”、“薺”都從此得聲，故可通用。2:52-2 號竹筍內盛的是葶薺，^④與簡文所記相合。

“蘇_f”原文所從“𦰩”旁是反寫的。包山簡還有兩個“蘇”，原文所從“𦰩”旁是正寫的：一個見於此簡下文“蘇一簞”，一個見

於 256 號簡“菰(糲)菰之藎”。爲了跟正寫的“菰”字相區別，釋文在“菰”的右下角加拉丁字母 f 作“菰 f”，以表示是反寫的“菰”。此簡“菰 f”與“菰”同時出現，說明它們不是一個字。“菰 f”還見於 2:59-2 號、2:418-1 號竹筍所繫的竹簽。^③“菰 f 二箏”當是指這兩件竹筍。2:59-1 號竹筍內有藕六節。^④“菰”、“藕”古音都是侯部字。^⑤古代文字往往正反無別，頗疑簡文“菰 f”是一個形聲字，從“菰”聲，讀爲“藕”。

根據以上所說，(3)的“菰菰”、“菰 f”是兩種水生植物。那麼位於其後的“菰”也應該是水生植物。據 2:191-3 號、2:202-2 號竹筍所繫竹簽文字，這兩件竹筍當是簡文所記載的“菰二箏”。2:202-2 號竹筍內盛的都是菱角，2:191-1 號竹筍內也盛有菱角。^⑥菱角也是水生植物，與菰菰、藕同類。簡文所記的“菰”和簽文所記的“苳”顯然是指竹筍內盛的菱角。楚人把菱角叫做“苳”。《國語·楚語上》“屈到嗜苳”，賈逵注：“苳，菱也。楚人謂陵（菱）爲苳。”^⑦《說文》艸部：“菱，苳也。從艸，淡聲。楚謂之苳。”以上文所引馬王堆漢墓帛書“枝”作“枳”和《說文》“臢”字重文作“肢”例之，包山竹簡的“菰”和竹簽的“苳”，無疑是“苳”字的異體，與後世出現的草名“苳苳”之“苳”，^⑧當非一字。於此可證，我們把 E 釋爲“只”是合理的。

在包山楚簡中，除了上面所說的兩個“苳”字的異體從“只”之外，還有兩個從“只”的字：

(4) 郢陽 《包山》圖版一六八·173

(5) 郢女 《包山》圖版一二六·83

(6) 周迟 《包山》圖版一七三·185

(4)的“郢陽”是地名。“郢”不見於字書，應該分析爲從“邑”從“只”聲。《水經注·沔水注》記枝水出大洪山，西南流經襄陽都縣、湫城，而注於敖水。水北爲陽。疑(4)的“郢”應該讀爲“枝”，“枝陽”可能因位於枝水之陽而得名。

(5)的“郢女”和(6)的“周迟”都是人名。“郢女”之“郢”是氏，疑也應該讀爲“枝”。《姓譜》卷一支韻“枝”字下注：“《國名

紀》云‘古枝國在楚。《左傳》‘戎伐楚，侵訾枝’是也，因氏’。
《世本》云‘楚大夫枝如子弓（躬）之後’。《千家姓》云‘楚郡族’。
“周迟”之“迟”是名字。此字見於《說文》，訓為“曲行也”。

最後談談本文開頭提到的C、D兩個器名之字。原文說：

(7) 四會（合）𨮒，一𨮒𨮒，屯又（有）蓋（蓋）。

(8) 邵之御𨮒（𨮒）

“𨮒”字見於《玉篇》，訓為“金也”。(7)、(8)的“𨮒”當非此義。
《集韻》支韻：“鉞，器名。”頗疑(7)、(8)的“𨮒”應該讀為“鉞”。

(7)的“會”字常見於古文字。楊樹達指出，“會”從“曰”“合”聲，《爾雅·釋言》的“會”即此字之誤。^②跟(7)“會𨮒”用法相同的“會”還見於包山265號簡“會瑚”、266號簡“會豆”等，指有蓋的器皿。

“𨮒𨮒”之“𨮒”原文上部畧殘。按此字亦見於2-07號簡，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釋為“𨮒”，讀為“錯”，^③可從。“錯”有用金銀塗飾和刻畫的意思。《說文》金部：“錯，金涂（塗）也。”
《史記·趙世家》“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司馬貞《索隱》：“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2-07號簡“□鉤，黃金與白金之錯”之“錯”用的是前一義。(7)“錯𨮒”之“錯”用的是前一義還是後一義，不詳。“錯𨮒”與“合𨮒”併列。“合𨮒”是指有蓋的𨮒，那麼“錯𨮒”應該是指沒有蓋的鑲嵌或刻畫有花紋的𨮒。

(8) 邵之御𨮒是蓋，是1975年隨州市均川劉家崖出土的，共有二件，大小形制相同。方形。蓋頂中間和蓋身四邊各有一鈕，皆已殘缺。直徑13.5厘米。^④有人認為這兩件蓋是方豆的蓋，不可信。方豆的名字在銅器銘文中寫作從“皿”從“奇”，^⑤信陽2-012號簡作“方琦”。

壽縣蔡侯墓出土的銅器中，有兩件所謂的方鑑，其中一件的頸部有銘文一行六字：

(9) 蔡侯紳之尊□。 《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圖版叁肆·3
“尊”後一字下半是“皿”，上半左側似是“只”字，右側不詳。我

們懷疑此字跟(8)的器名之字是同一個字的不同寫法。這件銅器也是方形，“有兩環耳，除口緣、腹弦及足有花紋外，餘均散銅花紋”。高28.3、口徑38厘米。^③

如果我們對(9)的蔡侯紳銅器銘文的器名之字辨認不誤的話，那麼對“𦔁”這種器皿的形態可以得到這樣一個認識：像方鑑，有的還有蓋。信陽長臺關二號墓出土隨葬物中，未見有跟“合𦔁”相當的器皿，但有一件所謂的陶方鑑，其形態與蔡侯紳𦔁相似。此器口沿和頸部壓印有帶狀圓圈紋四周，腹壁左右兩側有鋪首銜環（已殘）。高31.3厘米。^④ 2-01號簡記有“二方鑑”。不知這件陶方鑑是(7)所記的“錯𦔁”，還是2-01號簡所記的“方鑑”。

注釋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以下簡稱《信陽》）圖版一二六，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②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上冊502頁注②，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𦔁”字的偏旁見於《古璽文編》200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和《包山楚墓》（以下簡稱《包山》）下冊圖版一三八·86反、一五四·125反（文物出版社，1991年）等。

④ 林義光：《字源》4·5。

⑤ 為印刷方便，本文古文字釋文，一般採用通行字寫出，不嚴格隸定。

⑥ 關於此簡“寢莞”、“寢筵”、“蕙筵”等席的考釋，見李家浩《信陽楚簡“澮”字及從“尖”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89—199頁，1983年。“枕”的考釋，見另文。“屯”義同“皆”，見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1期74—76頁；朱德熙《說“屯（純）、鑊、衡”》，《中國語文》1988年3期161—164頁。

⑦ 《禮記·內則》“敝篲而櫛之”，鄭玄注：“櫛，輶也。”

⑧ 《文選》卷六《魏都賦》“惜愔驅謙”注引《韓詩》“飲”作“驅”，“驅”屬侯部。

⑨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圖版三六·四四二，釋文注釋74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⑩ 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竹簡“逗枳”讀為“桃枝”，是裘錫圭先生的意見。

⑩《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遺冊考釋34號簡“牛脯”、35號簡“鹿脯”、36號簡“弦脂脯”等的“脯”字，原文與馬王堆三號漢墓遺冊“心肺”之“肺”寫法相同，這大概是因“脯”跟“肺”形近而致誤。

⑪同注⑨圖版九四·六二·六三、釋文注釋149頁。

⑫孫詒讓：《札迺》335頁，中華書局，1989年。此書的點校者把《韻集》校改作《集韻》，非是。《韻集》是晉人呂靜所著，《集韻》是宋人丁度等所著。唐人玄應編寫的《一切經音義》怎麼會引比他晚四百多年成書的《集韻》呢！

⑬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漢簡》基本二二·7·圖版貳壹·7，文物出版社，1964年。

⑭參看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188、189頁，中華書局，1989年。

⑮《禮記·玉藻》“君羔帶虎植”鄭玄注：“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齋車之飾。”

⑯《信陽》64頁，圖版六八·1、2、3。

⑰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均川出土銘文青銅器》，《江漢考古》1986年2期101頁、102頁注①。劉彬徽：《湖北出土兩周金文國別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251頁，282頁注④，1986年。

⑱“𠂔”字原文作從“竹”從“共”。關於此字的考釋，看朱德熙、裘錫圭《信陽楚簡考釋（五篇）》，《考古學報》1973年1期127、128頁。

⑲容庚：《金文編》208頁，中華書局，198頁。

⑳《包山》下冊圖版四六·6·17。

㉑《包山》上冊151頁，下冊圖版四九·1。

㉒《包山》下冊圖版四六·11，四七·3。

㉓《包山》上冊152頁，下冊圖版四八·5。

㉔“𠂔”字從段玉裁、嚴可均、江有誥、周祖謨等人的歸部。《說文》說“𠂔”“讀若庚”。《史記·匈奴傳》“〔冒頓〕後北服渾庚……之國”，《漢書·匈奴傳》記此事“渾庚”作“渾窳”。《爾雅·釋詁》“愉，勞也”，郭璞注：“愉，今字或作‘窳’。”又《釋獸》“狢，類羆”，陸德明《釋文》“狢，字或作‘窳’。”“庚”、“愉”、“狢”皆屬侯部。

㉕《包山》上冊153、154頁。

㉖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三六“芰荷”條引。

㉗參看《漢語大字典》（縮印本）1329頁，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

㉘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74頁，科學出版社，1959年。

㉙朱德熙、裘錫圭：《信陽楚簡考釋（五篇）》，《考古學報》1973年1期127頁。

③ 同注④所引二文。

⑤ 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3頁，圖版貳12。

⑥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9頁，圖版拾肆·3，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⑦ 《信陽》47頁，圖版三五·4。

包山楚簡司法術語考釋

劉信芳（湖北省博物館）

包山楚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為司法文書^①，這是目前唯一能見到的“楚律”。從內容上說，包山簡所記多為案例實錄，而睡虎地秦律多為法律條文本身；由案例實錄我們可以瞭解當時的司法程序，而由秦律條文我們可以瞭解當時的法的思想、法的基本原則以及各種具體法規——出土楚律與秦律的不同內容恰好具有互補性。

由於包山簡“楚律”的特徵是各種案例，因而我們研究的重點自然應是從諸多案例中鉤稽出當時的程序法規以及法的範疇。以下謹將包山簡中的重要司法術語一一錄出，採取與典籍、秦律互證的方法，力求能讀懂讀通這些司法術語，相信這一工作能夠對“楚律”的綜合研究起到鋪墊的作用。

一、關於戶籍管理

集箸 “集箸”見簡一。“箸”即著的本字，本指竹筴，此謂名籍。“集箸”即登記匯集名籍。“箸”字又見四、八、一四、一三九反、一四五反諸簡，或謂書寫名籍，如簡四“其箸之”；或徑指記事之竹簡，如簡一三九反：“其所命於此箸之中，以為證。”名籍之“箸”，周人稱版，漢人稱“籍”。《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鄭玄注：“版，今戶籍也。”《釋名·釋書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戶口也。”《漢書·景帝紀》：“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王府之典 簡三記曾因年幼尚未登記入“王府之典”之“二夫”，自楚懷王九年（前320）登記入籍。或釋“王府”即周官之“王府”，非是。《周禮·天官·王府》：“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而楚簡“王府”是收藏戶籍及其它典籍之所，依古代禮制，這些重要典籍屬“祖廟之藏”，即所謂“天府”之所收藏。《周禮·秋官·大司寇》：凡邦之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又《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鄭玄注“天府”云：“祖廟之藏。”楚簡“王府”既為收藏名籍之所在，自與周官“王府”名同而實異。

溺典 簡七云：

邦人入其溺典，臧（藏）王之墨。

簡文“溺”字原有誤釋，湯餘惠先生釋作“溺”^②，極是。“溺典”之涵義，原報告考釋者認為即“隱匿名籍”，其說不可信。《釋名·釋疾病》：“溺，弱也，不能自勝之言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遇王子弱也。”杜預注：“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是俘虜稱“弱”。楚懷王時期，楚國人口變動極大，無戶籍者眾多，此類無戶籍者至少包括：1. 戰俘；2. 逃亡者；3. 因自然災害、社會動蕩（如莊驕暴郢）而引起大規模人口遷徙者；4. 正式登記戶籍所遺漏者，僅釋為“隱匿名籍”，顯然不能包括以上數種情況。

“溺典”其實就是“沒有正式戶籍的人口典冊”（大略相當於現在的流散人口登記）。專門登記無戶籍者的名冊——“溺典”需上報官府，即所謂“入其溺典”，還需“藏王之墨”（詳下釋）。“溺典”既是一種供呈報備案的典冊，自然不能簡單地釋為“隱匿名籍”。

據包山楚簡，楚懷王時期至少有兩次大規模地清理無戶籍者的行動（楚懷王八年、九年），由楚懷王親自主持（參簡七），“新官師”、“新官令”、“新官婁”、“新官連敖”等眾多官員“奔得受之”，如此緊迫地清理無戶籍者，這是社會動蕩在戶籍管理上的反映。《國語·周語上》：“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料民即登記人口之數。仲山父認為：“民不可料也。”理由是，如果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

“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而料民則“害於政而妨於後嗣”。料民的深刻原因在於統治者已經覺察到人口危機，是統治者急需人口以補充前線兵員損失的直接反映。對於無戶籍者的處理想必是十分嚴厲的，簡七記爲“已入其臣之溺典”，恐怕是連人帶“典”一併沒入官府，或充勞役，或充軍。如果僅僅祇有入“隱匿名籍”，司法官員處理就是了，是用不着如此興師動衆的。

藏王之墨 楚懷王八年，懷王親自授權大莫敖屈陽發佈命令：“邦人入其溺典，藏王之墨。”按“墨”謂書寫副本。《說文》：“墨，書墨也。”《周禮·地官·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賈公彥疏：“貳，副也，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溺典”既需“藏王之墨”，由楚懷王親自過目，說明楚懷王已經非常重視“溺典”所登記的人口。

陳豫之典 簡一一記一名叫“瘳族澗”者，“在陳豫之典”，此“陳豫”是紀年之省稱，簡七“齊客陳豫賀王之歲”，時當楚懷王八年，前三二一年，可知“瘳族澗”的名籍在“齊客陳豫賀王之歲”這一年的戶籍檔案之中。由此可推知楚國的戶籍名冊依年分地區編排，遇有徵發，即以某年爲截止，按地區調集。

集著言 簡一四至一七之一組簡以“集著言”爲題，《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王逸章句：“言，猶議也。”所謂“集著言”即有關名籍方面的爭議，也就是訴訟。

該組簡記載邵行之大夫盤郢穹無故抓走了五師宵官司敗若的四名信人，司敗若向楚懷王告狀，懷王責成左尹斷案，左尹移案給新造迅尹丹，新造迅尹丹讓訴訟雙方“至典”，即出示名籍以作斷案依據，其結果是司敗若“有典”，“邵行無典”，新造迅尹丹不予斷案，司敗若於是將新造迅尹丹也當作被告，再次告到左尹官府。

由該案的具體內容亦可明確，“集著言”即有關名籍之訴訟。當着出現人員歸屬爭議時，名籍是判定其所屬的法律依據。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該案有爭議的四名信人（即小臣），其名籍既屬宵官司敗若，應是案情明確，何以新造迅尹丹不予斷案？

按此抓走四名官人的“邵行”身份非同一般，實即見於史書記載之“昭常”，“邵”即“昭”之異體，“常”、“行”音近可通，常古音在陽部禪紐，行古音在陽部匣紐，《禮記·樂記》：“道五常之行。”鄭玄注：“五常，五行也。”《戰國策·楚策二》記載頃襄王爲太子時，質於齊，許予齊五百里地，乃得歸楚繼立爲王，嗣後齊人索地。頃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齊人索地未果。“集箸言”所記案例發生在楚懷王十二年（另考），事隔頃襄王繼立之時僅十九年，時代相接，因而可以認爲“邵行”、“昭常”爲同一人。

明確這一問題還可以從分析“邵行”的身份入手，“五師”是楚國家的軍隊，猶如周之“六師”、“八師”，由於楚是諸侯國，其軍隊之建置低周一等，此所以爲“五師”。“五師宵官司敗若”是可以直接面君的官員，其身份已不低，“邵行”敢於抓走五師宵官司敗若的四名官人，其地位之顯赫已不難想見。此案由楚懷王推給左尹，左尹推給新造迅尹丹，新造迅尹丹在案清明確的情況下，拖着不斷案，究其所以，實在是四名官人之案不足以使邵行對簿公堂，“邵行”之身份明顯凌駕於“五師宵官司敗若”之上，此等身份地位，正好與此後擔任“大司馬”一職的“昭常”相合。

二、關於司法程序及刑法

受正 “受正”凡二見：

蔡遺受鑄劍之官宋強，宋強廢其官事，命受正以出之。（簡一八）

八月辛未之日，迅命人周甬受正，李劄取臘田於章密鄒邑。（簡七七）

按“受正”猶言“受中”。中、正義通，《儀禮·聘禮》“入每門”鄭玄注：“門中，門之正也。”《孟子·離婁下》：“指履其正者，乃可爲中。”《周禮·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鄭玄注：“中謂罪正所定。”“受中”是司法常用語，《周禮·秋官·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鄭玄注：“受中，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注：“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

可知“受正”即接受獄訟裁決，從當時司法程序上說，是由刑獄官“士”執行判決結果。簡一八“命受正以出之”，意謂命刑獄官執行判決，將“廢其官事”的宋強逐出官府。簡七七“迅命人周甬受正”，意謂由迅命人周甬執行官府判決，判決的具體內容是李剗取駟田。“駟田”謂擅自擴大田界。詳下述。

受期 “受期”是簡一九至簡七九這一組簡的篇題，茲舉一例：

八月甲戌之日，郢莫囂之人周壬受期，癸未之日不廷，附門又（有）敗。

正生得。（簡二九）

《說文》“期”之古文作“𠄎”，與簡文“期”字形同。關於“受期”，學者們的理解分歧很大，目前至少已有五說：

其一、報告考釋云：“根據簡文可知為受理各種訴訟的時間及初步審理結論的記錄。”彭浩先生認為：“《受期》就是各地送報的告訴記錄摘要。……簡上的第一個日期是官吏接受告訴的時間，也稱作‘受期’。簡文的第二個日期則是接受告訴後，縣廷決定不對被告起訴的時間。”^③

其二、曹錦炎先生認為：“所謂某人受期，即某人接受年度考核之意，並非是指其接受報告而言。”^④

其三、陳偉先生認為：“受期簡應是左尹官署向被告責任人或被告本人下達指令的記錄。簡中的第一個日期，是對方接到指令的時間，第二個日期，是要求對方執行指令的時間。指令的具體內容，大多是要求出庭對質或說明情況（廷、謹）；另有為數不多的，如簡四四‘歸登人之金’，簡五‘量無下之賁’，則是有了初步裁決而要求執行的。”^⑤

其四、夏淦先生釋“受期”為“受賄”，“受賄一類案例，極大多數由立案和定讞兩部份組成，分別列於兩個‘干支紀日’之後，立案由‘受賄’即罪名收尾，定讞由‘茅門有敗’收尾。從立案和定讞

的時間距離看，估計中間還會有查證、審訊等中間法律程序在簡文中省略了。簡文最後往往署有審理此案的法官職務、人名，顯然簡書是用來呈報上級主管左尹作最終判決的。”^⑤

其五、李零先生認為：“受期所述並非‘初步審理結論的記錄’，而是講由於何種原因，無法審理，也就是說，簡文所錄都是未能結案的案例。”^⑦

按：原報告對“受期”二字的隸定是正確的，不能釋為“受鬱”，“期”字用例達七十餘，讀為“期”字已是文從字順，若勉強隸定為“異”，通轉為“晦”，再通轉為“賄”，反而不好理解。其二、“受期”不可能是年度考核。其三、“阡門又敗”是對違犯審案程序的認定語（說詳下），對於當事人來說，就是一種定性裁決，因而不能認為是“未能結案”。如果訴訟一方或雙方中止訴訟，以至未能開庭審理，“阡門又敗”即可認為是結案；如果繼續訴訟，那是審案的發展，“受期”簡有數次受期的例證，就屬後一種情況。

“受期”的意思其實既簡單又明確，就是接受訴訟的期約。簡八一：“周賜訟郟（鄆）之兵虜（甲）執事人邕司馬競（景）丁，以其政其田，期甲戌之日。”“期”即司法官員受理案件後，與訴訟人及被告共同約定的審案日期。古代訴訟需由涉案雙方“入束矢”，“入鈞金”，由官方期以時日，然後審案。若有一方不入束矢，不入鈞金，則是有認為“不直”，成為敗訴方，此案自行了結，官方不再審理。《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訟，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職之。”鄭玄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有服不直者也。”又：“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有服不直者也。”所謂“三日”是約數；所謂“束矢”，或云十矢，或云百矢（參上引注疏）；所謂“鈞金”，三十斤為鈞。“束矢”、“鈞金”是一筆極重要的訴訟費，告狀者若非萬不得已，恐怕不會出此巨資。之所以制定此類法律，是為了使告狀

訟獄者以刑獄爲重，不輕易對簿公堂。

對“受期”的完整理解，請參閱以下數條。

遲 包山簡三一：“八月戊寅之日，郢少司敗蔡丙受期，己丑之日不遲郢之己里人青辛以廷，阡門又敗。正秀不孫。”類似例多見，此乃“受期”最典型的句式。原報告考釋謂“遲”讀如“將”，誤。

按“遲”讀如“詳”，此乃重要司法術語。《尚書·呂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玄注：“審察之也。”（今本《呂刑》脫“詳”字，見《周禮·秋官·大司寇》注引）《說文》：“詳，審議也。”其字又作“祥”，《廣雅·釋詁》：“祥，審，議也。”所謂“不詳郢之己里人青辛以廷”，意謂至期約審案之日，沒有審議青辛之案於公堂。

簡文“遲”之異文作“行”，簡六一：“九月辛酉之日，新大慶陳漸受期，十月辛未之日，不行代易廢尹郢之人或戰於長沙公之軍，阡門又敗”。按“行”與“詳”音近義通，《禮記·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玄注：“行猶視也。”《呂氏春秋·季夏紀》“入山行木”高誘訓：“行，察也，視山木禁民不得斬伐。”由簡文“遲”之異文作“行”，可以進一步證明其字爲“詳”之假。《通典》卷一百六十八有“詳獄”一門，專述歷代獄訟程序法規，可參。“詳”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法庭調查。

阡門又敗 “受期”一組簡均以“阡門又（有）敗”作爲結束語（其中簡六四脫“阡門又敗”四字，簡七七不屬於“受期”簡，原整理者有誤植），句例可參前引。

“阡門”是楚司法官府名。楚有所謂“茅門”，《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清儒孫詒讓云：“茅門下作茆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即雉門也。《說文》佳部雉古文作𨵿，或省爲弟，與茅形近而誤。《史記·魯世家》築茅闕門，即《春秋》定二年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王先謙集解：“孫說茅門即弟之誤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雉門爲古代審案之所在，《周禮·秋官·朝士》：“掌

建邦外朝之臺，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鄭玄注：“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賈公彥疏：“九棘之朝，斷罪人之朝也。”是楚之所謂“阨門”，周、魯之所謂雉門也。

“阨門”讀如“登門”（阨、登音通，學者多證之），“登”、“雉”同有理獄之名，《詩·大雅·皇矣》：“誕先登於岸。”鄭箋：“誕，大；登，成；岸，訟也。……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左傳》襄公元年：“且不登叛人也。”杜預注：“登，成也。”《方言》卷六：“雉，理也。”是登門、雉門皆為理獄之門，名稱不同，內涵則一。“阨門又敗”猶言敗壞法廷。《左傳》昭公十四年載晉國叔魚與雍子爭鄆田一案，“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叔向認為叔魚有“鬻獄”之罪，論其罪名為“貪以敗官為墨”，意即貪贓枉法，使司法官府蒙受污名。“阨門又敗”之“敗”與此同例。

細檢“阨門又敗”之有關案例，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其一、接受期約的司法官員另有隱衷，未能如期審案，被認為敗壞法廷。如簡四六：“九月甲辰之日，郢異之司敗番覲受期，戊申之日不遲（詳）郢異之大師郢僕以廷，阨門又敗。”大師之職位高於該司敗，此案之審理頗讓該司敗為難，恐怕是能拖則拖，不惜冒敗壞法廷之名。此案凡四次受期。另三次分別見簡五二、五五、六四，若非另有隱衷，恐怕“司敗番覲”不會拖着不審理。

其二、涉案人員有違法行為，致使不能如期開廷。如簡六三：“九月癸亥之日，郢市之里人鼂訶受其兄鼂朔，執事人鼂萋求朔，訶不以朔廷，阨門又敗。”此案被告為鼂朔，至審案期約之日，執事之小吏拘傳朔（“求”即拘傳，睡虎地秦簡例多見），朔之弟訶不讓執事人將朔拘之法廷，致使“阨門又敗”。可見此敗壞法廷者為阻礙執行公務之“朔”，罪名十分明確。類似例又見簡五八。

其三、接受期約的當事人未能履行裁決。如簡七三：“十月壬辰之日，仿令賢受期，魚月辛亥之日，不量驂奉，阨門又敗。”所謂“奉”，

《廣雅·釋詁》：“奉，祿也。”，“不量駐奉即不支付飼養驛馬的所需費用。“量駐奉”是受期時形成的裁決，到約定的次月“辛亥之日”，未能執行裁決，被認為是敗壞法廷。這與後世的“藐視公堂”非常相似。

其四、當事人訟獄後，又想以其它方式結案（如私了）。如以下諸簡：

八月辛巳之日，邠舉之關戠公周童耳受期，己丑之日不遲（詳）邠舉之關人周敫、周琰以廷，附門又敗（簡三四）

八月己丑之日，付舉之關戠公周童耳受期，九月戊申之日不遲（詳）周敫、周琰以廷，附門又敗。（簡三九）

九月戊申之日，偁大戲六令周霰之人周雁訟付舉之關人周琰、周敫，冑（謂）葬於其土。琰、敫與雁成，唯周聽之妻安（焉）。（簡九一）

按以上三簡所記為同一案例，周童耳兩次接受審案期約，均未讓其屬下兩名“關人”受審於廷。其中原因尚未得而知。至第二次“受期”期約的下一個約定日，被告與原告“成”，即達成協議。按現代法律，被告與原告達成協議，可以撤訴。然古代法律以刑獄為重，不允許輕易對簿公堂，既已告狀又想私了撤訴，則甚有“戲弄公堂”的味道，因而還是被認定為“附門又敗”。此類“附門又敗”應是有所處罰的，除了“鈞金”、“束矢”之類訴訟費外，是否還有如秦律“貲二甲”、“貲一盾”之類的罰款，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以上列舉的四個案例，大致可以認為是“受期”簡“附門又敗”的四種類型，僅此已可知“附門又敗”是很抽象的法律認定語，其內涵隨具體案例而有差別，或謂審案官員不按司法程序辦事；或謂涉案人員有違法行為；或謂未能履行裁決（藐視公堂）；或謂告狀後又試圖以其它方式結案（戲弄公堂）。但其共同特點是影響了期約的審案，以致未能如期開廷，因而統統被定讞為“附門又敗”。

“附門又敗”還有一重要用例，簡一二六至一二八記載左尹官府向襄陵地方官員下令：“襄陵大夫司敗謹（對）襄陵之州里人陽鋤之

不與其父陽年同室，夏曆之月己酉之日，思（使）一載（職）獄之主以至命。不至命，附門又敗。”其後漢陵地方官員於該月癸卯之日（己酉前六日）將查對結果報告官府：“陽鑰不與其父陽年同室。”

很顯然，以上是左尹官府因審案需要查對某人的身份，向下級官府下達的指令，說明如果沒有如期執行此項指令，將被認定為“附門又敗”。此“附門又敗”僅是強調法律程序嚴肅性的警示語，其重要意義在於向我們提示：“附門又敗”的解釋權在左尹官府。遇有特殊情況，左尹官府有權劃定什麼樣的行為即屬“附門又敗”。

盟 盟證 “盟誓”是當時法廷調查取證的重要程序，簡二三：“八月己巳之日，鄰少司敗職未受期，九月癸丑之日，不遲（詳）鄰大司敗以盟鄰之懷里之敗無又李競（景）思，附門又敗。”“盟”即盟之異體。該簡大意是：至期約之日，沒有進行法廷調查，即沒有讓鄰大司敗通過盟誓以證明鄰之懷里為旦者之中是否有景思其人。簡一、二三、一三七諸簡記載凡涉案人員在提供證詞之前均要經過盟誓，簡一三七：“執事人為之盟，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皆言曰。”又一三七反：“既為之盟誥。”“誥”即“證”之異體。

作為審案程序的盟誓有久遠的歷史，《周禮·秋官·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聚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其酒脯。”賈公彥疏：“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盟誓實質上是遠古神權參與司法權的遺跡，由專門的官員主持儀式，讓參加盟誓者以對神明誠實的名義提供證詞，不僅案犯招供前要盟誓（簡一、二三），證人作證前亦要盟誓。盟誓的全部過程要作記錄，簡一、三九反：“為陰人舒程盟，其所命於此箒之中，以為誥。”說明盟誓記錄是斷案的重要依據。如果未經過盟誓，將被認為不合當時的程序法。

盟誓作證未見之於秦律，這是因為包山楚律較秦律為早。不過秦律是否淘汰盟誓作證，尚有待進一步證明。

謹 謹告 分謹 包山簡一二：“子左尹命漢陵宮大夫謹郢室人某廬之典之在漢陵之參錄。”“謹”即“對”之異體（下文徑用“對”）。

簡文“對”使用頻率很高，多用作“對簿”、“對狀”、審理對證之義。《史記·李將軍列傳》：“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後李廣自謂：“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漢書·酷吏傳》：“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師古注“簿者，獄辭之文書也。”知“對簿”猶言接受審問。《漢書·袁盎傳》：“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對狀”謂陳述案情。所謂“對鄣室人某墮之典之在潁陵之參錄”，“對”謂查對。

簡二七：“八月癸酉之日，郎易君之州里登嬰受期，乙亥之日，不以死於其州者對告，阡門又敗。”又簡三：“八月戊寅之日，郎易君之州里公登嬰受期，辛巳之日，不以死於其州者之居屍名族至命，阡門又敗”參核上引二簡，知“對”的具體內容是“居屍名族”，“對告”即要求查對其住址、身份、名字、氏族並呈報上級官府。

《儀禮·聘禮》：“對曰：非禮也，敢辭。”鄭玄注：“對，答問也。”簡文凡“對”之用例，均有受審者答官府之問，下級答上級之間的涵義。

簡四七：“九月甲辰之日，額司敗李聽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選額宦大夫煇公族具、朝易公穆滴與周臨之分對以廷，阡門又敗。”“分對”謂分別對狀。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二）：“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各展其辭。”即各自陳述爭訟之辭。

足獄 “足獄”乃簡八〇至一〇二之篇題。“足獄”即“疏獄”，分條記錄獄訟之辭。足，疏為古今字，《說文》解“足”字云：“一曰足，記也。”又“記”下云：“足也。”是足，記為轉注。段玉裁云：“足字今作疏，謂分疏而識之也。”《漢書·蘇武傳》：“數疏光過失。”師古注：“疏謂條錄之。”《漢書·杜周傳》“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注：“疏謂分條也。”

簡八一：“冬棄之月癸丑之日，周賜訟鄣之兵遽（甲）執事人宦司馬競（景）丁，以其政其田。期甲戌之日。鄭造公蛙截之，涎競（景）為李。”此是典型的“足獄”格式，內容包括：接案日期；原告姓名、

身份；被告姓名、身份；訴訟事由；期約的審案日期；足獄官員簽名，理獄官員簽名。若擬之於秦律，可與《封診式》諸條參對。

發節 復節 反節 將節 包山簡八〇：“冬棄之月甲辰之日，少臧之州人信士石鉅訟其州人信士石膏，言胃傷其弟石恥趾。既發筭，執勿遲。廷具哉之，秀履為李。”

類似例又見以下諸簡（摘錄）：

既發筭，遲以廷。（簡八五）

既發筭，廷足易之酷官之客。（簡一三五反）

客發筭。（簡一四八）

客發筭。（簡一五〇反）

按“筭”從竹從子，子即《說文》弓，“節”之本字。“發節”猶言發書，睡虎地簡《語書》（簡一二）：“發書移書曹。”古代發書必輔以節為信，此所以有“發節”之名。《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鄭玄注：“王有命則別其節之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簡文又有所謂“復節”：競（景）得訟繇丘之南里人聶佗、聶酉，胃殺其兄。九月甲辰之日，繇丘少司敗遠憐（？）護節，言胃：“繇丘之南里信又聶酉，以甘臣之歲為偏（隸）於鄣，居口里。繇易旦無又聶佗。”（簡九〇）

按“護節”讀如“復節”，猶言“返節”，《周禮·地官·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反節即以節復命。是發書輔以節為信，稱“發節”；復命輔以節為信，稱“復節”。

“節”字簡文又作“𦰩”，字不從竹（以下仍以“節”代之）：

節執雇女返，如公臧中，里公利釜返節，言胃：“女返既走於前，節弗及。”節執競（景）不割，里公吳拘、亞口、耶繇返節，言胃：“競（景）不割既走於前，節弗及。”（簡一二三）

“雇女返”、“景不割”皆是官府捉拿的殺人犯。所謂“節執”即發節捉拿；所謂“返節”已如上述；所謂“節弗及”謂被捉人犯在捉拿之前已投案自首，未及持節捉拿。

簡文“節”又作“茷”（以下仍以“節”代之）

郢節命葬王士，若葬王士之宅，僕命但將節，若節命鄢少司城葬頭為鼓，將節於僕。（簡一五五）

按“郢節”是郢都發節的省略語。“若”是持節傳令者。“宅”，此指安葬之所，《儀禮·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鄭玄注：“宅，葬居也。”“將節”讀如“將節”，《詩·周南·采芣》：“采采芣苢，薄言將之。”《毛傳》：“將，取也。”《說文》：“將，取易也。”即取節交換相合以作憑信。

古代凡傳令、書信往來、借貸多以“節”為信物。惟簡文“節”之字形較奇特，原報告多有誤釋，故重新匯釋如上。“節”之實物，有著名的“鄂君啓節”、“王命龍節”、“王命虎節”等。

以及其官 反官自訴 包山簡一三〇至一三九記有一典型的翻案上訴案件，原告舒慶報告官府，謂苛胃、宣卯殺害他的兄長昃，隨着案情發展，舒慶有殺人嫌疑，被拘押入獄，舒慶越獄逃跑，上訴直至楚王，楚王發令重審此案。簡一五至一七記五師宵官之司敗若不服新造迅尹的審案，“以告君王”，亦屬於翻案上訴。

對於翻案上訴的法律行為，簡文稱之為“反官自訴”，例如：

庚月辛酉之日，郢易之佻笑箕公遲，教令苛訟其官人番譽、番咎、番具，以其反官自啟（訴）於新大廡之古（故）（簡九九）

八月壬午之日，楚斯（莊）司敗再須訟陽路斯邑簞軍、韞，以反其官。（簡八八）

“反”即翻案，即不服判決另行告狀。《史記·平準書》：“杜周治之，獄少反者。”索隱：“反音番，反謂反使從輕也。”《漢書·雋不疑傳》：“有所平反。”如淳注：“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

對於要求翻案重審的上訴行為，秦律稱之為“乞鞫”，《法律答問》（簡一一五）：“已乞鞫及為人乞鞫者，獄已斷乃聽，且未斷猶聽也？獄斷乃聽之。”

上引簡九九、簡八八的文意不十分清楚，僅從字面意思分析，似乎“反官自訴”者，“以反其官”者反而成為被指控的對象，這與簡

文記有翻案上訴的實例是互相矛盾的。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目前可以歸納為兩點：其一、楚律對翻案上訴有嚴格的程序規定，嚴格到一般人很難翻案上訴。上引秦律對於翻案上訴“獄斷乃聽之”的規定，即案件判決後纔受理“乞鞠”，既如此，“乞鞠”在執行過程中對於平民已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其二、簡文所記兩則翻案上訴案例的當事人身份都不一般，上訴至於楚王纔被允許重審；而簡九九、簡八八的上訴當事人為小臣，並且均是上訴控告其直接上司，這或者為當時楚律所不允許，以至上訴者反而成了被告。當然這祇是表面的分析，對於楚律“反官自訴”，還得繼續研究。

成 作為司法用語之“成”僅見以下二例：

九月戊申之日，倍大戲六令周竊之人周雁訟付集之闢人周珠、周珠、周敫，冒葬於其土。珠、敫與雁成，唯周竊之妻葬焉。（簡九一）

……尹酉棺與劉君之司馬奉為皆告城（成），言冒：小人各政於小人之地，無嘉，登人所漸（斬）木四百失於對君之地褻漢之中，其百又八十失於畢地都中。（簡一四〇，一四〇反）

按“成”謂獄訟之平。《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周禮·秋官·方士》：“司寇聽其成於朝。”鄭玄注：“成，平也。”又《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賈公彥疏：“成謂罪已成定。”

上引簡九一之“成”，帶有協議結案的意思。而簡一四〇之“成”，則是承認其“無嘉”（失職的委婉語），可謂罪已成定。

傳 “傳”謂拘捕犯人

……或殺下鄭人會畢，小人命為誓以傳之。易城公樣畢命剌邦

傳解句，傳邦傳得之。（簡一二〇）

按：稱拘捕為“傳”，漢代典籍多見。《漢書·劉屈氂傳》：“以姦傳朱安世。”師古注：“傳，逮捕也。”《後漢書·順帝紀》：“亡徒當傳，勿傳。”章懷太子注：“徒因逃已當傳捕者，放之勿捕。”

剌 包山簡一二〇：“剌邦解句。”邦是被拘捕的人犯。“剌”字從刀京聲。“黥”字異體，見於《集韻》。《說文》：“黥，墨刑在面也，從黑京聲。剕，或從刀作。”黥刑又見於睡虎地簡，《法律答問》（簡一）：

“羅以爲城旦。”

拘

楚簡“拘”字作“句”，或作“苟”、“荷”，見以下諸例：

易城公命刺却解句。（簡一二〇）

俸却未至刺（斷），有疾，死於窞。（簡一二三）

舒程執，未又刺（斷），達窞而逃。（簡一三七）

尹夫人之飯愴之窞一夫，適逃至州遠。（簡一四二）

按“拘”謂拘禁，用如名詞則謂拘禁之所。《左傳》宣公四年：“有拘於司敗。”

秦律稱拘禁爲毆（繫），拘禁而強迫勞動者，稱爲“毆（繫）作”。《秦律十八種》（簡一三六）：“弗問而久毆（繫）之，大者夫、丞、反官書夫有罪。”這是因爲當時久繫不決已成問題，纔會有這樣的規定。包山簡有拘押至死的案例，又有數倒越獄的案例，祇是有關拘禁的具體規定缺載，但我們可以比照秦律而得其梗概。

受拘禁者往往被施以刑械，上引簡一二〇“刺却解句”即將人犯施以黥刑再解押至拘所。簡一四三：“郢造尹矯執小人於君夫人之飯愴，甲辰之日，小人取愴之刀以解小人之桎，小人逃至州遠。”《周禮·秋官·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鄭玄注：“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從法律程序上說，被拘禁者屬於罪名尚未被確定者，但楚律是將被拘禁者當作罪犯對待的，祇要被控告有罪，被拘傳，就會被施刑加械，這說明當時遵循的是“有罪推定”的原則。

敵 “敵”讀如“圉”，意即牢獄，見於以下諸例：

付舉之關敵公周童耳受期。（簡三九）

筭敵公若鯨受期。（簡七〇）

郢東敵。（簡一二四）

東敵公舒療，敵司馬陽牛實言曰：郢易之酷倖黃齊、黃鑒皆以甘匿之臭月死於小人之敵（簡一二五）

郢東破敵郢君之闕邑人黃斂。（簡一四三）

按“敵公”、“敵司馬”是看守牢獄的官吏。《禮記·月令》：“春圖

圜。”鄭玄注：“圜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周人或稱圜為“圜”，《周禮·秋官·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鄭司農注：“圜土謂獄城也。”

詰 楚律稱訴狀曰“詰”，僅見一例：

鄒人苛冒、起卯以宋客盛公鸛之歲到戾之月癸巳之日並殺僕之兄昀，僕以詰告子耶公（簡一三三）

簡文“詰”用如名詞，其為訴狀甚明。“詰”之本義為責問，《左傳》昭公十四年：“赦罪戾，詰姦慝。”睡虎地簡《封診式》（簡二）：“凡訊獄，必先盡聽其言而書之，各展其辭，雖智（知）其誡，勿庸輒詰。其辭已盡書而毋解，乃以詰者詰之。”

謄等 官府在接到訴狀後，根據訴狀及初步調查的情況移錄為官方司法文書，楚律稱之為“謄等”。

僕以詰告子耶公，子耶公命鄧右司馬彭澤為僕笑等，以舍舍之數客。（簡一三三）

“笑等”讀如“謄等”，謄，《說文》：“迺書也。”睡虎地秦簡《封診式》（簡六）：“有鞠 敢告某縣主：男子某有鞠，辭曰：‘士五（伍），居某里。可定名事里，所坐論云何，何罪赦，或覆問毋有，遭讎者以律封守，當謄，謄皆為報，敢告主。’”“謄”為“謄”之假。“等”，簡文多謂記事文書。“為僕謄等”，即為被告移錄有關案情。

漱 楚律又稱議罪為“漱”，與“詳”義近。

見日命一執事人至命，以行古（故）漱上恒，僕倚之，以至命。（簡一三七反）

左尹以王命告子耶公：命漱上之戡獄為鄒人舒烺盟，其所命於此箸之中，以為詳。（簡一三九反）

按“漱”從言從次，讀如“漱”，《說文》：“漱，議罪也。”字或作“讞”；《漢書·景帝紀》：“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注：“讞，平議也。”“上恒”據文義應是議罪之所。

就楚簡與漢代典籍“讞”之用例分析，作為程序法之“讞”是指

復審議案，此所以與“詳”有別。簡一三七反諸簡記左尹命湯公景軍迅速結案，但由於該案案情複雜，案犯屢次翻供上訴，所以湯公景軍未能結案，並陳述未能結案的理由：“以行古激上恒，僕倚之，以致命。”意思是：按故例應議案於上恒，在下據此以復命。這說明對於翻案上訴之類的複雜案件，楚律有議案的規定。

三、關於經濟管理法規

政 楚律稱徵收賦稅曰“政”

冬棄之月癸丑之日，周賜訟鄆之兵庫（甲）執事人官司馬競（景）丁，以其政其田。（簡八一）

小人各政於小人之地。（簡一四〇）

按“政”讀如“徵”，鄂君啓節：“見其全節則毋政。”政謂徵稅。《周禮·天官·小宰》：“聽政役以比居。”鄭玄注：“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徵，以其多言之，宜從徵。如《孟子》交徵利云。”鄭玄所引見《梁惠王上》。簡文既以“政其田”而引起訴訟，則此“田”應屬免徵之田。古代卿大夫供祭祀之田不徵田賦，《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徵。”鄭玄注：“徵，稅也。”《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趙岐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

簡一四〇之“政”，謂地方官員在所屬之地徵收賦稅。

敫 楚律又稱徵賦稅曰“敫”。

夷月辛酉之日，郢敖之郢邑人走仿登城訟走仿郎繡，以其敫

湯防與鬲澤之古（故）（簡一〇〇）

按“走仿”是徵收賦稅的職官（另考）。“敫”讀如“稅”，徵收賦稅。簡文既記載因徵收“湯防”與“鬲澤”之賦稅而引起訴訟，可知“湯防”與“鬲澤”應是免徵賦稅之所在。

“湯防”讀如“蕩防”有如簡三之“湯邑”應是“蕩邑”。《周禮·地官·稻人》：“以防止水，以溝蕩水。”杜子春注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防”字又作“罙”（簡一四九），字從网從沝，並讀如防。古代捕魚用防，又稱“梁”，故字又從网作。《左傳》襄公

二十五年：“薦掩書土田，……町原防。”杜預注：“防，堤也。”《周禮·天官·獸人》：“獸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堰也，堰水爲關空，以筍承其空。”賈公彥疏：“謂堰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筍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蕩防”與《左傳》“原防”意同，蕩謂水蕩，“原”爲“源”之本字，是“蕩防”即“原防”。

所謂“蕩澤”，“蕩”讀如“彌”，字亦作“彌”，義爲深水。《詩·邶風·匏有苦葉》：“有彌濟盈。”毛傳：“彌，深水也。”

蕩防與彌澤本爲水蕩（或水源）、堤防、深水、沼澤之地，應屬於減徵或免徵賦稅之處，即繇強徵其賦稅，此所以被起訴。《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數疆潦。”杜預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可證楚國在春秋時，對“蕩防”、“蕩澤”已有減免賦稅的規定，明確這一點，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以下簡文：

陵迅尹槁以楊虎斂關金於郟，斂賧仿之新易一邑需地一邑、
礪一邑、鄭一邑、佶楮一邑、新造一邑；與其罌；女繇一賽、淫
罌一賽、涿罌一賽、斂罌一賽，不量其關金。將講之於其尹令。
陵迅尹之枹陽余可入之。（簡一四九）

以上簡文是研究楚國賦稅政策的重要文獻，文字難度較大，有必要先作疏通。“陵迅尹”是管理山林的職官，兼有徵收賦稅之職，與《周禮·地官》：“山虞”“林衡”相類。“斂”謂賦斂，即徵賦。《尚書·微子》：“用又離斂。”馬融、鄭玄皆注“斂”爲“賦斂”。“關金”即“關稅”，“斂賧仿”，斂讀如稅，如上述。“賧”讀如“斛”，《說文》：“斛，量也。”“仿”是徵稅官，亦是徵稅官府之名（另考），“斂賧仿”即賦稅量入徵稅官府。“與其罌”，“與”謂賜予，意即免徵賦稅。《荀子·富國》：“其於貨財取計數也。”楊倞注：“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與其罌”總領下文，“女繇一賽、淫罌一賽、涿罌一賽、斂罌一賽”皆在“與”之列，亦即諸“罌”均被免徵賦稅，此其後有“不量其關金”，句意尤爲明白，所謂“賽”讀如“塞”，據文意應是作爲行政區劃的一定水域，《管子·度地》：“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

也，因而扼之可也。”戴望之注：“扼，塞也。”又：“涵則塞。”注：“塞亦控也。”是簡之“賽”實指有隄防控扼的漕漕之類。“陵迅尹之桡”，桡字從木色聲，讀如“嗇”，“嗇”、“色”古音同在之部生紐，是同音可通用，《春秋公羊傳》哀公六年：“色然而駭。”《一切經音義》引作“歎然”，是其證。嗇謂嗇夫，小吏之名，秦簡皆見。

可將上引簡文譯錄如次：

陵迅尹塙派楊虎在郛地徵斂關稅，賦稅量入走仿的有新陽一邑、需地一邑、礪一邑、佶櫛一邑、新造一邑；免於其夥納稅的，女繇一塞、淫滂一塞、漾滂一塞、斄滂一塞，未量入關稅，將與有關官員尹令對證核實。陵迅尹的嗇夫陽余可呈報以上稅收情況。

楚國腹地江漢平原以及淮河流域，湘沅諸流域，多低平易水患之地，對沼澤漕漕實行減免賦稅的政策，有利於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開發。

郛異 包山簡一〇三至一一九屢見“郛異”，如：

大司馬邵鄢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喜月，子司馬以王命命蔘陵公鬱、宜易司馬強貸郛異之黃金，以貸郛鄢以糴種。（簡一〇三）在該年喜月，有十地“貸郛異之黃金”，計九十四益四兩，期至屈柰之月“賽金”，而各地所貸黃金均是“逾期不賽金”，在該年夏柰之月，有一地“貸郛異之錄金”一百益二益四兩；有八地“貸郛異之金”計七十五益則益四兩。

所謂“貸”即借貸。“糴（糶）種”即購費種子。“賽金”即償還所貸金額。簡文所記借貸時間為“喜月”，即夏曆三月，正值耕種之時；賽金時間在“屈柰之月”，當夏曆十一月，正值秋收後入藏之時。“逾期不賽金”謂超過期約的時間未能償還所貸資金。

簡四六、五二、五五、六四記有“郛異之司敗”“郛異之大師”。另有簡一六五“郛異之人固敗”、簡一七三“郛異之人五慶”簡一九〇“郛異之人軋賈”，以上是“郛異”之全部用例。

“郛異”是理解以上諸簡的關鍵，然典籍闕載，是個疑難問題。就“郛異”之用例分析，存在兩種可能，其一是地名，其一是官府名。

若理解為地名，則在同一年由同一地貸出黃金（包括珠金）二百七十餘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就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而言，“郢異”祇能理解為官府名。

所謂“貢郢異之黃金……糴種”，帶有發放緊急貸款以救災的性質，“異”應理解為災異，《春秋公羊傳》定公元年：“異大於災也。”《春秋繁露》：“異者，天之威也。”“郢”讀如“越”，《說文》：“越，度也。”“越異”即渡災。作為官府名，“越異”應是楚特設的救災機構。《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徵，三曰緩刑……”鄭玄注：“荒，凶年也。”鄭司農注：“救饑之政十有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徵，輕租稅也；弛力，息餘役也……”《左傳》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知楚人救災措施與《周禮》之荒政十分相似。

從“郢異”官府實施貸金的程序看，是由楚王親自下令，“子司馬”（依文例應理解為大司馬）、令尹、大師等國家重臣親自主持，指定由某地貸金多少，規定償還日期，並由左尹官府的屬員分別記錄在案，說明此次貸金是當時楚國的重大經濟舉措，若非受貸各地遭受嚴重饑荒，諒非及此。

量 包山簡“量”僅見三例：

九月辛亥之日，臨易之宮司馬李珂受期，戊午之日不量廡下之資，阡門又敗（簡五三）

十月壬辰之日，仿令賢受期，庚月辛亥之日不量駐奉，阡門又敗。（簡七三）

不量其關金。（簡一四九）

所謂“廡下之資”，“廡”即“廡”《說文》“廡，堂下周屋。”“廡下”應指庫房，《漢書·竇嬰傳》：“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注：“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廡下之資”的含義有兩種可能，一是庫房的借貸。

二是某地某人向“廩下”借貸。

所謂“駐奉”，謂驛站養馬所需費用。

“量”謂裁量其大小，稱量其輕重。《爾雅·釋言》：“賦，量也。”郝懿行疏：“賦斂、賦稅皆爲量入，賦布、賦予即爲量出。”簡五三、七三之“量”爲量出，由於未按規定支付借貸，未按規定支付專項費用，因而其責任官員受到起訴。其一四九之“量”爲量入，“不量其關金”即未繳納關稅。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慎度量，來者有稽莫敢忘。”說明當時無論是量出還是量入，官員都必須按規定辦事，有帳目可據。如果違犯規定，帳目錯亂，將受到處罰。

賸田 “賸田”僅見以下二例：

癸月辛未之日，迅命人周甬受正，李劇取以賸田於章甑鄴邑。
(簡七七)

九月己酉之日，苛腹訟聖冢之大夫軫豎以賸田。(簡九四)
很明顯，“賸田”是一種違法行爲。按“賸”讀如“畷”，《說文》：“畷，兩百閒道也，百廣六尺。從田，𠂔聲。”畷可理解爲田界，《禮記·郊特牲》：“饗農及郵表畷。”孔穎達疏：“畷者，謂井畔相連畷。”《左傳》襄公十年：“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杜預注：“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即借正封疆爲名而侵他人田界，所謂“畷田”亦即重修田間之道而正封疆，與子駟“爲田洫”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碼事。

後 “後”作爲司法術語見以下諸例：

九月戊申之日，郿人軫鍾訟軫駁，以其歆(奪)其後。(簡九三)

左駢番戍畝田於郿或暫邑，城田一素畔蕃。戍死，其子番步後之；步死，無子；其弟番黠後之；黠死，無子，左尹士命其從父之弟番歆後(簡一五一)

之。歆畝田疴(病)於責(債)，骨償之。左駢游辰骨賈之又五釐。王士之後郿賞聞之，言胃(謂)番戍無後。左司馬造命左

令默定之。言胃（謂）番戍又後。（簡一五二）

所謂“後”為繼承，簡九三“奪其後”即剝奪其繼承權。簡一五一、一五二所述為土地買賣及繼承之訟案，是研究楚國土地制度的重要資料，有關問題李學勤先生已經作過很好的論述^⑧。以下謹補充幾點意見。

其一、所謂“城田”應讀如“町田”，城從丁聲，町、城為一音之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町原防”疏云：“《說文》云：町，田踐處曰町。史游《急就篇》云：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也。”又引賈逵云：“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也。”楚“町”之制目前尚未見實證，然據簡文之文意，“町”應是“畝”以上的計田單位。

其二，“蓄”字從艸從畜，應讀如“畝”。簡文另有從畜之字“陸”，簡一七〇“陸鐘”即“陸終”，而陸、畝古讀極近。“畔蓄”即半畝，惟“一素”尚不明其意。

其三，“骨”應讀如“副”，《說文》：“分解也”。“副債（贖）之”即將食田分割一部份出賣以抵債。

其四，“筭”字諸家多有誤釋，按字應讀如“則”，《周禮·春官·大司馬》：“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鄭玄注：“則，地未成國之名。”青川秦牘：“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一陌道。”^⑨阜陽漢簡記云：“卅步為則。”^⑩如此，“袤八則”共計二百四十步，與商鞅變法後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相吻合。楚國的田畝制度目前尚不清楚，如以卅步為則計算，“五筭”為一百五十步。

四 結語

以上討論的包山簡司法術語分三類計二十九則，另有“司法官府及職官”一類，限於篇幅，擬另文述及。楚簡司法文書所反映的最重要的內容是訴訟程序。審判程序和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二者之間是互相聯繫的，刑事立法需要有相應的訴訟程序方面的法律規定，纔能保證其實施，有什麼樣的實體法，也就有什麼樣的程序法。因而我們在討論楚簡程序法術語的基礎上，可以大致瞭解楚國實體法規的基本

構架。

注釋

- ① 《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版。
- ② 湯餘惠《包山楚簡讀後記》，《考古與文物》一九九三年二期。
- ③ 《包山楚墓》附錄二二。
- ④ 曾錦炎《包山楚簡中的受期》，《江漢考古》一九九三年一期。
- ⑤ 陳偉《關於包山受期簡的解讀》，《江漢考古》一九九三年一期。
- ⑥ 夏淦《讀包山簡偶記》，《江漢考古》一九九三年二期。
- ⑦ 李零《包山楚簡研究》，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討論會論文。
- ⑧ 李學勤《包山楚簡中的土地買賣》，《中國文物報》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 ⑨ 《青川縣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文物》一九八二年一期。
- ⑩ 參胡平生《青川秦墓木牘為田律所反映的田畝制度》，《文史》十九輯。

包山楚簡零拾

白于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1987年，在湖北荊門包山2號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戰國楚國竹簡，共約270多枚，數量可觀，文字清晰，內容複雜豐富，對楚文字以及楚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價值。

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包山楚墓》和《包山楚簡》二書，對包山楚簡進行了比較科學、系統的整理和報導，在釋文和考釋上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在學術界，特別是古文字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1992年在南京召開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上，諸多學者就曾以《包山楚簡》一書為對象，展開熱烈的討論，使包山楚簡的研究成為此次研究會的熱點。

目前，有關包山楚簡的研究文章日趨增多，就筆者所見，有關文字考釋的文章主要有湯余惠《包山楚簡讀後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二期）、劉釗師《包山楚簡文字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林雲《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四期）、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四期）、李家浩《包山楚簡研究（五篇）》（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李零《包山楚簡研究（占卜類）》（《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和《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黃錫全《〈包山楚簡〉釋文校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李天虹《〈包山楚簡〉釋文補正（35則）》（《江漢考古》1993年第三期）、周鳳五《包山楚簡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林素青《讀〈包山楚簡〉札記》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和陳松長《〈包山楚簡〉遺策釋文訂補》(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等十多篇。筆者此文,擬在諸家研究的基礎上,就《包山楚簡》個別文字隸釋上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以就正於方家。

一 痃

簡文中有如下兩字,作“𠂔”(13)、“𠂔”(127),《包山楚簡》字表(以下簡稱“字表”)隸作“痃”。按此兩字非從“丑”,簡文中作為干支的“丑”字出現的數量很多,均作“𠂔”祇有一例作“𠂔”(56),與“𠂔”字所從之“𠂔”有很大差異,而簡文中同樣是作為干支字出現的“亥”字出現有44次之多,除兩例作“𠂔”(19)、“𠂔”(55)外,幾乎都作“𠂔”,與“𠂔”字右旁相同無異。此兩字左旁從“𠂔”,即“𠂔”字,應為“𠂔”之省,簡文中從“𠂔”的字常常省作從“𠂔”,故上引兩字當釋為“痃”,“痃”字見於《說文》,在簡文中用為人名。

簡(126)又有字作“𠂔”,字表亦隸作“痃”,此字出現在與上兩字完全相同的辭例中,亦應是“痃”字。其右旁當是“𠂔”(19)、“𠂔”(55)之訛。

二 𠂔

簡(28)有字作“𠂔”,字表隸作“𠂔”。按此字右旁不是“臣”,而是“𠂔”。簡(46)有字作“𠂔”,字表隸作“𠂔”,劉釗師釋作“𠂔”,可信^①。此字在簡中用作人名,在相同辭例和相同人名的簡(64)中,此字又寫作“𠂔”,與上引簡(28)之字相同,故簡(28)之字應隸作“𠂔”,釋為“𠂔”字,“𠂔”在簡文中也用作人名。

在此有必要排列一下“𠂔”字作偏旁時在包山簡中的幾種構形,以供大家在研究中參考。

①簡(46) 𠂔異之司敗番𠂔受期

簡(55) 𠂔異之司敗番𠂔受期

- 簡(64) 咸異之司敗番 **𠂔** 受期
- ②簡(132) **𠂔** 卯 (人名)
- 簡(134) **𠂔** 卯
- 簡(134) **𠂔** 卯
- 簡(135) **𠂔** 卯
- 簡(136) **𠂔** 卯
- 簡(136) **𠂔** 卯
- 簡(136) **𠂔** 卯
- 簡(137) **𠂔** 卯
- 簡(135反) **𠂔** 卯
- ③簡(167) 郢易君之人番 **𠂔**
- 簡(175) 郢易君之人番 **𠂔**
- 簡(186) 郢易君之人番 **𠂔**
- ④簡(167) 郢人喪 **𠂔**
- 簡(58) **𠂔** 王之寗州人苛 **𠂔**
- 簡(58) **𠂔** 王之寗市之客苛 **𠂔**
- 簡(191) **𠂔** 王之寗市客苛 **𠂔**

通過以上比較，知包山簡中“𠂔”字最常見的寫法是 **𠂔**，另外有 **𠂔**、**𠂔**、**𠂔**、**𠂔** 等幾種變形。

三 𠂔

簡中有字作“**𠂔**”(67)、“**𠂔**”(181)、“**𠂔**”(186)等形，字表釋作“𠂔”。簡(153)又有字作“**𠂔**”，字表亦釋作“𠂔”。按此兩字形近而有別。鄂君啓節舟節有字作“**𠂔**”，諸家隸作“沽”，

讀“湖”，唯陳偉釋爲“油”^②，他認爲：“先秦文字中，由的單字尚未能確認，由、古二字也就沒能分別開來，不過《說文》所謂‘兜鑿也。從月由聲’的‘胄’字倒屢有所見，其釋讀也爲學者所公認。我們可以將胄字所從之由與古及從古而作的字進行比較……兩字形體大致類似，卻又存在着明顯的區別。這就是古字上部十字交叉，橫劃長出，由字上部則祇有一豎劃，或在一豎劃中著一圓筆。雖然古文字的点、橫時有互作，但這兩字卻界限森嚴，一般未見交叉。”並舉‘胄’字小孟鼎作“𠂔”、康殷作“𠂔”，中山王方壺作“𠂔”爲證。我們認爲陳說是正確的，其對鄂君啓節“𠂔”字的考證結論也準確可信。簡中此字右旁與“𠂔”字右旁相同無別，故亦應爲“由”字，此字左旁從邑，故字當釋爲“邨”，簡文中“邨邨”、“邨易”都用爲地名，其具體地望待考。

不過陳偉指出的“由”“古”二字的區別特徵尚有可修正之處。包山簡有字作“𠂔”（269）、“𠂔”（270）、“𠂔”（牘1），“𠂔”（牘1），從辭例來看，此四字用法全同，必爲一字無疑，字表釋爲𠂔是正確的，但所從之右旁有𠂔、𠂔兩形，可見由字上部也有十字交叉之例。筆者認爲這種情況的出現可能是與文字演變的“類化”有關。從文字演變的通例來看，古文字中有許多字都是在原有的一豎畫上加一小點再轉變爲一橫。所以由字上部出現十字交叉之形也不足爲怪。但古和由也並非因此而變得無法辨別，首先，凡古字上部都是十字交叉之形，從未見有一豎畫或一豎畫之上加一點的情況；其次，凡古字下部都從口，而由字則往往於口內加一小橫。儘管古文字中“乘隙加點”的情況屢見不鮮，但此處一小橫則可能是書寫者考慮到古、由形近易混而特意加入的一種“區別符號”。

四 𠂔

簡（85）有字作“𠂔”，字表釋爲“駸”，甚謬。字左旁應爲𠂔，非爲馬，（“𠂔”字字形詳下“鴈”字考釋）。另外，包山簡中

馬字與從馬之字屢見，如馬字作“𠂔”（8）、“𠂔”（牘1）；駁字作“𠂔”（93）、“𠂔”（234）；騎字作“𠂔”（119），例多不贅舉。馬字均作“𠂔”“𠂔”之形，與簡文“𠂔”字之左旁形似而實異。此字右旁應為晏，簡中有“𠂔”字作“𠂔”（145）、“𠂔”（181）、“𠂔”（186），所從之“晏”與此字左旁相同無異，故上引之字可隸作“𠂔”。根據古文字的一般規律來看，“𠂔”字應分析為從“晏”聲。上古音“晏”屬元部，“嬰”屬耕部，耕元二部關係密切，可以通用③。戰國文字中晏與嬰在用作聲符時經常可以替代。如王子嬰次廬的嬰字作“𠂔”，從貝從晏，是將嬰字所從之“女”變形音化為與嬰聲相近的“晏”。古璽和陶文的“嬰”字作“𠂔”（1935）和“𠂔”（《古陶文匯編》3.1248），亦從晏為聲（裘錫圭、李家浩說），簡文嬰字從晏作“𠂔”（包山259）、古璽作“𠂔”（5623）、“𠂔”（1573），凡此均可證“嬰”可替換“晏”④。故“𠂔”應即“鸚”字，即“鸚鵡”之“鸚”，“鸚”字見於《說文》，在簡中用為人名。

五 護

簡（90）有字作“𠂔”，字表釋為“信”。按此字左旁從言，右旁應為復字。簡文中鄭字習見，作：“𠂔”（10）、“𠂔”（10）、“𠂔”（164）、“𠂔”（189）諸形，所從之右旁與上引之字右旁相同，故上引之字可隸作“護”，“護”字不見於字書，字從言從復，應為復言、復書之“復”的專字。簡文“繁丘少司敗遠𠂔復𠂔”，過去由於誤將“護”釋為“信”，所以致使文義不明，斷句也有問題。按此處“護”當讀為“復”，意為回復、答復。《小爾雅·廣言三》：“復，白也。”《周禮·秋官·大司寇》：“凡遠近惇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鄭玄注：“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是以王辭而不復。”司馬貞索隱引郭璞曰：“復，答也。”

“𠂔”湯余惠先生釋為“札”⑤，可從。《說文》：“札，牒也。”

徐鍇《繫傳》：“牒，木牘也。”簡文“發札”之語習見，意為發出公牘文書，此“復札”是與之相對而言，意為回復、上報的公牘文書。

六 鄱

簡(100)有字作“𠂔狀”，字表隸作“鄱”，考察此字左旁筆畫，非為米，中間一豎筆並沒斷開，而是上下相連，故字當隸作“鄱”。米、番音近，在古文字中用為表音偏旁時常可替換，師旂鼎“播”字作“𠂔”，《璽璽》(0098)有“吳鄱大夫璽”，何琳儀先生讀“吳鄱”為“嶧鄱”^⑤，可從。其中“鄱”字原篆作“𠂔”，簡文之字與此應為一字，亦應是“鄱”字，簡文“鄱邑”用為地名。春秋時楚有番邑，秦置鄱縣，西漢改名番陽，東漢始作鄱陽，《字匯·邑部》：“鄱，古作番，春秋楚番邑。”《史記·楚世家》：“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為楚東境，秦為番縣，屬九江郡，漢為鄱陽縣也。”

七 赤

簡(102)有字作“𡗗”，釋文釋為“炎”。簡(276)與牘(1)又有字作“𡗗”、“𡗗”，釋文又釋為“赤”。按此三字上部從赤，下部從火，形體完全相同，當屬一字無疑，並以釋“赤”為是。簡文中“赤”字另見，作“𡗗”(168)、“𡗗”(184)，上部均從大。“赤”字原本從大從火，為會意字，此在其大字兩側分別加一小點，使其變為赤字，當屬“變形音化”，即使赤字由會意字轉變為從火赤聲的形聲字。古音“赤”為喻母鐸部字，“赤”為昌母鐸部字，聲母同是舌音，韻則疊韻，故“赤”字可以以“赤”字作為聲符。《說文》“救”字或體作“𡗗”，可證赤、赤在用作表音偏旁時可以互換。

八 豐

簡文中有如下兩字：“**𧯛**”(124)、“**𧯛**”(145)，從形體結構來看，此兩字形體相同，當為一字無疑，但釋文將第一字釋為“**豐**”，將第二字釋為“**豐**”，不知何意。按此兩字應俱為“**豐**”字，林澐先生曾對“**豐**”、“**豐**”二字作過確切的論證，即上部凡從“**珏**”者為“**豐**”，凡從“**𧯛**”者為“**豐**”^①。包山簡中從“**玉**”之字多見，**玉**字和**玉**旁均作“**王**”，與此兩字上部所從不類。金文和秦漢文字中“**豐**”字很常見，其上部所從均與簡文上引兩字上部形近，至於其上部將所從之“**𧯛**”寫成“**𧯛**”乃是由於簡省所致。此兩字又出現在相同的詞句中，簡(145反)為“司豐之客”，簡(124)為“司豐之臺邑人”，故此二字均應釋為“**豐**”。

又簡(21)有字作“**𧯛**”，字表釋為“**豐**”，按此亦應為“**豐**”字。武威漢簡《儀禮·泰射》四二有“**豐**”字作“**豐**”，《漢印文字徵補遺》有“**豐**”字作“**𧯛**”，曹全碑“**豐**”字作“**𧯛**”，魏王基殘碑作“**豐**”，史晨碑作“**豐**”，所有這些“**豐**”字均與簡文之字形近，而且此字亦出現在與前引兩“**豐**”字相同的詞句中，為“司豐司貳鄆頤”。故此字應是前引兩“**豐**”字的異體，這一差別可能是由於書寫者不同造成的。

根據前後辭例比較，知“司豐”應是地名，其地望待考。

九 柎

簡文中有一個從“**木**”的字，作如下之形：

柎(129)、**柎**(130)、**柎**(130)、**柎**(164)

前三字字表釋為“**柎**”，後一字字表釋為“**宋**”。考察後一字之形體，“**木**”旁上部應是從“**人**”而非“**人**(𠂇)”，故同前三字應為一字。

簡文中又有一個從“**見**”的字，作：

𧯛(138)、**𧯛**(164)、**𧯛**(175)

此字劉釗師隸作“𦣻”，釋為“瞱”^⑩，可信。此字又見於鄂君啓節，作“𦣻”，右旁又見於屬龍鐘，作“𦣻”，讀為“永世毋忘”的“世”。以上諸字所從之“世”均與上引“𦣻”字上部所從不類，故此字不當釋“葉”。

包山簡中“冬樂之月”的“冬”字多見，作：




𦣻(2)、𦣻(81)、𦣻(83)、𦣻(206)上部所從與“𦣻”字上部全同。《說文》：“冬，四時盡也，從夂從文，文古文終。”故“𦣻”應即“終”字。甲骨文終字作“𦣻”，金文作“𦣻”，簡文之“𦣻”與之一脈相承，但稍有變異。故“𦣻”字可隸作“𦣻”，終與冬音近，典籍中經常通假，如《易·比》：“終來有它，吉。”漢帛書本終作冬；《老子》五十二章終：“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漢帛書本終作冬。故“𦣻”可釋作“終”，“終”字見於《集韻》等字書。在簡(129)、(130)中，終字用為地名，地望待考。簡(154)中終字用作姓氏字，疑當讀作“冬”，古有冬姓，見《通志·氏族畧》。

十 鴈

簡(145)有字作“𦣻”，字表當作未識字隸作“𦣻”。此字何琳儀先生釋作“鴈”^⑪。按此字上部從“产”沒有問題，下部“𦣻”實為“鳥”字，鳥字作為偏旁在包山簡中屢見，如鳴字作“𦣻”(194)、“𦣻”(95)、鵠字作“𦣻”(183)、鷄字作“𦣻”(257)、“𦣻”(258)，所從之鳥旁均與此形近，頁字在簡文中均作“𦣻”(續1)、“𦣻”(續1)之形，均與此形不類。故此字應隸作“鴈”。戰國貨幣文字中有一字作“𦣻”，裘錫圭先生隸作“鴈”，釋為“鴈”，其說可信，^⑫簡文此字與“𦣻”為一字無疑，故亦應釋為“鴈”。“鴈”字見於《說文》，在簡文中用為人名。

十一 鴈

簡(145)有字作“𦔻”，字表隸作“𦔻”，無釋。按此字右旁從卑沒有問題。但左旁應為“𦔻”。古文字中許多字都加“口”繁化，這種“口”祇是一種羨符，並無實在意義，“𦔻”字本身就常有這種下部加“口”的繁體。如金文“鼓”字就有如下之形體：

 (沈兒鐘)  (郟王子鐘)  (王孫喜鐘)

這種加“口”的“𦔻”字一直保持到漢代，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後二一七有“鼓”字作“𦔻”，《老子》乙前一二上作“𦔻”，前一形當為後一形之省寫。

簡文之字應隸作“銘”，“𦔻”象鼓形，實即“鼓”之初文，故“鼓”、“𦔻”可通用。隨縣曾侯乙墓鐘磬文所記音階名“鼓”有如下幾形：

故簡文之“𦔻”應即“𦔻”字，字見於《說文》，在簡文中用作姓氏字，疑當讀為卑，古有卑姓，見於《通志·氏族略》。

十二 煮

簡(147)有字作“𦔻”，字表釋為“具”，林雲先生和刘劍師都有專文論述^④，將此字釋為“煮”，確不可移。簡(129)有字作“𦔻”，字表亦釋為“具”，從形體來看，此字亦應為“煮”字，同上比較，祇是略加簡單而已。將此字釋為“煮”，對文義的理解亦很有幫助。

簡文言：“左司馬造以王命：（命）恒思舍柁煮王之饗一青瓊之寶，足金六鈞。”《說文》：“煮，亨也。”《說文》：“饗，齊謂之炊。”《周禮·天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簡文“煮”與“饗”在一句中出現，與典籍中關於“饗”字的解釋正相合。

《詩·楚茨》：“執饗踏踏。”《傳》：“饗，饗饗、廩饗也。”《疏》：“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可見“饗”在古代有“饗饗”和“廩饗”之分。《儀禮·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雍饗

在門東南，北上。”鄭玄注：“雍人，掌割烹之事者，饗，竈也……羊、豕、魚、臘，皆有竈，竈西有鑊。”《儀禮·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觀匕與敦于廩饗。”鄭玄注：“廩人，掌未入之藏者。”

簡文“饗”字之後為“一青犖”，後一字《包山二號楚墓簡牘釋文與考釋》認為是“犖羊”兩字合書，考察此字的筆畫，上部是否為“犖”尚不能確認，但下部從“羊”是可以肯定的，故此字當與“羊”有關，所以簡文之“饗”很可能是用來烹煮牲臘魚的“雍饗”，而非煮飯食之“廩饗”，應由雍人掌管。

“賚”字劉釗師認為當讀“資”^④，甚確。《周禮·天官·外府》：“賚，賜與之財用。”又《掌皮》：“歲終則會其財用。”《注》：“予人以物曰賚……”

根據以上分析及同後簡(130)的辭例對比，知此簡中的“恒思”與“終”均用為地名。此句大意可能是講左司馬造以王命命恒思之地方官給予終地一筆用來為楚王烹煮一青犖的費用，其值為足金六鈞。

十三 逖

簡(167)有字作“逖”，字表釋作“逖”。按此字右上非為爰字，鄂君啓節“爰陵”之“爰”作“𡗗”。簡文中從“爰”之字亦多見，如：

𡗗：𡗗 (45)；𡗗：𡗗 (110) 𡗗 (182)

𡗗：𡗗 (5)；𡗗：𡗗 (76) 𡗗 (90) 𡗗 (189)

所從之“爰”均與鄂君節之“爰”形近，與“逖”所從之“𡗗”不同。魏三體石經“逖”字作“𡗗”，與“逖”右上所從相同，故“逖”應釋為“逖”，“逖”字見於《說文》，在簡文中用作人名。

十四 邾

簡文中有如下兩個字：邾(167)、邾(175)，字表釋為“邾”。

按此字右旁非爲蔡字，而應是求字。簡文中從求之字多見，如：

救：𠂔 (226)、𠂔 (228)、𠂔 (230)、𠂔 (續1)

悵：𠂔 (90)、𠂔 (90)、𠂔 (171)、𠂔 (189)

求旁寫法略同。簡文中邾字亦多見，作“𠂔” (120)、“𠂔” (18)、“𠂔” (31)、“𠂔” (200)、“𠂔” (206)，所從之右旁均與上引之字之右旁不類，故上引之字當釋爲“邾”，“邾”字見於《廣韻》、《集韻》，在簡文中用爲姓氏字，應讀爲“求”，字爲求姓之求的專字，故增附邑旁。求姓見《通志·氏族略》。

十五 𠂔

簡 (175) 有字作“𠂔”，字表隸作“𠂔”。此字左旁從“肉”，右旁非爲“女”，而應是“欠”字，簡文從“欠”之字多見，如：

𠂔：𠂔 (85)；𠂔：𠂔 (146)、𠂔 (189)

𠂔：𠂔 (168)；𠂔：𠂔 (143)、𠂔 (143)

可見，欠有“𠂔”、“𠂔”兩形，上引之字之右旁與第二形接近，故字當釋爲“𠂔”，字見於《玉篇》，在簡文中用爲人名。

十六 𠂔

簡文中有如下兩字：𠂔 (204)、𠂔 (213)，字表隸作“𠂔”，按此字上部從“竹”，中間“𠂔”沒有問題，其下部應是“巾”字。古文字中“巾”字往往於其上部加一小橫，變得類似“市”字。金文中“𠂔”作“𠂔”，也作“𠂔”即其例。包山簡中有貞人名“石被裳”，其中“裳”字有如下四種寫法：“𠂔” (199)、“𠂔” (244)、“𠂔” (203)、“𠂔” (214)，後兩形均從“巾”，衣、巾義近，故可通用。其中第四形所從之“巾”上部亦有一橫，祇是位置更靠上而已。故上引兩字可隸作“𠂔”，字應即“𠂔”字。按照古文字的一般規律，“𠂔”應從“𠂔”聲，而“𠂔”應以“𠂔”爲聲符，“𠂔”與“𠂔”在用作

聲符時常可互換（詳前‘都’字條），故“籒”可從“米”作。“籒”字見於《集韻》，即“籒”字異體，其在簡文中的用法待考。

十七 繹

簡（276）有“𢇛𢇛”一詞，字表隸作“𢇛𢇛”，但無釋。“𢇛”字劉釗師認為當讀作“輶”，訓“車下”^⑧，其說可從。足、胥音同，在用作聲符時經常互換，如簡文“楮”作“𣎵”（258）楮作“𣎵”（80），可證。“輶”字在此疑當讀作“繹”，輶從韋表義，繹從系表義。韋與革義近，韋（或革）同系在用作表義偏旁時常可互換，故從韋（或革）之字常有從系之異體，如：韌和紐，鞅和紳、鞅和緋、鞅和緞。蓋古代同一種東西往往有絲製和革製的不同，這種情況的存在使得在形聲字大量出現的戰國時代書寫者也往往把表示同一種東西的字書寫為從系和從韋（或革），在當時，從系和從韋（或革）也許是有意加以區別這些絲製和革製的同種東西，但到後世，隨着造字本義的模糊和消亡，從系和從韋（或革）也就往往混而為一了。

輶從卑聲，繹從畢聲，卑為幫母支部字，畢為幫母脂部字，兩字雙聲，韻亦不遠。字書中“輶”字就有“輶”為或體。武威漢簡《儀禮·服傳》四有“繹”字寫作“𢇛”，而此字在《泰射》六二中則寫作“𢇛”，從卑聲，可證輶確可讀作繹。

《說文》：“繹，止也。”《說文通訓定聲·履部》：“繹，按以組約圭中，以索紮車下皆曰繹。”段注：“〈考工記·玉人〉曰：‘天子圭中必’。〈注〉曰：‘必讀如鹿車繹之繹……’鹿車下鐵，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所謂鹿車繹也，與用組約圭中央皆所以止者。”

據此，“輶繹”當指車下用來約束車行的索帶。此詞在牘1句法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寫作“楚縛”。楚從足聲，故可假借為“輶”。

附 記

本文是從筆者的碩士學位論文《包山楚簡文字編》的第二部份《包山楚簡文字考釋》中摘錄刪節而成的，文章的寫作是在劉釗先生的悉心

指導下完成的，並得到林雲先生的幫助，謹此致謝。

注釋

① 劉釗：《包山楚簡文字考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屆學術研討會論文。

② 陳偉：《鄂君啟節之“鄂”地探討》，《江漢考古》1986年2期。

③ 李家浩：《仰天湖楚簡十三號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輯。

④ 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待刊。

⑤ 湯余惠：《包山楚簡讀後記》，《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2期。

⑥ 何琳儀：《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十九輯，1992年。

⑦ 林雲：《璽豐辨》，《古文字研究》十二輯。

⑧ 同注①。

⑨ 何琳儀：《包山竹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

⑩ 泰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78年2期。

⑪ 林雲：《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劉釗文同注①。

⑫ 同注①。

⑬ 同注①。

戰國時期的遣策

彭浩（湖北省荊州博物館）

在我國戰國時期的墓葬中，曾發現過不少的簡牘，其中有一類是專門記錄衣物、車馬器、食器等物件名稱、數量、質地的竹簡，學術界一般稱之為“遣策”。“遣策”一詞見於先秦文獻，以《儀禮》所說最為明確。《儀禮·既夕禮》記載：“書遣於策”，注：“策，簡也，遣猶送也。”可知，遣策應是他人贈送物品助喪的登記冊。而實際發現的這類遣策卻大部份是他人贈物和自備物品的登記冊，或者完全是自備物品的登記冊。為方便起見，本文仍舊沿用舊有的習慣稱呼，把登記隨葬物品的竹簡統稱作遣策。《儀禮·聘禮》載，隨葬物品“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在戰國墓葬中尚未發現這類的“方”，在包山二號墓中曾出土過一件竹牘，所記執事人受一輛正車及車上所載之物，並未記其它物品，應是與《聘禮》所說的“方”不同性質的另一種文書。

到目前為止，在戰國墓葬中已發現以下幾批遣策：

1. 湖南長沙五里牌406號墓，1952年發掘。由於墓葬被盜，竹簡已殘斷，現存殘片38枚①。
2. 長沙仰天湖25號墓，1953年發掘。據發掘報告統計，有竹簡43枚，發表的圖版中有39枚，多數簡完整②。
3. 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墓，1957年發掘。發掘報告把墓中出土竹簡按內容分作兩組，第2組是遣策，共29枚，保存較完整③。
4. 湖北江陵望山2號墓，1965年發掘。在簡報中發表了部份竹簡的照片和摹本④。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在《戰國楚簡研究（三）》

中收錄了全部的遺策⑤。

5. 湖北江陵藤店1號墓，1973年發掘。有24枚殘簡⑥。

6. 湖北江陵天星觀1號墓，1978年發掘。竹簡分卜筮祭禱和遺策兩組，遺策全部殘斷，拼接後尚有200余枚⑦。

7.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1978年發掘，竹簡215枚，全部是遺策⑧。

8. 湖北荊門市包山2號墓，1986年發掘。竹簡分卜筮祭禱和遺策兩組。遺策部份有竹簡27枚⑨。

上述八批遺策的年代應與墓葬年代一致。曾侯乙墓的年代約公元前443年或稍晚，相當於戰國早期。望山2號墓、藤店1號墓相當於戰國中期。天星觀1號墓的報告者認為，墓葬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前後，即楚宣王或威王時期。長沙五里牌406號墓和仰天湖25號墓大約是戰國晚期的。信陽長臺關1號墓的年代歷來眾說紛紜，報告認為是戰國早期，與已發掘的楚墓比較，定在戰國中期或稍晚似乎更可信。

這八批遺策的內容可以分作三類：第一類是以登錄衣物、禮器、食器和兵器為主，第二類比第一類多出車馬器具；第三類以登錄車馬和兵器為主。

出第一類遺策的墓以仰天湖25號墓為代表。這組遺策的首簡係記年簡，殘存簡文：“□孝般之年□”⑩。缺失的文字應是這組簡的名稱。遺策所記物品有他人贈送的衣物，如“鄒（許）易公一紵衣□經之□”、“何馬紵衣絳純絳繡”，“中君之一紵衣□純紵縞之繡”。楚國稱縣令為尹或公，鄒易公可能是縣公。中君則有可能是封君。簡文中的其它物品皆未注明物主，很可能是自備的。它們大多是各種衣物，佩飾和日用品。如“一結衣”、“一紵（組）縹”、“一新智縷。一岳智縷，皆又（有）虞足縷”、“革（？）縹又（有）玉環紅紵（組）”等。食器有“羸膚一隅”、“羽膚一隅”和各種用於存放食物的“筴”。銅器有“一鑄”、“一鉈（匝）”等。其它用器還有“一鑒”、“一齒（梳）”、“一紫絳之筴（席）”等。兵器則有“一戠（越）□鑄（劍）”、“二鄰（蔡）鉞（匕）”⑪等。藤店1號墓的遺策記有戈等兵器的名稱。

出第二類遺策的有長沙五里牌406號墓、信陽長臺關1號墓、江

陵望山2號墓和荆門包山2號墓。五里牌406號墓的竹簡全部殘缺，可辨識出有兵器和車的記錄。望山2號墓竹簡的首簡是“□周之戡(戡)八月辛□□□，車與器之典”。此簡有記年，格式與仰天湖25號墓的竹簡首簡相同，其絕對年代無從查考。此簡明確指出，這組遺策是“車與器之典”，即記載隨葬的車和其他物件的典冊。簡文共記有三輛車，其中有“女輅(乘)”、“畋(田)車”。簡文詳細登記了各輛車上的附件、飾物，懸掛的旌旗和車傘蓋等。每輛車均單獨起行書寫。簡文未說明是否他人所贈，可能是自備的。其他的隨葬物品大致分類別登記在竹簡上。例如，簡文有“金器：六鬲，又(有)盞(盞)。四罍，又(有)盞(盞)。二卵缶，又(有)盞(盞)。二盞，二鈔(匱)，卵盞……”。由於竹簡殘缺，其它物品的分類名稱已不見，但從簡文的內容上仍可推測出大致的情況。如“□二鬲、二盞(鑒)……”、“……一迅缶、一湯鼎……”、“□一盞、一融……”應是一組禮器。“一牛櫬、一豕櫬、一羊櫬、一□櫬、一大房、四皇俎、四皇豆……”則是一組與禮器相配的飲食器具。此外，還有一些日用品，如“一大盞(鑒)”係指銅鏡，“二𩊦冠(冠)”係指獬冠。兵器則有劍七件，嵩(短)戈一件。在殘簡中還發現有兩枚簡頭，分別記有“奉易公”和“長王孫”，似為贈物助喪之人，但所贈之物已無從知曉。此墓中的隨葬品反映在遺策上似以自備之物為多數。

信陽長臺關1號墓遺策所記全係自備物件，沒有他人贈送的物品。簡文依照物品的用途分組書寫，共分六組，每組簡文的開頭冠以“××之器”，然後逐一分列相關物件。如“樂人之器”包括一組編鐘，小大共十三枚，有虞架，它們就是著名的“曾侯乙”編鐘。編磬一組，小大共十九枚，有虞。鼓一具。還有一種樂器名不可辨識。有的分類簡字跡不清，僅能從其所記器名來推測。編號2-01簡所記為各種容器，用以盛酒。2-08和2-09簡所記多為盥洗器。2-012簡所記為盛食物的瓶、豆。2-024簡為“集積之器”，2-029簡是“糈之器”，所記為盛飯之器。簡文也記有車名，有軒車、女乘等^②。

荆門包山2號墓的遺策是分室放置的，共三組，把各組簡文的內

容與隨葬品相對照，竹簡有錯放的現象。“食室之金器”是記錄存放食物的銅器，有鼎、匕、“𦉰白之膚”、“𦉰膚”、簋豆等。“臥室之臥”列舉了各種食物，有“脩一簋（簞）”、“胾（臠）一簋（簞）”及各種蔬菜。“臥室所以食筭”記載了用筭盛放的各種食物，有“豕胾（臠）”、“𦉰（蒸）豬”、“𦉰（炙）鷄”、“𦉰（姜）”、“𦉰”等。“相尾之器所以行”是記載供出行使用的物件，有冠、屨、席、可收折的牀和筭等。“大北之金器”記有相應的禮器，包括各種鼎、盥洗器具及與之相配套的食案、俎等。另外有十枚簡記有四輛車，有正車、韋車、羊車等。編號267-270簡特別詳細地記載了在墓主左尹邵郢地下葬時（“大司馬邵郢救郢之歲昌月丁亥之日”）一輛角車上的各種附件、飾物、旌旗，甲冑等。簡277所列為“苛郢受”之物，這些物件是他人贈送的。值得注意的是，墓中有一件竹牘，是記載執事人所受的一輛正車，詳細登記了車上的部件、飾物、旌旗等，最後有“一軛車之上口皆實執事口不口口之口”十餘字，說明車上之物與執事人的關係，可惜有的字漫漶不清，無法窺得全貌。從此牘內容來看，與同墓遣策中的記車輛簡沒有明顯的不同，為何單獨寫在竹牘上，值得再研究。

出第三類遣策的有江陵天星觀1號和曾侯乙墓。從墓中所出簡文可知，天星觀1號墓的墓主是鄧熒君番勅。此墓的遣策是記載自備和他人贈送的車輛、馬匹。贈送車馬的多為官員，如“集脰尹”、“集精尹”、“宰尹”、“集尹”等。贈送的車有軒車、王車等。簡文並詳細地記載了車馬器具和飾物的名稱。遣策的另一部份是記錄鄧熒君番勅送葬時所陳的車馬，儀仗及馭車者。這些車輛都是兵車，如“廣車”、“旆車”等。根據古代車制，兵車的名稱就標示着它在車陣中的位置。旆車是用於載軍前大旗的，一般位於全軍之首。乘廣分作左、右，即左廣和右廣，分居兩側。該墓遣策沒有記載其它的禮器、食器和用品。

按曾侯乙墓遣策首簡的記載，這組簡是“畢起執事人書入車”。這組簡依其內容可分作四部份。第一部份是列舉喪禮上的陳車，所入車“大凡四十乘又二乘”，與各簡所記車數略有出入。喪禮上所陳

之車均記明馭車者之官稱、名。車輛均標明名稱、車上部件、飾物及所載旌旗、兵器、甲冑。按簡文記載，有輅（廣）車十二乘，包括大旆、左旆、大殷、左殷、右殷、乘廣、少廣。先秦時期把兵車統稱作廣車，旆、殷、乘廣、少廣均是按此車在車陣中的位置而得名的，此外，還有一些日常乘用之車，如敏（耿）車、游車等，馭車者有些是前來參加喪禮的官員，如官廩敏（令）、差（左）敏（令）、鄭連囂（敖）、新官敏（令）；有的是無官職者為他人馭贈送之車，如“哀還馭敏（令）尹之一乘留車。”自備之車都是由無官職者駕馭，如“黃夏馭右輅（旆）”、“黃、賈所馭左輅（旆）”等。參加喪禮的官員以右令建的職位最高，他乘坐的大輅（旆）之車，居於車陣的首位。簡文的第二部份記載了有關車輛上配置的甲冑和馬匹用甲，共有真甲六十四件，馬甲八十六件。這些車輛的名稱與簡文第一部份所記車名大致相近。簡文的第三部份是記載駕車之馬的位置和名稱，如“右尹之白為左騂，大迅尹之黃為左騂（服），大攻（工）尹之駟為右騂（服），鄭牧之騂為右騂。新官人之駟 =（駟馬）。左輅（旆）。”簡文的第四部份記載助喪所贈之車馬，整理者認為，簡文中的“幣”字當與贈送車馬有關。贈送的車輛中有造（路）車九乘，其他車輛八乘。贈送車馬之人有“王”、太子及封君。王似指楚王，因為楚、曾兩國是緊鄰，關係密切，楚王為曾侯乙去世贈送車馬也是合乎情理的。其它一些諸侯國的官員也參加了曾侯乙的喪禮，並贈送了相應的禮品，如“宋司城之駟為左騂”“宋司城之駟為右騂”“遊（旅）揚（陽）公之造（路）車之輦（乘）”等。

以上各墓的遣策均置於椁室之中，遣策所記的隨葬物品除車、馬之外，大多能與實物相對照。車、馬均以車馬器或飾件替代放入墓中。

上述之類遣策的內容和格式是不完全相同的。第一類遣策的內容比較簡單，仰天湖25號墓的遣策以一枚簡記一件物品，簡長僅22厘米。這些特點與西漢時期的遣策相似。第二類遣策的長度一般在60厘米以上，一枚簡上記載若干物品名稱，少留或不留空白。出土這類遣策的墓葬在椁室四周都有器物箱，因而遣策也往往分作若干組，按隨葬物

品的用途，功能分類，它比第一類遣策多出了車馬及飾物等。第三類遣策的長度與第二類接近，在內容上以記載墓主家自備和他人贈送的車、馬為主，而不記載其他隨葬品。上述之類遣策的異同，對我們深入了解戰國時期的喪葬制度，尤其是楚國的喪葬制度有很大的幫助。

到目前為止，已發掘的戰國墓葬數以萬計，楚墓的數量也近萬座，但祇發現了以上八批遣策。除了保存方面的原因外，似乎也暗示着遣策的使用並不是普遍的。凡是發現有遣策的墓葬，其規模都比較大，墓口長度都在10米以上，葬具至少是一槨二棺，這都超出一般的小型墓葬。據研究，藤店1號墓和望山1號墓墓主生前的爵位是下大夫，長臺關1號墓和包山2號墓墓主的爵位接近上卿。仰天湖25號墓被盜，望山2號墓公佈了部份資料，均不易判斷墓主人準確的身份，由於這兩座墓的葬具為多重棺槨，估計墓主人生前身份不會低於大夫。曾侯乙墓屬諸侯，天星觀1號墓屬封君。因此，我們可以據此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國時期遣策的使用限於身份是大夫或地位更高的人。《儀禮·既夕禮》說，在士的喪禮中使用遣策或方，與考古發現並不相合。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可能是《儀禮》所記的是有祿田的士的喪禮。

先秦文獻把贈送車、馬助喪稱作贈。關於贈的含義，文獻的說法不一：

《穀梁傳·隱公元年》：“贈者何也？乘馬曰贈。”

《公羊傳·隱公元年》：“車馬曰贈。”

《荀子·大略篇》：“輿馬曰贈。”

歸納起來，贈的含義包括：一是贈送馬匹，如《穀梁傳》所記；二是贈送車和馬匹，如《公羊傳》、《荀子》所記。從我們所討論的八批遣策來看，這兩種形式的贈都存在。《儀禮·既夕禮》認為，在士的喪禮中，“公贈，玄纁束帛、馬兩”，即贈馬兩匹。目前在與士的身份相當的一棺一槨墓中尚未發現過遣策，這些墓中的隨葬品幾乎沒有車馬器，屬無祿田的士。由此可見，在戰國時期的無祿田的士的喪禮中是沒有贈的。有祿田的士是否就一定有贈呢？還有待於新的發現來證實。第三類遣策中有關他人贈送車、馬的記錄可以認為是贈，自

備的車馬不能算作贈。第二類遣策中的望山2號墓和長臺關1號墓雖然有車的記錄，但未標明贈送人，故祇能認為是自備的，不能算作贈。包山2號墓的遣策雖然記有車名，多為自備，祇有竹簡上所記的一輛車是他人所贈，可算作贈。這大約與墓主人邵蛇生前官至左尹，且出身王族不無關係。這一類遣策基本上是自備車馬的記錄。一般情況下，在這類墓主的喪禮中是沒有贈的。值得注意的是，長臺關1號墓和包山2號墓遣策記錄的自備車均為五輛。如果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許就與當時的制度有關。

喪禮上所用的車以兵車為主，從遣策記錄的車名便可得到證明。為什麼要使用兵車呢？這與喪禮的某些規定有關。

《周禮·巾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噭啓關陳車。”

《車僕》：“車僕掌戎路之革……大喪廄革車”。

《禮記·少儀》：“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鄭注：“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

《禮記·雜記》：“介賻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賻。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廣）、大路於中庭北……”。

從上列材料中可以看出，在一定等級的喪禮中，不論是自備之車，還是他人贈送之車，都必須“陳車”，即按一定的位置排列，組成車陣。

文獻把贈送衣衾助喪稱作襚。《穀梁傳·隱公元年》：“衣衾曰襚”。《荀子·大略篇》：“衣服曰襚”。第一、二類遣策大都記有衣物，既有他人贈送的，也有自備的。在個別不出遣策的墓葬中，也有贈送衣物的現象，如江陵馬山1號墓的一件竹簡上有一枚簽牌，上書“□以一緇衣見於君”，簡內則放着一件小尺寸的衣服^⑤，這種現象似可稱作襚。贈衾助喪的例子目前祇見於包山2號墓，覆蓋在此墓外棺上的衾下壓有一枚簽牌，從上面的文字可知，衾是他人贈送的^⑥。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戰國時期，祇有大夫和大夫以上的人纔能在喪禮中使用遣策；賻應是贈送車馬助喪的總稱，是擁有上大夫以上爵位的人的喪禮中纔有出現，與《儀禮·既夕禮》

的記載並不相同；在貴族的喪禮中，槨的使用則較為普遍。

注釋

-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8年。
- ②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仰天湖第25號木槨墓》，《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
-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 ④ 湖北省文化局文化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 ⑤ 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戰國楚簡研究》（油印本），1977年廣州。
- ⑥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藤店1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
- ⑦ 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 ⑧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⑨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
- ⑩ 此從史樹青先生釋讀，見《長沙仰天湖出土楚簡研究》，羣聯出版社，1955年。郭若愚先生釋讀為“楚孝般之年”。見《長沙仰天湖戰國竹簡文字的墓寫和考釋》，《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⑪ 匕指取食器或兵器。《史記·吳太伯世家》：“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索隱：“匕首，短劍也”。
- ⑫ 該墓記載車輛的簡是2·04：“……一良□軒，紆□紆，良馬之青，……一良女乘，一乘良□，二乘□□……”。
- ⑬⑭ 湖北省荊州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楚帛書“夸步”解

吳振武（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八行”篇（饒宗頤等稱“甲篇”，李零等稱“乙篇”，李學勤稱“四時篇”）共分三章，第二章的最後一句話是“帝俊（俊）乃爲日月之行”，接下來是第三章。第三章字數不多，但有多處缺文，不過經過各家考釋，大概的意思還是可以知道的。下面鈔錄這一章，並按我們的理解施加標點。

共攻（工）夸步，十日四寺（時）□；□神則閔四□，毋（毋）思百神，風雨晷禕亂乍（作）。乃逆日月，以傳相□思，又（有）宵又（有）朝，又（有）晝又（有）夕。

這一章開頭第一句話是：“共攻（工）夸步，十日四寺（時）□。”“步”前一字，過去有“鬼”（商承祚，1964）、“行”（林巳奈夫，1964）、“夸”（饒宗頤，1968、1985）、“劓”（何琳儀，1993）等釋法。細察巴納《楚帛書譯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1973年）和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兩書所附紅外線照片，可知饒、曾《楚帛書》和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年）摹作𠂔是正確的，而其他學者所摹則多不可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同行上下字看，此字左側不應該再有其他偏旁，有些學者之所以會多摹出一個“刀”旁來，顯然是將兩行間的污痕誤看成筆畫了。

從字形上看，如果不計較是否多摹出一個“刀”旁的話，舊釋“夸”或“劓”似乎要比其他釋法好。“夸（劓）步”怎麼講？饒宗頤先生認為“夸”訓大，“夸步”可解釋為“大步”（《楚帛書》31-33頁）；

何琳儀先生則認為“𠂔步”應讀作“跨步”（《句吳王劍補釋——兼釋冢、主、𠂔、𠂔》，《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259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但是從帛書上下文看，這兩種說法顯然是不大容易講通的。此外，李零先生在《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一書中也討論過這句話。李氏雖然將“步”前一字按殘字處理，但他在“四寺（時）”後斷句，認為“這裏大約是說共工推步十日四時”（72頁）。李學勤先生在《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楚史論叢》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長沙楚帛書通論》（《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一集，荊楚書社，1987年）兩文中亦持有類似的看法。我們認為，“推步”說在帛文解釋上似乎可通，但在字形上卻得不到絲毫支持，所以這一說法同樣是有問題的。

實際上，仔細觀察照片可知，“步”前一字下部並不從“于”，要釋為“𠂔”是有困難的。饒宗頤先生在考釋此字時說：“字似從大從𠂔，可能為𠂔字。”語氣顯然也很猶豫。那麼這個字究竟是甚麼字呢？我認為，此字應分析為從“大”從“冢”省，即“冢”字的異體。在戰國文字（包括楚文字）資料中，這樣寫法的“冢”字並不少見，過去大家多釋為“𠂔”，不僅字形上沒有根據，有關資料也都講不通。這個問題我在《說梁重鉞布》（《中國錢幣》1991年2期）和《鄂君啟節“舫”字解》（《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兩文中已作過詳細討論（前一文中的一些錯誤推斷已在後一文中更正）。讀者可以參看。根據戰國文字資料中“冢”字（包括這種從“大”從“冢”省的“冢”字經常借作“重”的情況來看，帛書中的“𠂔（冢）步”很可能應該讀作“踵步”。“踵步”一詞後世習見，用喻效法或繼續前人之事，相當於“踵武”（《楚辭·離騷》王逸注：“踵，繼也；武，跡也。”）、“踵跡”等詞。本篇第二章最後既說“帝俊（俊）乃為日月之行”，接下來第三章說“共工踵步”，“十日四時”和“日月”如何如何，正是說明共工所為乃是承續帝俊之業。熟悉帛書的學者都知道，本篇第三章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文氣上，都具有明顯的連貫性。

由此可見，這樣解釋，不僅在字形上有所根據，在文意上亦毫無扞格之弊。

又，第二章“帝俊乃爲日月之行”一句中的“帝俊”，研究者多認爲即見於《山海經》中的“帝俊”，惟李學勤先生持有不同意見。李先生認爲此句當讀作“帝允，乃爲日月之行”，“帝”是指本章前面出現過的“炎帝”，“帝允”是“炎帝表示允可”的意思（見李著《楚帛書中的古史與宇宙觀》）。按從第二章的內容看，李先生說若可信，對本文關於“夸步”的解釋亦無大的影響，特附記於此。

楚帛書中的星歲紀年和歲星占

鄭 剛（中山大學中文系）

楚帛書是一篇具有極其重要價值的出土文獻，它提供了研究戰國時代有關楚國人的世界觀、神話和天文曆法知識的珍貴材料，彌補了傳世典籍材料的不足，對於思想史、學術史和歷史有着不可低估的意義，因而自發現以來，它的內容、結構和性質就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幾十年來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豐盛的成果^①。

但是，在對楚帛書的內容和性質的認識上仍有一些重大疑難問題沒有解決。帛書丙篇（十二月忌篇）有一套月名，與楚地實際使用過的代月名及一般的干支、數字紀月法都不同，其來源和性質仍是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一般認為，帛書甲篇（八行篇）講正，乙篇（十三行篇）講變，正的方面從創世神話的角度闡述了一些起源問題，但變的方面祇羅列了一些變亂的現象，產生變亂的原因是不清楚的；另一方面，有學者稱甲篇為四時篇，稱乙篇為天象篇，甲篇講述四時及相關事物的產生，但是乙篇卻不能算是天象篇，它沒論及天象的形式和結構，也並未提及一些主要天象，而祇涉及到歲、孛、天棓、妖等四、五種星體，其中大都是不常見不重要的，這樣的天象是非常獨特的。

各種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乙篇上，乙篇的內容在很多方面仍有待於認識。乙篇主要由幾種星體及其對人事的影響構成，祇有認識了這些現象的天文和術數意義，纔能解決乙篇以及整個帛書的性質的問題，進而可以對帛書的文化背景有新的認識。

天文和曆法是一體的，可以看到，乙篇的天文現象和丙篇的曆法系統是緊密相連的，丙篇的曆法是衡量乙篇的天文現象的關鍵工具。

帛書丙篇的十二段文字中包含十二個月名，也就是《爾雅·釋天》的十二月名。但是這一個月名體系目前祇見於帛書和《爾雅》，還沒有發現楚地文獻用它來紀月，它所屬的曆法系統也是不清楚的，因而有必要結合典籍材料考察它的性質。

在《爾雅·釋天》中，這一個月名體系與其它歲名、月名放在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年、月標名體系。這個體系由歲陽、歲陰、歲名、月陽、月名五個部份構成，其中歲陰是根據太歲（與歲星在天空中反向運行的虛擬星）在十干上的運行（一年行一干）來確定一年的年名，而歲陽則根據太歲在十二支上的運行（也是一年行一支）來確定年名，例如“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十歲陽和十二歲陰分別是：

歲陽：“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

歲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涇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闌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歲名即夏歲、商祀、周年、唐載，是不同朝代對年的不同叫法。

在月名方面，月陽指的是月在十干上的運行：“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窋，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沒有相應的十二月陰，而直接是十二月名：“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集，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陰，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這也就是帛書的月名系統。這裏有兩點是必須指出的。

第一、這是一個完整統一的曆法系統，是星歲紀年法（依陳遵媯）按太歲和月球的運行來命名的歲名和月名系統。不但“攝提格”等歲

陰、歲陽的命名已直言是按太歲運行進行命名的，更重要的是，這一套標名在歷史上確曾使用過，這就是《史記·曆書·曆術甲子篇》。在那裏，十歲陽和十二歲陰搭配起來用作歲名，例如漢太初元年正月，是“歲名焉逢一射提格，月名畢一聚”。這完全可以證明《爾雅》的歲名、月名是同一個系統，而且是屬於星歲紀年法的系統。

第二，這一套十二月名也就是月陰名，因為歲有陰陽，而月祇有陽而沒有陰，不成體系，且月名又正好是十二月，恰與十二支搭配。並且，《爾雅》此處的月名與上文的歲名不一致，歲名指的是不同時代對年的不同叫法，所謂月名也應該是不同時代對月的不同稱呼。

更重要的是，從《史記·曆書》來看，歲陰與歲陽相互搭配紀年，月陰與月陽相互搭配紀月，正像十干與十二支搭配以紀年、紀月。漢太初元年的正月是“畢一聚”，是以月陽的“畢”與月名的“聚”搭配。這可以證明，十二月名就是月陰的名稱。《史記》索隱謂“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這裏的雌雄就是陰陽，因而索隱就是把十二個月名看作是十二個月陰的名稱的。

因此，從《爾雅》和《史記》來看，帛書丙篇的十二月名就是星歲紀年法的月陰名。星歲紀年法根據歲星十二年繞天一週的特點，根據每年中歲星的出現來紀年，這一曆法在戰國時代已經成熟，並流行於楚國。漢代文獻中的星歲紀年法以甘氏星經為主要來源，馬王堆出土帛書中也有這一紀年法，這都說明這一曆法系統與戰國時代楚國有關，與帛書在地域、時代和文化背景上都吻合。

(二)

帛書以星歲紀年法為曆法背景，在天象上也以歲星為中心，這不但因為歲星紀年以對歲星的觀測為依據，從而在天象結構和天象變亂上以歲星為中心，並且從宗教和術數角度看，歲星占和太歲占在占星術中有着不同於其它星體的特殊地位，例如在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就專門有“歲篇”。帛書乙篇中，歲星是不多的幾種星體中的一種，但是從

帛書的曆法背景來重新考察乙篇，就可以發現更多的問題。

乙篇一開首就說：“佳□……月，則贏縮②，不得其當，”接着講天體運行混亂，四時失調，災異出現。“佳□……月”指的是時間，即若干個月之後，就會出現贏縮的現象。贏縮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專指日月和行星運行失常，例如《史記·天官書》：“歲星……起舍而前曰贏，退舍而後曰縮。”乙篇下文說：“日月星辰，亂逆其行，贏縮逆□”，也用贏縮指天體運行失常，《史記·天官書》：“歲星贏縮”，《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早出為贏，……晚出為縮”等也都是如此。

“則贏縮”的主語不應是月，月應是出現贏縮的時間。這一段帛文是：

□……月，則贏縮，不得其當。春夏秋冬，又□尚尚；日月星辰，亂逆其行。贏縮逆□，升木亡尚。

在這裏，“則贏縮，不得其當”既是綱領，也是原因，下面四季、星辰、萬物的變亂則是其表現和結果，而“日月星辰”中已包含了月，因而若“則贏縮”的主語也是月的話，則二者互相衝突，且文義重複。

其實，“則贏縮”的真正主角應該是歲星。歲星失次，則由歲星所決定的年、月，就與物候產生了差異，從曆法上看，萬物都失調了。而歲星是經常失調的，因為雖然歲星以十二年繞天一週的規律性為人所注意，成為紀年的標誌，並有了經星、紀星的美名（見《史記·曆書》），但它並非真的十二年繞天一週，而是以11.86個地球年為一個木星年，因而星歲紀年法在十二年中就差了一個多月。這一點是很晚纔被認識到的，並在漢代逐步形成完整的“超辰”概念，粗略地計為一百四十多年超一辰。

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說明在戰國時代已經認識到了超辰現象，因而在原始的星歲紀年法中，觀測到的歲星運行在十幾年中就會與曆法產生差異，因而從曆法來看，歲星運行失次便越來越明顯。

帛書反映了上古時代中國，特別是楚國的神話、宗教和術數的文化，在這個背景下，天人感應的觀念必然會在這一現象上有所體現，《史

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及《開元占經》等書都以大量篇幅記載了歲星失次影響自然和人事的內容，構成了歲星占的主要部份其主導思想與帛書乙篇大致相同。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歲星占中有一個觀念，就是認為歲星失次會變為彗星。

《史記·天官書》：歲星“失次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正義：“天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欖……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

《漢書·天文志》：“歲星贏而東南，石氏‘見彗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彗，本類星，末類彗，長三丈’，贏而東北，石氏‘見覺星’，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棊，本類星，末銳，長四丈’，縮西南，石氏‘見欖雲’，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石氏‘見槍雲，如馬’，甘氏‘不出三月乃生天欖，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槍、欖、棊、彗異狀’，甘氏……又曰：‘祲星，不出三月其下有軍’，這個祲星即天妖，《開元占經》引甘氏：“歲星出入不當其次，有天妖見其衝”。

歲星失次流為彗星的觀念至少起源於戰國時代，甘氏、石氏都已經有了各自的彗星體。它在漢代演變得越來越繁複。《漢書·天文志》引《河圖》：“歲星之經流為天棊、天槍、天滑、天衝、國皇、反登、蒼彗”，已多至八種。但從《史記·天官書》和甘氏來看，主要的，也是較早的共有天棊、天槍、天欖、天彗、天妖等幾種。這裏的天彗即蒼彗，與泛指一切的“彗”不同，在古代天文學中專指某種彗星。

帛書乙篇所論及的幾種天體，確鑿無疑的有妖、天棊、孛、歲四種^③，其中“凡歲德匿”統指歲星失次，其餘全篇就分述它化成的幾種彗星。

妖星數見^④，在篇首有“口……妖”，文義似指妖星出現：“凡歲德匿，如口佳邦所，五妖之行”，指的是歲星失次側匿，則在某邦國的位置上生出五個天妖；“口……上妖，三寺是行”，三時指的是三個月（見下文），全句義為歲星失次後三個月內有天妖運行，與《漢書》引甘氏

所謂三月內化為流星正同。

天棊一見，在篇首。帛文敘述歲星失次贏縮引起四季、天象、草木變亂之後，緊接着就產生了天棊，“天棊將乍湯，降於其方”，並進而產生了孛星。“山陵其發，又淵又籍^⑤，是胃孛”。

孛是彗的別稱，它在乙篇中還有出現。“孛歲八月，內月七日、八日口……”，又“佳孛德匿，出自黃淵，土身亡翼，出內口同，乍其下凶”，都敘述了孛對於人事的作用。孛字下從子，上從火，即從丰字，朱駿聲謂彗字從手執雙丰，《說文》釋丰為草莖，古文字中象植物豐盛之形的一些字都可作此形，用作不同的形旁和聲旁，如來、李（與孛字同形）、華、垂、棘等^⑥，孛字本義是草木盛出，上面的象形字也用此形，並且與彗字的形體可能也有關係。

因此，帛書乙篇的四種星體全都與歲星有關，其中歲星是中心，其它三種彗星是它的流變。“佳德匿之歲”，“凡歲德匿”，歲星失次側匿是中心。乙篇前九句宏觀總述了它引起的四季不當，日月星辰亂行，草木無常，緊接着提出的妖、天棊、孛都是它的變化。實際上，乙篇除第一段九句作總述外，關於這幾種星所引起的災變就構成了乙篇的主體。

妖、棊、孛（彗）都是典籍所載歲星失次所化成的彗星，並且是最常見最重要的幾種，由此可見，乙篇是歲星占的較早記錄。歲星失次引起災變，並且化為幾種彗星起不同的作用，這一基本思想是帛書乙篇、甘氏星經、《史記》、《開元占經》等所共有的。雖然在發展過程中歲星所化的彗星種類越來越多，分類也越來越細密（甘氏已經劃分了時間和方位），但其基本思想沒有變化。帛書所代表的楚地歲星占不但保留在傳世文獻中，也在出土文獻中有所反映，與楚文化有關的睡虎地秦簡日書就是一例。來源於楚地的《荊州占》（保存於《開元占經》中）也是一例，它不但觀念與帛書一致，在文字上也幾乎是帛書乙篇前半的翻版：“則歲星盈當縮，順而逆，水旱不時，當出不出，變為妖彗，所見之邦大兵起，國破主亡”，又“則歲星盈縮逆行，變色而天雨不時，有大旱與水，其無救即天棊出，出則殃起”。

由此可見，帛書乙篇保留了歲星占的較早形態，並且與歲星紀年法構成一個整體，二者互為表裏，說明在楚地曾出現過一種以歲星為中心的天文、曆法、占星體系，後代雖然吸取了其中一部份內容，但因為失去了星歲紀年法作為曆法基礎，歲星占成為占星的一個普通部份，歲星不再居中心地位。因此，帛書乙篇並不能與漢代典籍中的星歲紀年法及歲星占等同，它代表的是一個以歲星為中心的曆法、神學體系。

(三)

帛書乙篇的星歲紀年法背景和歲星的中心地位決定了它的主要內容，乙篇中很多東西都是與歲星、星歲紀年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以往研究中的很多難題，如果放在星歲紀年法的背景下考察，便都可以迎刃而解。

帛書乙篇是以曆法為重要組成部份的。“是逆月，閏之勿行”，以閏月為應付災異的方法（適當的閏月可以使曆法與十二年就遲出一個多月的歲星相合）。重要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德匿之歲，三寺口擊（繫）之以彗降，是月以遷，曆（揆度）為之正。這段文字說的是，在歲星失次側匿之年，三個月內會繼之有彗星降臨，這也就是甘氏所謂歲星失次必在三月中化為彗星。帛書乙篇中“三時”一詞二見，與表示四季的四時不同，含義費解。但是帛書謂“三時口擊（繫）之以彗降，是月以遷”，“三時”過後就是“是月”，可見時指的是月，指在三個月中有彗星。彗字從丰從巾，丰代表彗、彗二字所象之形，巾可能就是帚字所從之巾（彗字義為掃帚）。彗字在這裏指的應該是一切彗星（包括彗、掃帚、彗等）。從全句看，這段文字指的是，在歲星失次之年，歲星在三個月內化為彗星，而三個月後（“是月以遷”），則曆法、天象等又恢復正常了。

而德匿之歲十二年就有一次，“佳十有二口（歲），佳字德匿，出自黃淵，土身亡翼，出内口同，乍其下凶。”十二年就出現一次的德匿即

歲星失次側匿，因為歲星以11.86個地球年繞天一週，十二年就會差一個多月，置閏一月就可大致得到調整。

這一段文字中的“孛”字疑是歲字之誤。理由是：第一，帛書乙篇分為兩個部份，前半以歲星贏縮引起萬物失常開始，分列它所化的各種彗星及其影響；後半從“佳十有二口”開始，重述歲星贏縮帶來的天地變亂，但不再敘述自然性的徵兆，而是講因果，講天神關係，講恭民的反應。兩部份都以“佳”字開始，是發語詞。對照前後部份，可知“佳口一月”與“佳十有二口”意義相似，說的是歲星失次現象產生一次的時間，應是十二年或月。在時間之後，“則贏縮”與“佳孛德匿”同，主角應該都是歲星，並且作為後半部份的總論和原因，這一句也應以歲而非孛為主。

第二，“凡歲德匿”、“佳德匿之歲”、“是謂德匿”都是用“德匿”統指失次帶來災異的現象，應該是歲星占中對這一現象的特稱。“佳孛德匿”僅一見。可能是誤字，把它改為歲字，用德匿指歲星失次就更為貼切。

第三，“佳歲德匿，出有黃淵，土身亡翼，出內口翼，乍其下凶”指歲星與土星在某時間一起出現^①，這正是星歲紀年法中記錄歲星出現的標準格式，帛書五星占、《淮南子》、《史記》、《漢書》、《開元占經》無不使用“以某年某月與某行星出現於某星宿”的句子說明歲星的出現。

因此，這個孛字應該正為歲字，歲星纔是帛書乙篇的中心，帛書乙篇的內容就是從各個側面反映歲星的運行和變化。它把“孛歲”中“入月七日、八日……有電芒，雨土，不得其參職”的現象歸結為“是逆月”，並以閏月為解決手段，“是逆月，閏之勿行：一月二月三月，是胃逆終，……四月五月，是胃亂紀”，歲星運行與曆法的差異可以用閏月來調整，差異一至三個月稱為逆終，差異四至五個月稱為亂紀。歲星以其運行規律成為紀年的標準，所以它又稱為經星、紀星，失次則謂之“亂經”。所謂“逆終”也指的是擾亂了歲星的運行，因為歲星十

二年繞天一週正好叫作“一星終”(見《左傳》)。

帛書乙篇的結尾可以看作是帛書正文的結尾，它的方式是耐人尋味的。它的最後一句是“民人弗智歲，則無口祭祀，則迷民少又口，土事勿從，凶”，以這樣一個句子結尾，充分說明帛書乙篇最終歸結為歲星占，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它的性質。乙篇對於歲星失次現象的描述，對於天神衝突的神學探討的實際目的就表現在這段話裏，它是要警告人們瞭解歲(太歲)對人事的影響，不可不知歲，太歲與土事的關係是歲星(太歲)占的一個最基本的内容。

(四)

自楚帛書發現以來，幾代學者對它的内容、結構和性質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見解^⑤，使帛書的各個側面都得到了揭示。本文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它的曆法背景和占星原理作了進一步探討。

帛書乙篇的内容是一種在原始星歲紀年法背景下產生的早期歲星占，將曆法缺陷帶來的混亂用神話、宗教的方式加以解釋是它的占星原理的主要來源，它是後代歲星占的雛形，但與星歲紀年法的聯繫更密切，歲星的中心地位更突出。

但是在帛書的有機整體中，乙篇就不祇有歲星占這麼簡單了，甲篇從發生學和創世論的角度簡述了世界的構成，乙篇則根據其星歲紀年背景和以歲星為中心的占星天文學來解釋自然現象變亂的原理，並最終推向實用占星，丙篇的選擇術就是其應用的法則，雖然以十二個月為主導，但它也是星歲紀年體系和歲星占的一個部份。

因而，在帛書的結構中，乙篇是一個樞紐，在它的星歲紀年法和歲星占的聯繫下，帛書的廣泛内容纔聯為一體，它將甲篇的宇宙結構、乙篇的天文曆法、丙篇的選擇聯繫起來^⑥。

注釋

① 參見《楚帛書研究述要》，載饒宗頤、曾憲通二先生著《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8月。

② 贏縮二字原分別從星從出，為打印方便，本文在引用帛書時有時經改為通用字。

③ 李零先生、何琳儀先生最近又提出了一些其它星體。

④ 字從宀從夭。

⑤ 字從水從昔。

⑥ 參見拙文《戰國文字中的陵和李》，古文字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

⑦ “土身亡翼”據曾憲通老師的隸定，見《楚文字雜識》，古文字學會第九次年會論文。但曾老師認為“土身無翼”是用來形容字星的樣子的。我提出“土”指的是土星，因為“出入口同”似乎應該是“出入攸同”“出入與同”，“出入皆同”，指兩個行星一起出現更為貼切。另一方面，有翼是土星的最大特色，因為在土星赤道上有由億萬顆小星組成的薄環，用肉眼可以看到。在土星赤道正對地球的日子裏，由於這個環太薄所以看不到，而在其他時間，土星極軸相對於地球傾斜，在它的兩側都可以看到一對翼。

⑧ 例如饒宗頤先生在《楚帛書之內涵及其性質試說》一文中都提及星歲紀年法。

⑨ 本文於1988年12月形成初稿，1994年6月修改定稿，在修改過程中曾憲通老師提出許多寶貴意見。

青川秦牘田制考辨

祝中熹（甘肅省博物館）

青川秦墓更修《為田律》木牘問世後，古史學界給予了極大關注，連續發表了許多考釋、論析文章。但由於各家對牘文中某些關鍵詞語理解有誤，故使該律的部份內容未得到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說明。後來胡平生同志兩次撰文，^①指出牘文中的“則”係長度單位，而非連詞，“三十步為則”。這樣便糾正了通行釋文斷句及訓義上的雙重錯誤，為正確解讀律文、進一步研究秦之田制，掃除了一大障礙，確為學界值得稱道的快事。但在當時耕地規劃格式，特別是阡陌配置及其名稱義緣等問題上，史學界仍有不少混亂的認識。筆者願將個人學習、思考所得在此提出，以就教於方家。

（一）

關於周代的畝積，《周禮·小司徒》鄭注引《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古今學者對此無異辭。這就是先秦盛行的長畝制。《詩·小雅·甫田》：“禾宜長畝，終善且有。”這種長畝格局便於耕作和排水，便於田地的宏觀規劃、治理，適應於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時至戰國，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可耕地大量墾辟，畝積也隨之發生變化。各國畝積不盡相同，但總的趨勢是不斷增大。從銀雀山漢墓所出簡書《孫子兵法·吳問》篇反映的情況看，趙國地區早在春秋後期即已推行二百四十步的大畝制了。秦國至遲在商鞅變法時也已採用了長二百四十步的畝制，《說文》、《風俗通義》等書都肯定了秦畝長度為二百四十

步。秦統一時間太短，未來得及在全國範圍內畝制劃一，漢初亦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兩種主要的畝制並存：長百步的稱小畝，亦稱東畝^②；長二百四十步的稱大畝，亦稱秦畝。直到漢武帝末年，全國纔統一為秦畝。桑弘羊在與諸生辯論時說：“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③他把功勞都記在了漢武帝名下，迴避了二百四十步一畝乃秦制的事實。

青川木牘律文：“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首先須弄明白“畛”的含義。許多學者承襲傳統解釋，謂畛乃田間道路。但此釋用之於律文，不論視“則”為連詞還是量詞，都無法圓其說。如視“則”為連詞，“袤八”無疑應指長八步。我們已知秦畝是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的條畝，兩條畛在這一畝地中如何安置呢？按律文要求，“廣一步袤八”步應為一田區，這種田區在一畝地中可劃三十塊，兩條畛何能將一畝地分割成三十等份？如視“則”為量詞，像胡平生同志所指出的那樣，三十步為則，那麼，“田廣一步袤八則”正好是一個秦制長畝，兩條畛還是無從安置。若順長畝縱向安置，一畝地本有一步寬，在這一步寬幅內再修兩條平行的道路，不僅佔盡了耕地，實在也無此必要。若垂直於長畝橫向安置，即以畛作長畝的兩端，如楊寬先生所主張的那樣，^④初看似較合理，但律文緊接在“畝二畛”之後，還有“一陌道”的要求。這條陌道須“廣三步”，當然不可能作長畝與長畝之間的界路，它祇能安置在長畝頂端（它也不可能安置在長畝之中，下文將詳述之）。這樣的話，長畝頂端的畛道和陌道必然相重。

於是人們轉而把畛理解為田域。其實，古人言土地之疆理，界名與所界之區名常常通用，畛字本即有田域義項。《詩·周頌·載芣》：“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鄭箋：“隰謂新發田也，畛謂歸田有徑路者。”意思很清楚：畛為有徑路的田域。歸田者，長期耕種之熟地也。熟地修治畛畦，是精耕細作的需要。《戰國策·楚策》言“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言蒙穀被“封之執圭，田六百畛。”《左傳·定公四年》述康叔之封：“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楚辭·大招》：

“田邑千畝，人阜昌只。”均爲在田域意義上使用“畝”字之例。畝作爲田域，是由小徑分割開的，故畝間小徑便也稱畝。後世注家單以田間小徑釋畝，是失之片面的。

青川木牘的“畝”應當也祇能理解爲田域。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若視“則”爲連詞，廣一步袤八步即爲一畝，那麼，一畝地恰好是三十畝，而決不會是二畝；若視“則”爲量詞，一則三十步，那麼，一畝的面積就是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這正是一個秦畝，“畝二畝”豈不又陷入荒謬？有的學者據此而認爲秦畝爲四百八十步的大畝，但這在古文獻中找不到任何佐證，很難被人們接受。

問題的癥結在於對律文“爲”字的理解上。李學勤同志曾正確地指出：“爲”字義爲作、治，“爲田”的意思就是制田，“爲畝”的爲字亦如之。^⑥ 在古漢語中，“爲”作動詞有兩種絕然不同的用法：一種是作聯繫動詞，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是”；一種是作動作動詞，意爲造作、建樹、整治。“爲田律”的“爲”，無疑是動作動詞；“爲畝”的“爲”，用法與之同。這也正是《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伍。”昭襄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的爲字用法。律文下言“百畝爲頃”亦同理。“頃”是戰國以後盛行的田制術語，可能與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確定新畝積的份地制有關。頃包含一百畝耕地，但卻不完全是百畝的同義詞。頃須經過規範化的整治並有封界，即雲夢秦簡所謂之“頃畔”。頃乃一完整的份地單位，而百畝祇表示田地數量。雲夢秦簡《田律》言“入頃芻稿”，言“頃入芻若干”，表明作爲份地單位的頃，已是語言中定型的專稱。因此，“爲頃”和“爲畝”一樣，都是“爲田”的具體內容。

“爲畝”者，修治田畦也。此義一明，我們便可從量度計算的矛盾中解脫出來。“廣一步，袤八則”，說的就是一個長畝，在此長畝中修治兩片畝畦。剩下的問題祇是：這兩片畝域是順着長畝縱向劃分呢，還是從長畝正中作橫向截斷？稍有點農耕實踐經驗的人都會想到，縱向劃分是不可能的。因爲一畝地祇有一步寬（是時六尺，相當於今

市尺四尺左右），在此幅度內祇允許容納培植農作物所必須的幾條畦壟（以漢代趙過所行的代田法而言，一畝寬度僅容三畦），實在無法再培築一條哪怕是很窄的道路，硬要這麼做，則至少會浪費三分之一的耕地。張金光同志提出長畝中間橫向辟路分為二畛的意見，並指出：“戰國時在田間佈置規劃上通行着把一畝分作二區的耕作制度。”⑦張說極是。我這裏再作點補充論證：在長畝制下，特別是在二百四十步的長畝制下，將條畝橫斷為二域，是農事操作的實際需要。畛作為田區其實也就是畦。《說文》：“田五十畝曰畦，從田，圭聲。”慧琳《一切經音義》引《風俗通義》：“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為田，五十畝為畦。”從“圭”之字，多含物半之義，《孟子·滕文公上》：“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戰國授田以百畝為率，五十畝乃份地量之半，故曰圭田。《說文》：“跬，半步也，從走，圭聲。”段注引《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方言》：“半步為跬。”“畦”字從圭，正取“田之半”義。從百畝份地中部，橫辟一條道路，將份地中分為兩片田畦，每一片田畦包含一百個半畝，即五十畝。可惜張金光同志未見或見而未採胡平生“三十步為則”之說，故在解釋畝積時仍視“則”為連詞，並認為律文“袤八”之下脫一“十”字，這顯然是一種臆斷。此外，他認為二畛之間的界路，即是律文所言的“一陌道”，這也很值得商榷。第一，份地內的道路，純為農事操作往來便利而設，以人畜能通行為度，不需太寬；太寬不僅多佔耕地，且也虛耗築路之功。木牘律文所言之陌道，要求三步寬（合今市尺一丈二尺左右），並由政府督促每年定期除草修墊，分明具有公共道路的性質，與份地內畛域間的小徑有別。第二，雲夢秦簡《法律答問》：“何如為封？封即田阡陌。頃畔封也，且非是……是。”封即地界，律文說得很明確：阡陌即一塊份地的四界，相當於頃畔。假如橫貫一家份地之中的田道即為陌道，則與此律文不合，因為封是法律保護的、標誌土地歸屬的界標，自家份地內是沒有也不需要封的。第三，我們知道，先秦的長畝制延續到了漢代，漢代土地買賣是以畝為單位的，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買地契約看，大都以陌標誌其位置。如果陌道曾

經是份地制下每家田地內之橫向中線的結，土地買賣時以陌為界劃分兩家所有權的現象就不可理解，難道所有出賣土地的人，都把自己的耕地以半畝為單位往外賣？

二

要澄清律文所言“畝二畛，一陌道；百畝為頃，一阡道。道廣三步”的問題，須先從宏觀上把握當時土地規劃治理的總體面貌。許多同志的錯誤即在於囿於一畝地或一頃地的小範圍內思考，而未能將律文內容納入先秦廣泛存在的大型田域中察辨。古代耕地廣域連片的形式，是農田墾殖規律所決定的，是民族時代集體耕作傳統所決定的。先秦耕地宏觀治理的主體形式，就是在廣闊的田域中按定制作統一規劃，多以河流為中心軸線，採長畝制的百畝為單位配置阡陌，極注意溝洫道路的配套系統。這是往昔家族公社及後來的農村公社時代推行份地制的必然結果。《周禮·地官·遂人》對這種統一治理格局的大型田域有這樣板式的敘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這種萬家百萬畝的大型田域，按當時的量度標準計算，縱橫各三十餘里，這大約是周代村社土地連片規劃的最大規模。在都邑周圍的平野上，這是完全可以作到的。《詩·周頌·噫嘻》所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描繪的就是萬家份地百萬畝大型田域上春耕的景象。清儒程瑤田在其《溝洫考》中說：“里曰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舉成數之證也。”都邑周圍的沃壤無萊田，程氏的計算無誤。《漢書·刑法志》：“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作為大型田域中的一個級層，其包含耕地面積合計也正是三十餘里見方。《考工記》：“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凡溝逆地勢，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辨溝三十里而廣倍。”鄭玄注：“謂不墾地之溝也。”這裏實際上是講後備耕地的治理，先開溝

以瀉水，其溝比耕地之溝寬一倍，其治理規模着眼於未來的大型田域，故作三十里見方的籌劃。銀雀山漢墓竹簡有齊國的《田法》，也說：“州鄉以地次受田於野，百人爲區，千人爲域。”此尤爲大型田域存在之力證。有些學者懷疑《周禮》，更懷疑《周禮》的田制，認爲我國地勢複雜，丘源交錯，山林遍布，《周禮》所言那麼整齊劃一的田畝配置，祇是一種設想，不可能實施。持此類意見的同志忽略了我國三代時的實情，而用後世人烟稠密、可耕地盡辟的景況以律古昔。須知那時人口較少，聚居於都邑之內，耕地則從都邑周圍向外展開。那時的都邑，均選擇在河川流經的平野，或背山面水擁有一片川原的地帶，耕地大片連域是具備條件的。祇要份地制存在，這種統一規劃的大型田域就是必然的現實。商鞅變法因爲要擴大畝積，增多份地量以行“自爰其處”的鞅田制，不得不“開阡陌”，調整一下田畝界畔的原有結構，使每家份地單位“頃”的區域得以擴拓。但大型田域仍然存在，且新的阡陌業經確定，便很難再變。即使到份地制早已消失了的漢代，由於農業生產技術並未出現飛躍性進展，我們仍能看到先秦授田制下大型田域的歷史遺蹤。如“陌”，就仍在起着田地界標的作用：

《漢書·匡衡傳》：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閭陌爲界。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閭陌爲平陵陌。

《後漢書·光武帝紀》：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南千秋亭五成陌。

《孫成買地券》：左駿廐官大奴孫成，以雒陽男子張伯始賣所名有廣德亭部羅陌田一町……⑤

《王未卿買地鉛券》：河內懷男子王未卿，從河南街郵部男子袁叔威買皋門亭部什三陌西袁田三畝……⑥

《樊利家買地鉛券》：平陰男子樊利家，從雒陽男子杜調子子弟口買石梁亭部桓阡東、北是陌北田五畝……田南盡陌北，東自北調子，西比……⑦

《王當墓買地鉛券》：谷郊亭部三陌西袁田十畝……田本曹奉祖田，賣與左仲敬等，仲敬轉賣與……⑧

以上材料在亭部或郵部之後即言陌。用陌標明某塊田地的方位和歸屬，這祇有在大型田域中方有可能。陌前冠以數字，就能說明問題：這種作為田區位置座標的陌道，是按一定次序平行排列的（因此《匡衡傳》中郡國官吏把閭陌當作了平陵陌，據後文說，一陌之差造成了四百頃的出入），這正是統一規劃的大型田域的歷史遺存。每一條阡陌都統領着若干家的份地單位“頃”，每一條阡陌都有自己的名稱或編號。儘管份地制早已消失，儘管往昔的份地單位“頃”，在土地自由買賣的潮流中，也許早已被零碎分割，數易其主（如《王嘗墓地券》所反映的那樣），人們卻習用原阡陌為座標示其所在。“柎阡東北是陌北”一語，表明此處之阡為南北走向，陌為東西走向，確證阡與陌是垂直的。“陌西”“陌北”雜現，表明陌的走向或南北，或東西，全依長畝的縱向如何而定。《漢書·食貨志》顏注所謂“東西曰陌”的定向說不可取。我在十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古代長畝的走向，一般說與附近河流的方向有關^②。有東西方向者，有南北方向者，故《詩·小雅·信南山》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陌與長畝走向垂直，長畝走向不一，陌便不可能定向。

對這種統一佈局、按定制規劃的大型田域有了總體認識之後，再回過頭來看木牘律文的“為田”規定，思路便暢通無碍了。“田廣一步，袤八則，為畛，畝二畛”，是說先定寬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的條畝，然後在條畝內修治畛畦，即在條畝正中橫向修一條畛徑，將長畝分隔為兩片畦域。“一陌道”，是說在所有長畝終端，修一條與長畝走向垂直的陌道，以作為與另一家份地之間的界限。當然，長畝的另一端也有一條陌道，但那由另一家份地主人負責修治，每家祇須修一段陌道即可。由於陌道與畛徑平行而且等長，故在後世田域術語使用不甚嚴格的情況下，有時也將畛徑稱作陌道，如《說文》即謂：“畛，井田間陌也。”畛、陌混稱由來已久。“百畝為頃，一阡道”，是說一百個條畝平行並列治為一頃，這是一家的份地，在並列相排的第一百個條畝的地邊，應修一條與長畝平行的阡道，以作為與另一份地帶之間的界限。當然，在相反方向即第一個條畝的地邊，也有一條阡道，但那

由另一家份地主人負責修治，每家祇須修一段阡道即可。“道廣三步”，是因為阡陌不僅是每家份地的邊界，也是大型田域中的公用道路，此非份地內便於農作的畛間小徑可比，故需三步之寬。阡陌格局是定型的，因此兩側植桑，車騎旅人均可通行，如古樂府名篇《陌上桑》所描寫的那樣。按照這種為田制度，每家份地都被框在縱橫垂直相交的阡陌之內，成一寬百步、長二百四十步的矩形，矩形的長邊為阡，短邊為陌。阡陌為每家份地四面的邊界，故雲夢秦簡說阡陌也就是“頃畔”，也就是“封”。阡陌是法定的，是不能私自更動的，私自更動即犯“贖耐”之罪。漢代阡陌所以成為辨分田地歸屬的權威界標，道理即在於此。

(三)

人們可能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阡陌實即一塊份地的四邊，而阡又是四邊中的兩條長邊，為什麼存世的許多漢代土地買賣券契，在述及地畝所處位置時，幾乎皆以陌為座標而很少以阡為座標呢？探明這個問題對我們理解阡陌制度及古代土地所有制形態的發展變化，是有重要意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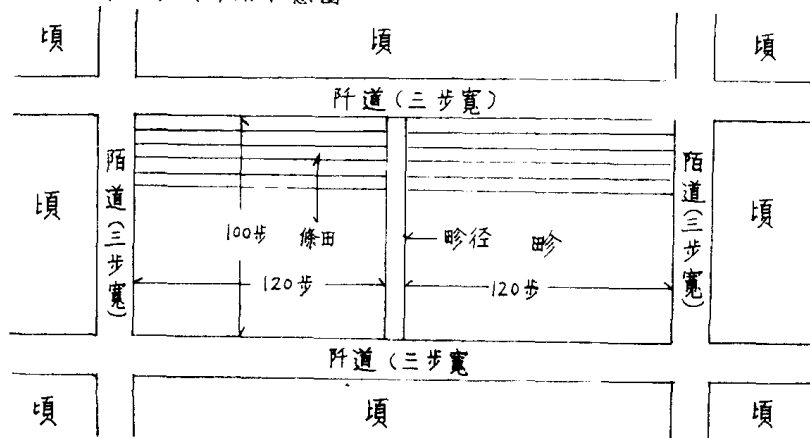
農村公社瓦解後，份地固定為各家的私產。戰國時的授田制，其實質不過是村社份地制的歷史慣性順延，它表明國家對農民擁有一塊份地的權力，給予了法律承認。當授田制也被廢止後，土地私有權便完全確立。西漢時代如汪洋大海般存在着的自耕農階層，便是村社制度結束後的產物。隨着人口的繁衍，隨着原份地家庭的分異，隨着土地買賣的展開，以“頃”為單位的份地作為小農的私產而被不斷切割易主。原有的阡陌雖仍如舊，但百畝一家的格局却漸被破壞，一頃份地可能為數家所有。漢代田地買賣券契反映的情況正是如此，一般田地交易不過數畝或數十畝，這是土地私有化之後的正常現象。明白了這一點，再聯繫長畝與阡陌的配置關係思考，漢代標示田地位置多言陌而極少言阡的疑問即可冰釋：阡與過去的每一塊份地相關聯，但卻不與每一

畝地相關聯，因此在確定幾畝或幾十畝地的位置時，很難以阡為軸標；陌則不同，陌是所有條畝的端綫，像魚的脊骨統領每一根刺一樣，陌統領着每一個長畝。因此凡是份地制大型田域中任何一畝或若干畝土地，都可從用陌來標示其位置。（參看附圖）

最後，還有個阡陌命名義緣的問題，即阡為什麼叫阡，陌為什麼叫陌。阡陌以本質上說，都是田界兼道路，阡與陌的區別，除了前者與長畝走向平行，後者與長畝走向垂直這一點外，還有些更深層的含義，這同我國農村公社後期份地配置原則有關。村社時代份地生產是社會經濟構成中的主體，村社成員是社會生產的主要承當者，是剩餘產品的提供者，是各種徭役的負擔者，也是軍隊中的基本戰鬥力量。正因為如此，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便是加強對村社成員的控制，於是產生了一整套嚴密的戶籍制度。農村公社越向後期演化，這種加強戶籍管理的趨勢越明顯。周代上層統治機構中據重要位置的“司徒”一職，在西周中期以前一直稱“司土”，西周晚期以後漸改稱“司徒”。徐中舒先生曾說：“先稱司土，後稱司徒，司土變司徒，是很有意思的，人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了。”^④ 愚意不然。本稱司土，是因為農村公社前、中期，土地管理是頭等大事：耕地墾闢與份地等量分割，須統一規劃佈局；各家份地每隔三年要重新分配，以解決饒瘠不均的矛盾；還有菜田的配置及新生勞力份地的授予等等。總之，村社的管理與控制，是以土地為中心的。到農村公社後期，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大型田域配置格局已完全規範，“爰田制”推行後，菜田漸消失，休耕輪作在各家份地內進行，份地被固定化並漸成農民私產，在國家的行政管理中，人的因素日益突出。《白虎通·封公侯》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聚也，重民聚。”這便是春秋以後各國強化戶籍制度的背景。在農村公社後期的戶籍制度下，生產的進行，稅賦的收取，徭役的徵發，軍伍的組合，均應互相照應，緊緊地聯結在一起。集居相鄰的各農家，編為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在軍隊中，這基層行政單位各家的服役者，相應地編為一個戰鬥集體，即“伍”和“什”；他們的份地，也在大型田域中被規劃在同一個長條帶中，這長條帶被夾在

兩條阡道之間，由若干個份地單位“頃”排列組成。此即《周禮·族師》所述：“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埋葬。”也即《逸周書·大聚》所言：“五戶為伍，以首為長；十夫為什，以年為長；合閭立教，以威為長；合旅同親，以敬為長。飲食相約，興殯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也即《國語·齊語》所謂：“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正如“什”在當時是軍隊中的基層戰鬥集體一樣，十家份地相聯而成的“千畝”，也是當時通用的份地規劃單位。因此，縱向區分十家份地千畝的封界兼道路，便被稱作“阡”；橫向區分每家份地百畝的封界兼道路，便被稱作“陌”。阡與阡相接，構成長阡；陌與陌相接，構成長陌。許多條平行的長阡，與許多條平行的長陌，縱橫交叉，組成了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典型的農村公社份地形態——棋盤狀耕地。《樂志》載曹植《琴調歌》一詩，其中有句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也是大型田域中阡陌配置的寫照。程瑶田《溝洫疆理小記·阡陌考》“當千畝之間故謂之阡”，“當百畝之間故謂之陌”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青川秦牘進一步證實了程說。

附：《畛域阡陌示意圖》



注釋

①《青川秦墓木牘“為田律”所反映的田畝制度》，載《文史》十九輯；《解讀青川秦墓木牘的一把鑰匙》，載《文史》二十六輯。後文係胡平生與韓自強合寫。

②東畝中又含畝積更小的古畝，此不詳述。

③《鹽鐵論·末通》

④《釋青川秦牘的田畝制度》，載《文物》1982年7期。

⑤參看注①《文史》十九輯胡文。

⑥《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載《文物》1982年10期。

⑦《論青川秦牘中的“為田”制度》，載《文史哲》1985年6期。

⑧⑨⑩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十五。

⑪洛陽博物館：《洛陽東漢光和二年王黨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80年6期。

⑫《〈周禮〉社會制度論略》，載《人文雜誌》1982年先秦史專刊。

⑬《先秦史論稿》，1992年巴蜀書社版，第368頁。

秦漢時期的一日十六時制

李解民（中華書局）

秦漢時期的時制，由於歷史的久遠、資料的貧乏，因而很不明朗。隨着本世紀出土文獻，特別是秦漢簡帛的不斷問世，陸續有學者研討這個問題，取得一些突破、進展。本文擬在已有資料、研究的基礎上，從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結合上，對秦漢時期的一日十六時制的問題作些探索。

（一）

秦代的時制，過去因為沒有資料記載，人們無從得知。但自雲夢睡虎地秦簡出土問世以後，學者們從中鉤稽出有關材料，問題便逐漸趨嚮明朗化。當年曾對秦簡《日書》整理作出重要貢獻的于豪亮先生，首先開此先河。他在《秦簡〈日書〉記時記月諸問題》（載《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中，揭示見於睡虎地秦簡甲種《日書》的如下材料：

正月日七夕九，二月日八夕八，三月日九夕七，四月日十夕六，五月日十一夕五，六月日十夕六，七月日九夕七，八月日八夕八，九月日七夕九，十月日六夕十，十一月日五夕十一，十二月日六夕十。

接着指出：“這是一份各月晝夜長短的表，五月正當夏至，晝長十一時，夜長五時；自五月以後晝漸短，夜漸長，至十一月正當冬至，夜長十一時，晝長五時。各月晝夜的總和正是十六時。這是當時將一晝

夜分爲十六時的最好的證據。”筆者完全贊同于豪亮先生的分析和結論。相同的材料，也見於睡虎地秦簡乙種《日書》，又見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均可進一步印證于豪亮先生的論斷。

嗣後，何雙全先生又從放馬灘秦簡《日書》中，揭示出具體記錄十六時稱的材料。（見《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筆者有幸得見簡文原件照片，現將有關釋文釐正後寫定如下：

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食男；日中女，日過中男；日則女，日下則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過中女，鷄鳴男。

此似採用夏曆，因夏曆建寅爲正，以平旦爲朔，故從平旦起始。十六個時稱依次爲：平旦、日出、夙食、莫食、日中、日過中、日則、日下則、日未入、日入、昏、夜莫、夜未中、夜中、夜過中、鷄鳴。其中“日則”、“日下則”之“則”，當通“戾”。“日則”、“日下則”即古籍中所見的“日戾”（《周禮·地官·司市》）、“日下戾”（《公羊春秋經》定公十五年）。

睡虎地秦簡《日書》和放馬灘秦簡《日書》所提供的新資料，具有重要意義，以確鑿的材料證明：一日十六時制，至遲在秦代和戰國後期已經出現並實行。它填補了以往文獻記載中的空白，爲探明秦國乃至戰國的時制開啓了門徑。

這裏，有必要對東漢王充《論衡·說日》中的一段有關資料作些討論。《說日》云：

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在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

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王充所述各月晝夜長短，與秦簡若合符節。秦簡《日書》所列一年十二月晝夜長短表，證明王充之說，源遠流長，至少可以追溯到秦代；同時也為正確詮釋《說日》中的“十六分”、“十六道”提供了註解。所謂“十六分”，是指一天時間劃分為十六等分，或者說十六個時段，也就是十六時。所謂“十六道”，是指太陽一天行經的空間劃分為十六個等分區間。它對應於“十六分”，“一道”行程即同“一分”時程對應。文中“日行，月從一分道也”的話，“分”、“道”合言，再也清楚不過地顯示了“分”、“道”之間的時空對應關係。對這一點，在下面討論《淮南子·天文》的資料時，將可獲得更深刻、具體的認識。

秦簡《日書》資料的發現，《論衡·說日》“十六分”、“十六道”的原來涵義便可得到正確詮釋，以往學者的一些誤解也可藉此加以澄清。例如陳夢家先生說：“王充的十六分是指日行月從的十六分道或十六道，而他在《調時篇》中說‘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才指時間。”（見《漢簡年曆表敘》，載《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註釋小組將原文“歲日行十六道也”改為“歲日行十二道也”。（見《論衡註釋》，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現在看來，這兩家的所釋、所改，均有失誤，應予糾正。“十六分”指的就是時間，“歲日行天十六道也”不能改為“歲日行天十二道也”。

也正是由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的問世，秦代流行的另一種時制——一日十二時制，也得到了確認。囿於本文研討的主題是十六時制，故不再贅述。

（二）

《淮南子·天文》有一段記載太陽一天運行的文字，保存了西漢時期的時制資料。但由於原文有脫奪，因此造成了一些疑誤。如陳夢家先生在《漢簡年曆表敘》中便說：“《淮南子·天文篇》記述太陽行

程，列舉一日十五個‘時稱’為晨明、朏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還、鋪時、大還、大春、下春、縣車、黃昏、定昏，其定昏以後、晨明以前如夜半、鷄鳴等屬於夜間，不在敘述之例。因此不能以為《淮南子》分一晝夜為十五等。”認為祇記述了太陽在白晝的行程和時稱，因此祇有十五個。此種說法，也見於其他著作。如楊寬先生《戰國史》說：“漢初《淮南子·天文篇》列舉一日十五時。”（見該書45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在目前流傳的《淮南子》中，該段文字為：

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鋪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春。至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暘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以為朝、晝、昏、夜。（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出版。據王念孫考證，其中的“小還”當作“小遷”，“大還”當作“大遷”，“禹”當作“離”。）

這裏所記時稱，誠如陳夢家先生所說祇有十五個，但所記行程卻是十六段。文中明確說“行九州七舍”，高誘註云：“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因此，相應的時稱當為十六個。查考文獻，可以補出這個脫落的時稱。《初學記》卷一援引《淮南子》這段文字時，在所記最後一段行程之下，比通行本《淮南子》要多若干文字，裏面保存了第十六個時稱。現將最後一段引文逐錄於下：

日入崦嵫，經於細柳，入於虞泉之池，暘於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原來，太陽最後一段的時稱叫做“桑榆”。《太平御覽》卷三、《事類賦注》卷一等引文，也均保存了“桑榆”這個時稱。因此，《淮南

子·天文》關於太陽一天運行的時空觀念，實屬十六分制。

“桑榆”作為時稱，一些研究秦漢時制的學者似乎沒有注意到。現在，我們從《淮南子·天文》的佚文中發現找出了它。同時，我們又從漢代的居延簡牘中獲取了印證資料。如《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EPT 56.336簡云：

□候漢疆敢言之謹寫移敢言

□令史并 書即日桑榆時起官

又EPW 67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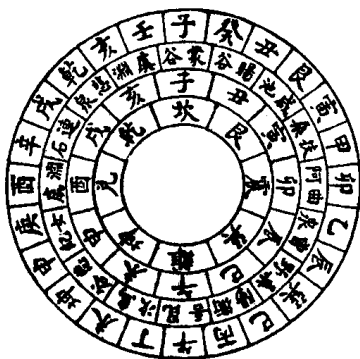
□月四日桑榆時之隧□□□昏時□

很明顯，這兩條簡文中的“桑榆時”都是具有特定含義的時段稱謂，與《淮南子·天文》佚文中的“桑榆”完全相一致。

陳夢家先生在闡述《淮南子》這段記載時，謂“其定昏以後、晨明以前如夜半、鷄鳴等屬於夜間，不在敘述之例”，也是不確切的。我們理解：該段文字敘述的是太陽在一整天內運行的空間和時間的歷程，當然包括夜間在內。原文末尾就清楚交待：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禹（離）以為朝、晝、昏、夜”。陳夢家先生似乎對此視而不見，以致出現不應有的疏忽。

對此，清人錢塘在《淮南天文訓補注》中已作過很好的分析，指出：“《論衡·說日篇》云：‘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也。’王充所說‘十六道’，與此‘十六所’合。”接着用漏刻計時制詳細剖析，並繪有《日行十六所合堪輿之圖》（圖一）。日行十六處所為一團，周而復始。從時間角度說，即日經一所為一時，歷十六時為一天，也是周而復始。這種時空對應關係，一目了然，明白確定。

錢塘排列日行十六所時說：“蓋蒙谷于也，暘谷癸丑間也，咸池辰也，扶桑寅甲間也，曲阿卯也，曾泉乙辰間也，桑野巽也，衡陽巳丙間也，昆吾午也，鳥次丁未間也，悲谷坤也，女紀申庚間也，淵虞酉也，連石辛戌間也，悲泉乾也，虞淵亥壬間也。”對照傳世的各種“式圖”，它與九宮類的太一式“太一十六神”（圖二）完全吻合。



圖一(引自《淮南鴻烈集解》下冊910頁)



圖二(引自《中國方術考》119頁)

根據已有的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可以知道作為占卜工具的式及其式圖起源相當古老。而《淮南子·天文》十六時的由來，也同樣非常久遠。錢塘《補注》即云：“虞淵、蒙汜諸名，見於《楚詞》，而《尚書》言暘谷，洵乎，其傳古矣！”屈原《天問》問道：“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如用《淮南子》的這段話來作答，應該說是十分貼切的。因此，兩者的吻合絕非偶然。李零先生《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二章“式”與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之第四節式圖解析（上）：時間與空間指出：“六壬式有兩種十二神，太一式有十六神，遁甲式有九神，皆配于天盤，用以表示時間劃分。我們懷疑，上述十二時制、十六時制和十八時制，可能就是對應于這種時間劃分而來。”儘管筆者對十八時制持懷疑否定態度，但覺得李零先生的分析推理相當有說服力，其總體思路極具啟發性。我們藉此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獲得對《淮南子·天文》十六時制真實性、歷史性的認識。

《淮南子》由西漢淮南王劉安（前180—前123）招致賓客集撰而成，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獻上，成書不會遲於西漢中期。《天文》所反映時制的年代當不晚於西漢中期。因此西漢早中期曾使用十六時制的事實應可認定。

(三)

現在，我們來談談漢簡所用的時制。這裏所說的漢簡，指西北地區的邊塞漢簡，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居延漢簡和敦煌漢簡，其時代主要為西漢後期至東漢早期。

陳夢家先生《漢簡年曆表敍》對此做過細緻研究，提出一日十八時制之說，具體排定十八時稱依次為：夜半、夜大半、鷄鳴、晨時、平旦、日出、蚤食、食時、東中、日中、西中、舖時、下舖、日入、昏時、夜食時、夜人定時、夜少半。並認為這是西漢以來直至東漢初年的官制。此說對學術界產生不小影響，得到一些學者認可。以後，李均明先生撰《漢簡所見一日十八時、一時十分記時制》（載《文史》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對陳說作進一步的正面論證。應該承認，漢簡十八時制之說的提出，在學術上有其積極的意義。其中一些具體意見，如：一時為十分；官方規定一般文書傳遞速度為一時十里，緊急文書傳遞速度為一時百里等，都是正確的。它為今後探索漢簡所用實際時制提供了有益的啓迪，準備積累了有用的資料。但從另一方面看，由於所見資料還不够充分、明確，具體的論證尚有不少漏洞，主觀擬測的成份較多，因此實際上仍停留在假設階段。陳夢家先生在文中說：“據上所述，西漢時至少有了十六時分，很可能是十八時分。關於後者，雖然證據還不够充足，似乎是没有很大的問題。”還加注云：“此文承夏鼐同志訂正了一些錯誤，提出了一些疑問。他對於十八時分之說，表示不應過於肯定。”也都反映出這一點。

筆者曾對漢簡時制的研究作過一些努力，結果得出了與陳夢家先生意見不同的結論。

根據秦簡和《淮南子》、《論衡》等文獻記載，已經可以證明從秦代至西漢、東漢都曾流行使用過一日十六時制。那末，作為處於這期間的西北邊塞地區也曾使用過十六時制，應說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但在沒有取得直接證據之前，即使再合情理，也祇是一種推論，一個假說。令人慶幸的是，在七十年代新發現已公佈的居延漢簡中，有一條

簡文可爲一日十六時制的實施提供明確無誤的佐證。

原簡編號爲 EPS4·T2·8，出土於漢代張掖郡居延都尉甲渠候官所轄甲渠塞第四隧的遺址，簡正背面均有文字。釋文（見《居延新簡》554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是：

官去府七十里。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書積二日少半日乃到，解何？書到，各推辟界中，必得。事案到，如律令言。會月廿六日，會月廿四日。（正面）

不中程，百里，罰金半兩；過百里至二百里，一兩；過二百里，二兩。不中程，車一里，奪吏、主者勞各一日；二里，奪令、口各一日。（背面）

簡文內容包括兩個部份。正面講的是追究一起遞送文書誤期事件的責任，背面記錄了對誤期者按不同情況而作的處罰規定，儘管有個別文字脫奪，但整個文意還是非常明確的。簡文正面內容具體是：有一封文書在甲渠候官至居延都尉府之間傳遞，其間距離爲七十里。按規定，文書在一晝夜中遞送的距離爲一百六十里，而那封文書卻積壓了二又三分之一天纔到達，作何解釋？文書到達後，各自在所管轄地段中查究務必獲取結果。調查事情的書案到達，按照律令規定陳述規定上報日期爲當月二十六日，當月二十四日。其中最重要的是“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一句。我們知道，一般文書傳遞速度在居延漢簡中規定爲每時十里。由此不難推知，祇有當一晝夜爲十六時時，纔會作出“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的規定。如果一晝夜爲十八時的話，應該說“當行百八十里”纔對。漢簡所用時制的真相藉此得以揭示：一晝夜分爲十六時，而不是十八時。這句話在簡文中是作爲處理責任事故的依據，即政府律令來援引的，從中透露出來的一日十六時的信息，反映的是官方制度，具有法律的規定性、權威性。

此簡見於甲渠塞第四隧遺址，一起出土的簡牘分兩個探方，共計195枚。這近二百枚簡的簡文，載有如下紀年：漢昭帝始元五年（前82）（EPS4·T2·13）；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EPS4·T2·93）；三年（前51）（EPS4·T2·108）；漢元帝永光四年（前40）（EPS4·T2·7）。

建昭元年（前38）（EPS4.T2.2）、二年（前37）（EPS4.T2.106）、三年（前36）（EPS4.T2.4）、四年（前35）（EPS4.T2.3）；漢成帝建始三年（前30）（EPS4.T2.62），河平三年（前26）（EPS4.T2.5），永始三年（前14）（EPS4.T2.69）；漢平帝元始三年（3）（EPS4.T1.11）；更始二年（24）（EPS4.T2.24）。據此，這批簡牘的年代應定為西漢後期。西漢後期的西北邊塞地區普遍實行十六時制，當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與我們在前兩節所得的結論，可互相印證，完全一致。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秦漢時期，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曾流行實施一日十六時制。至於十六時制的具體時稱及其劃分、排列，筆者擬另文進行討論。

簡帛所見軍法輯證

陳偉武（中山大學古籍研究所）

戰國秦漢簡帛中的軍法資料雖凌雜散漫，卻如碎璧斷瓊，頗值得認真整理和研究。

要研究軍法，首先必須瞭解法、律、令的聯繫與區別。《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法、律、令功用各異，但也有其共性，即都是束縛吏民的條條框框。令是統治者尤其是最高統治者發表的言論，往往具有法律效力，《韓非子·問辯》說：“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前引《管子》例“令”與“政令”異文，說明“令”是“言”，又從“政”所出。因而比法、律更具臨時性和靈活性。“法”與“律”都是成文的科條，常常可以互相通用，如商鞅傳授魏李悝的《法經》六篇，改“法”為“律”（《唐律疏議》卷一）。“律”與“令”有時也混用，如“漢令時稱漢律，故考漢律者必兼及漢令。”①

《韓非子·定法》篇說：“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栗勁先生指出：“法的基本內容被限制於‘賞’與‘罰’這個狹窄的範圍之內，而‘賞’又僅‘存乎慎法’。……這樣，法的定義本身必然導致專任刑罰。”②廣義的軍法包括軍隊編制、軍功爵賞和軍事刑法等。由於過去人們對軍隊編制、軍功爵賞研究較多，成果不少，筆者擬以討論軍律懲戒方面的內容為主，間亦涉及慶賞方面的問題。而且本文所輯證的材料有不少是軍令。《管子·小匡》：“作內政而寓軍令。”又：“……以為軍令。”或稱為“兵令”，

如銀雀山簡《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和傳本《尉繚子》均有《兵令》篇，或簡稱為“令”（《呂氏春秋·論威》）。軍令有文字的，有非文字的，非文字的訊號系統亦以文字記錄的軍令為基礎。文字記錄的軍令還可細作分類，如青海大通漢簡有“軍門令”、“合戰令”等。

軍法有時祇泛稱為“法”或“制”。簡本《孫子·形》篇甲種：“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整理小組注：“十一家本‘法’作‘兵法’。”《孫臏兵法·陳忌問壘》：“制曰：……法曰：……”又《篡卒》：“孫子曰：兵之勝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整理小組注：“制，法也。《呂氏春秋·節喪》：‘以軍制立之。’”《荀子·議兵》中臨武君向孫卿子“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所答亦多為軍事律令。銀雀山簡《要言》：“愛民如赤子，敬法如師，親賢如父……”此處兵家所謂“敬法如師”猶如《韓非子·定法》的“法者，……此臣之所師也”。或稱為“法制”、“號令”，如《玉兵》：“出號令，明法制。”《尉繚子·制談》：“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管子·七法·選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上舉大量例子證明，兵學文獻向來都強調軍事法令的重要性。

兵家重視軍法，軍事法令的發佈者、實施監督者是什麼人呢？

古代兵刑合一，③軍隊既是作戰組織，又是執法工具，將帥領兵，兼治刑獄，所以《尉繚子·將理》說：“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理官猶言法官，《韓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竹帛。”理就是法。銀雀山篇題木牘有《李法》，整理小組輯得六枚簡，亦注云：“……古書有《黃帝李法》。《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注：‘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竹書之《李法》不知與《黃帝李法》是否有關。”今按，《李法》中八九二號簡云：“……口然而置李者，所以守國邑之口……”既然“置李”是為了“守國邑”，則《李法》當與軍事有關。而《漢書·胡建傳》所引《黃帝李法》實亦為軍事律令條文，劉向《說苑·指武》

“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因此，《漢書》顏注引孟康說謂李法是“兵書之法”甚確。戰國時代黃帝崇拜之風甚熾，好事者叢聚軍法條文而託名《黃帝理法》。銀雀山簡《李法》與《黃帝理法》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研究。

《司馬法·仁本》：“塚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由塚宰和百官宣佈軍令，這當是春秋以前故例。軍令又稱“約束”，如《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釋兵旅，解約束。”又《孫武吳起列傳》：“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因而鈇鉞或斧鉞成了軍事刑法的代名詞。《後漢書·郭躬傳》：“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帝曰：‘軍征校尉一統于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李賢注：“督為大將。”

主持軍事律令實施的人可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周禮》中主軍法之事者或為“植”，或為“戎右”。《夏官·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賞誅。”鄭玄註引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左傳·宣公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杜預注：“植，將主也。”又《夏官·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鄭玄注：“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于穀，晉梁弘御戎，欒黶為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欒黶以戈斬之。”《商君書·境內》：“將軍為木壹（臺），與國正監，與正（王）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為最啓；其後入者，舉為最殿。”這是秦國軍法的資料，記述將軍、國正、王御史共同在戰地考察將士功過的情況，以便戰後進行賞罰。《六韜·王翼》：“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此謂稱為“兵法”的人亦可監督軍法的實施。

執行軍事刑法的人又稱“軍正”或“軍吏”，“正”“吏”本是泛稱，在此用作專指。《尉繚子·武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藝文類聚》卷59“將帥”條引《史記》：“……（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曰：‘當

斬。”《孫子》佚篇《見吳王》：“孫子乃召其司馬與與司空而告之曰：‘兵法曰：弗令弗聞，君將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長之罪也。兵法曰：賞善始賤，罰……請謝之。’”則以司馬和與司空執掌軍法。《墨子·號令》：“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不行。”《漢書·胡建傳》引軍法：“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由此可知執行軍法既有專職人員，又有特殊情況下的替補人員。

古代還實行監軍制度，由君主委派軍監作為自己的代表隨軍出征，對將帥起到監督、牽制的作用。據吳振武先生研究，西周中期的善鼎即記載周王命善監軍，而《古璽匯編》著錄的“中軍尸（監）”（502.554）和“左軍尸（監）錡”（21.0126）則是兩方燕國軍監所用之璽。“漢印中有‘軍監之印’（《徵存》27.145），正可以跟這兩方燕璽相印證。”④《史記·司馬苴列傳》記齊景公使穰苴將兵，以莊賈監軍，莊賈遲到為穰苴所斬，反映了將帥與軍監的矛盾。戰國時代，慎到主張在立法後，應反對君主干預司法工作，《羣書治要》本《慎子》：“大君任法而弗躬為，則事斷于法矣。”法家慎到的這種司法獨立思想，受了兵家的影響而產生。兵家提倡“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則，這種原則正好體現了司法獨立的精神。

《睡虎地秦墓竹簡·說明》：“《秦律雜抄》中許多律文與軍事有關，其中關於軍官任免、軍隊訓練、戰場紀律、戰勤供應以及戰後賞罰獎懲的法律條文，是研究秦兵制的重要材料。”受這段話的啓迪，本文的軍法輯證將分為三類：

一、有關軍事管理的律令

一般軍事管理有別於戰地活動，相應的律令也彼此不同。

1. 軍人買（賈）稟稟所及過縣，貨戍二歲；同車食、敦（屯）長、僕射弗告，戍一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

盜賣軍用物資，故須嚴懲。軍中對經濟活動是嚴格控制的，《白帖》卷九十一董仲舒《公羊治獄》引律云：“邊鄙兵所載直百錢者，當坐棄市。”⑤這條律文的目的是為了禁止軍中貿易。

2、不當募軍中而募者，皆貲二甲，法（廢）；非吏也，戍二歲；徒食、敦（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秦律雜抄》）

非法在軍中領取軍糧的吏民要受懲罰，知情不報的軍中吏卒也要按軍法論處。這同第1條律文均屬戰勤供應管理方面的單律。

3、兄募歸，辭曰日已備，致未來，不如辭，貲日四月居邊。（《秦律雜抄》）

此律謂軍士應征戍邊回鄉，聲稱服役期滿，而證明文券未到，與其所說不符，應罰居邊四個月。

4、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長、僕射不告，貲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貲二甲。（《秦律雜抄》）

負責守衛軍士不到崗位值宿，防守崗位的負責人知情不報要受處罰，值宿警衛者擅離崗位也要處罰。栗勁先生說：“《秦律雜抄》的‘徒卒不上宿’條也應屬《屯表律》。秦簡整理小組注云：‘《屯表律》，關於邊防的法律。’從律文的內容上看，當是軍隊從事邊防的法律。”^⑥

5、以兵刃、索繩、它物可以自殺者予囚，囚以自殺、殺人、若自傷、傷人而以辜二旬中死，予者髡為城旦舂。及有……（甲渠塞第四燧探方二：100號。）^⑦

此亦軍隊從事邊防的法律。駐守邊防的部隊還得遵守地方的其他法令，如不得私自鑄錢幣，不得屠殺馬牛，不得砍伐樹木，詳見《居延新簡》第480頁。

6、有令起軍，將吏受旗鼓……後其將吏出于縣部界；……述（達）亡不從其將吏，比于亡軍。父母……（銀雀山簡《兵令》）

《尉繚子·兵令下》作：“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乃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此實含兩條律文，一條即“後戍法”，內地士卒應征戍邊，不按期抵達目的地就要定罪服刑。《史記·陳涉世家》中陳勝、吳廣等謫戍漁陽，“度以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吳所犯的法正是“後戍法”。後一律文與前舉第3條相近，用以懲處戍邊期限未滿而逃歸者。這裏說比照處理逃兵的規

定懲辦，並未具體言明量刑的輕重，但從父母知情須連坐的處罰看來，對逃兵本人的判罰定然不輕。

7. 後將吏至大將之所一日，□□□ 吏戍一歲。（銀雀山簡《兵令》）

《尉繚子·兵令下》作：“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執及不言，亦同罪。”《六韜·分兵》：“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周禮·夏官·大司馬》：“……誅後至者。”《商君書·賞刑》記顛顛後至而被斬，事又見《左傳·僖公廿八年》、《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8. 律曰：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簿者，皆勿敢擅予。（《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838號）⑥

日本學者大庭脩謂此律強調不得向身份證明不清楚者洩露軍事機密。⑦傳本《孫子·用間》亦有懲治洩密的律令：“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二、有關軍事訓練的律令

1. 孫子乃召其司馬與輿司空而告之曰：“兵法曰：‘弗令弗聞，君將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長之罪也。’兵法曰：‘賞善始賤，罰……’請謝之。（《孫子》佚篇《見吳王》）

此例兩引“兵法”，非如《孫子》書通常指用兵之法，而是關於慶賞刑罰的軍法。前者屬有關軍事訓練的律令，後者屬於賞罰的一般原則。

2. 若夫發令而從，不聽者誅□□□……（《見吳王》）

3. 先大息五日，上使民之壯者，吏將以遽（獵），以便戎事，及助大息大費。（銀雀山簡《田法》）

4. 駕驕除四歲，不能駕御，賞教者一盾。（《秦律雜抄》）

為官長駕車，學習四年還不能熟練掌握者，教授駕車技藝的人要受懲罰。《尉繚子·兵教上》專述教戰之令：“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

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已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軍事訓練責任重大，如受訓練的將士違犯軍事律令，都會使教戰者連坐。

三、有關戰地活動的律令

1、鼓而坐之，十而揄之。（《孫臏兵法·威王問》）。

整理小組注：“坐，疑即坐陣之坐。《尉繚子·兵令上》：‘有立陣，有坐陣……立陣所以行也，坐陣所以止也。’……鼓音本來是起立前進的號令，簡文說‘鼓而坐之’，當是一種奇兵。……‘十則揄之’，未詳。一說坐借為挫，揄訓為引，意謂擊鼓進軍，挫敗敵人；以多種辦法引誘敵人。今案此條田忌問語已殘，但下一問是‘行陣已定，動而令士必聽，奈何？’問的是如何對待自己一方士卒的事，此處‘鼓而坐之，十而揄之’的‘之’似亦應指己方士卒。”

今按，整理小組注“坐”為坐陣之“坐”，甚是，謂此為使用奇兵的號令亦可從，而所引或說則不可信。“揄”當訓舉，《韓非子·飾邪》：“龐援揄兵面南，則鄰盡矣。”“揄兵”即舉兵。《淮南子·汜論訓》：“〔曹沫〕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揄三尺之刃。猶言舉三尺之刃。古語“揄揚”指宣揚、贊揚，義頗虛化，“揄”和“揚”本來都是舉起、揚起之義，故同義而複合。因此，“揄”的詞義與“舉”、“起”、“作”、“立”相近，簡文“十而揄之”意謂擊鼓十次則讓士卒起立。“揄”與“坐”義相對立。《吳子·論將》：“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坐”與“起”義反，一如“坐”與“揄”。

2、出卒戰（陳）兵，固有恒令，行伍之疏數，固有恒法。先……適之。恒令，非追北衄邑，先後……之。恒令，前失後斬。（銀雀山簡《兵令》）

出軍結陣，始終要保持一定的隊列，除非追逐敗敵或襲擊敵方城邑，隊列都不能散開。否則，前列失去隊形，後列的人可以斬殺。《尉繚子·兵令上》作：“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同書《經卒令》也說：“鼓行交鬥，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

為辱衆，逾五行而前有賞，逾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嚴整有序的陣形，奮勇向前的意識，都是戰鬥力強的表現，對行伍進退的獎懲絕不止於爲了“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六韜·武鋒》：“亂行可擊。”也從側面證明軍法誅斬士卒亂行者正是爲了防備敵人乘隙攻擊。

3. 戰而失其將吏，及將吏戰而死，卒獨北而環（還），其法當盡斬之。（銀雀山簡《兵令》）

《尉繚子·兵令下》：“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竹簡本所論的犯法者是“卒”，《尉繚子》所論則爲卒和將吏。又《東伍令》：“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法。”己方的將領陣亡，又不能擒獲敵將來抵罪，觸犯了“亡軍”之法，以銀雀山簡《兵令》例之，即要處以斬首。戰國時代兵士逃亡之風頗盛，《韓非子·詭使》謂逃兵而附託有威之門以萬數。禁止逃兵是當時治軍的一個難題，《尉繚子·兵令》：“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矢之一勝也。”睡虎地秦簡中也有懲處逃兵的律文：“不死者歸，以爲隸臣。”⑥

4. 將吏將其卒北，斬其將□……□□□□三歲。（銀雀山簡《兵令》）

“將”字下所缺當爲“吏”字。《尉繚子·兵令下》作“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兩段文字頗有出入。

5. 軍大戰，大將死，□□五百以上不能死適（敵）者，皆當斬，及大將左右近卒在□□者皆當斬。……奪一功，其毋（無）（□□□）□三歲。（銀雀山簡《兵令》）

《尉繚子·兵令下》作：“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陣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

6. ……軍功者戍三歲；得其死（屍），罪赦。（銀雀山簡《兵令》）整理小組認爲“軍功者”缺一簡，且“簡本此段字數當較宋本爲多”。《尉繚子·兵令下》作：“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

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李解民先生謂“簡本在‘同伍盡奪其功’之後、‘得其屍’之前有‘〔無〕軍功者，戍三歲’于義長。”⑩

7. ……百人以下之吏及與□及伍人下城，從……不操其旗章，從人非其故數也，千人之將以下止之，毋令得行，行者吏與□□當盡斬之。（《守法守令》）

此為戒嚴令，屬守城之法。《墨子·號令》：“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又：“卒有驚（警）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又《備城門》：“城持出必為明填，令吏民皆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其故人及其填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于上。此守城之重禁也，大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孫詒讓《問詁》謂“持”當為“將”，“填”當為“旗”。簡本證其說甚確。

8. 守城之令，主人毋與客言，毋得遇……舉手指摩（麾），姦詐之所豪（託）也。……（《守法守令》）

《墨子·號令》：“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譴罵，……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靡、訟駁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銀雀山簡《地典》：“……□□軍法令毋登丘墟（呼），毋遂……”（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2601號）。《釋文》2688號作：“軍法令毋登而譟（呼），毋遂……”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姦細通敵、防止暴露己方軍事意圖而製訂的律令。

9. ……去其署者身斬，父母妻子罪……（《守法守令》）

《墨子·號令》：“擅離署，戮。”

10. ……有法，父母妻子與其身同罪。（《守法守令》）

11. ……〔敵〕人在城下，城中行者皆止，丈夫行……（《守法守令》）

12. ……罪，非時得行者唯守……（《守法守令》）

13. 禁邪為次，殺鷄狗毋令有聲……（《守法守令》）

14. 劍戟固人備其所。弩二人共一，非適（敵）人傳城及在城下，卒不得服弩，弩恒在將吏之所。（《守法守令》）

15. 以斷辯入圍上爲犯禁也。（《守法守令》）

16. 廿步一屏（屏），離城毋過十五步。下之屏（屏）者必銜枚，二人俱斬。（《守法守令》）

17. 諸官府室屋壯（牆）垣及家人室屋器戒（械）可以給城守者盡用之，不聽令者斬。（《守法守令》）

18. 故大夫斬首者，遷（遷）。（《秦律雜抄》）

大夫責在指揮戰鬥，不得斬首爭功，因此《六韜·軍勢》說：“故爭勝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

19. 擅出令者斬官無紀……（吳氏《釋文》1665號）

“擅出令者”猶言“二令者”，《尉繚子·將令》：“軍無二令，二令者誅，失令者誅。”

20. 將長及死不出營，營私卒將吏皆耐爲鬼薪（薪），其……（青海大通漢簡351號）

21. 將軍令，令軍人人爲三日糧，國人家爲……望，國使毋來，軍使毋往。所以斷氣也。（《孫臏兵法·延氣》）

“所以斷氣也”殆非軍令原文，當是兵家編寫兵學文獻時闡釋律令之語。下文“所以利氣也”、“所以泄氣也”性質相同。

22. 將軍令，……其令。所以利氣也。（《孫臏兵法·延氣》）

23. 將軍召將衛人者而告之曰：飲食毋……〔所〕以泄（延）氣……也。（《孫臏兵法·延氣》）

24. 有興，除守嗇夫。段（假）佐居守者，上造以上不從令，貲二甲。（《秦律雜抄》）

此外，還有簡文殘泐過甚，無從詳知內容的軍法簡，如《守法守令》：“……斬。”吳氏《釋文》2267號：“不從令者罪……”

通過對出土軍法資料的輯證，筆者對軍法與一般刑法的聯繫和區別有如下述認識：

（一）、軍法比一般刑法峻酷

古代軍政合一，平時爲卿大夫，戰時爲將軍。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也是最高軍事統帥。銀雀山簡《吳王問》中稱晉國六卿爲“六將軍”，

正是春秋以前軍政制度的反映。戰國以後，有了職業化的軍官，不論出身貴賤，都可靠行軍作戰博取功名爵位。但軍法仍未能從一般刑法中完全獨立出來，如睡虎地秦簡《軍爵律》、《敦（屯）表律》均屬軍律，但與民事刑律渾然雜次。戰時全民皆兵，而銀雀山簡《守法守令》，不祇針對守城將士而言，對一般民衆亦適用。《韓非子·飾邪》：“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于鄰敵矣。”《國律》是趙國的刑書，《奉法》是燕的刑書。韓非子以《國律》、《奉法》的執行與否同趙、燕國勢的盛衰、軍隊的強弱聯繫在一起，可見《國律》、《奉法》亦必含有軍法的内容無疑。

戰國以後已經有了一些專門的軍事律令。銀雀山簡和傳本《尉繚子》都有《兵令》專篇，傳本《尉繚子》還有《伍制令》、《分塞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兵教》等篇，《墨子》有《號令》篇，這些絕大多數是有關軍事方面的懲戒性條文，比春秋以前軍誓所申明的“約束”精詳得多。

戰爭關乎國家存亡安危，對在戰爭中立功的人重賞，對在戰爭中觸犯律令的人重刑，都是必需的。《商君書·外內》：“民之外事，莫難于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前文輯證的軍法資料有不少是處以斬刑的律令，若是罪由不跟軍事性質相關聯，量刑當不至如此嚴重。

從秦的商鞅時代就有重刑連坐的法律。《商君書·墜令》：“重刑而連其罪。”又《畫策》：“行間之治連以五。”又《境內》：“其戰也，五人束縛而爲伍，一人羽（逃）而輕（剋）其四人。”連坐法的出現或可追溯到更早時代。《書·甘誓》：“予則孥戮汝。”《周禮·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藁。”連坐又稱爲“連刑”，《尉繚子·兵教下》：“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同伍連坐的律令見於前文輯證一·1、一·2、一·4、一·7、二·4、三·3、三·5、三·6、三·7、三·16、三·20諸條。同伍連坐屬於重刑連坐的

一種，另一種則是親屬連坐，如前文輯證一·6、三·9、三·10諸條律文。親屬連坐的律令在傳世文獻中習見，如《墨子·號令》：“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連父母、妻、同產。”《尉繚子·兵令下》：“（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執及不言，亦同罪。”這些律令對親屬是否犯有同謀罪、窩藏罪作了劃分，與罪同謀、窩藏罪犯的親屬必須連坐。《國語·吳語》記越王勾踐軍令：“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史記·商君列傳》注引律云：“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既指抄沒降敵者的財產，亦指將其親屬收斂。到了三國時代，軍法對降敵將士的家屬應否連坐有區別對待，《魏志》卷四注引《魏畧》云：“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生。”程樹德謂“疑亦魏武《軍令》佚文”。^②無論同伍連坐還是親屬連坐，都是軍法中重刑主義的具體表現。

（二）、軍法比一般刑法更重時效性

與一般刑法相比，軍法尤其是有關戰地活動的軍事律令更突出矛盾的嚴重性和臨時性。大敵當前，對待觸犯軍法的行為，容不得慢悠悠的偵驗取證、審訊復核、定罪量刑，往往是從嚴從重就地懲處。前文輯證三·2條規定如果出卒陳兵之時擾亂行伍疏數，可以“前失後斬”，即為明證。軍法極重軍事行動的時間因素，失期者斬，嚴懲不貸。

作為對重刑主義的一種補充，減免刑是法律制度趨於嚴密的標誌。軍法中的減免刑也從側面反映了軍法比一般刑法更講究時效性。簡本《尉繚子》四：“故今世千金不死，百金不胥靡。”此為納金贖罪活命之證。《管子·小匡》罰犯人繳納兵器軍備抵罪，睡虎地秦簡也有大量內容相似的律文，前文輯證一·2、一·4、二·4、三·24諸條均屬秦地軍律，亦以罰交兵械抵罪。納金、交納軍備而實現減免刑，祇能在平時軍事管理或戰後獎懲時纔能做到。在有關戰地活動的軍法中，更加重視通過殺敵立功、告發罪犯等途徑而非藉經濟手段或徭役、兵役來實現減免刑。《尉繚子·東伍令》：“亡伍而得伍，當之。……

亡長得長，當之。……亡將得將，當之。”喪失己方的將士，一同作戰的人有罪，而斬獲敵方將士，則可免刑或減刑。前文輯證三·6條“得其死（屍），罪赦”，則強調搶回戰死伍人的屍首可以免刑。《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又《兵教上》：“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用告發罪犯可免刑的律令迫使同伍戰士互相監督、減少或避免犯罪。這正是連保連坐之制的延伸。

總之，軍法中有關減免刑的律令帶有特殊性，側面反映了軍法比一般刑法更重時效性。

附記：本文承曾師經法（憲通）先生審閱，謹此申謝。

注釋

① 程樹德《九朝律考·凡例》，中華書局，1963年。

② 《秦律通論》第82—84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 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古代兵刑無別》，中華書局，1963年。

④ 《戰國璽印所見的監官》（摘要），1991年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會議論文。

⑤ 程樹德《漢律考》，《九朝律考》第74頁。

⑥ 《秦律通論》第351頁。

⑦ 《居延新簡》第561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⑧ 林梅村、李均明編，第86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⑨ 《秦漢法制史研究》第71頁，林劍鳴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⑩ 《秦律雜抄》。

⑪ 《尉繚子譯注》第145頁，注釋〔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⑫ 《九朝律考》第215頁。

秦至漢初簡帛文字與 假借改造字字源考證

趙平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所謂假借改造字，原本屬於假借字，由於種種原因，譬如：爲了表現它的借義，或爲了與本字區別，或由於漢字系統的影響，字形結構後來經過了改造。對於這類字的字源，過去由於缺乏材料，頗多誤解。

七十年代以來，在我國幅員遼闊的土地上，陸續出土了多批秦至漢初的簡帛文字資料。這些資料對於探求假借改造字字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爲戰國秦漢時期，既是假借字使用的高峰期，又是漢字形體演變最劇烈的時期，也正是假借改造字集中形成的時期。

本文試圖利用秦至漢初簡帛文字來探求无、縣、覺、皋、案的字源，以此發凡示例，展示秦至漢初簡帛文字在研究假借改造字字源方面的巨大價值。

一、釋无

《說文·亡部》：“𠂔 亡也。从亡無聲。𠂔，奇字無。通於元者，虛無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無。’商承祚先生說：“《玉篇》以无爲古文，不曰奇字。”^①无字字形奇特，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釋。

從出土材料看，无字始見於秦漢早期簡帛文字。在《睡虎地秦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含《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和《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馬王堆漢墓帛書〔叁〕》（含《春秋事語》和《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含馬王堆漢墓所出各類醫書）、《銀雀山漢墓竹簡》（含《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中，无字共出現二百多次，除一例外^②，都用作無。

這些无字的形態非常豐富，主要有以下幾種寫法：

无（睡虎地秦墓竹簡）

夫（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

无（孫臏兵法）

无（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

這些寫法和夫字下列寫法相同相近：

夫（貳簋）

夫（睡虎地秦墓竹簡）

夫无同是魚部字，聲紐同是唇音，古音很近，古漢語中有通用之例。如《文子·符言》：“故夫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即危，夫為〔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淮南子·精神訓》：“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392：“是故擅主之臣罪夫赤（赫）。”其中夫均通無。从夫的字也是如此，《戰國策·魏策二》：“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呂氏春秋·開春論》扶作撫。因此我們認為古文无是夫的通假字。

夫借來表示有無的無，至少不會晚於戰國末年。自從借夫表示無後，因為二字都是常用字，使用頻率很高，從形體上進行區別就顯得非常迫切。從睡虎地秦簡看，人們已經在探索區別二字的途徑。如夫作夫，无作无。很明顯，秦簡中夫无求別與後世是不同的。後世主要通過中筆是否出頭來區別，這種區別方法在《戰國縱橫家書》中已經萌芽^⑤，至遲在東漢時代已經成為嚴格的規範，校官碑、孔龢碑、熹平石經的无都不出頭。《說文》所收的奇字无當是漢代的產物。

二、釋 絲

《說文·糸部》：“𦃟 聯微也。从糸从帛。”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紡絮成縷謂之絲，聯微者，言其微眇相續也。因引申為絲長之稱。”張舜徽先生說：“絲當以絲絮為本義，乃繭之未紡成縷者，即今語所稱絲絲也。其物聯綴數廣不絕，揭之則薄如紙，疊之則厚可裝衣御寒。古人亦稱絲為帛，所謂五十非帛不暖也。絲與絮析言有別，

蓋精者爲絲，粗者爲絮，故許以敝絲訓絮耳。中土自宋元以來，始有木絲^④，故其字从木作棉者最爲晚出，古但作絲也。”^⑤

絲的本義爲“絲絲”，它的小篆形體“从糸从帛”。從出土文物看，它始見於秦漢早期簡帛。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及卷後古佚書》103：“絲絲呵若存。”《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222下：“絲絲呵其若存。”絲字分別作𦃟、𦃠。《睡虎地秦墓竹簡》602帛作帛、662作帛，與上舉絲字所從迥別，知絲本不从帛。

秦漢早期簡帛文字中，縣字作𡩂（睡虎地秦墓竹簡）、𡩃（春秋事語）之形，它本是會意字，象巢首之形。金文作𡩄（縣妃簋），漸漸演變爲𡩅，再變爲縣（小篆）。

拿簡帛文字中的絲和縣對照就會發現它們僅一橫之差，寫法驚人的相似。絲和縣都是元部字，我們認爲絲原本是縣的借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漢印里絲尚作𦃟），絲是通過減少一橫劃來與縣區別的。大約從漢代開始，出現了从帛从糸的絲，是在縣的基礎上，根據它所表達的意義“絲絲”進一步改造的結果。因此，絲在借字的基礎上曾經經歷了兩度改造。



由絲字字源的考證，可以聯想到一樁懸案。《方言》：“驢矐子謂之矐，宋衛韓鄭之間曰矐。”《楚辭·招魂》：“遺視矐些。”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方言》：“驢矐之子謂之矐。”《說文·目部》：“矐，盧童子也。从目，縣聲。”《玉篇》將矐矐二字並收，以矐爲矐之或體。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按《方言》矐字，當是矐字之誤。”張舜徽先生《說文解字約注》：“竊疑今本許書篆文作矐者，乃矐字之筆誤。”我們弄清了解縣的關係，就可以證明顧野王和段玉裁的說法是基本上正確的。

三、釋矐

《說文·矐部》：“矐 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矐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戴侗《六書故》：“以醴酉或血涂鼎釜及竈，彌其隙也。成廟成器皆矐之。”矐字馬王堆漢墓帛書《養生方》149作矐，文例爲：“矐冬各□□，草薺、牛膝各五折（掇）。”這個矐與小

篆𦣻的寫法不同，是在下列古文字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



 (頌鼎)  (秦公簋)

字象雙手持皿往頭上澆水之形，是沐的本字。由此看來，林義光《文源》說𦣻“古作”是正確的，但他說，可以證明這一點。《爾雅·釋詁上》：“𦣻𦣻，勉也。”《釋文》：“𦣻字或為𦣻。”

傳世文獻中，𦣻和𦣻也是異體字。如《國語·齊語》：“三𦣻三浴之。”宋庠《國語補音》𦣻作𦣻。又《爾雅·釋草》：“蔞蔞，𦣻冬。”《經典釋文》：“𦣻亦作𦣻字。”按𦣻即𦣻之省文。張舜徽先生《說文解字約注》說𦣻“俗書有𦣻、𦣻𦣻諸體。”可見其異體之多。

𦣻既為沐之本字，字形和“血祭”本無關係。古籍中借𦣻表示“血祭”都應屬於假借。小篆𦣻字从酉作，是就酉進行改造的結果，時間大約不會早於東漢。酉（即酒）和血祭有一定的聯繫，表明改造是扣着詞義進行的。由於𦣻在借字上進行了改造，因而許慎把它當作會意字來理解，就顯得很牽強。

四、釋鼻

《說文·本部》：“ 氣鼻白之進也。从本从白。禮：祝曰鼻。登歌曰奏，故鼻奏皆从本。《周禮》曰：‘詔來鼓鼻舞。’鼻，告之也。”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氣鼻白之進未達其悒。”張舜徽先生《說文解字約注》：“此篆說解，但當云：氣之進也。鼻、白二字皆衍文。從本從白，白非黑白之白，乃自之省體。自即鼻也，亦省作白。本書白下云：‘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氣從鼻出，與口相助也。’鼻訓氣之進也，故从白，象氣所自出；从本，喻氣之進疾也。故鼻之本義，謂疾進而引其氣以作聲耳。《周禮·樂師》：‘鼻舞’。鄭注云：‘鼻之吉號也。’《儀禮·士喪禮》：‘鼻某復。’鄭注云：‘鼻，長聲也。’皆其義已。自篆體謄从白而為白，說者望文生訓，傳會於黑白之白，而原意晦矣。”漢印鼻或作，從自作，可證說小篆鼻中的白“乃自之省體”有據，鼻實際上是鼻的本字。

皋的出現是比較晚起的事情，它在秦漢早期簡帛文字中還沒有形成專字，祇寫作𡗗。譬如：

馬王堆漢簡醫書《雜禁方》1：“又（有）犬善皋於𡗗（壇）與門，埽（涂）井上五尺。”

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98：“擇（釋）齊兵於焚陽成皋。”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191：“口人於齧桑而禽汜集也。”

其中皋分別作皋_皋、皋_皋。儘管簡帛的整理者都把它隸定為皋，而實際上它的寫法和𡗗沒有什麼不同，祇是借𡗗表示皋。這種情況在傳世古籍中也是很常見的。如《尚書·皋陶謨》：“皋陶。”《困學紀聞》六引《列女傳》作“𡗗陶。”《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夏后皋。”《路史·后紀》十四皋作𡗗。《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國語·吳語》：“皋如。”《春秋繁露》九皋作𡗗。《荀子·大略》：“望其墳皋如也，嶼如也。”《列子·天瑞》《孔子家語·困誓》皋作𡗗。

皋的出現應與𡗗的異體（實際上是省略形式）有關。東周金文中𡗗作𡗗旁時或作𡗗（𡗗_𡗗字所从）。秦漢早期簡帛文字或作𡗗（睡虎地秦墓竹簡1089擇字所从）。𡗗這兩個異體和小篆皋的寫法很相似。知《說文》小篆皋是在𡗗之異體的基礎上改造而來的，時間不會早於西漢早期。

在許慎所處的東漢時代，皋有兩種寫法，一種從白，一種從𡗗（漢印中皋字有从白从𡗗兩種寫法可證），從許慎對皋的解釋看，《說文》所錄的皋當本从𡗗，至少它是把白當𡗗來理解的。



五、釋案

《說文·采部》：“𡗗，悉也。知案諦也从𡗗从采。𡗗篆文案从番。”徐鍇曰：“从𡗗，覆也；采，別也；能包覆而深別之，案悉者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此與叢从西數同意。”張舜徽先生《說文解字約注》：“案之言深也，謂辨別事物至深邃也。”諸家皆依𡗗形為說。





在秦漢早期簡帛中，審主要作


審（睡虎地秦墓竹簡25·50）

審（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38上）






字下所从和審字不類，審一般作審（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126上），一律从田，和審字所从有嚴格的區別。驗之此前的古文字，古璽審作，審作，可以看出簡帛文字的寫法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簡帛文字中的審，不是象《說文》分析的“从心从審”，而應分析為从田从日（古璽文从口，从口與日同意）。田就是窠字。據我們考證，窠从穴从火作，象穴中有火之形，本義為竈，引伸為溫煮。它的演進序列如下：

（強伯窠鼎）——（沁陽戰書）——（石鼓文深字偏旁）
——（馬王堆醫書養生方）——窠（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書深字偏旁）^①

從窠的演進序列可以看出，窠和窠的某些寫法基本相同的。黃侃先生在《說文同文》中曾指出“窠同窠”，是非常精辟的見解。窠窠同是侵部書母字，古音相同。在从口或从日的審出現之前，所謂“悉”的意思應是借表示“竈”的窠來表達的，後來纔在借字的基礎上加意符。《侯馬盟書·宗盟類》16.3中有一字作，隸作窠。此字應理解為从思窠聲，也是審的異體。這樣，小篆審的出現可能有兩個途徑。一是把日改成田，一是把窠中的心省去。但無論經過哪種途徑，都經歷了被審同化的過程。因為被同化，導致了審字的中筆屈首，相應地窠字中筆也改為屈首。

注釋

- ① 《說文中之古文考》10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② 《馬王堆漢墓帛書〔卷〕》117，文物出版社1983年。
- ③ 如談書69.176，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卷〕》，文物出版社1983年。
- ④ 一般認為公元七世紀開始，從印度引進木槧。
- ⑤ 《說文解字約注》24卷7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 ⑥ 于省吾先生說：“  典籍皆訛作‘’。” 即 字。參見《齊魯蔡侯銅器銘文考釋》，載《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
- ⑦ 參見拙文《釋窠》，《考古》1992年10期。

讀秦簡字詞札記

劉 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

1. 詭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精裝本，以下簡稱《秦簡》）“封診式”部份有如下釋文：

簡54：“其手毋𢇛，令𢇛（號），其音氣敗。𢇛（癘）毆（也）。 ”

簡61—62：“訊甲亭人及丙，智（知）男子可（何）日死，聞𢇛（號）寇者不毆（也）？”

《秦簡》一書將𢇛字後加圓括號注為“號”，顯然是認為“𢇛”通作“號”。《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即將此字直接置於號字下。按此釋非是。𢇛字原簡作附圖1、2之形，所從之一彎筆並不是“水”旁。秦簡中凡偏旁中的“水”皆作三點之形，無一例外。西周金文中有字作附圖3之形，林澧先生在《新版〈金文編〉正文部份釋字商榷》（一九九〇年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南京第九屆年會論文）一文中將其釋為“𢇛”，其說極是。秦簡“𢇛”字所從之“𢇛”形與金文“𢇛”字全同，無疑也應釋為“𢇛”。秦簡“𢇛”字作附圖4之形，漢印“𢇛”作附圖5之形，𢇛字所從之“𢇛”作附圖6之形，漢簡“𢇛”字作附圖7之形，寫法都與秦簡“𢇛”所從之“𢇛”近似。所以秦簡的“𢇛”字顯然應該釋為“詭”。詭字見於《玉篇》、《廣韻》、《集韻》等書，即啼字異體。《漢書·嚴助傳》：“親老涕泣，孤子詭號。”顏師古注謂：“詭，古啼字。”字又作𢇛，《說文·口部》：“𢇛，號也。”詭、號皆喊叫之意，故典籍多以“詭號”連言。《秦簡》一書說義是，釋字則非。

2. 久故

“封診式”簡60有一句說：

“其腹有久故癰二所。”

《秦簡》一書注釋“久故”謂：“久，讀為灸。灸故癰，灸療遺留的疤痕。”按讀“久”為“灸”非是。“久故”二字乃同義複合詞，不應分釋。“久”即“舊”也。《尚書·無逸》：“舊為小人。”《史記·魯周公世家》作：“久為小人。”《詩·大雅·抑》：“告爾舊止。”鄭箋：“舊，久也。”《文選·答寶戲》：“君子之真也，時暗而文章者，”項岱謂：“久，舊也。”戰國包山楚簡占卜類簡在談到疾病時屢言“舊不瘥（瘥）”，“舊不瘥（瘥）”即“久不愈”之意（見李零《包山楚簡研究》（占卜類），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中華書局1993年）。此皆“久”可訓“舊”之證。“故”亦“舊”也。《楚辭·招魂》：“耐飲盡歡，樂先故些。”王逸注：“故，舊也。”《左傳·昭公十三年》：“曼成然故事蔡公，”杜注：“故猶舊也。”“久故”猶然“舊故”或“故舊”，皆“舊”之意。簡文“其腹有久故癰二所”是說“其腹部有舊疤二處。”

3. 庠

“封診式”簡84有一句說：

“甲懷子六月矣，自晝與同里大女子丙鬪，甲與丙相拌，丙償庠甲。”

《秦簡》一書注釋謂：“拌（音昨），《說文》：‘持頭髮也。’又“償（音奮），摔倒。庠，疑即庠（音餅）字，不詳。”按疑“庠”字為“庠”字非是。庠應即“𠂔”字。從古文字看，“厂”“𠂔”兩個偏旁應該是由一個字所分化，所以在戰國秦漢文字中這兩個偏旁經常混用無別，例多不舉。又早期從“𠂔”的字，在從來的文字中常常訛變為“开”。如“研”“汧”“開”三字在漢代就已大多寫作“研”“汧”“開”之形。由以上兩條文字演變規律來看，庠應該就是後世的“𠂔”字。《玉篇·厂部》：“𠂔，音溪，倒地。”從“𠂔”得聲的字如“𠂔”“𠂔”“𠂔”等字皆讀“古奚切”，而“𠂔”音溪，可見“𠂔”確有可能是從“𠂔”得聲的。“𠂔”訓為“倒地”，與“償”訓為“仆偃”其義相

同，所以“儔厝”也應是一個同義複合詞。

4. 離散

“秦律十八種”簡117說：

“縣葆菜苑、公馬牛苑，與徒以斬（塹）垣離（籬）散及補繕之，輒以效苑吏，苑吏循之。”

《秦簡》一書注釋謂：“塹，動詞，挖掘起保御作用的壕溝。散，疑讀爲藩。”按散、藩雖皆爲元部字，但一爲心紐，一爲明紐，似無相通之可能。“散”字在此應讀爲“柵”。柵古有兩音，一在清紐錫部，一在邪紐元部。柵讀邪紐元部與散字心紐元部音很近。《說文·木部》：“柵，編樹（《一切經音義》引作豎）木也。從木冊。冊亦聲（小徐本徑作“冊”聲）。”古從冊得聲的“珊”“姍”“刪”等字皆爲心紐元部字，與散字聲韻皆同。字書“霩”字義同於“霰”。典籍散字與從冊得聲的字可以相通，如《史記·平原君虞霩列傳》：“槃散行汲，”《集解》謂：“散亦作跚。”可證“散”確實可通作“柵”。《廣韻》去聲三十諫韻：“柵，籬柵。”按籬即欄也，籬柵即柵欄，今稱柵欄又龍崗秦簡252簡說：“亟散□□□毋令獸逃。”散爲動詞，疑是亦讀爲“柵”，意爲柵欄範圍以防野獸出逃。

5. 寬俗

“爲吏之道”簡12壹有一句說：

“寬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過勿重。”

《秦簡》一書在“俗”字後加圓括號注一“容”字，是以爲“俗”假爲“容”。按“俗”“容”兩字雖音上可通，但在早期典籍中少見“寬容”一詞。“俗”在此應讀作“裕”。“俗”“裕”皆從“谷”聲，故可相通。“寬裕”一詞多見於典籍。“寬裕”是儒家提倡的臣子所應具備的一種美德。《禮記·內則》：“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禮記·中庸》：“寬裕溫柔，是以有容也。”《禮記·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又《禮記·儒行》：“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

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句中前言“忠信”，後謂“寬裕”，與上引秦簡文“寬俗（裕）忠信”正相合。秦簡“爲吏之道”是爲初學做吏者提供的以識字課本爲形式的行爲規範，這與《禮記·儒行》篇歷述儒者行爲的內容很接近。

6. 索魚

“日書甲種”簡72正貳說：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爲祟，得之於黃色索魚董酉（酒）”《秦簡》一書注釋謂：“索，疑讀爲臘。”按古音索在心紐鐸部，臘在來紐葉部，聲韻皆遠隔，無由得通。“索”字在此應訓爲“乾”。《倉頡篇》：“索，盡也。”《說文·水部》：“斯，水索也。”“水索”即“水乾了”的意思。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諸傷方下有一條說：“復治……孰（熟）……其汁，汁宰（滓）皆索。”諸家皆訓“索”爲盡或譯此句爲“喝藥汁，喝時要把藥滓和藥液全部喝下。”按此說不妥，此“索”字即應訓爲“乾”，此句是說反復熬藥，直把藥汁和滓子熬乾爲止。後世有“摘索”“離索”“蕭索”“疏索”諸詞，皆“蕭條冷落之意”之意（見郭在詒《唐代俗語詞雜釋》“摘索”條，載《訓詁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蕭條冷落”即“枯乾”，這與“索”訓爲“乾”義本相因，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50號有“右方索魚七胍”之句，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在《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考釋補正》一文（載《文史》第九輯）中指出“索魚”是指乾魚。之後裘錫圭先生又在《說“索我於枯魚之肆”》一文（載淮陰師專《治葉文史專刊》110號，1981年；又收於作者《古代文史研究新探》一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論證了《莊子·外物》“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句中“索”字與“索魚”之“索”同義，就是穿在繩索上掛起來的意思。而所以稱乾魚爲索魚，應該是由於它們通常總是穿在繩索上掛起來的緣故。按秦簡中的索魚同漢簡中的索魚相同，也應該是指乾魚而言，而乾魚其實也就是臘魚，因爲將食物製成臘，“風乾”是其主要特徵。

“日書甲種”簡107正壹說：

“以殺豕，其肉未索必死。”

《秦簡》一書注釋謂：“索，盡。”按此注非是。此“索”字即“用繩索掛起來”或“乾”之意，與《莊子·外物》“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之“索”字義同。用繩索把肉掛起來風乾，是爲了製成臘肉。

《廣雅·釋天》：“臘，索也。”《禮記·郊特牲》說：“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按臘、蜡相通，《廣雅·釋天》和《禮記·郊特牲》中的“索”字自有注釋以來一直不得正解，皆以“求索”之義釋之。其實這個索字同漢簡和秦簡中“索魚”之“索”相同，也應訓爲“乾”，是指用繩索把食物掛起來風乾的意思。

7. 筭屏詞馬

“日書甲種”簡156背至160背是內容有關“馬”的“馬謀”篇。《秦簡》一書認爲馬謀“或即祭祀馬祖”，“則馬謀爲祈禱馬匹繁殖的祭祀。”按《周禮·甸祝》謂：“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饗獸，舍奠於祖禰，乃飲禽。禩牲、禩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曰：“禩，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獸。”鄭玄注：“禩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說文·示部》：“禩，禱牲馬祭也。”簡文頭兩個字爲“祝曰”，以下爲“祝”之內容。此“祝”也就是《周禮·甸祝》的“祝號”。所以從簡文內容看，“馬謀”篇應是馬祭的祝禱辭。簡文說：“驅其殃，去其不祥，令其口嗜口，口嗜飲，律律弗御自行，弗驅自出，令其鼻能嗅香，令耳聰目明，令頭爲身衡，脊爲身剛，脚爲身口，尾善驅口，腹爲百草囊，四足善行。”這與《周禮·甸祝》杜注謂“爲馬禱無疾”和鄭注“爲馬祭，求肥健”正相合。

簡文中有一句說：

“主君筭屏詞馬，”

《秦簡》一書對“筭屏詞馬”四字未加注釋。按“筭”似應讀爲“拘”，“筭”“拘”皆從“句”聲，有可相通。拘，執也，在此謂拘執馬也。

屏詞二字有些費解，頗疑屏字應讀為“禛”，《廣韻》上聲三十八梗韻：“禛，急兒。”《集韻》上聲三十九耿韻“禛，急也。”詞字《玉篇·言部》謂：“詞，徒貢切，認詞也。認，且送切，認詞，言急也。”《廣韻》去聲一送韻：“認，認詞，言急也。”又《廣韻》去聲一送韻：“駟，馬急走也。”詞、駟音同義近，應為同源詞。《韓非子·忠孝》：“今民懷詞智慧。”蔣禮鴻謂：“懷與懷、猥通。《說文》：‘懷，急也。’‘猥，疾跳也。一曰：急也。’是懷謂動之急也。懷詞猶云輕躁。”（見蔣禮鴻《讀韓非子集解》，載《懷任齋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蔣氏又引《後漢書·和熹節皇后紀》：“假借威權，輕薄認詞”章懷注“言急遽也”以證“詞”之“急”義。按“屏（禛）”“詞”二字皆有急義，於簡文中似指馬之暴躁而言。屏（禛）詞”應是一同義複合詞，“屏（禛）詞馬”似指暴躁不馴之馬，所以纔需加以拘執訓練，以達到能“律律弗御自行”的要求。

8. 尋

《秦簡》一書有如下釋文：

A. 冠（冠）、製車、折衣常（裳）、服帶吉。（日書甲種簡13正貳）

B. 可取婦、家（嫁）女、製（製）衣常（裳）。（日書甲種簡32正）

C. 六月己未，不可以製新衣，必死。（日書甲種簡15背）

D. 凡製車及冠（冠）□□□□申，吉。（日書乙種簡130）

其中A的製字、B的製字、C的製字、D的製字分別作附圖8、9、10、11諸形。《秦簡》一書解釋C的製字說：“所從之折從𠂔，從斤、從凡，斤反書。”按細加觀察就會發現，所謂的“𠂔”其實是兩個上下排列的“又”字，字既不從斤，也不從凡，這個字與D的製字顯然是一個字。兩個字都從“衣”作，只是C省去了所從的“寸”旁。秦漢時期的尋字結構是從兩個“又”（此從甲骨文、金文形體演變而來），從“舟”，從“寸”。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和“老子甲、乙本”有公認的尋字見附圖12、13、14、15之形，差別是字上部所從的“又”

和“舟”的左右位置有變化。漢印中有字作附圖 16.17 之形，我們在一篇題為《璽印文字釋叢（一）》（載《考古與文物》1990 年 2 期）的小文中將其釋為“尋”。同馬王堆帛書的尋字比較，其結論是沒問題的。秦簡這四個字其實也應是尋字或從尋的字，同馬王堆帛書和漢印的尋字比較起來，祇是 A、B 兩個尋字所從的“舟”旁左側一筆寫得較長，字左側的兩個“手”形與“舟”旁相連而已。D 所從之“舟”旁很清楚，而 A、B 的“舟”旁中間兩筆則變成了連書。所以 A、B 兩個字應該釋為“尋”，C、D 兩個字應該釋為“禪”。“尋”“禪”二字在簡文中似都應讀作“探”。尋字甲骨文本從“酉”（簋）聲，典籍探字又作擗或擗。《周禮·擗人》：“擗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序官注“擗人主擗序王意，以語天下。”《釋文》：“擗，他南反，與探同。”《集韻》平聲二十四監韻：“擗，取也，或作探。”《說文·手部》：“擗，探也。”《說文·手部》：“探，遠取之也。”《正續一切經音義》卷五十五《太子本起瑞應經》卷上“即探”條：“他含反，爾雅：探，取也。注云：謂探取也。說文：探，取也。亦試也，嘗試之也。”《爾雅·釋言》：“探，試也。”簡文“尋”“禪”讀作“探”，應訓為“試”。“尋（探）車”“禪（探）車”“尋（探）衣裳”“禪（探）新衣”即“試車”“試衣裳”“試新衣”之意。又尋字典籍或訓“用”，見於《左傳》莊公廿八年、僖公五年、昭公元年注和《小爾雅·廣詁》等。尋訓為“用”，按之秦簡亦可通。

9. 擗黑

“日書甲種”簡 259 有一句說：

“庚亡，盜丈夫，其室在西方，其北壁臣，其人擗黑。”

此句《秦簡》一書未加注釋。按“臣”應讀作“堅”。《白虎通·三綱六紀》：“臣者，纏也，堅也，屬志自堅固也。”《廣韻》上平聲十七真韻：“臣，伏也，男子賤稱，春秋說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孝經說曰，臣者堅也。”取字從臣聲，《說文·取部》：“取，堅也，又從臣聲。”“擗黑”之“擗”應讀作“黷”。《說文·黑部》：“黷，握持垢也。”《文選》卷五《左太沖吳都賦》：“碣岸為之木枯，林木為

之潤黷，”注曰：“黷，黑茂貌。”《漢書·枚乘傳》：“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媒黷貴幸。”顏師古注：“黷，垢濁也，音漬。”秦簡“攢黑”即“黷黑”，乃形容行盜者面色污黑也。

10. 寺

“日書甲種”簡65背壹——66背壹說：

“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歸之者，以莎芾、牡棘枋（柄），熱（燕）以寺（待）之，則不來矣。”

《秦簡》一書在“寺”字後注以“待”字，注釋謂：“燕，燃燒。待，《國語·魯語下》注：‘猶御也。’”按將“寺”讀爲“待”似不妥。“熱以寺之”的“熱”與“寺”是一對有因果聯繫的持續行動，在此應是指某種非常具體的動作，而不會是《國語·魯語下》訓爲“猶御也”的“待”。簡文前言“以莎芾、牡棘枋（柄）”，是說用“莎芾”和“牡棘柄”製成“炬”，則“寺”似應讀作“持”。簡文之意是說手持點燃的用莎芾和牡棘柄製成的火把，則鬼就不來了。

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往亡”與“歸忌”

劉樂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一)

往亡、歸忌是中國古代擇日術中兩個重要的擇日項目，在明清時代的選擇通書中極為常見，《協紀辨方書》卷六有詳細介紹和論述。除選擇書籍以外，別的文獻也屢有提及，例如：

途上之暴屍，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論衡·辨祟篇》)

有陳伯子者，出辟(避)往亡，入辟(避)歸忌。(《禮記·王制》正義引《後漢書·郭躬傳》)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漢書·郭躬傳》)

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陋，驗少妄多。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顏氏家訓·雜藝篇》)

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資治通鑑》晉義熙六年)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資治通鑑》唐元和十二年)

由上引諸書不難看出，往亡、歸忌確是古時出行歸家之兩大忌日，此兩忌日至遲在漢代已相當流行。

一九七五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爲研究往亡與歸忌提供了新的資料。饒宗頤先生早在撰寫《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時已提到《日書》中有往亡與歸忌，是《日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發現^①。但是饒

文未做具體論證，故其說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就沒有採用饒說，而祇在甲種一三一號簡正面“歸行”標題處加了這樣一個注釋：“《後漢書·郭陳列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還觸歸忌，必宿鄉亭。’注引《陰陽書曆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與本條所述類似。”^②按：精裝本的“歸行”標題下共有一三一正、一三二正、一三三正等三支簡文，都是關於出行及歸家的禁忌之日。所述雖然與《後漢書》之“歸忌”類似，但具體所指並非“歸忌”。所以，嚴格地說，上引整理小組之說是不對的。筆者於1992年完成的學位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雖指出了整理小組在這個問題上的疏誤，但因受後世選擇書如《協紀辨方書》之類所載“往亡”的影響，未敢遽然採用《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關於“往亡”的說法^③。最近，有機會讀到饒宗頤、曾憲通二位先生合著的《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知道饒先生又在《雲夢秦簡日書賸義》一文中對此作過闡發和論證^④。饒先生在文中明確指出，《月書》1044、1045的“亡日”，1046、1047的“亡者”，以及789、788反所載就是古書中常常提到的“往亡”，並引《驚頭通書》之“往亡歌”為證。筆者認為饒先生的意見非常正確，可以視為定論。但是，饒文的論述十分簡略，似有進一步論證的必要；此外，還有一些饒文沒有提到的相關問題也很重要，值得申論。所以筆者不揣冒昧草成此文，一則為饒文補充證據，二則補訂舊作之缺限。

(二)

“歸忌”的問題比較簡單，不妨先說。《日書》甲種一〇一、一〇二簡背面：

正月乙丑、二月丙寅、三月甲子、四月乙丑、五月丙寅、六月甲子、七月乙丑、八月丙寅、九月甲子、十月乙丑、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甲子，以行，從遠行歸。是謂出亡歸死之日也。（按：

原簡“以行”之前衍一“以”字)

簡文月份與地支的搭配爲：正、四、七、十月丑，二、五、八、十一月寅，三、六、九、十二月子。正、四、七、十月分別是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之月，即所謂四孟。依此類推，則簡文可以這樣表示：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顯然與本文第(一)部份所引《後漢書》注對“歸忌”的描述完全一致，說明《日書》中確有“歸忌”。

《居延新簡》“破城子探方六五”第22號簡云：

歸死：丑、寅、子，丑、寅、子，丑、寅、子，丑、寅、子，

□(按：第一個寅字前有一“癸”字，似不能與本簡連讀，待考)

顯然與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相合，也應是“歸忌”。

簡文稱爲“歸死”，疑是《日書》“出亡歸死之日”的省略。

關於“歸忌”，直到《協紀辨方書》還有詳細記載。由於古今說法一致，這裏沒有必要再作討論。需要詳細論述的是“往亡”。

先將《日書》與“往亡”有關的簡文排在一起：

A. 正月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廿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廿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廿七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廿日、十二月卅日，是日在行不可以歸，在室不可以行，是是大凶。(甲種一〇七背、一〇八背)

B. 入正月七日，入二月四日，入三月廿一日，入四月八日，入五月十九日，入六月廿四日，入七月九日，入八月九日，入九月廿七日，入十月十日，入十一月廿日，入十二月卅日，凡此日以歸，死；行，亡。(甲種一三三正)

C. 亡日：正月七日、二月旬、三月旬一日、四月八日、五月旬六日、六月二旬、七月九日、八月旬八日、九月二旬七日、十月旬、十一月旬、十二月二旬，凡以此往亡必得，不得必死。(乙種一四九、一五〇)

D. 亡者：正月七日、二月旬四日、三月二日、四月八日、五月旬六日、六月二旬四日、七月九日、八月旬八日、九月二旬

七日、四二旬，凡是往亡〔必得〕，不得必死。（乙種一五一、一五二）

四段簡文的日期大體相同，但也有差異，現列表比較如下：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A	七	十四	廿一	八	十六	廿四	九	十八	廿七	十	廿	卅
B	七	四	廿一	八	十九	廿四	九	九	廿七	十	廿	卅
C	七	十	十一	八	十六	廿	九	十八	廿七	十	十	廿
D	七	十四	二	八	十六	廿四	九	十八	廿七			廿

其中，B“五月十九日”是“五月十六日”的誤釋，應據照片改正。其它不同之處，當是竹簡在傳抄過程中出現的筆誤。簡文月與日的搭配是有規律可循的，例如A可歸納為：

正月七	四月八	七月九	十月十
二月二七	五月二八	八月二九	十一月二十
三月三七	六月三八	九月三九	十二月三十

排列如此整齊，說明A抄寫得最為準確。B、C、D有錯謬和殘缺，當以A為準一一加以糾正。

饒宗頤先生據文獻記載推定A、C、D、是“往亡”，其論述過程如下：

考熊宗立《鰲頭通書》卷七載有《往亡歌》云：立春後七日，驚蟄十四真。清明一十二，白露十八明。寒露二十七，立冬十朝靈。大雪二十位，大寒二十沈。在歷史上著名的史事有一些涉及往亡的，如：

劉裕攻（南燕主趙）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晉義熙六年二月丁亥）

李愬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唐元和十二年九月甲寅）

上列兩事見於《通鑑》。胡三省注云：“曆書以驚蟄後十四日為往亡日。”（中華本《通鑑》頁3626）又云：“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為往亡（按：此後還有“九月以寒露後二十七

日爲往亡”一句與《日書》及《往亡歌》相符。不知何故，饒文沒有引用）。（標點本《通鑑》頁7739）和《往亡歌》相符。《往亡歌》祇有八個月有忌日，少了四個月，而且是以某個節氣之後若干日來計算。秦簡是以每月的第幾日來定，而不管節氣。有些數字完全相同：如正月之七日，同於立春後之七日；二月之十四日，同於驚蟄之十四；八月的旬又八日（即十八日），同於白露之十八；九月的二旬七日（即二十七日），同於寒露之二十七；十月的旬，同於立冬之十朔；十一月的廿日（789反），同於大雪之二十位；十二月的二旬（1045），同於大寒之二十沈。可見後代《通書·往亡歌》的數字，是遠有所承的。如果不是出土的資料，決無人肯相信往亡的忌日，早在秦代以前已經由日者加以推定的。

按：《往亡歌》對“往亡”的記載不全且有錯謬，有必要予以補訂。此外，饒文以簡文“亡日”下的十二月二旬與大寒二十沈相對應，也不準確（上文已經指出，簡文當以A為準）。下面不妨先引一條內容完整的資料：

歷例曰：氣往亡者，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皆自交節日數之。（《協紀辨方書》卷六“氣往亡”條）

十二個數字齊全，且皆與《日書》之A段簡文相合，說明它是《日書》“往亡”的晚期形式。不過，其名稱“氣往亡”與“往亡”畢竟有別。要肯定二者爲一事，還須新的證據。最近，筆者涉獵過一些日本陰陽道的文獻，發現其中幾種與中國的選擇通書相似，可以視爲日本的通書。這些通書顯然是由中國流傳過去的，內中保存了一些珍貴的資料，對研究中國早期擇日術頗有參考價值。例如，其對“往亡”的記載就很重要，現抄錄如下：

往亡日：

自正月節日第（第）七日，自二月節日第（第）十四日，自

三月節日弟（第）廿一日，自四月節日弟（第）八日，自五月節日弟（第）十六日，自六月節日弟（第）廿四日，自七月節日弟（第）九日，自八月節日弟（第）十八日，自九月節日弟（第）廿七日，自十月節日弟（第）十日，自十一月節日弟（第）廿日，自十二月節日弟（第）卅日，皆往亡日也。但有沒日者加一日為往亡。^⑤

所載與上引《協紀辨方書》“氣往亡”一致，而名稱則為“往亡”，證明《協紀辨方書》之“氣往亡”其實應該叫“往亡”。其十二個日子明載於十二月之下，形式上與《日書》更為接近。不過，它也是以節氣之後若干日來定往亡日，與《日書》以每月幾日定往亡日已有明顯區別。與《日書》定日原則相同的往亡日，見於《虎鈴經》卷十一的“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一說云天門日亦謂之往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可也。^⑥

除十月、十一月外，其餘十個月與《日書》完全一致，說明上文的論述是可以成立的。十月與十一月的數字當是傳抄過程中出現的錯誤，與《日書》中的抄錯是同一現象。

以上的論述表明，秦代以前的確已有神煞“往亡”與“歸忌”，其運行日期和行事宜忌都和後世數術書所載一致。這說明中國古代擇日之術源遠流長。

（三）

選擇書中還有一個與上述往亡日大不相同的“往亡”，如《協紀辨方書》卷六（亦見於《星歷考原》）之“往亡”條云：

《堪輿經》曰：往者去也，亡者無也。其日忌拜官、上任、遠行、歸家、出軍征討、嫁娶、尋醫。歷例曰：往亡者，正月在

寅，二月在巳，三月在申，四月在亥，五月在卯，六月在午，七月在酉，八月在子，九月在辰，十月在未，十一月在戌，十二月在丑。

此“往亡”以地支為依據，與上文以序數為據推出的往亡沒有什麼共同之處。這種月與地支的搭配在《日書》中也曾出現，例如在“土忌”標題下有：

正月寅、二月巳、三月申、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當其地不可起土功（甲種—三一背）

鄭剛認為它就是上引《星曆考原》、《協紀辨方書》的往亡^①。在拙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中，我提出了這樣一種說法：“往亡（指《協紀辨方書》等所載的‘往亡’）的運行規律確與本簡相合，但本簡是關於興功動土的，宜從與動土有關的凶煞方面考慮。《永樂大典》二〇一二一卷《諸家選日七》所載《陰陽寶鑒剋擇通書·逐月凶日》表中，有一神煞叫‘土忌’，其日期為正月寅、二月巳、三月申、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其月與地支的搭配和《日書》完全一致。由此可知，本簡所述的凶煞應叫土忌。”現在看來，這樣說還不够全面。這裏可以說得更明白一些，即上引《日書》—三一背及《協紀辨方書》的“往亡”，都應是“土忌”。日本陰陽道文獻中有一條記載似與此有關：

地激日：正月寅、二月巳、三月申、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此日不可穿井，至膝，子死；至頤，妻死；身沒，身死。^②

地激當與土忌相類，都與動土有關。

總之，正月寅、二月巳之類應叫土忌或地激，是興功動土的忌日。每月幾日或某節氣之後某日之類該叫往亡，是出門與歸家的忌日。這本是兩個不相干的凶日。後世術士不知它們的來歷，有時分辨不清，甚至張冠李戴（按：《云笈七籤》卷三十六《攝生月令》的“往亡”為正月寅、二月巳、三月申、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

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知此二凶日在唐宋時已開始混淆）。例如，一些選擇通書不知有“土忌”，遂將之命名為“往亡”，同時又將原來叫“往亡”的凶日另取名叫“氣往亡”。於是，擇日系統中同時有了“氣往亡”、“往亡”這樣兩個詞義相近的凶日。這種共存現象多少有些讓人疑惑，有人便加以調和，試圖證明二者有淵源關係。曹震圭說：

氣往亡者，以四立月往亡日三合化象之成數為之。假令正月立春寅為往亡，寅午戌合火局，火之成數七也。四月立夏卯為往亡，亥卯未合木局，木之成數八也。七月立秋酉為往亡，巳酉丑合金局，金之成數九也。十月立冬未為往亡，土無化象，便以本行土為之，其成數十也。各倍之為次月往亡日，三之為下月往亡日也。獨水數不用者，蓋四立之月往亡無申子辰日也。然一歲之內四季之月以辰為首，辰月以申為往亡。申合水局，水之成數六也。故三月中氣後六日、九月中氣後十二日、六月土旺後十二日、十二月土旺後十八日各得往亡。或節氣早晚間有差一日者，然其理大概如此。（《協紀辨方書》卷六“氣往亡”條）

依曹氏之說，則“氣往亡”是由“往亡”推出來的。此說若能成立，倒是能解釋清楚“氣往亡”與“往亡”並存的原因。但是，曹氏解釋各月數字的標準不一，立說極為牽強。《協紀辨方書》編者批評說：

按：氣往亡日，曹震圭之說亦有巧合。但專取孟長則四方與三合彼此互異，且既取三合之氣，又不以未為木而以為土，未免自相抵牾。

今以出土資料及某些傳世文獻驗之，曹氏等說的“往亡”實為“土忌”或“地激”之誤，而“氣往亡”纔是真正的“往亡”。二者一為興功動土忌日，一為出行歸家忌日，可以說是不相干的。曹氏不知此誤，強以“往亡”（實為“土忌”）解“氣往亡”（實為“往亡”），其說之牽強附會也就難免了。其實，往亡日是以五行成數為依據安排每月數字的，與三合局無關：春三月（木）與七及七的倍數（火）相

配，夏三月（火）與八及八倍數（木）相配，秋三月（金）與九及九的倍數（金）相配，冬三月（水）與十及十的倍數（土）相配。很顯然，往亡日是日者根據五行配數之說推定的。

注 釋

- ① 《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歸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 ② 《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部份第201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本文所引《日書》釋文及竹簡編號皆以此書為準。
- ③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第158頁、第280頁，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
- ④ 《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
- ⑤ 村山修一《陰陽道基礎史料集成》第94頁、第143頁，東京美術出版社昭和62年版。
- ⑥ 本文所引《虎鈴經》係《粵雅堂叢書》本。
- ⑦ 鄭剛《睡虎地秦簡日書疏證·導論》，中山大學1989年碩士學位論文。
- ⑧ 同⑤所引書第323頁。

《日書》起源考 ——兼論春秋戰國時期的曆法問題

胡文輝（羊城晚報社）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書》甲、乙種，可以大致視為是《日書》的兩種不同傳本。甲種的開頭有《除》、《秦除》、《稷長》三篇，乙種的開頭則有《口》、《除》、《秦》三篇，其中甲種的《除》與乙種的《口》、甲種的《秦除》與乙種的《除》、甲種的《稷長》與乙種的《秦》分別按照順序相互對應，其內容都大同小異^①。同時，這三者的性質又是相同的，都是以不同的神煞與各個月十二支相配，以占斷當日行事的宜忌吉凶，實際上都是屬於所謂“建除”；也就是說，這三者是三套不同系統的建除^②。《日書》甲、乙種分別有相互對應的三套建除，表明甲、乙種確實具有一個相對共同的祖本，而這三套建除在這個共同的祖本中就已存在了。這三套建除的名稱及其與各個月十二支的相配情況都頗有不同，為了便於比較，下面將睡虎地《日書》這三套建除及其與第一月十二支相配的情況列成表格，為了下文方便論述，將甲種的《除》與乙種的《口》這一套建除稱為建除A，將甲種的《秦除》與乙種的《除》這第二套建除稱為建除B，將甲種的《稷長》與乙種的《秦》這第三套建除稱為建除C；其中建除A實際包括兩套建除之名，分別稱為建除A（一）、建除A（二）。表中所列的建除之名以乙種為準，括號內的為甲種的異文。表格還包括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簡《日書》甲、乙種所載的建除^③，以及見於《淮南子·天文訓》而為後世通用的建除：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睡虎地《日書》	建除C	正月、二月	采(秀)	正陽	危陽	敦	夢(萬)	陰	微	陰	夢(萬)	危陽	正陽	結		
	建除A(一)	十一月	結	陽	交	羅(害)	陰	連	外陽	外運(害)	外陰	絕紀	決(光)	秀		
	建除A(二)	十一月	索(瀦)	贏	建	宮(陰)	作(披)	平	成(寧)	空	姪(坐)	蓋(蓋)	成	復(甬)		
	建除B(乙種)	正月			建	余	吉	實	宮	微	衝	剋	虛	吉	實	閉
	建除B(甲種)	正月			建	除	盈	平	定	執	被	危	成	收	開	閉
放馬灘《日書》(甲乙種)		正月			建	除	盈	平	定	執	彼	危	成	收	開	閉
《淮南子·天文訓》		正月			建	除	滿	平	定	執	破	危	成	收	開	閉

比較上表，可以發現睡虎地《日書》的三套建除可以分為兩個系統：建除A和建除B是一個系統，建除C是另一個系統。二者的不同之處是：

一、前者的建除之名與各月的配合是一個月變動一次，而後者則是兩個月變動一次（如正月、二月兩個月的十二支與建除之名的配合情況相同）

二、前者的建除之名都有十二個，各與十二支一對一地相配，而後者的建除之名祇有八個，其中有四個建除之名（正陽、危陽、夢、陰）分別與兩個地支相配。

三、前者中的建除A以十一月子日為起始，建除B以正月寅日為起始，表面上雖然不同，但實際上所反映的建除之名與十二個月的配合關係是完全相同的，祇是起始的月份不同（如建除A雖然以十一月為起始，但它的正月也與建除B一樣是以寅日為起始的）。而後者則是以正月、二月的子日為起始，與前者截然不同。

由三套建除名稱的異同可以發現，建除B（以甲種為準）與建除C的差異最大，幾乎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而建除A的兩套名稱則分別與

建除B和建除C存在着淵源關係。建除A(一)與建除C明顯有對應關係：④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建除A(一)	結	陽	交	羅	陰	達	外陽	外宮	外陰	絕紀	決光	秀
建除C	結	正陽 危陽	敦	變	陰	微						柔(秀)

而建除A(二)又與建除B(甲種)明顯對應⑤，尤其是二者的建、平、成三種建除之名及其與十二支的配合關係都完全一致：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建除A(二)	憲	贏	建	宮	作	平	成	空	毘	盍	成	復		
建除B(甲種)			建	除	盈	平	定	摯	披	危	成	收	開	閉

可見建除A(一)、(二)在源流關係上處於建除C與建除B(甲種)之間。考慮到建除C的名稱罕見於後世⑥，而建除B(甲種)卻與後世通行的建除基本相同(祇有“盈”字後來因避漢惠帝劉盈之諱而改為“滿”)，因此我覺得這三套建除應以建除C最為古老，而以建除B(甲種)最為晚出，而建除A則可能在二者之間。

另外，三套建除與各個月的十二支相配的情況有着微妙的差別：建除C和建除B都是以子日為起始，但前者是始於正月子日，後者是始於十一月子日；建除C和建除A都始於正月，但前者是始於正月的子日，後者是始於正月的寅日。我認為，三套建除實際上是分別依據三種不同的曆法(曆正)形式製定的，由此可以對當時的曆法使用情況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建除C以正月子日為起始(建除C的二月也是以子日為起始的)，它所據的曆法應當是以建子之月(冬至所在之月，相當於夏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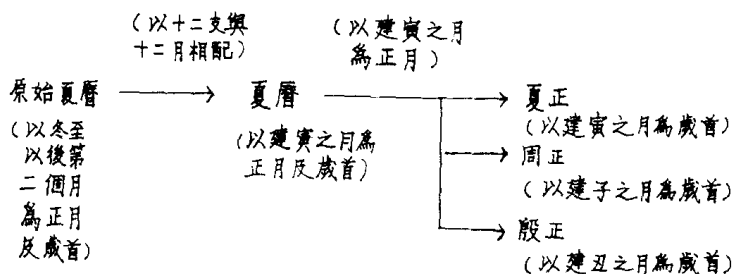
一月)爲正月(歲首)。這種曆法我以為纔是真正的“周正”，它不同於後來那種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的“周正”(即屬於所謂“三正”的那種“周正”)爲了相互區別，姑且稱之爲“周曆”^①。周曆大約通用於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②；《春秋》中所載的“春王正月”在宣公以後表示冬至所在之月(但當時可能還沒有採用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的曆法形式)，正相當於建除己的“正月”(建子之月)。不過準確地說，這種曆法在早期(戰國時期以前?)大約還沒有採用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的形式，祇能稱爲“原始周曆”，與後來採用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形式的周曆不能等同。

二、建除己以正月寅日爲起始，它所依據的曆法應當就是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及歲首的，即所謂“夏正”。建除A以十一月子日爲起始，它所依據的曆法應當是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而以建子之月爲歲首的，即所謂“周正”(這其實不是真正的“周正”)。這個周正與夏正、殷正(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以建丑之月爲歲首)合稱“三正”(周正、夏正是實際使用過的曆正，但殷正可能並沒有實際使用過)，古人相信“三正”是夏、商、周三代分別通用的三種曆法(曆正)，這當然祇是後來的附會。我以為所謂“三正”其實本是三位一體，祇是同一種曆法(都是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祇不過各以不同的月份爲歲首(正朔)而已——後來秦以建亥之月(夏正十月)爲歲首，也正與周正以建子之月(夏正十一月)爲歲首、殷正以建丑之月(夏正十二月)爲歲首的原理相同，它們所依據的都是同一種曆法。本來，一種曆法的正月就等於是歲首(正朔)，正月與歲首本是一回事，而“三正”說則將二者別爲兩回事；這樣，同一種曆法就分化成幾種歲首不同的變體(其中夏正實際上保持了這種曆法的“原型”)。這種以建寅之月(冬至以後第二個月)爲正月的曆法，姑且稱之爲“夏曆”。

我覺得，周曆是早期(春秋中期至戰國中期)通行的曆法，而夏曆是較晚時期(戰國中期以後?)通行的曆法。這有一個被忽視的簡單理由：十二支是以子爲排列的，如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很自然應當以排行第一的子與正月相配，而沒有理由以排行第三的寅與正

月相配。因此，在開始出現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這種曆法形式的時期，其曆法應當是以建子之月為正月的——這就是建除C所反映的周曆，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的曆法則應當是後來纔出現的，是借用前者的形式改造而成的（將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改為以建寅之月為正月）——這就是建除A和建除B所反映的夏曆。晚出的夏曆後來居上，逐漸取代了早期的周曆。

不過，這個夏曆並非無源之水，它有着很古老的來源。準確地說，採用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這種形式的夏曆（正月建寅）是較晚時期纔出現的，但不採用以十二支與十二月相配這種形式的夏曆（以冬至以後第二個月為正月）卻很早就已存在了，為了與前者不相混淆，姑且將後者稱為“原始夏曆”。傳世的文獻《夏小正》和《詩經·豳風七月》正是記載了這種原始夏曆。這種曆法是一種物候曆（《夏小正》的內容全是關於物候與星象的），大致以冬至以後第二個月為正月（歲首）¹⁰。這種原始夏曆可能在春秋時代就已存在¹¹，當時官方使用的周曆（官方的史書《春秋》就是使用周曆的），而原始夏曆則大約一直通行於民間，兩種曆法並行於世。後來（戰國中期？）可能因為周天子權威的衰落，各地諸侯國逐漸不再遵守原來正統的周曆，而改用通行於民間的原始夏曆。最終原始夏曆與周曆互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夏曆——夏曆在歲首（冬至以後第二個月）和季候方面繼承了原始夏曆的特徵，但在曆法形式上（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則是借用了周曆的特徵，所以夏曆實際上是借用周曆的形式改造了原始夏曆。原始夏曆與夏曆及“三正”的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綜上所述，大約戰國中期以前使用的是周曆，大約戰國中期以後使用的是夏曆（包括夏正、周正）。所以，依據周曆的建除C就應當是早期使用的建除，而依據夏曆的建除A和建除B則是晚期使用的建除。周和夏正大致是夏曆不同的地域變體²²，因此依據周正的建除A和依據夏正的建除B大約就是在戰國後期不同地區所使用的建除²³。其中建除A可能比建除B稍早一些，因為由上文可知，建除A還保留了早期使用過的建除C的不少名稱；而建除B（建除B（二））的名稱已與後來定型的建除基本一致，所以應當是較晚時期出現的。

因此，睡虎地《日書》甲、乙種所見的三套建除，其實是《日書》在形成過程中的不同時期（及地域）所使用過的建除——《日書》在早期使用建除C（採用周曆），在後期使用建除A（採用周正）和建除B（採用夏正），其中建除B（二）則應當是《日書》最後使用、也是後世一直沿用的一套建除。《日書》在每次改用新的建除時，仍將舊的建除保留在文本中，因此就形成了《日書》疊牀架屋地有三套建除的現象。由此可以知道，《日書》的形成經過了相當長的時期，它起源於使用周曆的時代（戰國早期至中期？），而經歷了使用夏曆（周正、夏正）的時代（及地域），最終基本形成於使用夏正的時代（及地域）——因為現存的睡虎地《日書》甲、乙種都明顯是使用夏正的（甲種），有一部份是使用楚曆的，是以冬至前一個月為正月及歲首，即相當於夏正十月。這個相對定型的《日書》可以稱為夏正《日書》，大約形成於戰國中期至後期，現存的睡虎地《日書》甲、乙種大致就是以這個夏正《日書》作為共同的祖本的²⁴。需要說明的是，說睡虎地《日書》甲、乙種具有一個共同的祖本祇是一種簡單化的說法，祇是表示甲、乙種相對地具有一個共同的來源。而實際上《日書》的形成和傳承肯定是非常複雜的，《日書》作為擇日之書，是流傳於民間的日常用書，這一特性決定了《日書》在流傳的過程中會不斷地發生變易；可以說，《日書》從來祇是一個動態的文本，而從來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文本，即從來也沒有一部統一的《日書》文本。

注釋

① 見李學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載《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收入《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劉樂賢認為這三者之間有淵源關係（《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P60，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鄭剛則直接將這三者稱為“三套建除”（《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結構特徵》，載《中山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

③ 放馬灘《日書》甲、乙種都分別祇有一套建除，兩者內容完全相同（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載《文物》1989第2期。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釋文》，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見鄭剛《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結構特徵》、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P60。

⑤ 見鄭剛《論睡虎地秦簡日書的結構特徵》、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P30。

⑥ 劉樂賢指出其中的正陽和曼在後世的通書中有零星的殘存（《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P59）。

⑦ 關於周曆的具體材料可參考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一“春秋時令表”。

⑧ 參見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P72—73；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1419—1420。

⑨ 戰國後期秦是使用顓頊曆的，屬於上文所說的夏曆（參見張培瑜《新出土秦漢簡牘中關於太初前曆法的研究》，載《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P81；但陳久金、陳美東的《從元光曆譜反馬王堆帛書天文資料試探顓頊曆問題》一文認為顓頊曆測製於秦始皇元年，見《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P93）。而1979年至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戰國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牘表明在此之前的秦武王時期（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300年）是使用周曆的（見李學勤《青川郝家坪木牘研究》，載《文物》1982年第10期，收入《李學勤集》）。木牘有“二年（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己酉”之文，根據張培瑜近年新出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版，P48），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周曆正為十一月己酉朔，與木牘的記載吻合，而顓頊曆則是九月己酉朔。由此表明秦在戰國中期由使用周曆改為使用夏曆。

⑩ 《詩經·豳風·七月》的曆法問題眾說紛紜，有夏殷周三曆混用、夏周二曆混用、周曆、夏曆、殷曆、豳曆等種種說法（見曹馥基主編《先

秦文學集疑》，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P281—284）。其實這個問題並不複雜，將《七月》與《夏小正》相印證，就可發現《七月》所使用的曆法是與《夏小正》一致的。

	《夏小正》	《七月》
二月	采蓂	春日遲遲，采蓂祁之。
	有鳴倉庚。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三月	攝桑。委楊	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運揚，猗彼女桑。
四月	秀幽。	四月秀蓂（幽、蓂聲母相同，韻母分屬幽、宵，亦相近）。
五月	鳩則鳴。	七月鳴（此條與《夏小正》相差兩個月）。
	良蜩鳴。 唐蜩鳴。	五月鳴蜩。
七月	秀蓂葦。	八月蓂葦。
八月	剝瓜。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玄校（校，青黃色）	八月載織，載玄載黃。
	剝蓂。	八月剝蓂。
九月	王始裘。	九月授衣。

另外，將《夏小正》與後來的《淮南子·時則訓》、《禮記·月令》（即《呂氏春秋·十二紀》的紀首）相比較，可以發現後者沿用了前者物候方面的內容。後者是採用夏正（正月建寅）的，而前者的歲首與後者相同，但還沒有採用以十二支與十二個月相配的形式，因此不能將前者直接等同於後者（一般都將二者等同，如顧頡剛說《夏小正》和《月令》都是用寅正的，見《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華書局1988年版，P237；金德建列表比較了《夏小正》與《月令》的物候記載，他也認為二者都是採用夏正，見《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P192—197）。

④記載這種原始夏曆的《七月》和《夏小正》成書都相當早。《七月》的著作年代還難以確定，主要有作於西周和作於春秋兩種看法（趙沛霖《詩經研究的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P109—110）；《夏小正》雖是漢代以後纔編入《大戴禮記》，但其文字古樸簡約，其物候記載又與《七月》如出一轍，而且它沒有《月令》那種陰陽五行的痕跡，也沒有“三正”說的痕跡，應當是很古老的書（顧頡剛、夏緯瑛、辛樹幟都認為《夏小正》成書較早，見辛樹幟《中國果樹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83年版，P13-15）。

⑤錢寶琮認為三種不同歲首的曆法（三正）“是春秋戰國時期不同地域的曆日制度”（《從春秋到明末的曆法沿革》，載《歷史研究》1960年第3期）。

⑤《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注釋認為建除B可能起源於秦,建除C為秦人之說(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P183、P234);李學勤也認為建除B和建除C是秦人的建除,而建除A則是楚人的建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劉樂賢也持同樣的觀點(《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P35)。他們的根據主要是建除B在《日書》中命名為《秦除》(甲種),建除C在《日書》中命名為《秦》(乙種)。但這似乎祇能證明建除B和建除C流行於秦地,而並不足以證明它們一定就起源於秦,也不能證明它們不能流行於其他地區。

⑥“《日書》研讀班”根據《日書》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其實是附有楚曆與夏曆月名對照的《日夕表》)推測《日書》成書當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佔領楚都郢之後不久(《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載《文博》1986年第5期)。劉樂賢認為兩種《日書》傳本的抄寫年代約在秦昭王晚年(公元前250年)至秦王政即位(公元前246年)之間或稍前;而《日書》內容的形成年代則比抄本年代更早,應當在秦佔領楚都郢(公元前278年)之後;其中乙種內容的形成年代可能更早一些(《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P406—408)。所以,睡虎地《日書》甲、乙種形成於戰國末年,則二者共同的祖本的年代應當更早。

論天水秦簡中之“中鳴”、“後鳴” 與古代以音律配合時刻制度

饒宗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一）秦簡日書之時刻表

殷人記每日之時刻，見於甲骨文者，昏、旦、食日、中日、昃等俱備。雲夢秦簡日書則十二時均見之。天水秦簡日書在“生子”與“八月吉凶”則記載自平旦至鷄鳴之十六時刻。其見十六時制不始於漢，而形成更在其前。放馬灘日書之中“律書”部份有云：

宮一，徵三、羽五、商七、角九。（乙72）

甲九木 子九水 日出□□水。朝食□□□，林鐘生大簇，大呂七十六 □山（乙76）

乙九（八）木 丑八金 朝食七羽（羽）火 入暮，中鳴六。大簇生南呂，大簇七十二 參阿（乙77）

丙七火 寅七火 暮食，六角火 夜半後鳴、五 南呂生姑洗夾鐘六十八 參阿（乙78）

丁六火 卯六水 東中五□土 日出日失（昃）八 姑洗生應鐘，姑洗六十四 陽谷（乙79）

是簡《文物》刊出何雙全所摘錄者，祇有甲乙丙丁四條，雖資料不完全，但可看出秦時日書中納音的辦法，事實比我們向來所認識與想像加倍複雜。它把甲乙日辰配上①五行②一日中十六時刻③五音④十二律相生及其律數⑤區域、方隅等等。就中最有趣是出現中鳴和後鳴兩

個名目。

中鳴的時段是 入暮，數是六

後鳴的時段是 夜半，數是五

既有中鳴與後鳴，可見應該有元鳴，元鳴即指鷄初鳴時候。下面試把十六時列出（此為天水秦簡所見之次序，據何雙全文記述）：

1 平旦	9 日入	
2 〔晨〕	10 昏	
3 日出	11 暮食	中鳴
4 夙食	12 夜暮	
5 日中	13 夜未中	
6 日西中	14 夜中	後鳴
7 西日下	15 夜過中	
8 日未入	16 鷄鳴	（元鳴）

（二）中鳴、中輶與元鳴

丹徒新出徐國鐘有云：

中鳴媿（是）好。我台（以）樂我心

一句，諸家無說，王孫遺者鐘云

中輶且禱，元鳴孔皇

沈兒鐘云：


中輶戲（且）禱，元鳴孔皇

許子鐘亦見此一習語，輶當讀為輶，即謂輶音，故其字從音，《易·中孚》卦上九爻辭：“輶音登於天，貞凶。”馬王堆本字作“輶音”，中輶即中輶。

《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鷄曰輶音”，輶音原指鷄鳴之聲。左襄二年傳荀偃令曰：“鷄鳴而駕”。風俗通義·祀典篇云：“魯郊以丹鷄，祝曰以斯輶音，赤羽，去魯侯之咎。”鄭玄注周禮鷄人云：“夜漏未盡鷄鳴時

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鷄人的責任是“報曉籌”，在大祭祀時候夜間呼旦，以叫醒百官。賈疏謂：“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爲夜，則呼旦也。”鷄能司晨爲“知時之畜”（說文云：“鷄，知時畜也。”）鄭注鷄人云“象鷄知時也。”鷄人即是在鷄鳴時候爲百官報告時刻，有如知時之鷄，故稱爲鷄人。

周官有挈壺氏，刻數以分晝夜，即後代銅壺滴漏的開端。尚書孔氏正義引馬融說：“古制，漏刻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此類古漏刻，昉自何時，尚待物證。惟考卜辭壺字凡五見。有二條云：

……貞、旬…王…壺（《南地》1176）

貞、勿于壺，力（協）（《英》751）

此處壺字如解爲漏壺，亦有可能。每日之時刻，淮南子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論衡說日篇稱十六道，說者謂此即是漏刻。（見錢塘《淮南子天文訓注》）

（三）鷄三鳴與刻漏制度

鷄三鳴又稱爲“三號”，見於大戴禮記。

四代篇云：“詩云：東有開（啓）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

誥志篇：“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分，於時鷄三號，卒明。”

史記索隱：“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鷄三鳴則天曉，乃始爲正月一日，言異歲也。”按三鳴自即指元鳴、中鳴、後鳴。

尚書牧誓責商王紂：“惟婦言是用，”復引古語云：“牝鷄無晨，牝鷄司晨，惟家之索。”則正常時刻，當以雄鷄司晨，卜辭所記殷時每日時刻，分旦、食日、中日、暮、昏等，必以鷄鳴來定時刻。

文選陸倕刻漏銘云：“夫自古觀象，昏旦之刻未分。”又云：“屬傳

漏之音，聽鷄鳴之響。”李善注引《五經要義》云：

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以前，漏三刻爲明。

殷卜辭既有涿壺之文，似是觀察漏刻之記載，後人取時刻以入樂，借鷄鳴以配音律，因有元鳴中鳴之語，中鳴復稱曰“中翰”，則以翰音爲鷄鳴故也。元鳴之詞，沈兒鐘、王孫遺者鐘均見之。中鳴則見於徐國鐘銘，幸中鳴、後鳴二名同於天水秦簡出見，得以推知其初義。以時刻配樂，蓋亦先秦納音術之一例。放馬灘日書云：“天降令（命）乃出大正，間呂六律，臯陶所出，以五音十二聲爲其貞卜。”託始於臯陶，秦人已有此說。

帛書《陰陽五行》與秦簡《日書》

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

馬王堆漢墓帛書中，屬數術類的帛書佔有很大的比例。據筆者按照《漢書·藝文志》的圖書分類法所做的帛書分類所知，帛書中至少有六種九篇是屬於數術類的古佚書，其中《陰陽五行》甲、乙篇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篇章。

帛書《陰陽五行》甲、乙篇由於殘損得比較厲害，綴合釋讀都相當費時費勁，加之各種原因的左右，這兩篇帛書至今也沒有一個整理好的本子面世，人們多祇能從有關介紹文章中瞭解其點滴內容。筆者因工作之便，多有機會觀察原物，目驗過這兩篇現存原件的所有殘片，雖然竊讀全篇多有困難和不解之處，但參照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亦偶有所獲，今將這兩種《日書》與帛書互相參校，對帛書《陰陽五行》作些淺略的分析介紹，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斧正。

（一）

帛書《陰陽五行》甲、乙篇最早見於韓中民先生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①一文中，文中僅列有目錄，對於內容沒作任何介紹。後來周世榮先生在《略談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竹簡》②一文中，對《陰陽五行》作了一些簡短的介紹。他說：

《陰陽五行》共兩卷，均用整幅帛書寫，可分為篆體與隸體兩種。篆體《陰陽五行》長3.5米，還有圖、表，可分為二十三個單元，並

互相穿插，占驗主要是干支二十八宿，也有用四方、四季、月令的；占法比較複雜，大部份屬於堪輿方面陽宅部份的，如“門在南方，徙之北方，門在東方，徙之西方”，“後徙故室大兌”等等，除此之外，有一些屬於選日方面的內容。

隸體《陰陽五行》長約1.23米，上有文字、圖表，大致分為十個單元，縱橫穿插比篆體《陰陽五行》猶甚。占驗以干支、月令、五行為主，兼用四季、五音、二十八宿以及玄武、昭搖二星等。占的對象較廣：如出行、嫁娶、選日、攻戰、祭祀、禁忌、舉事等等，類似一般占書。

應該說，這段介紹雖然過於簡短，但它畢竟是第一次對帛書《陰陽五行》作正面的介紹，因而尤其難能可貴。這裏需要略加澄清的是，所謂篆體和隸體的劃分，實際上是不大準確的。現存的帛書《陰陽五行》甲篇儘管在文字形體上保留了較多的篆書結構，但其用筆的走向，其波、挑、磔、撇、捺的隸書味，已顯然不是典型的篆書，而是一種正在演變中的古隸，例如同樣一個三點水的偏旁，就或作“𠂇”或作“彡”，兩者並存於同一篇帛書內，可見徑稱其為“篆體”或“篆書”都是欠準確的。因此，我們特將篆體《陰陽五行》改稱為《陰陽五行》甲篇，將隸體《陰陽五行》改稱為《陰陽五行》乙篇。

《陰陽五行》甲篇的長度，現已很難核量了，現存的帛書原件中，亦很難看出所謂二十三個單元相互穿插的脈絡。相比之下，倒是乙篇相對比較完整，好幾幅圖表都保存得相當完好，成段的文字也比較好釋讀。因此，本文就避難就易，多取乙篇的內容與秦簡《日書》作些比較分析，然後就甲篇的部份內容作些介紹。

秦簡《日書》的準確年代，據睡虎地7號秦墓椁室門楣上的刻款所知，它是秦昭襄王時的東西，屬戰國晚期之物，帛書《陰陽五行》雖出土於漢墓，但其內容所記，足可知其亦為戰國時期楚地之物。《陰陽五行》甲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乙當莫囂，丙當連勢，丁當司馬，戊當左右司馬，己當官口”。

其中“莫囂、連勢”是楚國特有的官名，可見這個抄本肯定是戰

國時楚人的著作，其流行的時間與睡虎地秦墓所出的《日書》當大致相同，或許更早些，故其內容亦多有相同相因之處。

(二)

秦簡《日書》中有“玄戈”一題，詳記秦曆十月至九月一週年間二十八宿所值之吉凶，分列記有招搖所擊之十二支和玄戈所擊之宿。對此，饒宗頤先生曾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述。他指出：

“招搖爲斗星，招搖星數一，《開元占經》引石氏：‘招搖一星梗河北’。又石氏讚‘招搖玄戈主胡兵’。二名已見石氏及甘氏星經。漢人以爲斗樞。北斗七星，其杓端有兩星，即招搖與玄戈。

殷字當讀爲擊，《漢書·藝文志》於兵陰陽云：‘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淮南·天文訓》：‘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衡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所謂斗擊，指北斗對衝之辰。……招搖、玄戈爲北斗杓端內外之兩星，其所擊之（十二）辰及星宿，即所謂‘斗擊’是也⑩。

由是可知，《日書》所列“玄戈”之題，實爲軍戰需要而設，故詳列了秦曆十月開始，至次年九月爲止一週年內每月招搖所擊之辰和玄戈所擊之宿，以便應用和查檢。

與此相同，帛書《陰陽五行》乙篇中也有專門的“玄戈”、“招搖”兩題，但它與秦簡《日書》略有不同的是，它並不是注明“招搖”擊辰，“玄戈”擊宿，而是用表格的形式，將“玄戈”所擊之辰、宿和

“招搖”所擊之辰宿列成一橫排，更便於檢索。其殘存的帛片上，較完整地保存了三月至八月“玄戈”和“招搖”所擊之辰宿，他們是這樣排列的：

☐ ☐	昭搖	七生寅(星)	玄戈	三月
角亥	昭搖	此唯巳	玄戈	四月
危子	昭搖	畢酉	玄戈	五月
虛丑	昭搖	翼丑	玄戈	六月
尾寅	昭搖	角卯	玄戈	七月
心卯	昭搖	危午	玄戈	八月

與秦簡《日書》相比，首先是所記的形式不同，其次是秦簡中“招搖”全作“木”字旁，而帛書中的“招搖”寫作了從日旁的“昭”，而“搖”則仍作木字旁的“搖”，可見這個抄本亦是一種演變中的古隸本，其偏旁部首尚沒最後定型，第三是“玄戈”所擊之宿和“昭搖”所擊之辰與秦簡《日書》略有不同。《日書》中是六月玄戈擊矛（昴），七月玄戈擊營室，而帛書《陰陽五行》則是六月玄戈擊翼，七月玄戈擊角。這說明兩者所記的斗擊之宿是根據不同的分野觀察星宿天象所作的實際記錄，我們說帛書《陰陽五行》是楚人的著述，因此，他們所記的斗擊之宿與秦簡所記有所不同，這是毫不足怪的。又帛書所記的“昭搖”所擊之辰亦與秦簡所記多有不同，例如帛書所記是四月昭搖擊亥，五月昭搖擊子，六月昭搖擊丑，七月昭搖擊寅，八月昭搖擊卯，而秦簡則是四月招搖擊丑，六月招搖擊亥，七月招搖擊戌，八月招搖擊酉。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兩者都是取五月招搖擊子，但秦簡是從五月開始，按五月、四月、三月、二月、正月、十二月、十一月、十月、九月、八月、七月、六月的順序排列十二辰的，而帛書則是從五月開始的，按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的順序來排列十二辰的，由於帛書上、下已殘，尚不知是以何月為建首，但上述不同已足可說明，帛書的十二辰排列肯定不是用的秦曆。最後還有一點不同的是帛書的“玄戈”、“昭搖”所擊同時具有星宿和辰位，這也許意味着帛書所記比秦簡更為完備一些。

(三)

秦簡《日書》中有“禹須臾”一題，該題亦見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中。關於“須臾”之義，饒先生曾指出：

“須臾義如立成。《後漢書·方術傳序》：‘其流有揆蓍、須臾、孤虛之術。’李賢注：‘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④

今根據秦簡《日書》所記，所謂“禹須臾”實為一種擇日出行的選擇規定。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有一段很好的說明：

“禹須臾，行，得擇日出邑門，禹步，三向北斗，質，畫地視之。曰禹有直五橫，今利行，行毋為禹前除，得。”

這無異於告訴我們，“禹須臾”乃是一種擇日出行的選擇。湖北睡虎地秦簡《日書》第八六四簡在“禹須臾”題下云：

“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二喜。

“甲乙、壬癸、丙丁，日中行有五喜。

“庚辛、戊己、壬癸，鋪時行有七喜。

“壬癸、庚辛、甲乙，夕行有九喜。”

又第七九九簡反面在“禹須臾”題下有：

“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庚戌、庚辰，莫（暮）市以行，有九喜”（下略）

帛書《陰陽五行》乙篇雖沒有明確題名“禹須臾”者，但它則用表格的形式記錄了這一種特殊的選擇術；它將一日中的“平旦”、“食時”、“晏食時”、“日中”、“暮市”分屬“宮、角、徵、羽、商”五音，分列五行記載其行喜的特定日子，其具體記敘如下：

“戊寅申、己卯酉、丙辰戌、丁巳亥、庚子午、辛丑未，宮也平旦行（二喜）

“己巳亥、庚寅申、辛卯酉、戊辰戌、壬子午、癸丑未，角也食時行七喜。

“丙寅申、丁卯酉、甲辰戌、乙巳亥、戊子午、己丑未，徵也晏食行三喜。

“癸巳亥、丙子午、丁丑未、乙酉卯、甲寅申、壬辰戌，羽也日中行五喜。

“辛巳亥、壬寅申、甲子午、乙丑未、癸卯酉、庚辰戌，商也墓市行九喜”。

和秦簡《日書》相比，其選擇的干支排列順序有所不同，特別是這些干支與跟五行相配的五音相屬，而且對一日中的五個特定的時辰進行了相對更嚴密的切分和定名。因此，帛書《陰陽五行》就顯得較為精細些，儘管它沒有題名，但顯然是“禹須臾”的另一個更詳細的抄本。這種將六十甲子分成五音進行占卜的方法，就是古代數術家常說的五行納音^⑤。

此外，秦簡《日書》在“禹須臾”的後面，從第八六五簡到八六八簡，都祇詳列了具體時辰出行何種方位的吉凶，如八六五簡云：

“子，旦，北，吉，日中，南，得。

辰，北吉，南，得，東西，凶，毋行。

申，西南，吉，北，凶。”

在《陰陽五行》中，則既有具體時辰和出行方位的吉凶說明，如：

“甲乙、平旦、日出、自如，食時、暮食，大吉。……”等

亦有一些帶規律性的說明，如：

凡行者，毋犯其鄉之大忌日。西毋犯亥未，東毋犯丑巳，北毋犯戌寅，南毋〔犯〕口口。

“春秋冬夏，庚辰毋東，丁丑毋西，丙戌毋南，壬戌毋北，皆不可往焉，往焉不反（返）。

“丙寅不可東，丙子不可北，丙戌不可西，丙申不可西南，丙午不可南，……”

由此可見，帛書《陰陽五行》既可與秦簡《日書》互相補充，又可互相對勘而顯示出秦、楚日書的各種不同和差異。

（四）

秦簡《日書》和帛書《陰陽五行》的相同之處固然不少，但畢竟是秦、楚兩地所使用的不同的數術著述，故其不同之處亦是隨處可見。例如：秦簡上的《艮山圖》，作倒梯形，巧妙地用三十個小圓圈表示從朔到望，再從既望到晦的變化，這種據“反支”以推“離日”的“艮山圖”在帛書中就沒有。但帛書亦有其便於圖繪的優勢，如所繪的“天一”圖^⑥，就非秦簡所能有。此外如表示四維和十二度的式圖等，也是帛書所特有的，不祇如此，帛書還有好些內容是不見於秦簡《日書》和其它傳世數術類文獻者，今僅摘錄一二以饗讀者。

1. 五行上朔順逆干支表^⑦

在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中，有兩塊保存得較為完整的帛片，兩塊拼起來，是一份幅寬48厘米的圖表，它從上到下分成十節，每節開首都標有“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歸屬，然後，在每一個五行歸屬內，分五排列有“逆七、上朔、順四、順七”及所屬的三十個干支，因此，權稱其為“五行上朔順逆干支表”。為方便理解，現錄一節完整的如下：

“火	逆七	乙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上朔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順四	戊申	己辛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順六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順十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其他九節的文字排列大體相同，祇是其干支不同而已。這裏關鍵是對“上朔”的說明問題。帛書左側有一句話：“天一所居為上朔”。大家知道：“天一”乃太歲之別名。《協紀辨方書》卷三“太歲”條引《黃帝經》曰：“太歲所在之辰，必不可犯。”《神樞經》：“太歲，人君之象，率領諸神統正方位，幹運時序，總成歲功，以上元闕逢困敦之歲起建於子，歲徙一位，十二年一週，若國家巡狩省方，出師略地，營造宮闕，開拓封疆，不可向之，黎庶修營宅舍、築壘牆垣並須回避。”因此，“上朔”日在數術家眼中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欽定協紀辨方書》卷六中就說“上朔日忌宴會、嫁娶、遠行、上官。”為什麼呢？《曆

例》曰：“陽年以年干加寅順數至亥，陰年以年干加丑順數至巳也。”曹震圭曰：“丑寅者，艮卦之方也，萬物始終之所也。巳者陽極之辰，亥者陰極之辰，故陽有生發萬物之功者寅也，陰有成終萬物之道者丑也。以陽而來會於極陰，以陰而往屬於極陽，則非相會之道也，其忌可知。”可見上朔乃是一大忌日，帛書所列的“五行上朔順逆干支表”，就是用於迴避這一忌日的說明圖表。

2. 星祭圖表

帛書《陰陽五行》甲篇中還較好地保存了一件基本可讀的有關二十八宿和祭法方面的圖表。這裏所說的圖表，其實是一幅文字表格，它亦由斷裂後的上下兩塊組成，從上到下大致有十六排，因右側不全，尚不知殘去多少，從現存的這兩塊殘片看，上半幅的前六排都是先錄特定的地支，然後在其左側注有特定的星祭吉凶占語，例如：

“……卯、午子、子午、卯、午子、酉、子午，滄池，大錯以祭，二歲或死。

“……丑、戌、辰、丑、辰、未、辰、血文以祭，果爰生，有死之。”

按，“滄池”在同一帛片上寫作“淦池”，“淦”或是“咸”之假字。按古音分部，“淦”在見母侵部，“咸”在匣母侵部，兩部之字多可合韻通假。“咸池”乃是“大時”之別稱。《淮南子·天文訓》：“斗柄爲小歲，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正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迎者壽，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又“大錯”亦或是“大敗”之別稱，錯、敗語義相通，實可通用之。“大敗”亦“大時”之別名。《協紀辨方書》卷六“大時”條引《神樞經》曰：“大時者，將軍之象也。所值之月忌出軍，攻戰、築室、會親。”曹震圭曰：“大時者，乃月建三合五行沐浴之辰也。蓋五行至此則敗絕，是最凶之辰也，故曰大凶之時。”

如果上述考述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所謂“淦池，大錯以祭”，也就是“大時”以祭，大時乃最凶之辰，大凶之時，故纔有“二歲或死”之占語。

所舉第二例中的“血文”，其中“文”字或是“支”字的訛抄。“血支”乃建除家所言十二神中的閉日。《樞要經》曰：“血支，其日忌針刺出血。”曹震圭曰：“血支者，氣血之支流也，故起於旺建之後生氣之前，如人生之後自有血脈暢於四肢，若其日針刺者，是去其血也，故忌之。”“血支”日既忌血，故其占語云：“果爰生，有（又）死之”，是知此日是忌生產、忌出血之凶日。

在帛片的第六排以下十餘排文字則是先錄星宿之名，然後於其左側注出特殊的星祭占語。例如：

“此、必、矛、危、公、尾、心、房、玄戈以祭，或死之。”

“去、繫牛、房、堽、箕、七星、輿鬼、輪美以祭，一歲有大咎。”

按：“玄戈”乃斗星，“輪美”為何星，待考。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八宿的名稱中，多用通假字和簡稱。例如“此”是“此觜”的簡稱，也是“觜宿”的省稱；“去”是“去張”的省稱，也是“張”宿的別名。又如“畢”宿作“必”，“亢”宿作“堽”，乃是通假之例。還有將“柳”寫作“酉”，“胃”寫作“膾”，“昂”寫作“矛”之類，是處可見。由是可見帛書著錄時的楚國，二十八宿之名尚沒定名，比起秦簡《日書》來，似乎隨意性要大得多，這多少意味着帛書著述的年代，比秦簡《日書》所作的戰國晚期似乎還要早一些。當然，這或許是楚人習俗和方言使然，但據此而說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是秦時抄本^①，則不盡然。

如上所述，這份幅寬48厘米，多至十六排之多的表格，因每行都記有一種特定祭法之占語，而且所祭都與二十八宿等星宿有關，因此，這裏姑稱之為“星祭圖表”，而最後定名則當以帛書整理完後發表的定本為準。

以上我們參照秦簡《日書》，對帛書《陰陽五行》甲、乙篇的部分內容進行了初步的介紹，這種介紹，僅僅是比較性的例舉而已，而帛書中的其它許多內容，例如刑德運行規律的文字說明，特殊的建除家言，天一運行的規律以及衆多的勘輿、選擇術方面的內容，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但析此文之後，能有衆多的學者來關注和研究帛書

《陰陽五行》，以便早日全面揭示出該帛書的全部內容和學術價值。

注釋

① 載《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②③ 載《馬王堆醫書研究專刊》第2輯，1981年出版。

④⑤ 見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⑥ 參見饒宗頤《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輯），劉樂賢《五行三合局與納音說》（《江漢考古》1992年1期）。

⑦⑧ 見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

帛書《易傳》窺管

魏啟鵬（四川大學）

陳鼓應先生主編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為“馬王堆帛書專號”發表了重新整理的《繫辭》釋文，並首次公佈了古《易傳》佚篇《易之義》、《二三子問》、《要》的釋文，尚未發表的《繆和》、《昭力》由廖名春撰寫了簡說詳細介紹，該專號的問世，將激發帛書易學研究的熱潮。筆者嘗試研讀帛書《易傳》，常懷以管窺天之嘆，偶有一得亦札記之。現略擇數則，以求正於方家。

帛書《繫辭》八則

• 聖人設卦觀馬（象）（三行上）

案：《繫辭》中的易象之“象”字，帛書此篇皆書作“馬”字，如“天垂象”、“易有四象”、“聖人立象以盡意”，皆以“馬”代象，約三十五見，唯“備牛乘馬，（引）重行遠（第三十五行）一句乃“馬”之本義。秦漢簡帛文字中的“象”字，阜陽漢簡作象，（其後魏碑“象”字別體作“象”、作“象”實本於此），與“馬”字字形有少許相近，除此以外，兩字形體區別甚為明顯，故以字形相近而譌解釋，恐難以令人信服，況且出現頻率很高，不像是偶然誤書。有的學者估計當與某種避諱有關，頗有見地。荆楚民族曾有象崇拜的習俗以及象牙厭勝術，江玉祥先生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象牙》一文中有頗詳的考述^①，指出“大溪文化遺址墓葬中發現了使用象牙厭勝術的遺跡，三星堆兩個祭祀坑內又重複發現了使用象牙厭勝的實物，說明這種習俗由東而西傳自長江中游

的荆楚地區。”而象崇拜一直延續到西漢猶餘霞斑爛，見《楚辭·九懷》：“乘虬兮登陽，載象兮上行。”王逸注：“遂騎神獸，用登天也。神象自身赤頭，有翼，能飛也。”同書《惜誓》：“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王逸注：“言已吸天元氣，得其道真，即朱雀神鳥為我先導，遂乘太一神象而遊戲也。”太一為楚人最尊之神，又曰“上皇”，亦天帝。道家之言，謂“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淮南子·主術訓》）而象和南方神鳥朱雀並稱，是南方神獸，可以載得道真者登高飛昇，“乘彼白雲，至於帝鄉”（《莊子·天地》），成為南方道家中神仙一派尊崇的神物。王逸指出《惜誓》作者“或曰賈誼，而疑不能明”，而洪興祖《楚辭補注》認為無疑是賈誼之作，後世學者多贊同洪說，可見道家的神象崇拜亦當流傳在賈誼謫居的長沙國一帶，帛書《繫辭》以“馬”代“象”，應為避神象諱，意在敬而勿失，以上通太一。倘若此說推測不謬，可作帛書《繫辭》為道家傳本說的一個旁證。

●聖者仁，壯者勇，鼓萬物而不與眾人同憂（八行下）

案：此句當從張政烺先生釋文，今本作“顯諸仁，藏諸用”，“眾人”作“聖人”，迥異於帛書，當為漢易數家，“源同流別，歧之中又有歧”的正常現象。帛書此段文意，朱伯崑教授認為“頗受老子無為說的影響”，樓宇烈教授指出《繫辭》中受某種程度道家思想的影響，那麼，其中插上這樣一段以‘聖者’喻易道的話也並非沒有道理”。④試以道家言（包括儒家吸收的道家觀念）說解此文。“聖者仁”，據帛書《老子》甲本後古佚書，“知天道曰聖”，聖者是“聞而知之”，聰明上達具有“天知”的人，“不仁，思不能精；不聖，思不能輕；不仁不聖”，聖者首先是一個仁者。“壯者勇”，壯借為臧，《繫辭上》鄭玄注：“臧，善也。”勇借為容，二字同為喻母東部字，故得通借。《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正義》：“容讀曰勇。”以“善者容”解讀，與老子思想十分合拍，第七章言“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即上善之所處世。第二十七章言“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

物。是謂襲明”，乃善者的襟懷和睿智。聖者乃是善者，故有容乃大，正如第十六章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聖者“鼓萬物”，⑤《風俗通義》佚文可以發明斯義：“聖者，聲也，通也。言聞聲知情，通於天地，條暢萬物，故曰聖”。此文以“聖者”與“衆人”對舉，“不與衆人同憂”亦本《老子》第二十章之義：“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以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嚴遵《老子指歸》卷七《天之道篇》對“衆人之道”專有論列，可以參看。

• 生之胃（謂）馬（象），成馬（象）之胃（謂）鍵（乾），教（爻）法之胃（謂）川（坤）（九行上）

案：今本作“生生之謂易”，孔穎達疏：“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轉變，後生次於前生，是萬物恒生謂易也。”或疑“生”之下脫重文符號“一”。本文傾向於將“生之謂象”作為古《易傳》的重要異文看待，試作解詁。從表層意義理解，帛書此句乃言生長成形而具象也，如《大戴禮記·本命》云“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易·坤·彖傳》“萬物資生”孔疏云“成形謂之生”。張岱年先生《初觀帛書〈繫辭〉》指出通行本“生生之謂易”，“祇能是贊述天道之語，不可能是論述聖人”。從深層的哲理而論，帛書“生之謂象”同樣是贊述天道、道、德。“象”可訓為“道”，見《老子》第三十五章“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章句：“象，道也。”⑥《素問·天元紀大論》：“天以陽生陰長。”王冰注：“生長者，天之道。”皆是其證。帛書《繫辭》第三十二行上“天之大思曰生”，通行本作“大德”，然“思”古義有“道德”之意，《逸周書·謚法》云“道德純一曰思。”《尚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馬注：“道德純備謂之思。”可見此句亦可與“生之謂象”互相發明。

“生之謂象”，當指“大象”，即《老子》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的“道”，“生”一旦賦有具體的形狀聲象，就有了乾坤陰陽之別，故帛書下文曰“成馬（象）謂之乾”云云。

• 陰陽之謂神（九行上）

案：今本作“陰陽不測之謂神。”帛書異文亦通，且與其上“通變之謂事”爲對文，句式整飭。先秦至西漢，“神”一詞本身即有不可知、不可測度之義，如《孟子·盡心下》：“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管子·內業》：“有神自在⑤，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注》：“神，不測者也。”《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物之難知者若神。”“神”又言其變化，《內業》：“一物能化謂之神。”《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更以陰陽爲“神明之府。”故帛書本與今本比較，文略意同。

•夫《易》，古物定命，樂天下之道（二十一行上）

案：今本作“開物成務”，“樂”作“冒”。帛書“古”之詞義稀見，《逸周書·常訓》：“民乃有古。”孔晁注：“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是“古”有“經遠之規”的意義，即長遠的謀慮和籌劃。“古物”，對世間衆物進行深遠的思量、謀慮、籌算，以推之其命運。《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又有敬神篤業致福之說。帛書此文則言以《易》知命，參看班固《幽通賦》：“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注：“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爲徵兆於前也。”《易》則以卜筮考其徵兆，知其定命，“其受命也如繆（案：‘錯’通‘措’，安置、制訂），無又（有）遠近幽險，述之來勿（物），非天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十八行下十九行上）即“古物定命”本義。

•聖人以此佚心，內藏於閔（二十二行上）

案：今本作“洗心”，《釋文》說“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帛書爲又一種異文。“佚”通“逸”，謂使心逸然。《尚書·周官》：“作德，心逸日休。”《孔傳》：“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孔穎達疏：“爲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逸豫，謂安樂、舒緩。帛書“佚（逸）心”亦就作德而言，緊承上文所述“著之

德”、“卦之德”而論聖人之德，聖人無私，無所營營，故能具“著”、“卦”、“六爻之義”三者之德，達到內心逸然安樂的境界⑦。“內藏於閉”繼續論“德”之積，帛書《老子》甲本後古佚書第四五行有云：“其閉盈謂之德，其行謂之說（悅）”，其意相同，可見此文比今本“退藏於密”含義較勝。《呂氏春秋·君守》云：“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與帛書此段文意相發明。

• 吉凶者，上朕者也。天地之道，上觀者。日月之行，上明者（三十一行上）

案：此句三個“上”字，今本皆作“貞”。疑“上”，皆謂天也。“上朕”從張政烺先生釋文，“朕”是徵兆、迹象，此即“天垂象見吉凶”之意。陳松長同志釋為“上勝”，鄙見疑“勝”借為“稱”。《繫辭下》：“貞勝”《釋文》：“姚本作稱。”勝、稱皆為章組字，同隸蒸部，故得通借。《說文》：“稱，銓也。”“上稱”言天稱量以銓定吉凶。“上觀”，謂天垂示大道。《爾雅·釋言》：“觀，示也。”“上明”，天之光明，即同書二十四行上“垂焉（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

• 蓋取諸《大有》也（三十七行下）

案：帛書大異於今本，較為費解。今本作“蓋取諸《夬》。”《九家易》曰：“夬本神世，下有伏坤，書之象也。上又見乾，契之象也。以乾照坤，察之象也。夬者，決也。取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虞翻曰：“夬反剝，以乾照坤。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取諸夬。”至於《大有》，漢易亦有說。《易·象上傳》：“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虞翻曰：“乾為揚善，坤為遏惡，為順。以乾滅坤，體夬，揚於王庭，故遏惡揚善。乾為天，為休，二變時巽為命，故順天休命。”帛書本“取諸《大有》”，與通行本“取諸《夬》”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強調了“以乾滅坤”，而不是“以乾照坤”。這當與漢初惠帝至高后年間呂雉專擅的“坤世”有關，其時天災、地異、人禍並見。“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

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彊將害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⑧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蝕。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全蝕。“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此次日全蝕，即“劉向以爲五月微陰初起而犯至陽，其至重”，京房《易傳》所謂“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陰氣盛，薄日光也。”⑨高后三年，“星晝見”⑩，“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請呂相王”。⑪凡此種種，以西漢士人觀之，皆爲陰盛虧陽，坤之爲惡之徵。帛書本“取諸《大有》”，意在滅坤倒呂，是當時漢廷將相公卿強烈不滿情緒的反映。這段異文還表明，漢初治《易》諸家中有人或“持論巧慧”，或“改師法”，並不是個別的孤立的現象。

帛書《要》一則

•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患（德）行亡者，神靈（靈）之趨；知（智）謀遠者，卜筮之蔡”，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行之爲也。（十三行）

案：“蔡”謂法、效法。《小爾雅·廣詁》：“蔡法也。”《尚書·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馬融注：“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緡”借爲“慙”，《經典釋文》：“慙，《尚書》作賢，又作昏，皆訓強。”⑫“緡行”猶言“強行”，《老子》曰“強行者有志”，即有毅力和見識。孔子教訓弟子說，沒有德行的人趨事神靈，遠離智慧和思想的人纔效法卜筮。子貢曾以此箴規自己的修養和行爲，所以對“夫子老而好易”感到困惑。

帛書《繆和》一則

•沈尹樹（戌）說伐陳之利（第二十三段）

廖名春先生《簡說》云：此段同於《呂氏春秋·似順》、《說苑·權謀》、《楚史·禱杙》，但更為詳實。主張伐陳之人，《繆和》說是沈尹樹（戌），《說苑》說是楚莊王，《呂氏春秋》說是“寧國”，係涉上文“國寧”而誤，不可信。從《繆和》云“遂舉兵伐陳，有之”來看，不似楚莊王十六年時楚“破陳，即縣之”事，因不久“莊王乃復陳後”。據《繆和》所載沈尹樹（戌）事蹟，可知此係指楚靈王七年楚滅陳為縣事。諸書所載的“莊王”很可能係“靈王”之誤。

案：《左傳》無沈尹樹（戌），有沈尹戌，楚莊王之孫，平王昭王時任左司馬，《左傳》凡九見，未有伐陳之事，而且其名“戌”古音為心母物部字，與“樹”實難通假。疑此“沈尹樹”當為《左傳》之“沈尹朱”。“樹”、“朱”，同為章組字，韻同隸侯部，例可通借，《文選·嘯賦》：“跼蹐步趾。”李善注：“《廣雅》曰：‘跼蹐，跼蹐也。’跼蹐與跼蹐，古字通。”即朱聲、直聲可通之證。

《左傳·哀公十七年》載楚事有二：“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此年為公元前478年，楚惠王十一年。）“惠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為令尹。”（杜注：“子國，寧也。”汪繩祖曰：“《淮南子·人間訓》云：‘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此沈尹朱即子朱，後復為太宰之官。”）由此推見，《繆和》所載沈尹樹（朱）說伐陳之利，以闡發《明夷》卦六四爻辭之義，可以補史籍之缺，沈尹樹（朱）也為惠王滅陳提供了重要的意見。此外《呂氏春秋》所載的“寧國”可能是令尹子國，即“公孫寧”、“寧”之傳寫訛誤。

注釋

①《三星堆與巴蜀文化》，第203頁，巴蜀書社，1993年。

②《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39頁、51頁。

③《自虎通·禮樂》：“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出。”

④ 參看帛書《老子》甲本復古佚書454行“聖者聲也。”

⑤ 《河上公章句》為西漢初年作品，非後人偽作。河上公以《易傳》解老有之，如第四章、五十二章，參看胡樸安、金春峰說。

⑥ 原書“在”下有“身”字，據《管子集校》乃衍文，刪去。

⑦ 參看帛書《五行》：“無中心之說（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荀子·解蔽》：“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

⑧ ⑨ ⑩ ⑪ 分別見於《漢書》之《天文志》、《五行志下之下》、《高后紀》、《五行志上》

⑫ 《經典釋文》卷九，《大司寇》音義。

馬王堆帛書《刑德》中的軍吏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馬王堆帛書中有《刑德》甲、乙、丙三種，其性質為兵陰陽家言。按《漢書·藝文志·兵書略》於兵陰陽家云：“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可知此家以刑德之術為主，與同志《數術略》五行家所載《刑德》、《五音奇肱刑德》等相通。這幾種帛書雖不限於刑德一術，稱之為《刑德》還是可以的。

1992年湖南出版社印行的《馬王堆漢墓文物》，發表有《刑德》乙種的照片和釋文^①。嗣後，饒宗頤、陳松長二先生均有文論述^②。刑德之術相當複雜，如清人錢塘所說，與律曆、風角等都有密切關係^③，體現着古代的宇宙論，容另文詳細研討，這裏祇就《刑德》乙種下列一段話略作考訂。

我們要談的，是帛書中關於風占的一章，章文之末殘損，《馬王堆漢墓文物》已據《刑德》甲種補上了多數缺字，稍加修正後是這樣的：

凡以風占軍吏之事，子午刑德將軍，丑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伯）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巳亥雨師冢子，各當其日以口（風，殺鄰（？）其宮，有事），若无事，〔乃有罪〕。

這段話的大意並不難索解。刑德、豐隆、風伯、大音、雷公、雨師是刑德圖上的六神，隨着時日流轉，所值之日有規律的變徙，但刑德總在子、午之日，豐隆總在丑、未之日，依此類推。其所居之宮也在不斷變化，在圖上有着清楚的表示，如在某日起風，風向侵襲值日之神所居之宮，則應於相當軍吏有事，刑德對應將軍，豐隆對應司空，

等等。如果無事，該軍吏便會獲罪。這是使用於軍中的一项占法，正與兵陰陽家宗旨相合。

此處要討論的，是章文所提到的六種軍吏，即將軍、司空、候、尉、司馬和冢子，這對我們了解當時職官頗有裨益。

《刑德》甲、乙兩種都有上引一章，二者的抄寫年代是清楚的。陳松長文已說到，甲種表中有“今皇帝十一”紀年，應指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高祖卒於十二年四月，《刑德》甲種即寫成於十一年至其卒前的期間。乙種表中有“孝惠元”紀年，應寫成於惠帝卒後，最可能在呂后初年。上述軍吏制度，反映了漢初的職官情況，和《漢書》等所記有所差異。帛書的出現，正好補充載籍的不足。

查《史記·吳王濞列傳》云：“吳王濞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事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所云軍制仍與帛書的將軍、候、尉、司馬四者相應。按《漢書·荆燕吳傳》用《史記》此文，作“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多“行間”二字。注：“孟康曰：行伍間候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候，或為司馬也。”均有未諦。王先謙《漢書補注》云：“‘行間’二字贅。《史記》無二字，文義自足。疑此涉下‘行間’而行，然傳本之誤由來舊矣。《通鑑》亦無二字。”其說甚是。

《通鑑》有關文字本於《史記》。胡三省注稱：“凡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副。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說蓋本於《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這是較晚的制度，但係自漢初演變而來，足資對照參考。

帛書軍吏，在將軍、候、尉、司馬之外，還有司空、冢子，需要論證。

司空的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大家知道，周代司空本是工官，至秦，

因工程多用刑徒，司空遂轉變成管理刑徒之官^④。《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和賈誼所說一樣，漢初的各種司空都是主管罪犯的，如《史記·儒林列傳》記竇太后言“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便是如此。同書《倉公列傳》齊有北官司空，也“當為主後官罪人之官^⑤”。由此推論，漢初軍中的司空也應為管理罪犯的職官。

冢子則不見於文獻。好在近年通過戰國文字的研究，已經接觸過這一職官名。

1981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發表了李家浩《戰國時代的“冢”字》一文^⑥，不僅釋出“冢”字，也論及職官名冢子。李文正確地指出，許多戰國文字材料，特別金文中的“冢子”，皆為職官名，“他們似與文獻裏稱太子為冢子名同而實異”。對於該文這一論點，我長時間不大相信，後來檢出帛書“冢子”，纔得釋疑。

分析李文列舉的材料，戰國金文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鼎銘，如：

六年，寧冢子得，冶諧為，財（載）四分釐。

十三年，梁陰令率，上官冢子疾，冶勳鑄，膺（容）半。

梁上官，膺（容）三分。宜信冢子，膺（容）三分。

卅三年，單父上官冢子意所受平安君者也。

前三器，如李文所言，都是魏國所作。末一器，與河南泌陽官莊北崗出土的另一件鼎相似，結合官莊同出漆盒紀年看，當屬於衛嗣君，與魏也甚有關係^⑦。凡此冢子一官皆在地方（包括宜信這樣的封邑），或屬上官，應係一種食官^⑧。

另一類是戈銘，如：

十八年，冢子韓贈，邦庫番夫口陽，冶口戠（造）戈。

三年，冢子攻正明義，左工師鄺許，馬重丹所造。

前一器，李文已指出屬韓國。後一器，“馬重”似為與冶相近的一種身份。1976年，山西臨縣窰頭村出土戈銘：

王何立事，貢工冶叢所教馬重為^⑨。

知“馬重”尚低於冶，窰頭村戈乃趙器，同有“馬重”的這件戈也當

屬趙國。兩器銘中的冢子一官是在朝廷，和魏制不同。

據此，冢子這一職官戰國時見於三晉。在魏國設在地方，在韓、趙設於朝中，其共同點是所轄有冶，職責是製作青銅器，包括兵器在內。

上引趙國戈銘云“冢子攻正”，“攻”讀為“工”，工正為工官之長。從這裏我們明白，無論是朝廷的冢子，還是地方的冢子，都是工官。帛書《刑德》的軍吏冢子，應為軍中的工官，其職能當即軍用器械的製造。相信今後還會有更多材料，來印證這一點。

注 釋

① 傅舉有、陳松長：《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

② 饒宗頤：《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

陳松長：《帛書〈刑德〉略說》，同上。

③ 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附錄三，中華書局，1989年。

④ 徐連達主編：《中國歷代官制詞典》，第36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⑤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下冊，第261—262頁，齊魯書社，1985年。

⑥ 李家浩：《戰國時代的“冢”字》，《語言學論叢》第七輯，商務印書館，1981年。下引材料出處均見該文。

⑦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年第9期。

⑧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

⑨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出土文物》，118，1980年。

馬王堆醫書釋讀札記

張顯成（四川大學中文系）

【提要】本文對馬王堆帛書的佚醫書中的10個長期未解決或未能妥當解決的釋讀難題試加考釋，它們是：再食漿；蓄藏；程，葦；僕累，羸中蟲；并符；泚；全虫蛻；大皮桐。

地下出土文獻是長期埋在地下而後問世的，具有極強的文獻真實性，所以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而要充分地利用出土文獻，首先就要解決好釋讀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制約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馬王堆漢墓帛書是珍貴的歷史文獻，自它一問世，就受到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二十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可喜的。但是，由於帛書絕大部份是佚書，“年代久遠，內容古奧難解”，就難免存在一些久攻未下的釋讀難題。在已公佈的這批出土材料中，醫書的釋讀難度很大，存在的釋讀難題也就要多些。本文擬就這批醫書中一些釋讀難題（包括至今未能釋者和雖釋而未妥者）試加考釋，竊望有助於這批佚醫書的研究，並祈方家教正。

再 食 漿

《五十二病方》：“狂[犬]啗人者，孰澡（燥）湮汲，注音（杯）中，小（少）多如再食洿（漿），取竈末灰三指撮（撮）□□水中，以飲病者。”57—58。（湮汲，即地漿。竈末灰，即伏龍肝。）

此方的“洿”顯然是“漿”的省筆字，故當釋為“漿”，於此，導

者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再食漿”的所指，卻一直是一大難題而未得其解。如帛書整理小組注：“再食漿，未詳。”魏啓鵬先生《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曰：“再食漿，不詳。疑為陳倉火米經水浸蒸曬後所煮汗漿，陶弘景、李時珍皆說古方中多用之，並以此煮汗煎藥。”^①此說顯然缺乏理據而牽強。馬繼興先生《馬王堆醫書考釋》曰：“‘再食漿’三字，應與其具體的藥用量有關，但未詳何義，待考。”^②下面，筆者試對此難題作一探索。

縱觀上下文，我們同意馬先生的看法，“再食漿”之所指，應與藥“湮浹”（地漿）的用量有關。我們不妨順着這一思路探索下去。而要解開“再食漿”之謎的難點是“漿”字的意義，故首先得從“漿”字下手。《說文·水部》：“𩚑，酢漿^③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今隸作漿。”段玉裁注：“按：《酉部》云：‘𩚑，酢漿也。’則漿、𩚑二字互訓。”又，《酉部》：“𩚑，酢漿也。”段玉裁注：“𩚑、漿二篆為轉注。”又，“酢，醖也。”段玉裁注：“酢本𩚑漿之名，引申之凡味酸者皆謂之酢。”又，“醋，酢漿也。”段玉裁注：“漿、𩚑、醖三者同物。”

那麼，到底什麼是“漿”，即“𩚑漿”呢？漿，就是古代的一種略帶酸味的淡酒。據《周禮·天官》記載，周制專設“酒正”、“漿人”為掌酒之官。《天官·酒正》：“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鄭玄注：“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漿，今之𩚑漿也。”賈公彥疏：“云一曰清，則《漿人》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釀粥為醴則為醫；三曰漿者，今之𩚑漿……漿，今之𩚑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從𩚑從酒省。𩚑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𩚑漿，故云‘今之𩚑漿也。’孫詒讓正義：“漿、𩚑同物，累言之曰𩚑漿。蓋亦釀糟為之，但味微酢耳。”孫氏語“酢”意即“酸”，為“酢”之後起義，即上文所引段注之“引申之凡味酸者皆謂之酢”。《天官·漿人》：“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於酒府，共賓客之稍禮。”鄭玄注：

“涼，以水和酒也。”《說文·酉部》：“醕，黍酒也。”故漿、醕、涼、醫、醕均指酒。《儀禮·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俟於東房。”鄭玄注：“飲酒，清酒也。漿飲，載漿也。”賈公彥疏：“云‘漿飲，載漿也’者，載之言載，以其汁滓相載，故云載，漢法有此名。”《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裴駟集解：“漿，一作‘醕’。”司馬貞索隱：“漿，《別錄》云：漿，或作‘醕’字”賣漿家，即賣酒家。綜上所述，“漿”是一種微帶酸味的淡酒，不是醇酒，這種淡酒包括“醕”類“汁滓相載”之濁酒，所以不用作“祭祀之酒”，因為祭祀之酒要用醇酒，故《酒正》“祭祀之酒”為“清酒”，所以《公食大夫禮》將“飲酒”與“漿飲”相對而言，因為（飲）“酒”是“清酒”，而“漿”是“淡酒”。

有趣的是，馬王堆醫書《養生方》3-8簡正有一以楨棘（即楨棘、天門冬）和秫米（高粱米）製藥漿（即藥酒）之方，該方為“老不起”方，即治老年性陽痿方。該方雖有殘脫，但文意是基本清楚的：“□□以楨棘為醬（漿）方：[刊]楨棘長寸□節三斗”，然後將楨棘反復熬煮取汁，“□為剛炊秫米二斗而足之，氣孰（熟）。□旬□即乾□□□□沃之，居二日而□漿，節（即）已。近內而飲此漿一升，漿□侍（恃）其汁，節（即）漿□□以沃之，令酸甘□□飲之”。天門冬，《神農本草經》列為上品，稱其“久服輕身，益氣延年”，故《養生方》此方以之治“老不起”。由此方言漿味“酸甘”，“近內（入房）而飲此漿一升”可知，“漿”顯然是一種略帶酸味的淡酒而無疑，也與上引《周禮》及後人注相合。

“再”的本義是“兩”。《說文·冫部》：“再，一舉而二也。”《玉篇·溝部》：“再，兩也。”《書·多方》：“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史記·蘇秦列傳》：“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以上“再”，即二次。

至此，“再食漿”之意就清楚了，即藥用量為“飲兩次漿酒”的量，“再食漿”所在的《五十二病方》治“狂犬啗人”方意為：“善制

地漿水，注之於杯中，其用量猶如飲兩次漿酒之量……以飲病者。”這樣，也就文從字順了。

《證類本草·玉石部·地漿》(卷五)引《名醫別錄》曰：“地漿，寒，主解中毒煩悶。”並引陶弘景注：“此掘地作坎，以水沃其中，攪令濁，俄頃取之，以解中諸毒。”《本草綱目·水部·地漿》(卷五)引作：“此掘黃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水沃入攪濁，少頃取清用之，故曰地漿，亦曰土漿。”李氏接着說：“(地漿)甘，寒，無毒”，“飲一升妙”。這不但說明地漿的功用主治與本方相符，而且說明藥用量大(飲一升)，與本方所說的用量“再食漿”(飲兩次漿酒之量)正相合。這也證明本方的“再食漿”應當如上訓釋方為是④。

最後，我們來探討一下“漿”字歷史意義的演變，以便揭示“再食漿”難釋的原因，同時一併指出辭書訓釋之誤。由上文可知，“漿”即“載漿”，就是古代的一種略帶酸味的淡酒，這是“漿”的本義。因該種酒淡而微酸，故在詞義的發展演變中可引伸出“酸汁”義來，如《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異物志”曰：枸櫞，似橘，大如飯管，皮有香，味不美。可以浣治葛苧若酸漿。”後又引伸出“汁液”義，《字匯·水部》：“漿，漿水，米汁相特也。”此義一直沿用至今，如“米漿”、“豆漿”、“樹漿”即然。“漿”的以上幾種相關聯的意義，辭書大都未能辨清。如《漢語大字典·水部》釋為：“古代一種釀製的微帶酸味的飲料。”《漢語大詞典·水部》也釋為：“古代一種微酸的飲料。”且都引《周禮·天官·酒正》和鄭玄注、孫詒讓正義以及《史記·魏公子列傳》為書證，此外《漢語大字典》還引了《說文》之訓。這顯然是把“漿”的本義與“酸汁”義雜揉混淆了。

由上文所釋“漿”義可知，古訓多以“載”、“酢”、“醋”或複合詞“載漿”、“酢漿”等訓“漿”，故若未能真正理解這些訓釋詞的意義，也就難免誤解“漿”的意義。於此，辭書也多未辨清。限於篇幅，茲祇舉“載”為例以見一斑：

《辭源·酉部》：“載：醋。《漢書·食貨志下》：‘除米麴本價⑤，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載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注：‘載，酢漿也。’緊接着收“載漿”一詞，釋曰：“酒類飲料。”書證為《周禮·天官·酒正》等。

我們祇要一對比《辭源》對字頭“載”和“載漿”的訓釋，就不難發現，其前（“醋”）後（“酒類飲料”）之訓釋是矛盾的。當如前所述，都訓為“一種略帶酸味的淡酒爲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辭源》所引《漢書·食貨志下》作爲“載”訓“醋”的書證更是張冠李戴。《漢書》這段文字是引有魯匡諫準釀酒以增加政府收入的一段話，這是“專論酒事”的一段話，不妨將這段話的後半部份引如下：

……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廬以賣，譬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醋載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這裏的文意是很清楚的，末句是說，其利的三成以及釀酒所餘的酒糟載漿灰炭，就作爲工器薪樵的供給之費用。很顯然，這裏的“載”是指釀酒至尾聲時所出的淡酒，與“醋”（酸味調味品）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裏是在說釀“酒”而不是製“醋”。故《辭源》引《漢書》此段文字作爲“醋”的書證的確是張冠李戴了。後世辭書對“載”的訓釋，也都照襲此誤，如《漢語大字典·酉部》、《漢語大詞典·酉部》。

通過以上對“漿”、“載”二字意義的初步清理可以說明，因爲“漿”及其古訓的訓釋詞的意義長期未能得以辨清，所以帛書《五十二病方》“再食漿”難以得其解而長期闕如，也就不足爲怪了。同時筆者還想指出，《五十二病方》是早於《黃帝內經》的古佚書，內中保留着古文本義是很正常的，並且祇有用這種歷史觀來指導這批古佚書的研究，纔會有利於探其真諦。

末了補充說明一句，《足臂十一脈灸經》帛書殘片有：“□煮熬再淥（漿）飲□。”殘了。因文意不明，故不與上“再食漿”並論。

蓄 瀝

《養生方》：“（製壯陽藥巾方：）蛇牀秦半參、藟（蔞）本二斗半、潘（礬）石三指最（撮）一、桂尺者五延（挺）□□□□之蓄半□□者一杆（莖），以三（月）蓄瀝□孰煮，令瀆（沸），而以布巾曼（慢）其□□□汁。且爲之，□之，令膚急毋歎（垂），有（又）令男子足□。”85—87。

此方的“蓄瀝”整理小組未釋，馬繼興先生《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釋“蓄”爲“酒”之省，再“假爲皂”，即皂角。然後釋“瀝”爲“載”的“古寫”，義爲“醋”。繼而譯“以三月蓄瀝”爲：“三月採的皂角和醋。”這就產生了幾個問題：一是皂角陽曆五月（夏曆三至四月）開花，秋季十月（夏曆九月）成熟，三月皂角大都未開花，哪有皂角可採呢？若以周曆（建子之月爲歲首）爲計，則更是不可能。二是爲何一定要用“三月”的醋呢？三月的醋與非三月的醋難道有什麼不同嗎？所以，看來馬氏此訓是走不通的，還得另闢蹊徑。茲另釋之。

瀝，同載。“瀝”字傳世典籍未見，但從載聲無疑，故在語音上與“載”是相通的。我們同意馬先生的訓爲“載”字的看法，但不同意訓爲“醋”。載，如上文“再食漿”條所說，當爲一種略帶酸味的淡酒，此方藥用“載”，顯然是傳統的以酒助藥力之法。

弄清楚此方的“蓄”的意義，是釋讀的另一關鍵。“蓄”的本義爲用酒灌注茅以祭神，故引伸爲泛指以茅瀝酒去渣。《說文·酉部》：“蓄，禮祭。茅束加於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蓄，象神飲之也。”段玉裁注：“《周禮》、《禮記·內則》二鄭所引《左傳》皆作‘縮’。然則縮者古文假借字，蓄者小篆新造字……而《周禮》‘蕭茅’，或作‘蓄’，皆漢人所用字。”《詩·小雅·伐木》：“有酒湑我。”毛傳：“湑，蓄之也。”陸德明釋文：“蓄，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涕之而去其糟也。”《左傳·僖公四年》：“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一。”杜預注：“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周禮·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鄭玄注：“蕭

字或爲菑，菑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苞茅，玉祭不共，無以縮酒。”孫詒讓正義：“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菑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禮，共菑茅’。蓋《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皆菑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菑茅’者，以茅爲菑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菑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菑字，故以今文讀之。”由上引可知，前賢已把“菑”的意義講透了，“菑”（酒）即“縮”（酒），前者爲古字。本方“菑戴”意即：用茅濾戴酒以去渣。“以三月菑戴”意即：“用三月的茅濾戴酒以去渣。”以三月之時菑戴，則當然是用三月的茅，且三月之茅嫩而潔淨，以之濾酒，當然爲好，故言“三月”。如上訓釋，也就文從字順了。

最後還要強調說明的是，本方“菑戴”二字的組合（動賓詞組），本身也證明了“戴”的意義是一種“酒”，因謂詞“菑”是“以茅濾酒”，則賓詞“戴”當然是指“酒”而無疑。

程 耜

《五十二病方》治癰方中有一個祝由方，現將其禁咒語引如下：

某（不）幸病癰，我直（值）百疾之口，我以明月炷若，寒口口口以杵檜，程若虎蚤（爪），挾取若刀，而割若耜，而剗若肉，口若不去，若 369—370。

此方中的“程”，整理小組未釋；馬繼興先生《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釋通“挺”：“挺與程上古均耕部韻。程爲透母，挺爲定母，故程假爲挺。挺字義爲木棍，木杖。《孟子·梁惠王上》：‘殺人以挺與刀’趙注：‘挺，杖也。’其引伸義，即用棍打擊。……全句即用老虎的爪來打你。”此訓“程”通“挺”於音理是講得通的，但於義（訓爲“打”）就有些不太妥貼了，因虎爪祇能說以之來“抓”，說以之來“打”就不太合適了。

余以為此方的“程”當釋“戠”^⑧。“程”與“戠”均從呈聲，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鼎部》同置二字於“壬”聲下。若細分其上古音韻地位，則為：程，透母、耕部；戠，定母、質部。可知二字聲同部位（同為古上音），韻亦近（耕質旁對轉）。故得相通假。戠，《說文·戈部》：“剔也。”剔，《說文·刀部》：“解骨也。”即把肉從骨上刮下來。“戠若以虎爪”一句意即：用虎爪剔抓你。此極言對癩魔的憎恨，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祝由辭的禁咒風格色彩，同時也與馬王堆醫書中其他祝由方的用語風格相統一了。此僅舉一例：《五十二病方》：“（治漆瘡祝由方）唾曰：‘噴，漆（漆）。’三，即曰：天帝下若，以來（漆）弓矢。今若下民疔。涂若以豕矢，以履靡（糜）抵（抵）之。”380。聲稱要用猪矢塗“漆”，用鞋底打爛“漆”，極言對漆魔的禁咒。

再看此方中的“葦”。此字整理小組仍未釋；馬繼興先生釋通“尾”。“尾與葦上古均微部韻。尾為明母，葦為匣母紐。故葦假為尾。”^⑨於是該書將“而割若葦”一句譯為：“把你的尾巴割掉。”此訓“葦”通“尾”在音理方面也是講得通的，但在文義方面就有些不太妥貼了。因鬼怪不一定有“尾”，且古人常附之以人形，故總覺有些牽強。

此方的“葦”當釋“韋”。“葦”與“韋”音同（葦，韋聲），故二字得相通假，此無需擬議。韋，義為“熟皮”。渾言之則“韋”、“皮”無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履部》“韋”下曰：“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故借以為皮革。……《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注：‘韋弁，韞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說文·刀部》：‘割，剝也。’此方‘而割若葦’一句意即：剝你的皮。這樣，不光附合祝由辭的對病魔的禁咒風格色彩，而且文意與下句“而剔若肉”（砍你的肉）正好相對——上言“割若皮”，下言“剔若肉”。故“葦”當讀為“韋”方妥。

下面，我們不妨來把“程（戠）若以虎蚤（爪），挾取若刀，而割若葦（韋），而剔若肉”幾句連起來串講一下：“用虎爪剔抓你，把你的刀挑出來，剝你的皮，砍你的肉。”如是，就文從字順了。

僕 累

《五十二病方》：“（治痂方：）治僕累，以攻（鉗）鐺（然）而傳”399。（痂，疥瘡。）

整理小組注：“僕累，即僕壘，據《吳普本草》係麥門冬別名。”但是，“麥門冬”諸本草書均未有治疥癬類皮膚病的記載（不少學者都已注意到了此點），故釋“僕累”為“麥門冬”是靠不住的。

本方中的“僕累”當釋“田螺”。其理由如次：

這裏的“僕累”，若單從字面上看，則可能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如整理小組所釋，訓為“僕壘”。因為據《證類本草·草部·麥門冬》（卷六）引《吳普本草》載，“麥門冬”（原植物“沿階草”的塊根）的原植物“沿階草”的其中一個異名為“僕壘”，而“累”與“壘”音同是可通轉的。但是，正如上所述，從藥理功用上看，這是不可能成立的。第二種解釋是訓為“蝸牛”。《山海經·中山經》：“南望蟬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累、蒲盧。”郭璞注：“僕累，蝸牛也。”但是，古本草中也未見有以“蝸牛”治本方類皮膚病的記載。故馬繼興先生《馬王堆古醫書考釋》^①在列出上述兩種解釋的可能後，也就未能進一步認定其所指了。

其實，祇要我們在第二種解釋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沿着古今詞義演變這一線索探討下去，問題也就有可能得到解決了。《說文·虫部》：“蝸，贏也。”（依段注改，原文作：“蝸，蠃也。”段注曰：“此復舉篆文之未刪者也，當依《韻會》刪。”）段玉裁注：“贏者，今人所用‘螺’字。……今人謂水中可食者為螺，陸生不可食者為蝸牛，想周、漢無此分別。”《集韻·戈韻》：“贏，蚌屬。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或作蝸。”《爾雅·釋魚》“蚶贏”條下郝懿行義疏：“贏與螺同。”《儀禮·士冠禮》“贏醢”鄭玄注：“今文贏為蝸。”據《周禮·天官》記載，周制設“鱮人”之職，以專掌“龜鱉之屬”，其中就包括“贏”。對《天官》所記載的“贏”的意義，清孫詒讓有一段精辟的疏證，現不妨引如下：《天官·鱮人》：“鱮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鱉蜃，凡狸

物。春獻蟹蜃，秋獻龜魚。祭祀，共麋、羸、蜺，以授醯人。”孫詒讓正義：《爾雅·釋魚》：‘蚶羸，蜺蜃。’郭注云：‘即蝸牛也。’王應麟《周書·王會篇》補注引《尚書大傳》‘鉅定羸’，郭注亦云‘羸，蝸牛也’。案：今語以水生者為羸，陸生者為蝸牛，古人蓋無此分別。凡經典之言蚶羸、言羸，注家訓為蝸、為蝸牛者，皆當為水羸。《說文·虫部》云：‘羸，一曰虎蜃。’又云：‘蝸，蝸羸也。’蝸、羸疊韻，羸亦可單言蝸。故羸醯，《內則》反《士冠禮》注引今文《禮》並作‘蝸醯’。《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獻蟹蜃與龜魚，供蝸羸與菱芡。’彼賦正用此經，蓋平子亦以羸為蝸。薛綜注云：‘蝸羸也。’螺即羸之俗。《爾雅》‘蚶羸蜺蜃’與‘羸小者蝸’文比屬，足證其同為水羸。若陸生之蝸牛，則《本草經》謂之陵蟲，腥穢不入食品，醯人羸醯必不用此矣。孫氏此段疏證可謂把“羸、蝸、蝸牛”的意義講透了。也就是說，“蝸”與“螺”一聲之轉，同為一詞，古之“蝸”的所指比後來廣泛，兼指後來的“蝸牛”和“螺”，即古陸生不可食者（今之“蝸牛”）謂“蝸”，水生可食者（今之“螺”）亦謂“蝸”；後世本草則常將“陸生者”謂之“蝸”，“水生者”謂之“螺”。上引治痢方的“僕累”，正是指水生可食者之“蝸”——今之“螺”。李時珍《本草綱目·介部·田螺》（卷四十六）：“螺，蚌屬也。其殼旋文，其肉視月盈虧。故王充云：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需要指出的是，《五十二病方》是早於《黃帝內經》的古佚書，內中保存着古義是很正常的。並且，也祇有用這種詞匯意義的演變的歷史觀來探討考釋這批古佚書的內容，纔會有利於得出其真諦。

弄清楚了“蝸”之古今詞義的這一演變之後，我們再來看水生可食者之“蝸”——今之“螺”的功用主治。螺，渾言之又名“田螺”（《名醫別錄》），“田中螺”（《藥性論》），“螺螄”（《千金方》）等等。今江南民間仍有上述稱呼，且常渾言之，以“螺”、“螺螄”渾指一切螺。若析言之，則大小有別。例《本草綱目·介部》即將螺之大者與螺之小者分立為二條，前者命曰“田螺”，後者命曰“蝸螺”又稱“螺螄”。《本草品匯精要·蟲魚部·田中螺附蝸螺》（卷三十一）即合之為一條，這是因為其主治功用相近的緣故。^⑩《本草品匯精要》“田中螺”

條引《日華子本草》曰：“田螺治手足腫及熱瘡，生研，汁傳之。”又引《本草拾遺》曰：“碎其肉，傳熱瘡。”《本草綱目》“田螺”條曰：“（田螺）燒研，治癰瘰癧瘡。”又引《千金方》治“風蟲癰瘡”方曰：“用螺螄十個，槿樹皮末一兩，同入碗內蒸熟，搗爛，入礬紅三錢，以鹽水調搽。”這些主治與“痂”正相符。所以，本方“僕累”即螺。（僕）“累”當讀本字，讀為（僕）“壘”訓通假反而不得其解。

羸中蟲

《養生方》：“（治方：）平陵呂樂道：羸中蟲陰干，冷，欲廿用七撮（撮），欲十用三撮（撮），酒一杯。”34。（治方，即壯陽方。“欲廿”、“欲十”，指性行為。）

整理小組釋此方的“羸”通“羸”，當。整理小組注曰：“羸中蟲，當即蝸牛肉。”（學者們大都持此說）此說就站不住腳了，原因有二：

第一，本方是壯陽方，從“欲廿用七撮，欲十用三撮”可知，此藥之壯陽功能較強，然蝸牛肉是絕無壯陽功用的。正如馬繼興先生《馬王堆醫書考釋》在釋“羸中蟲”為蝸牛肉後曰：“本方所用僅蝸牛一藥，其藥效後世醫書中尚未見其有補虛羸之作用者，僅記其有利水泄火，消腫敗毒，去濕清熱之功，主治外科癰腫，喉痺，癰瘰，驚風，痔漏等病。正如李時珍所說：“蝸牛所主諸病，大抵取其解熱消毒之功。”^①所以，這裏的“羸中蟲”絕不會是“蝸牛肉”。

第二，從語言結構上來看，“羸中蟲”的內部結構顯然是“羸中十蟲”，即羸中之蟲。既然如此，則無論如何也訓不出“蝸牛肉”來。況且，“蟲”字是絕沒有“肉”一類意義的。所以，從事物的得名之由來分析，“羸中蟲”也絕不會是“蝸牛肉”。

實際上，“羸中蟲”即《本草拾遺》所說的“寄居蟲”。理由如次：

一、羸，即螺。（說見上文“僕累”條）

二、據《證類本草·虫魚部·蝸牛》（卷二十一）引陶弘景注曰：“（蝸牛）生山中及人家，頭形如蛤蜊，但背負殼爾。前已注說之。

海邊又一種，正相似，火炙殼便走出，食之益顏色，名爲寄居。”又，《虫魚部·寄居蟲》：“蝸牛注陶云：海邊大有，似蝸牛，火炙殼便走出，食之益顏色。按，寄居在殼內，而非螺也。候螺、蛤開，當自出食，螺、蛤欲合，已還殼中。亦名寄生。”《本草綱目·介部·寄居蟲》（卷四十六）：“按，孫炳云：寄居在龜中者名曰蝟。……主治：益顏色，美心志。”《廣韻·至韻》：“蝟，似蝦，寄生龜殼中，食之，益人顏色。”《文選·郭璞〈江賦〉》：“爾其水物怪錯，則有……蛤蜊蠶蝟。”李善注：“《臨海水土物志》曰：‘蝟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愛蝟。’”以上對該蟲的描述與本方“蠶中蟲”之意正相符；該蟲之“益顏色，美心志”之滋補功用也與本方正相符。故“蠶中蟲”即“螺中蟲”亦即“寄居蟲”。

并 符

《五十二病方》：“蠱而病者，燔北鄉（向）并符，而烝（蒸）羊尾（尾），以下湯敦（淳）符灰，即口口病者，沐浴爲蠱者。”⁵³⁷此方“并”字長期未得釋讀，整理者未釋；馬繼興先生《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曰：“‘并’字義不詳。”^④“并”字義不詳，自然“并符”之義也就無法詳了。

并，當釋“秉”。并，幫母、耕部（[-eŋ]）；秉，幫母、陽部（[-aŋ]）。二字聲同紐而并爲耕部，韻相近而旁轉（均爲收[-ŋ]尾之陽聲韻），故得相通。耕、陽二韻相通轉者在古文獻中是不乏其例的，茲略舉一二，如“省”與“相”、“瘞”與“強”、“醫”與“葢”、“嬰”與“鞅”、“經”與“綱”、“頸”與“亢”等等，均爲（前）耕（後）陽相轉。所以，無論從音理上講，還是從實際用例上看，耕、陽二部都是可以相通轉的，也就是說，此方的“并”通“秉”是完全靠得住的。故“并符”即“秉符”。

本方之“燔北向秉符”，意即：手秉符錄北向而焚之。

符，即古人迷信鬼神用以驅鬼召神治病的神秘文書，也稱“符”。

錄”、“符書”。葛洪《抱朴子·遐覽》：“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這可以代表古人對符的認識。《後漢書·皇甫嵩傳》：“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大寧宣和遺事·政和六年》：“靈素既遭過道君之後，是時官間多妖怪，詔靈素治之。靈素乃作鐵簡，長九尺，上書符錄，埋於地，其怪遂絕。”這是古人用符驅邪治病的例子。本方正是以符治（驅逐）中蠱蟲之邪毒方，這也進一步說明“并符”即“秉符”，即手持着符錄。這樣，也就與本方的文意相符而文從字順了。

泚

《養生方》：“治中者，以汾囷（菌）始汾（坟）以出者，取，
□令見日，陰乾之。須其乾，□以裨（葦）〔蘚〕五、門冬二、伏
靈一，即并搗，漬以水，令覓（鏡）闔（掩）。□而泚取其汁，以
漬〔汾〕囷（菌），亦〔令覓（鏡）〕闔（掩），即出而乾之。令盡其乾，
即治，參指最（撮），以□半杯（杯）飲之。”74—76。

整理小組注：“泚，讀爲排，《說文》：‘擠也。’此說欠妥。縱觀此方上下文，“泚取汁”顯然是指“提取出漬藥物的水液”，而《說文》所訓之“擠”乃“推、推擠”義（《廣雅·釋詁三》：“排，推也。”），且統觀“排”義，也祇能由“推”引伸出“排斥、排擠”義，絕未見古文獻中有用作“排擠汁液”、“濾取水汁”類意義者。即，古文獻中“提取汁液”、“濾水汁”是不用“排”的。故釋“泚”通“排”牽強。下面，我們試另釋之。

泚，此字傳世文獻中祇用作水名（泚水）、地名（泚陽縣），未見有與此方相關的意義的用法；且先秦兩漢傳世文獻未見此字。

泚，當即“澤”。泚，《廣韻·旨韻》“卑履切”；比聲，上古音當爲幫母、脂韻。澤，先秦兩漢傳世文獻亦未見之，《廣韻·質韻》“鄙密切”；筆聲，上古音當爲幫母、質韻。二字聲同，韻陰入對轉。

故二字之音極其相近而可相轉。“澤”義爲“濾去水汁”，《廣雅·釋詁二》：“浚，澆，澤，筴，盪也。”王念孫疏證：“澤之言逼，謂逼取其汁也。《玉篇》：‘澤，筴去汁也。’《衆經音義》卷五引《通俗文》云：‘去汁曰澤。’又云：‘江南言逼。’^⑤義同也。今俗語猶云澤米湯矣。”《集韻·屋韻》：“盪，或從水。”《廣韻·屋韻》：“盪，去水也。”《周禮·考工記·愰氏》：“清其灰而盪之，而揮之。”由上可知，“泚”、“澤”、“逼”同爲一詞^⑥，義即“濾水汁”。此詞今乃活在方言中，如川方言：“把熬好的藥泚出來。”即，將藥液濾取出來。“泚米湯。”即，將米湯濾取出來。“這碗菜的水多了，泚點出來。”即，將水汁濾出一點來。本方“泚”字所在句的意思：“將漬泡萆薢、天門冬、伏靈的藥汁濾取出來，用以漬泡芬茵（香蓼）。”這樣，也就文從字順了。

全虫蛻

《五十二病方》：“治顏（癰）初發，偃攣而大者〔方：取〕全虫蛻一，□□□，皆燔□□□□□酒飲財足以醉。男女皆可。令。”223 — 224。

整理小組注：“全虫蛻，即蛇蛻。”此說大致不錯，但“全虫”（蛻）是怎麼釋成“蛇”（蛻）呢？“全虫”是否就是蛇？整理者並未言。馬繼興先生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他在《馬王堆古醫書考釋》^⑦中注云：“‘全虫蛻’自應是蛇類或蟬類所蛻之皮。即所謂蛇蛻或蟬退者。從古韻學看，蟬與全均爲元部。蟬爲禪母，全爲從母，故全可假爲蟬。而蛇與全爲同源字，係神從準雙聲，歌元對轉者，故二字可通假。”也就是說，馬先生將“全虫”釋爲“蟬虫”。但是這就產生兩個問題，一是若將“全”訓爲“蛇”，則“全虫蛻”就成了“蛇虫蛻”，哪有“蛇虫”這一說法呢？二是正如馬先生接下來所說的：“惟在《神農本草經》中祇有‘蛇蛻’及‘蚱蟬’二名入藥，尚無‘蟬蛻’一稱。至於本條的‘全虫蛻’究指蛇蛻或蟬蛻，尚有待進一步考定。”

其實，如果我們另闢蹊徑，從文字學度來探索這一問題，可能就

好辦了。

《說文·虫部》：“虫（今音 huǐ），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段玉裁注：“虫篆象卧而曲尾形。”邵瑛羣經正字：“今經典統用虺字……正字當作虫。”《玉篇·虫部》：“虫，此古文虺字。”

《說文·它部》：“它，虫也。從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它或從虫。”徐鉉注：“今俗作食遮切（今音 shé）”段玉裁注：“加虫左旁，是俗字也。”《玉篇·它部》：“它，蛇也。”

《集韻·麻韻》：“它，虺屬。”如果我們上溯至甲骨文，則會進一步發現甲骨文中“虫”與“它（蛇）”同為一字，由於字形的演變，至《說文》時，許氏遂分之為二字，後世又將“它”俗作“蛇”。正如羅振玉說：“它與虫殆為一字，後人誤析為二，又併二字為蛇，尤重複無理。許君於虫部外別立它部，不免沿其誤類。”⑩至於第三人稱的“它”，則又是假借蛇義的“它”而來的，《玉篇·它部》：“它，今作佗。”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它部》：“它，其字或假佗為之，又俗作他，經典多作它，猶言彼也。”徐灝箋：“古無他字，假它為之，後增人旁作佗，而隸變為他。”也就是說，古“虫”字，就是後來的“蛇”字的本字。這裏的“虫蛻”就是“蛇蛻”，這正是“虫”之古義的保留。《五十二病方》是早於《黃帝內經》的古佚書，保留着古文古義是非常正常的，同時也說明它是非常寶貴的古文獻材料。用這一歷史觀來看待這一問題，難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下面附帶說一下“全”（虫蛻）字。全，即“整個、完整、齊全”的意思，《說文·人部》：“全，完也。”《口部》：“完，全也。”所以，“全虫蛻”即“整條蛇蛻，完整的蛇皮”。

大皮桐

《五十二病方》：“（治痂方：）大皮桐，以蓋而約之，善。”
348。

整理小組注：“大皮桐，藥名，不詳。或說即桐樹皮。”如果我們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探討“大皮桐”的所指，或許能解決這一難題。

先分析“大皮桐”的語言結構。解開這一語言結構的難點是“皮桐”到底是一種什麼語言形式，因為傳世典籍未見有“皮桐”這一稱。實際上，如果我們考慮到《五十二病方》是早於《黃帝內經》的先秦早期典籍的話，即用歷史觀來看待分析之的話，則會發現，“皮桐”屬於上古漢語的一種“大名冠小名”語言結構形式。關於“大名冠小名”，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以大名冠小名例》^①已說得很清楚了：

《荀子·正名篇》曰：“物也者，大共名也；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是正名百物，有共名別名之殊。乃古人之文，則有舉大名而合之於小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禮記》言“魚鮪”，“魚”其大名，“鮪”其小名也。《左傳》言“雉鳴”，“雉”其大名，“鳴”其小名也。《孟子》言“草芥”，“草”其大名，“芥”其小名也。《荀子》言“禽犢”，“禽”其大名，“犢”其小名也。皆其例也。《禮記·月令篇》：“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為災；仲冬行春令，則蝗蟲為敗。”王氏引之曰：“‘蝗蟲’當為‘蟲蝗’，此言‘蟲蝗’，猶上言‘蟲螟’，後人不知而改為蝗蟲，謬也。”按：上言“蟲”而下言“蝗”，上言“蟲”而下言“螟”；“蟲”其大名也，“蝗”、“螟”其小名也。

用以上“大名冠小名”這一上古漢語結構的理論來看“皮桐”，可知，“桐”為大名，“皮”為小名，“皮桐”即“桐皮”。所以，“大皮桐”即“大桐皮”。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五十二病方》是早於《黃帝內經》的古醫書，內中保留着“大名冠小名”這種漢語的古老結構形式是很正常的；同時也說明它具有重大的文獻價值。

分析清楚了“大皮桐”實即“大桐皮”之後，我們即可從詞義的歷史演變發展的角度推斷出：“大皮桐”（大桐皮）實即“海桐皮”。理由是：海，本義指承受江河流水的最大的水域，《說文·水部》：“天池也，以納百川者。”至中古前期，其詞義便引伸演變出“大”義，《玉篇·水部》：“海，大也。”此義至今仍存，如“海碗”即“大碗”；“海量”即“酒量很大”（另指“度量很大”）也就是說，“海”之“大”

義最早見於梁顧野王《玉篇》，為“海”的後起義。有趣的是，檢古本草我們同時也發現，“海桐皮”《神農本草經》未見之，據《本草品匯精要·木部》（卷十九）載，此名也是最早見載於中古前期的《名醫別錄》。故我們可推知，因“海”至中古前期已有“大”義，同時，此時漢語早已不用“大名冠小名”這一結構形式，故人們遂稱“大皮桐”為“海桐皮”。

下面，我們再從藥的主治功用上來證明“大皮桐”即“海桐皮”。《證類本草·木部·海桐皮》（卷十三）引《開寶本草》曰：（海桐皮）“除”“疥癬”；又引《海藥本草》曰：（海桐皮）“主”“疥癬”。《本草綱目·木部·海桐》（卷三十五）：“海桐皮能行經絡，達病所，又入血分，及去風蟲。”並引《艾氏如宜方》治“風癬有蟲”方：“海桐皮、蛇床子等分，為末，以臘豬脂調，搽之。”以上所主，正與本方以“大皮桐”治“痂”（疥瘡）相符。故本方的“大皮桐”即“海桐皮”。

注釋

① 成都出版社，1992，第一冊，頁61

② 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頁381（語譯）“按語”。該書為馬王堆醫書研究之集大成者，代表當前馬王堆醫書釋讀之最高水平。

③ 字也隸作“漿”。為排印方便，下文所引《說文》此字均寫作通行體“漿”。

④ 上引《養生方》“近內而飲此漿一升”之“一升”，與此《本草綱目》“飲一升妙”之“一升”，各自所指的實際容量是不同的。上古的“一升”較之於中古、近代的“一升”，其所指的實際容量要少得多。據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考訂，西漢的“一升”（《養生方》為漢以前的佚醫書，此僅以西漢為計）合今之0.3425市升，明代的“一升”合今之1.0737市升。所以，本方所引的這前後兩條材料是不矛盾的，而是正相契合的，從而也進一步說明“再食漿”當如上所訓方是。

另，關於“載”當訓“酒”的證據，緊接着的下條“蕒載”還要談到，請互見。

⑤ “價”當作“賈”為是。

⑥ 上引書頁697、699。

⑦ 上引書頁594—595。馬書此段的“挺，杖也”，當作“挺，杖也”。《孟子》正文“挺”倒有誤作“挺”者（如閩本），但趙注卻無有作“挺”者。

⑧ 此字也作“𧈧”。

⑨ 上引書頁594 595。另，馬書引方的“韋”當為“葦”，可能是排印之誤。

⑩ 上引書頁573。

⑪ 還需要指出的是，古之“蝸、螺、贏”的意義，今人多未辨清，如江西新醫學院《中藥大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蝸牛”條，即將“蝸牛”與“螺”混為一談。

⑫ 儘管《本草綱目》分立之為二條，而在“田螺”條下卻又引了《千金方》以“螺蛳”治“風蟲癬瘡”之方（詳下文），這也說明螺之大者與小者之功用是相近的。

⑬ 上引書頁670。

⑭ 上引書頁633。

⑮ “江南言通”非《通俗文》語，當為玄應《一切經音義》語。

⑯ 通，幫母，職部，與“泚”、“澤”上古音是不能相通轉的。後世由於語言的演變，此三字方同音。故“江南言通”當是後世語音演變後的現象。

⑰ 上引書頁494。

⑱ 羅振玉語及有關“𧈧”與“虫”古為一字之說，詳見《甲骨文字集釋》卷十三“虫”、“𧈧”條，及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1988）卷十三“虫”、“𧈧”條。

⑲ 可見《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中華書局，1956，頁52。

從《奏讞書》看漢初軍功爵制的幾個問題

朱紹侯〈河南大學〉

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的竹簡《奏讞書》，保存了漢初有關刑獄司法的第一手珍貴資料，這對研究漢初的法律制度至關重要，但在《奏讞書》中也有一些簡文涉及到軍功爵制的問題，對研究漢初的軍功爵制，特別對研究劉邦時期軍功爵制的演變及實施情況，大有補益。下面僅就《奏讞書》中所涉及到的軍功爵制資料，談談漢初有關軍功爵制實施中的幾個問題。

一、爵級與官級的對比關係問題

關於軍功爵的爵級與官級的對比關係，秦漢時期前後變化很大。秦人重爵，有爵就有官，特別是在商鞅變法秦軍功爵制初建時期，爵級與官級是一種對等的關係。據《韓非子·定法篇》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按韓非子講的商鞅所建立的軍功賜爵制，實際是斬首級數與賜爵、任官的等級是三對等關係。很顯然這種“三對等制”是難以長期維持不變的。這不單純有如韓非子所批評的，斬首是憑勇力，當官是憑智能，讓有勇力的士兵，去當智能之官，就等於讓勇士去當醫生、工匠一樣的不合理。更主要的是勇士斬首是沒限量的，賜爵由於是榮譽頭銜，容量也大一些，但是，政府設官是有限量的，這就不可能斬多少敵首，就賜爵多少級，更不可能賜多少級的爵位，就任對等的官職。試問政府哪有那麼多的官位可安置呢？事實上到秦始皇末年，就出現了有爵無官，甚至有爵者也淪爲“居貲”服勞役的境地。根據秦始皇陵西側趙

背戶村出土的18件瓦文來考察^①，其中有12件瓦文記有“居貲”的身份。據筆者的研究，所謂“居貲”並不是刑徒，而是以勞役抵債的人^②。在這12件“居貲”的瓦文中，有11件記有爵位的名稱。計有：“東武居貲上造慶忌”、“東武（居貲）不更所資”、“東武東間居貲不更鵠”、“居貲用里不更余”、“楊民居貲公士富”、“楊民居貲武德公士契必”、“蘭陵居貲便里不更牙”、“鄒上造姜”、“居貲□□不更□必”、“貲……□……不更滕。”按上引瓦文統計，有爵者公士（一級）3人，上造（二級）2人，不更（四級）6人，總的來說這11人的爵位，都屬於低爵範圍，但它卻說明到秦始皇末年軍功爵制已經輕濫，有爵位的人已處於以勞役抵債的狀況，他們當然也就與官級毫無聯繫了。劉邦建漢，軍功爵的價值一度回升。劉邦在漢五年五月的《詔書》中宣稱：“軍吏卒會赦，其無罪而無爵反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反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其令諸吏普遍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③歸納起來，劉邦在詔書中宣佈了以下四種決定：一、凡是跟劉邦打天下的軍吏卒，原來沒有爵位或爵位不到大夫級者，一律賜予大夫爵（四級）；原有大夫以上爵的軍吏卒，再加爵一級。二、凡有七級公大夫以上爵位者，均享有食邑特權；七大夫以下，本人及其家享有免除租賦稅役特權^④；三、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應享受佔有一定數量田宅及其他特權，官吏應優先滿足其應得的要求；四、秦時公乘、七大夫以上可以與縣令、丞平起平坐。劉邦表示他對高爵也很重視，要求官吏優待高爵，使他滿意，否則將嚴厲處罰。

從劉邦漢五年五月《詔書》來分析，爵位與官級能掛上鉤的祇有一條，即“秦民爵公大夫以上與令、丞亢禮”，而講的還是秦代的事情。不過，《詔書》中還說“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講的則是漢初的事。既然七大夫、公乘以上都享受高爵待遇，說明軍功爵的價值

有所提高，但自惠帝時開始大規模賜爵^⑤，從此爵制分爲民爵和官爵，軍功爵制日趨輕濫，史書、漢簡均有資料可證，筆者已有專文論述^⑥，在此無須贅言。現在的問題是在劉邦時期，爵級與官級究竟是什麼關係？過去由於文獻無徵，很難說清楚；而在張家山出土的竹簡《奏讞書》中，記有劉邦時期爵制資料，使我們有可能窺見漢初爵級與官級對比關係的一斑。

已發表的《奏讞書(一)》記有十六個案例，所涉及到的各種人員，共83人次。即夷道令介、夷道丞嘉、男子毋憂、夷道尉富、發弩九、署獄史曹、江陵縣丞驚、大夫祿、婢媚、士伍點、胡縣令狀、胡縣丞臨、署獄史闌、女子南、大夫虞、人婢清、太僕公上無害、胡縣嗇夫、胡縣丞鼎(二見)、大夫旃、隱官妻女子符、大夫明、江陵縣令余、江陵縣丞驚(二見)、校長池、士伍軍、大奴武(已解放爲士伍)、求盜視、公大夫昌、奴相如、漢中郡守、北地郡守、女子甌、奴順、北地郡守(二見)、奴宜、戍卒官大夫有、蜀郡守、蜀郡佐啓、主徒令冰、城旦環、蜀郡守(二見)、城旦田、春士爲董、蜀郡佐憎、蜀郡守(三見)、大夫犬、大夫武、上造熊、河東郡守、郵人官大夫內、河東守(二見)、士吏賢主、大夫辨、獄史令賢、安陸縣丞令、五大夫獄史、大男子種、安陸國相、南郡守强、南郡守吉^⑦、江陵縣丞、醴陽縣令浹(秩六百石、爵左庶長)、從史石、舍人士伍興、舍人士伍義、南郡守强(二見)、南郡守丞吉(二見)、廷史建舍、淮陽郡守偃、新鄭縣令信(大庶長)、求盜甲、獄史武、大庶長^⑧公梁亭校長丙、大庶長髡長蒼、大庶長^⑨發弩贅、求盜大夫布、舍人簪裹余、舍人小簪裹造、舍人萊、新鄭縣令甲、新鄭縣丞乙、獄史丙等。如果從這十六個案件出場的83人次中，去掉8個重出、三出的人物，實際祇有75人。對這75人如果按社會地位分類，最高的有太僕行廷尉事，其次是郡守、郡佐，再次是縣令、縣丞、縣尉、獄史、縣嗇夫，再其次是亭史(校長、發弩、求盜)、舍人、卒吏、從史、郵人、主徒令史等，還有沒有爵位的男子和婦女、男女刑徒，最下層的則是男女奴隸，反映了漢代社會各階層、各階級的全部情況。在這75人中，關於有官職、爵位人的記載共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祇記官職，不記爵位。這並不是那些有官職的人沒有爵位，是因為祇記官職就足以表明他們的身份和地位，沒有必要再記爵位。說明漢初已是重官輕爵。第二種是祇記爵位如公大夫、大夫、上造等，這大概並不是他們有官職不記，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官職，這是漢初有爵無官實際情況的反映。第三種是既記官職，也記爵位。由於本題就是探討漢初官級與爵級的對比關係，故對這種類型要作詳細的分析。

在《奏讞書》的十六個案例中，既記官職又記爵位共有11人。即大夫求盜布、舍人管裏余、舍人管裏造、戍卒官大夫有、郵人官大夫內、獄史五大夫平、醴陽令秩六百石左庶長恢、新鄭令大庶長信、鬲長大庶長蒼、公梁亭校長大庶長(?)丙、發弩大庶長(?)贅。從以上的11例中，就可以斷定漢初的爵級與官級的對比關係，已是爵大於官，官重於爵了。

研究漢代爵級與官級的對比關係，很難找到具體的標準根據。《韓非子·定法篇》所說的“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的資料，雖然具體明確，但時間久遠，難以為據，且漢代鄉亭以下小吏又不明記官秩石數，無法核實，而《奏讞書》有很多低爵者，根本就沒有官職，也不需要核實。再有就是劉邦在漢五年五月《詔書》里講的“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與令丞亢禮”，所講也祇是公大夫與縣令丞一種對比關係，也難以類推其餘。現存唯一可以作為研究漢代官級與爵級對比關係的參考資料，就是漢元帝時公佈的後宮嬪妃的官級與爵級的對比制度。這一制度雖然祇適用於后官，但它必有所據，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根據秦及漢初劉邦繼承秦的官級與爵級的對比制度而制定的。為了研究的方便，現將元帝時后宮嬪妃的官、爵對比制度的原文照錄於下：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二十級）；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十九級）；俗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十六級）；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十五級）；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十三級）；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十二級）；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十一級）；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十級)；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九級)；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八級)；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⑤

從元帝時后宮嬪妃官級與爵級的對比制度看，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在“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之前，有官級與爵級的對比關係；在“五官視三百石”以後，祇有官級，沒有爵級，沒有官、爵對比關係，這是由於自惠帝大規模賜天下民爵之後，軍功爵制漸有官爵，民爵之分，改變了劉邦時期的“七大夫以上為高爵”的規定。改為五大夫以上是官爵，公乘(八級)以下是民爵，即通常所說的“民爵八級”。由此民爵與官爵沒有聯繫，故“五官視三百石”以後，沒有官、爵對比關係，是符合漢代軍功爵制的演變情況的。

根據元帝時嬪妃官級與爵級的對比關係，再與《奏讞書》中的官、爵對比情況，兩相對照進行研究，對漢初的官重於爵的問題，就更清楚了。如在元帝時后宮嬪妃的官、爵對比關係中，十六級的大上造就相當於真二千石(卿)級官，而在《奏讞書》的官、爵對比關係中，十八級的大庶長，祇有一人任六百石的新鄭縣令，還有一人任四百石的鬍長，還有一人任公梁亭校長、一人任發弩，都屬於有秩斗食的鄉亭小吏。我對公梁亭校長丙，發弩贅的大庶長爵位有懷疑，準備在下文中進行考辨，但僅以十八級的大庶長與六百石、四百石的官級對比，也顯得太低了。再如左庶長，在元帝嬪妃官、爵對比關係中，相當於八百石的官秩，而在《奏讞書》中，左庶長恆祇能任六百石的醴陽令。還有五大夫，在元帝嬪妃官、爵對比中相當於六百石級官秩，而在《奏讞書》中祇任縣吏級的獄史，至於擁有公大夫(七級)、官大夫(六級)、大夫(五級)、簪褭(三級)的人，或無官職，或任戍卒、郵人、求盜、舍人等職，都屬於有秩斗食之列，又無可比性，就不一一論列了。總之，從元帝嬪妃官、爵對比制與《奏讞書》中的官、爵對比關係兩相對照來研究，可以看出漢初軍功爵制也存在着輕濫的情況，當然這也不是否認漢初軍功爵制的價值有所回升的事實，祇是說明其價值回升的尺度，並不像劉邦在漢五年五月《詔書》中所說的那

樣高，值得注意的是，《奏讞書》中的十六個案例所發生的時間，是在漢六年至漢十一年之間，即都在漢五年《詔書》之後，這就充分說明，漢五年《詔書》所提出的提高有爵者待遇的諾言，並沒有認真貫徹執行，沒有完全落實。

二、軍功爵制與減罪、免罪、贖罪的問題

筆者在拙著《軍功爵制研究》中專闢一節論述“軍功爵制在秦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說明秦時因軍功事功而獲得爵位的人，可以享受四種優待：一、有當官為吏，乞燕子的特權；二、可以贖罪、減刑、免刑；三、可以免除親人為奴婢的身份；四、生活上的優待。以上四種優待，在兩漢時期，除乞燕子外，其他各項都不同程度地被延續下來，其中有爵者可以贖罪、減罪、免罪一條，也是有條件地延續下來了。如漢惠帝在一次詔令中宣佈：“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四年刑），皆耐為鬼薪、白粲（三年刑）。”^⑨意思是說，凡是有五大夫以上爵位、六百石以上的官吏，或皇帝知名的官吏，有罪應帶刑具入監獄者，可以不帶刑具在監外寄押；凡有上造（二級）爵位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被判為四年刑者，可減為三年。《後漢書·南蠻傳》則說：“其民（指少數民族）爵比不更（三級），有罪得以爵除”這是以爵贖罪。《漢官舊儀》還說：“秦制二十級爵，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以減，年五十六免；無爵為士伍，年六十乃免老，有罪各盡其刑。”^⑩這是說凡有一級以上爵位的人，有罪可以減刑，五十六歲就可以退役；沒有爵位的人，則按罪判刑，不減不免，年六十纔能退役。以上資料綜合起來，說明在漢代有爵位的人，可以享受贖罪、減刑、免刑及提前五年退役的優待，但劉邦時期對此執行的情況又如何呢？《奏讞書》也給我們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奏讞書》的十四、十五案例涉及到有爵者犯罪，可以“以爵賞免”的問題。下面先談十四案例。此案記的是漢八年（前199年）八月己未（十三日）安陸縣丞忠告劾五大夫獄史平藏匿“無名數”（脫離戶籍）的大男子種一個月，觸犯了“諸無名數者，皆令自占書名數，令到縣

道官，盈卅日（三十天），不自占書名數，皆耐爲隸臣妾，錮，勿令以爵賞免；舍匿者與同罪”的法令。這個法令的意思是說：凡是戶籍上無名（逃脫戶籍）的人，全都命令他們自報戶口，自此令到達縣道官府之日起，起三十天不自報戶口的人，一律罰爲隸臣妾（男爲隸臣，女爲隸妾），禁錮終身（即剝奪政治權力終身），不得以爵贖罪、免罪。窩藏逃離戶籍的人，與逃離戶籍的同罪。根據此令，五大夫獄史平因窩藏逃離戶籍的人，被罰爲隸臣，並不得以爵贖罪，免罪。

案例十五記的是漢七年（前200年）八月乙未（十二日）江陵縣丞揭發左庶長醴陽縣令（秩六百石）挾偷盜縣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賣後得金六斤三兩，錢一五千零五十，而觸犯了“盜賊值過六百六十錢，黥爲城旦，令吏盜，當刑者刑，毋得以爵減、免、贖”的法律，故醴陽令挾被判爲“黥爲城旦”（面上刺字後服四年徒刑），且不得以左庶長（十級）爵位減罪、免罪、贖罪。

通過以上兩個案例，從側面說明秦代的以爵減罪、免罪、贖罪政策，在漢初劉邦時期仍在執行，但有爵者不是犯任何罪都可以減、免、贖。由此可見，劉邦建國之初，由於人口逃亡，不入戶籍，國家的租稅賦役減少，爲了強迫逃亡人口重新入戶籍，以增加國家控制的人口，增加政府收入，也是爲了穩定社會秩序、發展經濟，而採取的嚴厲措施。同時也說明，漢初對貪污盜竊案的處理也非常堅決，凡盜賊超過六百六十錢，不論任何人，包括有高爵者在內，都嚴懲不貸。但有一個小節還應該交待一下，由於獄史平、醴陽令挾擁有五大夫、左庶長高爵，所以在結案時，必須由南郡守彊、南郡守丞吉、卒史建舍共同簽署，並上報廷尉，以示慎重，這是其他案件所沒有的手續。

通過《奏讞書》十四、十五兩個案例，可以看到，漢初的政治是比較清明的，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獄史平、醴陽令挾雖有實權和高爵，也一樣判罪服刑，這些對我們的現實似乎也應該有所啓示、借鑒。

三、劉邦施行過楚爵的問題

關於劉邦施行楚國的軍功爵制的問題，宋人王益之早已發現。他在《西漢年紀》卷二《高祖》的《考異》中說：“高帝初起，自稱沛公，

其官爵皆楚制（重點號為筆者所加），如左司馬、連敖之類是也。自入關，封，漢元年始用秦制。”應該說王益之對劉邦初起“其官爵皆楚制”講的非常清楚，但由於《西漢年紀》流傳不廣，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故比王益之稍晚的徐天麟^①，在撰寫《西漢會要·職官》時，對劉邦起兵後所施行的爵制，稱之為“舊爵”，而不知其為楚爵。筆者曾在《西漢初期對二十級軍功爵制的因襲和改革》^②一文中，曾專門論證過劉邦施行軍功爵制的情況，當時由於沒讀到《西漢年紀》，還誤認為是自己的“新發現”而沾沾自喜，其實是自己見識不廣的表現。王益之說劉邦初起兵時“其官爵皆楚制”，完全是從史書上得出來的結論（更準確地說是推論），筆者也是一樣，並沒有見過第一手原始資料。在《奏讞書》的十六案例中，終於找到了劉邦實行過楚爵制的實證。一六案例記載的是淮陽郡守偃追查新鄭縣令信謀殺獄吏武的案件。此案所涉及的人員有新鄭令信、髡長蒼、公梁亭校長丙、發督贅、求盜大夫布、舍人余等。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求盜大夫布、舍人余一死一逃，沒有結案，其餘四人信、蒼、丙、贅因犯謀殺人罪、殺人罪、縱囚罪，被判處死刑（棄市），在審案時，曾查過以上四人的身份，得知信、蒼、布、贅四人在楚漢戰爭中，因為漢堅守滎陽立過戰功，所以信被封為廣武君、蒼為壯平君、贅為威昌君，丙為五大夫，並說明“皆故楚爵，屬漢比士，非諸侯子。”意思是說以上四人因守滎陽而得的爵位，都是過去施行的楚國軍功爵制，並明言劉邦在改行秦制後，又比屬於漢的官制，他們都不是諸侯國的成員，是漢的舊部。

關於《奏讞書》證實劉邦施行過楚爵制問題，筆者已有專文論證^③，故在此不再贅言，下面僅就《奏讞書》一六案例中個別文字解釋問題，談點個人的管見。

“診問蒼、信、丙、贅，皆為關內侯。信有侯子居雒陽楊里，故右庶長，以堅守滎陽，賜爵為廣武君，秩六百石。蒼，壯平君，居鄭都隱(?)里；贅，威昌君，居故市里；丙，五大夫，廣德里……”

這段文字非常難解，其中有標點問題，也可能有衍文。1、“診問……”

關內侯”句。“診問”後應加冒號(：)，“關內侯”後的句號(。)應改為問號(?)。句子的結構應是：“診問：蒼、信、丙、贅皆為關內侯：診問的結果，四人中無一人是關內侯。2. “信有候子居雒陽楊里，故右庶長，以堅守滎陽，賜爵為廣武君，秩六百石”這段文字中的“有候子”三字，可能是衍文或誤釋。從上下文意分析，在這裏絕對不會提到信的兒子問題，所講應是信的情況。“故右庶長”可能指信在賜爵大庶長前的爵位，是漢爵不是楚爵。下面的“以堅守滎陽，賜爵廣武君，秩六百石”句，是追述前功，廣武君為楚爵。祇有這樣理解，這段文字的上下文意纔可以順理成章。3. “蒼，壯平君……贅，威昌君……丙，五大夫……”，是指蒼、贅、丙因堅守滎陽功，而獲得的爵位。壯平君、威昌君、五大夫都是楚爵，這和劉邦曾經實行過的楚爵制的爵名是完全一致的。

“敢言之，新鄭令信，髡長蒼謀賊殺獄史武，校長丙，發弩贅捕蒼而縱之，爵皆大庶長。”

這段文字中所講的大庶長，敝意以為是信和蒼的爵位，與丙、贅無關。理由：1. 從句子的結構上分析，其文的前半段講的是新鄭令信和髡長蒼謀殺獄史武的事，後半段是說丙、贅抓住蒼後又放了，因此“爵皆大庶長”是連指信、蒼的爵位，與丙、贅無涉；2. 從官級上看，也祇有新鄭令信和髡長蒼有可能獲得大庶長的爵位。新鄭令的官秩是六百石，髡長蒼筆者認為他是縣長的級別，按秦漢大縣為令，小縣為長的規定，髡長的官秩應為四百石。由於漢初爵制貶值，大庶長任六百石和四百石的縣令、長級的官職是有可能的。但是，丙、贅則不同，丙為公乘亭校長，贅為發弩（弩兵）均是亭吏，即屬於未入流的有秩小吏。以十八級大庶長的高爵，而任未入流的有秩斗食之吏，儘管漢初爵制貶值，也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以上兩點理由是可以成立的。祇是由於本人沒有見過《秦隸書》竹簡原件，對衍文、斷句方面的問題，不敢過於自信，所提出的見解，也祇能做為疑問，向專家、學者請教，並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注釋

- ①、見《秦始皇陵西側趙背戶村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 ②、詳見《許昌師專學報》，1982年第2期《“居貨”非刑名辨》，《軍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2頁—200頁。
- ③、《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
- ④、據《通典》卷三《職官十三》載成帝鴻嘉三年詔書也有“七大夫以上皆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的記載。查《漢書》卷十《成帝紀》無此詔，不知《通典》何所據而云然。根據史實考察，漢中期以後，爵制已經輕濫，七大夫不可能享有食邑特權，七大夫以下也不可能享受“復其身及戶勿事”的優待。
- ⑤、《玉海》卷一三四《官制》：“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
- ⑥、《軍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73頁—83頁。
- ⑦、南郡守丞吉，即南郡試用郡丞吉。秦漢任官有一年試用期曰守，一年後轉正曰真。
- ⑧、《漢書》卷九七上《外戚傳上》。
- ⑨、《漢書》卷二《惠帝紀》。
- ⑩、《漢官六種》（中華書局），53頁。
- ⑪、王益之與徐天麟均為南宋人，其生卒年史皆失載。我們祇知王益之為“淳熙丁未年（1175年）進士”，徐天麟為“開禧元年（1205）進士”，故斷定徐天麟稍晚於王益之。
- ⑫、《軍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51—53頁。
- ⑬、《劉邦施行過楚爵制已有實證》，《南都學壇》1994年第2期。

讀《孫臏兵法》札記

劉 桓

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大量竹簡，其中有失傳了一千餘年的《孫臏兵法》。這部著作，實為我國古代的重要軍事著作。

此書既為先秦古籍，頗見難於索解之處。個人初讀此書，偶有所得輒錄之。近年復見張震澤先生所著《孫臏兵法校理》^①（以下簡稱《校理》），迺又對舊作有所修改補充，而成此札記。因學識所限，必有謬誤不當之處，尚希讀者不吝賜教。

擒 龐 涓

吾將示之不智事

古時知、智二字可通用，不智事即不知事。《校理》謂“不智事猶言糊塗事。”則嫌不夠確切。雲夢秦簡南郡守騰文書：“惡吏不明法律令，不智事”，文中以“明”、“智”對言，“智”猶“明”也，故不智（知）事即不明事理。

於是段齊城、高唐為兩，直將蟻傳平陵

影本注釋：“段，疑當讀為斷。意謂將齊城、高唐二大夫帶領的軍隊分成兩部。”按段應是斷之假借字。《釋名》：“斷，段也，分為異斷也。”可為證。蟻傳亦見《墨子·備城門》。岑仲勉先生《墨子城守各篇簡注》釋之為“傳即附字，猶今之密集隊衝城”^②。《校理》謂“此二句主語自應是龐涓，句意正形容其忿急而無謀，犯了攻炎之忌。”甚是。

陳忌問壘

□□□，所以當殲也；發者，所以當俾倪也

影本釋發爲殲，《校釋》引《詩·秦風·小戎》“蒙伐有苑”，謂字作伐。按字亦作撥，《史記·孔子世家》：“會於夾谷，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袂矛戟劍撥，鼓譟而至。”索隱：“撥，房越切，音伐，謂大槊也。”發、撥、殲、伐四字古音相同，可以相通假。《校釋》據詩疏以爲伐是中等大小的盾，可備一說。

□去守五里直候，令相見也，高則方之，下則員之，夜則舉鼓，晝則舉旗

直候，影本注釋讀爲置候，意即設置哨兵，當是。高、下猶言上、下，古書如《老子》常以“高”、“下”相對爲文，即此意。此處“高則方之，下則員之”，《校理》說“此二句似謂候人所使用之信號有方有圓，用易識別”，說頗迂曲難通，此蓋謂哨所形狀上方下圓。“夜則擊鼓，晝則舉旗”，猶《孫子·軍爭》：“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耳目也。”

行 纂

貨多則辦，辦則民不德其上

《校理》注：“辦同辦，治也，成也。貨指錢財。言民錢貨多則事皆辦成，無求於上，故‘民不德其上’”。今按，辦亦通辦，應讀爲徧。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徧”字下引顧炎武說：“經文言辦者非一，燕禮注今文辦皆作徧，是也。”辦、辦皆通徧，普遍也。

官 一

制卒以周閭，授正以鄉曲

此二句相對成文。“制卒以周(州)閭”，其意與《左傳·僖公十五年》載晉國“作州兵”相近。正，指官長，《爾雅·釋詁》：“正，長也。”鄉曲，司馬遷《報任安書》：“長無鄉曲之譽。”影本謂：“此二句

意謂按地方行政組織編制士卒，任命軍中官吏。”《校理》說：“謂編隊授官，都按鄉里關係”，皆是。

因險解谷以二遠

因險，《校理》謂“當指敵人據險，不可猝攻，則制其出入，不令活動。”恐不可信。銀雀山竹簡《尉繚子》云：“因險者毋（無）戰心。”便罷以雁行，險厄以雜管

按便罷，險厄皆指地形言。便罷應讀偏陂，馬王堆漢墓所出帛書《老子》甲本“是以便將軍居左”，“便”字今本作“偏”。罷與彼相通，《老子·十二章》：“故去彼取此”，帛書甲本“彼”作“罷”。此處罷當假爲陂。《說文》：“偏，頗也。”頗、陂音同。《書·洪範》：“無偏無陂”以偏、陂對言。《說文》：“陂，阪也，一曰沱也。”《釋名》：“山旁曰陂，言陂陀也。”偏陂是聯綿詞，或作偏頗，本指山旁不平之地。雁行，參看《十陣篇》：“雁行之陣者，所以接射也。”險厄，參看《八陣篇》：“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險厄指險要阻塞之地。《淮南子·兵略訓》作“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用弓，隘則用弩”。焱凡振陣，所以乘疑也。

影本注釋爲：“焱凡振陣，疑當讀爲颯風振塵。”《校理》讀爲“颯風震陣”。除“風”字讀法可商外，當以後說可取。今按凡讀爲風，雖音釋可通，却從未見其例。焱凡應讀爲焱盤，甲骨文“凡庚”即“般庚”，凡、般、盤古時音同可通。《爾雅·釋天》：“扶搖謂之焱”，注：“暴風從下上也。”故此二句喻以颯風盤旋之勢震撼敵陣，乘敵疑惑而猛擊之。

檠鬣藩薄，所以玄疑也。

影本注釋謂檠即檠，鬣爲鬣，均是。藩薄，《校理》謂是“以草木爲籬落障蔽也”，恐非是。按，《呂氏春秋·觀表篇》：“綠圖幡薄從此生矣。”高誘注：“幡亦薄也，鍛作鐵物，言薄令藩也。”楊樹達先生《積微居讀書記》說：“綠圖幡薄蓋豫言人世禍福之書，如秦時‘亡秦者胡’及東漢初赤伏符之類，高注不可解”^⑤。從文意推斷，藩薄即幡薄，正“豫言人世禍福之書”之類。玄疑，即玄疑。《荀子·

正論篇》：“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備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楊注：“玄與眩同，謂幽深難知。”是其意。玄疑、疑玄，其義一也。

十 問

交和而舍，適人氣衆以強，至是以剛，兑陳以胥，獻之奈何

影本釋氣爲既，至爲勁，皆是。唯釋兑爲銳，非是，《校理》亦沿此誤。按，兑有聚義，《荀子·議兵篇》：“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兑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延，兑相對成文。楊倞注：“兑猶聚也，讀與隊同。”延謂隊伍之延展成陣，兑則指隊伍聚集而成陣。兑字的這一用法還見於甲骨卜辭，如“王兑田”即指殷王聚隊而田獵。讀兑爲銳實不可通。

五名五恭

二曰軒驕

影本注釋謂軒驕“當是高傲或驕悍之意。”《校理》將軒驕的軒釋爲車前高爲本義，引伸爲飛、舉等義。“軒驕，蓋指志意高傲，飛揚跋扈。”今按軒驕即宣驕，《詩·小雅·鴻雁》：“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楊樹達先生認爲宣亦驕意，當讀爲奎^④，說當是。

夫威強之兵，則詘更而待（待）之

按，更以讀懦爲是。更、懦古通用。如馬王堆漢墓古佚書《經法篇》：“岐行喙息，扇蜚更動”，《淮南子·原道篇》作：“歧行喙息，蜚飛蠕動”，更既通蠕，亦可通懦。威強，詘更義正相反。《校理》讀更爲軟，不可從。

〔兵 失〕

禽（食）而廉，龍而敬，弱而強，柔而〔下缺〕

《校理》讀龍爲寵，謂寵有驕義，驕與敬正相反。按，禽、廉，龍、敬，弱、強皆相對成文，“柔而”後《校理》補一“剛”字，亦

相對，當是。但敬之反義非寵，字當讀弄。《詩經·商頌·長發》：“何天之龍”，鄭箋讀龍為寵，《老子·十三章》：“寵辱若驚”，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寵”作“弄”，是龍、寵、弄古時通用之證。古器物中有“弄器”，《說文》：“弄，玩也。”“玩，弄也。”以玩、弄二字互訓。《漢書·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可知弄有玩弄、侮弄之意，正與敬意相反。

〔將 德〕

賞不榆（逾）日，罰不覈（還）面

《校理》謂：“覈、還通旋。旋面就是轉臉。不旋面，言其疾速”。釋義得之，但不必以覈、還通旋作解。《國語·周語下》：“晉孫談子于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韋昭注：“睛轉復反為還也。”轉眼謂之還，轉面（臉）亦可謂之還。

將 失

八曰，師懷，可敗也

《校理》：“懷謂懷念鄉土”。所釋非是。《左傳·宣公二年》：“我之懷矣”，杜注：“懷，戀也。”又《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懷與安，實敗名。”懷指貪戀享受，非僅懷念鄉土也。

廿曰，多幸，衆怠，可敗也

本書《八陣》說：“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幸字用法相同，意為微幸。《校理》謂“幸猶言偏愛”，失之。

〔雄牝城〕

軍食汜水者，死水也，可毆（擊）也

本書《地葆》云：“不留（流），死水也”。《方言》卷三：“澗、洼，洿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汜。”《說文》：“洿，水濁不流也。一曰窰下。”則汜應指不流動的死水，溼地之積水自應屬之。

〔積 疏〕

徑（徑）勝行

《枚理》就影本注釋：“徑，小路，捷徑。行，大道。”認為“捷徑勝大道，固已難解，下文‘徑行相為變’更為難通，小路和大道如何轉化乎？”今按《論語·雍也》：“行不由徑”，《老子·五十三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大道”即是“行”，實仍以“行”、“徑”相對而言。行是大道，徑是小路，抄小路比大道便捷，故有“徑勝行”之語。至於“徑行相為變”，則謂徑可以變為行，行可以變為徑，逆是隨着客觀形勢而發生的變化。

〔奇 正〕

故有刑（形）之徒，莫不可名

春秋戰國時期刑名概念的影響頗廣。《孫子·兵勢篇》：“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馬王堆漢墓古佚書《十六經》：“欲知得失，請必審名察刑（形）”，《戰國策·趙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

注 釋

①·張震澤《孫臏兵法枚理》，收在《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年。

②·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第4頁，中華書局，1958年。

③·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279頁，中華書局，1962年。

④·同③書70頁

讀銀雀山漢簡《三十時》

李 零（北京大學中文系）

數術書在古代是“流行讀物”，出土簡帛多有之，銀雀山漢簡也不例外。但這批漢簡是以吳、齊兩種《孫子》著稱，數術書排在最後，出版最慢，20年過去，正式整理本仍未公佈，現在我們祇能利用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下簡稱“吳書”）中按出土號排列、未經拼聯的簡文試做討論。

這裏我想先對銀雀山數術書做點介紹，然後着重分析一下其中的《三十時》。

一

銀雀山數術書在“吳書”中是列入“陰陽時令占候之類”，共包括12種：

（一）《曹氏陰陽》。篇題存，是曹氏所授的一種陰陽書。內容是講天地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丘陵、年月日時）和萬物（草木、鳥獸蟲魚、五穀六畜、人）的陰陽，以及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生相克，互為德刑的關係。曹氏其人，於史無可考。

（二）《陰陽散》。篇題存，僅存二簡，簡0505為書題，簡0684作“陽散，有死之徒也”，大約是講陰散為生、陽散為死一類內容，蓋亦古陰陽書之一種。

（三）《禁》。篇題存，是按陰陽五行講四時禁忌。如簡文說“故守國無禁，必傷於民。土無禁則年不長，木無禁則日體短，火無禁則勿（物）

不絳(豐),金無禁則筋[□□水無禁則□□□□]”(簡0331、0339),規定“春毋伐木……,夏毋犯火……,秋毋犯金……,冬毋犯水……,陽毋犯鳥……,陰毋犯獸……,雨毋犯蟲……”(簡0206、0619),〔定春□□,……,毋以〕圖衆舉斧柯伐木;若以舉斧柯伐木,其鄉曲碎。定夏大暑,蚤治,毋以聚衆鼓廬(爐)樂(鑼)金;若以聚衆鼓廬(爐)樂(鑼)金,遺大玄,國臺廟將有焚者,君大堵玄焉。定秋下霜,……毋以聚衆鑿山出金石;若以聚衆鑿山出金石,賢人死,哲士亡。定冬水困,血氣董滯,毋以聚衆夫(決)囹圄澤通水;若以聚衆〔決川利澤通〕水,其鄉曲碎。定夏大暑,蚤治,毋以聚衆鑿(鑿)土;若以聚衆鑿土,是謂攻氣,國大碎。定冬水冰,血氣董凝,毋以聚衆鑿土,若以聚衆鑿土,是謂攻臧(藏),國大碎”(簡1929、0365、0609、1503、3476、2008、3406、3487、3421、3037、0980、0348、0342)。簡文所說“定春”、“定夏”、“定秋”、“定冬”,綴以“□□”、“大暑”、“下霜”、“水冰”,從竹當節氣看,相當季春、季夏、季秋、季冬。作者是以木、火、金、水配四時,並把土行之忌安排在季夏和季冬。其書應屬時令曆忌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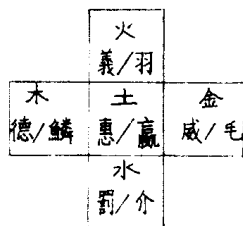
(四)《三十時》。篇題存,是一種以6日爲一節,12日爲一時,分一年360日爲“三十時”的時令書,詳下討論。

(五)《〔迎四時〕》。篇題是補加,篇幅很短,內容是講天子於東、南、西、北四堂分迎四時,形式與《月令》等書常講的天子春居青陽,迎春於東郊;夏居明堂,迎春於南郊;秋居總章,迎秋於西郊;冬居玄堂,①迎冬於北郊相合。其書應屬古“明堂月令”之說。

(六)《〔四時令〕》。篇題是補加,篇幅很短,內容是講“天子出令”,命“四輔”(東輔、南輔、西輔、北輔)“入御令”,授時於民,定其宜忌。“四輔”見於《書·洛誥》,無說,秦漢儒者定爲疑、承、輔、弼四職(《尚書大傳》、賈誼《新書》)。此書以“四輔”配四方,蓋亦古“明堂月令”之說。

(七)《〔五令〕》。篇題是補加,篇幅很短,是以德、義、惠、威、罰“五令”與鱗(當木行)、羽(當火行)、羸(當土行)、毛(當金行)、介(當水行)“五蟲”相配,講五行生克和陰陽德刑。(如簡文說“故

德令失則羽蟲爲災，義令失則毛蟲爲災，惠令失則羸（羸）蟲爲災，威令失則介（介）蟲爲災，圖（令失則鱗蟲爲災）”（0732.0819.2003），就是按五行相生之序排列（木生火，火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但土生土）。而簡文說“〔鱗蟲爲〕災則發罰令，界（介）蟲爲災則發義令，羽蟲爲災則發威令，此順天道”（簡0235）則是以德、義爲陽爲德，威、罰爲陰爲刑，兩兩相克。另外，簡2475提到“羸（羸）蟲爲災則發德令”，則是講介於這兩類的土行之令（圖一）。



（八）《〔不時之令〕》。篇題是補加，篇幅很短，內容是講不順令合時會帶來什麼凶咎，屬於古災異之說。它把一年的四時十二月，每個季節分爲“六時”，於各個季節歷述“一不時”至“六不時”有何災變，可見是用二十四節氣。

（九）《〔爲政不善之應〕》。篇題爲補加，篇幅很短，內容是講爲政貪暴、苛擾百姓會帶來什麼凶咎，亦古災異之說。如簡0292“爲正（政）壹暴則胞，再則如塊（丸），三則盈握，四則穿屋，五則如杞，六則兵作，七則君碎”，格式率多如此。

（十）《〔人君不善之應〕》。篇題爲補加，篇幅很短，內容是講人君驕奢淫佚、荒怠政事會帶來什麼凶咎，亦古災異之說。如簡0247、0786，“人君好垂廬（爐）蒙，撫金廬（爐），反山破石。曆（歷）二時，五穀椅橋；曆（歷）四時，天火焚臧（藏）；曆（歷）六時則林有口者矣；曆（歷）八時而國亡”，簡0171“……□□□爲男爲女，處君三年而國亡”，疑“二時”者半年，“四時”者一年，“六時”者一年半，“八時”者二年，皆“三年”以下之應，其最高限是三年。參《三十時》簡2516“卒歲必有死亡之憂”，簡2159“不出三年，必有死〔亡之罪〕”。

(十一)《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篇題存，是一種風角五音之說。其中“八風”是指與“四方八位”相配的八種季節風，即所謂生風、柔風、弱風、周風、剛風、暫風、大剛風、凶風（從東、東南到北、東北順數）。大體合於《靈樞經·九宮八風》及《五行大義·八卦八風》引《太公兵書》所記，“五音”則指與“五行”相配的宮、商、角、徵、羽五個音階，以及與“五音”相應的宮風、商風、角風、徵風、羽風。全書是按風角五音講用兵的主客形勢之便，屬於古兵陰陽說。古代用兵與推律有關，所謂“師出以律”（《易·師》）、“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褚先生補《史記·律書》。《律書》原名《兵書》）。銀雀山漢簡中的兵陰陽書，除去此篇，還有收入“論政論兵之類”的《地典》。②二書一講“天時”，一講“地利”，都是研究古兵陰陽說的寶貴資料。

(十二)《[占書]》。書題是補加，內容是講祲祥（暈、彗、反景、孛蝕、星月并出、星貫月等）和分野，與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接近。傳世古書如《開元占經》和《乙巳占》等書也有不少這類內容。

這十二種古書，（一）（二）兩種為一類，即整理者所謂“陰陽”；（三）至（七）為一類，即整理者所謂“時令”；（八）至（十）為一類，是講災異，從類名看不出；（十一）是兵陰陽書，似應歸入“論政論兵之類”；（十二）即整理者所謂“占候”，也與災異有關，嚴格講是屬於漢代數術家所謂的“星氣”。③

銀雀山漢簡，各類古書往往有篇題木牘伴出。其四號木牘有殘存文字，是作：

……	陰□散	□言
□□	□	□子
曹氏	禁	
……	□	

木牘上的10個篇題，就是上述簡文的目錄（但可能不包括（十一），並且（五）與（六）或（九）與（十）原來也許是一書），其中《曹氏》即簡文中的《曹氏陰陽》，《陰□散》即簡文中的《陰陽散》，《禁》即簡

文中的《禁》，餘無可考。

這批簡文，過去祇有羅福頤先生做過簡略介紹，^④ 近來則有饒宗頤先生考證《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⑤ 加拿大學者葉山(Robin D. S. Yates) 試做英譯^⑥。另外，我在《中國方術考》中也偶有涉及^⑦。看來可以開掘的地方仍很多。

二

下面，我想選擇上述“時令”類五書中篇幅最長，內容也最重要的《三十時》做一點探討。

關於中國古代的時令書，過去我們曾指出，它是分為“四時時令”和“五行時令”兩個系統^⑧。前者是按四分的系統，把一年360日(12個朔望月)平均分爲四時，每時分爲6個節氣，每個節氣各含15日，見於《漢書·律曆志下》，^⑨ 即後世農曆沿用的二十四節氣。後者是按五分的系統，把一年360日平均分爲五行，每行各含6時72日，則見於《管子》一書的《玄宮》、《玄宮圖》和《五行》等篇，^⑩ 後世不傳，古人稱爲“三十時節”。我們這裏要談的《三十時》就是與《管子》這些篇屬於同一系統，形式相近，可以相互比較，相互發明。

爲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先把“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列表比較如下：

四時	順序	三十時節		二一四節氣
春	1	地氣發(正)	春	1 立春(正)
	2	小卯(正)		2 雨水(正)
	3	天氣下(正二)		3 驚蟄(二)
	4	義(養)氣至(二)		4 春分(二)
	5	清明(二)		5 清明(三)
	6	始卯(三)		6 穀雨(三)
	7	中卯(三)		
	8	下卯(三、四)		

四時	順序	三十時節		二十四節氣
夏	9	小鄧(盛)(四)	夏	7 立夏(四)
	10	絕氣下(四)		8 小滿(四)
	11	中鄧(盛)(五)		9 芒種(五)
	12	中絕(五)		10 夏至(五)
	13	大暑至(五、六)		11 小暑(六)
	14	中暑(六)		12 大暑(六)
	15	小暑終(六)		
秋	16	期(朗)風至(七)	秋	13 立秋(七)
	17	小酉(七)		14 處暑(七)
	18	白露下(七、八)		15 白露(八)
	19	復理(八)		16 秋分(八)
	20	始前(八)		17 寒露(九)
	21	始酉(九)		18 霜降(九)
	22	中西(九)		
	23	下酉(九、十)		
冬	24	始寒(十)	冬	19 立冬(十)
	25	小榆(十)		20 小雪(十)
	26	中寒(十一)		21 大雪(十一)
	27	中榆(十一)		22 冬至(十一)
	28	寒至(十一、十二)		23 小寒(十二)
	29	大寒之陰(十二)		24 大寒(十二)
	30	大寒終(十二)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二者既有對應關係，又有不少差異，甚至存在很大矛盾。“二十四節氣”，支撐點是“分、至、啓、閉”(《左傳》僖公五年)，“分”是“春分”、“秋分”，“至”是“夏至”、“冬至”，“啓”是“立春”、“立夏”，“閉”是“立秋”、“立冬”(案：“啓”、“閉”於式的圖式當天、地、人、鬼四門，正是象其門戶開閉之義)。其他節

氣可分三類，一類是取物候爲名，如“雨水”、“驚蟄”、“白露”、“寒霜”、“霜降”、“小雪”、“大雪”；一類是取風氣爲名，如“清明”爲風名（《淮南子·天文》的“八風”是以“清明風”爲東南風），“小滿”是陽氣開始滿盈之義，“大暑”、“小暑”、“處暑”是暑氣之別，“小寒”、“大寒”是寒氣之別；一類是取農時爲名，如“穀雨”、“芒種”。“三十時節”，支撐點是“卯酉”、“寒暑”。“卯酉”是“二繩”（子午綫和卯酉綫）中表示東西方向的橫軸，代表“春秋”。“始卯”略當春分，早於“始卯”有“小卯”，晚於“始卯”有“中卯”、“下卯”；“始酉”略當秋分，早於“始酉”有“小酉”，晚於“始酉”有“中西”、“下酉”。這套節名是一組。另一套是“寒暑”。“寒暑”是寒氣和暑氣，相當“二繩”中表示南北方向的縱軸，代表“夏冬”。“夏至”叫“大暑至”，早於“大暑至”有“小鄧”、“中鄧”，是表示陽氣初滿和中滿（“鄧”讀爲“盈”，“小盈”即“小滿”），⑩“絕氣下”和“中絕”是表示陰氣初絕和中絕，爲配套概念；晚於“大暑至”，“中暑”、“小暑終”是表示暑氣漸衰（相當二十四節氣的“大暑”、“小暑”）。“冬至”叫“寒至”，早於“寒至”，“始寒”、“中寒”是表示寒氣初起和漸盛，“小榆”、“中榆”疑是“小肅”、“中肅”之誤，指殺氣初起和漸盛，也是配套概念；晚於“寒至”有“大寒之陰”和“大寒終”，是表示寒氣漸盛（相當二十四節氣的“小寒”、“大寒”）。二十四節氣的暑氣是從大到小，寒氣是從小到大，三十時節也是如此。剩下的時節，有些也是取風氣爲名，如“地氣發”即《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的“地氣上騰”；“天氣下”即《呂氏春秋》十二紀孟春的“天氣下降”，“養氣至”疑是“養氣至”之誤，“養氣”與“殺氣”是對應概念；“清明”亦指“清明風”；“期風至”疑是“朗（涼）風至”之誤（《淮南子·天文》的“八風”是以“涼風”爲西南風）；“復理”疑指陰氣復起。作爲物候名，比較明顯祇有“白露下”。農時名則未見。

這兩種時令系統，節氣時點必然有對應關係，但它們因劃分方法不同，卻存在很大矛盾。首先，二十四節氣是按四時劃分，三十時節是按五行劃分，四、五無法通約，本身就無法套合。其次，若是硬要套

合，情況也必然很别扭。例如四時時令雖然也配五行，但古人於這一時令系統通常是以春、夏、秋、冬配木、火、金、水，一對一的結果是沒有給土行留下餘地；一定要把土行加進來，祇能把土行置於季夏或季秋（一如五行時令所安排）^⑧，這不但等於憑空加進一段，而且會同火行、金行重疊。而五行時令配四時，情況也同樣麻煩，因為三十時節四分的話根本除不盡，平均數是7又1/2，即使把春、秋拉長一點，定為8個時節，冬、夏縮短一點，定為7個時節，也是沒法與五行對號入座，每個季節都必然跨着五行中的兩個。

三

銀雀山漢簡《三十時》，從大的系統上講，應屬上面講到的“五行時令”，同《管子》的“三十時節”性質相近，但它們在形式上和細節上仍有一定差異。通過排比簡文，我們把它所描述的“三十時”也列成表格，並把排比的依據附注於表後，以便檢驗。《三十時》屬“五行時令”，其系統可列表於下：

五行	四時	十二月	積時積日	時節名	氣名及其它
木	春	春一月	4時48日	作春	始解〔1〕
			5時60日	少受	起生氣〔2〕
		春二月	6時72日	乃生	生氣也〔3〕
			7時84日	華實	生氣也〔4〕
			8時96日	—	——〔5〕
		春三月	9時108日	□□	生氣也〔6〕
火	10時120日		中生	生氣也〔7〕	
	11時132日		春沒	上六割、下文生〔8〕	
	夏一月	12時144日	始夏	生氣也〔9〕	
		13時156日	瀆/絕氣	柔氣〔10〕	
	夏二月	14時168日	音	閉氣也〔11〕	
		15時180日	中絕	——〔12〕	

接上頁表格					
土	夏三月	月	16時192日	夏至	—— {13}
			17時204日	——	盛氣也 {14}
			18時216日	夏沒	上六生，下六刑 {15}
金	秋一月		19時228日	(作秋) 涼風	殺氣也 {16}
			20時240日	——	—— {17}
			21時252日	肅(白)洛(露)	—— {18}
	秋二月		22時264日	——	—— {19}
			23時276日	霜氣	殺氣也 {20}
			24時288日	秋亂	生氣也 {21}
	秋三月		25時300日	——	—— {22}
		26時312日	秋沒	上六生，下六刑 {23}	
冬一月			27時324日	始寒	剛氣也 {24}
			28時336日	賊氣	殺氣 {25}
		29時348日	[中寒]	—— {26}	
火	冬二月		30時360日	——	—— {27}
			1時12日	冬至/大寒始隆	—— {28}
	冬三月		2時24日	大寒之隆	剛氣也 {29}
			3時36日	冬沒	上六刑，下六生 {30}

表注(簡文“焉”往往作“少”，下一律作“焉”；重文也一律直接按兩字錄寫)：

- {1} 據簡0669“(·四時)，卅八日，作春，始解，可使人勞國……”。
- {2} 據簡1743“(·五時六十日，少受，起生氣……”。
- {3} 簡760、4790：“……廿四日(日)，乃生，生氣也。以戰，客敗。得人之一里賞(償)以十里，得人之將賞(償)以長子……”，疑述“作春”後24日事。
- {4} 據簡1227“(·七時，八十)四日，華實，生氣也。以戰，客敗，可……”。
- {5} 缺，相當二十四節氣的“春分”，《玄宮》作“清明”。
- {6} 據簡2543“(·九時)，百八日，□□，生氣也。以戰，客敗，不可……”。
- {7} 據簡2355“(·十時，百廿日，中生，生氣也……”。
- {8} 據簡2608、0243“(·卅六)日春沒。上六刑，以伐，客勝。下六生，以戰，客敗。不可以舉事，事成而身廢，吏以(已)免者不復置。春沒之時也，可謀”。“卅六”是參簡1682“夏沒”條補。“春沒”在“春分”36日後。

“上六刑”、“下六生”，是指此12日前6日爲“刑”，後6日爲“生”，陰衰陽起。

[9] 據簡1959“〔·十〕二時，百卅四日，始夏，生氣也……”。

[10] 據簡1385“〔·十三時，百〕五十六日，瀆，柔氣。以戰，客敗……”。又簡0785提到“絕氣、中絕、帛(白)洛(露)、霜氣”，應是時節名。《玄宮》列“絕氣”於此，似即“瀆”之別名。

[11] 據簡1931“〔·十四時，百六十八日，音，閉氣也。民人居……”。

[12] 簡0785提到的四個時節名內有“中絕”，《玄宮》列“中絕”於此。

[13] 據簡1977“〔·十六時，百九十二日〕，……也。日夏至，地成，不可……”。

[14] 簡0927：“……盛氣也。以戰，客敗，不可攻回(圖)，可爲百丈千丈、冠帶劍……”疑當此時。

[15] 據簡1682“……卅六日，夏沒。上六生，下六刑。可爲晉夫……”。“夏沒”在“中絕”36日後。“上六生，下六刑”，與“春沒”相反。

[16] 簡0240：“……〔四〕時卅八日，涼風，殺氣也。以戰，客勝。可始脩(修)田野溝，可始入人之地，不可垂刃，垂刃有央(殃)，壹得而三其央(殃)，利奮甲於外，以嫁女”。“涼風”在“中絕”48日後，相當《玄宮》的“期(朗)風至”，於二十四節氣爲“立秋”。簡文“立春”作“作春”，“立秋”自宜相應作“作秋”。“涼風”蓋“作秋”之別名。

[17] 缺。

[18] 簡0785提到的四個時節名內有“帛(白)洛(露)”，《玄宮》列“白露”於此。

[19] 缺。

[20] 據簡0372“……〔八〕時九十六日，霜氣也，殺氣也。以戰，客勝。攻城不取，邑疫，可以回(圖)衆絕道，逼人要塞，可以爲百丈千丈城，攻敵人之地”。“八時”亦接“中絕”而數。簡0785提到的四個時節名內也有“霜氣”。二十四節氣於此爲“秋分”，“霜氣”蓋“秋分”之別名。

[21] 據簡0372“……〔九〕時百八日，秋亂，生氣也”。“九時”亦接“中絕”而數。

[22] 缺。

[23] 據簡2272、0789、0924“……〔卅六日〕，秋沒。上六生，以戰，客敗。可爲晉夫，嫁女取婦，禱祠。下六刑，以戰，客勝。以入之地勝，不亟去後者且及吏，以辟(避)舍不復……”。“卅六日”是參簡1682“夏沒”條補，“秋沒”在“霜氣”36日後。

[24] 據簡1203、0383“……不可以立，此朝開莫(暮)閉之時也。始寒，剛氣也，以戰，客勝，用入人之地勝，攻城城取。此冬首殺也，此吾……”。

[25] 據簡 2718 “……(十三) [圖] 百五十六日，賊氣，殺氣……”。“十三時”亦接“中絕”而數。

[26] 缺。《玄官》列“中寒”於此，“中寒”是與“始寒”、“大寒”、配套的概念，據捕。

[27] 缺。

[28] 據簡 1728 “[·一時，十] 二日，大寒始隍，日冬至，口……”。“大寒始隍”是“冬至”的別名。隍，不識，疑是隍(昇)字的異寫。

[29] 據簡 1698 “[·二時廿] 四日，大寒之隆，剛氣也。不可爲……”。《玄官》列“大寒之陰”於此，據簡文，“陰”可能是“隆”字之誤。

[30] 據簡 3087 “……冬沒氣，此欲……”，又簡 0947 “……焉耆夫，多罪不可用。下六生，可以嫁女取婦……”，疑“焉”字上缺文作“卅六日，冬沒。上六刑，可”，同上“春沒”、“秋沒”各條。

四

簡文除“三十時”的續時續日、節名氣名，還講到以下幾類內容：

(一) 各時節的物候

往往可與《夏小正》、《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四民月令》等書對照參看。如簡 4865 “凍(凍)始澤”，《夏小正》：“正月：……寒日滌凍塗。滌也者，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多也。”《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簡 0683 “桃李華，食榆莢(莢)”，《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四民月令》：“二月：……是月也，榆莢成……”；簡 0955 “燕始下”，《夏小正》：“二月：……來降燕……”，《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鳥至……”；簡 1419 “木莖(槿)華”，《月令》：“仲夏之月：……木莖(槿)榮……”；簡 2210 “蜩(蟬)鳴”，《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唐蜩鳴……”，《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簡 2102 “霜零(露)下”，《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霜始降……”；簡 0273 “西風始下葑(葉)”，《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草木黃落……”；簡 0749 “以入蟄虫”，《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簡 0917 “雉(鵲)居巢”，《月令》：“季冬之月：……鵲始巢……”。

(二) 各時節的宜忌

有不少是表示選擇事項的套語，爲古日者之書所通用，如“嫁女取婦”、“冠帶劍”、“爲嗇夫”、“禱祠”、“鼓舞”、“葬埋、分異、祓除”、“徙”、“出（或入）人民六畜”、“出（或入）貨”、“爲土功”、“爲宮室”、“爲門”、“修闢閉、鑄管鑰”、“築垣牆”、“爲道梁”、“瀆溝洫陂池”、“發梁通水”、“爲百丈千丈城”、“鑄劍戟兵刃器”、“築武室、塞故關”、“攻（或入）敵人之地”、“圍衆絕道、遏人要塞”、“攻圍”、“居軍靜衆”。還有一些則是與節令相適的特殊規定，可與《夏小正》、《月令》一類書對照，如簡2414“脩（修）封四疆（疆）”，《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簡1005“祠者毋以牝”，《月令》：“孟春之月：……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簡4862“狸（埋）白骨”，《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簡0270“當殺蒼莢、薺、亭歷（歷）之時也”，《月令》：“孟夏之時：……靡草死……”，注：“舊說云：靡草、薺、亭歷之屬”，《四民月令》：“四月：……收蕪菁及芥、亭歷、冬葵、蓂若子”，簡2200“當麻叔（菽）第災（栽）〔之時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四民月令》：“五月：……時雨降，可種胡麻。先後日至各五日，可種禾及牡麻。先後各二日，可種黍。……”，簡0966“當薺采（菜）薺（漂）麻、取薺〔之時也〕”，《月令》：“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後者多與采獵耕牧等生產事宜有關。

(三) 相應的鐘律

可參照《月令》等書排列如下：

(1) 太簇。簡0050：“……金，殺人不報，日夜分離之物也，簇（葬）狸（埋）、分異、芟（祓）除。入之三日，奏大（簇）……”，當春一月。

(2) 夾鐘。缺，當春二月。

(3) 姑洗。簡2436：“……畫三日，奏古（姑）洗。精列登堂……”，當春三月。

(4) 仲呂。缺。當夏一月。

(5) 蕤賓。簡0248：“……〔禱〕祠。入之三日，奏蕤賓。天不陰雨不吉利，有入也，麥秋苗生”，當夏二月。

(6) 林鐘。簡0306：“……之，可以嫁女，不可取婦，取婦蚤（早）操令。下六可爲宮室、嫁女取婦、禱祠、入六畜。入之三日，奏林鐘。天必”，當夏三月。

(7) 夷則。簡0890：“……不鳴水。入之一日，趣（奏）夷則。天不陰雨”，當秋一月。

(8) 南呂。簡1949：“……〔奏南〕呂。大浩（鵠）至，天不陰雨，民多……”，當秋二月。

(9) 無射。簡2055：“……鳴，可爲美事。人（入）之曰（日），奏毋（無）射。大”，當秋三月。

(10) 應鐘。簡0305：“……可禱祠。入之之日，奏應鐘。天戴圓，天不陰雨，主人不吉。雞（鷄）鳴帛覽（智），民入室，執（摯）蟲求穴。可築不可”，當冬一月。

(11) 黃鐘。簡0773：“……不盡三日，奏黃鐘。天立方，雞（鷄）鳴，畢筆”，當冬二月。

(12) 大呂。缺，當冬三月。

這些內容都是一般時令書所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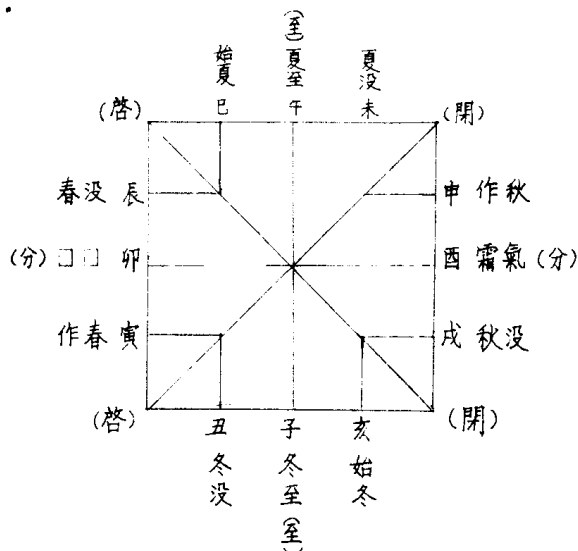
《三十時》和《玄宮》相比，有幾個特點很值得注意。

第一，它是把一年的12個月分別叫做“春一月”、“春二月”、“春三月”，“夏一月”、“夏二月”、“夏三月”，“秋一月”、“秋二月”、“秋三月”，“冬一月”、“冬二月”、“冬三月”，^⑩這和《月令》等書把四時分爲孟、仲、季做法是一樣的。“四仲”當“四正”（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四孟”、“四季”夾“四隅”（東南、西南、西北、東北）。

第二，它的積時積日是從冬至（子位）起算。其三十時的長短雖

與《玄宮》相同，也是以12日為一時，但簡文還把這12日再分為“上六”（前6日）和“下六”（後6日）兩節，常於各時下細述“上六”的宜忌如何，“下六”的宜忌如何，簡3258稱為“二日一時，六日一節”。

第三，它的時節名，“立春”、“立秋”叫“作春”、“作秋”，“立夏”、“立冬”叫“始夏”、“始寒”；“春分”、“秋分”叫“□□”、“霜氣”；“夏至”、“冬至”，叫法相同。“分、至、啓、閉”的概念很清晰。另外，它不僅有表示四時起點和中點的術語，還用“春沒”、“夏沒”、“秋沒”、“冬沒”表示四時的終點。這和一般時令書祇強調起點和中點（因為每一起點總是與上一終點相鄰）是不太一樣的。其中“□□”、“霜氣”以卯酉分（日夜均，陰陽半），“夏至”、“冬至”以子午分（日最長或夜最長，陰起或陽起）是謂“二繩”；“作春”與“冬沒”、“始夏”與“春沒”、“作秋”與“夏沒”、“始寒”與“秋沒”夾四隅，是謂“四鉤”（案：夾持四隅的長位構成L形折角，古人叫“四鉤”），可以圖象表示（圖二）。



簡3311、0430說：“……日冬至恒以子午，夏至恒以卯酉。二繩四句（鉤）分此有道。”就是講這種劃分（案：前兩句可能是說冬至為陽起

之日，前此陰衰，後此陽盛，故以子午縱分四時；夏至為陰起之日，但所居之半為陽，故以卯酉橫分四時。這些術語，除“絕氣”、“中絕”、“涼風”、“帛（白）洛（露）”、“始寒”、“〔中寒〕”、“冬至/大寒始隍”、“大寒之隆”八名與《玄宮》相同或相近，其他差異較大，特別是缺乏“三卯”（始卯、中卯、下卯）、“三酉”（始酉、中酉、下酉）、“三暑”（大暑至、中暑、小暑終）、“三寒”（寒至、大寒之陰、大寒終）這套整齊的配置，從框架上看，要比《玄宮》更接近於二十四節氣。

第四，它的“節”、“氣”相配也很有特色。如春有“生氣”，秋有“殺氣”，“生氣”與“殺氣”相對；夏有“柔氣”，冬有“剛氣”，“柔氣”與“剛氣”相對。另外還以“閉氣”、“盛氣”等名穿插其間，表示陰陽消長的進退曲折。它的時節名也有不少是取名於氣，或與氣名有關，如“少受”至“春沒”多標“生氣”。“生氣”是表示陰氣之起，其升起是有一個過程的。“少受”是初受生氣（故曰“起生氣”），“乃生”，是漸生生氣，“中生”是繼生生氣。“始夏”至“夏沒”，乃陰絕陽盛之時，也有一個過程。“始夏”仍為“生氣”，陰未絕；“絕氣”是絕氣再下；介於其間的“音”標“閉氣”，“閉氣”與“絕氣”是相似概念（“閉”有伏閉之義）；“盛氣”則表示陽氣或暑氣之盛。“作秋”至“秋沒”，簡多缺文，但可以估計多半是作“殺氣”（與春天的“生氣”相對）。“作秋”亦名“涼風”，涼風起，殺氣下（故曰“殺氣也”）。“霜氣”亦為殺氣；“秋亂”，蓋指中秋以後乍暖還寒的換季時期，即張家山漢簡《引書》所謂“春夏秋冬之間，亂氣相薄還也”，也都與“氣”有關。“始寒”至“冬沒”，大概是以“剛氣”表示“寒氣”，但“剛氣”初起，“殺氣”未絕，而有“賊氣”，仍標“殺氣”。簡文除表示分至啓閉和風氣概念的術語，還有表示物候概念的“華實”和“帛（白）洛（露）”，但後一類術語數量很少。

由於有《三十時》的發現，我們對古代時令書的瞭解比前又進了一大步，一方面是增加了對其複雜性的認識，不但懂得這些時令書是分為兩大系統，而且知道其每個系統內部還可以有許多不同“版本”，遠不是那麼整齊劃一。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我們對其規律性的認識，弄

清了這些不同“版本”的依據是什麼。它們的變化雖多（目前所見也不過是局部），但時段劃分、取名定義仍有則可循，總不外乎陰陽消長、分至啓閉、風名氣名、物候農時等等。編製時令者雜取而配伍之，有種種排列組合，可是萬變不離其宗，取材範圍和時間框架還是大體固定的。

我相信，今後發現愈多，這一點當會看得更加清楚。

1994年12月5日寫於北京薊門里

注釋

①《管子》有《幼官》、《幼官圖》，“幼官”是“玄宮”之誤，《玄宮》即《玄堂》。

②《地典》見《漢書·藝文志·兵書略》“陰陽”類著錄，久佚。地典是“黃帝七輔”（黃帝身邊最著名的七個大臣）之一，此書是依托黃帝、地典問對講用兵地形，參看李零主編《中國兵書名著今譯》（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278—280頁所收《地典》輯本（輯自“吳書”）。

③《史記·佞幸列傳》：“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

④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2期32—35頁；又《臨沂漢簡所見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第11輯（中華書局1985年）10—51頁。

⑤饒宗頤《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113—119頁。

⑥1994年7月承作者以手稿見示。

⑦李零《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51、153頁。

⑧李零《〈管子〉三十時節與二十四節氣》，《管子學刊》1988年2期18—24頁；又《中國方術考》150—153頁。

⑨這些節氣名也見於月令系統的早期文獻，如《夏小正》、《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等書，但都是零星提到，全套名稱是見於《漢書·律曆志下》。

⑩《玄宮》、《玄宮圖》原作《幼官》、《幼官圖》，“幼官”，乃“玄宮”之訛，本文用改正後的篇名。又《淮南子·天文》兼有這兩種系統，其《天文》所說五行各72日是“五行時令”，而《時則》所

述是“四時時令”。前者是本之《管子·五行》，後者是本之《呂氏春秋》十二紀。

① “盈”改“滿”是避漢惠帝諱。

② 《月令》和《呂氏春秋》十二紀都是把土行安排在季夏，《史記·封禪書》記漢武帝甘泉太一壇也是托與土行相配的黃帝之位安排在西南（季夏、孟秋當西南）。

③ 如簡0837“至春二月喜”，簡0804“至秋三月必破”。全部名稱即據此類推。

④ 《月令》、《玄宮》等書，與“殺氣”相對有“養氣”（後者誤為“義氣”）。美國賽克勒美術館新獲子彈庫帛書的殘帛提到“逆之曰生炁（氣），從之曰死炁”與“生氣”相對者又作“死氣”。

讀漢簡札記

裘錫圭(北京大學中文系)

一、關於“𥽿”的新資料

我在《漢簡零拾》第十九則“𥽿”字條中，曾指出漢簡屢次提到盛糧食用的“𥽿”（有時也寫作“卷”），《說文》說“𥽿，囊也，今鹽官三斛爲一𥽿”，盛糧的𥽿也應以三斛，亦即三石爲標準容量（拙著《古文字論集》604—605頁，中華書局，1992）。近讀1990年以來新發表的居延簡和敦煌簡，找到了幾條有關的新資料，現在逐條說明於下：

居延新簡E·P·T 56:120：

入粟三石𥽿百九；又糜三石𥽿九十二，奇一石

正月乙丑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居延新簡》316頁，文物出版社，1990。標點爲引者所加。以下簡稱此書爲“《新》”。）

此簡明言“三石𥽿”，可以證實我們的說法。“粟三石𥽿百九”，意謂一百零九個三石𥽿所盛的粟，共合粟三百二十七石。“糜三石𥽿九十二，奇一石”，共合糜二百七十七石。居延新簡E·P·T 59:7有“三石布囊一”之文（《新》359頁），似乎當時用來盛放以斗石計量之物的袋，大號的多以三石（約合今六斗）爲標準容量。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以下簡稱“《敦》”）所收的敦煌後坑墩採集的一枚簡也提到“𥽿”。原書所作釋文如下：

入粟小石二百五十石多券八十三枚者一石 十二月庚戌使
敦煌亭長却車六兩（《敦》266頁1227號）

何雙全《敦煌新出簡牘輯錄》改釋為：

入粟小石二百五十石為券八十三枚奇一石 十二月庚戌受
敦煌倉長都車六輛 (李學勤等編《簡帛研究》第一輯222頁,
法律出版社,1993)

從此簡圖版看(見《敦》圖版壹壹零),何釋改“多券”為“為券”,改“者”為“奇”,改“使”為“受”,都是正確的。“長”字上一字及下一字,何釋亦與《敦》釋不同。由於這兩個字在圖版上都很模糊,只能存疑。

“入粟小石二百五十石,為券八十三枚,奇一石”,意謂收入粟小石二百五十石,裝為八十三券,還多出一石。每券三石,八十三券共二百四十九石,加上多出的一石,正是二百五十石。上引何文說此簡“中段文字‘為券八十三枚’一句,與正文字體相異,為第二次書寫,可能是運輸糧食時出入庫的憑證編號”(《簡帛研究》第一輯,223頁)。這是不正確的。由此可知,用券裝糧時,不管是以大石還是小石計,一券都裝三石(漢代小石合大石的十分之六,看高自強《漢代大小斛(石)問題》,《考古》1962年2期)。為了收付糧食時計算的方便,採取這樣的措施是很自然的。

《敦》1074是出自敦煌馬圈灣的一枚殘簡,原釋文如下:

昌安倉券檢繩遣車輸 (《敦》260頁,圖版玖玖)

從圖版看,被釋作“券”的那個字也應改釋為“券”。由於此字所从的“巾”寫得比較斜,中畫墨色又比較淡,所以被認作了“券”。末一字右旁大部已殘失,從剩餘筆畫看,似非“俞”旁,當存疑。此簡所提到的“券、檢、繩”,都應是裝糧所用之物。“檢”大概指裝糧於券後用來封券的簽牌。

馬圈灣所出,尚有如下兩條可能與券有關的簡文:

入麥小石十三石五斗 乙 居攝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黨、候史尹欽,受就人效穀益壽里鄧尊。少不滿車兩,未券。

(《敦》230頁285號,圖版叁壹。釋文的標點為引者所加。)

右已募未募定入麥小石三百卅四石七斗 (《敦》231頁306號,

圖版叁叁)

此二簡的“泰”字疑當讀爲“養”，用作動詞，就是以養裝糧的意思。前面說過，漢簡有時把“養”寫作“卷”。“養”、“卷”、“泰”三字從同一個聲旁。“卷”既然可以借作“養”、“泰”應該也可以借作“養”。也有可能，“養”字的動詞用法變讀爲與“泰”同音，所以特意借“泰”字來表示。

上引前一簡的“少不滿車兩，未泰”，意謂僦人鄧尊的這輛車所載的糧食（即麥小石十三石五斗）不夠一輛車應載之量，而且沒有用養裝好（關於漢代運糧之車應載的糧食數量，參看本文下一則）。上引後一簡是一組“入麥”之簡的總結簡。上引前一簡應該就屬於這一組。這一批所入之麥，有的已用養裝好，有的尚未用養裝好，所以簡文有“已泰未泰”之語。

二、關於每車載糧數量的新資料

我在《漢簡零拾》第三則中，曾根據三十年代出土的居延簡指出，在漢代，至少在西漢晚期和王莽時代，用車運糧以一車載大石二十五石爲常規（《古文字論集》574—577頁）。當時我找到了所記的載糧數量與常規明顯不符的兩條簡文，現轉引於下（前面的序數是原文對所引簡文所加編號）：

(10) 𠄎載有水倉麥小石卅五石輸居延 (75·25)

(11) 第十部吏一人 載穀三十斛致官 𠄎 (95·12)

對此我作了如下解釋：

(10)。(11)未言車數，從所載糧食數字看，都應該是一車。漢代小石等於大石的十分之六，(10)的小石卅五石相當於大石二十一石，比常規數字少四石。(11)的三十斛則多出五石（斛、石都相於十斗）。(11)明記是第十部戍吏自運。(10)從殘存文字看，似乎也是記吏卒自運之事的。這兩車所載糧數與常規不合，可能與此有關。僱傭的僦人和服役的將車者輸送糧食的時候，大概一般比較嚴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車的常規。（《古文字論集》575頁）在讀了新發表的居延簡和敦煌簡之後，我發現這種解釋是不正確的。

從新發表的居延簡來看，一車載糧大石二十五石，的確是當時的常規。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有下列一些簡文：

●右十一月廿七日訖今月七日受十七兩粟大石四百二十五石

(E·P·T 40:12, 《新》86頁)

十七輛車載粟大石四百二十五石，每車正合二十五石。

出粟大石廿五石 一 四 (E·P·T 43:78, 《新》106頁)

下引之簡中有說“出粟大石廿五石，車一兩”的，可知此簡所記也應為一車所載。

入粟大石廿五石車一兩 四 (E·P·T 43:177, 《新》111頁)

入粟大石百石車 四 兩三 四 (E·P·T 43:178, 《新》111頁)

將“四”寫作“三”，是新莽簡特點。疑此簡所記之粟分裝四車，每車正合二十五石。

入粟大石廿五石 四 (E·P·T 43:189, 《新》112頁)

對照上引 43:177 號簡，此簡所記之粟也應為一車所載。

居延平明里王放就人昌里漕陽車一兩 粟大石廿五石

(E·P·T 49:53A, 《新》147頁)

入三年轉粟廿五石 車一兩 四 (E·P·T 50:57, 《新》156頁)

車一兩

四 為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 河平四年正月壬戌甲渠令史

口世受甲渠口口際長 (E·P·T 52:528, 《新》263頁)

小石四十一石六斗六升大半升，正合大石二十五石。

入粟大石廿五石車 四 (E·P·T 57:26, 《新》338頁)

此簡“車”字下當殘去“一兩”二字。

入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管家茂陵

東進里趙君壯就人肩水里鄧宗 (E·P·T 59:100, 《新》366頁)

出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管家昌里齊憲就

人同里陳豐付存遠置令史長 (E·P·T 59:175, 《新》371頁)

■右壬辰車五兩 粟百廿五石 與此千三百口口 四

(E·P·T 59:176, 《新》371頁)

此簡所記五輛之粟共一百二十五石，每車正合二十五石，當屬大石。

入粟大石五十石^{車二兩}始建國天鳳一年三月乙丑將
輸守尉尊□□□ (E·P·T 65: 412, 《新》446頁)

此簡所記之粟大石五十石為兩車所載，每車也合二十五石。

敦煌馬圈灣所出之簡中有如下三簡：

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兩[？]居攝三年四月壬辰大煎
粟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
都步昌候史尹欽際長張博受就人敦煌高昌里滑護字君房 (《敦》
230頁282號，圖版叁壹)

入□□居攝三□□□□□□一兩 □□三年三月戊辰大煎
小石卅二□□斗□升
都士吏牛黨□□□□□□□□壽里□□□□ (《敦》230頁
286號，圖版叁壹)

效穀陽玉里蓋安車一兩 粟小石卅一石六斗九升大 □

(《敦》259頁1058號，圖版玖柒)

後二簡圖版非常不清晰，釋文據原書過錄。其中前一簡的“卅二□”疑當釋“卅一石”，後一簡的“九升”應是“六升”的誤釋。上文已經說過，小石四十一石六斗六升大半升正合大石二十五石。

總之，從漢簡看，當時用車運糧以一車載大石二十五石為常規這一點，是可以肯定下來的。但是實際情況是很複雜的，與常規不合的情況總是存在的。每車載糧的數量當然不可能料若畫一。

本文第一則中曾引過敦煌馬圈灣出土的一枚簡(《敦》230頁285號)據此簡，僦人鄧尊的一輛車所載的糧食只有麥小石十三石五斗。這當然是很特殊的情況。與此簡同出的有如下簡：

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兩[？]居攝三年三月戊辰大煎
麥小石卅七石五斗
都士吏牛黨候史尹欽受就人效穀益壽里鄧尊 (《敦》230頁284號)

此二簡“居攝三年”以下文字全同，而後者所記一車載糧數則大大超過前者，可知前者所記糧數應是他車載剩的餘數。

但是上引《敦》284所記的“小石卅七石五斗”，合大石二十二石五斗，仍少於標準量二十五石，而且與此同出的還有如下簡：

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半兩[？]居攝三年四月壬
麥小石五十六石二斗五升

長大煎都步昌候史尹欽獲長張博受就人敦煌利成里張賀字少平。

(《敦》230頁283號)

一輛半載小石五十六石二斗五升，一輛也合小石三十七石五斗。敦煌後坑墩採集之簡中也有內容與此相類的如下一簡：

入郡倉元年六月轉二兩居攝元年八月己未步昌候長黨隧
麥小石七十五石

長尚受就人龍勒萬年里口 (《敦》266頁1234號)

二輛載小石七十五石，一輛也合小石三十七石五斗。上文引過舊居延簡中“載有水倉麥小石卅五石輸居延”一簡，所記數量與此相近。

以上所引一輛載小石三十七石五斗或三一五石之例：其所載糧食全都是麥；而與上引馬圈灣記入麥之簡同出的。從簡文格式等看很可能屬同一簿冊的記入粟之簡，如上文引過的《敦》282等簡，其所記的載糧數則仍為小石四十一石六斗六升大，即大石二十五石。這是很可注意的，不知是否由於同重量的麥的體積較粟為大的緣故，不過我在《漢簡零拾》第三則中引過舊居延簡253·5“車二兩麥五十〔石〕”一簡，此五十石似當為大石，則運麥時仍有一車載大石二十五石之例。

上文引過舊居延簡95·12“載穀三十斛致官”一簡，在新發表的居延簡中，也可以看到一車載三十斛的例子：

入粟三十斛 車一兩 二月口 (E·P·T14:5,《新》62頁)

“三十斛”的“斛”當為大石。如是小石，三十斛只合大石十八石，離二十五石的標準量就太遠了。

敦煌馬圈灣所出之簡中有如下一簡（為排印方便，不按簡文原來格式抄錄）：

入敦煌二年三月玉門轉一兩，穰麥小石卅八石七斗五升 已
入卅七石，少十一石七斗五升 元始二年正月丁巳令史豐受就
人敦煌安國里范仲 (《敦》230頁532號，圖版伍伍)

小石四十八石七斗五升，合大石二十九石二斗五升，與三十石相差甚微。可見一車載大石三十石，在當時也並非很罕見的現象。附帶說一下，上引簡文“仲”上一字，《敦》釋為“范”；從圖版看，似有可能是“茝”字（參看羅福頤《漢印文字徵》1·10二“茝”字，文物出版

社，1978）。

上文所引的關於一車載三十斛（石）和載小石三十七石五斗等例，大都並非“吏卒自運”，可見我在《漢簡零拾》中所作的有關解釋是錯誤的。

總之，從漢簡所記的以車運糧的情況來看，當時確以一車載大石二十五石為常規，但有時也有一車載到大石三十石的；而在運麥時，可能由於麥的體積較粟為大，一車往往只載小石三十七石五斗，即大石二十二石五斗。此外，當然還會有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不合常規的情況。各種不合常規的情況，主要當是由各種實際的需要造成的，跟運糧者是哪一種人並無多大關係。

三、樂涇

《敦》826號殘簡上有兩位戍卒的籍貫、姓名，原釋文作（此簡尚有其他文字，從略）：

戍卒祿福足竟 戍卒樂浪王譚 （《敦》251頁，圖版柒捌）

祿福是酒泉郡的縣名，樂浪則是郡名，戍卒的籍貫不可能只書郡名而不書縣名；而且敦煌是西北邊郡，樂浪是東北邊郡，樂浪郡的人決不會到敦煌來當戍卒。可見原釋文有問題。細審此簡圖版，“樂”下一字實作“涇”。《漢書·地理志》所記酒泉郡屬縣正有樂涇，故地當在今甘肅酒泉市與高臺縣之間。

清人洪亮吉曰：“《玉篇》《廣韻》‘涇’字注云：‘縣名，在酒泉。’今《志》（引者按：指《漢書·地理志》）从‘官’作‘涇’，非。”陶憲曾駁之曰：“《說文》無‘涇’字，‘涇’下云：‘从水，官聲。酒泉有樂涇縣。’則字本从‘官’甚明。古寫本《玉篇》‘涇’下云：‘古亂、胡亂二反。’《漢書》酒泉有樂涇縣，是顧氏元書亦作‘涇’（《廣韻》平聲二十六桓“涇”下亦云：“樂涇縣在酒泉。”）今《玉篇》《廣韻》作‘涇’，蓋唐宋《漢志》‘涇’字或有誤从‘官’者，孫強、陳彭年輩因而收之。洪不加訂正，反以‘涇’字為非，其失甚矣。”所駁甚是（洪說、陶說皆轉引自王先謙《漢書補注》）。由於漢簡“樂涇”的出現，是非就更加明白了。

附帶說一下，上引《敦》826 釋文中的“疋”字，從圖版看可能也是誤釋的，當存疑。

四、脩成

《敦》253、270、1010 三簡的原釋文如下：

戌卒循成富里左豐年三十五省府木工美水 府（《敦》229頁253號，圖版貳捌）

戌卒循成泉里索韵年三十 能為泉履 步昌 □□□
（《敦》230頁270號，圖版叁零）

戌卒脩成當利里楊馮年三十 省府 取代 省府 （《敦》258頁1010號，圖版玖叁）

從圖版看，此三簡的“成”上一字顯然是相同的，只不過前二簡的字跡不如後一簡清晰而已。前二簡釋文的“循”字應從後一簡釋文改為“脩”。

此“脩”字左邊作“彳”。我在《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曾指出漢簡中“脩行”的“脩”字，有時由於左邊作“彳”而被誤釋為“循”；並指出：“漢代隸書‘彳’旁往往變作‘彳’，漢簡、漢碑中‘條’寫作‘條’，‘假’寫作‘假’一類現象很常見，並非只有‘脩’字如此。”（拙著《古代文史研究新探》2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脩成”誤釋為“循成”，與“脩行”誤釋為“循行”同例。

古書中也時見譌“脩”為“循”之例。上引拙文已指出《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漢官》和《晉書·職官志》中都有譌“脩行”為“循行”之例（同上27—28頁）。見於上引簡文的地名“脩成”，在今本《漢書·地理志》中也譌成了“循成”。此《志》武都郡下有循成道（《漢書·百官公卿表》：“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七》“循成道”條說：“‘循’當為‘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並作‘脩城’。”漢簡“脩成”的出現，證明王氏的意見是正。

確的。脩城故地在今陝西略陽西北。

附帶說一下，從圖版看，上引《敦》253號簡釋文中的“富”字，似可改釋為“畜”；270號簡釋文中的“泉”字、“韵”字和1010號簡釋文中的“取代”，似都與原文不符，當存疑。

五、大司空隆心公邑

《敦》220號簡原釋文如下：

尉大君以東傷辜半日死元夫圯等皆亡大司空隆心公急發覺臣
謹案五品不孫典樂掌教大夫之□□（《敦》228頁，圖版貳貳）

從圖版看，“公”下一字實當釋為“邑”。此“邑”字上部作三角形，隸書“邑”字屢見此種寫法，睡虎地秦簡的“邑”字和“邑”旁中已有此種寫法（看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98頁“邑”字及99—100頁从“邑”諸字），漢魏碑刻“邑”字和“浥”、“挹”等字偏旁往往作此形（看劉球《隸韻》卷十緝韻“邑”、“浥”、“挹”諸字，翟云升《隸篇》第六·23頁下“邑”字）。

《敦》所附《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討論上引《敦》220以及可能與之同冊的一些簡的時代說：

……75:181號簡（引者按：即《敦》220號簡，《報告》引簡用發掘號，參看《敦》的《附錄》所收的《建國後所獲漢簡編號索引表》）載“大司空、隆心公”。據《漢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正月，以“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始建國四年，“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故T5:180—184號簡（引者按：即《敦》219—223號簡），當為始建國四年的爰書。（《敦》附錄68頁）

《報告》指出“大司空隆心公”是王邑，正確可信，不知釋文為何將“大司空隆心公”後的王邑之名誤釋為“急”。從文義上看，“大司空隆新公急發覺”也是有問題的。如要表示“馬上發覺”、“很快發覺”一類意思，只能說“即發覺”，不能說“急發覺”。

附帶說一下，《王莽傳》並未明言“改‘心’為‘信’”即在始建國四年，因此《敦》220等簡的時代晚於此年的可能性恐怕也是存在的。

六、可能與陳良、李崇有關的一條簡文

《敦》127號簡原釋文如下：

必蒙天有期殄滅臣等爲故崇叩頭死 = 罪 = 唯 （《敦》225頁，

圖版壹叁）

從圖版看，“有”宜改釋爲“右”，在此當讀爲“祐”。“等”上一字，寫法與見於《敦》250（229頁，圖版貳捌）和371（234頁，圖版肆零）的“良”相同，不應釋爲“臣”而應釋爲“良”，疑指新莽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主謀殺害戊己校尉刁護，脅衆叛入匈奴的戊己校尉史陳良。

此簡當是屬於一位名“崇”者寫給上級的一份書奏的（“奏”指奏記，崇不稱臣，故知不是給皇帝的章奏），可能不是原件而是抄本或草稿。此名“崇”者與見於同出的91號簡的“大都護崇”（《敦》224頁）似當是同一人。《漢書·西域傳下》說天鳳二年（公元15年。據《漢書·王莽傳中》應爲天鳳三年即公元16年）王莽“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王駿兵敗被殺後，“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大都護崇即西域都護李崇。

陳良之事見於《漢書》的《西域傳下》、《匈奴傳下》和《王莽傳中》。陳良等殺刁護是始建國二年九月的事（據《王莽傳中》所載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之奏）。陳良等叛入匈奴三年之後，即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匈奴新單于立，欲與中國和親。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遣使賀單于初立，趁機求得陳良等人，押回長安燒殺之。

上引簡文所錄書奏說：“……必蒙天祐，期殄滅良等爲故。”如“良”確指陳良，此書就應是作於始建國二年陳良叛變之後，天鳳元年陳良被求得之前的。據《王莽傳中》，始建國五年西域都護但欽爲西域叛國所殺（據《西域傳下》，殺之者爲焉耆國），李崇爲都護最早也得在但欽被殺之後。他在作上述書奏時，很可能尚未任都護。疑戊己校尉刁護被殺後，繼任者即李崇，他作此書時的身份可能是戊己校尉。也

許陳良事件發生之後，李崇就被派往西域，他在停留於玉門一帶時作了上述書奏。那麼，作此書的時間大概不會晚於始建國三年。

《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已指出見於上引《敦》127的崇即李崇（《敦》附錄84頁），其說可從。但是，《報告》將此簡與《敦》145繫聯，則不可從（《報告》引簡用發掘號，所引75:88即《敦》127，75:106即《敦》145，後者見《敦》225頁及圖版壹肆）。此二簡字跡有異（請比較二簡的“叩”字），而且《敦》145號簡最後有“臣△叩頭叩頭”之文，與《敦》127的“崇叩頭死罪死罪”相矛盾。《報告》認為上述簡文是天鳳四年“王駿全軍覆沒，西域都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時的奏書（《敦》附錄84頁）。如果我們上文的推斷不誤，此說便不能成立了。

《敦》127出有1979年馬圈灣發掘的T5探方。據《建國後新獲漢簡編號索引表》，《敦》40至480諸簡皆為T5所出。見於這些簡的當時年號，既有天鳳三、四年，也有居攝三年（《敦》282、283、284、285、286）、始建國元年（《敦》184、185）、始建國二年（《敦》358）、天鳳元年（《敦》187）等。所以《敦》127屬於始建國時代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七、車師後王狐蘭支

《敦》85號簡原釋文如下：

故車師後亡侯虜支 將諸亡國千餘人（《敦》223頁，圖版捌）
從圖版看，“國”下三字甚不清晰，似當存疑。“虜”字是加注在旁邊的，寫得很小。

《漢書·西域傳下》謂始建國二年，車師後王須置離欲亡入匈奴，都護但欽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漢書補注》謂“狐蘭”下疑更有“支”字）”。《匈奴傳下》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本文上則所述陳良叛變之事，是緊接着這件事發生的。上引簡文提到的“故車師後亡侯虜支”應即狐蘭支。車師後王須置離被殺後，

孤蘭支當襲其位。王莽篡位後，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為理由，將“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改為侯”（《漢書·王莽傳中》），所以簡文稱孤蘭支為“故車師後亡侯虜支”。加“故”加“亡”加“虜”都是由於孤蘭支已經叛亡的緣故。將其名簡稱為“支”則是由於已經寫明其具體身份的緣故，與本文下則所引《敦》90稱烏孫的車爰寔為“烏孫歸義侯寔”同例。

《敦》86說“故車師後亡侯弟虜布將兵二千餘人”（《敦》224頁，圖版玖），“故車師後亡侯弟虜布”大概就是孤蘭支的弟弟。此簡和上引《敦》85所說的，有可能就是始建國二年孤蘭支叛亡或入寇時的事。

與《敦》85、86同出的有如下簡（簡文據《敦》的釋文過錄）：

焉耆虜還且將柰八十人皆發 與南將軍期會車師 （《敦》

225頁149號，圖版壹伍）

“南將軍”亦見《敦》114（《敦》224頁，圖版壹壹），《敦》106又稱“南逆將軍”（此據《敦》釋，見《敦》224頁，圖版壹壹）。“南將軍”為匈奴官號。據《漢書·匈奴傳下》和《西域傳下》，陳良叛變時，匈奴方面接應他的就是南將軍（《匈奴傳下》又稱“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漢書補注》引周壽昌謂“此南犁汗王所屬南將軍”。“汗”在有的本子中作“汙”）。上引之簡，格式、字體與《敦》85相近，簡文所說似即匈奴遣兵與孤蘭支寇擊車師之事，則此次行動並有焉耆參加，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

八、卑爰寔

《敦》486號簡出自馬圈灣遺址，原釋文如下：

小昆彌卑爰寔和親共治國大善若不相信內計未 （《敦》238頁，圖版伍壹）

今按：“寔”即“寔”字，卑爰寔為烏孫小昆彌末振將之弟，其事見於《漢書》。

《漢書·西域傳下》記烏孫小昆彌末振將在成帝永始年間（此年代據《漢書補注》所引徐松說），指使貴人烏日領刺殺大昆彌雌栗靡，

“久之，大昆彌飼侯難柶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末振將弟卑爰寔本共謀殺大昆彌，將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至元始中（元始爲平帝年號，共五年，相當於公元1—5年），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匈奴傳下》記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烏孫庶子卑援寔”部下曾入侵匈奴，單于因此派兵攻擊烏孫，“卑援寔恐，遣子超遠爲質匈奴”，後因漢朝干涉，匈奴將“卑援寔質子”遣歸，“卑援寔”和“卑爰寔”是同一人名之異寫。建平四年，息夫躬上疏，也提到“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疆埴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漢書·息夫躬傳》）。

上引簡文說：“小昆彌、卑爰寔和親，共治國，大善；若不相信，內計未……”。從語氣看，所議論的應是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以後的情況，其時代似當在平帝元始年間。

馬國濟所出之簡中，還有兩枚與卑爰寔有關的簡。此二簡原釋文如下：

尉與車師前侯詡車師伯卑長寔清子俱求度以己已到如律令

（《敦》224頁89A，圖版玖）

正月丙辰移書敦德 草 （同上89B）

五校吏士妻子議遣烏孫歸義侯寔清子女到大煎都候郵

（《敦》224頁90號，圖版玖）

從圖版看，《敦》89A當改釋如下：

等(?)與車師前侯詡、車師侯伯、卑爰寔侍子俱(?)來，度以己已到，如律令。

89B的“丙辰”似當釋爲“戊辰”。《敦》90的圖版不清，但可看出“清子”也是“侍子”的誤釋。“子”下一字，似非“女”字，當存疑。

上引《西域傳》說元始年間漢封卑爰寔爲歸義侯，可知89A的“卑爰寔侍子”與90的“烏孫歸義侯寔侍子”指同一個人。屬國君

主遣子入侍皇帝稱侍子，實即人質。例如漢宣帝時，匈奴的呼韓邪單于和郅支單于就都向漢朝派遣了侍子（《漢書·匈奴傳下》）。卑爰寔向匈奴單于也派遣過侍子，《匈奴傳》稱為質子，已見上文。上引二簡都與卑爰寔侍子入漢之事有關，當時卑爰寔應該尚未被殺，而且仍與漢朝維持着比較好的關係。

卑爰寔究竟在哪一年被殺，《漢書》是交代得不清楚的。上引《西域傳》說元始中卑爰寔封歸義侯，後來由於他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襲殺之”。《漢書補注》引徐松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尚在西域，或再任也。”《漢書·段會宗傳》說段會宗在元延年間使烏孫，誅殺末振將太子番丘，後來由於“小昆彌李父卑爰寔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並未明言其事在建平中。《西域傳》雖然叙孫建殺卑爰寔之事於元始中卑爰寔封侯事之後，但也並未明言殺卑爰寔就在元始年間。上引《敦》89B已稱敦煌為敦德，89A又稱車師君主為侯，其時代至少應已晚到新莽初年。但據《漢書·平帝紀》，孫建在元始元年已是“右將軍”，地位很高。此後他長期是王莽的親信，似乎不可能再去任西域都護。所以卑爰寔究竟在何時為何人所殺，西域都護孫建與王莽親信孫建究竟是不是一個人，都是有待研究的問題。治西域史者早就注意到了這些問題，馬圖灣簡提供了新的線索。

校按：寫此文時，《居延漢簡》圖版本尚未發賣，故有關簡文皆引自1990年出版的只有釋文的平裝本。今亦未遑與圖版本一一核對，只是刪去了平裝本E. P. T 59: 176號簡釋文“粟百廿五石”下明顯誤衍的“排”字。

漢簡中所見漢律論考

高 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漢代律令早已亡佚，雖經學者多年爬梳整理，但由於資料所限，人們至今對一代律令也祇能有粗略瞭解。所以，當本世紀在甘肅地區發現大批漢簡後，其中的律令簡文格外引人矚目，有不少學者曾撰文作專門論述。爲了深入開展漢代法制史的研究，筆者願隨其後，從律學角度對這批律令作進一步探討。這裏先對可能屬於漢律的簡文逐條分析如下。

一、“ \square 同產子皆得以爲嗣，繼續 \square ”^①

這枚簡文雖未署名爲“律”，但無論從其內容，還是從其行文語氣來看，都似一條法律條文，屬漢“戶”律。

何謂“同產”？有兩種解釋，顏師古說：“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②李賢說：“同產，同母兄弟也”。^③這個解釋較顏師古的確切，與這條律文的精神相符（詳後）。

“嗣”，繼承。以他人之子承繼爲自己之子，謂之“嗣子”。

“統”，繫、屬。世世繼承不絕，爲“統”。

按這條法律規定，若本人無子，其同母（當然也應是同父）兄弟之子，皆可以立爲嗣子，繼承世統。《漢書·張湯傳》：“（張）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張賀之弟）小男彭祖”。以往認爲像張賀這樣，以弟子爲嗣子是一種習俗。現從這條律文得知，無子，得先以同母兄弟子爲嗣，是法定制度。

這一法律規定，與漢時禮制相合。漢成帝無繼嗣，丞相翟方進等人議立成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嗣，說道：“《禮》曰：昆弟之子猶爲子也。

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後遂立定陶王爲太子。^④此外，這一條法律規定也體現“嫡庶之別”的禮制精神。前面說過，“同產”即同父母兄弟立同母兄弟之子爲嗣，自然就反映出“嫡出子，高於庶出子”。若按顏師古的說法，“同產”即“兄弟”，這條律文就不體現“嫡庶之別”。《唐律》這方面的規定，因襲了漢制，並且更加嚴謹。《唐律疏議·戶婚》：“諸立嫡違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嫡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疏議》引《戶令》：“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準此”。

“同產子皆得以爲嗣，繼續”。這一規定對於本人無子者得以繼續維繫以血緣關係爲紐帶的宗族，具有重要意義。在那個時代，維繫“世統”，對任何人都是一件大事，所謂“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⑤。從法律角度來看，立爲嗣，與爵位的獲得、家庭財產的繼承，都有直接關係。如《漢書·宣帝紀》載，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孟康注：“諸復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他將“復其次”，解釋爲“得傳同產子”。這正與本條《戶》律的意思相合。“復家”，即免除徭役。這說明，立爲嗣者的“同產子”可享免除徭役的待遇。再者，立爲嗣，也是獲得“賜爵”的資格。漢時，每遇重大慶典常“賜爵”與“父後者”，或重賜“父後者”。如《漢書·文帝紀》：孝文元年，建太子，“因賜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後漢書·順帝紀》載，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人三級”。“爲父後者”，即立爲嗣者。

爲人嗣後即獲有統率家事的家長權。這裏不一一贅述。

二、“言律曰：畜產相賊殺參分償和。令少仲出錢三千及死馬骨肉付循請平。”^⑥

這枚簡始見於沙畹著《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漢簡》(編號949)。王國維先生以《魏新律序略》所言：“《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認爲此簡簡文是《賊律》。大庭脩教授認爲不確。他

說，《魏新律序略》是指“某人殺傷他人畜產時而言，而此律文所說的‘畜產相賊殺’，大概是指動物之間彼此爭奪殺傷”。^⑦筆者同意這一分析。此簡是一件判決書。前半段是引用的律文：“畜產相賊殺，參分償，和”。後半段是判詞，即使被告人少仲出錢三千及其死馬骨肉予被害者循，以便和解。筆者僅補充一點意見如下。

這條律文當屬漢《廐》律。《唐律·廐庫》篇有關規定可資佐證。《唐律》：“諸犬自殺傷他人畜產者，犬主償其減價；餘畜自相殺傷者，償減價之半”。《疏議》舉例道：“自相殺傷者，謂牛相牴殺，馬相踏死之類。假有甲家牛，牴殺乙家馬，馬本值絹十疋，為牴殺，估皮肉值絹兩疋，即是減八疋絹，甲償乙絹四疋，是名‘償減價之半’。”漢、唐律相比，可以看出，兩律關於“畜有相殺傷”賠償費的比例的規定有所不同，漢律規定賠償畜價的三分之一，唐律規定賠償費實際是五分之三。唐律規定的賠償費高於漢律的規定，但兩律都規定，可以死畜的骨肉作為部份賠償費。在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

《晉書·刑法志》載，《魏新律序略》云，漢《囚》律有“告劾傳覆”、“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據此，可以認為漢簡中以下諸枚簡文，當屬漢《囚》律。

三、“《囚》律：告劾毋（無）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⑧

“關”，白、通，關說。《說文》段注：“凡立乎此而交彼曰關”。“輕重”，指罪行輕重。

這條律文的意思是：凡告劾二千石官所屬的官吏（可能是指縣級以上的官吏），無論罪行輕重，均應通報二千石官。《唐律》有關規定可資參考。《唐律·職制》“長官及使人有犯”條：“諸在外長官及使人於使處有犯者，所部屬官等不得即推，皆須申上聽裁。若犯當死罪，留身待報。違者，各減所犯罪四等”。《疏議》曰：“‘在外長官’，謂都督、刺史、折衝、果毅、鎮將、縣令、關監等。長官及諸使人於使處有犯者，所部次官以下及使人所詣之司官屬，並不得輒即推鞠。若無長官，次官執魚印者，亦同長官。皆須先申上司聽裁”。若與這條唐律相比，上述漢《囚》律條文中兩

點尚不清楚：1、《唐律》僅規定“諸在外長官及使人於使處有犯者”，“須先申上司聽裁”。不知漢《囚》律的規定是否也有此限制範圍。2、《唐律》規定在“推鞠”前，“須先申上司聽裁”，而漢律上述規定卻沒說明何時“關屬所二千石”。從有關史料來看，當時可能是在判決後，執行前，“關屬所二千石”。^⑨

四、“證財物故不以實，贓（賾）五百以上，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言請（情）者，以辭所出入罪反罪”。^⑩

這是審判官問案時首先向被告宣讀的一條法律，^⑪雖未署律名，但按其性質當屬漢《囚》律。審問當事人之前，先向他宣讀這條法律，令其招供實情，當是漢代審訊制度。因而在漢簡中，凡記錄審問案件的簡牘都有這條律文。現將漢簡中所見到的這類律文，抄錄一部份，以便分析。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3·35：“先以證不言請（情）出入罪”。

38·27：“囚官，先以證不言請（情）出入”。

7·20：“囚先以證不言請（情）出入罪囚”。

《居延新簡》：

E·P·T 5: 111：“囚辭以定，滿三日囚”。

E·P·T 51: 228：“囚三日而不更言請（情）書律辨告。乃驗問……”。

E·P·T 51: 290：“囚故不以實，贓（賾）二百五十以上令辨告”。

E·P·T 54: 9：“賈而賣賣而不言，證財物故不以實，贓（賾）二百五囚”。

E·P·T 52: 417：“囚先以證不（言）請（情）律辨告。乃驗問……”。

E·P·T 51: 509：“市券一。先以證財物故不以實。”

E·P·T 53: 181：“囚先以證財物不以實律辨……”。

E·P·S 4 T 2: 7：“而不更言詔書（情）律辨告……”。

E·P·F 22: 288：“建武五年二月丙午朔甲戌掾譚召萬歲候長憲詣官。先以證不言請（情），辭已定，滿三”。

E·P·F 22: 328, 330：“建武四年三月壬午朔丁酉萬歲候長憲口 2 際

●謹召恭詣治所。先以證縣官城樓守衙口而不更言請(情)，辭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

E·P·W: 13: “口案、不更言，以辭所出內罪人”。

以上所錄十數枚簡文，有的是該律文的節錄，如“證財物故不以實”。有的是該律文的概括，如“證不言請(情)出入罪”。有的是該律文的殘篇，如“先以證不言請(情)，辭已定，滿三日……”。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出：

(1) 律文中的“賊五百以上”、“賊二百五十以上”、“縣官城樓守衙……”等語，不是這條律文的組成部分，而是審判官問案時，根據審問案情的需要引用的有關令文，^⑫或歸納出的理由“辨告”當事人。如無需要，審判官宣讀這條律文時，也可以不引用其它令文插入其中。^⑬所以，簡文中所見引用這條律文之處，各不相同。

(2) 律文中的“證不言請”、“不更言請”的“請”，即“情”。《史記·禮書》：“請文俱盡”。《集解》徐廣注：“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封診式》“治獄”條和《法律答問》“女子甲去夫亡”條中也見有假“請”為“情”，可參考。“情”，指情實^⑭。當事人被審問時如不說實話，要負法律責任。《唐律·詐偽》明確規定：“諸證不言情，反譖人詐偽，致罪有出入者，證人減二等，譖人與同罪”。

(3) “故不以實”中的“故”，指“故意”，法律用語。《後漢書·郭躬傳》：“法令有故、誤，誤者其文則輕”。

(4) “辭已定”，即將供辭錄為文書之後，也就是“傳爰書”。《漢書·張湯傳》：“傳爰書”。王先謙《補注》：“傳爰書者，傳囚辭而著之文書”。以便三日以後“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⑮復問時，如仍不更改謊言，就要“以辭所出入罪反罪”。

五、“以兵刃索繩它物可以自殺者予囚，囚以自殺、殺人；若自傷、傷人而以辜二旬中死，予者髡為城旦舂及有”。^⑯

此文未署明律名，但根據文意，可以認為是漢《囚》律中關於監獄管理條文的殘簡。這條律文語言簡潔，意思清楚，大意是：“任何人

若將兵器、繩索，以及其它可以用來殺傷人的器物給與囚犯，使其用以自殺、殺人，或自傷、傷人，若被傷者在保辜期限二十天內因傷死亡，供給囚犯上述器物者應處為城旦舂”。律文中所說的“辜”，指保辜，是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略說明如下。

《說文》段注：“辜者，辜之省。辜與保同義，疊字”。律文中的“辜”，指刑法中的保辜制度。《急就篇》：“疾病保辜詭呼號”。顏師古注：“保辜者，各隨其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但是顏師古有一點沒有說清楚，即“限內致死”不僅是“坐重辜”問題，首先是罪行的性質改變了。原是“傷人罪”，“限內致死”則成為“殺人罪”。《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載，昌武嗣侯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補注》引沈欽韓曰：“此在保辜限也”。《唐律·鬥訟》：“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它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限內死者皆依殺人論”。與漢制同。此說甚是，漢簡中另見一案例，也可佐證。E·P·F 22:326：“廼口口申第三墜戍卒新平郡苦縣奇里上造朱疑見第五墜戍卒同郡縣始都里皇口口所持鉞，即以疑所持胡桐木丈（杖），從後墨擊意項三下，以辜一旬內立死。案疑賊殺人。甲辰病心腹口口”。“墨”，通默，無聲。“從後墨擊意項三下”，顯然是“賊傷人”。而“辜一旬內立死”，就成為“賊殺人”了。

關於“保辜”，還有一點可以補充，即當時不僅規定“傷人罪”實行“保辜”，其它法律行為，如建築、修繕等土木工程也實行“保辜”，即現代的“保修期”。《說文》：“辜，任保也”。段玉裁說：“辜”字，“原許君之義，實不專謂罪人保辜，謂凡事之估計預圖耳”。此說甚是。秦簡中所見“辜”字，即非關“罪人保辜”事。《睡虎地秦墓竹簡·徭律》：“興徒以為邑中之紅（功）者，令結（辜）堵卒歲”。也就是說，徵發徒眾修築城垣者，要對所修城牆擔保一年。

六、“《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廬舍捕人。犯者，其室毆傷之，以無故入人室律從事”。①

這條律文寫於一簡之上，署名《捕律》，當是漢“九章律”中的

《捕》律原文。由於簡中律文與《周禮》鄭玄注中的引文相符，故引起學者格外關注。如大庭脩教授所說，此“簡牘史料與過去的文獻史料如此相符合，應該說是稀有的例子。”^⑩《周禮·秋官·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玄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漢簡所見條文云：“以無故入人室律從事”，就是先鄭所說的，對於“無故入人室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大庭脩氏在考證這枚簡文時，將“禁吏毋夜入人廬舍捕人”，寫作“禁吏毋敢入廬舍捕人”。另一處，在引用仁井田陞博士《中國法制史》中對這條律文的標點時，又寫作“禁吏毋或入人廬舍捕人。”^⑪案頭無日文本的《秦漢法制史研究》和仁井田陞先生的《中國法制史》，沒有核對，不知原文是否也不確。筆者認為《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95·11簡釋為“禁吏毋夜入人廬舍捕人”，當不誤，也合乎情理。因為法律不可能不加說明的，一概“禁吏毋敢入廬舍捕人”。若作如此規定，官吏將無辦法逮捕躲入室內的逃犯了。法律規定，“禁吏毋夜入人廬舍捕人”，是由於黑夜間，廬舍內的人無法辨認闖入者是有拘捕權的官吏，還是盜賊。在這種情況下，室人與闖入者格鬥，甚至將其殺之，無罪。

所以說，漢律規定“無故入人室”，“其時格殺之，無罪”，是為了保障居民安全，而不是為“禁吏入人廬舍捕人”。再說，漢時，官吏逮捕人應持有官府的文書，所謂“還書”^⑫。吏持“還書”入人室捕人，就不是“無故”。

七、“律曰：贖以下可檄，檄，勿徵還。與令史移檄，官憲功算，臬維蕭封”^⑬。

此律未署律名，但根據內容來看，當屬漢《囚》律條文。略分析如下：

“贖”，指贖刑，一種輕刑刑罰名。凡處“贖”刑的罪，稱做“贖罪”。《晉書·刑法志》：“贖罪者誤之戒”。又云：“意善功惡，

以金贖之”。由此可知，“贖刑”是對過、誤違法、犯罪的處罰，一種輕刑。據統計，東漢永元年間，“贖罪以下”的律文二千六百八十一條^②。

“檄”，官文書形式，多用於徵召。《說文》段注引李賢文：“《光武紀》曰：‘《說文》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謂之檄，以徵召也。’”《漢書·申屠嘉傳》：“嘉爲檄召通”。

“逕”（音代），同逮，“徵逕”，徵逮。

“憲”，政令^③。此處指召傳案件當事人的檄文。

“功”，攻。攻治之乃成之。見《釋名·釋語言》。

“算”，通筭。《禮儀·既夕》：“主人之史請讀貳算”。鄭注：“古文算，皆爲筭”，指簡書、簿冊等^④。《莊子·駢拇》：“挾筭讀書”。

“臬”，麻。見《說文》。律文中的“臬”，指用於纏繫簡牘的麻繩。

“維”，繫，連結。

“蒲”，蒲柳。《爾雅·釋木》：“楊，蒲柳”。《詩·楊之水》：“不流束蒲”。箋云：“蒲，蒲柳”。律文中的“蒲”指書板。臬、蒲，都是製作檄書的材料^⑤。

“官憲功算，臬維蒲封”，即製作“合檄”的程序。由令史將官府的政令寫在兩塊或兩塊以上的木板上，然後用麻繩纏繫在一起，用封泥、印章封緘^⑥。

按以上解釋，這枚簡文的大意是：“法律規定，凡屬贖刑以下的犯罪，可以用檄書傳喚到案的，均用檄書傳喚，勿需採取逮捕措施。檄書由令史製發，即將官府的政令，製成書版，用麻繩纏繫之，再用封泥，印鈴封緘”。

這枚簡文，前半段是法律條文，後半段可能是如何製作檄書的說明，從中可以看到：

(1)、審判機關用檄文傳喚當事人，而不採用強力逮捕，不僅減省人力、物力，而且有利於緩和訴訟人與官府之間的矛盾。

(2)、檄書的製作、傳遞，均有嚴格規定，從而有利保守機密。

八、“移人在所縣道官，縣道官獄訊以報之，勿徵逮。徵逮者以擅移獄論。”^⑪

這枚簡文從行文語氣來看，明顯是法律條文。按其性質，很可能是關於審判管轄的條文，屬《囚》律篇。《唐律》有關“違法移囚”內容的規定在《斷獄》篇^⑫。而唐《斷獄》淵源於秦漢《囚》律。但該條律文強調的是“勿徵逮”，因此將它列入規定逮捕制度的《捕》律可能更合適。

“移人”，指被徵逮的案件當事人。

“擅移獄”，罪名，非法受理、審訊，不屬於該審判機關管轄的案件。

這條法律規定了一項審問原則，即案件由當事人所住在的縣道審判機關負責審問該案當事人，然後將審問結果報與受理此案的縣道審判機關。受理此案的縣道審判機關，勿需將當事人拘捕到本縣道。否則按“擅移獄”罪論處。

九、“《捕律》：亡入匈奴、外蠻夷守葉亭鄣烽（烽）燧（燧）者不堅守降之，及從塞徼外來絳（降）而賊殺之，皆要（腰）斬，妻子耐為司寇作如”。^⑬

這枚署名《捕律》的簡文是漢《捕》律佚文，1979年發現於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律文的主旨是禁止邊防軍“賊殺”降者。律文所說的來投降者分兩類，一是逃跑到匈奴、外蠻夷的原守烽燧的戍卒。一是塞徼外的人。漢承秦制，在戰爭中仍實行斬首授爵政策，鼓勵殺敵。因而，常有軍人為了邀功，濫殺來降者，獲取爵位。為了嚴肅軍紀，爭取更多敵軍來降，法律明文禁止“賊殺”降者。犯者，腰斬。妻子耐為司寇，服勞役。

秦漢舊律，淵源於魏國李悝所著《法經》。其中的《囚》、《捕》篇，為劾、捕賊、盜的內容，是與斷獄有關的法律。而現見到的這條《捕律》，與斷獄無關，但卻署為《捕律》，恐非蕭何所著“九章律”中《捕》律的原條文。這種情況，或如《晉書·刑法志》所言，漢律終漢之世沒有全面、系統地編纂、整理過，因而形成“雖大體異篇，

實相採入”、“錯綜無常”的混亂體系，這裏，將與斷獄無關的禁止“賊殺”來降者的條文，署為《捕律》，即是漢律體系日漸混亂的一側。

十、“律曰：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簿者，皆勿敢擅予”。^④

這枚簡是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發現於酒泉地區的。不少學者對此簡作過論證。大庭脩先生對此簡的解釋，值得重視。他說：“當上級官（府）的使者在其身份證明文件中，寫明所需要的簿冊名稱時，如要索取卒簿（士兵名冊）、甲兵簿、武器登記簿、禾稼簿（糧食帳簿），不得隨便給予。”^⑤

武器、士兵、糧食簿冊，是有關邊防軍事部署的機密。根據這些簿冊的記載，即可以知道各地區駐防軍隊狀況，所以，當時為保守機密，對於“兵簿”、“卒名籍”等簿籍的造冊登記、抄錄、領取、傳送等都有一套嚴格制度。^⑥因此，法律規定不得隨便將這類簿籍交與他人查閱。

十一、“毋得貰賣衣財物”。

這條律文載於一文書中。《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13·15：“毋得貰賣衣財物。太守不遣都更循行口嚴教受卒。官長更各封臧口”。

“貰”，賒。

“都更”，即督郵。《漢書·文帝紀》：“二千石遣都更循行，不稱者督之”。如淳曰：“律說，都更今督郵是也”。

“臧”，同藏。“封藏”，查封保存。

這條簡文末署律名。它與41號簡中的：“律曰：臧官物非錄者，以十月平賈計”的性質相似，也是為處理邊防軍人貰賣衣物問題而引用的一條法規，故將其作為律文的節文，錄入本文。

吏卒貰買（賈）衣物的問題，軍中普遍存在。因而引起軍政各級機關嚴重關切。在漢簡中就發現與處理此問題有關的簡文二十餘枚。其中有：州牧（或中央有關官府）下達各郡的府書，令太守派遣都更督察處理吏卒貰賣衣物的問題。如《居延漢簡》213·15簡。有郡太守發佈的命令，對於如何處理吏民貰賣衣物問題，規定出各項具體措

施。如令下級隨時呈報戍卒買賣衣物的情況；⑤規定買賣衣物為贓物。⑥對於犯者要“以時驗問”等等。⑦邊塞各軍政當局對此問題如此重視，也說明“毋得買賣衣物”，絕非一般條例、命令。

十二、“律曰：贓官物非錄者，以十月平賈計”。⑧

“錄”，抄錄。此處指將物品登記入冊。《周禮·天官·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錄”。孫詒讓《正義》：“凡財物之名數，具於簿籍，故通為之錄”。

“平賈”，官定市場平均價格。“以十月平賈計”，此律可能制定於武帝太初改曆之前，所以仍沿用以十月為歲首。規定以十月為會計年度的開始，平價計算贓值。

此律見於張掖太守“府書”中：“二月戊寅張掖太守福、庫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張掖農都尉、護田校尉府卒人，謂縣。律曰：‘贓官物非錄者，以十月平賈計’。案戊田卒受官袍衣物，貪利貴賈賈予貧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時驗問。”⑨在這件“府書”中提出，凡戍卒、田卒倒賣官府的“非錄”衣物的案件均“以十月平賈計”贓。中國古代法律一般均按贓值的大小作為贓罪定罪量刑的重要根據。因而對於如何計算贓物價值，都有明確、具體規定。一般都是按罪犯獲得贓物時的物價計算贓值，而不是按一年中某一月的價格計贓。⑩據此可以認為，漢簡中見到的這條關於計贓的規定，僅適用於戍卒、田卒倒賣“非錄”官物這類案件，而不是一般贓罪的計算方法。

注釋

①《居延新簡》E·P·T5:33 以下凡引《居延新簡》文，祇注其編號。

②《漢書·龔臈傳》顏師古注。

③《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

④《漢書·孔光傳》。

⑤《漢書·文帝紀》。《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

⑥《敦煌漢簡釋文》2011

⑦《日》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中文版）71-72。

⑧ E·P·T10:2A

⑨ 參見《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載《居延新簡釋粹》第112頁。

⑩ 《居延新簡釋粹》第112—116頁。

⑪ 參見《居延新簡釋粹》第112—116頁。

⑫ 如E·P·T51:290簡寫為“贓二百五十以上令”。這是懲治“贓罪”(如貪污、盜竊、詐騙等罪)而規定的定罪量刑的界限。就是說贓“五百以上”是一種處罰,“二百五十以上”又是一種處罰。秦時以“錢十一當一布”,故以十一的倍數,“一百十一錢”,“六百六十錢”作為區分贓罪檔次。如《秦簡·法律答問》:“可(何)如為大誤?人牛、馬牛及者(諸)貨財直(值)過六百六十錢為‘大誤’,其它為小”。

⑬ 見E·P·F22:330簡。

⑭ 《周禮·小宰》:“六曰以叙聽其情”。賈公彥疏:“情,謂情實”。

⑮ 《漢書補注·張湯傳》張晏注。

⑯ E·P·S4·T2:100簡

⑰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95·11簡。

⑱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第70頁。

⑲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第69、70、54頁。

⑳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58·17、193·19:“逕,戌卒饒得安成里王禍,字子文,故以逕書捕得,福盜械”。“逕書”,即拘捕證。

㉑ 這條律文由兩枚簡綴合而成。各家釋文不相同。本文對其中的“與”、“移數”的“檄”,採用了《甲乙編》的意見。“算”、“維”的釋文是以《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為據,詳見《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57·13、185·11簡的按語。釋文還參考了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第215頁)的意見。

㉒ 《後漢書·陳寵傳》。

㉓ 《穆天子傳》:“受法憲”。

㉔ 漢簡中以“算”為“筭”例多見,如“告部檄記算卷”、“吏遣符算”等。

㉕ E·P·T59:229:“始建國天鳳一年六月以來所受集蒲及遺繫諸物出入簿”。“繫”,牘牒。集、蒲,當也都是製書版的“諸物”。

㉖ 漢簡中常見“蒲封”連用詞,指檄或其它官文書。如《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83·11A、183·15A。

㉗ E·P·S4·T2:101。

㉘ 見《唐律·斷獄》“囚徒伴移送併論”條。

㉙ 《敦煌漢簡釋文》983。

㉚ 《敦煌漢簡釋文》2325。

㉛ 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第71頁。

㉜ 見李均明《漢簡所見‘行書’文書述略》。載《秦漢簡牘論文集》。

㉝ 如E·P·T56:82:“甲渠候官,卒不實買爰書”。E·P·T3:2:“第十七部甘露四年卒行道實賣名籍”。E·P·T59:47:“□□年戌卒實賣衣財”。

物名籍”。

⑭如E·P·T 52:334:“𠄎卒禁賁賣，皆入爲贓(贓)公從𠄎”。

⑮見《居延漢簡釋文合校》4·1。

⑯《居延漢簡》(甲乙編)4·1。

⑰這枚簡，各家釋文不同。“太”，《合校》作“大”。“人”Z.K
“入”。“官”，《合校》作“宅”。“錄”，《合校》作“錄”。“漫”，Z.1
丁作“渴”。本文釋文以《甲乙編》爲據，同時也吸取了其它注釋家
意見。

⑱如《唐律·名例》：“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有關條文，也規定“得時值贓”，
可參考。

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

謝桂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無疑是居延漢簡整理和研究中的重要基礎工作。自從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首次出土一萬餘枚居延漢簡以來，迄今已整六十週年，海內外的前輩和同行學者，茹苦含辛，前赴後繼，在這兩方面都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不斷地取得了令人可喜的豐碩科研成果。但也毋庸諱言，由於居延漢簡大多數屬於斷簡殘篇，而且筆跡嚴重漫漶不清，加之可供借鑒的簡牘和文獻資料又極其有限，因此，無論是斷簡綴合，還是冊書復原的工作，至今尚遠遠沒有完成，需要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攜手合作，繼續努力去做。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日，筆者有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日本學術振興會的交換學者，赴日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學術交流和訪問，受到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大庭脩教授的热情接待。鑒於當時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隧新出的居延漢簡釋文尚未公開發表，所以，我在訪問期間，除了應邀參加以大庭脩教授為首的居延漢簡研究班，共同研討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舊出的居延漢簡釋文之餘，得有機會從事這批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和冊書復原，並在以往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現和突破。今趁自我於一九七八年始從事居延漢簡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以來，經常諄諄教誨我的張政烺先生八十歲誕辰即將到來之際，將它發表出來，為我一向敬仰的張政烺先生祝壽，亦表示對大庭脩教授熱情接待的由衷感謝，並就正於海內外的博雅君子。

一、斷簡綴合舉隅

關於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出土的居延漢簡的斷簡綴合，勞幹先生編著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以下略稱《考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居延漢簡甲編》（以下略稱《甲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居延漢簡甲乙編》（以下略稱《甲乙編》），都相繼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和李均明、朱國炤同志共同編著的《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以下略稱《合校》），雖然也略作了一點補正，但並未詳細加以說明。現將我新發現和《合校》中雖已指出尚未詳細說明的可以綴合的部份斷簡，一一列舉如下：

例一 簡六七·二八：𠂔渠候𠂔

簡六七·三六：甲渠候官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六七，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幹先生編著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以下略稱勞《圖》）第一九七頁。簡六七·二八不僅木質、筆跡和簡六七·三六完全相同，而且簡六七·二八上面“渠候”兩字的殘留筆劃，和簡六七·三六上面“渠候”兩字的殘留筆劃，正好合成“渠候”兩字。可見，簡六七·二八和簡六七·三六適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六七·二八為右半部，簡六七·三六為左半部，裂痕亦很清晰，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所示，釋文應該讀作“甲渠候官”。

例二 簡七〇·四：甲渠候官

簡七〇·一五：甲渠候官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七〇，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三三四頁。簡七〇·四的圖版倒置，將它正過來後，不僅木質、筆跡和簡七〇·一五完全相同，而且兩枚斷簡所殘留的筆劃，正好合成“甲渠候官”四字。可見簡七〇·四和簡七〇·一五，適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七〇·四為左半部，簡七〇·一五為右半部，裂痕亦很清晰，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2所示，釋文應該讀作“甲渠候官”。

例三 簡一八四·九：甲渠候官𠂔𠂔

簡一八四·一：甲渠候官七月癸巳郭卒田安世以來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一八四，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四二二頁。簡一八四·九不僅木質、筆跡和簡一八四·一完全相同，而且兩枚斷簡所殘留的筆劃，正好合成“甲渠候官”四字，分別寫於“甲渠候官”以下右面和左面兩側的兩行小字，其書寫內容和格式，亦與一般封檢相符。“癸巳”，《甲乙編》本作如是釋，《合校》改釋作“辛巳”，今細察圖版，似應仍從《甲乙編》釋作“癸巳”爲是。可見簡一八四·九和簡一八四·一適由一簡縱裂而成，簡一八四·九爲右半部，簡一八四·一爲左半部，裂痕亦很清晰，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1:3所示，釋文應該讀作“甲渠候官^{田安世以來}”。簡一三三·一：“甲渠官^{張掖甲渠塞尉}九月癸亥卒同以來^{田安世以來}”。簡一三三·四A：“甲渠官^{田安世以來}”。與此文例相類。

例四 簡二三九·八三：二月甲子口口口口口

簡二三九·八五：甲子驛北卒聖以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二三九，出土於A 33（地灣），載於勞《圖》第五五〇頁。簡二三九·八三不僅木質、筆跡和簡二三九·八五完全相同，而且兩枚斷簡所殘留的筆劃，正好合成“甲子驛北卒聖以”七字。可見簡二三九·八三和簡二三九·八五適是由一簡縱裂而成，簡二三九·八三爲右半部，簡二三九·八五爲左半部，裂痕亦很清晰，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1:4所示，釋文應該讀作二月甲子驛北卒聖以。

例五 簡五二·五〇：第十二隊長長諸官自言五月戊子鋪

簡五二·一八：鋪坐入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五二，出土於A 8（破城子），簡五二·五〇載於勞《圖》第一九〇頁，簡五二·一八載於勞《圖》第一八九頁。簡五二·五〇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五二·一八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鋪”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五二·五〇和簡五二·一八，適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五二·五〇爲上段，簡五二·一八爲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1:

5 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第十二隧長V長詣官自言，五月戊子鋪坐入”。簡二六·一二：“第十三隧長黨召詣官，秦月癸丑蚤食入”，簡五二·五七：“第卅六隧成父不幸死，當以月廿二日葬，詣官取急，四月乙卯蚤食入”，與此文例相類，均屬於“詣官簿”的簿錄。

例六 簡七一·二五：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

簡七一·一五：□月辛酉除 □□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七一，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一六九頁。從圖版上面的簡影來看，簡七一·二五上端已斷缺，“新”字上尚有殘留的筆劃。簡七一·一五圖版倒置，將它正過來後，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七一·二五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七一·二五和簡七一·一五，適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七一·二五為上段，簡七一·一五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6所示，發現“年”和“月”字之間，尚應補釋一個“十”字，釋文應該連讀作“□□ 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十月辛酉除□□”，整個簡文共有三段，因為第一段和第三段簡文無法辨認，所以不能確定此簡屬於哪類簿錄。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十月己未朔，辛酉為十月十三日。

例七 簡一〇一·七：□奉餘錢四千□

簡一〇一·三：□千五百五十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一〇一，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四二七頁。簡一〇一·七上端斷缺，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一〇一·三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千”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一〇一·七和簡一〇一·三，適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一〇一·七為上段，簡一〇一·三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7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奉餘錢四千五百五十”，屬於帳簿簿錄。

例八 簡一二二·一：第十七部建平四年十二月戊卒家屬當廩□

簡一二二·一九：□廩名籍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一二二，出土於A 8（破城子），載

於勞《圖》第一五一頁。簡一二二·一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一二二·一九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廩”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一二二·一和簡一二二·一九，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一二二·一為上段，簡一二二·一九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8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第十七部建平四年十二月戊卒家屬當廩名籍”，屬於簿檢，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在《居延漢簡の集成——》中，已將上述兩支斷簡綴合為一簡，甚是。

例九 簡二〇一·九：城北勝卒李忠

簡二〇一·六：穀二石九斗少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二〇一，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四三三頁。簡二〇一·九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〇一·六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谷”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〇一·九和簡二〇一·六，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〇一·九為上段，簡二〇一·六為下段，“斗”字，《考釋》和《甲乙編》均作如是釋，《合校》改釋作“升”，因筆跡漫漶不清，似應仍釋作“斗”字為宜。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9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城北勝卒李忠穀二石九斗少，可能屬於卒廩名籍一類的簿錄。

例十 簡二三三·一七：輒賦予如府

簡二三三·一〇：書律令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二三三，出土於A 21（烽台，在布肯托尼（A 22）的東北），載於勞《圖》第六三頁，《合校》已指出它們可以綴合。簡二三三·一七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三三·一〇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書”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三三·一七和簡二三三·一〇，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三三·一七為上段，簡二三三·一〇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0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輒賦予如府書律令”。又載於勞《圖》同頁之簡二三三·一二：“口累虜隧長誼敢言之：迺戊子口”；簡二三三·一六：“口放所寄器，放以口口”；簡二三三·

二一：“口三百償憚口”；簡二三三·五三：“口口本不受口”；簡二三三·五四：“口減二百五十以上口”，其木質、形制、字體、筆跡亦與上述兩枚斷簡完全相同，可能屬於同一冊書。簡二三三·一六中“以”字後之“口”，應補釋作“布”；簡二三三·五三中“本”字前之“口”，據殘留筆劃和簡二三三·一六的簡文，似應補釋作“放”。“放”，人名。

例十一 簡二三三·一三：五十少千一百五十數責不

簡二三三·二五：可得證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二三三，出土於A21，即布肯托尼（A22）東北的烽火台，載於勞《圖》第六三頁。簡二三三·一三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三三·二五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不”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三三·一三和簡二三三·二五，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三三·一三為上段，簡二三三·二五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1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五十，少千一百五十，數責不可得，證口”。簡二三三·二五中之“可”字，《考釋》、馬先醒等共同編著的《居延漢簡新編》（上）（以下略稱《新編》）、《甲乙編》、《合校》等均釋作“前”，非是，今據圖版訂正。“數責不可得”，迺此類債務文書中的常用語，如簡三·四：“三燠隧長徐宗，自言故霸胡亭長寧就舍錢二千三百卅，數責不可得”；簡三·六：“口隧長徐宗，自言責故三泉亭長石延壽芡錢，少二百八十，數責不可得”。均是其證。

例十二 簡二三九·八〇：口地節五年口口

簡二三九·六五：口年盡元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二三九，出土於A33（地灣），簡二三九·八〇載於勞《圖》第五四九和第五五〇頁，簡二三九·六五載於勞《圖》第五五〇頁。簡二三九·八〇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三九·六五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年”字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三九·八〇和簡二三九·六五，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三九·八〇為上段，簡二三九·六五為下

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2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地節五年盡元”，意即從地節五年到元康某年。地節五年即元康元年，為公元前六十五年。

例十三 簡二四二·三五：戌卒濟陰郡

簡二四二·四一：定陶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二四二，出土於A 33（地灣），載於勞《圖》第五六四頁，《合校》已指出它們可以綴合。簡二四二·三五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四二·四一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郡”和“定”兩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四二·三五和簡二四二·四一，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四二·三五為上段，簡二四二·四一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3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戌卒濟陰郡定陶”，屬於戌卒名籍一類的簿錄。

例十四 簡二四四·一二：□□月壬寅第卅六縣長孫成付

簡二四四·一四：椽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為二四四，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二六一頁。簡二四四·一二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四四·一四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付”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四四·一二和簡二四四·一四，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四四·一二為上段，簡二四四·一四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4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月壬寅，第卅六縣長孫成付椽”，屬於出納帳簿的簿錄。

例十五 簡二四四·一六：第廿五縣長

簡二四四·一三：受第卅六縣長孫成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亦均為二四四，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二六一頁。簡二四四·一六圖版倒置，將它正過來後，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二四四·一三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二四四·一六和簡二四

四·一三，這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二四四·一六爲上段，簡二四四·一三爲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5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第廿五縣長口受第卅六縣長孫成”。這兩枚斷簡不僅與簡二四四·一二、簡二四四·一四出土地點相同，而且木質、形制、字體、筆跡亦完全一致，加之又均出現了第卅六縣長孫成，疑原本同爲一冊書，屬於領取和支付財物一類的帳簿簿錄。

例十六 簡三四六·一四：口八長七尺口

簡三四六·一七：口尺二寸黑色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三四六，出土於A33（地灣），載於勞《圖》第四〇一頁。簡三四六·一四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三四六·一七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尺”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三四六·一四和簡三四六·一七，這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三四六·一四爲上段，上端已缺失，簡三四六·一七爲下段，下端亦已缺失，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6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口八，長七尺二寸，黑色”，屬於出入關門時的檢查登記簿錄。簡一四·一二：“口里上造史賜，年廿五，長七尺二寸，黑色，爲蘭少翁將車”；簡一四·一三：“口口市陽里上造王福，年六十，長七尺二寸，黑色”；與此文例相類。

例十七 簡四八六·二一：口罪死罪職口

簡四八六·四七：口職事數毋狀當口

簡四八六·二：口坐罪當死叩頭死罪死口

以上三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四八六，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三〇九頁。這三枚斷簡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完全相同，而且，“職”字筆劃分別殘留於簡四八六·二一和簡四八六·四七，“坐”字筆劃分別殘留於簡四八六·四七和簡四八六·二，簡文內容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它們這是由一簡橫斷爲三。簡四八六·二一爲上段，上端已缺失，簡四八六·四七爲中段，簡四八六·二爲下段，下端亦已缺失。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7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口罪死罪，職事數毋狀，當坐，罪當死，叩頭死罪死口”屬

於上行文書。簡二七·二“□□□數冊狀，當坐，罪當死，□”，簡二五七·一〇：“來□失□，職事冊狀，罪當死，叩頭死罪死罪□□”，與此文例相類。

例十八 簡四八六·五三：□領甲渠□

簡四八六·五：□□治所封符爲□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四八六，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三〇九頁。簡四八六·五三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四八六·五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渠”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四八六·五三和簡四八六·五，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四八六·五三爲上段，上端已缺失，簡四八六·五爲下段，下端亦已缺失，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8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領甲渠治所封符爲□”。

例十九 簡一一五·一：□卅二縣長聖初除詣官□

簡一一五·二：□六月辛亥鋪時入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均爲一一五，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一八五頁。簡一一五·一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均與簡一一五·二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簡一一五·一和簡一一五·二，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一一五·一爲上段，上端已缺失，簡一一五·二爲下段，下端亦已缺失，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19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卅二縣長聖初除詣官，六月辛亥鋪時入”，屬於“詣官簿”簿錄。

例二十 簡六三·一二：·校臨木十一月□

簡一八八·二一，一九四·一一：□□月郵書二封張掖

居延都尉十一月壬子夜食當曲卒同受收降□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雖然不同，第一枚斷簡爲六三，第二枚斷簡爲一八八、一九四，但它們同出土於A 8（破城子），簡六三·一二載於勞《圖》第一二五頁和六〇五頁，簡一八八·二一，一九四·一一載於勞《圖》第三一一頁。這兩枚斷簡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一月”兩字的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

銜接，可見它們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六三·一二為上段，簡一八八·二一，一九四·一一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20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校臨水十一月郵書二封，張掖居延都尉，十一月壬子夜食當曲卒同受收降□”。日本學者鶴飼昌男在《居延漢簡に及る文書の遞傳について》（載《史泉》第60號，1984年）一文中，已將上述兩枚斷簡綴合成一簡，甚是。

例二十一 簡一四八·一一：右第二亭四月食□

簡五三四·一二：□食簿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雖不同，第一枚斷簡為一四八，第二枚斷簡為五三四，但它們同出土A10（瓦因托尼），簡一四八·一一載於勞《圖》第四四七頁，簡五三四·一二載於勞《圖》第四三七頁。這兩枚斷簡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食”字殘留筆劃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它們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一四八·一一為上段，簡五三四·一二為下段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21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右第二亭四月食簿”，屬於“廩食簿”簿檢。

例二十二 簡四八八·一一：·右第二亭□

簡一四八·一八：□月食簿

以上兩枚斷簡的上方編號雖然不同，第一枚斷簡為四八八，第二枚斷簡為一四八，但它們同出土於A10（瓦因托尼），簡四八八·一一載於勞《圖》第四八九頁，簡一四八·一八載於勞《圖》第四四七頁。這兩枚斷簡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裂痕亦可銜接，可見它們迺是由一簡橫斷而成的。簡四八八·一一為上段，簡一四八·一八為下段，英國學者魯惟一指出，這枚斷簡簡文應為“十月食簿”，甚是。經過綴合以後，如附圖I:22所示，釋文應該連讀作“·右第二亭十月食簿”，亦屬於“廩食簿”簿檢。

以上就是我從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新發現的能够綴合的二十二例斷簡，共四十五枚。其中除例十七是由三枚斷簡綴合而成外，其他均是由兩枚斷簡綴合而成的；從例一至例十九，不僅每組斷簡的出土地點相同，而且上方編號亦相同，例二十至

例二十二，雖然每組斷簡的上方編號不相同，但是出土地點相同；從例一至例四，屬於縱裂，例五至例二十二，均屬於橫斷。通過上述二十二個斷簡綴合的實例，可見能夠綴合的斷簡，必須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出土地點相同，這是前提；二、不僅木質、字體、筆跡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文例亦可銜接，如果屬於橫斷，形制必須完全一致；三、殘留筆劃和裂痕完全吻合；這三者不可或缺。因此，可以預計，無論是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出土的居延漢簡，還是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出土的居延漢簡，或者是這兩批居延漢簡之間，還會有一部份斷簡，是可以通過綴合來恢復其本來面目的。

二、冊書復原舉隅

如前所述，關於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出土居延漢簡的冊書復原工作，海內外的前輩和同行學者，也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取得了豐碩的科研成果，但也並沒有窮盡。這裏因為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像斷簡綴合那樣，把新發現的能夠復原的冊書都一一列舉出來，下面僅舉出“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廩名籍”這一冊書的復原，來加以說明。

關於這個廩名籍復原過程，大體是這樣的。首先，我注意到原簡編號為二五四·二五的一枚簡，簡文如下：

• 凡吏卒十七人 凡用鹽三斗九升 用粟五十六石六斗六升大

這枚簡的上方編號為二五四，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二九八頁。該簡和簡文均完整無缺，用非常恭謹的隸體書寫。簡端先寫一個黑圓點，簡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用大字書寫，分別記載吏、卒的人數和用粟的總量，第二段用小字書寫，記載用鹽的總量，根據簡文的書寫格式，此簡屬於總計簡。“凡用鹽三斗九升”，《甲乙編》本作如是釋，《合校》改作“凡用鹽五斗九升”，非是。今重新予以訂正。

根據簡文所記載的內容，“凡吏卒十七人，用粟五十六石六斗六升大”，則平均每名吏卒用粟三石三斗三升少，正好相當於一個大月的食糧定量。簡二五四·二三：“令史鄭豐，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

少，十一月丙寅□□□”，簡一六一·一〇：“□七隸卒王長，十二月食三石三升少，十一月丙寅卒馮喜取□”，可以印證。可是，同樣根據簡文所記載的內容，“凡吏卒十七人，凡用鹽三斗九升”，第一，這兩個數不能整除；第二，這兩個數相除，則平均每名吏卒用鹽約二點二九升，顯然和其他居延漢簡記載的每月配給食鹽的定量數目不相符合。如簡一三九·三一：“出鹽二石一斗三升，給食戍卒七十一人，二月戊午□□□”，簡二五七·二六：“□七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鹽三升，六月癸巳高霸取□”；破城子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新出居延漢簡E·P·T 53:136中亦記載云：“官卒十一人，鹽三斗三升”；說明居延地區戍卒每月配給食鹽的定量為三升，這可能是大月的標準定量。而小月和閏月的標準定量則為二點九升，如簡二八·一三：“入鹽八斗七升，給鉞庭部卒卅人閏月食，陽朔五年正月辛亥第卅三卒夏奇、第卅四卒范客子受守閏卒音”；又簡二六八·一二：“出鹽二升九合”合二點四五升，均是其證，據陳垣《二千史朔閏表》，陽朔四年閏十二月丙辰朔，閏月為二十九日，平均每名隸卒這個月領取的配給食鹽正好是二點九升。《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其中每人每月用鹽也是約三升，和上述居延漢簡的記載是完全吻合的。如果按照每人每月用鹽三升計算，那麼，簡二五四·二五中的“凡用鹽三斗九升”，正好等於十三人一個月的用鹽總量，換句話說，在十七名吏卒中，有四個人沒有向官府領取配給的食鹽。於是接下來又提出另一個疑問，即在這十七名吏卒中，有哪四個人沒有向官府領取配給的食鹽呢？我帶着這個疑問，發現了簡二五四·二四這枚簡文：

鄭卒李就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有取

這枚簡的上方編號亦為二五四，同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二九九頁。此簡下端左側雖有斷缺，但簡文完整無缺，亦用非常恭謹的隸體書寫。簡文共分四段，第一段記載鄭卒及姓名；第二段用小字書寫十二月領取配給食鹽的總量；第三段記載領取十二月

配給食糧的總量；第四段記載領取配給食鹽和食糧的月、日和領取人。此簡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迹和簡二五四·二五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書寫格式亦相類，可見，它們應該屬於同一冊書。因此，我揣測沒有向官府領取配給食鹽的四個人，可能不是戍卒，而是屬吏。

其次，我翻閱了從破城子出土的有關吏卒廩名籍的簿錄，結果發現了下述三枚簡文：

• 右吏四人 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〇三·一〇 《圖》一三三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二〇三，亦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圖》第一三三頁。此簡和簡文均完整無缺，用非常恭謹的隸體書寫。簡端先寫一個黑圓點，簡文共分兩段，第一段記載屬吏的總人數，第二段記載用粟的總量，平均每人用粟三石三斗三升少，正好等於一個大月的食糧標準定量。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此簡沒有記載用鹽的總量。

• 右鄣卒九人 用鹽二斗七升 用粟卅石

二八六·九 乙貳捌陸版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二八六，亦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甲乙編》圖版乙貳捌陸版。此簡和簡文均完整無缺，用非常恭謹的隸體書寫。簡端的“• 右”，筆跡漫漶不清，《甲乙編》和《合校》均釋作“第九”，非是，今據圖版訂正。亦是簡端先寫一個黑圓點，簡文共分三段，第一段用大字記載鄣卒的總人數，第二段用小字在簡的右側記載用鹽的總量，第三段用大字記載用粟的總量，平均每人用鹽三升，用粟三石三斗三升少，正好等於一個大月的食鹽和食糧標準定量。

• 右省卒四人 用鹽一斗二升 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

一七六·一八，一七六·四五 《圖》二四九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一七六，亦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圖》第二四九頁。此簡在《圖》上為兩枚斷簡，即簡一七六·一八和一七六·四五，《甲乙編》將其綴合成一簡，甚是。“用鹽”，《甲乙編》釋作“粟”，《合校》將“粟”改作“鹽”，因簡文漫漶不清，但據簡二八六·九的書寫格式，似應釋作“用鹽”為是。“十三石”之

“十”，《甲乙編》和《合校》均未釋出作“口”，今據圖版補釋。簡文亦是用非常恭謹的隸體書寫，簡端先寫一個圓點，簡文共分三段，第一段用大字記載省卒的總人數，第二段用小字在簡的右側記載用鹽的總量，第三段用大字記載用粟的總量，平均每人用鹽三升，用粟三石三斗三升少，正好等於一個大月的食鹽和食糧的標準定量。

上述三簡雖然和簡二五四·二五的上方編號不同，但同出土於A 8（破城子）。它們不僅木質、形制、字體、筆跡完全相同，而且簡文內容和書寫格式亦相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將上述四簡所記載的簡文內容進行比較，結果發現：第一，簡二〇三·一〇的第一段簡文“·右吏四人”，加上簡二八六·九的第一段簡文“·右鄣卒九人”，再加上一七六·一八，一七六·四五的第一段簡文“·右省卒四人”，正好等於簡二五四·二五的第一段簡文“·凡吏卒十七人”；第二，簡二八六·九第二段用小字書寫的簡文“用鹽二斗七升”，加上簡一七六·一八，一七六·四五的第二段用小字書寫的簡文“用鹽一斗二升”，正好等於簡二五四·二五的第二段用小字書寫的簡文“凡用鹽三斗九升”；第三，簡二〇三·一〇的第二段簡文“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加簡二八六·九的第三段簡文“用粟卅石”，再加上簡一七六·一八，一七六·四五的第三段簡文“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正好等於簡二五四·二五第三段的簡文“用粟五十六石六斗六升大”。

由此可見，上述三簡和簡二五四·二五，無疑屬於同一冊書；簡二五四·二五屬於整個冊書的總計簡，而簡二〇三·一〇、簡二八六·九和簡一七六·一八，一七六·四五則分別屬於屬吏、鄣卒、省卒等三個部份的小計簡；同時也證明了我在前面所作的屬吏沒有向官府領取配給食鹽的揣測，是符合歷史真實情況的。

再次，然後我分別尋找屬於屬吏、鄣卒、省卒等三個部份的廩名籍簿錄。有關屬吏的廩名籍簿錄，根據簡二〇三·一〇，本應共有四枚簡文，可是，目前祇找到下述一枚簡文：

令史田忠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一三三·七 《圖》二一六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一三三，亦出土於A 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二一六頁。此簡和簡文均完整無缺，用非常恭謹的隸體書寫。簡文共分三段，第一段記載官職名和姓名，第二段記載領取十二月配給食糧的總量，第三段記載領取食糧的月、日和領取人。

其他三枚屬吏的廩名籍簿錄，因為目前尚未發現，因而無法知道他們的確切姓名，但是根據下述有關吏卒廩名籍的諸簡：

令史□□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有取下

尉史□伊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有取下

鄠 令史皇楚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庚子自取下

尉史郭當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戊申有取下

令史郭充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二月丙午自取下

右奉食吞遠

鄠卒□□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壬申有取下

鄠卒趙志生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下

鄠卒馬定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有取下

鄠卒弋南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有取下

鄠卒孟延壽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下

鄠卒孔勝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有取下

鄠卒徐充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有取下

鄠卒王奴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有取下

鄠卒李壽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癸酉自取下

鄠卒樂松之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戊子自取下

施刑桃勝之粟三石十一月庚子自取下

二六·二一 《圖》四一四

令史張宣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鄠 尉史郭常粟三石三升□

尉史史承祿粟三石三斗□

一三九·二〇 《圖》二〇六

鄠 令史任根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令史隗忠粟三石三斗三升少□□

一四二·九 《圖》二三九

可以推測他們應該是指令史和尉史等主管和負責候官文書的屬吏。有關鄣卒的廩名籍簿錄，根據簡二八六·九，本應共有九枚簡文，除了前面已經舉出的簡二五四·二四外，還找到了下述三枚簡文。

鄣卒張竟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二〇三·一四 《圖》一六一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二〇三，亦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一六一頁。該簡和簡文均完整無缺。

鄣卒史賜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
二九二·一 《圖》四二二

此簡載於勞《圖》第四二二頁，在勞《圖》和《考釋》中，原簡編號均作為三九二·一，因為上方編號為三九二的簡，不是從破城子出土的，所以，《甲乙編》將原簡編號訂正為二九二·一，甚是。此簡和簡文的下端均已缺佚，“庚”字，《甲乙編》和《合校》均漏釋，今據圖版補釋。

上述兩簡的木質、形制、字體、筆跡、簡文內容、書寫格式和簡二五四·二四完全相同，應該屬於同一冊書。

鄣卒□□ 鹽三升 十一月庚申自取
二八六·一二 失照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二八六，亦出土於A8（破城子）。雖然因為該簡失照，無從知道它的木質、形制、字體、筆跡，但從所記載的簡文內容和書寫格式來看，即第一段用大字記載鄣卒及姓名，第二段用小字記載領取配給一個大月的食鹽的總量，第三段記載領取配給食鹽的月、日和領取人，其中除漏寫了用大字書寫的“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這一段簡文外，其餘均和簡二五四·二四、簡二〇三·一四、簡二九二·一完全相同，所以，我推測它亦應該屬於同一冊書，都是有關鄣卒的廩名籍簿錄。

有關省卒的廩名籍簿錄，根據簡一七六·一八，一七六·四五，

本應有四枚簡文，可是，目前祇找到了下述一枚簡文：

□胡蘇卒張平 鹽三升 十二月食□

五五·八 《圖》二五二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五五，亦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二五二頁，圖版倒置。此簡和簡文下段均已缺佚，“□胡”，《甲乙編》和《合校》均釋作“執胡”，因筆跡漫漶不清，姑且釋作“□胡”；“鹽三升”，《甲乙編》和《合校》均漏釋，今據圖版補釋。該簡的木質、形制、字體、筆跡、簡文內容、書寫格式，與上述鄧卒廩名籍簿錄完全相同，應該屬於同一冊書。

另外，還有下述這枚斷簡：

□ 鹽三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二七·一〇 《圖》五〇七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二七，亦出土於A8(破城子)，載於勞《圖》第五〇七頁。該簡和簡文上段已經缺佚，“鹽三升”，《甲乙編》和《合校》均漏釋，今據圖版補釋。此簡的木質、形制、字體、筆跡、簡文內容、書寫格式，均和上述鄧卒和省卒的廩名籍簿錄完全相同，它們屬於同一冊書，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由於第一段簡文已經缺佚，所以，它究竟屬於鄧卒還是屬於省卒的廩名籍簿錄，目前尚無法判定，姑且將它視作省卒廩名籍簿錄。

最後，我又翻閱了從破城子出土的和吏卒廩名籍有關的簿檢，從中發現了下述兩枚簿檢：

• 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廩名籍

二〇三·六 《圖》一三三

此簡的上方編號為二〇三，載於勞《圖》第一三三頁。雖然簡的下端有斷缺，但簡文是完整的。簡的頂端先寫一個黑圓點，然後依次記載某年某月、機關和名籍的名稱。“建平”是西漢哀帝的年號，“建平五年”為哀帝元壽元年，即公元前二年；“官”是甲渠候官的略稱；這是建平五年十二月，直接屬甲渠候官統轄的吏卒廩食名籍的簿檢。簡二八七·九：“甲渠官居攝三年三月吏卒廩名籍”；簡五五·二四，

一三七·二〇：“萬歲部建平五年五月吏卒廩名籍”；均與此文例相類。

如果說簡二〇三·六是整個名籍的標題簡或首題簡，那麼根據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從肩水金關出土的“•橐他其當歷始建國二年五月守衙（御）器簿”的體例，下述這枚簿檢可能就是整個廩名籍的尾題簡：

•建□□年十二月吏卒廩名籍

二〇三·二五 《圖》一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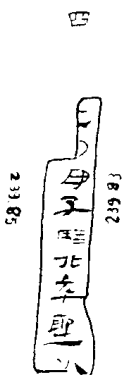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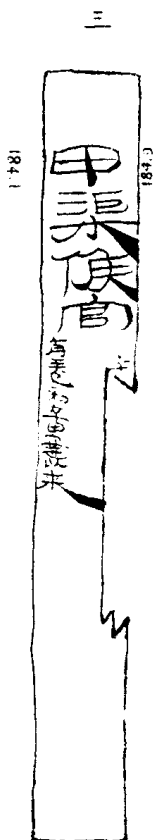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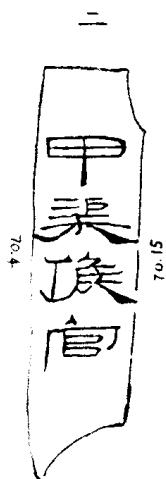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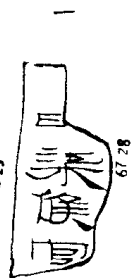
果真如此，“建□□年”，應該是“建平五年”，因為這兩個字的筆跡已經完全脫落，所以，《甲乙編》和《合校》均釋作“建□□年”。另外，根據簡二〇三·六的文例，在“十二月”和“吏卒”之間，原簡還漏寫了一個“官”字。

以上就是我從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所復原的“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廩名籍”，這個廩名籍共由二十三枚簡組成，可是，現在僅存十三枚簡，有十枚簡已經缺失；嚴格說來，這個名籍屬於一個不完整的冊書。儘管如此，整個廩名籍的基本結構和全貌已經大體清楚，現將它排列於後，如附圖Ⅱ所示。

通過“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廩名籍”的復原，使我們對居延等漢代西北邊陲屯戍地區的吏卒廩食制度，又得到了若干新的認識。第一，凡是在居延戍邊的官吏，雖然每月都由官府配給和戍卒同等數量的食糧，但不配給食鹽。第二，而在居延戍邊的戍卒，不僅按月都由官府配給一定數量的食糧，而且同時配給一定數量的食鹽；食鹽的定量標準為大月每人每月三升，小月或閏月每人每月二點九升。如果沒有得到官府配給的食鹽，戍卒還可以直接向官府投訴，如簡一三六·四四云：“卒胡朝等廿一人，自言不得鹽，言內。•一事集封，八月庚申尉史常封。”即是其證。第三，為什麼在居延戍邊的官吏，官府不配給食鹽呢？換句話說，他們每月所需要的食鹽，又是通過什麼渠道來供應的呢？這個問題，廩名籍並沒有具體說明，但是通過居延簡和文獻記載，我推測大概主要因為戍邊的官吏，按月由官府發給薪俸，所

以，他們所需要的食鹽，是用他們所得到的俸錢來購買的。如《全後漢文》卷四十六，崔寔《政論》中云：“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芻、膏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斗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姦生矣。”明確說到百里長吏每月所需要的薪炭鹽菜共五百錢，是由他每月所得到的俸祿錢來支付的。又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從肩水金關新出的地皇三年“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書亦云：“•勞邊使者過界中費：梁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米三石，直四百五十；羊二，直五百；酒二石，直二百八十；鹽、豉各一斗，直卅；醬將薑，直五十；•往來過費凡直千四百七十，•肩水見吏廿七人，率人五十五。”亦說明招待這位使者在肩水金關等地所食用的米、肉、酒、鹽、豉、薑錢，都是由肩水地區的現任官吏等廿七人，平均每人支付五十五錢來購買的。

附圖 I



五

第十隊長長 誦官自言日月成次鋪入

52.90

52.19

六

建國建業三

71.25

71.15

七

年解心四子五

101.7

101.3

八

第十部建平四年三月

122.21

122.19

九

城北隊年表

201.9

201.6

一〇

轉勝子妙有書肆

233.11

233.10

一八
領甲藥油
486.53
486.5

五
第二隊長
244.16
父事長
244.13
子事長

二六
346.14
346.17
二六

24241 242.35
美和堂藥局

三黃黃世興隱長孫茂付孫

233.25
233.15

[illegible]

一九

世隱長臣初陳頤
六月辛亥歸時人

115.1

115.2

二〇

校浚水有部去討接居
都子十月辛亥食當曲子
食女效陳

63.12

194.11

188.21

二一

孝子高四月食薄

148.11

534.12

二二

名美三高月食薄

488.11

148.18

附圖Ⅱ

一
建王季土月官吏卒乘
名摺

二
吏憲
土月官吏卒乘
土月吏卒乘

三 缺
四 缺
五 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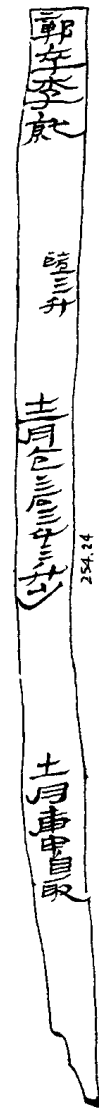
六
吏憲
土月吏卒乘
20310

七


 鄭卒 殳 監 三 升
 土 月 食 三 石 三 升 少
 土 月 庚 申 自 取

203/4

八


 鄭卒 李 廋 監 三 升
 土 月 食 三 石 三 升 少
 土 月 庚 申 自 取

254/24

九


 鄭卒 大 賜 監 三 升
 土 月 食 三 石 三 升 少

392/1

一〇 鄭卒 □ □

監 三 升

十二月食三石三升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圖版缺)

286/2

一一 缺

一二 缺

一三缺

一四缺

一五缺

一六
 石鄭平九
 用票廿石
 286.9

一七
 均發三長下
 土月
 855

一八
 土月金三石三升
 27.10
 土月庫中三取

一九缺

二〇 缺

右省本史 176.18

卷三十三 用筆三十三 176.45

二二
凡用臨三九
用藥五十六石六升大

二三
建
辛丑月
辛亥年
辛酉月
辛酉日

203 25

居延漢簡研究二題

曾憲通（中山大學中文系）

一、“刑德七舍”疏證

80年代初，筆者曾將秦簡《日書》中的“日夕消長表”歸納為七式，發現它們與《淮南子·天文訓》的“陰陽刑德七舍”有關。^①1990年《居延新簡》出版，在破城子的不同探方中又發現兩枚與“刑德七舍”有關的殘簡。見於43號探方的簡文有殘缺，釋文作“□術巷門庭堂□堂庭門巷術野”；見於65號探方的簡文字距較疏，釋文作：“德堂庭門巷術野術巷門庭堂內中”。根據文例，筆者將前一簡的第一個缺文補出為“野”字，中間的缺文補出為“內中”二字。並草成《居延新簡“刑德七舍”疏證》（提要）一文於1991年7月提交在蘭州舉行的“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討論，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興趣。裘錫圭同志指出這一發現很有意思，同時，他根據另一簡以“德”字開頭的格式，頗懷疑第一枚殘簡的首字有可能是“刑”字之殘。事關此一重要材料的準確性，因向大會提出核對原簡的請求，很快就得到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意，在何双全同志的陪同下，我和裘錫圭、朱國韶同志獲準到研究所仔細察看了原簡，發現該簡在簡首的殘缺部分，確有“刑”字的筆跡，證明裘錫圭同志的推測完全正確。其後，劉樂賢同志在寫作博士學位論文時，又發現《居延新簡》甲渠第四燧探方二出土的一枚殘簡上有“德所在……堂”的字樣，也應屬刑德七舍的內容。^②至此，就居延漢簡所見，已有三枚木簡與刑德七舍有關。現一併揭示如下：

(1)、**刑** **野** 術巷門庭堂 **內中** 堂庭門巷術野 (E.P.T. 43:185)

(2). 德_西室_中堂庭門巷術野術巷門庭室_中 (EPT 65: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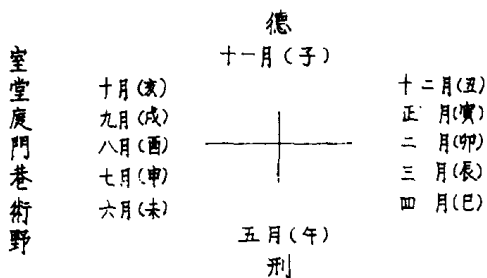
(3). 乙德所在_{口口}堂_{口口} (EP54T2: 80)

以上三簡出自不同的坑位，從字體行款判斷，當出於不同的書手。值得注意的是，與(1)號簡相配的原本應有另一枚以“德”字開頭的簡；與(2)號簡相配的也當有另一字距較疏以“刑”字開頭的簡；但都佚去，而幸存的兩簡正好互補，合成雙壁，這完全是一種巧合。第(3)簡“德所在”且下有“堂”字，則是對“德”在七舍中運行軌跡的說解。此外，銀雀山簡有“無故而庭術巷皆高其西方而下口……”者，當亦屬於此類。以上數簡雖殘缺不全，但從中可以看到漢代關於“刑德七舍”觀念流行的情況，且可與相關文獻互相印證，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淮南子·天文訓》云：“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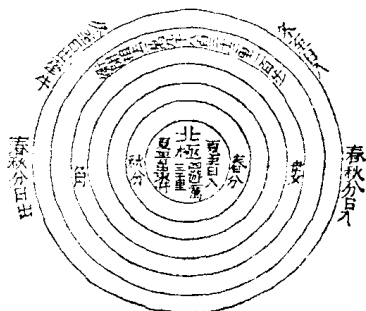
將《淮南子》的刑德七舍與居延漢簡加以比照，便不難發現，除《淮南子》的“室”居延簡作“內中”外，其餘悉同。《太平經》卷四十四有“刑德”篇，其中稱室為“內室”或“室中”，居延簡作“內中”者蓋其異名。由上引《天文訓》這段文字，可知居延簡之刑德，乃屬陰陽之刑德，七舍則是陰陽刑德一歲運轉之七個處所。德自內而漸外，刑自外而漸內，二者相對而行。《天文訓》又云：“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淮南子》以刑德為雌雄二神，德合子左行，依次為室堂庭門巷術野，故自內而漸外；刑合午右行，依次為野術巷門庭堂室，故自外而漸內。以十二辰配十二月，十一月建子謀德與五月合午謀刑各兩級，其餘十二月同十月（丑亥）；正月同九月（寅戌）；二月同八月（卯酉）；三月同七月（辰申）；四月同六月（巳未），

共有七式，配以七舍，依次而行。表示如次：



根據清錢塘《天文訓補注》，《淮南子》所謂的七舍，是指日月刑德陰陽之所居，自子至午有七辰，故謂七舍。“室為子，堂為丑亥，庭為寅戌，門為卯酉，巷為辰申，術為巳未，野為午。此七舍，以門為中，在門內者為庭堂室，在門外者為巷術野。”至於何以冬至為德？夏至為刑？《天文訓》的解釋是：“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這就把刑德的概念同斗柄的運轉及陰陽二氣的消長直接聯繫起來，使刑德具有“月氣”的屬性。

與“七舍”相類的還有“七衡”，見於《周髀算經》的“七衡圖”，是用圖解方式來表明廿四節氣與刑德之間的關係的。七衡圖以北極為中心，從裏到外共有七圈，每圈一衡，謂之“七衡”。第一衡即最內衡為夏至日道，第二衡為小滿、大暑日道，第三衡為穀雨、處暑日道，第四衡即中衡，相當於春秋分日道，第五衡為雨水、霜降日道，第六衡為大寒、小雪日道，第七衡即最外行，為夏至日道，衡與衡之間稱為“間”，共得六間。七衡相當於十二個月的中氣，六間則相當於十二個月的節氣，其運轉周期也存在七式，與上述陰陽刑德七舍之月氣大致相同。詳下《周髀算經》七衡圖。



根據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對《周髀算經》的研究，七衡圖內衡“春分”、“秋分”四字和外衡“春秋分日出”、“春秋分日入”十字，都應寫在第四圈的旁邊，因為這十四字都是對第四衡“春秋分日道”所作的說明（見《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第131頁）。七衡圖是古代周髀家運用勾股法觀測天地，通過圓規式平面圖來說明一年節氣的變化，它同《淮南子》的陰陽刑德七舍一樣，都反映太陽在一年內的運行規律，猶以二至二分最為明顯。例如：

七衡中的外衡為冬至日道，相當於七舍的室；七衡中的中衡為春秋分日道，相當於七舍的門；七衡中的內衡為夏至日道，相當於七舍中的野。餘類推。

我們再將秦簡《日書》的“日夕消長表”，按照“二至二分”的排列方式，正好排成七式，且可與《淮南子》及居延漢簡的七舍和《周髀算經》的七衡相搭配，從中可以看到它們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

七式	秦簡日夕消長表	《周髀》 七衡	《淮南子》 七舍
(1) 式	十一月(子) 日五夕十一	外衡	刑德 野室(內中)
(2) 式	十月(亥) 日六夕十 十二月(丑)	第六衡	術堂
(3) 式	九月(戌) 日七夕九 正月(寅)	第五衡	巷庭
(4) 式	八月(酉) 日八夕八 二月(卯)	中衡	門門
(5) 式	七月(申) 日九夕七 三月(辰)	第三衡	庭巷
(6) 式	六月(未) 日十夕六 四月(巳)	第二衡	堂術
(7) 式	五月(午) 日十一夕五	內衡	室(內中) 野

上表秦簡“日夕消長表”見於《日書》，它表明一年十二個月中晝夜長短的變化，共七式，正可與《周髀算經》的七衡和《淮南子》及居延漢簡的刑德七舍互相挾發和證明。從表中可以看到，(1)式為冬至日道，日五夕十一，晝最短而夜最長，相當於七衡中的外衡和七舍中的室（《淮南子》）或內中（居延漢簡），所謂陰氣極、陽氣萌，故為德；(4)式為春秋分日道，日八夕八，日夜分平，相當於七衡中

的中衡和七舍中的門，所謂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7)式爲夏至日道日十一夕五，晝最長而夜最短，相當於七衡中的內衡和七舍中的野，所謂陽氣極，陰氣萌，故爲刑。由此看來，陰陽刑德是通過自然規律的週期性來體現的。十一月斗建子，故德在室（內中）刑在野，十二月斗建丑，故德在堂刑在街，正月斗建寅，故德在庭刑在巷，二月斗建卯，故刑德合門。由此推之，三月德在巷則刑在庭，四月德在街則刑在堂，五月德在野則刑在室（內中）；而六月如四月，七月如三月，八月如二月，九月如正月，十月如十二月，一年而刑德週矣。

刑與德的觀念，很早就植根於中國古代社會政治和宗教文化之中，並且與天命觀有着密切的關係，隨着天道有自然觀和陰陽五行說的流行，天命思想對人類的影響越來越大，舉凡日月之運行，星辰之週轉，四時之循環，陰陽之交替，五德之代興，無處不是自然神力的表現，由它主宰社會人事和國家政治的命運。在這一背景下，刑和德便變成表示與自然規律周期性同時存在的吉凶。這就是陰陽刑德逐步數術化乃至應用於占卜的由來。

《淮南子》將刑德分爲一歲之刑德與二十歲之刑德二類，居延漢簡的刑德即屬於一歲之刑德。它是以刑德所在七舍表示一歲之內各個月份陰陽二氣此消彼長的過程，帶有“月氣”的色彩，從殘存簡文“德所在”及“堂”看來已有相當明顯的數術傾向，其性質當與蕭吉的《五行大義》所歸納之刑德月氣占相類。月氣占以各月陰陽二氣的消長變化占候月事宜忌與吉凶。流行於東漢中晚期的《太平經》中載有“案書明刑德法”一章，^④即在刑德七舍的基礎上稍事纏繁。《刑德法》云：“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爲萬物人民之法度。”書中分“用德”與“用刑”兩大類十二項，以刑德所在月份與七舍、卦爻相配，其用於占卜的目的更爲明顯。通過居延漢簡、臨沂銀雀山漢簡爲數有限的殘文，結合《淮南子》、《太平經》等相關記載，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漢代刑德月氣的粗略概貌。

二、契齋所藏居延漢簡考述

先師商錫永先生（號契齋）生前珍藏“居延漢簡”一函，函套爲

藍布面白綢裏，先生於白綢上手書“居延漢木簡”五字，下注“元壽為西漢哀帝年號”，楷體端莊秀雅，同隸草兼備之漢簡墨跡相映成趣。函內木簡五枚，釋文依次如下：

- (1)、客子漁陽郡路縣安平里張安上 馬二匹
輜車二乘 (甲附40)
- (2)、長安有利里宋賞年廿四長七尺二寸黑色 己(甲附37)
- (3)、元壽二年三月甲子朔丁丑，中部候史薛君伯口
竟十一月錢畢，捐不得忠藏責君伯錢，君伯即口 (甲附41)
- (4)、明府懷憐全命，未忍行重法，叩頭死。罪。前府丞送府口
比 (甲附38)
- (5)、永光元年六月丙申朔，甲渠鄴候喜敢言之。府移太守府，都
吏書曰：昭縣繅得御所失亡 (甲附36正面)
士吏彊、令史宣 (甲附36背面)

以上(1)、(2)為關傳名籍，(3)為文書，(4)是信札，(5)為應書。

關傳簡是吏民出入關津個人身份的憑證，除書寫持證人的籍貫姓名之外，一般還要寫明持證人的年齡、身高、膚色以及隨同出入關津的物品等。簡(1)長23.3厘米，相當於漢制一尺。簡文“客子”是主人的隨從。漢代官吏出入關津多帶隨從，此簡為隨從者身份之憑證。上書隨從者的名籍。漁陽郡，秦始置，漢承其制，其地在今北京市東、天津市北及長城以南一帶，故城在漁水之陽，故名。路縣為漁陽郡屬縣。簡文“馬二匹”與“輜車二乘”用小字雙行夾書。“輜車”即“小車”。《國語·齊語》：“服牛輜馬”，韋昭注：“輜，馬車也。”簡(1)是說隨從者張安上有二架與主人合用的小馬車，隨同出關入關。

簡(2)長23.8厘米。持證人名為宋賞，來自長安。簡文“宋”字末三筆寫作“小”，為“賞”字起筆所借用。簡末處書一“卩”字，在漢簡中極為常見，過去以為是簽押符號，其實“卩”就是“己”字的特殊寫法，早在長沙仰天湖戰國楚簡的“遺策”中就已出現，當時寫作𠄎、𠄏或𠄐、𠄑，可見己是已分化出來的。祇要把後一種寫法的末筆引長作“卩”，就同漢簡的“卩”字無別。漢簡把己寫成卩，顯

然是在漢代“長筆”的影響和支配下形成的（參陸錫興《釋P》，刊《考古》1987年12期）。“己”字書於簡末、表明有關的核驗手續已經完結。

簡(3)簡面較寬，並書兩行。這種形制的簡或稱為“兩行”。殘存15.6厘米。據文意，當是記載一樁與中部候史薛君伯債錢有關的債務文書。債務人忠藏向債權人薛君伯借到債錢若干，原定十一月底還清，薛君伯派收債人捐前往收取，仍未兌現。由於簡文下半殘去，其詳不得而知。事在西漢哀帝（劉欣）元壽二年，當公元前1年。

簡(4)下端稍殘，存22.6厘米。簡文“明府”他處或稱為“明官”。如居延新簡云：“明官哀憐全命，未忍加重誅，殺身靡骨不足以報塞厚恩，叩頭死罪。”（《居延新簡》EP T 52.165）句式與此大同。“明府”是漢人對太守的敬稱，見《漢書·韓延壽傳》。韓延壽出門因騎吏後至而令定其罪名，門卒謂延壽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放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後漢書·孫寶傳》：“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李善注：“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叩頭死罪死罪”是下級對上級感恩自責之恒語。簡文“明府哀憐全命，未忍行重法”云云，是對太守憐恤輕判表示感戴。此件屬感恩恕罪之信札。

簡(5)長22.8厘米，兩面書寫。正面為甲渠鄴候任喜回應都尉府與太守府行文的應書，一般以“敢言之”為格式。“永光元年”當公元前43年，“永光”乃漢元帝劉奭的年號。“府移太守府”，是指居延都尉府發文下行至張掖太守府。“都吏”為太守府屬吏。“樂得”本為匈奴地名，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置為縣，屬張掖郡治。本簡“昭縣樂得”及《漢書·霍去病傳》“揚武乎樂得”即其地。簡背則是士吏和令史的簽署，二者皆甲渠障候官屬吏，職掌文書。

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居延漢簡甲編》時，錫永師曾提供所藏漢簡照片，由編者輯入該書附錄（自甲附36A·B—甲附41）。

其中甲附39與本函漢簡無涉，不知是從何處闖入的。五枚木簡的編次也與函內排列序次不合，當據此函予以更正。據《甲編》“後記”所述，上揭契齋藏簡當得自袁元善處，原是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黑城附近所得兩漢木簡的一部份，因被盜竊出來而流失四方。此函幸歸先生妥善收藏，雖歷經半個多世紀，而字跡卻清晰如新，實在是值得慶幸的。

注釋

①、《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頁81—95，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

②、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108—109，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

③、銀雀山漢簡殘文是：“……是胃（謂）通德必川谷無故而庭術巷皆高其西方而下口……”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0597簡（陰·一二），1985年12月出版。

④、王明《太平經合校》頁105—106，中華書局1960年。

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 ——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三

邢義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稍習漢代簡牘者皆知，在漢邊候長、隧長的考課中，“能書”“會計”、“知律令”是三項標準。所謂能書，是指能否以公文常用的書體——史書，也就是隸書寫公文；所謂會計，是指基本的計算，這是應付漢代軍隊行政中無數報表計簿不可少的基本能力；知律令，則應是泛指對各種法令條品規定的知識。由於居延和敦煌簡的出土，使我們知道他們能書，知計算和知律令的能力並不是擔任這些職務以前就必然具備，而是在擔任職務的過程裏，逐漸學會的。例如破城子探方五十一所出一關於隧長的“除書”簡中明白注明他在除為隧長時“不史”：

1、居延甲渠第二隧長居延廣都里公乘陳安國年六十三建始四年八月辛亥除 不史(EPT 51:4)

在另外兩支除書簡中，則分別注明一位候史，一位候長為“史”(EPT 51:9A, EPT 51:11)。所謂“史”或“不史”，于豪亮已清楚考證就是會不會以隸書寫公文的意思(《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一九八五，頁二〇二——二〇三)。經過學習，原不會寫的變成會寫，在個人資料上也有記錄。例如敦煌簡載，玉門千秋隧長呂安漢“故不史今史”(《敦煌漢簡》，1186AB，圖版139)，意思是他原不知史書，今已知史書，就是明顯的一例。另一個于豪亮曾引用過的例子，可以證明隧長史或不史不但有記錄，記錄還經考核；如有不符，上級會追問，要求提出解釋：

2、校甲渠候移正月盡三月四時吏名籍第十二隧長張宣史案府籍

宣不史不相應解何（129·22 + 190·30，勞圖版429）

從上引數例可知，“史”或“不史”最少出現在：（1）除書，（2）四時吏名籍，（3）府籍（疑指存於都尉府之籍）和（4）計功勞的簿籍（前引呂安漢簡為一計功勞之簡）等四種記錄中。除為隧長的有不知史書的，不過還沒有發現候長或更高的官吏不知史書的。換言之，漢代任命隧長，原或不必然以識字、知書，能算為條件。但為應付職務上的需要，為了升遷，恐怕不得不去學習，學習的結果經過考核，並會記錄下來成為人事資料的一部份。這樣看來，漢代邊塞的軍中教育就成為一個有趣且值得注意的問題。

根據漢代的徵兵制度，除了北邊徵為騎士的良家子，其餘士兵絕大部份原來是農人。文帝時，馮唐答文帝之間，有一段提到：“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史記·馮唐傳》）從居延出土的簡牘看，漢代邊塞的確有大量來自內郡的田卒。墾田耕作對這些到邊塞充當田卒的人來說，可能是最駕輕就熟的事。這些農夫原本有多少曾讀書，會識字，我們今天沒有任何依據可以作準確的推算。不過，可想而知，在漢代地方郡國學校尚未普及以前，一般平民的識字率是不可能高的，即使地方學校設立以後，能入學的多半也是少數當地豪門或吏的子弟。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官於成都市，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漢書·循吏傳》）。富人出錢求之，其結果可知。東漢建武時，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後漢書·循吏傳》）。如此一來，一般人的機會就十分有限。漢代的農人絕大多數祇可能是文盲。漢代軍隊中的“籍”和“符”都使用文字，文盲自然沒辦法瞭解尺籍伍符為何物。馮唐的話可以使我們推想，入伍服役因而可能是漢代一般百姓識字和受教育的一個重要機會。一旦入伍服役除了必要的軍事訓練，他們有機會學會文字，知道書寫，會算術，甚至認識一些基本的國家法令。

漢代邊塞的軍中教育反映在居延和敦煌大量出現的（1）練習寫字的簡牘，（2）字書《倉頡》或《急就》篇，（3）九九乘法表簡。在兩地

邊塞出土的簡牘殘籍自然不祇以上所列，其他醫方、曆書、日書、占書、兵書、經書及失傳古籍都有，但最多的無疑是最基本的字書和算書，學習律令似乎沒有特殊的教本。字書《急就》第廿八章至卅章，已經將律令及司法的基本知識納入。讀《急就》即可習得第一步的律令知識（參拙文《秦漢的律令學》，《秦漢史論稿》，東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頁八〇—八一），關於《倉頡》、《急就》及《九九》，研究的學者很多（最新一篇研究九九術，蒐羅甚富的見甌燕、文本亨、楊耀林，〈從深圳出土乘法口訣論我國古代九九之術〉，《文物》9，1991，頁78—85）。這裏特別注意的是吏卒對烽火品約的學習。烽火品約是廣義律令的一部份。在72—74年出土的居延簡中有以下簡：

3. □□卒諷讀薰火品約第十七候長勝客第廿三□（EPT52:33）

4. □知讀薰火品約□（EPT52:45）

5. □卒一人讀薰火品未習（EPT52:66）

6. 吞遠隨長救之 卒人讀薰□（EPT52:156）

從這些簡可知吏卒需能諷讀烽火品約，不能熟讀的稱為“未習”。吏卒是否習知烽火品約，列入長官行塞督察的項目。始建國地皇四年七月的行塞省兵物錄中有一條規定：

7. 省候長鞏馬追逐具吏卒皆知薰火品約不（EPF22:237）

這條是說要省察候長是否備妥鞏馬和追敵的器具以及吏卒是否都知烽火品約。如果候長居然不知諷讀品約，即構成遭到斥免的一項理由：

8. □□里上造張熹萬歲候長居延沙陰里上造郭期不知讀薰火兵弩不樂持惠□□□斥免它如爰書敢言之（EPT59:162）

一般戍卒或隧卒是否知烽火品約也在考核之列，如何獎懲則不清楚：

9. □竟 卒三人一人病 卒符憚月廿三日病傷汗

二人見

卒范前不知薰火品（46.9A，勞圖版473）

從與第6簡出自同一坑位的另一簡上，我們知道當時吏卒需要諷讀的還有其他的“條品”：

10. 口皆諷讀知條品方循 (FPT 59: 274)

以及其他的品約，如：

11. 口聲窳深目各口諷誦品約口 (118·4, 勞圖版 542)

以上第3、4、5簡中的“讀”，第6簡中的“讀”，都是“讀”字的異寫。這就關係到漢邊吏卒“書”的傳授和“能書”的程度不一。此外，所謂“諷讀”或“諷誦”，指的是背誦和閱讀。《漢書·藝文志》：“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說文解字》許慎序作：“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九千字乃得爲史”。段注：“周禮注曰：倍文曰諷；竹部曰：籀，讀書也；毛詩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抽即籀，籀，讀二文爲轉注”。背誦不一定需識字，閱讀則必識字不可。漢邊任烽火戍卒，必然需要熟知烽火品約，能背誦應是起碼的要求，能讀其文字則需先識字。

出土簡牘中有很多字書殘簡或觚，還有不少練習寫字的簡，過去大家較注意字書簡，並不很注意習字簡，其實兩者對瞭解漢代邊塞的教育同樣地重要。如果稍稍檢視這些練習的內容，就可以發現絕大部份練字是在廢棄的簡牘上，以現成的公文——各種籍或記錄爲範本，重複抄寫公文中的某些字句或部份的內容。例如不少學者研究過的“徐宗”簡(24·1B, 勞圖版 220)，據個人考察原簡，就不是正式簿冊的一部份，而是以某一簿籍爲範本，重複抄寫其內容的一支牘(參〈從居延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新史學》三卷一期，頁一二七——一二九)。其他這一類例子可參見如：

出於地灣 A 33：

183·11AB (勞圖版 35：以下省勞圖版三字)，125·38A(35)，
31·1A(121)，183·8(544)，

出於博羅松治 P9：

413·5A(109)，

出於金關 A 32：

43·31(419)，75·10AB(580, 581)，

出於破城子 A 8：

26. 9AB (140, 141), 45. 10AB (155, 156), 175. 5 (172), 234. 5 (181),

133. 2AB (205, 206), 133. 4AB (206, 207), 24. 3 (208), 24. 8 AB (209, 211),

28. 21AB (215, 216), 24. 1AB (219, 220), 160. 7 (230), 286. 26AB (243, 244),

286. 27AB (243, 244), 282. 16 (262), 185. 30 (266), 220. 20 (287), 229. 5AB (291, 292), 271. 7AB (305, 306), 317. 23 (326), 283. 8 (363), 285. 9AB (370, 371), 4. 17AB (379, 380), 4. 6AB (445, 446), 157. 23 (476), 160. 5AB (507, 508), 160. 9AB (506, 507), 262. 35AB (510, 511), 311. 7 (576), 479. 14 (577), 67. 12 (577), 259. 13AB (594, 595)。

這些例子幾乎都是利用廢棄的簡牘，重複書寫簡牘上的文字。漢書資源有限，簡牘都是儘可能重複利用。學習寫字並沒有專門的練習簿。學書的人有機會以公文為範本，可見他們的學習方式基本上頗類似現在的在職訓練。漢代閭里有教書寫的“書師”，邊塞簡牘中不見其例。擔任書師工作的也許就是那些在簡中注記“能書”的那些人吧。這樣的在職訓練，用秦漢時的話說就是“以吏為師”。漢邊塞以吏為師的情形和內郡看來並無不同（參前引拙文〈秦漢的律令學〉）。

居延和敦煌也出土不少九九術的殘簡，這些殘簡書寫的格式不一，橫豎皆有（例如：36. 5，圖版34，直書；75. 19，圖版430，橫書多排；《敦煌漢簡》2170，圖版173，橫書多排）；在書法和格式上，不像出土的《急就》或《蒼頡》殘觚那樣工整和一致。個人懷疑九九術的教授和學習可能不像字書那樣有教本，而是如甌燕等學者提出來的以背誦口訣，再默書的方式教和學（參前引文）。因此我們在居延和敦煌所見的九九簡應是學算時練習抄錄的痕跡。甌燕文也提到居延九九簡分別出自A33, A32, A8, P9等地一樣，這和其他練字簡分別出自A33, A32, A8, P9等地一樣，反映識字和學算的活動並不特別集中某處，而應是普遍存在於邊塞的烽隧線上。漢代邊塞雖有軍中教育，似乎並沒有特

定的“學校”。吏卒在工作之餘，向識字、知書、能算的的夥伴請教，利用葉簡作些練習，這應是他們學習的主要方式吧。

漢代的軍中教育，在內容上當然不以以上提到的為限。一支軍隊要維持軍事勤務和日常生活，從耕種、養馬、造屋修路、製造日常用具、兵器，到醫療、占卜等等，需要各式各樣特殊的技能和人才。敦煌簡中提到戍卒有“能為集履”（《敦煌漢簡》，270），為“木工”的（同上，253）。應徵戍邊的士卒或原有這些技能，但也必有不少是入伍後纔漸漸學會的。我們也許可以稍作想像，每年從內郡有數以千計的田家子徵調到邊塞戍守。他們在這裏有機會受到一定的教育：不論是騎射或“尺籍伍符”，或某些特定的技能，或是識字、知書、能會計，甚至知律令；一年或若干時日之後，他們又解甲回鄉，成為鄉里中見過世面（更何況那些番上京師為衛士的），有“文化”的一羣，這對鄉里地方造成什麼影響，對帝國內部的凝聚和文化的傳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實在是一些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81. 5. 13

後記：本文曾請裘錫圭先生指教，獲益良多，謹此誌謝

（原載《大陸雜誌》第八十七卷第三期）82. 7. 27

關於居延“車父”簡

王子今（中央黨校歷史教研室）

居延出土漢簡中可見出現“車父”字樣的簡文。“車父”稱謂未見於史籍，然而就現有資料所知“車父”活躍於漢代邊地軍事生活與經濟生活中的事實，使得人們不能忽視其歷史作用。“車父”身份、職任之研究，應當有助於全面分析漢代軍役制度，全面分析漢代運輸組織形式，也可以豐富對漢代社會生活的認識。

一

居延漢簡涉及“車父”的簡文，可輯錄數十例，其中可能屬於所謂“車父名籍”者，以其文例之整齊尤其引人注目。如：

(1) ● 新野第一車父連□ 145.4

(2) 父城第一車父南陽里執毋適
□
□
□
□
E·P·T 56:68
E·P·T 52:209

(3) 第三車車父與

(4) 戍卒梁園睢陽第四車父官南里馬廣□
鉤二 承鉤二破
鉤二 釜一完
303.6 303.1

(5) 河東縣第四車父直□

弩一箭百

E·P·T 8:9

(6) 長社第五索車父□□

E·P·T 11:7

(7) □陽第七車父□陽里郭王

287.21

279

(8) 杜延第七車父市陽里□□

E. P. W: 61

(9) 內黃第十五車父魏都

101.29

(10) 淮陽郡□平第十五車父□平里陳尊

襲一領

復鈎一兩

果履二兩

498.12①

(11) 第廿三車父范昌 □

E. P. T 51: 315

官具弩七 鉗胡一 弩轡九 承轡十四

承弩二 由皮一 蘭七 私劍八

(12) 第廿五車父平陵里辛盈川

有方三 新干十 蘭冠七

囊矢三百五十 新轡十 服七

囊矢千五十

10.37

桐六其一傷

(13) 第廿九車父白馬亭里富武都

斧二 大鉗一

斤二 小鉗一

67.2

(14) □車父竹里董貞

E. P. T 58: 63

(15) 東緡□□車父梁任

580.5

(16) ■車父名籍

157.4

以上可能屬於“車父名籍”的諸簡，文式大體皆為：縣名——車序——“車父”——里名——姓——隨車物件記錄。

簡(7)“□陽”，陳直先生《居延漢簡綜論》據勞幹釋文“實陽”，以為“當即雲陽之別體”②。簡(4)“官南里”，《居延漢簡甲編》、《居延漢簡甲乙編》、臺北1960年重訂本《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皆將“里”字分釋為“旦一”，誤③。簡(15)“東緡”，《居延漢簡甲乙編》作“束緡”，《居延漢簡釋文合校》訂正為“東緡”，然而第5.6字仍作“車H”，原簡失照，然對照其他簡文可知當為“車父”之誤釋，原簡文或當為“東緡園□車父梁任”。

與以上十數枚“車父”簡文例略有不同，但似乎亦可歸入“車父名籍”一類者，又有：

郡

(17) 南陽新野車父□□

72.42

- (18) 第卅二卒王弘車父 木十五枚 付弘軸一
 新野第四車 泉三□
 □六枚
 箱泉車二枚 E.P.T57:60

- (19) 南陽某車父武后第十七車
 (以上為第一欄)
 輪一具 挾柔福(幅)七 輶指福(幅)一 折 佐爰完
 杙軸完 (以上為第二欄)

E.P.T51:251

- (20) □長修車父功孫□□ E.P.T5:108

又有雖不宜歸入“車父名籍”，然而亦標注“車父”依縣籍編次車序者，如：

- (21) 貝丘長道敢言之謹伏地再拜請伏地再□ E.P.T56:138A

- 貝丘第三車父田敢第三車父田敢□ E.P.T56:138B

又如：

- (22) 回順陽車父唐妨竈篋 257.1

簡端有封泥印匣槽，當與當時邊塞私衣財物“封臧”(213·15)“閭官”(214·93)的制度有關。

簡文有的標記所屬郡國，如簡(4)、(5)、(10)、(17)、(19)、(20) (郡名“河東”缺失)；有的則祇具縣名，如簡(1)、(2)、(6)、(7)、(8)、(9)、(15)、(18)、(21)、(22)；有的甚至僅見車序。

由“車父”簡所見資料，可知這些“車父”由以下郡縣行至河西：

郡國	縣	所見簡	縣治今地	備 注
左馮翊	雲陽縣：	(7)	陝西淳化西化	據陳直先生說
河東郡	彘 縣	(5)	山西霍縣	
	長修縣	(20)	山西新絳縣	
潁川郡	父城縣	(2)	河南襄城西	
	長社縣	(6)	河南長葛東北	
淮陽郡	長平縣：	(10)	河南西華東北	《漢書·地理志》屬汝南郡

郡國	縣	所見簡	縣治今地	備 注
南陽郡	新野縣	(1) (17) (18)	河南新野	
	杜延縣	(8)	河南南陽西南	即杜衍
	葉 縣	(19)	河南葉縣南	即葉縣
	順陽縣	(22)	河南淅川南	
山陽郡	東緡縣	(15)	山東金鄉	
魏 郡	內黃縣	(9)	河南內黃西	
清河郡	貝丘縣	(21)	山東臨清南	漢簡貝丘多見屬魏郡及東郡者④，今據《漢書·地理志》
梁 國	睢陽縣	(4)	河南商丘	

勞幹先生在《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一文中列舉上引簡(1)、(4)、(7)、(9)等⑤，指出：“運輸之車運至塞上者，且遠自梁國魏郡諸境”，“今據漢簡之文，山東之車率以若干車編為車隊，行數千里，轉運之難，大略可想。”⑥

史籍多有秦漢時期組織大規模運輸活動的記載。主父偃諫伐匈奴，說到秦始皇“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餘年”，“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勞役之苛重，致使“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徐樂上書也說道：秦始皇“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漢時仍然頻繁組織以由東而西為基本流向的大規模運輸。《漢書·枚乘傳》：“漢併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史記·平準書》也記載，漢武帝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而致一石。”“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漢武帝組織對匈奴的出擊並經營西域，東方人千里轉輸，勞役愈益繁重。

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可見簡文：

□轉穀輸塞外輸食者出關致籍

D.M.T8:27⑦

居延漢簡中也可以看到政府組織大型運輸車隊輸邊的有關資料。如：

□二百七十五兩輸居延

□三十六兩輸橐他□

32·18A

□九十四兩輸居延

□十一兩輸橐他

32·18B

□□車十泰□□

E.P.T43:225

冊車牛冊□□

E.P.S4.T2:152A

□與此車百七兩粟大石□□

E.P.T65:428

□下為車五百廿五兩□

262·8

□有二十兩車在居延北汝往當見車

E.P.F22:449

可見居延地區車輛運輸組織往往有驚人的規模。當時“車運轉穀”(E.P.W:101)“輸廩”(E.P.T51:593)的車列序次亦多見諸簡文，如：

第一車(29·9, 54·24, E.P.S4.T2:47)

第三車(74·22, E.P.T53:43)

第六車(25·1, 45·20, 230·10)

第八車(180·40B, 238·13, E.P.F19:13)

第十車(514·50)

第十一車(E.P.T53:45, E.P.T56:137)

第十二車(E.P.T51:593, E.P.T53:137)

第廿一車(199·8)

第卅車(28·10, 477·4)

第卅四車(E.P.T53:213)

第卅四車(E.P.T52:139)

有的於車序前又標識縣名，如：

新陽第一車(515·16)⑧

館陶第一車(81·1)

館陶邑第一車 (311.13)

葉第一車 (E. P. T 59:323)

冠軍第二車 (180.8)

貝丘第四車 (428.2A)

貝丘第五車 (24.6)

元城第八車 (311.30)

貝丘第九車 (24.6)

貝丘第十一車 (24.6)

宅唐第廿車 (24.6) ⑤

新陽、館陶、葉、冠軍、貝丘、元城等縣分屬於東海郡、魏郡、南陽郡、清河郡。

簡文僅記錄車序而不標識縣名者，有可能縣名在“第一車”簡上著明，由簡 29.9, 54.4, E. P. 54. T2: 47 的內容看，也有可能整個簡冊登記的是來自同一縣的車隊。

漢代政府組織的運輸活動具有高度集權的特點，甚至郡級行政長官亦不得“擅為轉粟運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漢書·劉屈氂傳》記載，漢武帝時，丞相公孫賀獲罪，所謂“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耕者自轉”即被指為罪名之一。漢武帝時代又強化健全“均輸”制度，官營運輸活動統一由均輸官調度指揮。從《九章算術·均輸》中所列算題的內容看，“均輸”即以道里遠近和戶數多少分配各縣輸粟及出車數量。如：

今有均輸粟，甲縣一萬戶，行道八日；乙縣九千五百戶，行道十日；丙縣一萬二千三百五十戶，行道十三日；丁縣一萬二千二百戶，行道二十日，各到輸所。凡四縣賦，當輸二十五萬斛，用車一萬乘。欲以道里遠近，戶數多少，衰出之。問粟、車各幾何。

答曰：

甲縣粟八萬三千一百斛，車三千三百二十四乘。

乙縣粟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斛，車二千五百二十七乘。

丙縣粟六萬三千一百七十五斛，車二千五百二十七乘。

丁縣粟四萬五百五十斛，車一千六百二十二乘。

運輸車隊確實大致是以縣為基本單位組織編發的，《後漢書·臧宮傳》中“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說的就是這樣的情形。

僅記錄車列序次而未見“車父”字樣的簡，有些可能屬於所謂“牛車名籍”（43·25B）、“士卒折傷牛車出入簿”（E. P. T 52: 394）②“倉穀車兩名籍”（E. P. T 52: 548）等簿籍，然而有些則與“車父”簡有關或本身即可歸入“車父”簡之中。下引簡文可以為例：

(23) ● 右第八車父社 □ □ 守父靳子衡算身一人 □ 180·40A

● 右第八車 180·40B

簡180·40B雖未直接出現“車父”字樣，但實際上顯與“車父”簡有密切關係。其他文式相同的簡文很可能有類似情形。

居延“車父”簡中還可以看到如下簡文，似乎說明關於“車父”在車隊中編次的記錄文例並不一律：

(24) 車父莊亭 七十二 孫平 二 E. P. T 57: 98

(25) □ 畢 車父守 第廿一 E. P. T 52: 331

簡(24)、(25)均為竹簡，當不排除原簿籍編寫於車隊出發地點的可能。簡(21)有“貝丘長道敢言之謹伏地再拜請”文句，情形或許類同。

二

秦漢史籍中未見有關“車父”稱謂的內容，其身份之研究，祇能主要依據居延出土漢簡中的有限資料。

前引簡(4)“戍卒梁國睢陽第四車父宮南里馬廣”及簡(18)“第卅二卒王弘車父”，“車父”兼稱“卒”或“戍卒”，都說明其身份的雙重性。類似資料又有：

(26) 木中隳卒陳章車父 □ E. P. T 50: 30

此外，居延漢簡中又可直接看到所謂“車父卒”、“車父車卒”等稱謂：

(27) □ □ □ 等身將 車父卒 □

484.67

(28) 長偏資事并將車父卒董利 □

E. P. T52:167

驢喜隸車父車

卒許勃所假

(29) □ □

具弩一有帽

餘光爲閤

83.5A

“車父”同時又身為“卒”，當大致與主要以轉輸為職任的所謂“漕卒”（《漢書·食貨志上》）、“委輸棹卒”（《後漢書·岑彭傳》）以及“廩與之卒”（《漢書·嚴助傳》）之“興卒”身份相近。

秦漢時往往“戍漕轉作”（《史記·秦始皇本紀》）、“轉輸戍漕”（《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併稱。漢武帝“穿漕渠”，據說意圖在於“損漕省卒”（《史記·河渠書》）。可見運輸往往由“卒”承當，列為軍役內容之一。董仲舒說，秦時百姓“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書·食貨志上》）顏師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看來，“卒”除“屯戍”之外，還要承擔包括轉輸在內的“力役之事”《漢書·王莽傳》中記述王莽始建國二年時事：

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天衣裘、

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

可見即使募卒亦得兼事委輸屯戍。所謂“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則使人聯想到簡(21)“貝丘長道敢言之謹伏地再拜請”的涵義。

《鹽鐵論·擊之》：“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秦漢時期服役者大約多是“彊者執戟，羸者轉運”（《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漢晉春秋》），“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史記·項羽本紀》）在交通條件相當落後的情況下，軍運耗用人力之多十分驚人。諸葛亮北伐，魏延獻計由子午谷突襲長安，請求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軍中作戰人

員與運輸人員的比例達到一比一。

《史記·孝文本紀》：“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
《漢書·食貨志上》：“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漢書·食貨志上》記載漢元帝時曾“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也都說到除軍運外，又大量用卒從事民運。《漢書·朱買臣傳》說，朱買臣即曾“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漢初，婁敬建議劉邦定都秦地，據說初見劉邦時，“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轡，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婁敬身為戍卒而引車前行赴戍所，可能即《漢書·食貨志上》所謂“行者賫”。顏師古解釋說，“賫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居延漢簡中“戍卒□曾里石尊 第卅車五人”（477·4）、“戍卒鄴東利里張敞第卅車”（28·10）“右第六車卒廿人”（230·10）等等，或許即體現類似情形。

我們在居延漢簡中還可以看到戍卒除赴邊途中轉運即所謂“行者賫”外，專門從事轉運的實例。如：

□□□遣卒六將持車牛詣官以十 418·1

入二年戍卒牛車十三兩 E.P.T 56:133

新卒假牛車十五兩皆毋□ E.P.T 53:188

●十部治卒車吏名 E.P.T 53:115

所受適吏皆家部卒所輸穀車兩 E.P.T 62:364

有的簡文還著錄戍卒原籍，如：

□魏郡貝丘戍卒牛 E.P.T 56:266A

□□卒車 E.P.T 56:266B

簡文所見“戍卒牛車”、“卒車”，似乎可以說明有的戍卒在服役時以私車從事轉輸。可能正因如此，我們在被有的學者歸入居延“吏卒功過勞績的考課文簿”^①的簡文中可以看到“車父”活動的記錄。例如：

卒四人
一人省
(30) 次吞隧長長舒 一人車父在官已見
二人見

（以上為第一欄） E.P.T 59:6

(一) 人李廷壽車父不在

(31) 𠄎 (一) 人稟

(一) 人見

104.19⁴²

此類簡文中，“車父”有時又寫作“車子”，如：

廿八日出

一人高同車子未到

(32) 第十五縣長王賞不在署

一人王朝廿八日從候長轅

一人見

206.27

(33) 𠄎 二人黃小子車子刻到

𠄎 二人見

285.5

簡(33)與(32)文式內容均類同。

與前引簡(22)“回順陽車父唐妨竈篋”類似的簡又有：

𠄎 鄆卒孟廣衣囊

E. P. T 51: 443

第十五
陳衣囊 𠄎 尹嚴

E. P. T 51: 442

𠄎 戌卒
資錢

E. P. T 51: 449

• 𠄎 戌卒南陽郡宛邑
臨洞里魏合衆衣囊

E. P. T 51: 149

戌卒魏郡鄴

都里趙元衣囊檢

E. P. T 52: 494

戌卒篋檢 𠄎

E. P. T 52: 668

同類戌卒衣囊的封檢，還可以舉出許多例。裘錫圭先生曾指出：“從居延簡看，戌卒的衣服錢物常常‘閤官’，即存放在候官處。”⁴⁴簡(22)“車父”私篋封檢的發現，說明“車父”得與“戌卒”同樣遵行這一制度。簡(22)與上引諸簡相互比照，可以說明“車父”與“鄆卒”、“戌卒”身份之一致。⁴⁵

“車父”身份嚴格地說屬於“卒”，然而又與一般的“卒”有所不同。例如：

(34) □卒宗取韭十六束爲中舍二束掾舍十一束卒史車父復來

□二石唯掾分別知有餘不足者圓不得水出□多恐乏今有

E.P.T51:325A

□ 即復取來輒計爲度遣使記□今圓及期其

□二束其一束中舍一束掾舍●陳陽里王少少毋已

E.P.T51:325B

圓中得韭二束，“其一束中舍，一束掾舍”，“取韭十六束”則“其三束爲中舍，二束掾舍，十一束卒史車父”。“卒史”是官府屬吏。《史記·汲黯列傳》：汲黯遷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引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秦時已有“卒史”之職。周昌、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自卒史從沛公”（《史記·張丞相列傳》）。秦末，武臣曾“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史記·陳涉世家》）。《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補述，說到武帝時北海太守屬下有“文學卒史王先生”。魏相曾“爲郡卒史”（《漢書·魏相傳》）^④，匡衡亦曾“補平原文學卒史”（《史記·張丞相列傳》）。

《史記·儒林列傳》：公孫弘爲學官時曾建議：“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據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吏斌斌多學之士矣”。《索隱》引如淳云：“《漢儀》：……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索隱》：“服虔云：‘百石卒史。’”《漢書·兒寬傳》：“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

漢簡所見河西地區“卒史”^⑤，可舉列如下諸例：

張掖大守府	卒史利	E.P.T52:96
酒泉大守府	卒史廣	303.12
居延都尉府	卒史賞	40.2, 267.5
	卒史□	260.10
	卒史居	E.P.T50.212B

	卒史史儻	E. P. T 50: 212B
	卒史平	E. P. T. 51: 189B
	守卒史奉親	EP. T51: 190A
肩水都尉府	卒史安世	12. 1C
	卒史趙卿	E. P. T 52: 405
	守卒史義	10. 29
玉門都尉府	卒史山	敦煌 203
居延令、丞	卒史充	240. 3
	卒史尊	219. 17

陳夢家先生《漢簡所見太守、都尉二府屬吏》指出：“屬吏諸級在簽署文書時，依級別高低為序。有中央至縣，大致可分為三級：高級為掾和史、少史、士吏；中級為卒史、令史、屬、守屬、守卒史、守令史和嗇夫、守嗇夫；低級為書佐、佐、尉史和候史。”“卒史通常在掾之次，應是第二級，但有時在屬之前，似亦可作為第一級。”^⑧

簡(34)所見“車父”與“卒史”相比例，說明“車父”地位與待遇有時甚至接近下級吏員。

“車父”身份特殊之原因，很可能在於他們是以私車服事軍役者。簡(12)可見“車父”辛盈川隨車兵器車具15種，除“私劍八”外，均為“官具”，簡(29)亦可見所謂“所假具”。特別著明“官具”與“所假具”，似乎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其所駕車輛當為私車。

居延漢簡可見所謂“發茆家車牛載輸候官第口”(E. P. T 50: 51)。“茆家”又作“賢家”、“管家”。此簡可與前引“所受適吏管家部吏卒所輸穀車兩”(E. P. F 62: 364)對照讀。所謂“茆家車牛”的涵義現在尚未十分明確，但是可以說明居延邊塞確實有相當數量的私車從事軍事物資運輸。又如：

入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正月癸卯甲渠官掾譚受管家茂陵東進里趙君壯就人肩水里鄧宗 E. P. T 59: 100

“管家”鄉籍甚至遠在茂陵，顯然也是值得探討的現象。

不過，從現有資料看，“車父”與為“管家”(或“茆家”、“賢家”)

承運的所謂“就人”（僦人）等運輸人員身份不同。

三

戰國時期已經出現稱為“僦”的運輸生產形式。《商君書·墾令》：“令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秦時仍限制運輸生產中以“僦”為形式的僱傭關係。雲夢睡虎地秦簡《效律》規定：“上節（即）發委輸，百姓或之縣就（僦）及移輸者，以律論之。”漢代這種運輸形式則為政府所利用而得到發展。《淮南子·說林》：“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史記·平準書》：“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漢書·王莽傳中》：“寶貨皆重則僦載煩費。”可見“僦”已經成為主要運輸形式之一。

以“僦”求利的“車人”，在漢代居延邊塞文書中稱作“就人”（僦人），例如：

- 受管家延壽里上官霸就人安叔昌譚昌 214.125
賢家安國里王嚴 車一兩 九月戊辰載就人同里時褒已到未
言卿 267.16
方子直一兩就人周譚侯君實為取 502.11
出錢千三百卅七 賦就人會水宜祿里蘭子房一兩 506.27
出錢四千七百一十四 賦就人表是萬歲里吳成三兩半
已入八十五石
少二石八斗三升 505.15
●元延四年八月以來將轉守尉黃良所賦就人錢名 506.26
□置佐博受就人井客□ 586.5
居延平明里王放就人昌里漕陽車一兩粟大石廿五石居延平明
里王放就人昌 E. P. T 49:53A
□□平明里□褒就人趙永 E. P. T 65:376

敦煌漢簡中也可見有關“僦人”的簡文：

出廩二斛 元和四年八月五日僦人張李元付平望西部候長憲

425

“就人”又稱“就家”(562·3A)。所謂“僦載”，往往也取有組織的結隊運輸的形式，如：

出粟大石廿五石 車一兩 始建國二年正月壬辰管家昌里齊熹就人同里陳豐付吞遠置令史長 E.P.759:175

■ 右壬辰車五兩 粟百廿五石排 與此千三百□□□ E.P.759:176
前者“車一兩”顯然包括在後者“車五兩”中。又如：

● 凡五十八兩 用錢七萬九千七百七十四 錢不儘就 505·20
“僦載”車隊的規模至於58輛。

“就人”(僦人)所得運費即所謂“就錢”(僦錢)或“就直”(僦值)，在簡文中也可以看到有關記錄，如：

□ 就錢□百卅出 116·46

就錢三百 254·5

□□□就錢君強取秬□□ 乙附9B

乙二月積一月廿七日運莢就直 350·12

其四兩有行

□

一兩取就直 214·83

出錢□□二二月丁□□□長忠取二月食就直 155·16

□ 就直乙 300·50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中也說到“就直”的計算(E.P.F 22:6, 8, 23, 30)。敦煌酒泉漢簡中也有關於“就錢”(90)、“就直”(890)的內容。

《九章算術·均輸》中關於“均賦粟”的算題，說到漢時運車載重規格和僦費常值即一般運價標準：“一車載二十五斛，與僦一里一錢。”這種規範之形成，體現出“僦載”之普及，而政府倚重這一運輸形式，並往往主持對“僦載”的組織管理^①。居延出土《甘露二年御史書》簡冊中可以看到“以牛車就載籍田倉爲事”簡文(E.J.T 1:1)^②。《潛夫論·實邊》說，“募運民耕邊入穀”，乃“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運民”即漢代從事運輸活動的民戶。所謂“就人”(僦人)，應當也

在“運民”之列。

“車父”與“就人”(僦人)的重要區別之一，是前者以服役者的身份不能通過運輸活動獲取“就錢”或“就直”等經濟收入。

“車父”與“就人”(僦人)的另一重要區別，就是“就人”(僦人)有相對較多的人身自由。“車父名籍”和“車父”所攜兵器、車具的嚴格登記以及“到”、“在官已見”、“不在”的記錄，都可以說明這一事實。

從居延漢簡提供的資料看，居延地區“車父”與“就人”(僦人)還有一個重要區別，這就是“就人”(僦人)大多為河西當地人，而“車父”鄉籍則多遠在山東諸郡國。

除“車父”與“就人”外，居延漢簡中又可見另一以車輛從事轉運者的稱謂“將車人”。例如：

將車轆得萬歲里口 77·7

將車轆得新都里郝毋傷 334·36

口將車轆得安世里公乘工未央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 334·13

將車河南郡樊陽 346·39

口里上造史賜年廿五長七尺二寸黑色為蘭少卿將車 14·12

十一月十五日為記邑中夏君壯多問

少平食食如常人馬起居得毋有它今有買魚得二千二百黍十頭

付子陽與子陽將車人粟十三石牛食豆四石栓西垣乘軸一付 E·P·T·44·5

《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也可見有關寇恩“將車”的文字：

恩從轆得自食為業將車到居延

《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補述：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翦伯贊先生在《兩漢時期的僱傭勞動》一文中指出：“這裏所謂‘為人將車’就是受人之僱為人趕車。”^②“將車”一般亦泛指駕車，如前引朱買臣“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例。然而如居延簡“將車轆得新都里郝毋傷”等，“將車”與“將車人”同，已經是表示特定身份的稱謂。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銅車馬有隸書銘刻，其御者身份，“小車馬”稱“御奴”，而“輦車馬”即貨運車馬則稱作“將車奴”^③。

由《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的內容，可知“將車人”與“就人”

不同。寇恩以私車爲粟君載魚至樂得賣，當得“就直”，是爲“就人”。而“到樂得賣魚盡錢少”，因賣牛相抵，以賣牛錢付粟君妻業，以車具“置業車上”，又“從樂得有食爲業將車到居延”。是往樂得時爲“就人”，自樂得返時已成“將車人”。身份之變化在於已不再擁有所駕御車輛的所有權。

“將車人”可以爲私人“將車”，也可以“將”公車爲政府服務，前引“將車樂得新都里郝毋傷”等簡可能即體現爲公家營運的勞務關係。然而無論爲公家“將車”還是爲私人“將車”，“將車人”與車主間皆存在僱傭關係，因而其身份與“車父”顯然體現出鮮明的差異。

“就人”（僱人）、“將車者”、“車父”都是所謂“車人”（《淮南子·說林》）、“轉者”（《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轉車人徒”（《史記·大宛列傳》），然而具體身份及其所體現的生產關係則不同。“車父”雖服務於軍運，但是在傾國力以強武備的時代，他們的勞作對於社會經濟的意義，顯然不可輕視。

簡(32)“一人高同車子未到”、簡(33)“口人黃小子車子刻(?)到”與同類簡文(30)、(31)比較，可知“車子”即“車父”。④《文選》卷四〇繁欽《與魏文帝牋》：“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嚨引聲，與茄同音。”看來漢時確實曾通行“車子”稱謂。

“車子”又見於《左傳·哀公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杜預注：“車子，微者。”孔穎達疏：“杜以車子連文，爲將車之子，故爲微者。《家語》說此事云‘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王肅云‘車士，將車者也。子姓，鉏商名。’今傳無‘士’字。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車士”之稱，又見於《戰國策·燕策二》：“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車士”稱謂秦漢社會仍然通行。《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集解》引服虔曰：“車戰之士。”《史記·萬石張敖列傳》：“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漢書·衛綰傳》則作“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車士”似仍指御車之士。《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李善注：“韋昭《漢

書注》曰：「輿，車士也。」《漢書·嚴助傳》：「廡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顏師古：「廡，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車父”與“車士”相比較，其身份似乎更貼近於所謂“微者”。

“父”，在秦漢時期已經成為從事某種職業者的一種通稱，其地位，大多低微卑賤。如：

田父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之。」類似稱謂有所謂「農夫」。《史記·淮陰侯列傳》：「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又《酈生陸賈列傳》：「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尚書·酒誥》可見「農父」之稱。「夫」、「父」其實相通。

漁父 《焦氏易林》卷一：「敝筇在梁，魴逸不禁，漁父勞苦，焦喉乾口，虛空無有。」“漁父”稱謂又見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伍子胥列傳》、《范雎蔡澤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

亭父 《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補述：「（任）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後為亭長。」“亭父”，《集解》引郭璞曰：「亭卒也。」《正義》：「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方言》卷三：「楚、東海之間，亭父之謂亭公。」《後漢書·陳忠傳》注引《謝承書》：「（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陳直先生在《居延漢簡解要》中分析“順陽車父唐妨竈篋”簡時即指出：“車父之名，不見於古籍，當與亭父之名稱相似。”^②

弩父 《方言》卷三：“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郭璞注：“主僮慢弩導檐，因名云。”

“車父”稱謂所指代的人們，其身份等級大致與這些人相類。^③而如若考慮到其勞作方式，或許還可以聯繫古時所謂“輓父”進行分析。《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邠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得合葬於防焉。

“輓父”，有可能是以引車為職業者。《禮記·檀弓上》記述此事，“輓父”則寫作“曼父”：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朱起鳳《辭通》卷一三說：“輓、曼音義同。”“曼”或許取義於輓車之索帶。“輓父”與“車父”相類同，在於均為以車輛從事轉輸者。不過“輓父”很可能是以力引車，如“脫輓輅”見劉邦之妻敬然。居延漢簡所見每車十人、二十人的記錄，可能也體現人力牽引運車的情形。《漢書·馮奉世傳》記載，馮奉世“陳轉輸之費”，曾說到“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輶，則曠日煩費。”如淳解釋說：“輶，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車而餉。’”《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跪而推轂”。“推轂”又見於《荊燕世家》、《汲鄭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是漢時比喻尊舉奉推的習用語。《索隱》：“推轂謂有卑下之，如為人推車轂也。”“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是當時人力運輸確實有“推車轂”形式。而“車父”則大致為驅駕畜力車轉輸物資者。

陳直先生《居延漢簡綜論》指出：“居延簡稱御車者為‘車父’”^①薛英群、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漢簡釋粹》中也有對於“車父”的解釋：“御車者，負責趕車的人。或曰車夫：‘④這一認識大體是符合事實的。需要補充修正的是，‘車父’既為‘御車者’，又是以私車服事軍役的‘卒’。居延漢簡所見‘車父’，其出身，大致多來自關東諸郡國。

“車父”作為軍事化管理下的運輸生產者，往往千里轉輸，備極艱辛。“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鹽鐵論·徭役》）單程轉運亦多歷時經年。簡(23)“●右第八車父杜□□守父靳子衡算身一人□”，可能即體現《鹽鐵論·未通》所謂“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并給徭役”的情形。邊地軍運除勞作艱苦外，還存在人身安全問題。所謂“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鹽鐵論·誅秦》），旋車，即殘壞傾覆的運車。《鹽鐵論·取下》還說：“戍漕車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居延漢簡可見：

很可能就是運輸人員從事軍運時不幸死亡的記錄。

陳直先生在《居延漢簡綜述》“車父的助邊”一節中指出：“居延各簡，開始於武帝末期，惟車父名籍，皆無紀年。”陳直先生又據前引簡(22)“順陽車父唐妨雷篋”簡文判斷：“順陽在哀帝時改稱博山侯國以封孔光，可證農民轉車助邊之弊政，至哀帝時猶未廢除。其實博山東漢時又改稱順陽。《漢書·地理志上》：‘博山，侯國。哀帝置，故順陽。’應劭曰：‘明帝改曰順陽，在順水之陽也。’《續漢書·郡國志四》：‘南陽郡有順陽侯國，故博山’。此縣前稱順陽，後改博山，又復名順陽。《漢書·地理志上》雖有博山‘故順陽’之說，然而又謂‘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汭’，仍用‘順陽’之稱。《後漢書·李通傳》：‘破公孫述於西城，還屯田順陽。’又《鄧禹傳》：‘四年春，復寇順陽間。’似乎兩漢之際‘順陽’縣名依然存在。且順陽改稱博山亦未必哀帝時事。《漢書補注》引陳景雲曰：‘據《孔光傳》，封侯後十日哀帝始即位，則博山封邑置自成帝非哀帝也。’地名沿革如此複雜，看來，似乎僅據‘順陽’縣名尚未可輕易斷定‘車父’助邊的具體年代。

注釋

①《居延漢簡甲編》及《居延漢簡甲乙編》均釋作：“淮陽郡口平第十五車口平里陳尊”，臺北1960年重訂本《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作“壽平里”，《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作“襄平里”，今據圖版校正。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指出：“居延漢簡屢見淮陽郡長平之名，長平縣於《漢志》屬汝南，由漢簡知其本屬淮陽郡。”（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頁）

②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頁。

③又“鍾”，《居延漢簡甲編》、《居延漢簡甲乙編》釋作“銀”，臺北1960年重訂本《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釋作“鍾”，皆據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訂正。

④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居延漢簡有‘魏郡貝丘’之記載(82·9)，說明《漢志》清河郡貝丘縣曾隸屬過魏郡，但隸屬的具體時間不明。”（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頁）“魏郡貝丘”簡文又見311·12，311·20，E·P·T51：451，E·P·T52：479，E·P·T53：31，E·P·T56：92，E·P·T56：97，E·P·T56：

102, E. P. T 56: 110, E. P. T 56: 113, E. P. T 56: 260 B, E. P. T 56: 266 A, E. P. T 56: 269, E. P. T 56: 377, E. P. T 57: 2, E. P. T 56: 6 又有簡文: “戍卒東郡貝丘武里黃侯模” (E. P. T 56: 191)。“東郡貝丘”簡恰恰發現於“魏郡貝丘”簡出土最密集處。何雙全《〈漢簡·鄉里志〉及其研究》將貝丘縣分列於“東郡”、“魏郡”條下(《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頁、159頁、168至170頁)。

⑤ 其中有誤釋,如簡(9)“內黃第十五車入魏都”釋作“內黃第五車入魏都”等。

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

⑦ 吳初驥:《玉門關與玉門關候》,《文物》1981年10期。

⑧ 《居延漢簡甲乙編》釋作“■右新陽第一車十二”,《居延漢簡釋文合校》訂正為“■右新陽第一車十八”。

⑨ “宅窟”縣名無考,疑或與濟陽郡苑縣(縣治在今山東成武西北)、清河郡厓縣(縣治在今山東臨清東北)有關。厓縣與貝丘縣相鄰。

⑩ 又簡E. P. T 56: 315: “□陽斗車出入簿”。

⑪ 初師寅:《漢邊塞守御器械考略》,《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頁、151頁。

⑫ 《居延漢簡甲乙編》作:

李廷壽車父不在

□廣見

此從裘錫圭先生《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商榷(續七)》(《人文雜誌》1983年4期)。

⑬ 如:

東郡戍卒東阿靈
里哀奮衣囊

100.1

戍卒河東郡安邑尊德里張常
□衣囊封以私印

210.26

戍卒南郡穰邑二里
何趙利衣囊

326.8A

戍卒魏郡梁期
長積里侯宣衣囊

E. P. T 51: 297

戍卒宋里卜嘉
康衣囊

E. P. T 59: 368A

■右南陽私衣物囊百一十一

E. P. T 52: 84

⑭ 裘錫圭:《漢簡零拾》,《文史》第12輯,第6頁。裘錫圭先生還指出,由本文引簡(29),“可知有時戍卒把從公家借來的武器也存放在閭中。”

⑮ 簡(10)車父名下注明衣囊名目數量,很可能也與戍卒私衣物“封藏”、“閭官”之常制有關。

⑭《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魏相“少學《易》，爲府卒史”。

⑮居延漢簡又可見中央部門大鴻臚屬下“卒史敏”(203.22)。

⑯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09頁。

⑰袁錫圭《漢簡零拾》有“從漢簡反映的關於用車運糧的情況談《九章算術》的史料價值”一節，說到“居延簡里有很多關於用車運糧的資料，每車所載糧食一般爲二十五石”，“僱傭的僦人和服役的將車者輸送糧食的時候，大概比較嚴格地遵守二十五石一車的常規。”《文史》第12輯，第8至9頁。

⑱初仕賓：《居延簡冊〈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考古》1980年2期。

㉑不過，“就人”（僦人）往往在經濟上也受到嚴厲的剝奪。如《史記·汲鄭列傳》：“（鄭）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漢書·酷吏傳·田延年》：“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

㉒《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59年第1期。

㉓《甘肅武威雷臺東漢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2期；《武威雷臺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

㉔船夫也有稱作“舟子”者。《詩·邶風·匏有苦葉》：“招招舟子，人涉卬予。”鄭玄箋：“舟子，舟人，主濟渡者。”漢時仍通行這一稱謂。《焦氏易林》卷一：“褰衣涉河，水深漬罷。賴遇舟子，濟脫無他。”

㉕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頁。

㉖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九：“南朝謂北人曰僦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齊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可見後世仍有以“父”爲蔑稱者。

㉗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1頁。

㉘薛英羣、何雙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頁。

㉙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頁。

說“改火”

羅 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我國古代有改火之俗。改火，又稱變火、易火，《隋書·王劭傳》載“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這個古俗在漢代還存在，但初始的涵義已泯滅，歷來的注釋家多依據《周禮·夏官·司燬》所載“司燬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來解釋它，認為改火就是隨季節的變化，使用不同的木燧取火，以順應天時，保證健康。如說“古人用火必取之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疫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①總之，長期以來，改火之俗被塗上濃重的神秘色彩，幸而居延漢簡中保存了漢代改火的記述，使後人得以考究這一古俗的原貌。

一

1930年西北考察團所獲居延漢簡中，曾見一組漢宣帝神爵元年寢兵改火史料，共三簡：

1.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太常昌書言大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日夏至，宜寢兵，大官抒井、更水火、進鳴鷄。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別火（編號10·27）

2. 官先夏至一日，以陰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

長安、雲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日。臣請布，臣昧死以聞。（編號 5·10）

3、四月廿九日庚戌寢兵，五月大，辛亥一日，壬子二日夏至，癸丑三日，甲寅四日盡，乙卯五日，丙辰六日……庚辰卅日。（編號 179·10）

三簡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長 23.5 釐米左右，第一、二簡各書二行，第三簡橫置豎寫三十一行。在《居延漢簡考釋》中，勞幹考證“丙吉奏，本為二簡，余讓之先生查其字跡相同，合為一奏（時在二十四年），前後完整無缺文”。簡文載五月二日壬子夏至更水火，自其前二日庚戌至其後二日甲寅，寢兵不聽事五日，第三簡是曆譜“自四月廿九日庚戌寢兵，至五月四日甲寅盡，其中五月二日壬子為夏至，與此簡相符，此二簡奏文與此曆譜當時必置於同處”，所以這是一份相當完整的記述改火之俗的珍貴史料。

簡文中“御史大夫吉”即丙吉，《漢書》有傳，其事並見《宣帝紀》。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宣帝紀》載“三月行幸河東，祠後土。詔曰……乃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丙吉奏稱元康五年，當在正式下詔改元之前。漢代“寢兵”之制也見於文獻，如《後漢書·孝獻帝紀》載，興平元年夏“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于豪亮曾論：“在重要節日或遇到大的自然災害時，‘寢兵不聽事五日’乃是漢代的制度。”^②又，主宮中改水的水衡是掌池苑之官；大官即太官，屬少府，主天子膳食，均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主取新火的是別火官，置於武帝太初元年，除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外，《後漢書·百官二》大鴻臚條下有“本注曰……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漢書補注》引“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事。”此外，漢官印中不僅有“大官丞印”，“大官監印”，還有“別火丞印”，^③都可與簡文相印證。這進一步證實丙吉奏兩簡文銜接，而且釋文必為：“別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陰隧取火”。曾見有的釋文將句讀斷在“官”字之前或其後，都是不恰當的。

釋文存有歧義的還有“陰燧”一語，簡文作陰隧，勞幹釋“陰隧”，陳夢家釋“陰隧”，說“不知何故作陰隧，或抄寫筆誤。”④于豪亮也釋為“陰隧”，說“陰隧取火，古籍無聞，僅見此簡”，考證了古代有用陽燧，即凹鏡取火和鑽木取火兩種方法，提出：

《周禮·司烜》記司烜以夫燧取火於日，供祭祀之用；《司燿》以鑽燧取火，供改火之用。《禮記·內則》以“金燧”和“木燧”並舉鄭注云：“金燧可取火於日”，又云：“木燧，鑽木也。”取火於日的夫燧、金燧又名陽燧，則與此相對的鑽木取火的木燧必定又名陰燧。⑤

審慎的學者對此尚存疑，但“陰”釋陰不是沒有道理的。如鳳羌鐘銘有“鳳羌乍戎……入長城，先會于平陰”，陰字寫作陰。其地即今山東平陰縣，⑥亦即《左傳·襄公十八年》晉齊平陰之役的平陰。戰國古璽中“平陰都司徒”的陰寫做陰，私璽中有復姓“口陰”，做“眾陰”或“眾陰”，⑦可知陰陰皆為陰字，簡文釋“陰隧”不誤。居延烽燧遺址發現過鑽火木燧，應即簡文所載“出火椎鑽”，⑧可知漢代仍常用木燧取火。聯繫記載，陰燧即木燧之說是有道理的。

所以據上丙吉奏，漢代的改火是選擇適宜時日，停止其他政事，由別火官用鑽燧方法取出新火，授官更以至百姓，以易故火，同時抒井更水，舉行進鳴雞的儀式。這就告訴我們，所謂“改火”並不僅僅是取新火，作為一種古俗，它包含着一系列特定的內容。其中有些不見於文獻記載，卻可從“社會化石”即民族學資料中找到它的痕跡。

本世紀五十年代雲南滄源縣佤族社會調查表明，岩帥、糯良、班老等地都曾流行過每年取新火，易故火的習俗，⑨這是當地主要的宗教活動，有專門負責取新火的頭人。如在糯良地區，由總頭人達改負責，而達改一職是由最早到糯良建寨的魯賽氏族成員擔任。在上班老，取新火由老寨旁來聽頭人板勐負責，板勐一職也是由上班老最早建寨的斯翁氏族成員擔任。斯翁是一個很古老的氏族，在口耳相傳的歷史中，他們遷徙路線可以一直向前追溯到司崗里，這是傳說中佤族祖先的發祥地。

取新火這一宗教活動的整個程序大抵是：

1. 舉行前打掃寨子。
2. 到各家徵收祭品。糯良是由兩個頭人到各家徵收一碗米、一碗飯、一點鹽和火灰，在寨外舉行祭祀；岩帥是每家出一碗米、一支香、一點鹽、灰、棉花和房草。
3. 取新火，在頭人家舉行。在糯良是由達改用四碗茶負責主祭，以摩擦方法取出新火，並鳴放土炮表示祝賀。
4. 點新火。在糯良是各家準備好火把，在達改家用新火點燃帶回各家，然後舂粳粿，舂好後取兩塊到達改家，分別放在房內和牛槽旁祭祀，祭祀完畢纔可以吃；在上班老，板勐取出新火以後，先由頭人點燃自己的火把，所屬十二個寨子的羣衆，再到頭人家取新火的火種。

此外，在岩帥地區，同時還要祭水井，貢品是兩隻白鷄、一隻紅鷄、二顆穀種、三個鷄蛋殼，全寨各家出米。白鷄送給水鬼，紅鷄送給山神。這使人很容易聯繫到漢簡的記載，為理解“更水火、進鳴鷄”提供了一把鑰匙，正是禮失求之於野，早已泯滅的漢代習俗，仍保存在滄源佤族的宗教儀式裏，將這兩種資料相印證，可使我們對改火這一古俗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

漢代改火要與抒井易水相結合，滄源佤族在舉行取新火儀式之前也要打掃寨子，祭水井，這透露出改火之俗中凝結和保存了古代的衛生保健習慣。這可以從文獻中得到印證。如：

《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管子·禁藏》：“當春三月，菽室煖造，鑽燧易火，抒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

《管子·輕重己》：“以冬至日始……教民樵室鑽燧，謹竈

泄井，所以壽民也。”

此外，《漢書·禮儀中》也有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之說。這些記載都表明春秋戰國時民間猶存改火之俗，其時間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冬，是時要用泥塗塞修補好用了一年的竈，再用鑽燧的方法取出新火點燃它，煙烤房間，以去毒滅菌，其目的性是很明確的。但後來的注釋家們往往將其複雜化，如：

《周禮·夏官·司燿》“四時變國火”，鄭玄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論語·陽貨》“鑽燧改火”，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邢昺疏：“正如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此外，《淮南子·時則訓》有在春、夏秋、冬三時，分別以萁、柘、松木為燧取火；《管子·幼官》則載，要在四季的“八舉”“七舉”“九和”“六行”時節，各以“羽獸”“毛獸”“介蟲”“鱗獸”之火為炊。這些顯然都是在陰陽五行學說盛行以後演化出來的，而且這些四時以異木為燧，雖然也涉及取新火，但與改火之俗無關。因從滄源佹族取新火的儀式，要由古氏族老寨或總頭人主持來看，改火起源於十分久遠的古代。

關於改火的產生及初始涵義，近世學者做了有益的探索，提出可能源於原始宗教中與火有關的禳解儀式；或認為和古代農業生產有密切聯繫，寒食之俗就起源於哀悼改火中為祈年而燒死的人性。^⑩這些無疑比改火的舊釋大大前進了一步。但從改火要鑽木取火的方法看，應蘊含了對人工取火這一偉大發明的紀念，最初形成的時代可能距這一發明不很遙遠，以後發展成一種以衛生保健為主的古俗。

鑽燧，即用摩擦方法取火，是人類最早廣泛使用的方法。雖然以石相擊能出現火花的發現可能更早，但用擊石法取火，必須用燧石和

鐵礦石(或鐵),否則微弱的火花無法收集引燃,因此這種取火方法到鐵器時代纔廣泛使用。而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由於長期使用火,保存火,積累了對火性能的認識,更兼磨制鑽孔技術的出現,都為摩擦取火的發明創造了條件,已知的摩擦取火的方法很多,如鑽木、鋸竹、犁法,還有的利用弓鑽、繩鑽等。而分布地域最廣,最原始的方法是鑽木,亦即鑽燧。在中華大地亦如此,因而將人工取火發明的代表人物稱為“燧人氏”。

用火,在人類生存技術進步中,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然而,祇有發明了取火,纔使人類能真正支配這一自然力,把自己從動物界劃分出來,使生存技術的進步達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諸種進步中,最關鍵的是原始農業的發明,它打開了通向文明的道路。原始農業發生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刀耕階段”,將山坡林地的樹木砍倒、焚燒,然後播種等待收穫。有些民族,如我國的景頗族,在刀耕火種放荒火時,規定必須由一老人先燒,而且要用摩擦取火的古老方法取新火燒山;佤族的一些地區,在燒荒以前要殺白鷄一隻,將血滴在點火的竹把上,再引火焚地;布朗族每年燒荒前,要向火神滴水祭祀,供奉飯、竹筍等,請求火神不要燒傷人或無邊蔓延。^①這些不僅說明原始農業出現的時間與人工取火的發明相去不遠,還可以窺見滄源佤族在每年取新火時,要祭水、祭山——“白鷄送水鬼,紅鷄送山神”以及漢代“更水火,進鳴鷄”的淵源。

摩擦取火發明於一萬多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原始農業的發明標誌着新石器時代的開端,這是兩個相銜接的時代,而且一般認為火耕源於火獵,農業的發明是與人工取火出現以後,火獵的廣泛使用有關,這應是原始農業階段要用最古老的鑽燧取火方法引火燒荒習俗的由來。不僅如此,在農業的刀耕階段,放荒火是極重要的生產環節,時間掌握不好,過遲或過早都可能造成顆粒無收,若發生山火蔓延,對農業生產會造成更大、更長遠的不利影響,所以隨着農業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在摸索防止山火蔓延的同時,也出現了放荒火時向火神、水神、山神獻祭祈禱的宗教儀式;以後隨着農業的發展,不再需要年

年放荒火了，但這一古代風俗卻在宗教儀式中保存了下來，還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因為在農業成為社會主要生產部門的同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定居的村落，但尤其在北方，穴居、半穴居的住室相當潮濕，對健康威脅極大。《墨子·辭過》載，上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上古之民的解決辦法之一是發明了用火烘烤的防潮技術，考古發現證明，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普遍使用燒烤房屋的地面以至四壁，使泥土陶化以防潮濕的方法。^⑭雖防潮技術在後來不斷發展，但這最初的用火烘烤的方法，對改善生活條件有重要開創意義。從《管子》所載“殺室燻造”“樵室鑽燧”，可見它作為衛生防病、去毒壽民的措施，一直沿用到後世。定居和農業的發展，還導致了鑿井技術的發明，而且考古發現證明，中華大地注重水井的衛生也有很悠久的歷史，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距今近六千年的第二文化層發現了木構水井，水井內壁用木構方框支護，可避免坑壁泥土造成的井水渾濁，並且在井上還有棚架頂蓋。^⑮到了距今四五千年間，有助於保持水質清潔的木構水井，在長江、黃河流域都有發現。與此同時，開鑿了更多的土井，土井的構築省工省時，所以推廣很快，也許定期淘井換水，以保證飲水衛生的習俗也在這時逐漸形成。

由此可見，改火之俗確與農業生產有密切聯繫，最初主要是紀念人工取火的發明及由此促進了農業的產生。後來形成與農業有關的祭火儀式，並逐漸演化成為以衛生保健為主的古俗。在初民社會，由於生產力很低，生存條件艱難，醫藥知識還處於萌芽階段，不能不重視衛生防病經驗的積累，並保存在“宗教，這古代風俗的儲藏庫”^⑯中，一代代傳下去。從民族學資料及漢簡所載，舉行改火儀式的細節，還可以找到這一演化發展的痕跡。

三

火的廣泛使用及人工取火的發明給人類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所

以在各地的原始宗教中，火都佔有重要地位，不少的祀火儀式中，都要使用原始的取火方法取出新火進行祭祀活動，〔英〕詹·喬·弗雷澤《金枝》一書中曾有大量敘述。但中西文化是有差別的，就關於火的傳說而言，希臘神話中，最受崇敬的英雄是盜取天火給人類的普羅米修斯；有些澳大利亞土著部落也傳說人間的火是從天上偷來的，是一種很小的鳥——鸛鵒把天上神聖的火花藏在尾巴下，帶給大地；或認為是渡鳥從貞女喀拉卡魯克的掘土棒尖端搶來的。^⑤然而在中華大地，被載入史冊世世傳頌的不是“盜火者”，而是“造火者”，是“造火者燧人，因此為名，”“燧人鑽木而造火。”^⑥反映在宗教儀式上，則有對最先用火者和造火者的祭祀，即文獻記載中的“祭饗”、“祭燿”。

《周禮·夏官·司燿》載，掌行火之令的司燿職責之一是“凡祭祀，則祭燿，”鄭玄注“報其為明之功，禮如祭饗。”賈公彥疏“祭饗，祭老婦也，則此祭燿，謂祭先出火之人。”孫詒讓進一步考證了“古祭火之事有五：一祭火星，以火正配，此為天神之祭”；“一祭五神之祝融，以稗配，此為地示之祭，即《大宗伯》血祭，祭五祀之一是也；一祭五祀之竈，亦為地示之祭，《月令》夏其祀竈是也；一祭先炊，則為人鬼之祭，雍饗、饔饗是也；一祭先火，亦為人鬼之祭，即此祭燿是也。”並且引述前人考證，指出古有祭奧，“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簠豆，設於竈徑，又延尸入奧。”^⑦

考這五種祭火之事的產生，祭火星必在原始農業取得一定發展，天文學萌芽產生以後；火正的出現和祝融的時代在原始社會末期，所以對火星及祝融之祭：應相對出現較晚。先火是先出火之人，也就是造火者燧人氏；先炊是老婦，即留在口耳相傳歷史中，負責用火煮飯分食的遙遠女祖。孫詒讓考古代祭竈火之神以老婦配之，實際上不少古族的傳說中，竈火之神就是一位老婦，日本北部的蝦夷人信奉的神祇中，最重要的是女火神，“她管理每一家爐火，賜予溫暖，監督烹飪，也是家中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見證者。由於她的火是神聖的，所以人們在飯前飯後和每天早晨起牀都要向他致敬，並用禁忌保護着防止褻瀆。”^⑧我國大興安嶺的鄂溫克人也有類似的禁忌習俗，“在吃飯

和飲酒時，總是先要舉行簡單的祭火儀式，即用一些餚菜酒肉投入火中，然後自己纔能吃起來。”^④歷史上，過游牧生活的突厥人，“崇拜火，尊敬空氣和水，頌揚大地。”卡欽人信仰天上、人間和地下的一切神靈，但其中最受崇拜的是女火神，她的像“掛在帳中最榮耀的地方”“是薩滿首先祝告的對象，每帳的主人，必須將第一口食品供奉她。這位女神被卡欽人當做保佑合家大小平安和守護帳內爐火的‘家婆’，顯而易見，火神即帳神，是爐火崇拜的產物，具有公認的神聖性。”^⑤保存着母系家庭的雲南永寧納西族，對祖先的崇拜與對火塘的崇拜也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火塘上的鍋莊石是祖先神位的象徵，遷居時“搬運象徵祖先神位的鍋莊石，也須由主婦負責，並由她從舊居取來火種，在新房的火塘裏點燃起第一把火。”^⑥已向父系氏族過渡的基諾人也保存了同樣的遺俗，他們最隆重的祭祖儀式是上新房，儀式中的上賓是氏族中最年長的女性，即使已嫁到外寨也要設法請回。按照慣例，她是傳統新房的主人，應第一個登上新房，將樓梯、樓房象徵性地清掃一遍，“然後安好代表祖先的神器三腳鍋莊石，升起第一把熊熊的火焰。”^⑦這些都告訴我們，對火的崇拜植根於母系制時代，受到祭祀的火神不是自然界的火，而是作為社會細胞的氏族以至家族的竈火之神，並與氏族的女性祖先融為一體。這一習俗大約產生於母系氏族制度的繁榮階段，略晚於對先炊、先火的追念，而早於祭火星、火正。

對此，在祭禮上也有反映。《周禮·大宗伯》有“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祭竈以及祭先炊、先火則唯黍肉。如：

《禮記·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宗伯夏父弗綦祭閔公、僖公逆亂昭穆，對竈神用祭天神之禮燔柴而祭，臧文仲不能止，所以孔子責其不知禮。“奧”鄭玄注為“饗”字之誤，或作竈。孔穎達疏分辨說：奧是竈神，饗是祭先炊老婦之神，二者的祭儀有所區別，祀竈神其禮尊，“略如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祭先炊老婦“盛於盆，尊於瓶，以其事小也。”^⑧“奧”“饗”分別指竈神

和先炊，前人早已辨明，然而在五種祀火禮儀中，將其用“事大”“事小”來區別是後起的。先炊是老婦，無疑用“老婦之祭”，而《禮記·禮器》載“夫與者，老婦之祭也，”明確告訴我們祀竈神，即“與”，也曾用“老婦之祭”，這與民族學中竈火之神為老婦，用日常飯食獻祭相合。可見竈神與先炊關係十分密切，最早的祭禮是相同的，祭器均不用籩豆俎，所以說唯黍肉而已。

對最早的竈神及先炊等“老婦之祭”僅用盆、瓶、祭燭，即先火“禮如祭饗”，亦同於先炊。這種祭儀的簡樸並非由於“以其事小”，而反映了歷史的久遠，所以不用禮器是因為這一習俗產生時還沒有出現禮器。如在雲南永寧的納西族，傳統的建築形式是與以母系家庭為社會細胞的制度相適應的，土司家庭雖已打破了阿注婚，實現了男婚女嫁，建有規模宏大的衙門和別墅，但仍要“專門保留一棟與民間同一形式和結構的正房，平時由僕人使用，過年過節時土司本人及其親屬都要到這裏來進餐、祭祀祖先。”這是不能違背的“古規”。^②聯繫鄂溫克人以及突厥人對女火神的獻祭形式，可見簡樸的祭禮也是“古規”。不用禮器，僅用盆、瓶獻祭的記載，使人能很容易聯想起全盛時期氏族制度下墓葬的隨葬品組合：食器（或還有炊器）和水器，這是那個時代每個人的基本飲食用具。這說明對先炊、先火及竈神祭祀的盛行，可以追溯到氏族制度的全盛時期。隨着氏族制度的衰落和文明時代的到來，以先炊面貌出現的女性祖先，逐漸被家族的男性祖先取代，對先炊、先火的祭祀，由於時間的久遠而逐漸廢弛，出現了“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的傳說。^③新的竈神取代了以老婦配祭的竈神“與”，並升格為地示之祭，祭禮遂與先炊、先火有了區別。但實際在民間祭竈仍長期保持簡樸的形式。《漢書·孫寶傳》載“御史大夫張忠……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遷新居先要祭竈，而且要“請比鄰”，這與納西族、基諾族遷新房要在寨中舉行慶典和火塘點火儀式，有相近的意義。

以上祭火之俗與改火或取新火的祭祀有不少相似之處，如文獻所載祭先炊、先火和與，進獻的是日常飯食，雲南滄源佤族取新火，各

家獻出的祭品也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米和鹽。用先火發明的“鑽木而造火”方法，取出新火點燃家庭的爐竈，是佤族取新火及漢代改火儀式的主要內容，隱含其中的是對先火法施於民偉大功績的追念，應屬古代祭先火之禮。取新火時，各家要從火塘中取出一些火灰，與米、鹽一齊送到村外祭祀，然後再迎來新火點燃火塘，這是首開後世祭竈、送竈的先河。又如前所述，火神被視為“家婆”，火塘中的鍋莊石被視為祖先的神位，可見祭竈與祭先炊也有聯繫。所以做為宗教活動的取新火與祭先炊、先火和竈這三種祭火可能同出一源，而改火之俗從主要內容看，顯然同於取新火。

人工取火的發明，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變化，涉及火的宗教習慣也很多，但就改火而言，應起源於史前流行於中華大地的對先炊、先火和氏族、家族的竈火之神的祭祀，但它的涵義卻不僅限於對火、對最早發明用火和取火者的讚美、祈求，還凝聚了部份利用火改善生存條件的經驗。

一九九三年 初稿

一九九四年七月修改

注 釋

① 顧炎武《日知錄·用火》

② 《于豪亮學術文存·居延漢簡叢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③ 羅福頤主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漢印199.200.185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陳夢家《漢簡綴述》164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⑤ 《于豪亮學術文存·居延漢簡釋叢》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⑥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考釋277

⑦ 羅福頤主編《古璽匯編》0013.4070～4072號，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⑧ 參見④及汪寧生《我國古代取火方法研究》《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4期。

⑨ 雲南大學歷史研究所民族組《拉佤族佤族崩龍族傣族社會與家庭調查》1975年版。

⑩ 汪寧生《改火的由來》《中國古代史論叢》總第8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袁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寒食與改火》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⑪ 參見⑧及李根蟠等《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原始農業形態》477頁，農業出版社1987年版。

⑫ 楊鴻勳《仰韶文化居住建築發展問題的探討》《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⑬ 楊鴻勳《河姆渡遺址木構水井鑒定》載《建築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⑭ 拉法格《財產及其起源》三聯書店，1962年版。

⑮ [德]利普斯著，汪寧生譯《事物的起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⑯ 見《禮含文嘉》及《韓非子·五蠹》。

⑰ 孫詒讓撰《周禮正義》2400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⑱ 喬治·彼得·穆達克著，童恩正譯《我們當代的原始民族》120～121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1980年版。

⑲ 秋浦等著《鄂溫克人的原始社會形態》91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⑳ 蔡鴻生《突厥事火》《中亞學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

㉑ 詹承緒等著《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1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㉒ 杜玉亭《基諾族母系制殘餘及其向父系制的過渡》《民族學研究》第二輯，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㉓ 《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

㉔ 同②

㉕ 同⑦

漢劾制管窺

徐世虹（中國政法大學）

自本世紀初以來，伴隨着簡牘史料的陸續出土，特別是三十年代大批居延漢簡的問世，使不少海內外學者得以以漢簡為中心，不斷地開拓漢代法制研究的新領域，推出了一批較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七十年代以後，數以萬計的居延新簡的出土，更給漢代法制研究帶來了新的希望，昭示着它不衰的生命力。本文即旨在以居延新簡所見的史料為中心，探討漢代的劾制。

一

漢有囚律告劾，其本於秦律，而秦律又源於李悝《法經》之囚法，此已眾所周知。《晉書·刑法志》說漢之“囚律有告劾、傳覆”、“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若以今世法律訴訟這一概念所包含的起訴、審訊、判決三個階段來比較，則已無所不在其中，可見漢代的立法已有相當高的自覺性。在漢代囚律的諸法中，告劾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其理由十分簡單，即它是所有訴訟活動的基礎階段，傳覆、繫囚、鞠獄、斷獄皆以其為本。不過在這裏我們首先應該澄清一種認識，這就是在漢代，告與劾是兩個適用對象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以睡虎地秦墓律簡見之，秦時起訴通稱“告”，如“告不審”、“公室告”、“非公室告”、“告不聽”、“告盜加賊”、“自告”、“州告”等；^①其時尚未出現劾制，對告行為的實施者，身份限定還不那麼明確，吏民起訴，均被納入告的範疇。漢代以降，伴隨着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官僚制度的完備，一種運作

於官僚系統內部的法律制約機制也應運而生，這就是劾制。關於劾字之義，歷來有諸多詮釋。沈家本在羅列了以《說文》為首的諸家之說後指出：劾有三義，一為上對下之詞，一為兩人相對之詞，一為《周禮》鄭注，“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也”。² 有論文指出，沈家本概括的劾字三義，前二義絕難成立，唯有第三義纔符合漢史。³ 筆者也同意這一看法。不過需要明確的是，沈家本同時還指出，“告、劾是二事，告屬下，劾屬上”，即他已經意識到了告與劾是兩個涉及對象不同的概念。遺憾的是他在界定對象時，仍未有所明指，而祇是籠統地說：“告屬下，劾屬上”，並在後文分析劾義時進一步解釋道：“《張敞傳》：‘敞身被重劾。’凡此言劾者，並為上對下之詞，而告者乃下對上之詞，二字正相對待。”翻檢漢史可以發現，告與劾確實是“二事”，很少有見告、劾混用的情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在漢代，告與劾的適用對象是非常清楚的。這就是告行為的發生者往往是民，而劾行為的發生者往往是官。換言之，民對民、民對官或官對民的起訴行為稱告，而官僚系統內部的彼此起訴行為稱劾，二者一般不混淆使用。底下不妨以江陵張家山漢墓出土的《奏讞書》中的部份案例加以佐證。

告類：1. 高祖十年七月辛卯朔甲寅士五告男奴武逃亡案。2. 高祖十年十二月壬申大夫蒍告女子符為士八案。3. 高祖十一年八月甲申朔己丑發弩九告男子毋憂去亡案。

劾類：1. 高祖八年十月己未安陸丞忠劾獄史平舍匿無名數大男子種一月案。2. 高祖十年七月辛卯朔癸巳劾臨菑獄史關令女子佯病卧車中出關案。⁴

在告類案件中，原告的身份分別是大夫（有爵者，二十等爵第五級）、士五（因罪而失官爵者）、發弩（專司射弩的兵士），而被告分別為逃亡女子（女子符）、成年男奴（男奴武）、被徵召男子（男子毋憂），身份或為“隸”，或為“奴”，或為“蠻夷”，均十分低下。在劾類案件中，原劾者的身份均為非民。前者未言明劾者，但應該是與被劾者同一系統的官吏；後者官職為“丞”。被劾者則均為獄史。從上述比較可以看出，至早在漢初，告與劾在使用上就已有所區別。也許在秦時的司法

實踐中，此種區別已經初露端倪，祇是尚有待進一步考證。若再徵以漢籍，此種區別則表現得更為明顯。例如：

1. 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漢書·文三王傳》
2. 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為後。《漢書·景十三王傳》
3. 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漢書·于定國傳》
4. （王尊）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漢書·王尊傳》
5. ……（灌）夫愈怒，不肯順。（田）蚡乃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漢書·灌夫傳》
6. 於是上使御史簿責（竇）嬰所言灌夫頗不辭，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滅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嬰良久乃聞有劾，即陽病，不食欲死。（同上）
7. ……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父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漢書·杜周傳》

由上述諸例可見，凡非官者發生訴訟行為，均稱告，反之則稱劾。應該說，在漢代的司法活動中，劾行為是經常而且大量發生的，因為在漢代典籍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發端於劾的案例。但遺憾的是，就像對漢代訴訟制度的研究仍很不得力一樣，有關漢代劾制的探討也還處於初始階段。居延出土的著名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書，

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訴訟文書。它由四份爰書組成，真實地反映了東漢初年的訴訟制度。已有一些專家學者對其進行了分析考證，論述了它的價值所在。^⑤不過確切地說，雖然這一冊書是漢代訊鞠論報訴訟程序的具體化，但它所反映的是“訊、鞠、論、報”，即告或劾以後的各個階段程序的文書形式和內容，並沒有直接含有告、劾的訴訟文書。冊書也記有被告寇恩的證詞及原告栗君起訴文書的部份內容，可它畢竟不是原始完整的訴狀或劾狀，通篇冊書乃是都鄉嗇夫依據縣廷的指令，二次傳訊寇恩調查核準事實，並將結果以爰書形式上報縣廷的報告書，作為導致訊鞠論報發端的原始的起訴文書，則無由窺其全貌。該冊書的二份爰書的起始部份都提到了“都鄉嗇夫官以廷所移甲渠候書召恩詣鄉”，應當說這裏的“甲渠候書”，正是指起訴文書的原件。那麼作為立案基礎階段的起訴文書（或曰劾文書），其原貌究竟是怎樣的呢？據以劾的原則、劾所處的訴訟程序、劾的程序及受理又呈何形態？在探討漢劾制時，這些都是應該首先弄清的基本問題。令人慶幸的是在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出土有幾件前所未見的極其珍貴的東漢初年的劾狀與狀辭，它們就是原始的起訴文書。現擇三份有代表性者錄之並加以簡釋，然後在此基礎上就漢劾制的幾個問題加以探討。

二

其一：

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丁丑，主官令史譚敢言〔之〕，謹移劾狀一編敢言之。甲渠塞百石士吏居延安國里公乘馮匡，年卅二歲，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三月己亥除署第四部，病劾（咳）氣短，主亭隧七所咿呼。七月□□除署除四（第十）部，士吏□匡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丁丑，主官令史譚劾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

●狀辭：公乘居延鞬汗里年卅九歲，姓夏侯氏，為甲渠候官斗食令史，署主官以主領吏備盜賊為職。士吏馮匡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七月壬辰，除署第十部士吏，案匡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

五月丁丑甲渠守候博移居延寫移如律令／椽譚

EPT 68:1-11

這是一份較完整可讀的由劾狀和狀辭組成的劾文書（即起訴文書）。劾狀部份的首尾是上行公文的例行用語，中間為劾狀之文。意為：被告馮匡，現年三十二歲，係甲渠塞百石士吏，籍貫居延縣安國里，爵名公乘。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三月乙亥遣往第四部，因患病咳嗽氣短（而不能盡職），致使負責的七虞亭隧均有所壞裂。同年七月轉調第四（十？）部。查馮匡為軟弱不任吏職，故依據法令將其斥免。狀辭部份除寫明原告身份外，與劾狀無明顯不同。

其二：

建武五年九月癸酉朔壬午，令史立敢言之，謹移劾狀。迺九月庚辰，甲渠第四守候長居延市陽里上造原憲，與主官人譚與憲（與憲一行文？）爭言鬪，憲以劍擊傷譚匈一所，騎馬馳南去。候即時與令史立等逐捕到憲治所不能及，驗問隧長王長辭曰：憲帶劍持官弩一、箭十一枚、大革囊一、盛糲三斗、米五斗，騎馬闌越隧南塞天田出，西南去，以此知而劾。無長吏教使，劾者狀具此。

建武五年九月癸酉朔壬午，甲渠令史劾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

上造居延累山里，年卅八歲，姓周氏。建武五年八月中，除為甲渠官斗食令史，備寇虜盜賊為職。至今月八日，客民不審口讓持酒來過候，飲。第四守候長原憲詣官，候賜憲、主官譚等酒，酒盡，讓欲去。候復持酒出，之堂煌上飲。再行酒盡，皆起。讓與候史候口夏候譚爭言鬪，憲以所帶劍擊傷譚匈一所，廣二寸，長六寸，深至骨。憲帶劍持官六百石具弩一、囊矢銅銀十一枚、持大口囊一、盛糲三斗、米五斗，騎馬闌越隧南塞天田出。案憲鬪傷、盜官兵、持禁物闌越於邊關徼亡，逐捕未得。它案驗未竟。

EPT 68:13-28

就格式而言，這份冊書和其一大致相同，雖無“狀辭”二字，但仍可看出有“上造居延累山里”為狀辭之文。該劾狀的主要內容是，建武五年九月庚辰，甲渠第四守候長原憲（籍貫居延市陽里，爵名上

造)，在候官廳中飲酒時，與主官人譚爭吵言鬪，用劍刺傷譚胸部後，騎馬向南逃去。候立即與令史等人追捕，到原憲治所後未能捕得。經驗問隧長王長，原憲已攜帶兵器糧物，騎馬私自越過隧界，自天田而出，向西南逃遁。甲渠斗食令史周氏，以此劾原憲。

其三：

迺今月十一日辛巳日且入時，胡虜入甲渠木中隧塞天田，攻木中隧。隧長陳陽爲舉燧上二烽、塢上大表一、燔一積薪。城北隧助吏李丹候望，見木中隧有烟，不見烽。候長王褒即使丹騎驛馬一匹馳往逆辟。未到木中隧里所，胡虜四步人從河中出，上岸逐丹，虜二騎從後來共圍遮，略得丹及所騎驛馬持去。●案褒典主而擅使丹乘用驛馬爲虜所略得，失亡馬。褒不以時燔舉，而舉燧上一首火、燔一積薪，燔舉不如品約，不憂事邊。

建武五年十二月辛未朔戊子，令史劾將褒詣居延獄，以律令從事。

……

EPT08:81—92◎

此劾狀簡文內容完整連貫，意爲建武五年十二月辛巳日，匈奴攻打木中隧，隧長發出信號報告。城北候長在不瞭解敵情的情況下，即命令城北隧助吏李丹騎驛馬前去迎戰，結果二馬兩失，被斗食令史劾以失亡馬、燔舉不如品約、不憂事邊諸罪。

三

以上所列舉的，是三份真實地反映了原貌的原始劾文書。若對其進行分類，則其一爲行政處罰類，其二爲刑法類，其三爲軍法類，大體代表了居延新簡所見劾狀的主要內容，從而爲我們探討漢劾制提供了極其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一) 案與劾

漢律的核心原則是加強鞏固封建的中央集權政治，這個原則所涵蓋的面是極廣的。就邊疆的防禦而言，它要求邊地安寧、戍邊組織內

部穩定、各級機構均可正常運轉。因此在這個原則指導下的劾，便帶有明顯的功能特徵。即凡被認為有礙於這個原則實施的行為，均可在劾的範圍之內。但這種劾並不是隨意泛濫的，它要求劾要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律條的徵引應和事實無有二致。

以其一見之，士吏馮匡原主領甲渠候第四部，因病咳氣短，難以勝任吏職，後雖調任第十部，仍被劾以“軟弱不任吏職”，按令加以斥免。軟弱不任吏職係漢律罪名，又稱“軟弱不勝任”。其罪的科定，有政績平庸之軟弱。《漢書·百官公卿表》：“孝元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琊張譚仲叔爲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有痼疾不任朝之軟弱。《漢書·王子侯表》：“東莞侯吉，坐痼疾不任朝，免。”以居延新簡見之，又有不任候望之軟弱。EPT48:8簡：“咻呼不塗治，案嚴軟弱不任候望。”還有不盡職守之軟弱。EPT59:3—4簡：“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將軍行塞，舉駟望隧長杜未央所帶劍，刃生，狗少一，未央貧急，軟弱毋以塞，舉請斥免，謁言官敢言之。”就軟弱不勝任而言，雖然相應於該罪的處罰僅可見“免”或“斥免”，但在漢代官吏的心目中，一旦因軟弱不勝任而被斥免，則意味着自身價值的喪失，終生也難以再度入仕，其耻辱遠甚於因貪贓污職而受刑。^⑥由此亦可反證，漢律對此罪一般是從快處罰的。馮匡劾狀言甲渠守候博於建武五年五月乙亥朔丁丑，將斥免馮匡的劾狀移送居延縣獄，又據破城子甲渠候官遺址出土的、內容涉及官吏任免的簡文記載：“建武五年四月丙午朔癸酉，甲渠守候謂第十四隧長李孝，書到，聽書從事，如律令。第十四隧長李孝，今調守第十守士吏。第十士吏，斥免缺。”可見對馮匡的斥免，在甲渠候向居延都尉府移送劾狀以前（至少在建武五年四月以前）就已實施了。於是這樣一個問題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在訴訟過程中，劾究竟屬於第幾程序的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文列舉的劾文與狀辭中，都出現了“案某某罪”的句式。就是說在劾行為發生前，已經對被劾者進行了“案”，狀辭中的“案某某罪”都是案驗完畢的結果（如尚有未案驗畢的罪行，則稱“它案驗未竟”）。《文選·通幽賦》注項岱曰：“案舉曰劾”，《急就篇》顏師古注曰：“劾，案舉之也，有罪則案舉”。

也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釋劾。但需要明確的是，案與劾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從上述劾狀來看，先案後劾的程序特點十分明顯。即劾是程序法中的重要環節，它的完成是以案為基礎的。江陵張家山漢簡劾類案件反映的訴訟程序為劾、問（詰）、鞠、當。《漢書·張湯傳》中張湯治鼠獄則為劾、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應當說這裏的劾均發生在案後。《周禮·鄉士》鄭注：“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從司法文書的角度，對劾作了最準確的解釋。《說文》釋劾為“法有罪也”，段注：“法者，謂以法施之。《廣韻》曰：‘劾，推窮罪人也。’”對劾的性質作了引伸解釋。因此所謂劾，乃是依據律令被認定為有罪，被劾者將作為罪人而被直接“推窮”其罪。

再以原憲及褒的劾狀來看，原憲身為甲渠第四守候長，鬪傷人後，又持官兵器及禁物私自越過邊境潛逃，一身數罪併發，係重大刑事案件，故案發後即將劾狀移送居延獄，請求以律令行事。候長褒則在戰鬪中指揮不當，致使兵員與驛馬為敵所虜，亦是數罪併發，也被迅速劾罪。作為防禦異族入侵的邊陲之地，劾始終貫穿着不允許危害邊地安全行為存在的原則。以上述三份劾狀為代表，據以劾者，多是私去署、乏迹候、失關不憂事邊、共盜官兵、關越邊關、燔火不如品約、持禁物關越塞等罪名，表現出漢律對邊關制約的嚴密。以軟弱不勝任為行政處罰，所以甲渠候可以行使自己的行政職權，一方面“以令”對被劾者實施“斥免”，一方面及時調遣屬員填補缺員。但以上諸種行為已構成刑事犯罪，對它的懲罰權限，已超過了候官的職權範圍，因此必須盡快呈報上級機關，不使劾罪拖滯。相應於這些罪名的懲罰刑名，簡文中未見反映。但無論結果如何，就被劾者而言，自劾狀成文之際，其罪人的身份就已經被確定了。EPT 68:29—30 簡云：“建武六年四月己巳朔戊子，甲渠守候長昌林敢言之，謹移劾狀一編敢言之。”又31—32 簡云：“建武六年四月己巳朔己丑，甲渠候長昌林將良詣居延獄以律令從事。”對被劾者的移送之快，很難想像在劾的階段，申辯權利可以作用於原告。

案而後劾，劾而後訊鞠論報，這或許正是適用於漢代官僚行政系

統的訴訟程序。

(二) 劾的程序

在漢代，地方司法機關並非呈獨立系統，它的職能與職權被統一在行政機構的系統之中。這樣就要求發生、活動於這個系統中的劾行為，必須要有一定的程序，即祇能逐級劾而不能越級劾。居延新簡EP T10:2A 簡載：“囚律：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正是在法律上對劾程序做出的限定。以前文所舉的劾狀來看，邊境地方的劾，確實是循一定的法律程序而進行的，表現出了很規範嚴謹的行政運作的職能。

李均明先生曾圍繞着居延新簡中的二份劾狀，探討分析了移送劾狀文式的格式。他認為其程式為：1. 劾狀呈文。含起訴時間（年、月、朔干支、日干支）、起訴人（所在機構、職務、姓名）及關於所呈文書性質與數量的說明。2. 劾狀本文。主要內容是被告的犯罪事實和原告的調查意見。3. 處理劾狀的呈文，包含時間和處理方式。4. 劾狀的再抄件，由原告的上級製成，含對原告身份的證明及劾狀的抄件。5. 原告上級關於批轉文書的呈文。^⑥

我們知道，漢代的文書製作與傳達和官僚的組織系統、司法行政職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有所謂“文書政治”之說。^⑦以上所述雖然是移送劾狀公文的程式，但是據此也可分析出基層組織的劾程序。從馮匡、原憲、王褒三人的劾狀來看，對被告進行起訴的，分別為夏侯氏、周氏，其中周氏一人劾二人，兩人均係甲渠候官的斗食令史，職責是“主領吏備盜賊”。由於他們對基層軍吏及防禦守備的情況比較熟悉，因此對產生於基層的各種有礙於邊塞安定行為的原始劾，主要是由這樣一批斗食令史來進行的。所以在移送劾狀公文中所見的“狀辭”的製作者，正是“狀辭曰”後面言及的、寫明其名爵、縣里、年齡、姓氏、官祿的某“氏”。同時也正因為劾為訴訟之始，劾者必須對自己的劾行為承擔責任，所以不僅要在劾狀開始寫明各項證明身份的內容，還要在狀辭末尾寫上例行用語“以此知而劾，無長吏教使，劾者狀具此”，以表明所劾事實的不偽和劾的獨立無倚。劾狀在某“氏”手中完成後，便

被移送到上級官署候。候接到劾狀後，通常是由候的文職屬吏令史，根據原始劾狀製作出呈送上級司法機關居延縣獄的公文，即所移劾狀。經令史或掾史之手產生的移送劾狀的文書，已是對原始劾狀加工後的產物。從內容上看，其所移劾狀的事實與狀辭所述事實有完全相同的，如對王褒的劾狀，但也有互補的，像對馮匡之劾，狀辭指出“案匡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但未明因何而“案”。劾狀則陳述所案為“病咳氣短，主亭隧七所咻呼”。又，對原憲之劾，事實部份大體相同，但劾狀云“它案驗未竟”。如何“未竟”，狀辭詳述道：在原告原憲犯關傷罪逃亡後，候與令史立即追捕，追至原憲所在第四候署，得知原憲已盜官兵、持禁物闖越邊關。這種劾狀與狀辭的互補，並非說明了兩者在等級上的同一性，反之它恰好證明了作為候之上、都尉之下的候官，具有將原始劾狀修改為上行劾狀文書的職權。而此種職權的獲得，正好表明了兩者在程序等級上的差異。至於狀辭附在劾狀之後，一則說明劾的由來，二則表明所劾事實的不偽。

一般說來，候官令史並不具備直接向上級轉呈劾狀的權力。理由很簡單，候官令史祇是候的文職屬吏而已。劾狀文書中雖寫有令史某“劾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但事實上應先呈報給甲渠或其它候官，由候官長官呈報居延上級官署。

（三）劾的受理

漢代邊境的地方組織，在郡太守的統轄下分兩大系統。行政系統為郡——縣——鄉——里、亭；軍事系統為都尉府——候官——候——隧。假設來自基層的劾經候官向上呈報後，則受理劾的機構，是都尉府還是縣呢？以劾狀文書的呈文見之，其通常寫“某某劾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結尾則寫“某某移居延寫移如律令”。可見劬到了候官一級後，不是繼續向都尉府轉呈，而是向候官的平行官署縣轉呈，換言之，居延縣廷是受理劬的官署。從《候粟君所責寇恩事》所反映的內容看，身為甲渠候官之長的粟君，其向客民寇恩的起訴，是向居延縣廷提起的。縣廷受理後立即立案驗問，整個訴訟活動都是在縣至鄉、鄉至縣、復縣至鄉、鄉至縣這個行政系統中進行的。而且縣還可以對甲渠候官

做出“須以政不直者法亟報”的結論，並直接照會本人所在的官署。據此可見，至少在邊境地區，即使是軍吏，其訴訟活動也要被納入地方行政的司法權限之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類似“軟弱不任吏職，以令斥免”的行政處罰，也要“移居延寫移如律令”，這是否意味着除司法權外，地方行政機構對軍事組織在人事上也有一定的支配權呢？

所謂“劾移居延獄，以律令從事”，並不意味着居延縣廷是所有劾的最終審理機關。前文所引的“囚律：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這一重要的漢律佚文，既是在法律上對劾程序做出的規定，也表明就地方司法機構而言，二千石官所統轄的郡太守府是受理各種劾的最高審級。正是在這一律條的制約下，居延縣廷儘管對候粟居做出了“政不直”的結論，然而仍需“(以)法亟報”，以期獲得郡太守的準可。在漢代的縣道——郡——廷尉——天子的訴訟系統中，二千石官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僅大小輕重之劾須上報二千石官，而且漢初即規定，縣道獄有所疑，亦須上報郡太守以待定奪；郡太守不能定奪者，則附所當比罪名律名，上報廷尉乃至天子。可見二千石官在整個系統中起着連貫中央和地方乃至基層的作用。《周禮·秋官·鄉士》云：“士師受中。”注：“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疏：“士師當受取上成定中乎文書。漢時，受二千石祿廩郡守之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沈家本進一步明確道：“二千石受其獄，謂郡守受在之下之爰書也。”^①這裏自然也包括受理各種自下而上的劾狀。不過這當然不是說劾無巨細，均由二千石官受理。漢囚律云：“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其中的“關”字之義，當是關白。《說文》曰：“關，以木橫持門戶也。”段注：“……又引伸之，凡曰關閉、曰機關、曰關白、曰關藏皆是。凡立乎此而交彼曰關。”既然是關白稟報，則有可能是縣廷將有權審理且已判決的劾案上報太守備案，也有可能是將有權審理而難以決斷、或無權審理的劾案上交所屬的二千石長官。總之無論結案還是未結案，都必須稟報太守府。甲渠候在以令斥免了軟弱不任吏職的馮匡後，再向居延縣廷移送劾狀，也許正可以從這個意義上解釋“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

注釋

- ① 均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
- ② 沈家本《漢律摭遺》卷一（《歷代刑法考》第三冊 中華書局1985年）。
- ③ 陳曉楓《兩漢劾制辨正》（《法學評論》1989年第三期）。
- ④ 均引自《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釋文·一》（《文物》1993年第八期）。
- ⑤ 見俞偉超《略釋漢代獄辭文例——一份治獄材料初探》，徐蘋芳《居延考古發掘的新收穫》，蕭亢達《“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畧考》（以上均見《文物》1978年第一期）。大庭脩《居延新出土的“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書》（《秦漢法制史研究》第五篇第二章 日本創文社 1982年），劉海年《東漢初年的一宗訴訟卷案》（《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 ⑥ 上述三份劾狀，均引自《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 1990年）。
- ⑦ 《漢書·尹賞傳》載：“遷執金吾，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錢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贓，慎毋然！’”
- ⑧ 李均明《居延漢簡訴論文書二種》（《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
- ⑨ 米田賢次郎《帳簿中所見漢代官僚組織》（《東洋史研究》十四之一、二）。
- ⑩ 沈家本《漢律摭遺》卷六（《歷代刑法考》第三冊 中華書局 1985年）。

漢簡“得算”、“負算”考

于振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一、引言

在居延漢簡中，有一些上面寫有“得(若干)算”或“負(若干)算”之類的文字。我粗略統計了一下，這類漢簡大約有十八枚。^①

對這類簡文的解釋，大致有如下幾種意見：

(一)陳直先生在《算收家貨與官吏考績之得算負算》^②和陳夢家先生在《漢代烽燧制度》^③中都認為這裏的“算”是罰款或獎金的計算單位，一算相當於一百二十錢，與漢代算賦數額相當。

(二)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在《論禮忠簡與徐宗簡——平中琴次氏算賦申報書說的再探討》^④中認為：“算”是一種評價單位，負一算意即減一分，與算賦、口算、貨算無關。

(三)幾年以後，永田英正在《居延漢簡集成之二——破城子出土的定期文書(二)》^⑤中又提出了另一種看法：他認為負算是器物件數減少的意思，負一算意即減少一件器物。

以上諸說都沒作具體論證，學術界也看法不一，本文擬對此作一考察，疏漏在所難免，敬請師友批評指正。

二、對“得算”、“負算”的詮釋及對以上諸說的評價

在漢代，“算(筭)”並不僅僅指算賦。《說文解字》云：“算，數也，從竹從具，讀若算”，“筭，長六寸，計歷數也，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筭古代通用，即都可做動詞，表示計數，也可做名詞，指計數用的籌碼。如果“算(筭)”僅指算賦，並已在漢代普遍流行的話，作為漢代字書的《說文解字》不能不有所反映，但事實

上，《說文解字》在解釋算，第二字時，卻隻字沒提算賦。

《漢書·惠帝紀》六年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漢律，人出一

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在這裏，“五算”或“倍算”雖為歧視性措施，但仍屬於算賦，與之相對應的是“不算”或“復算”即免徵算賦，而不是“得算”。如《漢書·晁錯傳》：“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書·南蠻傳》：“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五算”或“倍算”每年與普通算賦一起徵收，而不是作為罰款隨時徵收。

另外，“算”作為一種賦稅名稱，其數額並不十分固定，漢初有六十三錢、一百九十錢、二百二十七錢、四百多錢等不同說法。^⑥雖然西漢中期至東漢末，“算百二十錢”已基本成為常制，但仍有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算四十”等臨時變動^⑦。以上祇是作為人頭稅的“算賦”數額問題，而作為財產稅的“算”又有所不同：《漢書·武帝紀》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注李斐曰：“一貫千錢，出錢二十也。”又《漢書·翟方進傳》注張晏曰：“牛馬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而《漢書·景帝紀》後元二年五月詔中“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注服虔曰：“訾萬錢稅百二十七也。”可見，“算”在不同的時期與不同的場合中所代表的稅額並不固定，用這種不確定的東西作為獎金或罰款的單位，恐怕並不符合情理。

我們再來看“負”。《說文解字》：“負，恃也，從人守貝，有所得也；一曰受貸不償。”沒提到有罰款之意。此外，負還有賠償之意，見《韓非子·說林下》：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

但賠償並不是罰款，如秦律《效律》：

倉廩（漏）朽（朽）禾粟，及積禾粟而敗之，其不可飮（食）者，不盈百石以下，誅官嗇夫；百石以到千石，貲官嗇夫一甲；過千石以上，貲官嗇夫二甲；令官嗇夫、冗吏共（償）敗禾粟。

這裏，貲爲罰之意，賞(償)即賠償，二者區別極爲明顯。官吏失職，既要賠償，又要受罰。

在漢代，貲仍用來表示罰款之意。《說文解字》：“貲，小罰以財自贖也，從貝此聲，漢律，民不徭貲錢二十三。”同時，在漢簡中則直接用罰表示罰款，如EPS4T2:8B

不中程百里，罰金半兩。

《漢書·張釋之傳》也有類似的例子：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可見，不論在秦漢文獻還是簡牘中，表示“罰款”都另有他詞，而不用“貲”。

《九章算術·方程》提出了“正負”的概念，宋人李籍《九章算術音義》云：

本數爲正，非本數爲負。正與正同名，負與負同名。同名相除則異名者相益，異名相除則同名者相益。一正一負，相反而相爲用，術之至也。

漢簡中之得算、負算與這裏正數、負數的用法頗爲近似。

早在先秦時期，算就已作爲計數的籌碼而被使用。《儀禮》之《鄉射禮》和《大射儀》中有用算計射箭勝負的內容，《禮記·投壺》中也有用算計投壺勝負的內容。二者使用算的方法大致相同。漢代投壺之戲仍很流行，算的應用也更爲廣泛和經常，這已爲文獻和考古材料所證明。^④加之人們已掌握了正負數的運算法則，因而在考察官吏時就應用了這些方法，根據每個官吏政績的好壞而確定“得多少算”或“負多少算”，用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因盡職而“加若干分”或因失職而“減若干分”。

上面考釋的結果，與陳直、陳夢家等先生的見解相左，但與永田英正的早期見解相合。

關於永田英正後來的修正意見，我認爲不能成立。我們不妨用永田英正所根據的簡52·17+82·15來作一分析：

甲渠候郵：大黃力+石弩一，右淵強一分，負一算；八石具弩

一，右弭生，負一算；六石具弩一，空上蜚，負一算；六石具弩一，衣不足，負一算；塢上望火頭三，不見所望，負三算；塢上望火頭二，不見所望，負二算；口扣弦一，脫，負二算。凡負十一算。據《釋名·釋兵》：弓兩端叫簫，也叫弭，中央叫附，簫附之間叫淵。“右淵強”指弩的左右兩淵力量不平衡。弭據《釋名》爲骨質，但考古發現，亦有銅質之弭。^⑤“生”據于豪亮先生考釋，爲生鏽之意。^⑥“衣不足”可能指未上弩衣。“空上蜚”意不可曉。凡此種種均謂兵器或烽燧設施的某些部位出了點問題，但並非減少了。如果“負一算”即減少一件器物，那麼，“口扣弦一，脫”也祇能“負一算”，而不應“負二算”。況且兵器不止一種，軍事設施也各不相同，將其減少的數目加在一起，而說“凡負十一算”，如此統計，未免帳目混亂，毫無意義。

總之，漢簡中的“得算”、“負算”是一種評價官吏政績的術語，與算賦無關。永田英正的早期看法是合理的，可惜他後來沒有堅持。

三、漢簡本身的印證

下面結合漢簡具體驗證一下上述推論是否正確。

次吞隧長長舒：卒四人，一人省，一人車父在官已見，二人見。塢戶厭破不事用，負二算；木長樨二，柄長，負二算；直上蓬干柱櫃木一，解隨，負三算；塢塢不塗堞，負十六算；反筭一，幣，負二算；天田埒八十步，不塗，不負一；縣索三行一里卅六步，幣絕不易，負十算；積薪梁皆不堞，負八算；縣索緩一里，負三算。●凡負卅四算

EPT 59: 6

這是一個相當完整和詳細的考課記錄，既包括對燧卒的考勤，也包括對烽燧設施的檢驗。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天田埒八十步，不塗，不負一”這句話。天田是在邊防綫一帶鋪的沙土，一旦有人偷越邊境，就會在上面留下痕迹。埒是邊界，“不塗”即沒鋪好沙土。“天田不塗”是一種失職行爲，盡管不足以負一算，也應受到某種輕罰。如果此簡是獎罰記錄，就不應該祇記罰款數目而不記錄對一般過失的處理情況。而如果此簡是“考績評分簿”，就完全有理由祇記評分結果，而不必

記錄對各種過失的懲罰情況了。簡EPT52:783頗能說明問題：

□□□□軍王門塞外海廉渠，盡五月以□九月都試，騎士
馳射最，率人得五算半算。

這條簡文大意是說，某隊騎士在都試時，馳射成績為“最”，平均每人得五算半算。根據漢代“功令第卅五”：

●功令第卅五：士吏、候長、蓬隧長常以令秋試射，以六為程，過六賜勞，矢十五日

285·17

□弩發矢十二，中筈矢六為程，過六若不筈六，矢賜奪勞各十五日

EPT56:337

秋射時要根據射箭成績，予以賜勞或奪勞，並沒有獎金或罰款的規定。因此，這裏的“五算半算”與其說相當於5.5個算賦的獎金，倒不如說平均每人得5.5個籌算的成績更為符合實際。

其實在漢簡中用作評分單位的，除了“算”以外，還有其他名目，如簡226·23

□第四 決 決 第四 決 不 不 相除定負百廿四算
這似乎也是一個射箭記錄。“決”、“不”可能分別代表射中目標與否，然後根據所得“決”、“不”的多少，換算成“算”數。此外還有許多直接寫“得若干”、“負若干”，而不用任何計分單位的簡，如簡206·25

鉅庭守候長李□ 三 七 二 一 凡得十三

這類簡的存在，也反過來證明，得算、負算之“算”與錢無關，不應與算賦混同。

就漢簡而言，評分考績方法應用於烽燧設施的維修、兵器和藥品的保管、現金出納以及秋射等許多方面。所用的評價單位有若干種，“算”祇是其中比較主要的一種。

四、文獻資料的佐證

以上通過漢簡本身的資料驗證了我們對“得算”、“負算”含義的推論，而傳世的文獻中也有佐證。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中有這

樣一段話：

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

其中“得”與“負”二字，賴炎元先生釋爲“獎賞”與“懲罰”，但根據前面對漢簡的分析以及本段上下文的聯繫判斷，我認爲當釋爲“加分”和“減分”。“得少者以一益之”以下幾句，用獎賞、懲罰的思路，無論如何是解釋不通的，因而賴炎元先生未加注釋。蘇輿認爲：“此爲得負乘除法，未詳其式。”蘇說近是。^①我認爲這段話把評分與定等結合起來，提出了一套官吏考評方法，大意是說：根據官吏的功過分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級，共九級；第一級爲最，第五級爲中，第九級爲殿；官吏們都要以“中”的標準爲參照，比中好的要加分，不及中的要減分；根據功過程度的不同，在中的基礎上加或減一至四分。“皆逆行”是說等級的第一爲最高級，第九爲最低級，而得分的一分爲最低分，九分爲最高分，二者正好相反；也可能是指“得一”比“得四”功小，“負四”比“負一”過大，二者正好相反。因文字過於簡奧，難究其詳，但兩種說法都能說得通。圖示如下：

等級	最	二	三	四	中	六	七	八	殿
得負	得四	得三	得二	得一		負一	負二	負三	負四
分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上面之所以把“中”定爲“五分”，是因爲《考功名》中有：

二得九，並去其六，爲置三弟

盧文弨曰：“弟，古第字。”^②這句話是說，在三次考評中，有兩次得九分，就可以躍過六分那一級（第四）而升爲第三級。而在一般情況下，三次考評合格祇能進一級。由此可見，九分爲最高分，五分爲“中”。五分又是評定政績的基本分，官吏的得分都以此爲基數，在加四分與減四分的範圍內波動。

《考功名》中的評分方法與漢簡中的評分方法並不完全一致，但

其“得”、“負”的用法與漢簡的情況相同，從而也為我們對“得算”、“負算”的考察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五、餘論

本文通過文字的詮釋，漢簡本身的印證和傳世文獻的佐證幾個方面得出這樣的結論：漢簡中的“得算”、“負算”是對官吏政績進行評價時所用的術語，與獎金、罰款沒有必然聯繫。漢代的“算(筭)”除用於指算賦外，也指計數的籌碼，必須視不同的場合加以區別，不能一概而論。

就漢簡所見，漢代評分考績方法似主要用於平時的考核，而非一年一度的總評。而且在使用評分的場合，秋射與其他項目之間仍有很大區別，如秋射的一算相當於十五日的勞，而其他項目的一算未必如此。評分方法與年終總評之間的關係，在漢簡中沒體現出來；簡牘與《考功名》中的評價方法之間的關係，簡牘中的評分考績法在漢代是否具有代表性，也不十分清楚。這些問題都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纔能解決。

本文是我的碩士畢業論文的一部份，在寫作的過程中，得到張傳璽先生和祝總斌先生的悉心指導，在此致謝。

93. 10. 16

注釋

① 本文所引簡牘資料，出自以下各書：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平裝本），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

與“得算”、“負算”有關的十八枚漢簡如下：6·12，52·17+82·15，206·4，226·23，265·1，407·11，EPT5：8，EPT50：2，EPT51：693，EPT52：431，EPT52：539，EPT52：783，EPT53：226，EPT56：186，EPT59：6，EPT59：242，EPW 63，46·19。文煩不引。

②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綜論》。

③ 陳夢家《漢簡綴述》。

④ 《簡牘研究譯叢》第二輯，原載《東洋史研究》第28卷第2、3號，1969年。

⑤《簡牘研究輯叢》第二輯，原載《東方學報》第47冊第243—300頁，1974年。

⑥參見(日)加藤繁《關於算賦的小研究》(《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高敏《從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簡牘看漢代的口錢、算賦制度》(《文史》第20輯)、岳慶平《漢代“賦額”試探》(《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⑦分別見《漢書》之《宣帝紀》和《成帝紀》。

⑧關於漢代投壺之戲的流行情況，可參見《西京雜記》卷五《郭舍人投壺》和漢代畫像石(如南陽漢畫館閔修山等《南陽漢畫像石》第80—81頁)等資料。漢代籌算的使用情況，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曾有出土(見吳初驥、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附錄之《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于豪亮學術文存·居延漢簡校釋》中也對“籌算的記數號碼”有所考證。

⑨山東濰博富托村西漢齊王墓陪葬坑曾出土銅弭(見《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錯金銀銅弭(見《文物》1978年第8期)。

⑩《于豪亮學術文存·居延漢簡校釋》

⑪此賴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譯·考功名》，本文所引蘇輿、盧文昭語均出於此。

漢簡《蒼頡篇》新資料的研究

胡平生（中國文物研究所）

1983年，我曾執筆寫過《蒼頡篇》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簡稱“初步”），根據在阜陽漢簡中發現的資料，對佚失千年之後，於本世紀初重新出土的秦漢字書《蒼頡篇》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討論^①。十餘年來，各地又陸續公佈了許多新的漢簡材料，其中有不少《蒼頡篇》的資料，另有一些殘簡，內容也與《蒼頡篇》有關。本文首先將這些分散的資料集中起來，對些有疑點的釋文加以校訂，討論那些處乎疑似之間的簡文，然後再依據新材料對佚書作進一步的考證與探討；新的研究對“初步”一文有驗證，有補充，也有修正，可以算是前文的續篇。

一、漢簡《蒼頡篇》新資料

有關《蒼頡篇》的新資料見於1972—1974年間有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出土的漢簡、1977年有玉門花海出土的漢簡和1979年有敦煌馬圈灣出土的漢簡，前者的釋文已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新簡》一書，圖版本也即將出版（以下簡稱“居新”）；後者有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漢簡釋文》（以下稱“簡裝本”）和中華書局出版的帶有圖版的《敦煌漢簡》（以下稱“精裝本”，釋文皆簡稱“敦”），因兩書釋文稍有不同^②，有時需要分別加以討論。《蒼頡篇》是字書，遺簡多為習字之作，因此書寫中常有錯別字，大多因讀音相近或形體相近而誤，釋文不能不“照顧”這種情況，我們一般不把錯別字作為假借字看待。凡整理者釋讀中錯誤，或還難以定論的釋文，我們都先按原釋文照錄，仍不加標點，但將衍文用黑方括號括出。然後討論書

寫或釋讀的錯誤與問題。在第二節以後論述語言文字及編撰特點等方面的問題時，則採用我們校正後的釋文，並加注標點。

甲、居延新簡《蒼頡篇》

1.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勉力風誦晝夜勿置苟務
成史計會辨治超等軼羣出尤別異 居新EPT50·1A

初雖勞苦卒必有意慤願忠信微密俊言〔言〕賞〔賞〕 B

本簡中，“詔”爲“詔”字之誤；“風”爲“諷”字之誤，“辨”爲“辯”字之誤。《說文》段注“辯”字下云：“治也，理也，俗多與辨不別。辨，判也。”“俊”當爲“談”字之誤。《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俊，恬也。”可知《蒼頡》中另有“俊”字。

2. ……蒼頡作書〔按：前後有無闕文字不錄〕居新EPT50·134A

3. 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敬戒勉 居新EPT56·27A

力風誦〔勉雖子 幼子承〕 B

4. 蒼頡作書以教後子□□史□□ 居新EPT56·40

本簡中，“後子”爲“後嗣”之誤，“子”字也合韻。

乙、《居延新簡》中可能與《蒼頡篇》有關的簡：

5. 族姓嫂妹親戚弟□□病悲□□哭死□遣□心所□

（六棱觚） 居新EPT56·181A

鷄 B

6. □謹慎□ 居新EPF22·741

丙、玉門花海漢簡《蒼頡篇》

7.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諷謹慎敬戒勉力諷
晝夜勿置勉成史計會辨治超等 B

8.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諷謹慎敬戒勉力諷誦 敦1460A
晝夜勿置苟勉力成史計會辨治超等 B

9.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諷謹慎敬戒勉力諷誦晝夜
敦1461A

勿置苟勉力成史計會辨治超等 B

玉門花海出土的漢簡，嘉峪關文保所已有《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一文（簡稱“嘉文”）^③，作過介紹與研究；我也曾寫過《玉門、武威新獲簡牘文字校釋》一文（簡稱“校釋”）^④，其中有一節討論《蒼頡篇》諸簡。當時因嘉文沒有公佈全部照片，“校釋”對簡文釋讀的某些問題未能作深入討論，本文作了些補正工作。《敦煌漢簡》將例簡7.8、9中“幼子承詔”一句的“詔”釋為“諷”字，是錯誤的，實則釋為“調”較妥當。其實，嘉文已將此字釋為“調”，《敦煌漢簡》反改錯。按，“調”與“詔”音，一聲之轉。習字者因同音相通，寫了一個白字，又將下文的“諷”字也錯寫成像“調”的樣子。我在“校釋”中曾引用王力先生之說，指出漢代時幽部韻的“調”，可通宵部韻的“詔”^⑤。下面我們再舉一例為證。《說文》：“惆，失意也，从心周聲”朱駿聲《通訓定聲》謂，字亦作詔，惆詔一聲之轉。此為从周與从召之字互通的實例。

“苟勉力成史”一句，“勉力”二字釋讀有誤，實則仍應釋為“務”。儘管書寫者把它們寫得有點相像，但“勉力”為二字，“務”為一字，這還是清楚的。此三簡書法極為稚拙，且錯誤甚多，一個原因，大概習字者是初學者；另一個原因，他臨寫時所用的“帖”，不是漢隸本，而是古隸（秦隸）本。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對嘉文的看法有些修正，後面還要討論。

丁、玉門花海簡中可能與《蒼頡篇》有關的簡

10. 曰書人名姓趙荻韓礪范鼠張豬翟如竇錢墻（豬）中馮聚陳涓
敦1462

11. 曰書人名姓趙荻韓礪范鼠張豬翟如賸
敦1463

嘉文已將這幾支簡列作“疑為《蒼頡篇》等字書者”，唯在釋讀上還有一些問題。這幾支簡的文字也很差，錯別字很多，作釋文比較困難，需要仔細分析。

10、11兩簡可對讀。第一個姓氏釋為“趙”，從字形上講有些問題，“趙”字左邊是走旁，與簡文字形不大相合。不過，“趙”字的走旁在馬王堆帛書裏或寫做“𡳿”，如果臨寫者搞錯，似乎也有可能錯成現

在這個樣子，還有它的右旁也有些變樣。我們姑且保留原釋文，這個字的另一釋法，我們在後還要再談到。

“竇錢”下二字，精裝本釋作“壙中”，簡裝本作“豬中”，恐怕都不確。第一字的右邊，以“韓殤”的“韓”字右旁作比較，看來應該釋為“韋”，祇是底下多了兩點，而“韓”字的下面也有兩點。韋字左邊加雙立人，應是“偉”或是“衛”字。漢代有“偉”姓，也有“衛”姓。第二字，從形體上分析，應是“戈”字。書寫者不諳筆劃，照貓畫虎，寫出來就成現在這樣了。

陳涓之“陳”，從簡文形體上難以釋作“陳”字。它的左邊倒確是阜旁，而右旁似為“垚”之變，這樣此字就應當釋為“陘”，古有“陘”姓，《字彙》云：“晉大夫以邑為氏”。

12. 營庄邵謙郇郇郇郇傳贛董僕李員 敦1451

本簡可與後面所列的例簡16對勘，“邵謙”之“謙”，在例簡16裏同一位置的字釋為“駢”。我們認為，此字右旁从巽，左旁有訛變，可能从走之（彳），或者从言旁；所以，應是“選”或“誤”字。

“傳贛”之“傳”，釋文與簡文字形明顯不合，可知乃是整理者根據例簡16的“傳”字釋出的，而簡12此字，應釋為“俯”（“俯”之異體）。俯，是幫母侯部字；傳，是幫母魚部字，漢代魚、侯兩部合韻⑥，可知“俯”與“傳”音近而習字者寫錯。

戊、敦煌馬圈灣及附近所出漢簡《蒼頡篇》

13. 出尤別 𠂔（按：A面非《蒼頡篇》） 敦249B

14.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幼子承詔謹慎。 敦844

己、馬圈灣簡中可能與《蒼頡篇》有關的簡

15. ▲日書 敦1222

本簡應是“日書人名姓”之殘。

16. 𠂔𠂔銅𠂔𠂔駢郇郇郇郇傳功董僕李𠂔𠂔 敦1260

本簡前八字皆難以辨識，原釋文又與例簡12不合，令人不解。今“駢”字據例12改釋為“選”，其上各字暫存疑。最後二字改釋為“諒產”。“諒”字的右旁下部衍出一短橫。古有諒姓，《戰國策·趙策》中

有辨士諒殺。

17. ▲焦黨陶聖陳穀魏嬰程頤穆平梁賢尹寬榮雍尚 敦639A

贛岑度露騫彭績秦參涉競夏連樂恢檄更 B

唐美耿督廢沓塵誤黃文威山肥敕檄脩賈蘭鄧 C

難季偃田硯 (四稜觚) D

本觚文字工整清晰，但釋讀方面仍有一些問題。“尚贛”之“贛”字，從圖版看，左右旁字形明顯地與“贛”字不合。此字左旁應從金，右旁頭上為點下一橫，底為旦，中部可能是回的訛變，因此，似乎應釋為“檀”。《說文》：“檀，伐擊也。”

“岑”下一字，似可釋為“庫”；“騫”字，下部從鳥，不从馬，二字雖相通，但字形畢竟不同。

“涉競”之“競”（簡裝本作“竟”），應釋為“競”，《說文》裏“競”从言从二人，“競”从二兄从豐聲。“夏連”之“夏”，上部的四橫畫右側無豎筆封住，下部左右多了許多筆畫，在睡虎地秦簡中，“夏”寫作“𠂔”，此處能否釋為“夏”頗有疑問。分析上部與中部的筆畫，此字可能釋為“羸”比較合適。

“檄更”，“檄”當為“樹”之訛；《說文》謂為樹之籀文；此處右旁誤為從攴。古有樹姓。“更”，從字形分析，最上一橫有點，左豎作撇，故或可釋為“庚”。此字可與敦1457簡的“庚”字對看，該字从广从更。

“廢沓”，應釋為“段沓”；左旁的寫法，見於古璽（參見《古璽文編》72頁，《古璽匯編》3128）。“塵誤”，似應釋為“啓誤”，左旁因牽涉上面的“段”字而訛，正寫應作“塹”，亦見於古璽（見《古璽文編》77頁，《古璽匯編》2580等）①。

“威山”，應釋為“戡山”，“戡”通作“戡”。古有戡姓。

“檄脩”，應釋為“桃脩”，“桃”有訛變。

“季偃”之“季”，簡裝本誤為“李”。

“田硯”之“硯”，《字彙》云，同“研”字。

18. □謝頌□

敦1484

19. □鄧□□□

敦1485

“鄧”下一字或可釋爲“泉”。

20. □□□□□願杜屏赤龐豐貌▲柳喜滿丹祿錢喬連

□□□□□□□□

敦652A

九

B

“杜”上一字釋“願”恐非是，從字形看似爲“繇”。“豐貌”之“貌”，簡文作“貌”，右旁從頁，是或體，見《說文》。“貌”下爲一墨色三角，爲章首標記，簡裝本不誤，精裝本誤作“人”字。“祿”字右旁，簡裏寫作從彖，應是祿字之訛（《正字通》說“祿”爲“祿”之訛）。《馬圈灣發掘報告》認爲該簡是《蒼頡篇》簡。

21. □寬忍愚小人細

敦661

《馬圈灣發掘報告》未論及，該簡字體書風與例簡20、22都相同。因此將它們放在一起討論。

22. 昆弟賓昏善相聞鄰里對門與親友坐雖不樂好相樂 敦845

《馬圈灣發掘報告》認爲該簡是《蒼頡篇》簡，第六節中再作討論；該簡句讀有疑問，說亦見後。

二、《蒼頡篇》首章研究

前面列出的資料中，數量最多、最爲完整的要數《蒼頡篇》的首章，祇有最後一句殘缺，實際上祇缺三個字。可以說《蒼頡篇》首章的全貌已經比較清楚。現在，讓我們對該章用韻、詞匯、意義等情況作一討論。

蒼頡作書，以教後嗣；（之部）

幼子承詔，謹慎敬戒。（職部）

勦力諷誦，晝夜勿置；（職部）

苟務成史，（之部）計會辯治；（之部）

超等軼羣，出尤別異。（職部）

初雖勞苦，卒必有意。（職部）

懇愿忠信，微密俊言，賞

本章基本上是兩句一韻；“苟務成史，計會辯治”，一句一韻；最

後三句祇有末句一韻。全章押之部和職部韻，陰聲與入聲通韻，一韻到底。這裏牽涉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漢初對秦代的《蒼頡篇》的更改。

按照《漢書·藝文志》的說法，秦丞相李斯作《蒼頡》七章，“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蒼頡篇》”。漢代的《蒼頡篇》計有三千三百字。從這些記載看，漢初“閭里書師”對《蒼頡篇》好像祇作了分章的工作，在文字、用韻、句法等其它各方面並沒有進行過修改。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三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蒼頡篇》第五章有“漢兼天下”（居9·1）之語，顯然是漢人更改了秦文，這是從內容上作了修改。而從第一章的用韻看，末尾三句祇有最後一句入韻，在《蒼頡篇》裏這是有代表性的，因爲每章十五句，二句一韻，總得單出一句。在“初步”一文中，我們曾說過，三句一韻在秦代的韻文中很常見；因此，漢《蒼頡篇》很可能是沿襲了秦代的格式。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因爲漢初對《蒼頡》三篇的修訂，是強行將原來的二十章按六十字一章斷開的，那麼，在恰好斷爲一章時，那裏的原文有可能並不是三句一韻的，爲了入韻，就可能加以改動。假如我們的這一推想成立的話，僅押韻這一點而言，漢初的“閭里書師”對秦本《蒼頡篇》所作的修訂就比我們原來想像的要多。從內容而言，《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蒼頡》有“稀點韓覆，叛討殘滅”；庾元威《論書》謂《蒼頡》第九章有“稀信京劉”^⑤，這些明顯的帶有漢代烙印的文字，顯然也都是漢人所改訂的。而在阜陽漢簡《蒼頡篇》中“□兼天下，海內并廟，飭端脩法，變化”等文字，在居延漢簡（居9·1）已改爲“漢兼天下，海內并廟，□□□類，蒞臨離異，戎翟給賓，但致貢□”。這些迹象表明，漢代對《蒼頡篇》的修改更動還是相當大的。

從書體而言，《漢志》說，《蒼頡》三篇“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三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中的《蒼頡篇》第五章是用成熟的漢隸（八分）書寫的，而檢視玉門花海出土的《蒼頡

篇》首章，書體卻顯得很是古樸。關於這一點，嘉文曾說過，“似習字有所依教本爲篆書，或爲具有篆意的隸書，即早期隸書”。通過對雲夢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等秦及漢初的文字資料的研究，我們對早期隸書已有較多的瞭解。我們認爲，嘉文說習字者採用的教本是篆書本，證據不足；玉門花海《蒼頡篇》的文字還是更接近早期隸書（或稱“秦隸”、“古隸”）的寫法。例如“頡”字石旁末筆是典型的隸書寫法；“書”字已寫作𠄎（缺中堅）是隸書寫法，篆書應作𠄎。又如草字頭，雖在“蒼”字中寫作艸，是篆書的寫法，而在“苟”字裏寫作卝。“治”字的水旁，寫作彡，三點水，也是隸書的寫法。還有“諷誦”、“謹”等字的言旁，也已寫作言，反映出已從篆變隸。從整體筆法上看：除開“口”旁和“以”的左旁，它們基本上已經沒有篆書圓轉的筆道，而是隸書平直、方折的筆畫。

從篇章、詞匯的意義上看，我們在《初步》一文中已指出，《蒼頡篇》的篇章與句式結構有陳述、羅列兩種類型。在陳述結構中，詞語的意義明顯地已不是本義，需要按照它在句中的意義來理解。《蒼頡篇》第一章就特別典型，全章敘述了以“勸學”爲中心思想的完整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蒼頡篇》所說的“勉力諷誦”，“苟務成史”，“初雖勞苦，卒必有意”的意思，後來也被《急就章》沿用，成了“勉力務之必有喜”。

我們在《初步》裏還說過，《蒼頡篇》常將同義、近義或反義詞編在一起，以便對詞義作對比、辨析。《蒼頡篇》首章雖是陳述式，但這一特點也還是很清楚的。如：

謹慎——謹，《說文》：“慎也”；慎，《說文》：“謹也”。

敬戒——敬，通“警”；《說文》：“戒也”；戒，《說文》：“警也”。
《詩·常武》：“既敬（警）既戒。”鄭箋：“敬之言警也。”

諷誦——諷，《說文》：“誦也”；誦，《說文》：“諷也”。《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計會——計，《說文》：“會也，算也”；會，《孟子·萬章》：“會計

當而已矣。”注：“計算也。”

辯治——辯，《說文》：“治也”；段注云：“治者，理也。俗多與辯不別，辯者，判也。”又注“从言在辛之間”云：“謂治獄也”。

超等軼羣——超、軼、皆訓“過也”。軼，《文選》李注引《三蒼》：“從後出前也。”等、羣，皆訓“輩也，類也”。羣，《說文》：“輩也”。

出尤別異——尤，《說文》：“異也”。朱駿聲《通訓定聲》謂“尤”，假借爲“異”，引《廣雅·釋言》：“尤，異也”。

慤愿——慤，《說文》：“謹也”；愿，《說文》：“謹也”。《禮記·緇衣》：“而民作愿”孔疏“愿，慤也”。

微密——微、密，皆訓“隱”、“秘”、“小”。《春秋左傳序》：“其微顯闡幽”，疏：微謂纖隱。《孟子·公孫丑》：“具體而微”，趙注：“微，小也。”《禮記·少儀》：“不窺密”，鄭注：密，“隱曲處也”。《易·中孚》：“密雲不雨”，虞注：“小也”。《列子·說符》：“人可與微言乎”，注：“微言猶密謀”。

談言——談，《說文》：“語也”；言，《禮記·哀公問》：“然後言其喪算”，鄭注：“言，語也。”《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需要特別加以討論的是“卒必有意”的“意”字。《說文》：“意志也”。放在這裏講不通。《急就篇》第一段說“勉力務之必有喜”，那麼，一種可能是“意”爲“喜”之訛，在居延漢簡中，“喜”作“熹”，與“意”形近。還有另一種可能是，“意”字並不誤。《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朱駿聲《通訓定聲》云：“謂美名也，《文選》引作懿，意、懿雙聲。”也就是說，“意”是“懿”的假借字。我們在《初步》一文中曾說過，在識字的課本裏使用通假字，說明一些漢字的形體、聲音與意義三者的關係在當時還不十分確定。我想，今後若有新的資料發現仍然還將證明這一點。

三、關於“書人名姓”

玉門花海出土的“書人名姓”簡，前面我們已校訂三簡文字，現將我們的釋文寫出，並指出押韻的情形：

曰：書人（真部）名姓，（耕部）

趙菰（魚部）韓碭，（陽部）

范戠（魚部）張豬，（魚部）

翟如（魚部）竇錢，（元部）

偉戈（歌部）馮聚，（侯部）

涇涓（元部）

這一小節用韻甚密，魚、陽是陰陽對轉，魚、侯在漢代合韻，魚、元也是合韻。上面四句，不但一句一韻，而且一句中的兩詞也是基本押韻的。另一簡可有兩種句讀法，似乎都有韻可尋：

營庄（陽部）邵選，（元部）

郇郇郇郇（耕部），

傅籛（冬部）董僕，（屋部）“贛”，一本作“功”，東部。]

李貝（月部）諒產，（元部）

這樣讀可認為押元部字韻，因為“李貝諒產”已寫在該簡最末，“產”字已經寫於下編繩之下，則本簡很像是一章的末尾。一章六十字，一簡二十字，三簡正好寫完，一章的最後三句祇一韻。在各句之中，陽、元是合韻，東、屋與月、元都是陽聲韻與入聲韻對轉通押。總之，可以看做採用了比較相近的韻字，不過，另一種讀法似乎也說得通：

營庄（陽部）

邵選郇郇（鐸部）

郇郇傅籛（冬部）（一本作“功”，東部。]

董僕李貝

諒產

陽、鐸是陽聲與入聲韻對轉，東、陽合韻。按照這兩種排列法來讀，都可以看作與“趙菰韓碭”一節是押韻的，因而，它們有可能為同一章之遺文。

爲什麼說“書人名姓”簡有可能是《蒼頡篇》一系的書呢？主要的理由是：

(1) 《急就篇》“羅列諸物名姓字”，共羅列了136個姓名，我們推想這種形式源自於《蒼頡篇》。祇是《急就篇》是七字句的編排，所以用雙字的名字，姓名合爲三字一頓，而《蒼頡篇》是四字句，所以“書人名姓”用單字的名字。

(2) 書寫敦1462簡的字體與風格同編號爲敦1459、1460、1461的《蒼頡篇》簡相近。

(3) 玉門花海簡牘時代較早，中有一支紀年簡，爲漢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寫簡字體書法皆帶時代較早的特徵，同出簡中未見《急就篇》內容，這批簡牘的採集者也認爲出簡的烽燧年代較早。我們推測這批簡牘可能爲西漢中期之前的遺物。而西漢時的四言字書，《蒼頡》之外，另有漢平帝時揚雄所作的《訓纂篇》，爲《蒼頡篇》之續篇。花海所出簡牘，時代似不可能晚至西漢末，在此之前的四言字書似乎非《蒼頡篇》其屬了。

細審“書人名姓”章，與舊出的《蒼頡篇》簡也還有一些出入，主要是用韻的特點不一樣，《蒼頡》一、五兩章皆一章一韻，一韻到底，相當齊整，而本章則顯得較亂。還有“曰書人名姓”，是五字一句，這兩支簡如真是《蒼頡篇》簡的話，怎樣解釋這個四言字書中出現的不規則的句式，或者那個冠於章首的“曰”字，不是正文，不當計入字數中？如果按照舊有的《蒼頡篇》知識模式來衡量，貿然斷定本章必是《蒼頡》，似尚欠穩妥。但是，有前述三條理由爲依據，我們將它列入屬於《蒼頡篇》這一大系統中大抵是不錯的。

在結束這一小節之前，我們想提出“趙苾”二字的另一種釋讀。

我們在前面已說過，從例簡12看，“趙”字釋爲“趙”，形體結構上有些問題，這個字的左偏旁不像从走，而像是从古，祇是下面的口裏多了一橫，在古璽裏，從古的偏旁口中都有一橫；這個字的右旁也不像是肖，而像是上爲草頭，下爲月字，如果這一分析成立的話，這個字似乎應釋爲“蒔”，但是，“蒔”的草頭又不應移在右側，而且古人並

無“蒦”姓。如果釋爲“蒦”，那麼可能是“胡”字之訛了。“蒦”字從字形與筆畫看，還可爲“蒦”。下部的“臣”，三匡裏的部份，隸書都寫成三點，而且右邊一點，通常寫作捺筆。在雲夢睡虎地秦簡和阜陽漢簡中的“蒦”字都這樣寫。本簡的這個字中右邊一捺，捺得長些而已。筆者在《校釋》中曾點出“趙蒦”可能與趙高有關，如讀爲“胡蒦”，便與胡毋敬相關了。這裏僅提供另一種釋讀的可能性，聊備一說而已。

四、關於“焦黨陶聖”章

《敦煌漢簡·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將該牘列爲《蒼頡篇》（見簡裝本319頁，精裝本同），理由未見陳述。我們認爲需要作深入討論。先將校正後的該章釋文及用韻情況寫出，上下左右完全不協韻的字，用單字寫出韻部，以便於比較：

焦黨（陽部）陶聖，（耕部）

陳穀（屋部）魏嬰，（耕部）

程頡（文部）楊平，（耕部）（平，又音便，真部）

梁賢（真部）尹寬，（元部）

榮雍（東部）尚鑪，（元部）

岑摩（蒸部）露審，（元部）

彭續（錫部）秦參，（侵）

涉競（蒸部）羸連，（元部）

樂恢（之部）樹庚，（陽部）

唐美（脂部）耿聾，（元部）

段沓（緝）啓選，（元部）

黃文（文部）戡山，（元部）

肥報（鐸）桃脩，（幽）

賈蘭（元部）鄧難，（元部）

李偃（元部）田研，（元部）

全章十五句，六十字，這正好是《蒼頡篇》一章的字數，“馬圈灣發掘報告”說它是《蒼頡篇》，想來即是以此爲根據的。另外，玉門花海漢簡“書人名姓”章有可能是《蒼頡篇》的話，則本章體例、結構

相近，認定本章爲《蒼頡篇》內容，確實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本章的用韻的情形與《蒼頡篇》第一、五兩章不同。一、五兩章都是一章一韻，一韻到底，而本章前三句押耕部韻，以後則押元部韻。在上古音中，耕部字同元部字是不合韻的，所以本章成爲一章二韻，前後不一。另外，本章還有用韻甚密的特點，幾乎一句一韻，句句入韻，甚至有些句子一句中的兩個名字也押韻，或者通押相近的韻，如耕陽兩部，文、元兩部，耕文兩部，真、文兩部，兩句中的前面兩個名字也有相近的韻，如蒸、東兩部，之、脂兩部，這也與一、五兩章中所見的情形不一樣。但與“書人名姓”章似乎有些相近。另外，我們在阜陽漢簡《蒼頡篇》裏也見到過類似的用韻。《初步》一文已指出《蒼頡篇》有一句一韻之例，如：

爰歷次馳，(魚)繼續前圖，(魚)輔塵顛阻，(魚)駮儋闕屠，(魚)
又如：

引汲斟，(魚)猝遇弗虞，(魚)賁默一虞，(魚)

《初步》一文也指出了有些不入韻的句子，有時用韻部相近的字，很像是“交韻”。“焦黨陶聖”章也有這種情形。

從現有材料來分析，確認本章一定是秦與漢初的《蒼頡篇》，尚有些問題。主要是：(1) 馬圈灣漢簡爲西漢中期以後至王莽末期遺物，紀年簡最晚者爲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這支“地皇三年”簡與“焦黨陶聖”簡同出於探方七，該探方出土的簡似以王莽簡居多。《漢志》云：“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漢平帝“元始”年號共五年，若以“元始中”爲公元3年的話，至王莽地皇三年已有十幾二十年之久了，《訓纂篇》早該流行起來了。就是說，馬圈灣漢簡中有可能包含有晚於《蒼頡篇》的四言字書。(2) 從本章用韻看，有若干顯示時代較晚的迹像。一處是開頭三句押耕部韻的“聖”、“嬰”、“平”三個字。中古時，聖、嬰入清韻，擬音作*iɛŋ*，同元部字發展而來仙韻比較接近。至於“平”字，上古時或讀爲“便”音(真部)，中古就讀入仙韻(擬音*iɛn*)。另一處是

“彭績秦參”的“參”，上古音是個侵部字，與上下句的元部字不押韻（此處可不入韻）；但“參”字音後來有了變化，成為談韻字，擬音作 am ，這就與元韻比較接近，元韻的擬音作 an ，元音相同，韻尾發音部位不同。又如“梁賢尹寬”“賢”是真部字，“寬”是元部字，真、元在楚辭中也合韻（《湘君》），但在中古時“賢”讀入先韻，則與元韻音更近。

當然，秦王朝存在的時間很短，我們還不能區別秦、漢兩代語音的差異，這裏僅僅從上古音到中古音發展的大趨勢來討論時間的先後早晚特徵，不能以此判定本章的絕對年代。既然存在着這些問題，我們認為比較穩妥的辦法是，同“書人名姓”一樣，暫將“焦黨陶聖”章歸入《蒼頡篇》的大系統中，總是不错的。

五、若干可能是《蒼頡篇》的資料的辨析

前文中我們還列舉校釋了若干可能是《蒼頡篇》簡的資料，它們是：

5. 族姓嫂妹親戚弟□□病悲□□哭死□遣□心所□□

（居新 T 56·181）

18. □謝須□

（敦 1484）

19. □邳泉□□

（敦 1485）

20. □□□□□繇杜屏赤龐豐貌▲柳喜滿丹祿錢喬連晉

□□□□□□□

九

（敦 562A·B）

21. □寬忍愚，小人細

（敦 661）

22. 昆弟賓昏善相聞鄰里對門與親友坐雖不樂好相樂（敦 845）

現在我們分別討論上列各簡究竟是否《蒼頡篇》的內容。

例簡 5 可有兩種斷句法，其一是：

族姓，嫂妹親戚，弟□□病，悲□□哭，死□遣□，心所□□

按這種斷句法，“姓”，是耕部字；“病”，是陽部字；耕、陽旁轉合韻。另外，“戚”，是覺部字；“哭”，是屋部字；覺、屋兩部也可旁轉合韻。另一種句讀法是：

族姓嫂妹，親戚弟₁，₂病悲₃，₄哭死₅，₆遺₇心所₈，₉……
這樣點，第二句以下各句，末尾的韻字皆闕，無從考察押韻情形，但“₁病悲₃”，“₄哭死₅”相連屬，意義接續似乎更順暢。出土該簡的探方56，同出簡牘時代較早，多為西漢中期遺物，從該簡文字體例而言，很像是《蒼頡篇》的內容；但該簡現祇見釋文，未見圖版，而書寫格式與字體是我們辨識字書《蒼頡篇》的重要根據，總之，證據還不够充分，所以現在還不能下斷語。

例簡18、19皆為柿片，是從習字的木觚上削下來的，大約與“書人名姓”簡有關，書風與筆法也相近。“郅泉”之“泉”，為元部字，與“書人名姓”一節可合韻；“焦黨陶聖”章也可合韻。

例簡20很像是《蒼頡篇》。它四言一句，“柳喜滿丹”前有墨色三角標記，明是一章端首，“丹”，“連”，都是元部字，又可押韻。但是，尚有兩點疑問。一是該簡書寫格式體例與以前所見《蒼頡篇》簡不同。過去的研究者已指出，《蒼頡篇》六十字一章，一簡二十字，恰好三簡寫一章。此簡則連貫而下，“柳喜滿丹”是章首，卻也並不另起一簡。簡背有“九”字，說明是一卷之第九簡，按一簡約三十字計算，前面應已有四章，“柳喜滿丹”是第五章，據舊出居延漢簡三棱觚9.1章首標明“第五”，內容是“牋表書掾”，該章文字已經得到阜陽漢簡的印證，可見，“柳喜滿丹”的第五章，不可能再是《蒼頡篇》。二是“祿錢”一語，說明該簡時代較晚，秦及漢初，官吏俸祿都都不發錢，發錢至少在西漢中期以後。在居延漢簡中，有紀年的給邊吏發放“俸錢”的簡，就都在武帝之後（含武帝）。而在文獻中，《後漢書·百官志》裏纔有“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的記載。所以在秦與漢初的《蒼頡篇》中不應出現“祿錢”之語。

儘管如此，例簡20仍然可以歸入《蒼頡篇》的大系統中，即漢代人倣照《蒼頡篇》的體例、形式、用韻等特點，而採用更切近漢代時代風貌的語音、詞匯、思想內容，編寫出來的字書。祇是我們目前無法判斷它們究竟是民間自編的字書，還是《漢志》所說的揚雄等所續之書。

例簡22也是《馬圈灣發掘報告》中指為《蒼頡篇》的簡，但是。

如果按四言一句來點斷的話，該簡是無法句讀的，如按下邊句式强行讀斷，？處應有缺字：

昆弟賓昏，？善相聞，鄰里對門，與親友坐，雖不樂好，相樂？？
這裏的“昏”、“聞”、“門”倒都是文部字，可押韻，但字數不對，參差不齊，該簡“相樂”以下就都是白簡了。所以應當是一個篇章的結束。反復斟酌，該簡似乎祇能按七言句讀，即：

昆弟賓昏善相聞，鄰里對門與親友，坐雖不樂好相樂

“昏”指婚姻，即婦、婿之家。“坐雖不樂”之“樂”，似應讀爲yuè，演奏音樂；“好相樂”之“樂”，讀爲lè，快樂，意謂相坐時雖無音樂，但因和睦友愛而其樂融融。這種七言句，使人想到居延新簡中也有一支簡，形式與內容同例22簡頗有相近之處：

□□呼之行垂眼，時怒時喜半趨走；丈人怒之大訶□，□辯物器拙諸戶，分之魚肉怒不取。

八

（居新EPT 65.42 A、B）

走和取，都是侯部字，戶，是魚部字。這已經像是民間文學的詩句了。而且，此爲第八簡，按每簡與此簡字數相同，即一簡28字計算，該篇至此已有224字。綜上所述，則例簡22不大可能是《蒼頡篇》殘簡，“發掘報告”之說是錯誤的。

例簡21與例22很相像，因爲殘字寥寥，我們無法判斷它究竟是四言，還是七言。它似乎可以從“愚”處讀斷，很像是七言的句式，真是那樣的話，它也不應是《蒼頡篇》簡。

下面，我們還要討論一條特別的材料：

23. 遽學成史，從姓字始。

（居新EPS 4.T1.5）

這也是一條“四字一句，有韻可尋”的簡文，這又是什麼“篇”裏的文字呢？我們認爲，這不是字書裏的語句，而可能是習字者根據已有的字書編造出來的。很清楚，“遽學成史”，是從“苟務成史”一句脫出的；“從姓字始”，是從“羅列諸物名姓字”一句脫出的。這種按照自己的意思對現成的字書加以改寫，以前已見過若干例子。如望都壁畫墓券頂有題文曰“作事甚快與眾異”，漢鏡銘文有“巧是明鏡成快意”

等，陳直先生曾指出，這是模倣《急就篇》句法^①。

六、小結

本文考察了自阜陽漢簡《蒼頡篇》資料與研究發表後公佈的有關新材料，我們着重討論了《蒼頡篇》首章，甄別了許多可能屬於《蒼頡篇》系統的遺簡，也否決了一些被誤認為是《蒼頡篇》的資料。由於居延新簡的圖版本尚未面世，我們的工作受到了一些局限，有些材料被放棄了，我想，不久還可以再來一次拾遺補闕。

通過對有關新資料的研究，我們加深了對《蒼頡篇》的瞭解。現在我們推想《蒼頡篇》可能與《急就篇》一樣，有一個“書人名姓”的內容。準確地說，應當是《急就篇》倣效了《蒼頡篇》羅列名姓的編輯形式。聯想到兩“篇”首章文字的相似處，我們有理由進而推測，《急就篇》倣效《蒼頡篇》的地方可能還不光是這一些。大概在編排方式和押韻等方面，兩“篇”也會有相似之處的。我們知道，《急就篇》的編排，雖是以七字一句為主，但是三十一章“漢地廣大”以下便是四字句；羅列姓名時，是三字一句。那麼，《蒼頡篇》會不會以四字句為主，也兼有其他句式呢？《急就篇》的押韻，多為一章一韻，但是也有一章兩韻的情形，那麼，《蒼頡篇》會不會也有這樣的情形呢？現在看來，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羅振玉將秦漢字書劃分為“四字句”與“七字句”兩大系統，這種劃分大體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具體到每一種書，似乎不能說“四字句”系統的書就絕對沒有四字之外的其他句式；“七字句”系統的書，就絕對沒有七字之外的其他句式。對各種字書分章、用韻的研究，也需要開拓思路，不能囿於舊格局。可以說，今後我們在甄別出土資料時，面臨着更複雜的形勢，但也正是這樣的反復與否定，不斷地深化了我們的認識。

注釋

①《文物》，1983年2期。

②《居延新簡——甲渠侯官簡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

- ③ 《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④ 《考古與文物》，1986年6期。
- ⑤ 王力《漢語史稿》，81頁，（新一版）中華書局，1980年。
- ⑥ 同上，78頁。
- ⑦ 《古璽文編》、《古璽匯編》，羅福頤主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 ⑧ 《法書要錄》，卷二，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
- ⑨ 陳直《居延漢簡研究》，147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本文排好後，讀到了日本埼玉大學初山明教授賜寄的福田哲之論文《敦煌漢簡所見小學書殘簡》，有些看法與拙見不同，容另文再加討論。）

出土簡牘與漢晉敦煌

李均明 劉 軍（中國文物研究所）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北魏至北宋間的兩萬多卷古寫本和一些刻本，吸引眾多學人研究，“敦煌學”遂逐步形成，至今延續近一個世紀，碩果纍纍。此外，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烽隧遺址中發掘出近千枚簡牘，無疑對敦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它沒有被納入“敦煌學”的範疇。197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馬圈灣等遺址發掘出一千餘枚漢簡。而後，1990年至1992年間，他們又在敦煌與安西縣之間的甜水井懸泉置遺址發掘出二萬餘枚漢簡，這是本世紀以來中國境內同一遺址中出土簡牘數量最多的一批。上述簡牘加上甘肅其它地區及新疆羅布淖爾、樓蘭尼雅遺址出土的簡牘，總數逾五萬，無疑可以從多角度展現漢晉時期敦煌乃至河西及西域歷史的真實面貌。因此，如果把出土簡牘也做為敦煌史料的一部份，“敦煌學”的上限可以延伸到漢代。以下，筆者試結合文獻及簡牘所見，對漢晉敦煌的一些課題談談我們粗淺的認識，不當之處，請指正。

一、地理和人口

敦煌曾經是古代中西交通路綫上的一顆明珠，它的形成除了下文將要陳述的經濟、政治的原因之外，還有地理位置、環境條件和人口的因素。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重要組成部份，是它的西出口。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西至敦煌，東西長一千多公里，南北寬數公里到二百公里。走廊的北面是北山及蒙古荒漠，南面是高入雲端的祁連山脈，走廊本身卻地勢平坦，猶如一條夾在蒙古高原與青藏高原之間的峽谷，形成

一條自然通道，敦煌也因此成為東西交通的必經之地。

敦煌一帶的年降水量僅數十毫米，異常乾旱，但走廊南面的祁連山脈年降水量達100至500毫米^①，許多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區，終年積雪，形成大面積冰川，是一座巨大的冰山水庫，溶化的雪水匯集成大大小小的河流泄向走廊中央，滋潤山坡草場，灌溉綠州農田。另外的大部份雪水滲入戈壁中，形成潛流，在地勢低窪處涌出，如《漢書·地理志》所載敦煌淵泉縣，便以地多泉水而得名。當時流入敦煌境內的河流有氐置水（今黨河）、籍端水和冥水（今疏勒河），在河的下游匯集成湖泊如冥澤等。和兩側較惡劣的環境相比，敦煌便是適宜人類生存的寶地。

敦煌再西就是《漢書·西域傳》所謂之白龍堆沙，《新唐書》稱之為莫賀延磧，今天叫做庫姆塔格沙漠。東來西往的使者、客商乃至軍旅，都以敦煌為中繼站。西去的在這裏配足糧草、飲用水、馬匹、駱駝，然後纔能跨越大漠；東來的經長途跋涉，精疲力竭，無力再前進，就非在這裏休息不可。由於大量的人員物資都經過這裏吞吐，敦煌便名副其實地成為扼中西交通的咽喉。

敦煌的發展過程，還有賴於一定的人口數量和質量。關於敦煌的人口，史籍有明確記載始於西漢，據《漢書·地理志》，西漢的敦煌郡有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敦煌、冥安、效穀、淵泉、廣至、龍勒，它的地域包括今天的敦煌市、安西縣、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及阿塞哈薩克族自治縣的一部份。《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的敦煌郡，有戶七千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屬縣與西漢同。三國曹魏時期敦煌郡屬縣，除上述兩漢原有六縣之外，又增設宜禾一縣，但人口祇有一萬多人。《晉書·地理志》載，西晉時敦煌郡有戶六千七百，屬縣十二：昌蒲、敦煌、龍勒、陽關、效穀、廣至、宜禾、宜安、深泉、伊吾、新鄉、乾齊，面積雖然比兩漢大，戶口、人口都減少了，人口估計不到二萬五千人。據勞幹先生推算，西漢時敦煌郡的面積約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祇有0.3人。

上述是對敦煌人口的傳統觀察方法。所見人口數據僅僅是有戶籍在敦煌注冊的常住人口。此外，還有一羣富有活力的流動與半流動人口，他們的戶籍雖然不在敦煌，但對敦煌的開發曾起過積極的作用，況且在西漢時他們的數量幾乎與常住人口一樣多，應視為敦煌人口因素的重要部份，而不應排除在外。

所謂半流動人口，主要是指在敦煌居住一至二年的戍卒、田卒、騎士等，他們甚至比敦煌的一些常住人口還更早地到達敦煌，是開發敦煌的先鋒。以下試考察一組簡牘所見戍卒與騎士名籍：

戍卒何池下黃里李東，年二十三	上	《敦》256②
戍卒何池耶里緣詡，年二十泰	上	《敦》258
戍卒何池河池里王育，年二十泰	上	《敦》1008
〔戍卒〕故道市陽里楊崔，年三十三	上	《敦》268
戍卒故道故道里上官宏，年二十五	上	《敦》269
戍卒河南郡雒陽安里公土郭匡		《敦》1555
戍卒河東郡汾陰高汜里張賢		《敦》636
戍卒河東郡皮氏長子里趙樂世		《敦》1663
戍卒上黨郡屯留陽石里公乘趙柱，年廿四……		《敦》2077
戍卒潁川郡陽翟邑步利里公乘成遣，年卅六		《敦》2051
戍卒脩成富利里楊馮，年三十		《敦》1010
戍卒循成泉里索歆，年三十 能為泉履		《敦》270
騎士北口公，潁川郡鄆陵邑廣口里口口口		《敦》2111
騎士屋蘭大昌里夏侯鳳		《敦》2112

簡牘所見此類名籍數量較多，以上僅舉例。這些戍卒和騎士在敦煌服役，他們的戶籍在外地，如武都郡何池（即河池，位於今甘肅徽縣北）、故道（位於今陝西省寶雞市南）、河南郡雒陽（位於今河南省洛陽）、河東郡汾陰（位於今山西萬榮西）、皮氏（位於今山西稷山西）、上黨郡屯留（位於今山西長治市）、潁川郡陽翟（位於今河南禹縣）等，與《敦》1314簡所見“各郡遣卒敦煌”的記載合。上述地點距離敦煌郡都比較遠，地理分佈廣，大多屬中原地區，中原的先進文化也由這

些戍卒帶到了敦煌。據劉光華先生的研究，漢武帝時期河西大約有戍田卒二十萬人以上^③。敦煌郡是河西四郡中部都尉最多的，計有玉門、陽關、中部、宜禾四個都尉，按每個都尉七千人計，則敦煌戍田卒的人數近三萬人。簡牘所見有關屯戍活動的情況，也從某些局部反映戍田卒的數量，如《敦》276：“出戍卒卅人終更罷，二月戊寅盡三月丙子五十九日積二千三百六十人。”這僅僅是某個屯戍單位的戍卒服役期滿後復員的統計，一月之間總數即達二千三百六十人。又《敦》1780：“制詔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芟酒泉郡，其假口如品，司馬以下與將卒長吏將屯要害處，屬太守察地刑（形）依阻險，堅壁壘，遠候望，毋……”某一次從敦煌派到酒泉郡砍伐芟草的戍卒就達二千人。這僅是敦煌戍卒的小部份，其大部當在駐地堅守。

除了駐守的戍田卒，敦煌曾有大規模的臨時駐軍，如甘露元年漢破羌將軍辛武賢曾率領一萬五千人屯駐敦煌，並在那裏通渠積穀。既能從事農業生產，駐守時間至少也在半年以上，這些人也構成敦煌的半流動人口。^④

東漢以降，敦煌郡戍田卒雖不及西漢時期水平，人數仍不少，如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長史索班赴西域勸降，一次就動用了一千餘人，留守敦煌者當也不少。^⑤

除軍事人員外，敦煌的半流動人口還包括一些商人和人質。正如日本學者榎一雄先生所說：“多數西域商人由西域進入中國門戶敦煌時，滯留了相當長的時間。”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漢烽隧遺址中獲得六封粟特書信，其中一封談及洛陽被焚，天子出亡，匈奴入據事，書寫年代當在東漢末或距此不太長的時間，他們在敦煌滯留的時間當不短，東漢時期西域諸國派往漢朝的質子，大多也在敦煌居住。

上文已云，敦煌戍田卒的人數近三萬，但計算半流動人口時要排除從當地服役的戍田卒，這些戍田卒如：

富昌卒敦煌擅胡里張咸

《敦》267

戍卒龍勒壽里王鳳，年卅五□

《敦》818

因為他們的戶籍在當地，所以應屬於常住人口，但簡牘所見這類

戍卒出現的頻率比外籍戍卒少的多，況且常住人口中服役人員的比例不會太大，所以他們對半流動人口總數的影響不大。對總數的統計影響較大的是屯戍組織中的隧長等低級官吏，因為他們中的多數是當地人，如：

隧長效穀間田常利里上牛康，年三十五口 《敦》25

玉門却適候史敦煌如昌里公乘魏護，年卅一 《敦》244

廣昌候史敦煌富貴里孫毋憂…… 《敦》1757

通常計算戍田卒數量時，包含了率領他們的官吏，所以要考慮這一因素。據居延漢簡所見，低級官吏約佔官吏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又據居延甲渠候官的情形考察，官吏與士卒的比例約為一比五。^⑥綜合上述因素，則戍田卒中的半流動人口亦逾二萬，如再加上商人等，總數近三萬，當然這是西漢高峰期的數量。

敦煌的半流動人口，主要由戍田卒構成，有嚴密的組織，適宜進行較大規模的農、牧業生產及軍事行動。因此，他們是敦煌人口中的積極因素。

流動人口主要是過境人流，包括內外使節、軍隊、商人等，史籍載“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以至“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⑦他們對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

二、開發與繁榮

敦煌是包括漢族在內的敦煌、氐、羌、月氏、烏孫、匈奴等許多民族共同開發的。敦煌這個地名便來源於一個少數民族的稱謂，據說這個民族就是後來的吐火羅。他們最晚在戰國時期就住在今天新疆東南的焉耆至羅布泊一帶，史籍稱敦薨。後來，由於塞人東遷等原因，敦薨人東遷進入河西走廊西部，史籍稱敦煌。再後，由於月氏和匈奴向西擴張，敦煌人西遷到蔥嶺以西，東漢時重新建立國家，稱兜勒，又稱吐火羅。另有一些敦煌人分散到各地，其中一支仍留在敦煌西南，稱“去胡來”。^⑧

塞種人東遷時，也曾“世居敦煌”，月氏強大後，纔西遷葱嶺。^⑧

曾居敦煌的還有烏孫、月氏、氏、羌及匈奴。先是月氏強大，擁有東達今寧夏賀蘭山、西至敦煌西的廣大地區，當時連匈奴頭曼單于都把自己的太子冒頓送到月氏當人質，以示友好。原來居住在河西的烏孫，在月氏的壓迫下，大部份逃往匈奴。漢初，匈奴在冒頓單于的領導下，逐漸強大，遂向月氏進攻，迫其退出河西並遷至伊犁河上游。另有一小部份月氏人退保南山，史稱“小月氏”。匈奴入居後，河西走廊便成為他們重要的畜牧業和手工業基地，以至他們失去河西走廊後乃以頌歌方式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秀色。”上述兄弟民族，對敦煌的開發無疑曾起過積極作用。

關於敦煌名稱的解釋，還有一個傳統的說法，《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條引應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志》時進一步解釋說：“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這種解釋在漢武帝以後一直被史家引用，不能不說和漢武帝對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四郡的開發有關，它是現實發展的反映。

西漢初年，中原王朝相當衰弱，漢高祖劉邦採用恭敬的和親建議向匈奴退讓。這時的匈奴便佔有了包括東至遼河流域，北達貝加爾湖，南括河套，西及葱嶺的廣大地區，成為中國北方的強大部落聯盟國家，對西漢帝國構成嚴重威脅。後來，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到漢武帝時，國力已經大大加強，於是開始了反擊匈奴的戰爭。主要的戰役有河南之戰、河西之戰和漠北之戰。其中元狩二年春夏二次出擊河西，原佔據河西走廊的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投降，中原朝廷便從此開始對河西走廊的全面控制。為了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繼軍事佔領之後，漢武帝在河西設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隔絕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絡，《敦》2438簡見“酒泉玉門都尉護衆”，可證最初敦煌歸屬於酒泉郡，至遲在太初元年纔從酒泉郡劃分出敦煌郡。

漢武帝在河西設郡後的數十年間，是敦煌的大發展時期。她的初期開發是採用軍屯和移民並舉的方式進行的。元封、太初年間（公元前104年左右），漢築邊塞鄯隴西至敦煌，為解決軍隊供養，屯田隨

之進行，《史記·平準書》載：“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戍田之。”《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效穀縣”顏師古注：“本漁澤鄯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爲漁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表明敦煌效穀縣是在魚澤鄯發展屯田的基礎上設立的。據徐樂堯等先生的考察，當時敦煌屯田主要在三個地方進行：一在今敦煌市榆樹泉盆地東部，當時屬玉門都尉大煎都候官轄區，這裏分佈有馬迷兔、吐火洛、天橋、灣窰等四個小型盆地，地勢平坦，水源充足。二在今敦煌、安西交界處的西水溝、東水溝和安西縣的蘆水溝下游綠洲上，當時屬宜禾都尉之宜禾、魚澤候官轄區。三在今敦煌南湖陽關遺址一帶，當時屬陽關都尉所轄渥洼水西岸地區。渥洼水係由阿爾金山雪水溢出的大泉、鄂博圖等泉水匯集而成的湖泊，湖泊周圍是適宜農耕的肥沃綠洲，這一帶曾發現了漢代田壟、房基、墓葬及各種器物。^⑨

和軍屯並舉的是大量移民，近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簡牘中即見《徙民屯田詔》。《漢書·武帝紀》載：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據谷苞先生研究，河西四郡共有移民七萬一千二百七十戶、口二十八萬二百二十一人。^⑩《後漢書·明帝紀》：“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這些移民都來自內地，如《漢書·地理志》所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諄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因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移民成份多罪犯和下貧，《敦》1118亦見“送囚效穀”。當然，這些人之中不乏有相當資歷的人物，如《漢書·孫寶傳》載：“哀帝即位，徵寶爲諫大夫……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鄯候。”又《薛宣傳》載：“宣子況爲右曹侍……

減罪一等，徙敦煌。”他們的後代，有些人也成為名人，孫修身先生說：“在古代，許多人因遭遣謫、做官、避亂、經商、傳教等原因，來到敦煌而成敦煌人。這些人從內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很多人及其後代成為大官、名人，使敦煌成為人物薈萃的中心。”文中李先生考證出敦煌莫高窟所見的李姓，是李陵、李穆的後代，可備一說。正是如上所見的各種層次的人員構成的、寬鬆的移民社會，加速了敦煌的發展。

敦煌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農業、畜牧業及貿易方面。

敦煌的農業是實行屯田和移民之後纔有較大的發展。由於當地降水量稀少，農耕需通渠灌溉，《史記·河渠書》：“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祇有通過屯田進行較大規模的開發，纔有能力開鑿較大的水渠等水利設施，《合校》303.15, 513.17 見“戍田卒千五百人爲驛馬田官寫湮渠。”①一次就動用一千五百人。又《合校》140.15：“河渠卒河東皮氏毋憂里公乘杜建，年廿五”表明平時設有專職水利的人員。上述二例所云雖爲張掖的情形，由於地理環境相類，敦煌亦當如此。破羌將軍辛武賢曾率領一萬五千官兵在敦煌以西“通渠積穀”也說明了“通渠”方能“積穀”。魚澤尉崔不意教力田而載入史冊，表明敦煌農業的初期發展得益於軍屯。這類官方對農業生產的指導一直延續到魏晉以後，比較有名如《三國志·魏志·倉慈傳》：“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趙）基爲太守。初，敦煌不甚曉田，常灌溉瀆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耨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甚所有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改變了原來不用耨犁和大水漫灌的落後狀態，使敦煌農業更上一層，迅速趕上中原水平。敦煌農業產品中有享譽古今的瓜果，《漢書·地理志》敦煌縣注：“敦煌，中部都尉治步廣候官，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這種說法毫無誇張，敦煌出土漢簡《敦》9 載“私王瓜一枚重卅斤”即明證。今日敦煌瓜果，依然香甜可口。西漢中晚期，中亞的許多植物

品種傳入敦煌，屬於新莽時期的《敦》239簡已見“耳宿”等，近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植物品種含大蒜、苜蓿、桃核等，大大豐富了敦煌農業的內涵。

敦煌的畜牧業具有傳統的優勢，《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三稱河西“水草豐饒，以屯牧爲宜。”《魏書·食貨志》稱北魏佔有河西時，“以河西草善，乃以爲牧地，畜產蕃息，馬至二百餘萬，駱駝半之，牛羊則無數。”至唐代已是“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月氏、烏孫、匈奴爲敦煌的畜牧業做過貢獻，培養出優良品種。《資治通鑑·漢紀》：“（元狩三年）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於是便有《天馬歌》之產生（見《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漢人見敦煌馬而奇之，上聞朝廷，說明敦煌的畜牧業在漢武以前已相當發達，所謂神馬，無疑是匈奴等民族的遺產。漢武之後，重視馬政，畜牧業繼續發展，《敦》80簡所見一次從敦煌借調雜馬達三千匹。亦常見傳馬、驛馬、候馬等多種用途的馬。設有馬廐及管理人員，如《敦》2082：“付主養守司馬丞平、冥安廐佐光。”相馬知識普及，《敦》843：“·伯樂相馬，自有刑齒十四、五當下平。”爲《相馬經》片斷，是當時常用的典籍。簡牘中尚見大批牛、羊、驢的記載，如《敦》618：“萬共校其一羣千一百頭……”每羣數達千餘；《敦》962：“羊二千餘頭、馬數十匹”、《敦》981：“驢五百匹。”《敦》1168：“不移轉牛凡三百廿九枚，見二百枚不付。”轉牛，是轉輸所用拉車的牛。上述事例，足以說明敦煌畜牧繼續發展的勢頭。

敦煌是貿易通道，包括絲綢在內的紡織品交易聞名遐邇，形式多樣。

大批量的交易以中外客商和官府爲主要媒體。客商又往往是隨着使團或者自身即是使臣來往，例如屬賓“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漢廷派往西域的使節，也是“多貪人子，私縣官

賚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東漢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率龜茲等八國兵攻破焉耆，其中有漢吏士商賈一千四百餘人。”官府則多以饋贈的方式進行“絲綢外交”，例如漢代初年，中原王朝無力反擊匈奴的騷擾，即以大量的絲綢酒食相饋贈，換取邊境的相對安寧。漢武帝反擊匈奴的過程中，派張騫兩次出訪西域，每次也攜帶大量的布帛金錢前往。東漢初年，絲路中斷，在東漢王朝再次開通西域的過程中，也以絲綢開路，如《後漢書·梁慄傳》載：竇憲派梁慄，“先齎金帛使北單于”籠絡北匈奴，全力對付南匈奴。班超通西域，賜烏孫大小昆彌錦帛，又派使者多齎錦帛遺月氏王。對前來朝拜的諸國，亦多賞賜，如漢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龜茲來朝，賞賜綺、繡、雜繒等凡數千萬。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小批量但廣泛的交易簡牘中有些記載，《敦》1383：“出牛車轉絹如牒，毋失期……”可惜用途不明。《敦》1407：“賣絳七百廿七匹”則明確用以銷售。絳是素面絲織，《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絳，無文綺也。”《說文》：“綺，文繒也。”敦煌是轉口站，其絲綢來自內地，《敦》1790：“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即證。亢父在今山東濟寧市南。成千上萬的內地成卒戍邊，多攜帶布帛在出賣，如《敦》838：“當欲隧卒賓德成賣布一匹，直錢三百五十……察適隧卒王未央賣絳一匹三百七十……勇敢卒孤賣練一匹，賣錢四百九十，又布錢百卅四，凡直六百廿四……”也有出賣成衣者，如《敦》1708：“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廣漢縣廿鄭里男子節寬惠賣布袍一陵胡隧長張仲孫所，賣錢千三百，約至正月（畢己），任者口口口……”民間的這種小批量但極普遍的交易形式，無疑是絲綢輸出的重要途徑之一。敦煌絲綢的庫存量應甚多，以致常用絲綢支付俸祿或者充當貨幣，如《敦》2024：“廣新隧長張淵奉縑三丈二尺。”魏晉時在樓蘭亦使用敦煌絲綢，如《樓》291：“出敦煌短綾絲十匹給吏宋政耀，泰始五年十一月五日從掾位馬厲、主者王貞、從掾位趙辨付從史位宋政、功曹闕。”^④也充當貨幣，故商品多以

絲標價，如《樓》553：“故黃旗褶一領，賈絲三匹。”這些充當貨幣的絲綢，當然能順利地流向西方。

三、政治和軍事

敦煌是中原王朝控制西域的政治、軍事中心。

河西四郡中，敦煌是設立都尉最多的一個，用以守御富足有餘，如此重兵把守，因為它是戰略要地。從一開始，它便是漢伐大宛的軍隊調整、出發、後援基地。據《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武帝紀》和《漢書·李廣利傳》的記載，太初元年，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次年失利，還至敦煌，漢使使遮玉門，貳師恐，因留敦煌。太初三年，增發邊騎及赦囚徒、輜重至敦煌，於是李廣利起敦煌西，再發大宛。次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前後歷時四年。而後“有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⑤建立了可靠的交通聯絡路線，確立了敦煌的戰略要地地位。從此，凡西域有事，常派兵從敦煌出征，例如：

《漢書·陳湯傳》：漢成帝即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

《後漢書·明帝紀》：“漢明帝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初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後漢書·梁慄列傳》：慄“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慄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慄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慄未至而已得解。”

《後漢書·西域傳》：（自永初元年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又“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

煌，復郡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

《後漢書·班勇傳》：漢安帝延光四年秋，‘(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單就，大破之。’

《後漢書·西域傳》：漢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

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東返，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罷西域都護，保留西域副校尉，從元初七年起副校尉常駐敦煌。此後，對西域的重要政治軍事行動多由敦煌太守主持。魏明帝太和中（公元227—232年），敦煌太守倉慈為西域諸國人頒發去洛陽的通行證，和西域保持密切關係，以至後來，“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史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造共祠之。”^④當然，漢簡所見早在西漢時，西域人士貢獻中原的物品已由敦煌官員驗關放行，如《敦》1906封檢署文“降歸義烏孫女子復蓐獻驢一匹，騊，牡，兩法，齒口歲，封頸以敦煌王都尉章。”

敦煌作為控制西域的政治中心，還體現在敦煌太守對朝廷決策的影響及西域諸國質子多居敦煌等問題上。

前者如《漢書·陳湯傳》：陳湯討伐匈奴郅支單于有功，後因罪免為庶人，詔徙湯敦煌郡，“久之，敦煌太守奏‘湯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又《後漢書·西域傳》：建武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太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這兩次，敦煌太守都改變了皇帝的決定。

後者如《後漢書·西域傳》：建武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

綜言之，西漢時期多直接由朝廷派遣強大兵力威攝西域，而東漢以降則多由敦煌等河西精兵羈縻之。

作為控制西域的基地，漢廷在包括敦煌在內的河西四郡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後勤體系，儲備大量的武器和糧草。

後勤設施中最主要的是倉庫。當時的倉與庫有區別：倉主要存放糧食，而庫則存放兵器、財物。倉設倉長，如《敦》1313：“倉長口壽行丞事”。庫亦設官，如《敦》1884：“庫守宰尹千人忠”，此為新莽簡，宰秩與倉長相當。敦煌郡最大的糧倉，漢代稱“郡倉”，許多糧食從此倉調撥，如：

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粟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居攝三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昌候史尹欽、隊長張博受就人敦煌高昌里滑護，字君房。

《敦》282

入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麥小石卅七石五斗，居攝三年三月戊辰大煎都士吏牛黨、候史尹欽受就人效穀益壽里鄧尊。

《敦》284

同上的記載又見《敦》283、286、1234等。郡倉之外，當有分散在各處，尤其交通要道處的倉庫，最典型的如斯坦因標號T18烽隧正北的大方盤倉儲遺址。此遺址位於敦煌至玉門關的大道旁，西南距小方盤城20公里，東南距敦煌市80公里。倉儲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132米，南北寬15米，有些地方牆垣仍高達7.6米。中隔為三個大廳，各廳南北牆上都有兩排對稱的三角形通風孔。倉外有兩重圍牆，四角築有角樓。此處曾出土四十多枚漢簡。^⑤據《敦》418：“……輩一萬五千，黍餘三斛直千，日轉四千，期至……”《敦》555：“……

…二百直廿二萬二千三百，慶二千萬，用就百七十七兩大半兩，兩七千，予”《敦》1866：“布單卷百五十二枚，車十九兩。”轉輸的數量相當大。而且不僅輸往屯戍諸部，也輸往塞外，如《敦》682：“轉穀輸塞外”。轉輸的糧食除日常口糧，還包括軍用乾糧，如《敦》802：“車三兩，載米糲百五石。”晉武帝泰始年間令狐豐佔據敦煌時，曾建造河倉城，倉容甚大。^⑥

敦煌設有兵器庫，《敦》80：“假敦德庫兵奴（弩）矢五萬”，一次就借出五萬支箭，其規模相當不小。

四、遺址和簡牘

敦煌一帶殘留下許多漢晉遺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塞牆、鄯隧遺址，俗稱“長城”。

1907年及1914年，斯坦因兩次考察敦煌鄯隧。其中1914年沿疏勒河經玉門、金塔，一直走到額濟納旗。1930年，中國和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有酒泉沿額濟納河經金塔至古居延澤，沿途考察鄯隧並獲木簡一萬餘枚。1944年，夏鼐、閻文儒等先生，由敦煌南湖始，對敦煌境內小方盤以東的漢代長城進行考察，獲簡44枚。1972年至1982年間，甘肅居延考古隊對額濟納河流域鄯隧遺址進行全面考察，並對破城子、第四隧、卅井次東隧、金關遺址進行了重點發掘，出土漢簡近二萬枚，還有極少晉簡。這次考察雖然不在敦煌境內，但所出簡牘對敦煌研究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197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敦煌馬圈灣進行漢烽隧遺址發掘，獲簡千餘枚。1990年至1992年間，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對漢晉懸泉置遺址進行了連續兩年的發掘，首次揭示漢代驛置的面貌，出土簡牘二萬枚，另有一些麻紙，舉世注目。

由長牆、鄯隧等複雜的防禦工事體系構成的防線，當時叫“塞”。《漢書·匈奴傳》：“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均為因地制宜，或以土垣、壘石牆，或設柵欄，或直接利用陡崖、河流等自然地形，配之以塹壕、天田、城鄣、隧塢等。敦煌所見塹壕和

塞牆多同時建造，以蘆葦或紅柳捆紮成束，圍成框架，然後挖整壕中砂礫填充，一層層疊壓，外圍為蘆葦或紅柳，牆中是砂礫，因為當地水中鹽碱成份較多，與砂礫混合後凝結極牢固，因而保存較好。開挖整壕後多在其中填入細砂並鋪平，即為“天田”，它是一條連綿不斷的松軟砂土帶，人馬越過，就會留下足跡，唐代叫“土河”。城是塞牆內側最大的駐人建築，郭次之，烽燧最小。這些建築都設有圍牆，稱城牆或塢，牆頂還築有女牆，內嵌“轉射”、“深目”等用以觀察反射擊的裝置。塢牆四周設有叫“僵落”的尖木樁，按一定的間距排列，對防備敵方騎兵相當有效。在烽臺頂端、塢牆甚至地面上立有許多木桿，用以懸掛烽、表等標識物。郭隧旁在與塞牆成垂直角度的方向擺設許多叫“積薪”的柴草垛，大的重達1噸以上，用以燃火或者放烟傳遞信息。

縣泉遺址是我國首次進行全面發掘的早期驛站遺址，對研究古代交通意義非凡。“縣”通“懸”，“縣泉”是由於遺址東南山谷中有一泉水而得名，它是方圓數十里內唯一可飲用的水源，因而漢、晉、唐、清各代在這一帶都建有驛站。縣泉遺址為漢晉驛站遺址，由塢和厰兩部份組成。塢為正方形，邊長50米，牆體以40×20×11厘米的土坯壘砌。塢內西、北建有不同時期的房屋3組12間，西南角有一土坯壘砌的平臺。塢外西南為一組長約50米呈南北走向的馬厰。遺址內文化層共六層：一層為表土，二層為魏晉時期堆積，三層為王莽至東漢中期堆積，四層為西漢晚期堆積，五層為西漢中期堆積，六層為西漢中期塢牆建築的堆積。遺址的使用，上始於西漢武帝後期，下止於魏晉時期，延續了近400年。

更可貴的是上述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簡牘，今將郭燧遺址及驛置遺址出土簡牘的內容分述於下：

敦煌郭燧遺址出土的簡牘多與屯戍有關，反映了漢代屯戍的各個方面，例如屯戍的組織、管理等等，關於這個方面的研究，早年羅振玉、王國維做過許多工作，《流沙墜簡》一書即其代表作，它是清代考證學在簡牘研究方面結出的奇葩。從文書學的角度考察，這批簡牘

大多爲官私文書。官文書有詔書律令、司法文書、符、傳、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等；私文書多屬買賣契約和書信。此外，還有古書如《蒼頡》、《急就》、《力牧》、九九、歷譜、《相馬》、《相善劍刀》及占候卜筮、醫藥方等。

縣泉置遺址出土簡牘的內容則多與郵驛有關，它首次向人們展示了兩漢郵驛的面貌，簡文對“置”的職能、管理組織和人員構成等都有明確的記載。據簡牘所見，縣泉置隸屬敦煌郡效穀縣，置設丞一人，下轄置嗇夫、厨嗇夫、倉嗇夫、少內嗇夫，都由嗇夫等官吏，其下領有御、郵人及一些弛刑徒、官奴婢等。額定傳馬、驛馬達36匹。置的主要職能是傳遞文書及迎送接待過往官員、使節。今見接待的對象有朝廷使者、行邊御史、太守、都尉、司馬等各級官員，還有西域各國如大月氏、烏孫、車師、莎車、且末等國的貴人、使者，規模大者達一百餘人。簡牘所見各種名目的簿籍，記錄了支付糧草、車馬的數額、品種、價值，生動地反映了接待官員、使者的過程。其中一枚驛置道里簿，詳細記載酒泉至敦煌的路綫、置名、和里程：如果把它和1973年間在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出土的驛置道里簿一起考察，則可以繫聯出長安到敦煌的驛置路線。此外，根據傳遞郵書的記錄，可知縣泉附近的驛置名稱，如西漢的魚離置、淵泉置，東漢的石廕郵等。就文書形式而言，簡牘所見亦多爲官私文書，如詔書律令、檄、記、符、傳、司法文書及簿籍。另有如《蒼頡》、《急就》、術數、相馬、醫方等古佚書，詔書見《徙民屯詔》，發佈從中原移民敦煌進行屯田的命令，還見對漢官廷車輛的配備作出具體規定的詔書。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此遺址出土了不少麻纖維紙，據稱是西漢宣帝、元帝時期物，其中四件有墨書文字，紙既然已在西北邊郡使用，它的傳播應已相當普及。寫於牆壁上的墨書詔書和醫藥方，也是首次發現。^⑩

雖然上述簡牘多反映地方的、局部的事情，但也不乏涉及全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最典型的即詔書律令之類。詔書如《敦》1300：“尚書臣昧死以聞。制曰：可。購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人三萬，校尉史、司馬候丞人二萬，書佐、令史人萬。”這是皇

帝關於購賞品次的命令。律令如《敦》983：“捕律：亡入匈奴；外蠻夷守，棄亭鄣逢降者，不堅守，降之及從塞徼外來降而賊殺之皆要斬，妻子耐爲司寇，作如”《敦》1875：“行言口若許，及受賕以枉法，皆坐臧爲盜，沒入口具口……”有些簡雖然不是律令本文，但它是對有關律令的應用與實行，如《敦》1854：“敦德步廣尉曲平望塞有秩候長敦德亭閒田東武里五士王參，秩庶士，新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十月乙未迹盡二年九月晦積三百六十日，除月小五日，定三百五十五，以令二日當三日，增勞百泰十泰日半日爲五月二十泰日半日。”“以令二日當三日”即以《北邊挈令第四》爲依據。此令見《合校》562·19：“北邊挈令第四：北邊候長候史迹二日當三日。”適用北邊諸塞，居延所見之實行，如《合校》159·14：“五鳳三年十月甲辰朔甲辰，居延都尉德丞廷壽敢言之。甲渠候漢疆書言候長賢日迹積三百廿一日，以令賜賢勞百六十日半日，謹移賜勞名籍一編敢言之。”

無論是鄣隧還是驛置遺址出土的簡牘，它們的形制與質料大致相同。形制主要有簡、兩行、牘、觚、楬、封檢、削衣等，質料有紅柳、柞兒松、胡楊等。有極少竹簡，亦見一枚以蘆葦製作的簡。

綜言之，敦煌出土簡牘的內涵相當豐富，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諸領域，是研究敦煌乃至漢晉史的第一手史料。

上文，僅僅是對漢晉敦煌的幾個側面做了簡要介紹，錯謬之處必多，再望多賜教。

注釋：

① 參見寧可：《河西懷古》，載《絲路訪古》255—274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第1版。本文簡稱《敦》，下同。

③ 劉光華：《建郡後的漢代河西》，載《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2輯87—99頁

④①③參見《漢書·西域傳》。

⑤ 參見《後漢書·班勇傳》。

⑥ 參見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上、下),載《文史》第34、35輯。

⑦ 王宗維:《“敦煌”釋名——兼論中國吐火羅人》,載《新疆社會科學》1987年1期 61—72頁。

⑧ 黃文弼:《中國古代大夏位置考》,載《西北史地論叢》117—1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⑨ 徐樂堯、余賢傑:《敦煌軍屯的幾個問題》,載《西北師院學報》1985年4期。

⑩ 谷芑:《河西四郡新農業區的開闢是絲綢之路暢通的關鍵》,載《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⑪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韶:《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版。本文簡稱《合校》,下同。

⑫ 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2月版。

⑬ 《三國志·魏志·倉慈傳》。

⑭ 參見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疏勒河流域漢代邊塞遺址概述》,文物出版社1984年3月版。

⑮ 參見宿白:《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載《絲路訪古》15—38頁,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⑯ 參見甘肅省考古所懸泉縣遺址發掘隊:《漢懸泉置遺址發掘獲重大收穫》,載《中國文物報》1992年1月5日。

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 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

敦煌市博物館

1990年4月2日敦煌市黃渠鄉筴子場村一農民交來漢簡一冊，散簡數枚，素簡一捆。是其挖芒硝時，在馬迷兔西北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上發現的。次日我館工作人員即赴現場調查，又採集到漢簡數枚。

馬迷兔是一距敦煌市西北約128公里的小盆地，這次發現漢簡的烽燧遺址位於馬迷兔西北11.6公里的湖灘風蝕臺地上，南距疏勒河（當地俗稱清水溝）3.2公里。甘肅省文物隊編號D9，斯坦因編號T1。（D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號，T為斯坦因編號，下同）方位東經93°20'，北緯42°21'，往西北依次為D8（T2）、D7（T2^a），東南可遙見D11（T4^a）。（圖一）

該烽燧方位北偏西10°，由兩部份組成，上部土坯砌築，高3.7米，頂部1.8×3.2米；下部為夯築，高3.5米，底基6.5×5米。夯土隔20餘釐米，夾有一層紅柳。北側繞西殘存登頂臺階，用土坯夾蘆葦砌成。烽臺西、西北壁與塢相連，塢已坍塌，殘存部份土壑牆基。西面灰層厚約2米，所圍面積6×4.5米，灰層南為塢門，塢門前有進深0.4米的甬道。甬道頂塌，殘高1.33米，寬0.92米。塢門高1米，寬0.55米，門楣為內外兩根橫木，寬0.14米。甬道、門及門內均塗以草泥，門內被坍塌的土壑堵塞。土壑0.36×0.18×0.12米。西北角的一片草灰層，厚一米多，面積6×12米，灰層內涵多為草灰，夾雜有燒殘的火苣、葦草、麻布殘片、草編殘片、木器殘件、畜糞等，似為牲畜圈。這次出土的漢簡和較完整的器物，均出自距甬道口西0.85米的一片灰層中，現分述於下。

一、出土器物 較完整的器物共五件，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文化用品等。

1. 斧刃 鍛造，正面長方形，鏽蝕嚴重，長方形銎，刃部漸薄，已殘。寬7、高8.5釐米。銎口長7、寬3.2釐米。（圖二）

2. 木柄工具 呈弓形。一端齊平，呈長方形，側面有一長方形孔，內殘留麻布片。一端呈圓形，底部刻一圈凹槽，中部有一穿孔。桿長42釐米，頂部長3.5、寬1.5釐米。方形孔長3.5、寬0.5釐米。下端直徑2.3釐米，孔徑0.5釐米，用途不明。（圖三）

3. 竹籃 圓形，其編織結構為，口沿用柳條編製，外裹纏皮子。籃身竹條為緯，用細麻繩上下相交為經，編織而成。籃底有一破洞。口徑21、高9釐米。（圖四）

4. 筆套 竹製，表面光滑。分為上下兩節，上端繫一節細皮繩。上半節線刻山水畫。上半節長8.5、下半節長10.5釐米，管徑1.3釐米。裝在一節皮套中，皮套長14.5、寬4.5釐米。（圖五）

5. 辟邪 紅柳木製成，上端圓面斜削兩刃成棱形面。下端削成尖椿狀，再以墨筆繪出人面形。繪法為上畫一弧綫為額，兩眉上挑，吊眼，豎點為睛，扁圓形口，口上有八字髭，顯得凶煞有神。長17、徑1.8釐米（圖六）

二、漢簡 這次出土曆譜一冊27枚，散簡14枚，無字素簡一捆21枚。形制有簡、牘、符、冊等，所有質材多為當地胡楊、紅柳，個別為竹簡。內容有曆譜、符、要書、品約、簿籍等。多數文字清楚，個別簡由於殘斷漫漶，文義不清，類別難以判斷。現將這批漢簡的釋文和簡影刊於此，（圖版一、二散簡照片中無編號的簡是9號簡的下半節，簡冊照片中廿五日簡下的殘段應為四日簡下端）散簡釋文均以原簡款式繁體字橫排，簡文之後注明A字者，表示是簡正面，B字表示背面。釋字口表示字迹不清或不可釋之字，□表示斷簡，釋文號碼是整理時所編，其它照錄：

1、元鳳四年七月癸未朔乙未延年亭口

2、延年亭 不警符柱中

3、青敢言之謹移病卒爰書一編敢言之

4、●天鳳塵陰雨不具蓬火者亭隧騎馳人走傳相告以急疾毋乏爲故

5、司馬令史趙疾去 十月十一月食六石

6、沐青子^{穿口五斗}_{十銷四脯}寄王文所

7、四日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建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 丙辰

8、廿四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申 丙寅口

9、●蓬以布若韋爲溝高五尺口徑四尺索逢二

10、年發尚令史進口口伏地曰兄東口思口

候口口口口苦水間夜行口持水食者出乙

水食出不相見即日暮宿同年北谷中留待口

口口與口候井選口一人選穿井口水口

口益壽井遭益口直北口口口口 A

暮食口口即口之益壽井口之口 B

11、口口口口大口五口口口一分口

12、出糜 一石四斗三升 以食候史吳偃五月壬戌盡甲戌十三日

13、廿八日 癸酉 壬寅口

14、出糜二石六斗 以食候史吳偃私馬一匹五月壬戌盡甲戌十三日食

簡冊釋文見圖（臨摹）

這批漢簡年代的上限爲西漢昭帝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紀年簡，據曆譜簡的朔閏干支推算，下限爲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茲將這批漢簡內容考釋如下：

散簡：

1號簡爲紀年簡，西漢昭帝紀元年號爲“元鳳”，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昭帝元鳳四年七月爲癸未朔，十三日得乙未。故該簡爲西漢昭帝年號簡。下書“延年亭口”，從2號符知其爲出土地點之烽亭

名。

2號簡詳後。

3號爲官文書——爰書，這是漢代邊塞常見的一種證明書性質的文件。該簡爲移交的“病卒”證明，相似之簡例，如居延簡“三月辛巳甲渠候長福口疾卒爰書一編敢言口”。（42·11.《居延漢簡甲乙編》編號，以下簡稱居）

4號爲邊塞烽火品約中的傳言之制，即在烽火報警碰到特殊情況，如氣候惡劣和失誤時，不能施放烟火報警，需即刻派遣驛騎、人力傳檄相告，予以補救。該簡與居延《塞上烽火品約》簡中：“匈奴人入塞，天大風，風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傳檄告，人走馬馳以急疾爲故，（《居延新簡》EPF16:16）屬同一品。

9號簡記錄了一件漢邊塞《守御器簿》中的烽具——“布烽”，是烽火信號標誌之一，由烽堠（布烽的木櫃架）、烽布、烽索等組成。該簡錄質地、形狀、尺寸、烽索數量。

5、12、14簡爲簿籍，5號爲士吏廩食簿，錄官職、姓名、廩食數、月份。12、14號爲出穀簿，12號受穀者爲人，錄品種、數量、受穀人官職、姓名、時間；14號受穀者爲私馬，較12簡多錄私馬數，兩簡同時、同一人，一爲候史吳偃，另一爲其私馬。

7、8、13號簡是殘曆譜，與同時出土的地節元年曆譜冊屬一式，即一年曆譜用三十簡組成，一簡一日，下記全年干支。7號爲豎讀式，簡的左側分上中下有三個繩的三角形小鏤口，據《二十史朔閏表》推算，爲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曆譜，是年閏九月。8、13簡殘，字體相同，編繩小鏤口在右邊，經推算，屬同一曆譜簡冊，爲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的曆譜。

6號文意不詳，10、11號殘斷、漫漶嚴重，文字多不可釋。

下面僅對散簡中的一些問題作一說明：

1. 關於“不驚符”

2號簡是一枚符，該符係紅柳製作，長14.5釐米，寬1.7釐米。符上端左側有一刻齒，刻齒中書有半個墨書“百”字，爲“百”字之右

半。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從竹付聲。”《漢書·高帝紀》曰：“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師古注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又居延簡載：“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爲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第八”（居65·7）

該符長14.5釐米，約合漢尺六寸，形制與“六寸符”正相合。

符的刻齒，是用來合符以示信的，即“符合以從事”，敦煌簡有“合符取芟六十束”，（1152，《敦煌漢簡釋文》編號，以下簡稱敦）該符以齒與“百”字爲合符標誌。

秦漢皆行符券左右之制，從居延、敦煌已出土的符得知，邊郡所行符券爲“左居官”、“左上右下”之制。該符刻齒內的“百”係右半，知其爲右“券”，是由上級部門移予使用地。該符以左側齒痕爲界，上端所書“延年亭”，當爲接受地，即該亭燧之名。下部書“不警符柱中”。“謹候望，通蓬火”，是邊塞亭燧的主要職責，敦煌曾出土有“驚候符”^①，“驚”通“警”，即報警之警，“警候符”通燧卒候望報警時所佩用之符。無獨有偶，該符爲“不警符”。“不警符”當爲“下蓬、止烟火”時戍卒佩用之符。敦煌烽火品約載：“望見虜塞外及入塞虜即還去，輒下蓬、止烟火，如次亭未下蓬、止烟火，人走傳告，都尉出追未還，毋下蓬”（敦521），即在烽火報警時，看到敵人退出塞後，則需“下蓬、止烟火”，即刻消除警號，解除緊急狀態，如果次亭未照樣處理，需派戍卒身佩不警符，走傳相告。因此，這枚“不警符”的出土，將有助於漢代邊塞符傳制度的研究。

2、關於大煎都候的亭燧問題

漢王朝在敦煌由東往西設有宜禾、中部、陽關、玉門關四部都尉。大煎都候爲玉門關都尉所屬最西端的候官，亦是漢王朝直轄郡縣的極西陲，與西域接壤，戰略地位極爲重要。大煎都候所屬烽燧及名稱，王國維曾有考述，尤其是馬圈灣烽燧遺址漢簡出土後，已大致考證清楚，其烽燧東自D15（T7）始，往西至D11（T4^a），現存烽燧5

座，由D11往西南，有D10（T4^c）等6座烽燧，往西北過疏勒河，有D9等4座烽燧，共計現存烽燧遺址15座。現已知亭燧名14座，即：

廣昌、厭胡、大煎都、凌胡、步昌、益昌、廣武、富昌、獲鷹、庫地、美水、服胡、破胡、莫當燧。

現存15座烽燧中，其中已知D1（T6^d）名“廣昌燧”；D2（T6^c）名“厭胡燧”；D3（T6^b），名“凌胡燧”；D4（T6^a）名“步昌燧”；D5（T5）名“廣武燧”；D12（T4^b）名“富昌燧”^③。而疏勒河西北D9（T1）等4座烽燧均不知其名。

今據清水溝東墩簡：“元鳳四年七月癸未朔乙未延年亭”，符“延年亭，不警符柱中”，又知“延年亭”一名。漢代邊郡符之制，“左居官”，右符移於使用點。該符係右券，當存於使用點。因而，可知清水溝東墩烽燧即D9（T1），名為“延年亭”，並且，“延年亭”一名，正好補足大煎都候15座亭燧名稱中所缺的一個烽燧名稱。

簡冊：

該簡冊現存二十七枚，木質，簡新如洗，字迹清晰，以漢隸書寫，為編冊橫讀式曆譜。每簡上端有日期，從右至左，一日一簡，按日編排，從四日至三十日，其中一、二、三日簡缺佚。簡端縱書日期，下面橫書十三行，為一年每日的干支，行距間縱書八節、時辰，及建、伏、臘曆注。

該曆譜的年代，我們從同烽燧遺址出土的“元鳳四年七月癸未朔乙未延年亭口”紀年簡，可初步斷為漢昭帝前後的曆譜。又從日期下的十三行干支日，知該年十三個月，有閏月。據干支紀日很容易推得所佚三日干支，可以得到一個一年完整曆譜，據每月干支紀日，知其十三個月的月建為庚子、己巳、己亥……。再將該曆譜與《資治通鑑目錄》、《二十史朔閏表》對照，發現該曆譜的每月朔閏干支及大小盡，與這兩本書所載距元鳳紀年簡八年後的壬子年，即宣帝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的朔閏干支完全一樣。又據《漢書·宣帝紀》載：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查該曆譜十二月晦日干支，正是“癸亥”，由此我們完全可以斷定該曆譜就是地節元年的曆書，應屬太初

曆法（公元前104年——公元85年）。

該曆書在干支下記有立春、立夏、秋分、立秋、立冬和冬至六節氣，綜合佚去三簡，可知其有二至二分和四立的“八節”，八節其名見於《漢書·律曆志》統術篇中，該曆佚者為春分、夏至二節氣。從該曆日期下橫書一年干支為十三行，知該年有閏月，據其所記六節和用太初術以平氣（恒氣），可推二十四氣中的其餘節氣。知該年第二個月沒有中氣。《漢書·律曆志》曰：“朔不得中，是謂閏月”。知該年閏正月，與《資治通鑑目錄》、《二十史朔閏表》的記載相符。該曆譜在其中八個月中紀有八個時稱，從八時所紀干支來看，是按十二辰紀時。《史記·曆書》曰“時鷄三號，平明。撫十二（月）節，卒於丑。”正義曰“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鷄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使一日一夜，故曰幽明。”其中，除閏月外，還有正、五、六、七四個月未置時。

該曆譜紀有建、三伏、臘諸曆注，建是以相當於月建的十二支日設置的，閏月沒安排建。該曆三伏為夏至後第四庚初伏，立秋後第一庚中伏，立秋後第二庚後伏，與《陰陽書》“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不同。該曆冬至後第四戌為臘，《說文》曰：“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又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曰：“宋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大墓日也，是為臘。……古法遇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不可在十一月也”。可知《說文》所紀僅為正歲之臘。

地節元年曆譜是我國至今發現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太初曆譜簡冊，該曆譜僅距太初改曆30餘年，距元鳳定曆僅五年^⑤。因此，該曆譜為我們認識太初改曆後的標準曆譜格式提供了實物資料。另外，該曆譜用十二時辰注曆，為至今發現古代曆譜所僅見。地節元年曆譜的發現，不僅對太初曆法，也對整個古代曆法的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本文漢簡釋文，承蒙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雙全先生校正，特此致謝。

執筆 殷光明

注釋

①《敦煌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木簡》，敦煌縣文化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吳弼驤等《敦煌漢簡釋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見《漢書·律曆志》，中華書局標點本，第978頁。

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 出土《曆譜》述考

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館)

1990年，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有字簡41枚，素簡21枚，內容包括兩部份，其主體部份是一冊《曆譜》，餘為散簡（詳見《敦煌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文物調查及漢簡考釋》）。《曆譜》是敦煌歷次出土漢簡中最完整的一次，也是我國至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太初曆譜簡冊，無疑為研究漢代的科技文化提供了珍貴資料。茲將其內容述考於下：

該曆譜現存二十七枚，木質，簡新如洗，字跡清晰，以漢隸書寫，為編冊橫讀式。簡長36—37，寬0.6—1.3，厚0.3釐米。排次齊整，每簡上端有日期，從右至左，一日一簡，按日編排，從四日至三十日。其中一、二、三日簡缺失，十一、十六日簡斷裂，四、十九、二十五日三簡部份殘缺。（圖版二，其中廿五日簡下端的殘段應為四日簡下端）在上中下三道細麻編繩中，上道繩完好，中道繩存一半，下道繩佚。編繩左端有餘頭繫簡冊：上道繩留9釐米餘頭，有兩個結；中道繩留13釐米長的繩套。故該簡冊是從右至左編捲，上端無天頭，下端按簡內容留或不留地頭，地頭0.8—1.7釐米。簡端日期下分十三行干支，一、七、十三行書於上中下三道編繩下，其餘各行簡面均有刀刻橫線，依線下書寫，刻線行距2.5釐米。每簡字數不等，少者16字，多者34字。該簡冊係先寫而後編。簡端縱書日期，下面橫書十三行，為一年每日的干支，行距間縱書八節、時辰、及建、伏、臘等曆注。另外，在第八日簡背上部墨書“甲戌食時可”，十八日簡背上端削低0.2釐米，縱書“田飽”二字。

該曆譜的年代，我們從同烽燧遺址出土的“元鳳四年七月癸未朔乙未延年亭口”紀年簡，可初步斷為漢昭帝前後的曆譜。又從日期下的十三行干支日，知該年十三個月，有閏月。據干支紀日很容易推得所佚三日的干支，可以得到一個一年的完整曆譜，據每月干支紀日，知其十三個月的月建為庚子、己巳、己亥……。再將該曆譜與《資治通鑑目錄》、《二十史朔閏表》對照，發現該曆譜的每月朔閏干支及大小盡，與這兩本書所載距元鳳紀年簡八年後的壬子年，即宣帝地節元年（公元前69年）的朔閏干支完全一樣。又查《資治通鑑目錄》、《二十史朔閏表》兩書，漢代再無與此曆譜朔閏干支一樣的年代，所以我們可以基本斷其為地節元年曆譜。又據《漢書·宣帝紀》載：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查該曆譜十二月晦日干支，正是“癸亥”，由此我們完全可以斷定該曆譜就是地節元年的曆書。

我國從漢初到太初元年（公元前204——前104年）沿用秦使用的顓頊曆，即使用以夏正十月為歲首的曆法制度。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這種政治年度和人們習慣通用的春夏秋冬明顯不合。同時漢初以後，人們對於天象觀測和天文知識在不斷進步。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共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①以後每年都從孟春正月開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終，這種曆法叫“太初曆”，它是我國最早根據一定規制而頒行的曆法，它的制度可以說是劃時代的。兩漢末，經劉歆加以補充後，將太初曆稱三統曆，後人也常用三統曆這個名稱，《漢書·律曆志》保存了太初曆的主要內容。太初曆（即三統曆）的使用從太初元年到元和二年（公元前104——公元85年）。所以，地節元年曆譜應屬太初曆法。

八節

此曆書在日干支下記有立春、立夏、秋分、立秋、立冬和冬至六節氣，綜合佚去三簡，可知其有二至二分和四立的“八節”。八節其名見於《漢書·律曆志》統術篇中，兩相對照可知，該曆佚者為春分、夏至二節氣。我國古代使用二十四節氣安排農事，二十四節氣的名稱最早見於《淮南子·天文訓》。太初曆則明確規定一回歸年平分為二

十四氣，一氣平均爲15—16日。《淮南子·天文訓》記載春分後“有四十五日而立夏”；立夏後“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夏至後“有四十六日而立秋”；秋分後“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該曆譜秋分在辛丑，立冬在丁亥，相隔四十六天，與《淮南子》記述相同。另外據以上記述，並用太初術以平氣（即恒氣）推之，可知該曆譜立夏在甲申，可推得前四十五日己亥當爲春分，這也與《資治通鑑目錄》所記該年“二（月）一日春分”相同，而立夏後四十六日，立秋前四十六日的庚午日當爲夏至日。

二十四氣在太初曆以前已出現，又在太初曆法中明確記載，這證明當時二十四氣在農業生產中已普遍使用。但是，在該曆譜中爲什麼僅用了八節注曆呢？

我國古代使用陰陽曆，平年354或355天，閏年384或385天，這對農業生產極爲不便，於是創立二十四氣以彌補陰陽曆對農業生產的不便。二十四氣在我國曆法上有一個形成過程。《書經·堯典》所追述的時期已有二分、二至的“四時”，後來增加到“八節”，即《左傳·僖公五年》所謂“分至啓閉”，“分”指春分、秋分；“至”指夏至、冬至；“啓”指立春、立夏；“閉”指立秋、立冬。在《淮南子·天文訓》中，二十四個節氣已經具備。二十四個節氣是我國勞動人民，通過長期借助星象出沒的判斷掌握農時節令，纔逐漸創立的。“八節”是構成二十四節氣和我國古代曆法的基本要素。據《漢書·律曆志》，漢代治曆首先要“雜候……八節二十四氣”，在《統術編》中也是先“求八節”，後“求二十四氣”。又《史記·律書》曰“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索隱注“八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可知八節在古代曆法中之重要。《周髀算經》載有八節二十四氣，據趙爽注：“節三氣，三而八之，故爲二十四”。古代勞動人民對這方面的天文知識相當熟悉，祇要在曆譜中注明八節，也就很容易推出二十四氣了。因此，用八節注曆，也就意味着用全部二十四氣注曆。用八節注曆的另一原因是，在漢代八節是封建王朝的重大祭日，《周髀算經》趙爽注又稱：“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

生長收藏之始，是爲八節。”所以，皇帝在八節各日常要帶百官進行祭祀活動。當然封建王朝祭祀的主要目的，也是爲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另外，與二十四氣的形成一樣，用節氣注曆也有一個發展過程，從已發現的漢代曆譜來看，屬顓頊曆的銀雀山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曆譜僅用冬至、夏至、立春、立秋四節氣注曆，^④太初改曆後開始用八節注曆，地節元年曆譜是已發現漢代曆譜中，用八節注曆的最早實例。從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諸曆譜可知，太初曆一直沿用八節注曆。^⑤由敦煌遺書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的曆書來看，用全部二十四個節氣名稱注曆，至遲不會晚於南北朝時期。^⑥

閏月

該曆書日期下橫書一年干支爲十三行，知該年有閏月。太初前的《顓頊曆》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實行歲終置閏法，即以十月爲每年的第一月，最後一個月是九月，這樣閏年有所謂後九月。漢初沿用秦舊法，元光元年曆譜就是“後九月”的歲終置閏法。這種置閏法中氣不能與月名一一對應，對於生產季節的推算，很不方便。太初改曆後規定一回歸年平分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又分爲十二中氣和十二節氣，即冬至起奇數次的氣大寒、雨水等，稱爲中氣；偶數次的氣小寒、立春等，稱爲節氣。《漢書·律曆志》曰：“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記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即春、夏、秋、冬四時中，記啓閉的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節氣，可以在本月的上半月，也可以在上月的下半月；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中氣必須在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中。《漢書·律曆志》又曰：“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即在閏年有十三個月，總有一個月輪不到中氣，就以這個月作爲閏月。

地節元年曆譜原存六節氣，上面我們已推得佚簡中春分、夏至二節氣，而由八節和平氣很容易得知其餘節氣在該曆的分配。正月十四日癸丑爲節氣立春，隔十五日戊辰當爲中氣雨水，次月的十五日癸未當爲節氣驚蟄，而又次月的己亥朔（立夏前45日）爲中氣春分，這樣

正月後的這個月兩合朔間不逢中氣，作為這年的閏月。又據《漢書·律曆志》“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即中氣在這個月的朔日或初二，則前一月必為閏月，也說明己亥朔春分（中氣）這個月的前一月為閏月，即閏正月。這也與《資治通鑑目錄》、《二十史朔閏表》的記載相符，說明這兩書的記載是正確的。太初曆這種“朔不得中，是道謂閏月”的原則，是曆法為生產服務的一個重要措施，也是曆法前進路上的一個重要標誌，它在我國曆法史上是一個重要改革。這種原則，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纔廢止。

時辰

該曆譜紀有八個時稱，從八時所紀干支來看，是按十二辰紀時。《史記·曆書》曰：“時雞三號，平明。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正義曰：“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使一日一夜，故曰幽明。”該曆將八時分置於不同月中，即：八月寅平明時、九月卯日出時、十月辰食時、十一月巳隅中、十二月午日中、二月申舖時、三月酉日入時、四月戌黃昏。八時在每月裏的安排順序，是從八月干支中第一個地支的寅下置平明時開始，逐月下推，依次在每月第一個地支的卯、辰等八地支下，按序分置日出時、食時等八時。其中除閏月外，還有正、五、六、七四個月未置時。在推出所佚三簡干支的曆譜中，逐月以十二支相推來看，正、五、六、七四個月中的未日昃、亥人定、子夜半、丑雞鳴四個時辰，在原曆譜中就未設置。

在雲夢睡虎地和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中列出了十二時辰和十六時，說明秦時已並行着兩種紀時制度。^⑤將一日分為十二時並以十二辰表示十二時，至遲開始於春秋戰國時期，是隨着天文曆法的發展而產生的。地節元年曆譜中以十二辰紀時和居延、敦煌漢簡中所紀十六時，則說明漢代仍繼續並行着兩種記時制度，並進一步證實漢代民間普遍使用十六時制，十二時制則僅為曆法家等少數人使用。

秦簡《日書》十二時辰中，放馬灘簡僅列出了七個時稱，未與十二辰相配；睡虎地簡雖有殘缺，仍可補足，列出了全部十二時辰，二

者的時稱和排列多有不同。地節元年曆譜所紀八時名稱及十二辰的搭配，與秦簡《日書》十二時辰也有差別。東漢王充《論衡》中《調時篇》曰：“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王充所述十二時，應如晉代杜預注《左傳》所述十二時，⑥ 茲補足其相應的十二辰，將三種時辰列表如下：

十二辰	秦簡《日書》	地節曆譜	杜預《集解》
子	人定		夜半
丑	雞鳴		雞鳴
寅	平旦	平旦	平旦
卯	日出	日出	日出
辰	食時	食時	食時
巳	莫(暮)食	隅中	隅中
午	日中	日中	日中
未	日昃		日昃
申	下市	舖時	晡時
酉	春日	日入	日入
戌	牛羊入	黃昏	黃昏
亥	黃昏		人定

可以看出，地節元年曆譜，除了四個未記的時辰外，所記時辰與東漢、晉代的十二辰完全一樣，遲至唐代基本沒有變。⑦ 這說明十二時稱及與十二辰的搭配，太初前還不統一，直到太初改曆時，纔確定下來。

在該曆譜中，除了幾個未置時辰的月份外，八時辰分別以春分、秋分作爲兩個起點。早在《尚書·堯典》中就以日中、宵中，表示春分、秋分晝夜平分；以日永、日短表示夏至、冬至，夏至晝最長夜最短，冬至則晝最短而夜最長。該曆八時從八月秋分始，至十二月，又從二月春分始，至夏至前的四月止，以紀一年由秋分——冬至——春分——夏至，經歷了晝夜平分——晝最短夜最長——晝夜平分——晝最長

夜最短的一個回歸年。

該曆譜八時辰，起秋分後一日的壬寅平明時，訖於黃昏。《尚書大傳·甘誓》：“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又《史記·曆書》：“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時鷄三號，平明。”這都是說夏曆每年以寅月，即農曆正月爲歲首，每日以寅時即平旦爲一日之始。該曆譜起平明，迄黃昏，是以旦、昏分割晝夜。我國古代使用漏壺測定晝夜昏旦，“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④終兩漢之世，漏刻晝夜百刻，據《後漢書·律曆志》“永光十四年（102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永、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本始）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地節元年（前69年）距孝宣帝三年（前71年），僅隔一年，當施行官漏，率九日增減一刻。但漏所分晝漏、夜漏並非平分各五十刻，適因四時二十四氣增減有長短。該曆譜秋分正值一日之始寅平旦，漏刻恰爲晝55，夜45（由於晨昏朦影的關係，古代天象學家們規定，把夜去掉五刻，加到晝刻裏面），既是一日，也是一年漏刻之始。這可能是該曆譜較其它曆譜多紀八時辰的主要原因之一。

該曆譜以旦、昏分割晝夜。起平旦，迄黃昏爲一日之晝，我國古代又將晝分爲朝、中、夕，《續漢書·五行傳》注引《尚書大傳》曰：“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昃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朝、中、夕各三時。《左傳》昭公元年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淮南子·天文訓》曰“禹以爲朝、晝、昏、夜。”故《史記·封禪書》曰：“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該曆譜紀朝、中、夕九時。黃昏至平旦以前爲夜，凡三時，計十二時辰。

關於地節曆譜中的時辰，筆者囿於古代曆法知識，僅能談以上幾點看法，該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曆注

該曆譜紀有建、三伏、臘諸曆注。

《史記·日者列傳》有“建除家”，可知“建”起源甚古。該曆建的安排是，正月（寅月）在十二支或十二辰的寅日為建，次月是閏月沒安排建，二月（卯月）在卯日為建，以下就逐月按十二支安置，這樣可以知道當時以相當於月建的十二支日為建，記述正月至十二月每月建除十二客相配十二地支的對應循環關係。

漢代重伏、臘二祀，故於曆譜中記其干支。《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公元前677甲辰年）初伏”。《正義》注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為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所謂三伏者，《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也。”但此於漢簡曆譜所記不同，在漢簡曆譜中，除地節元年曆譜外，敦煌所出永光五年曆譜也記三伏，茲比較如下：

地節元年曆譜	永光五年曆譜	陰陽書
五月三日庚午夏至	五月四日丁未夏至	
六月四日庚子初伏 （夏至後第四庚）	六月八日庚辰初伏 （夏至後第四庚）	夏至後第三庚初伏
	六月十八日庚寅中伏 （夏至後第五庚）	夏至後第四庚中伏
六月廿日丙辰立秋	六月二十一日癸巳立秋	
六月廿四日庚申中伏 （立秋後第一庚）		
七月四日庚午後伏 （立秋後第二庚）	七月八日庚戌後伏 （立秋後第二庚）	立秋後初庚後伏

以上地節元年與永光五年曆譜，唯初伏皆在夏至後第四庚，後伏在立秋後第二庚，（夏至為庚日時，算作第一庚）另外，原敦煌漢簡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曆譜還載有：“五月二十二日甲子夏至，六月十九日庚寅初伏”，初伏在夏至後第三庚，又與前兩曆不同。^④ 以上三曆皆為太初曆施行時期，而對於三伏的安置先後不盡相同。而漢簡曆

譜和《陰陽書》完全不同，初伏與中伏相隔，地節爲二十日，而永光爲十日；中伏與後伏，地節爲十日，而永光爲二十日。而且地節立秋後初庚爲中伏，而非後伏。可知兩漢伏日安置先後並不統一，《陰陽書》所記當爲西漢以後之事。

該曆譜十二月十七日庚戌下有一個臘字，是月五日戊戌，其十一月九日癸酉冬至，十日甲戌，廿二日丙戌，故十二月庚戌是冬至後第四戌。據《左傳》，臘祭是周制，僖公五年曰：“虞不臘矣！”《初學記》卷四載“魏臺訪儀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漢火德，火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關於臘日設置，《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又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曰：“宋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大墓日也，是爲臘。……古法遇閏歲即以第四戌爲臘，不可在一月也”。可知《說文》所記僅爲正歲之臘。此外，現知出土漢簡曆譜中，地節元年（閏歲）曆譜以冬至後第四戌日爲臘，永光五年曆譜以第三戌日爲臘，而顓頊曆施行時期的銀雀山元光元年曆譜是以第二戌日爲臘。以此，冬至後三戌爲臘（閏歲爲第四戌）的臘日設置，當從太初曆纔開始施行。

在敦煌、居延歷次漢簡出土中，這類編冊橫讀式曆譜已多次發現。居延簡曆譜大多殘缺不全。敦煌簡曆譜大都是本世紀初英人斯坦因掘獲的，多爲零散簡，且字跡殘缺漫漶，保存較完整的，也僅存十餘支，其中最早的爲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和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曆譜。因此，地節元年曆譜是我國至今發現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太初曆譜簡冊。該曆譜僅距太初改曆30餘年，此外，在太初改曆後27年，即昭帝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發生過一場改曆風波：太史令張壽王反對施行太初曆，主張用殷曆。昭帝曾命主曆使者鮮于妄人、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多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鈎校諸曆用狀”。從元鳳三年十一月起到六年十二月測候三年多，考驗十一種曆之疏密，還是以太初曆最爲精密。當時得出的結論是：“故曆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前75年），三十六（此處“六”字疑爲衍字，太初改曆距元鳳六年爲三十年）歲，而是非堅定。”^⑩而

地節元年距此事僅五年，在邊陲敦煌使用的地節元年曆譜，當是元鳳定曆後標準的太初曆譜，而且從該曆譜同時出土的還有本始四年、地節三年殘曆可知，這裏的曆譜是逐年記下來的，因此，該曆譜為我們認識太初改曆後的標準曆譜格式提供了實物資料，使我們知道太初曆確比顓頊曆進步，例如：太初曆明確規定一回歸年由二十四氣組成，並用二十四氣注曆，規定了無中氣之月為閏月，等等，科學成份大大增加。另外，該曆譜用十二時辰注曆，為至今發現古代曆譜所僅見。所以，地節元年曆譜的發現，不僅對太初曆法，也對整個古代曆法的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資治通鑑》卷21，第699頁。

②羅福頤《臨沂漢簡概述》，《文物》1974年2期。陳久金、陳美東《臨沂出土漢初古曆初探》，《文物》1974年3期。

③王國維《流沙墜簡》。

④蘇榮輝《敦煌所出北魏寫本曆日》，《敦煌論集》，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出版。劉操南《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殘曆讀記》，載《敦煌研究》1992年第一期。

⑤《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⑥《左傳》昭公五年載有：“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杜預《集解》稱：“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將十時配十個階層

⑦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⑧《後漢書·律曆志》，中華書局標點本第3033頁。下同。

⑨張鳳《漢晉西陲木簡歷編》

⑩《漢書·律曆志》第978頁。

西郭寶墓出土木謁及其釋義再探

石雪萬〈連雲港市博物館〉

謁和刺是古代的通用名片，這是當今最通俗的解釋。故《辭海》、《辭源》都把謁、刺解釋成名帖、名片，未對古之謁、刺加以區別，甚至引為“西漢時叫做謁，東漢時叫刺，”認為二物實一物，祇是時代不同，稱謂不一而已。

其實，謁和刺是兩物，謁的使用年代早於刺。由於史無詳實記載，所以確切年代，格式已漫漶不清。雖然謁和刺的長度一般相仿，均在21—25釐米之間，為漢時一尺，但在形製上謁和刺是有很大區別的。

謁寬而厚，刺窄而薄，謁中央頂端書一“謁”字，而刺無此字；謁書一般分書兩行和叁行，而刺中央壹行直下；謁可以列賀錢數，而刺卻無此項。謁的使用比刺鄭重得多，用於下對上，而刺的內容卻可詳可略，可親可疏，可恭可倨，持刺者可根據上下，長幼，親朋，初次交往等不同情況選寫名刺，表達各種複雜而微妙的感情。

在漫長的流行過程中，刺以其輕巧、靈便逐漸取代了謁，謁和刺之間的差異模糊了，到宋時謁和刺已連在一起使用，謁、刺混為一談了。這是謁和刺現今一般的考證。

自1985年連雲港市新浦南8公里處發掘了一座西漢中晚期的西郭寶墓，獲一組五片的漢代木謁後，揭開了當代最古，形製上最完整的漢代木謁之謎。其長為21.5釐米，寬為6.5釐米，厚為0.8釐米。其排列順序為無文字圖案的素木謁一，名謁一，載有陪葬物的木謁（兩面都書有文字），名謁二，最後迺是與首頁一樣的素木謁二。它的發現使後世一直認為木謁單片書寫的形式，推至到漢代初年木謁是由首封和底封

形式的組合作件，故古之名謁當稱做“名札”。“辭海”“辭源”中之釋意都有不確之處。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當讀做“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錢穀”，當為最接近謁之原貌，其稱做札是經過推敲的，漢唐僅數百年之隔，考證是容易確切的。

據上所述，謁刺到宋代已混為一談，而且長期從出土和各館藏中的藏件來看，都沒有組合的最古形式出現，因此，歷代歷年之解釋不確當不足為怪。據發表的考證資料來看，全國現今存世最早的木謁當推馬鞍山東吳朱然墓木謁和連雲港黃石崖西郭寶墓木謁，兩者相較之下西郭寶木謁的年代要早東吳朱然墓 200 年之多，所以，西郭寶墓木謁當首推為當今最古之謁。

其形制、內容也完全和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相符。它不但具有札之首、底封的素木片，而且具有夾在兩名刺中的被常規稱做“衣物券”的而實際上是兼載錢穀的木謁。這一木謁不但具有完整無損的外形，而且，具有分兩面書寫的清晰秀麗的漢代隸書 323 個字。據《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為亭長時，曾與沛豪傑一起去賀呂公，因無會禮之錢，不得見，“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可見，謁至遲於漢初就出現了，並具有了載錢物的功能。據此載，西郭寶墓出土的木謁之形制，其年代可上溯至漢初。葬俗當為世之遺俗的見證，出土時這一木謁夾於兩名謁之中，據此推斷這一木謁當稱做載錢穀之謁，為此也揭開了並證實了認為無實物見證而一直被懸着的謁的“載錢物”的功能，也糾正了世說錢物可書在名謁空隙處的說法。

這西郭寶木謁中夾於兩名謁中的木謁，不但證實了謁的“載錢物”的功能，而且以其兩面書寫的形式，也證實了名謁古稱“札”的折疊書寫形式的正確。

謁，現在出土和館藏的存世物中都為單片，其書寫一般都為兩行。

而第二行中央頂端祇書一個“謁”字，而無其它內容的文字，雖有墓葬出土多件名謁的記載，但其內容僅僅是重複而已，唯有西郭寶墓木謁，有特殊之處，其名謁分二片。

名謁一為：

東海太守寶再拜

謁

西郭子筆

名謁二為：

東海太守寶再拜

請

足下

西郭子筆

從書寫形式上來看是迄今全國首次發現分三列書寫的木謁，從謁刺演變和混稱為一的過程來看，其三列書寫的形式，當為形式最全，最鄭重的書寫方法，也為當今發現的最古最具鄭重性的書寫方法。

更值得研究的是名謁分二片書寫，並各具有不同的內涵。據考證，木謁一，即帶“謁”字的木謁，應視作劉熙《釋名·釋書契》曰：“謁，詣也，詣告也。以告所至詣者也”。也就是說，第一塊名謁的作用祇作投謁之意，說明來訪者的籍貫、官爵、姓名、問候語，也是世之最常見形式。

而木謁二，中央祇書一個“請”字的木謁，在木謁中適為首次發現，而且，是與帶“謁”字的木謁一起作為一整套出現的，這不得不使人想起漢時木謁具有的另一半未被發現的內容，我認為這一木謁是客人投謁後，主人出迎時所持木謁。

我認為漢時的木謁既具有投謁以介紹來訪者，籍貫、官爵、姓名、問候語的作用，也具有介紹投謁後主人出迎時介紹主人的禮儀與問候的雙重作用，古人謁分成這樣的兩份是非常合理的。假如，沒有出迎時隨帶的木謁，那麼，出迎時的主人的身份就使投謁者不明，投謁者就無從禮讓而失卻對主人的尊重和失拜訪者的身份。所以，謁的早期應該分作兩份，而謁應該是投謁和迎送兩個功能的名謁的總稱。

雖然在全國沒有類似的實物的發現，也沒有資料很直接地說明這一問題，但是可以從漢畫像石中的投謁和迎賓的場面中說明這道理。（見《徐州漢畫像石》圖76“祠堂畫像”。畫像分上下兩部份，上部份展示了重大的節日或演講、議事的場面，侍者搖扇、忙碌，而主人伏几端坐在重帷之下，忙於和一個一個的來訪者講談的場面。從畫面中可見主人的端坐和來訪者持謁拜見的確切場景。這裏可以看到謁的投“詣”和“告”的功能外，還必須持謁拜見以示對主人的尊重，體現了謁以下對上在禮儀上的鄭重性。

畫面的下半部份是描寫主人迎賓的場面，重門雙開，闕旁兩衛士持戟戟恭立，主客揖手致意，主人持謁恭敬出迎的場面，來訪者祇揖手致意，沒有持木謁，從這個場面中可以看到謁的第二個作用，即來客後主人持謁迎接的作用。當然從場面中可以看出來訪者的地位，起碼與主人相仿，也不會低於主人，畫面中重門外隨帶的侍眾和兩列華蓋馬車，足以說明了主人的身份，所以，象這種身份等級者，投謁後不需持謁拜見，主人卻必須持謁出迎，以示對來訪者的尊重。從上所述知謁在漢時是作為禮儀和權力等級的象徵，故可以推知當這種與主人同等或者高於主人地位者離別時，主人還必須持謁相送，以示其鄭重。這和持謁拜見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謁的使用很鄭重。

在此發現之前，一般都認為投謁祇是以下對上而用的，其對同僚和對上持謁迎送作用實為新的發現。

連雲港黃石崖西郭寶墓木謁的出土，是當今木謁存世的最早見證，它不但給歷來考證木謁提供了最早最完整的學術資料，而且，對木謁解釋和使用過程中的禮儀提供了最確切的實物證據，無疑是研究漢代禮儀的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記建興廿八年“松人”解除簡 ——漢“五龍相拘絞”說

饒宗頤(香港中文大學)

—

右簡爲長方形木板，長36.5cm、廣9cm，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收藏。簡的中間，墨繪一偶人着袍褂，作揖，上記“松人”二字，四周文字如下：

建興廿八年十一月丙申朔，天帝使者合同，復重，拘校，八魁九坎，年望朔晦，東井七星。死者王羣洛子所犯，柏人當之，西方有呼者，松人應之，地下有呼者，松人應之。生人有所口，當問柏人。洛子死注咎，松人當之，不得拘校復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復重酒，松、柏能言語，急急如律令。

上方記：无拘校復重，松柏人當之。

兩旁記：日月時、拘校，復重，柏人當之。（右方）

歲墓年命，復重，松人當之。（左方）

背記：

建興廿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武威）北所住者謹爲王氏之家解復。

死者洛子，四時不食復重拘校，與生人相妨，故作松、柏人以解咎殃，謹解：

東方甲乙之復，鬼令復五木，謹解。

西方庚辛之復，鬼令復五金，謹解。

南方丙丁之復，鬼令復五火，謹解。

北方壬癸之復，鬼令復五水，謹解。

中央戊己之復，鬼令復五土。無復兄弟妻子婦女孫息宗親，無罰無負，齊一人止。急急如律令。

主人拘校復重，松人應之。死人罰謫作役，松人應之，六畜作役，松人應之，無復兄弟，無復妻子，若松人前卻，不時應對，鞭苔（笞）三百，如律令。

右側記：二日丁酉直開

是簡據傳聞與本所另藏王杖簡同出於武威磨咀子。

吐魯番出土有若干件犯土禁而祭於五方土神的唐代寫本文書①，內中有云“□觴，五土解”及酌酒行觴“願爲△甲驅□百病，驅使消除，日夜覺差，身輕目明”（《五土解》）又“行虎步，平復汝故主□”“謹啓：△戒范（犯）……土”，末云：“諸土悉解”。（《唐犯土禁忌文》）此處“復”爲平復的意思。今通觀本簡文字主題是在解復，含義不同。簡之背面顯然寫着：“謹爲王氏之家解復”以下續記五方五行與鬼所使行之“復”，然後再言“謹解”。即簡文前、後疊次載明“拘校，復重”和“復重、拘校”，意指必須藉神力加以解除，以松人與柏人，擔當其所犯之咎。一切“拘校復重”引起之禍害及罰謫作役等等，概由松人當之。如松人不服命，可加以鞭苔，這當然是一種去邪巫術，但蘊藏一深層意義，值得加以研究。



本簡所言之“復重”，可能指某一日辰之重見、重犯，有所禁忌。故云：“日月時拘校復重”，“太歲墓年命復重”。此類日時、歲年重犯，概由柏人、松人當之。是簡題榜曰松人，以此推知，應另有一板，題榜曰柏人，惜已失去。

後代尅、置占星所流行禁忌之日辰有曰“復日”與“重日”者，具見《協紀辨方書》。該書卷五引《曆例》云：“復日者，正、七月甲、庚，二、八月乙、辛，四、十月丙、壬，五、十一月丁、癸，三、九、六、十二月戊、己日也”。曹震圭曰：“復者，重見也。爲本建之辰與所遇之于同也。”

又同書卷五，解釋“重日”，引曹震圭云：“亥爲陰極之位，坤辟

在焉，巳爲陽極之位，乾辟在焉。是陽中陽而陰中陰也。故曰重其日，忌爲凶事者，恐重犯也；利爲吉事者，宜再見也”。是重日謂重陽與重陰，蓋指巳（陽極）、亥（陰極）二日。

復日與重日之說，如何形成必有它的遠源。漢代簡牘已見重日及復日，如《居延新簡》EPT8.12：“……廿四日己巳建重”重日正值巳日。復日見《居延新簡》EPT65.425A：“四月……二日壬寅除復……”又《敦煌漢簡》1968A：“十八日庚午定反支復……廿九日甲申建復”1968B：“十日癸巳執全復”（據圖版）

卜辭復字作，又一形作（𠄎），疑爲復之異構，僅見“復日”一條殘文：……丑卜，其𠄎（復）日……（《合》34119）未知是否可釋“復日”？若然，則可遠溯至殷矣。

簡文對於五方五行所值鬼令重犯之復（日），都注“謹解”二字。解即解除之術。《論衡·解除篇》云：“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齊民要術》載祝釴文“東方青帝土公，南方赤帝土公，西方白帝土公，北方黑帝土公，中央黃帝土公，主人公某甲謹相祈請”。凡解，必遍請五方之神，其俗由來已久。

此簡記明松人、柏人，考曾侯乙墓簡云：

“侖所口口六夫……柏大奚二夫，桐揆一夫”（簡212）

柏奚字亦作僊，即是柏人，知以柏人作爲偶人，戰國已然。《三國志·吳志·孫和何姬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吳孫皓左夫人死，皓使工匠刻柏木作木人，內冢中以兵衛。”此爲吳時有關柏人的記載。

簡背記云：“建興廿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武威）北所住者”，試以朔日推算，十一月丙申朔應爲晉成帝咸康六年，即西元340年12月6日。晉懷永嘉七年（313）四月壬申，愍帝改元建興。是簡之建興，即晉愍帝年號，其書“建興廿八年”者，武威在西北僻遠，故仍書西晉末年號延長至廿八年。惟其時用建興作年號者又有蜀劉禪及張寔、慕容垂諸政權，均與此無涉，故是簡當爲晉簡。（用鄧文寬說）

是簡所謂“天帝使者合同復重拘校”，似乎與漢代一種迷信所謂“五龍相拘絞”之義有關聯。照簡中所述五木五金五火五水五土，都由鬼作祟，令其時日復重，以構成五方：東甲乙、西庚辛、南丙丁、北壬癸、中戊己之“復”日。這種現象稱之“復重拘校”。按“拘校”一詞，居延簡云“不事拘校”，字亦作拘校，從木。^②《太平經》卷四有云：“故天教吾拘校之也”語見《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人辭訣》。拘校是漢人習語，拘或作鉤，《漢書·陳萬年傳》：“咸皆鉤校”。史晨碑：“鉤河撻維”。亦單言曰鈞。“相拘絞”與“復重拘校”可能是一事。“拘絞”自宜讀作“拘校”。“五龍相拘絞”語見說文解字十四下戊字，文云：

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

向來其義難明。五龍必指五行，段注引《遁甲開山圖》榮氏註云：“五龍治在五方為五行神”及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云“五龍，五行之龍也”。今證以是簡，五龍之即五行，不成問題，故六甲五龍相拘絞，可解作六甲五行相拘校。過去談“六甲五龍說”者多人，若江藩、張文虎、俞樾、黃以周、李錦、高涵和諸家^③，出於晚清經家大師，陳義各異，今不具舉。彼輩以限於資料，無法取得確解。茲從建興是簡證知漢以來，有以五行（五龍）配五方甲乙至戊己（十干）之時日復重拘校”；後此道教徒以為此出於天帝使者合同之譴責行動，當時流行，有“日月時之拘校復重，歲墓年命之復重，五方鬼（魅）行使五行時日之復重一類語言。如是時日拘絞為祟，由於死者六甲之對八魁九坎，東井七星歲時等有所衝犯，可以連類及其親屬，故為施行解除之術，以去其害。

“東井七星”殆指所屬的地域。《漢書·張耳傳》甘公曰：“漢王入關，五星聚東井之時，東井，秦分也”。東井蓋指秦之分野。八魁者，星經下：“八魁九星在北落東南，主獸之官”。《後漢書·蘇竟傳》與劉龔書云：“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依宋均注：八魁為虎、豹、熊、羆、

犀、象、馬、獮”。九坎猶言九地，《禮記·祭法》：“坎壇，祭寒暑也”。《廣雅》：“方澤、大折，祭地也”。盧文弨注：“大折作大坎”。故九坎相當於九地。八魁九坎，年望朔晦，死者犯之，正如觸犯大歲必遭其殃，造成五龍六甲“拘校復重”“互相拘絞”的連帶關係，“拘校復重”的後果，必及於死者親屬。此處“復重”二字，意義正訓為“複重”，乃同義複詞。《廣雅釋詁四》：“復，重也”。《集韻》引《廣雅》作“復、重也”^⑤。會觀是簡，字形實多作“復”。《說文》戌字下“六甲五龍相拘絞”一句，涵義不易明，今證知“拘絞”義同“拘校”，本簡文字可為證明。上說不妨聊備一解。

注 釋

- ① 劉昭瑞：《吐魯番阿斯塔那352號墓方術文書解說》（《文物》1994.9）
- ② 參陳槃：《漢晉遺簡識小》，頁5。
- ③ 見《說文詁林》，頁6571-73。
- ④ 參陳槃《識小》，頁31。
- ⑤ 見《廣雅詁林》，頁293，改復字作復。

簡帛研究評介

評〔日〕堀毅著《秦漢法制史論考》

高 敏（鄭州大學歷史研究所）

由法律出版社於1988年8月出版的日本學者堀毅所著《秦漢法制史論考》一書（以下簡稱堀毅書），近二十八萬字，由《睡虎地秦墓竹簡概要》，《〈漢書·刑法志〉考證》、《秦漢卿官考》、《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考》、《秦漢刑名考》、《秦漢寬刑考》、《秦漢徭役考》、《秦漢盜律考》、《秦漢物價考》、《秦漢賊律考》、《漢律溯源考》、《唐律溯源考》及《秦漢法制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共十三篇從法制史角度研究雲夢秦簡的論文組成，書末附有《有關雲夢秦簡的資料和著述目錄》及作者簡歷。蒙堀毅先生惠贈我一冊，收到之日，立即展誦，頗有感於該書作者對秦漢法制史的一些考證及論述，既有新意，又有疑團。為了促進中日學人之間的文化交流，願撰此書評，既以略抒讀後之感，又以稍示質疑問難之意。如此，定能增進我們之間的真誠的學術友誼！

（一）

評論一部學術著作的質量高低，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看其在材料發掘、研究方法和論證結果等方面，有無超出前人和同時代同行學人已有論著的地方。所謂“超出”指的是在前人及今人研究同一問題的基礎上有所推進、補充、發揮，以及新問題的提出與新領域的開拓等等。祇要在這些方面有其一點或一個側面，就應當承認其為“超出”，不一定要面面俱備，更不能要求新說的完善無缺。事實上很難出現這

樣的創舉。至於行文的風格如何、措辭的優美與否以及敘述的方法是否得當等等，雖然也很重要，但畢竟不是關鍵所在。對通過翻譯而來的外國學者的論著，尤其不應過多的苛求。這就是我在評論堀毅先生論著時所遵循的原則。

用這一原則去衡量，我認為堀毅先生的這一論著，至少有如下一些立意甚新之處：

第一、關於確定重點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新的構思：

我們知道，雲夢秦簡（以下簡稱秦簡）的出土和整理公佈，給戰國和秦漢史的研究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福音。由於其內容的高度原始性、可靠性和豐富性，深為學人所重視。於是利用秦簡探討戰國、秦漢時期各種制度的論文，一時如雨後春筍，形成了“秦簡熱”。但應該指出，秦簡的主要內容是秦律，因而秦簡的主要價值，應當表現在對戰國、秦漢法制史的研究方面。這就是說，充分利用秦簡所提供的新資料，去探討秦律的淵源、秦律的刑名類別和刑罰體系、秦律所反映的立法原則和法制思想、秦律的本質特徵、秦律與漢律的關係以及秦律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的地位等等，才算抓住了秦簡研究的核心問題。這樣才能更好地顯示出秦簡的作用所在和更深入發掘秦簡內涵的巨大價值。然而有1976年秦簡公佈後，研究它的論著雖然不少，卻缺少專門從法制史角度去研究秦簡者，儘管也有一些關於法制史的論文問世，仍顯得有些分散和單薄。直到1985年5月才有栗勁同志的《秦律通論》問世，初步充實了從法制史的角度研究秦簡的單薄。不過，栗著屬於綜合性論著，偏重於把他人的研究成果系統化，又把有關官制與國家職能方面的一些內容收入其中，還不乏空洞的理論闡述，對有關法制史方面的內容卻缺少深入的發掘。這就是說，對秦律的研究仍然是不夠的。因此，從迫切需要加強對秦律的研究着眼，堀毅書可謂真正抓住了核心問題，並能從法制史的角度對秦律中的盜律、賊律、刑名類別、刑罰體系、立法原則、漢律和唐律等同秦律的淵源關係等等方面去論述秦律在中國乃至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得出了李悝《法經》是真實存在的、商鞅制定的《秦法經》直接來源於魏國的李悝《法經》、

蕭何制定的《九章律》基本承於秦律，《漢書·刑法志》刪略了從春秋到秦之前若干法典的編纂過程與情況致使人們懷疑李悝《法經》的存在。魏明帝時修改的舊律有許多地方符合秦律等等有關法制史的結論，從而證明了《晉書·刑法志》所說的中國古代法制史經歷了由李悝《法經》到商鞅《秦法經》，到漢初蕭何《九章律》，再到曹魏明帝太和三年的刑法改革這樣一個一脈相承過程的真實性。因此，堀毅先生的秦簡研究，在確定研究重點方面，確有牢牢抓住秦簡的主要內容，並從法制史的角度去探討秦律內涵的新構思。

第二、關於秦漢刑罰名稱、類別、刑期、刑罰體系和變化發展過程的新見解：

關於秦漢刑名的研究，過去主要是根據《漢舊儀》、《漢書·刑法志》及《史記》、《漢書》的有關注釋。可是，這些材料關於秦漢刑名的記載既在刑期方面有矛盾，又在諸刑名的含義方面有不同理解。特別是由於秦律的散佚，使人們祇能依據《漢律》去推斷秦律，或者竟把《漢舊儀》中所說《秦制》云云當作秦律的真實情況，以致陷於矛盾重重之中而不能自拔。於是，各依據自己的理解去作解釋，從而產生了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狀況。例如《漢舊儀》把秦制的“髡鉗城旦、舂”說成五歲刑，“完城旦、舂”為四歲刑，“鬼薪、白粲”為三歲刑，“司寇”為二歲刑，“戍罰作”與“復作”均為一歲到三月刑；而《史記·秦始皇本紀》如淳注及《漢書·惠帝紀》應劭注，都認為“髡鉗城旦、舂”為四歲刑；關於“完城旦、舂”，《周禮·秋官·掌戮》鄭司農注及《北堂書鈔·刑法部·刑徒》均作三歲刑；今人則有據秦簡而謂秦的刑徒無刑期者。又《漢舊儀》所載“秦制”中無“隸臣妾”刑名，《漢書·刑法志》才第一次出現此刑名。在秦漢刑徒服勞役方面，傳統的解釋都認為每一種刑徒的勞役內涵是固定的，如“城旦”築城，“舂”舂米，“鬼薪”取薪，“白粲”擇米，“司寇”監視盜賊與邊寇，“戍罰作”即“戍罰”，意為戍邊，“復作”為女徒作於官府。至於“髡鉗”、“完”是附加在各類刑名之上的附加刑，在《漢舊儀》所載及《漢書·刑法志》中均不見附加肉刑

如斬趾、黥、劓刑等上述各種刑名之上者，而秦簡所見律文卻有之。這都反映《漢舊儀》所云“秦制”與秦簡中秦律之矛盾。

如何解釋上述各種矛盾看法呢？

堀毅氏的辦法是這樣：首先，他從整理秦簡中的刑名入手，找出秦簡中存在“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候”等五種勞役刑刑名。他之所以判定“隸臣妾”為勞役刑刑名，是因為《法律問答》“何謂家罪”條有“有收當耐未斷，以當刑隸臣罪誣告人，是謂當刑隸臣”的話，同《法律問答》“當刑為城旦”的提法相同，表明“隸臣妾”是刑名。（關於隸臣妾的說法，仍有可疑處，詳見後文。）這樣，既糾正了傳統舊說認為秦不存在“隸臣妾”刑名的說法，也暴露出《漢舊儀》所云“秦制”之可疑。其次，他又把見於秦律中的刑名主刑部份（即勞役刑部份）同附加的肉刑部份加以區分，發現見於秦律中的“城旦、舂”刑徒有附加“斬左趾”、“刑”、“黥”、“黥劓”等肉刑者，卻無附加“髡”、“髡鉗”等刑者，反之，却屢見“城旦、舂”刑名前附另“完刑者：並揭示出肉刑僅科於城旦、舂、鬼薪、白粲而不及於司寇與候的規律，還推斷出秦有斬左趾的肉刑。這既說明秦的“隸臣妾”以上勞役刑刑徒多存在勞役刑之外處以肉刑者，又表明“髡”、“髡鉗”和“完”等附加於勞役刑刑罰，是保全其軀體完整而施加的輕刑，還說明了《漢舊儀》中的“城旦、舂”刑徒之所以無“斬左趾”、“黥”、“黥劓”等附加肉刑的刑名，是因為免除了肉刑的原故，從而進一步暴露出《漢舊儀》所云“秦制”，並非秦制而是漢制。再次，堀毅氏又把秦律中所載諸勞役刑刑名同《漢書·刑法志》所載勞役刑刑名比較，發現《漢志》所載是西漢文帝實行刑法改革前的肉刑名稱，有“斬右趾”、“斬左趾”、“劓”、“黥”等，同秦律附加於勞役刑“城旦、舂”刑徒的肉刑名稱相同；反之，卻同改革後的加於勞役刑的笞刑完全不同，這就表明西漢文帝實行刑法改革前的刑名與刑罰，是直接導源於秦律的；由於文帝刑罰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肉刑和代以笞刑，因而形成了同秦律刑名、刑罰的差異。這樣，堀毅氏便得出了《漢律》存在着文帝改革前的《漢舊律》

與改革後的《漢新律》兩個刑罰體系與兩個發展階段的結論。其四，堀毅又以《舊漢儀》所載“秦制”中的刑名、刑罰同《漢舊律》及《漢新律》中的刑名與刑罰比較，發現《漢舊儀》所載除笞刑外，均與《漢志》所載《漢新律》基本一致。從而得出了《漢舊律》所載勞役刑的刑名與刑期，均為文帝改革後之制。這樣一來，《漢舊儀》所載刑名、刑期、刑罰都不是“秦制”，而是漢制，且是文帝改革後之制，從而使基於此而產生的一系列矛盾迎刃而解，這不能不是堀毅氏的一個重大發現。此外，堀毅氏還闡明了如下一些概念：“完刑”的“完”，意為剃光頭髮，其意與髡刑相同；完刑同耐刑有區別，耐刑是剃光鬚鬢且不與城旦、舂并科使用，祇同鬼薪以下勞役刑并科使用；秦律中的耐刑不是單指刑名，是附加刑，但到了晉以後及南北朝，便變成了一個固定的刑名；在秦律中，完刑祇限與城旦、舂并科使用；當時設置完、耐兩種刑罰，是為了把“城旦、舂”同“鬼薪”以下囚犯區分開來；秦律中的贖刑，取“贖加刑名”的形態，所要贖的是原來應該科處的刑罰，包括耐罪以上的肉刑在內，但從漢律開始，“贖刑便變成了一個固定的刑名；秦的刑徒是有刑期的，而且推斷城旦、舂刑徒的刑期為六年（詳見堀書168—至170頁及316頁注⑥）；在秦律及《漢舊律》中的“鬼薪、白粲”勞役刑，是祇適用於有爵二級以上者的特殊性刑罰，到《漢新律》中便變為了包括庶人在內的三年勞役刑的刑名。儘管這些新的看法，有的還值得進一步推敲，但他這種處處從法制史的角度來闡明刑名、刑期、刑罰等的含義及其變化發展的作法是值得重視的。

第三、關於秦、漢律中的立法原則和法制思想方面的新見解：

過去法制史的研究者，無不認為秦律是無比殘酷的，體現了法家治法思想的輕罪懲罰原則。秦簡出土以後，也無不以秦律內容去論證秦法的殘酷性。但堀毅氏却與眾不同，他除揭露秦法殘酷性一面外，還較多地論述了秦律的合理性和寬刑主義思想等。如：他在《秦漢盜律考》與《秦漢賊律考》二文中，弄清了“盜罪”與“貲罪”的關係，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貲二甲”是秦律中“貲罪”的最高級

別：級別低於“耐隸臣妾”“耐司寇”與“耐侯”等勞役刑，同“貲二甲”以下的各級貲刑，是作為二個刑法系統同時並存的，盜賊的數量與刑罰的輕重是相應的，同貲罰的多少也是對應的，其對應關係為：盜一錢未滿者貲一盾，盜百錢者貲二甲，盜百錢以上者耐為隸臣、妾，盜二百二十錢以上者完城旦、舂，盜六百六十錢以上者縣城旦、舂。他還發現了秦律中犯有幾項刑罪的罪犯，採取“二罪從重”的基本原則，而且這一立法原則為《唐律》所繼承，並獲得了發展。他又指出了秦律中存在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同害刑思想。因此，“秦律”實際上並不像《史記》及《漢書》等史書所說的那樣嚴酷，而且在罪刑法定方面的完備程度堪與唐律相媲美。”（336頁）；特別是秦律中包含了對“幼少者”、“老者”、“有疾者”和“婦女”在量刑輕重、從事勞役的強度和服刑時是否帶刑具等方面都有從輕從寬的原則，表現出敬老主義、保護婦女與兒童及“公癰”即因公致殘者的立法原則與精神，堀毅氏特稱之為“寬刑主義”思想，從而更顯示出秦律的合理性與非殘酷性的一面。對於秦律的非殘酷性一面，堀毅氏認為主要是秦始皇三十四年以後逐漸增加的。所有這些觀點，對於我們進一步探討秦律的合理性是會有幫助的。我曾經撰寫了《見於〈秦律〉中的訴訟、審訊與量刑制度》（收入《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中）及《試論秦的經濟立法原則及其意義》（刊《學術研究》1986年第二期）等文，也企圖探討秦律的合理性，讀堀毅先生的有關論文後，更覺有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的必要。

此外，堀毅先生還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即因鬪毆致傷他人顏面及鬚髮，要處以特別重的刑罰。如《法律問答》中關於“士伍甲鬪，拔劍伐，斬人髮結，何論？當完城旦”，便是例證。為什麼要處以重刑呢？堀毅氏認為，因為是傷了他人的“面目”，要影響到他人的面子，而“當時能否保存體面甚至關係到其整個人格”（頁319）。所以秦律中對此特別要科以重刑。如果結合秦律中關於髡刑、耐刑、完刑等刑罰名目及其變化來看，更可見能否保全形體的完整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明乎此，對“面子”一詞的由來以及秦漢時期的社會

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狀況，都可以由此得到許多啟示。

第四、關於秦漢戶籍制度的新見解：

關於秦漢時期的戶籍制度，堀毅氏並無專文，但他在《秦漢刑名考》一文中卻論及了秦漢戶籍制度的“八月案比”之制及以年齡作為衡量大、小的基礎這一制度的形成過程等問題。

我們知道，關於漢代常以八月案比戶口（即以每年八月調查、登記戶口）的制度始於何時的問題，在過去基本上沒有弄明白。《漢書·高帝紀》四年（前203年）條，雖有“八月初為算賦”的記載，但無法斷定“八月案比”之制是否也始於此時。又登記戶口是為了徵收賦稅、徵發徭役和兵役，這必然要涉及到役年與納稅的年齡標準問題，那麼以年齡計算大小的基準制度又始於何時呢？為了解決這些長期疑而未決的問題，堀毅先生的考證提出了斬新的看法。他根據秦律中對於細小者實行寬刑措施的各種表現，證明秦時確定成年與未成年即大與小的標準，不是年齡而是身高。並根據《法律問答》的若干簡文，證明六尺是秦律中區分大與小的基準。但當他考慮漢律中的對幼小者與老者實行寬刑措施的各種表現時，卻發現不再以身高為準則，而是以年齡的大小為標準去區分大小長幼。於是，他得出這樣的結論：秦和西漢用於區別成年與未成年的標準有一個由身高為基準到以年齡為基準的變化發展過程。至於這個變化始於何時？堀氏又作了巧妙的回答：他根據《史記·秦本紀》中的秦王政“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及秦簡《編年記》中“（秦王政）十六年……自占年”兩條記載，確證此年始有令男子登記年齡的事。接着他又以《秦律十八種》關於“小隸臣妾以八月傅為大隸臣妾，以十月益食”的規定，斷定書年之事也在這年八月，意即是漢制“八月案比”的淵源。但尚不足以證明成年的年齡標準到底是多少歲，於是，他又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條《集解》引徐廣語作了新解。徐廣曰：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有實田”。本來《史記》正文該年無事迹，是空白，祇有徐廣作了這麼一個注才填補了這一年的空白。徐廣的根據是什麼，已無從得知。堀毅氏認為徐廣的這個注十分寶貴，因為這年的“使黔首有實田”是為徵收租稅

從秦王政十六年到始皇三十一年，恰恰爲十五年。假定“有實田”也是三十一年八月，那麼始皇十六年的出生並開始登記年齡的人，到這年已十五歲，要他們從這年起“有實田”即開始納稅“就成爲可能了”。通過了這番廣泛的聯繫與論證之後，他得出了這樣的最後結論：秦漢時代的八月案比與十五歲成年的戶口調查制度的建立，經歷了秦王政十六年八月前的“舊制度時代”（即以身高爲大小的時代）；秦王政十六年八月到始皇三十一年八月前“爲向新制度發展的準備時期”；以及從始皇三十一年八月後到秦末“爲向新制度轉變時期”這樣三個階段。堀毅氏的這一看法，雖然還存在一些假設的成分，並不完全是無懈可擊的，但其聯想的豐富和推論的新穎，確是令人驚奇的，無疑可以促使人們去繼續思考這些問題。

第五、關於秦漢物價問題的新見解：

過去研究秦漢物價者，大都未能充分重視《九章算術》一書，更未真正將這部書作爲基本史料加以利用。究其原因，一是不明此書的成書年代；二是書中所載的物價與見於正史中的物價差距甚遠。堀毅氏則將見於秦簡中的戰國和秦的物價，同《九章算術》中的物價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特別是通過秦律關於盜、賊罪的贓值例證及官府廩衣食時所涉及的物價，推算出戰國和秦的物價狀況表。然後，分別以此表同《九章算術》的物價及秦代史料中所見物價分別比較，從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九章算術”是與秦律同時代的書，因爲兩者所列物價基本相同或相差不多。因而《九章算術》，不僅是一部數學書，同時也是一部了解戰國和秦的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寶貴文獻。反之，由於《九章算術》中所反映的物價，同漢代史籍中的物價記錄相差很大，表明它反映的不是漢代的物價。與此同時，堀毅氏還把見於漢代史料中的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同《九章算術》所反映的戰國和秦的勞動者收入進行比較，從而發現漢代勞動者的勞動收入，較戰國和秦時收入高十倍；而漢代的粟價祇比戰國和秦高三倍，漢代馬、牛、羊等畜類價格祇比戰國和秦高一至三倍。這說明漢代勞動者的勞動收入增長幅度大於物價上漲幅度，反映出漢代人們的衣食之資較戰國和秦遠爲豐

富，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獲得了提高。這祇能是漢代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大大超過戰國和秦時纔能出現的。基於此，漢代人口之迅速增長到5900萬，為以後十個世紀中所未曾達到的高度，都與漢代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們生活的改善有關係。堀毅先生從秦漢的物價研究入手，最後順理成章地得出如此重要的結論與推斷，不能不說這是獨具匠心的表現。

此外，在秦漢鄉官研究中，堀毅先生也提出了不少頗具新意的見解。例如他從見於《漢書·百官表》的秦漢鄉官的名稱與職掌等情況卻均不見於秦簡的事實出發，得出了戰國和秦沒有“鄉嗇夫”，祇有縣級嗇夫、漢代的鄉嗇夫及鄉三老等鄉官始於漢高祖二年和漢代縣級嗇夫官制已經消失等結論。而這些變化產生的原因，堀毅氏認為：戰國和秦時其所以縣級機構中有各式各樣的嗇夫官，是為了執行《倉律》、《司空律》、《工律》、《廐苑律》、《田律》等法規的需要而設立的；到了漢代之所以不存在縣級嗇夫官，則是由於漢初《九章律》形成後，許多有關的事律被合併入了興、廐、戶三律中，有關嗇夫官的職掌也相應地併入了列曹，故無須另設縣嗇夫系統。七十年代末，我曾從漢代國有經濟系統的削弱方面去闡明漢代取締縣級嗇夫的原因（詳見拙著《雲夢秦簡初探》增訂本中《論〈秦律〉的“嗇夫”一官》），見堀毅氏之說後，允其發掘之深。餘不悉舉。

（二）

堀毅先生之所以能從衆所周知的秦簡及現存的史料中得出上述一系列新的看法，並使秦簡的研究有所推進，應當說同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密切的關係。概括起來，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集中表現為比較法、統計法、表解法和數學計算法的有機結合和靈活運用，這使一些很難獲得數量觀念的問題，也能用數量去表示，從而引導出新的結論。

以比較法來說，其方式也是多式多樣的。有縱比法，如以秦律同《尚書·呂刑》等先秦典籍中的刑罰制度比，同《漢律》、《晉律》、

及《唐律》等比，用以發現中國古代刑罰制度的繼承與演變狀況。有橫比法，如以秦律的盜同賊律比，以盜律中的不同部份相互比，以賊律中的不同部份相互比，以發現其異同，從而總結出原則和尋繹出規律來。研究秦律是如此，考察秦漢物價時也是如此。例如堀毅氏之判定《九章算術》成書的時間應與秦簡同時，便是用此書所反映出來的物價同秦簡所反映出來的物價的比較並發現其基本一致以後得出的。他所發現的漢代勞動者的勞動收入高於戰國和秦時的勞動者的勞動收入，也同樣是通過比較而來的。至於他斷定秦簡《編年記》的性質與作者時，更是把《編年記》中措辭的語法結構、用詞特點進行比較後纔作出的結論。因此，可以這樣說，堀毅氏的每一篇目，都充滿了比較研究法的範例。

堀毅氏比較研究法的運用靈活和得當，而且能得出人們意料之外好結果，還在於他的比較研究法同統計法、表解法與數學計算法等方法同時使用。

以統計法與表解法的運用來說，據我不完全的統計，見於堀毅氏書中的表解不下52個之多，而且他每作一個統計表或運用一次表解法，都是為其比較法的運用而服務的，也是為了把複雜的關係簡單化和條理化、為了揭示某種事物的關聯而運用的。至於統計與表解的具體作法，也無一定格式，視論文、論點的需要而定，他需要突出什麼和需要瞭解什麼，就以什麼為中心而設計出表解的項目與格式；同一性質的史料，他可以根據其需要和重點的不同而作出各種方式的表解。例如同是運用秦律的有關規定作為依據，當他要揭示各種事律如《倉律》、《工律》、《田律》、《廄苑律》及《徭律》等同不同的執行官吏之間的關係時，就列出了《秦律十八種及其担当官》的表解（見頁111至頁112）；當他要瞭解見於秦律中的秦代勞役刑的類別及其同肉刑、完刑與耐刑等的關係時，就繪製了《秦代勞役刑》表（見頁162）；當他要瞭解秦律中的贖刑同罪犯的身份、爵位的關係時，便製出了《身份、爵位和贖刑的關係》表（見頁166）；當他要弄清秦律中諸刑名同贖錢多少的對應關係時，便列出了《刑名和贖錢的關係》表（見頁168）；當他要明白秦律中的盜罪與刑罰的輕重關係時，他製出了《秦

律中盜罪與刑罰》表（見頁248），當他要瞭解秦律中耐刑的含義的變化時，便繪製了《刑罰從秦到到隋的變遷》表（見頁164），闡明了東漢和晉以後耐刑成了勞役刑的通稱的變化過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表解的主體都是秦律，而每一表解的目的與重點都不相同，充分反映出對同一史料進行表解的方式的多樣性。

至於統計、表解、與數學計算方法的結合使用，他在關於秦漢物價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他為了要弄清《九章算術》中所反映的物價屬什麼時期，便先分別將見於漢代史料中的物價，按穀類、六畜和布帛類的各種不同品種與時代列出來，並分別計算出它們的單價，再把見於《九章算術》中的同類同品種的各種產品表列出來，也同樣計算出它們的單價，然後將二者列於一總表中分別進行比較。這樣，兩者的價格差別便一目瞭然。關於秦簡中的物價與《九章算術》中的物價比較表，也按同樣方法計算與繪製。不過，為了計算秦簡中的物價，他不得不借助秦律中關於盜賊與貨罰數量的多少的關係去發現線索，並用數學的方法計算出秦的物價來。因此，在這裏計算的方法就顯得更為重要。除此之外，還有粟與米的換算方法；又由於米有糯米、稗米等的不同，它們同粟穀之間的換算率又各有不同，因而更需要運用計算的方法，否則，他的統計、表解便無法進行。正因為他正確地運用了計算方法，計算出了見於秦簡中的各類主要物品的大致單價，便為他同見於《九章算術》中的物價及漢代史料中物價的比較創造了條件，從而使他一系列有數量根據的結論便隨之而產生了。由此可見，他的一些有新意的結論之所以能夠得出，實同他的統計、表解法同計算方法的結合運用有密切的關係。

分析、假設和必要的推理方法，在堀毅氏的書中也時有反映。特別是分析的方法，他的每一統計的完成和每一表解的繪製，都是在分析的基礎上作出的。離開表解，也會使統計和表解失去目的性而成為畫蛇添足的東西。至於假設和推理，也是堀毅氏在分析過程中經常使用的方法，例如他在編製秦漢時的勞役刑以上刑名的比較表時，“預先把《漢舊儀》假定為文帝以後的制度”，以之同秦律、《漢書·刑

法志》的舊規定及新規定相比較（見頁180），通過比較就證實了他的假定是正確的，因為在幾者的比較中，反映出一個合乎規律的逐步演變過程來。同樣的假定，在論證過程中曾多次出現，而且大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由此可見，在分析基礎上的假設和合乎邏輯的推理，在研究問題的過程中，也是不能絕對排除的。

如上所述，堀毅氏書中所體現的研究論方法，也是值得重視的和可以借鑒的。

（三）

當然，堀毅書也同任何一部成功的著作一樣，有其不足之處和可疑的地方。茲就鄙見所及，略舉數端，以之求教：

第一、該書內容在質量上存在不平衡性：

全書共收論文十三篇，其中大部份論文有如上所述的新見解，但也有個別論文，並未提出什麼新問題，也沒有解決什麼老問題，比較明顯的例證，我認為《秦漢徭役考》一文即屬之。

此文僅僅對秦簡出土前日本史學界根據《漢舊儀》所載研究秦漢徭役制度時得出的一些結論進行了評述。至於作者本人，並沒有從秦簡中發掘出有關秦的徭役的內涵和以之論述秦漢的徭役制度。然而，秦簡中關於徭役制度的內容是不少的，拙文《秦漢徭役制度》（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對此已經作了一些發掘，而堀毅氏未能察覺，因而給人以發掘不深之感。作者在此文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如對“士伍”身份的認識與爵位是否可以世襲等問題，則是中國學者言之鑿鑿的問題，而堀毅氏既未加以引述，又未提出這些人的看法，反之只是在日本學者的觀點中打圈子，好像中國學者無人探討似的，這未免不符合事實，故顯得引述不如其他論文宏博。如果說此文也有新見解的話，那就是對中國傳統的說法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漢舊儀》所說的“年五十六免”的話，不是指免除刑罰，而是指免除徭役，因而應以五十六歲為老免的年齡上限。他之所以如此認為，是因為五十六

歲老免的年齡的規定有其醫學上的根據，具有合理性。他的根據是《四部叢刊正編》唐王冰注本卷24所載《黃帝內經》的《上古天真論篇》中的下述記載：“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這裏的“七八”之年，堀毅氏認為就是五十六歲。因而他認為他得到了中國古代以五十六歲為中國老免年齡上限的“醫學上的佐證”，並使他“窺見（了）當時醫學進步的足跡，並得知其成果已經出現在公法上的情況”（頁228）這樣的結論和引伸，未免顯得根據不足，給人以個人想象代替事實的印象。象這樣的見解，新則新矣，但未必可靠！同樣的“新見解”還不少，此不悉舉。

第二、堀毅書中有些觀點，還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略舉數例如下：

例一、關於秦的勞役刑刑期的計算問題：

堀毅氏認為秦的“城旦、舂”“鬼薪、白粲”、“隸臣、妾”、“司寇”及“候”等勞役刑刑名，都是有刑期的。單就秦的刑徒有刑期這一點來說，我個人是贊同的，且早已有所論述，詳見拙著《雲夢秦簡初探》及其增訂本中的《從出土〈秦律〉看秦的奴隸制殘餘》及《關於〈秦律〉的“隸臣妾”問題質疑》等文，且推算出“城旦、舂”的刑期為六歲和“司寇”的刑期比“城旦、舂”少三歲等，此不贅述。但堀毅先生却推算出秦的“城旦、舂”刑期為三十年。他是怎樣推算出來的呢？他推算的唯一依據就是《法律問答》中的如下一條簡文：“當貨者，沒錢五千而失之，何論？當辟。”在他看來，“當貨者”的刑罪同“沒錢五千而失之”的刑罰是相等的。因而他得出“貨一盾”等於罰錢五千的結論，從而為他作出貨盾、甲的數量同罰錢多少之間存在着對應關係的結論提供了依據。然後，他又依據秦的《司空律》關於以服勞役償債、償罰款和贖刑罪時的“日居八錢”及給“居貨償債者歸農、種時，治苗時各二旬”等規定，計算出每一個服勞役贖刑罰的人，每年實際服勞役祇有三百二十五天。再以此天數乘以八錢，即得每人一年的贖錢額為二千六百，即等於“貨一盾”的罰款數額的

一半。換言之，“貨一盾”的金額，等於服勞役兩年的金額。於是從貨盾的多少，就可以推算出一系列的不同金額和折合成不同的服勞役的年數來。推算至此，他又遇到了一個問題，即秦簡中有無“貨二盾”的刑罰呢？“貨一盾”與“貨一甲”之間的比例關係如何呢？依據他的考證，盜賊值大於一錢和小於二十二錢的罪犯，定罪時，應“貨二盾”；盜賊值大於二十二錢和小於六十六錢者，應“貨一甲”；盜賊值大於六十六錢而小於百一十錢者，應“貨二甲”（見頁266表解）。於是“貨一盾”、“貨二盾”、“貨一甲”與“貨二甲”這個貨罰輕重的順序便排列出來了，隨之而來的便得出了相當於罰款五千、一萬、二萬、四萬、八萬這個等比級數的順序也排列出來了，從而折合服勞役刑的年限分別為二年、四年、八年、及十五年或十六年、三十年的刑期差別也推算出來了（見頁266表解）。這就是說，“貨二盾”的貨罪實例，根本不見於秦簡，因而“貨二盾”相當於貨錢一萬及相當於服勞役刑四年等看法，都是憑他一系列的假定推算出來的。至於“貨二甲”的例證，雖見秦簡，卻祇有“司寇盜百一十錢，先自告，何論？當耐為臣妾，或曰貨二甲”（見《法律問答》）一例，從這裏也看不出“貨二甲”與“貨一盾”、“貨二盾”之間比例關係來。因此，堀毅氏的“貨一甲”為“貨二盾”的兩倍和“貨一盾”的四倍等說法，也是在秦簡中找不到例證的。這就是說，關於“貨盾”與“貨甲”之間的錢值與服勞役長短的比例關係，都是堀毅氏主觀想象出來的。因而這一系列的推算，其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

更有甚者，他所賴以作出上述一系列推算的史料基礎的理解也有錯誤。如前所述，他作出上述一系列推算的史料基礎是《法律問答》的“當貨盾，沒錢五千失之，何論？當辭”等語。他從這裏獲得了貨一盾等於罰款五千的這個數據。實則《法律問答》此條不能作如此理解。此簡文是說對一個應判罰一盾的犯人，祇判處沒收其錢財五千，法律認為是“失刑”，即判處不當，判者當受到申斥。總之，這條《法律問答》的內容，是針對審判者講的，不是針對犯人講的。從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出：“當貨盾”的刑罰要比沒錢五千嚴重，否則不能叫“失

之”，也不應當受到申斥。這就是說，“當貨旨”的錢值要大於五十錢。既然這個前提發生了動搖，那麼，堀毅氏據以作出的一系列推算，自然就是建立在沙灘上的樓閣。

堀毅氏在計算過程中的又一根據，即《法律問答》關於“司寇盜百一十錢，先自告，何論？當耐爲隸臣，或貨二甲”。對此條的理解，也多少有些問題。此簡是說當一個犯有司寇罪的犯人又犯了盜人百一十錢的罪，在自首了以後應當如何處理，有兩種意見：一是“耐爲隸臣”，一是判以“貨二甲”的貨罪。此條法律的總精神有從寬處理的意思，因為犯罪人原是輕刑“司寇”，又係自首。因此，對此處之“或耐爲臣妾”與“或曰貨二甲”的關係，存在兩種可能：一是二者是相等的，即“耐爲臣妾”等於“貨二甲”，堀毅氏正是這樣理解的；二是二者不相等，即“貨二甲”輕於“耐爲臣妾”，才能體現從寬之意。從情理推斷，應當是後者居多，可是，堀毅氏在找不到其旁證的情況下，就斷定二者是相等的，並以之去作計算“隸臣妾”以上勞役刑刑期的依據，從而得出了“隸臣妾”刑期爲十五年及“城旦、舂”刑期爲三十年等結論，未免有武斷之嫌！

實際上，對依據上述根據及推算方法計算出來的“城旦、舂”刑期爲三十年之說，連他自己也感到太長，有些說不過去。於是，他又杜撰了一個李悝、商鞅條以“五口人家爲前提計算刑期”（頁170）的新理論，意即所判之勞役刑，是科於五口之家這個整體的，即每人分攤爲六年，因而“城旦、舂”的實際刑期爲六年的說法便出來了。以這種杜撰出來的理論去企圖解決矛盾，實際上是等於自我麻煩。人們不禁要問：司寇的刑期爲八年，“隸臣妾”的刑期爲十五、六年，又如何分攤呢？“城旦、舂”的刑期爲三十年，按五口之家分攤，每人六年，實際服勞役時是一人去服役還是五人輪流呢？五人服勞役的總年數是六年還是三十年呢？所有這些問題，堀毅氏都沒有回答，事實上也不可能回答，因為都是子虛烏有的事。

例二、關於“盜十錢”的貨罰爲“貨二甲”的推算問題：

堀毅氏在分析秦律中的盜賊值的多少與貨罰輕重的關係時，首先，

他從《法律問答》的“甲盜不盈一錢，行乙室，乙弗覺，問乙何論也？毋論。其見知之而弗捕，當貲一盾”的規定中，找到了“‘凡人盜不盈一錢’法定刑的重要綫索”（頁249），再結合“甲盜”，贓值千錢，乙知其盜，受分贓不盈一錢，問乙何論？同論”的規定，得知“甲盜不盈一錢”的貲一盾。其次，他又按照同樣的方法，從《法律問答》中分別找出了盜百錢的貲罰為貲二甲，盜百十錢以上的刑罰為耐隸臣，盜二百二十錢以上的刑罰為完城旦、舂，盜六百六十錢以上的刑罰為黥城旦、舂（見頁260）。儘管在這些過程中，堀毅氏利用了不屬於盜律的囚律及《效律》中的一些法規作為旁證，還算是可以自圓其說。但是，到了第三步，當他推算一錢與十錢的刑罰為“貲二盾”這種對應關係時，就越來越顯得根據不足了。他論證的辦法是這樣：首先他假定秦律應當存在“貲二盾”這個刑罪等級；其次，又把僅見於《秦律雜抄》中的唯一的一條關於“貲二盾”的法規普遍化，實際上這條法律根本與盜律無關；其三，進而又假定李悝《法經》本有“貲二盾”的等級，是商鞅把它改變了，或是由於簡化司法手續將“貲二盾”并入“貲一盾”、或是秦始皇時期仍把“貲二盾”的等級取消了等等理由，去解釋秦律中根本不見“貲二盾”等級的原因；最後，還不得不借助於日人古賀登先生發現的“所謂古代中國人特有的分割法這種思維方式”（見頁262）再加上他自己“不揣冒昧認為當時的盜贓值是同時並用了分割法和乘加法這兩種方式”（見頁263）計算出來的假設。計算的結果，得出了一百一十錢、二百二十錢、六百六十錢等等數值，與秦律中的二十二錢、三十三錢、五十五錢、六十六錢等同十一成倍數的一系列數字表述法相似，於是，他就認為這是“可以確認戰國到秦時的一個數理原則”（見頁265），從而求出多於一錢和少於二十二錢的刑罪等級為“貲二盾”，“盜一錢與十錢”恰是包含在這個段落內，因而也是“貲二盾”。於是，一個完整的盜贓值與刑罰對應關係的體系便宣告確立起來了。試問這種依靠假設之上加假設、推理之上加推理得出來的結論，能靠得住嗎？實際上，秦律中所以常見二十二、三十三、四十四、五十五、六十六、一百一十、二百二十、

六百六十等等與十一成倍的數字，並不是什麼按照分割法和乘加法得出來的，而是爲《金布律》所規定的：“錢十一當一布”這個錢幣與布幣的比值所決定的。至於秦律中之所以不見“貲二盾”的刑罰例證，是由於出土秦律並非完整秦律之故。因此堀毅氏刻意求深的作法，其結果是反而失之。

例三、關於秦律中的“完刑”祇限科於“城旦、舂”的問題：

堀毅在研究秦律勞役刑刑名時，首先，將見於秦律的勞役刑刑名及附加刑作一統計表（見頁262表二）。在表中，祇見“城旦、舂”有附加刑者；其次，他又着重指出：“完刑祇限與城旦、舂并科使用；耐刑不與城旦、舂并科使用，而與鬼薪以下的各種勞役刑并科使用”；又說：“完刑是專門和城旦、舂并科使用”的，目的是爲“了從外觀上把城旦、舂和鬼薪以下的囚犯區分開來，而設立了完、耐兩種刑。”（見頁162—163）但是，在《法律問答》中有這樣一條簡文：“女子爲隸臣妾，有子焉，今隸臣死，女子比其子，以非隸臣子也，問女子何論也？或黥顏爲隸臣妾，或曰完，完之當也。”這是說，當隸臣之妻犯有將隸臣之子從家中分出而否定其爲隸臣之子時，有的認爲應該在隸臣妾的額部顴部刺墨作爲隸妾，有的則認爲應處以完刑，即完爲隸妾，不要“黥顏爲隸妾”，官府的回答是：“完之當也”，即完爲隸妾是妥當的。由此可見，對隸妾有處以完刑的法律規定，豈不證明完刑並不限於同城旦、舂并科使用嗎？堀毅先生又認爲隸臣妾是比鬼薪低一級的勞役刑刑名，豈不是鬼薪以下的囚犯也同樣可以并科“完刑”嗎？這說明堀毅氏完刑祇限同城旦、舂并科說值得懷疑。

不僅如此，而且在這個問題上還反映堀毅看法的有相矛盾之處。他曾說：“按當時的習慣，祇有一個完字就意味着指完城旦、舂等國家法定的刑罰觀念”。（見頁179）這裏說“城旦、舂”等，就表明完刑並非祇限同城旦、舂并科使用，從而表現出自己論斷的前後矛盾。

第三、也有個別觀點證據不足，或有相矛盾：

例一、關於隸臣、妾爲刑徒的問題：

堀毅氏認爲秦簡中的“隸臣妾”爲刑徒，不是官府的奴隸。但是，

對這樣一個如他自己所說的“引起研究者極大興趣，寫出了許多專著”的重大問題，卻沒有舉出更多的證據去證明“隸臣妾”是刑徒而不是官府的奴隸。他祇是說：“在過去的研究中，有的認為是刑徒，有的認為是官奴婢；我理解秦律中的隸臣妾不是刑徒之外的什麼。”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在他所作的《秦漢的刑名》表中，“從‘斬右趾城旦、舂’以下到‘耐候’，都處在一個完整的刑罰體系之下，隸臣妾是完城旦舂減一等的刑。並且，和城旦並不一定意味着‘築城’，司寇並不一定意味着‘監察盜寇和邊寇’一樣，隸臣妾也不能理解具有特殊的含義”。（均見頁175）換言之，堀毅氏認為隸臣妾不是官奴婢而是刑徒，有兩條理由：一是“隸臣妾”的名稱同“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等處在一個完整的刑罰系統之中，二是“隸臣妾”同“城旦、舂”、“鬼薪、白粲”及“司寇”一樣也要服勞役。其實，這兩條理由都是可疑的。關於“隸臣妾”的名稱在秦律中處在一個完整體系中的問題，秦律本身並未如此說。“隸臣妾”與“城旦、舂”、“鬼薪、白粲”、“司寇”等之作爲刑名，見於《漢書·刑法志》。可見這是漢代的情況，並不等於秦時的“隸臣妾”也是刑名。人們之所以把秦的“隸臣妾”也當作刑名，正是受了《漢志》這個先人之見的影響，以漢制去推斷秦制所致。因此，說“隸臣妾”是處在秦時刑罰體系之下的說法，本來是沒有根據的。至於說“隸臣妾”也同“城旦舂”“鬼薪、白粲”及“司寇”等刑徒一樣要服勞役，這是由於它的奴隸身份決定的，所以在爲官府服勞役這點上，“隸臣妾”與刑徒無異。因此，第二個理由也不能證明“隸臣妾”是刑徒而非奴隸。反之，如果認為“隸臣妾”是刑徒而不是奴隸，倒有許多問題不好解釋：一是刑徒有刑期，這是堀毅氏也承認的，但“隸臣妾”的身份卻需要通過取贖才能解除，這是屢見於秦簡的事實，可見“隸臣妾”的服役是無期的，祇有奴隸身份纔能與之相應。二是秦時確實存在奴隸身份的人，男性叫做臣，女性叫做妾，連堀毅氏也承認“臣妾”的身份是奴隸，即使是“隸臣妾”名稱的由來，也與此有關。（見頁182）而且在秦簡中，凡所見“臣妾”都是私家的，是私人所有的奴隸。那

麼，與之相對，稱呼屬於官府的奴隸為“隸臣妾”，應當說是順理成章的。但堀毅氏不承認這一點，並說，“隸臣妾”作為刑名的本義，不外是“隸於臣妾”，“臣妾”既是奴隸，則“隸於臣妾”，便是屬於奴隸的意思，何能又說“隸臣妾”不是奴隸呢？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三是“隸臣妾”的來源是多式多樣的，有由戰俘而來的，有用錢買來的，如《告臣》爰書中就有私家賣奴隸給官府的例證；有奴隸的子女，如《法律問答》中某隸臣之妻因為不承認其子為隸臣子而受到“完為隸妾”的處分，便是例證；當然也有由罪犯及其家被籍沒而來的，祇有這種“隸臣妾”，同刑徒更為相似。而刑徒祇有一種來源，就是罪犯。然則怎能把“隸臣妾”混同於刑徒呢？四是“隸臣妾”既可以通過買賣而獲得，如果是刑徒，怎麼可以用錢買刑徒來服勞役呢？五是刑徒的名稱，一般都有同其刑罰相關聯的固定勞役內容，如最重的“城旦、舂”刑徒，便是固定從事“築城”和舂米勞役的；“鬼薪、白粲”，便是固定從事拾柴、擇米勞役的，唯獨有“隸臣妾”在先秦文獻中，無從事固定勞動的記載；在秦簡中，也同樣沒有從事固定勞役的規定。如果“隸臣妾”是刑徒，這又怎麼解釋呢？堀毅氏之所以提出“城旦並不意味着築城，司寇並不意味着監察寇盜”的論點，正是為了解釋這一點，但是，他忘記了“城旦、舂”“鬼薪、白粲”與“司寇”等刑名由來究竟是由於什麼；又忘記了他有己在其它地方有意無意地承認了刑名與勞役內容之間的對應關係，如頁196至210頁在說明男性刑徒的勞役多為築城、戍邊，女性刑徒從事舂米等勞役時，便無異於承認了刑名與勞役之間有固定的對應關係，從而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例二、關於《編年記》研究的窄狹性問題：

堀毅氏書中，有《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考》一專文。按題目要求，應涉及《編年記》的各個方面。但是，實際情況卻祇涉及到了《編年記》的性質與作者兩個問題，對於《編年記》內容中反映出來的許多問題，例如“喜傳”時的年齡問題，《編年記》記錄何以始於秦昭王元年的問題、“吏誰（推）從軍”所涉及的秦的軍事制度問題，昌

平君及昌文君的經歷問題、“韓王居口山”同《編年記》作者的關係問題、“南郡備警”的含義問題、“韓王死”及“昌平君居其處”同“昌平君徙於郢”的關係問題、《編年記》所載何以多於《史記》所載楚地事的問題、王稽與張祿之死何以同載的問題等等，堀毅氏此專文均未涉及。至於《編年記》的史料價值以及它所反映秦的統一六國的戰爭史等內容，此文更未論述。因此，僅僅考證了《編年記》的性質與作者，就謂之《編年記考》，未免題大而文小，對《編年記》內容的研究，顯得過於窄狹。

即使從堀毅氏所主要研究的《編年記》的性質與作者來說，也還有可疑的地方存在。如謂《編年記》的性質是私人性的記錄和作者是喜的親族，而且其身份祇是某些戰役的參加者而非秦軍統帥之類的人物。果如此，那麼這個“私人色彩甚濃”的記錄何以要始於秦昭王元年呢？記錄的時間長達九十年，難道這位喜的親族能在如此長的時間之內參與秦的統一戰爭嗎？如果是喜的幾位親族先後所記錄（堀毅氏並未說及這一點），那麼他們又何以要為此事而先後相承呢？這種私人記述的目的又是什麼？堀毅氏的結論的作出，理應對這些問題有所察覺和交代，可是堀毅氏此文又付之闕如，給人以美中不足之感！

總之，堀毅先生之新著對秦漢法制史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新見解和新問題，頗能發人深思。其使用方法，也存在比較、統計、表解、與計算等方法相結合的特點，還能大膽假設，多方推理。其若干新見解的獲得，多得益於此。然而，他的不少新見解，由於不是通過史料的鉤沉索隱而來，而是通過假設、推理而且以此為條件的比較、統計、表解與計算而來，從而出現了一些推理有餘而證據不足的情況，不審堀毅先生以為然否！

1988年12月於鄭大平房院翹楚齋

近年來秦簡《日書》研究評介

張 強（陝西歷史博物館）

秦簡《日書》研究，是近年來在簡牘學和古代文化研究領域中新興起的一個研究課題。所謂其“新”，一是材料新。在中國簡牘學史上，1975年冬，始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出土大批秦代簡牘，佔這批秦簡總數三分之一強的《日書》甲乙種圖片及釋文，則遲至1981年正式公佈於天下。1986年4月，在甘肅省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秦代墓葬中，又出土《日書》甲種簡73枚（釋文已發表在《文物》1989年第二期）和乙種簡380枚。二是內容新。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放馬灘秦簡《日書》係戰國後期至秦代“日者”占候時日、推擇吉凶的工具書，其所含內容極為豐富，無論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抑或天文、曆法、民俗、民生，莫不涉及，尤以社會生活資料最稱充裕，堪補秦代正史記載之闕如。這兩批秦簡《日書》的面世，不僅反映了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社會風俗的內容變化，展現出某種文化傳播及融合的現象，而且結合漢簡及後世一些術數類書籍如《協紀辨方書》等，還可以看到某種文化延續發展的軌跡。這就從社會史、文化史、宗教史等多方面給《日書》研究提供了廣闊的馳騁空間。可以說，近年來對秦簡《日書》的研究，進一步拓寬了簡牘學的研究視野，並為秦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就整個秦簡研究而論，《日書》研究由於起步較晚，長時間內處於較為薄弱的環節。睡虎地秦簡《日書》公佈最初幾年內，國內外學者問津者不過寥寥數人，研究水平總的來說處於較膚淺的程度，有深度的文章尚不多見。1988年，著名秦漢史專家林劍鳴先生就《日書》

研究專門撰寫《曲徑通幽處 高樓望路時——評介當前簡牘〈日書〉研究狀況》一文（刊於《文博》1988年第3期），詳細敘述了多批簡牘《日書》的出土情況，評論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並對《日書》研究前景加以展望（為節省篇幅，林先生此文所談的內容，本文均從略）。從那時以來，秦簡《日書》研究逐漸為中外學術界廣泛重視，《文博》和《江漢考古》雜誌專門開闢了《日書》研究專欄，一批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不少頗有價值的論著相繼問世，給簡牘學和秦文化研究領域增添了勃勃生機。這裏應該指出，人才的培養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1986年，林劍鳴先生引進日本高校“研讀班”的形式，在西北大學歷史系率先舉辦“《日書》研讀班”，吸收研究生和部份青年教師參加，目前在國內《日書》研究中嶄露頭角的張銘治、李曉東、吳小強、賀潤坤等人，均出自該研讀班。嗣後又有古文字學家曾憲通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後繼續就學於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劉樂賢專攻秦簡《日書》。迄今專門研究秦簡《日書》的六十餘篇論文和二部專著中，四分之三以上是1986年以後發表的；由這些師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代表着目前中國在秦簡《日書》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茲將近年來秦簡《日書》研究的主要成果舉要分述如次：

林劍鳴《從秦人價值觀看秦文化的特點》（《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李曉東、黃曉芬《從〈日書〉看秦人鬼神觀及秦文化特徵》（《歷史研究》1987年第4期）二篇論文，均通過對《日書》的研究，試圖從整體上把握秦文化的本質特點。林文認為“《日書》中明顯地反映了秦人近乎原始的多神崇拜的現象”；“《日書》中所表現的質樸的、人格化的多神崇拜，說明對‘人間秩序和道德價值從何而來的這個根本問題，秦人尚未達到當時中國境內東方各諸侯國，尤其是齊、魯、晉、楚各國思想家將對‘天’、‘帝’的崇拜與人的內心道德自我修養合而為一的水平，也沒有達到西方古代世界以‘理念’追索超越源頭和人世關係，從而創造出‘上帝之城’的程度。”該文進而分析《日書》中反映出的秦人價值觀具有“外傾”和“重功利，輕倫理”的特點，提出秦文化“唯大尚多”的本質特徵。林文第一次充分利用

《日書》等新的考古成果，從價值觀這一新視角對秦文化宏觀特徵作了科學論證，令人耳目一新，該文的基本論點在《日書》和秦文化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深遠影響。李、黃二人文章則根據《日書》資料，對秦人的鬼神觀念作了初步探索，並得出秦文化具有功利主義特質的結論。該文認為，秦人的鬼神觀“表現出直觀、質樸的特色”，“秦人心目中的鬼神有濃厚的世俗氣息，而超人的力量和怪異的浪漫主義色彩則比較薄弱。秦人不僅未賦予神作為社會等級秩序和道德源泉的實體意義，也沒有對神降福降災的原因作出理論說明，似乎某日某時的吉凶禍福，祇是一種先驗的規定，沒有道理可講。”由於“秦人缺乏思辨的傳統”，因而“秦文化的特質則突出表現為重實效、重結果、重現實的功利主義。”該文首次利用《日書》，對秦人的精神世界作了有益的探討，其觀點頗有啓發性。

在秦簡《日書》與秦代宗教信仰方面做進一步研究的主要有吳小強。他在其系列論文《論秦人宗教思維特徵——雲夢秦簡〈日書〉的宗教學研究》（分載《江漢考古》1992年第1期，《秦漢史論叢》第五輯，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論秦人的多神崇拜特點》（《文博》1992年第4期）、《論秦人宗教信仰的層次性》（台灣《簡牘學報》第十四期，1992年3月）等文章中，提出：（一）秦人的宗教信仰是以自然神崇拜為核心的多神崇拜體系，自然神包括天神、星宿神、土地山川神、動物神等；日常生活神被提高到重要地位，如五祀神、財神、夢神等，秦人的生活神不再具有周人那種嚴格的宗法政治含義；“秦人的神權體系中幾乎找不到祖先神的位置，祖先神在秦人眼中是微不足道的，這與殷周社會對待祖先神明恭敬備至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照”（二）秦人宗教思維的基本特徵表現為世俗化，“生活在下中層社會的普通秦人完全是按照‘人死為鬼’的思維邏輯來理解和解釋鬼神的存在”，“認為鬼神不過是人在另一個世界的化身而已；鬼類必然具有與現實生活中的活人相類似的思想感情和欲望追求，過着與人們世俗社會一樣的生活。”諸如穿衣、飲食、居住、游玩、交友、愛情、婚姻、性生活等。“在一般秦人看來，鬼神是活靈活現、有需求有煩惱的、

形象豐滿的感性生靈，而非哲人聖賢意識中抽象蒼白的政治倫理概念的符號。”(三)秦人宗教信仰具有顯著的層次區別，統治集團的信仰特徵是“重上帝而輕鬼神”，中等階層是“略輕上帝而稍重鬼神”，下層社會則為“近鬼神而遠上帝”。《日書》集中反映了秦代中下層社會人們的宗教觀念，《史記·封禪書》則主要記載了統治集團的宗教思想。中下層秦人宗教觀念特點是關注自我、重視疾病、人鬼相通、巫文化色彩濃厚、陰陽五行思想流行。(四)《日書》是秦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亦是秦楚文化融合的結晶，其所反映的秦代民間宗教意識及思維特徵，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日書》既代表了秦人的宗教觀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代楚人的宗教意識。至戰國後期，秦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達到全國的先進水平。以《日書》為代表的民間宗教文化一直延續到中國近代社會的終結。吳小強對秦人宗教信仰與宗教思維的研究比較系統和深入，勾勒出了秦代宗教文化思想的總體面貌，在《日書》與秦文化研究中很有特色。

透過《日書》簡文考察秦國經濟發展狀況是《日書》研究的重要側面，賀潤坤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他的系列論文：《從〈日書〉看秦國的穀物種植》（《文博》1988年第3期）、《雲夢秦簡所反映的秦國漁獵業》（《文博》1989年第3期）、《從雲夢秦簡〈日書〉看秦國的六畜飼養業》（《文博》1989年第6期）、《中國最早的相馬法——雲夢秦簡〈日書·馬〉篇》（《西北農業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從雲夢秦簡〈日書〉看秦國的林業、桑麻業》（《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從雲夢秦簡〈日書〉看秦民間的災變與救災》（《江漢考古》1994年第2期）等，對《日書》材料詳扒細梳，條理歸納，認為（一）秦國農作物以禾、麥而非菽、粟為主要品種；（二）政府對漁獵業有明確的法規加以限制、指導；（三）六畜飼養業是秦國的傳統經濟門類之一，“六畜”已與後世相同，且飼養極為普遍，《日書·馬》篇內的“馬謀祝”辭是中國迄今最早的相馬法；（四）秦國的林業、桑麻業受到廣泛重視；（五）秦國民間的防災救災活動具有一定的規模和成效，性質為非官方、自發的民間互救或自救，《日書》反映出秦人在迷信

氛圖中立足人事的行為及思想特徵。賀潤坤的《雲夢秦簡〈日書·門〉圖初探》（台灣《簡牘學報》第十五期，1993年12月）則從建築學角度對《日書·門》圖進行分析，指出：《門》圖不是某城、鎮、村或某建築物的設計圖，它概括了當時一般城鎮或村落的建築特徵。賀潤坤的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對過去秦國經濟研究觀點有所突破，在《日書》與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領域中頗有價值。

根據《日書》研究秦代交通問題，主要有王子今的三篇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秦楚行忌比較》（《秦文化論叢》第二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12月）、《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狀況》（《國際簡牘學學會會刊》第一號，臺灣蘭臺出版社1993年）和《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行歸宜忌》（《江漢考古》1994年第2期）。王文比較了秦、楚兩地區的“行忌”，提出：“秦人建除（法）中無‘行吉’日”，“而事實上的‘行吉’日則遠較楚人為多”；“秦人行忌名類較楚人少”；“水路行忌相對少於陸路行忌，反映楚地水運重於陸運的事實”，同時“秦人行忌較楚人寬鬆”。王文特別指出，“《日書》所列行忌凡十數種，行忌日相合可以達到驚人的數字”，“出行禁忌之苛嚴繁密，體現當時交通活動所受到的來自觀念方面的顯著影響。儘管秦漢時代是交通發展實現空前躍進的時代，然而在戰國晚期至於秦統一一初，至少在出土睡虎地《日書》的楚地，人們的出行活動是受到多方面限制的，對當時的社會文化進行考察，不能不注意這種交通史的背景。”關於秦、楚交通狀況，王文認為“當時作為重要陸路交通工具的車輛，在民間已相當普及”，秦楚水上航運也很繁榮：“出行等交通行為往往有關聯物質利益的動因”，說明“出行等行為與社會經濟活動的關係”。王文還指出，“秦簡《日書》中多見與役人逃亡有關的內容”，其“大多並非指奴隸逃亡的情形”，而是“反映了當時役人‘去亡’之普遍”，“也是與秦徭役繁重的歷史事實相符合的。”秦代政府大量遷徙人口，《日書》則對徙行時日作了嚴格限制。王文的結論是“交通本身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交通發展的狀況同時又對社會文化的全貌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從《日書》看到，“在當時人們的生活和生產

活動中，出行等交通行為，已經佔據重要的地位。”“秦始皇統一事業的成功，原本有交通文化條件的基礎。”作為林劍鳴先生的高足，王子今多年來專攻交通史，建樹頗多，其對《日書》的研究獨闢蹊徑，自成一家之言，觀點很有見地。

在《日書》與秦代政治的研究中，林劍鳴先生的扛鼎之作《秦漢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義》（《歷史研究》1991年第4期）頗具代表性。林文分析了“秦漢時代的官吏墓葬中，《日書》與律令共存”這一普遍現象，指出：“通《日書》者與執法的官吏在秦漢時代往往兩者集於一身”，“術數常與儒學一樣成為官吏必備的基礎知識”，《日書》中所包括的內容“往往能起到直接指導官吏處理政務的作用，這就形成秦漢吏治的一大特色。”《日書》對官吏的作用，除用以斷獄、決疑、征戰、入官等，更普遍的在於供官吏瞭解地方的風俗、習慣和民衆的信仰。“當時的官吏‘不僅要根據政府律令，而且要依據風俗信仰處理公務，甚至對當地禁忌、崇尚也需尊重、考慮，否則就很難稱職。’”林先生的頗富創見性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秦漢政治研究的窠臼，對全面把握秦漢時代政治特色極為有益。賀潤坤的《從雲夢秦簡看秦的吏治》（《西安石油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1期），通過對《日書·吏》篇等簡文的分析，認為“秦國民間對當時官吏的辦事效率和作風基本上是肯定和信任的，抱有一定期望，同時也反映了某些官吏處事偏差、辦事不力和態度惡劣等問題。”《日書》“這種來自秦國民間的記載，較之以往任何官方文獻及封建史家傳述都更為可信。”

天文、曆法，是解開“《日書》之謎”的關鍵問題之一，自睡虎地秦簡《日書》刊佈伊始，專家們即開始從事這方面的艱苦探索。近年來大陸發表的有關論文主要有：張銘治《秦簡〈日書·玄戈〉篇解析》（《秦漢史論叢》第四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89年2月）、楊巨中《〈日書·星〉釋義》（《文博》1989年第4期）、〔日〕成家徹郎《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文博》1991年第3期王維坤譯）、王維坤《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再析》（《陳直先生紀念文集》，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張銘治《〈日書〉中的二十八宿問題》（《秦陵秦

俑研究動態》1992年第2期）、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玄戈〉篇新解》（《文博》1994年第4期）等。學者們對《日書·玄戈》篇比較關注，因為該篇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理論中某些以往不被注意的問題，這方面的討論以張銘治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張文提出：（一）對《玄戈》篇的12支簡斷句時，“應將每個月之後的第一個星宿與後文斷開。這樣，就有了‘十月：心’，‘十一月：斗’，……等十二個月與二十八宿的對應關係。”“這種關係表明的是太陽在當月所行經的第一個星宿。”（二）簡文中“招搖”、“玄戈”二星名實際代指北斗星，根據其按照相反方向運動的規律，可以發現與《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的記載相合，即“《日書》中的‘招搖’、‘玄戈’，並非指斗柄外的兩顆星或天象中的‘斗柄’，它們亦為‘北斗之神’，祇不過是‘雌’北斗之神而已。”這種天學理論大約是楚文化的內容之一，並且未融入秦文化內核中，其“在漢初即已失傳，而祇留下了一些含混的概念。”（三）《玄戈》篇中十二地支與二十八宿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應關係，考古實物中也有這種對應關係存在。這樣就將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與各月中太陽行經的不同星宿聯繫起來。張文認為“《玄戈》十二簡作為日者占候卜筮之辭，不可否認其帶有濃厚的迷信色彩，然而，同時它也包含着相當豐富的天象、曆法知識和古代天文學理論，它還反映出秦人鬼神觀念中的重要內容。”“睡虎地《日書》從二十八宿名稱上所表現出的，是秦、楚文化的融合，而非‘純’楚文化。”劉樂賢的文章對《玄戈》簡文作了仔細校勘，其結論與張文依據“月將”提出的觀點大體相同，為人們準確理解《玄戈》篇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

通過秦簡《日書》研究秦代社會婚姻、家庭、生育以及人口再生產問題，突出的是吳小強的另一組系列論文：《試論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觀念》（《中國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秦人生育意願初探》（《江漢論壇》1989年第11期）、《〈日書〉與秦社會風俗》（《文博》1990年第2期）、《從秦簡看秦俑的社會內涵》（《文博》1990年第5期）、《從雲夢秦簡看戰國秦代人口再生產類型》（《西北大學學報》1991年第2

期)、《〈日書〉所見秦人之生死觀》(《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2年第2期)、《從〈日書〉看秦人的生與死》(臺灣《簡牘學報》第十五期, 1993年12月)等。吳文認為:(一)嫁娶生子必須選擇良日, 回避忌日, 趨吉避凶, 是秦人婚姻家庭生活最顯著的觀念; 嫁娶生子的吉凶往往與貨物交易、奴隸買賣、宗教祭祀活動相聯繫; 秦代中下層社會婚姻觀念, 明顯折射出一夫一妻家庭特徵。(二)《日書》反映的婦女觀主要有悍、多舌、妒、不寧、貧、病、不媚、絕後, 但沒有西周宗法制度婦女“七去”罪名中的“不順父母”、“淫”、“竊盜”; 愛情是維繫秦人夫妻關係的重要紐帶, 秦代中下層社會家庭存在着真摯的夫妻戀情, 但離婚休妻、棄妻亡夫的悲劇也時有發生。從女賈、女醫、女巫、女盜、“女子爲正”等簡文中說明, 戰國秦漢時代的婦女所受精神束縛較小, 她們深深參與了社會生產生活活動, 從事着廣泛的職業, 社會地位也較後世爲高。(三)秦人企盼子孫繁茂、恐畏無子絕嗣, 極爲重視生育時間的選擇和對兒女體質的選擇, 已具有朦朧的優生意識; 他們期望兒女將來貴、富、武、巧、孝, 不願兒女賤、貧、疾、孤、遠離。(四)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上, 戰國時期真正確立了“政府干預人口再生產機制”, 尤以秦國鼓勵人口增殖政策最爲典型;(五)戰國秦代社會盛行早婚早育, 形成高人口出生率、高人口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粗放式的人口再生產類型, 構成了戰國秦代至舊中國結束之前人口再生產過程的基本特徵。(六)阻遏戰國秦代人口擴大再生產的因素主要是貧窮、疾病、喪偶、離婚、社會風俗、戰爭和徭役。秦人對人口質量的追求, 集中體現在體、貌、智、行、壽等方面。吳小強在《日書》與戰國秦代社會生活、人口發展專題上的積極探索, 無疑具有重要的開拓意義。

李學勤先生曾指出:“《日書》屬於《漢書·藝文志》所列數術一類”, “對於《日書》, 至少可以從兩方面去研究: 一方面, 是從數術史的角度去考察”, “另一方面, 對《日書》的內容還可以作社會史的考察。”(見《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 《江漢考古》1985年第4期)鑒於《日書》作爲流行於戰國秦代民間的宗教實用手冊的

性質，祇有確切弄清楚其所包含的“數術”的涵義，纔能真正讀懂《日書》。因此，對《日書》各種占卜方術的研究，很自然成為《日書》研究的基本的和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銘治《雲夢秦簡〈日書〉占卜術初探》（《文博》1988年第3期）和《秦簡〈日書〉‘建除法’試析》（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1988年）；劉樂賢的系列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詁咎篇〉研究》（《考古學報》1993年第4期）、《睡虎地秦簡〈日書·反支篇〉及其相關問題》（李學勤主編《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10月）和《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往亡”與“歸忌”》（紀念容庚先生百年誕辰暨中國古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4年）；劉信芳《〈日書〉四方四維與五行試探》（《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2期）等。張銘治的論文提綱挈領，將《日書》內多種占卜方術作了歸納與分析，並對其源流加以考索，這對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源流來考察《日書》的特殊價值，是很有意義的。《日書》研究的後起之秀劉樂賢則是憑借其紮實的古文字學和文獻學功底，對《日書》通篇文字進行了詳細、縝密的校勘、疏證，在此基礎上結合後世數術典籍的記載，對《日書》中的各種占卜術做了進一步探討。劉樂賢的博士學位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最近已由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這是關於秦簡《日書》研究的第二部專著。該書長於文字訓詁、校正，對正確理解睡簡《日書》簡文涵義很有參考價值。

放馬灘秦簡《日書》出土後，不少學者對睡簡《日書》與放簡《日書》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許多新的獨到見解。這也表明，秦簡《日書》研究已確立了其作為獨立的研究課題的地位。在兩種《日書》比較研究方面主要有：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文物》1989年第2期）及《秦漢簡牘研究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林劍鳴先生的二篇論文：《睡簡與放簡〈日書〉比較研究》（《文博》1993年第5期）和《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簡帛研究》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10月）。劉信芳《秦簡中的楚國〈日書〉試析》（《文博》1992年第4期）等。何雙全論述了放簡《日

書》的出土整理過程、編冊分類及定名、簡冊制度、文字與語言、內容概觀、時代考訂、放簡與睡簡之比較、從放簡《日書》看秦代社會等，認為放簡《日書》所包括的內容異常廣泛和龐雜，“簡直是一部翔實的社會史和思想文化史”。在比較分析了睡簡和放簡《日書》後，何文提出，“兩部《日書》的性質是相同的，祇是內容上的差別。”“從《日書》思想傾向看，《放》簡帶有強烈的時代政治氣味，雖然都是選擇日子，但所涉及的事件都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每每相聯繫，長篇大論的並不是鬼神如何。”而睡簡《日書》則“涉及社會政治的較少，通篇充滿了鬼神觀。就是說秦人重政治輕鬼神，而楚人重鬼神輕政治，鬼神觀是非常嚴重的，這就是兩部《日書》的最大特點。”作者斷言“《放》簡是純秦《日書》，《睡》簡是純楚《日書》，儘管有秦的成份，但主體不同於秦，它代表的是秦代楚人的思想。”何文不僅揭示了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日書》所表現出的多種差異，實際上還提出了如何通過《日書》研究秦文化內核的問題。林劍鳴先生的文章提出“《睡》簡《日書》和《放》簡《日書》‘建除’一章雖僅有文字上的小異，而這些關鍵性的差異中，卻顯出楚、秦兩種文化特點的不同：《睡》簡有較多的禮制影響和較濃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點；《放》簡則相反，顯得質樸而具體，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輕仁義’的特點。”可以說，放簡《日書》的出土，更直接地支持了林劍鳴先生曾在《從價值觀看秦文的特徵》一文中所論及的觀點。

劉信芳在《秦簡中的楚國〈日書〉試析》一文中，試圖從睡簡《日書》內將“純”楚文化的《日書》內容輯出，指出睡簡《日書》中有《除》、《歲》、《嫁子》、《毀棄》、《土忌》、《到室》等六個章題共62支簡的主要內容原屬楚國《日書》。換言之，其餘部份即原秦國《日書》或秦、楚《日書》雜糅的內容。劉文認為，“從秦簡中析出楚國《日書》，是爲了使秦簡《日書》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更加可靠的基礎上”，“則可以使我們的研究在時間、地域的觀念上更加精審，從而避免張冠李戴之誤。”劉文對睡簡《日書》中的秦文化成份做嚴格的解析，顯然是一種很有意義的探索。此外，張銘治的《〈史記·日者列傳〉小

察》(分載臺灣《簡牘學報》第十五期,1993年12月,和《司馬遷與史記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對《日書》的使用者“日者”的身份做了深入考察與分析。

近年來,臺灣學術界也逐漸關注對秦簡《日書》的研究。目前所見者主要有: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日書〉中的“夢”》(《食貨》復刊,第17卷3—4期1987年)、蒲慕州《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1993年4月)、陳守亨《睡虎地秦簡〈日書〉歲星禁忌之研究》(臺灣《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一號,1993年)等。其中以蒲慕州的論文為代表。蒲文是一篇長達六萬言的大作,由八個部份組成,即引言、《日書》之結構、《日書》中所見之人際關係、《日書》中所見之社會生活、《日書》中所見之經濟生活、《日書》中所見之政治與社會秩序問題、《日書》中之宗教信仰、結論。在對秦簡《日書》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析之後,作者提出:“《日書》所反映出的並非當時人生活的全面現象”,“《日書》所反映出的不但不能說是‘秦文化’,甚至不能說是秦人中下階層的文化,而應該是當時中國社會中中下層共同的文化的一部份。”“因此《日書》很可能是一部雜揉了秦楚兩方面民俗的作品”。睡簡和放簡“這兩種《日書》之不同,主要反映出的應為地域性的差異,所謂‘各有所用’,但不能改變兩者基本上為流行於同一類社會階層中之作品的事實。”蒲文最後寫道:“日書”反映出了秦末中國社會中以中下階層為主的人民生活和信仰的部份情況。其中的宗教心態雖然缺乏理性思考和邏輯推演,又有圖求物質福祉的功利主義性質,但若認為它是一種‘不成熟不發達’的宗教,則是從一種‘宗教性質一元化’的觀點出發而得到的結論……這種‘不成熟不發達’的宗教(嚴格的說祇能是一種‘信仰——belief,因為其中沒有說理的‘教’的部份)本身其實是一種已經發展完成的信仰形態,由秦漢以下兩千年來一直以類似的面貌流傳在中國民間的事實,可以得到印證。”蒲文的論述對於大陸學者的研究,很有啟發性。陳守亨的文章通過對《日書·歲星》篇的詳細論證,揭示了“秦俗多禁忌之特色”,其分析細緻入微,別具特色。

日本學術界對秦簡《日書》的研究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長期進行不懈的努力，並獲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工藤元男。其系列論文：《論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日本早稻田大學東洋史懇話會：《史滴》第7號，1986年1月）、《二十八宿占（一）——秦簡〈日書〉劄記》（《史滴》第8號，1987年1月）、《被埋沒的行神——以秦簡〈日書〉為主》（《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6冊，1988年3月）、《中國古代文明之謎》（《光文社文庫·歷史謎事典》，1988年）、《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所見的法和習俗》（《木簡研究》第10號，1988年11月）、《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的史料可能性》（《東亞史上的國際關係和文化交流》）、《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所見秦、楚二十八宿占——先秦社會文化的地域性和普遍性》（《古代》第88號，1989年9月）、《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和道教的習俗》（《東方宗教》第76號，1990年）、《日書的狀況》（《古代文化》第43卷第8號，1991年）、《雲夢秦簡〈日書〉與秦史研究》（《秦漢史論叢》第五輯，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等，提出了許多新觀點，例如：他認為“《日書》所反映的各種禁忌習俗，與楚曆法關係密切，可以認為是來源於楚文化。”《日書》中大量的關於“行”及“歸行”的禁忌，“都起源於當時的一種對行神的信仰”，而當時的行神是“禹”，由此還出現了“禹步”、“禹符”等巫術的步行法和咒符。”《日書》中旅行的程序、吉日的選擇、通過城門時的咒術儀禮等，“大致為後來的道教原原本本的吸收”，因而“《日書》在原始道教的形成研討上，其貴重性是可預想的。”在《日書》與秦律的關係上，工藤認為“秦人為了將其佔領區原有的文化、習俗納入自己的統治體系，甚至利用當地原有的曆法（這是古代文化、習俗的主要部份之一）來制定法律，這使我們看到秦法家統治的現實主義特點。”其《雲夢秦簡〈日書〉所見法與習俗》一文已被介紹到中國（《考古與文物》1993年第5期，莫枯譯）。日本學者研究《日書》的還有太田幸男《從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看“室”、“戶”、“同居”的意義》（《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9冊），前文所提成家徹郎《睡虎地秦簡〈日書〉》等。工藤元男等日本學者的論著收集資料相當廣，疏理

細緻，考證縝密，言必有據，研究角度和思路獨特新穎，其研究成果有相當價值。

綜上所述，近年來秦簡《日書》的研究無論在中國大陸、臺灣或是日本，均成果迭出、熱潮有增無減，在中國簡牘學和古代文化研究領域中大有異軍突起、方興未艾之勢，這無疑大大促進了歷史學和文化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從國內研究狀況來說，由於李學勤、林劍鳴、曾憲通先生等一批第一流學者首倡其事，作為學術帶頭人並着力培養人才，一批中青年學者勤奮努力、脫穎而出，業已成為研究中堅，形成了一支有水平、有實力的學術梯隊；在國內簡牘研究學術論文發表不易的情況下，有《文博》、《江漢考古》、《秦陵秦俑研究動態》等學術刊物慧眼識珠，特為《日書》研究開闢了專欄，為《日書》研究取得豐碩果實創造了良好條件、成為《日書》研究得以持續深入發展的動因之一；伴隨海峽兩岸文化交流的迅速擴大，以馬先醒先生為代表的臺灣簡牘學會等學術團體積極致力於簡牘學及《日書》研究的開展，僅《簡牘學報》第十四、十五兩期，就刊登了一大批大陸中青年學者的作品。學術交流促進了研究的深化，秦簡《日書》研究，已成為維繫海峽兩岸學術界同胞團結友誼的紐帶之一，亦是海內外學者共同感興趣、攜手共探索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概言之，天時、地利、人和，是秦簡《日書》研究獲得較快發展和較大成果的根本原因。相信在近期內，其研究成果還會不斷擴大。

半個多世紀前，傅孟真先生曾說過：“凡一種學問，能擴張它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中外學者對《日書》的研究，短短數年間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然而，要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還必須從更廣闊的角度和範圍擴張更多的材料，吸取更多的科學內容，纔可以達到所謂“透徹”的地步。1988年林劍鳴先生曾借用王國維《人間詞話》關於學術研究三種境界的詞句以喻《日書》研究之艱辛苦實。數年來，中外學者潛心探索，“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過去曾被視為畏途的《日書》之謎“正在逐步被破解，《日書》所包裹着的厚厚的神秘外衣已被層層揭開。我們期待着動人心弦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時刻的到來。

漢代地方行政文書的重大發現

—連雲港市尹灣漢墓出土簡牘

尹灣漢墓羣，位於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溫泉鎮尹灣村西南約二公里處的一座高嶺上。一九九三年二月底，尹灣村的農民在這裏取土時，偶然從深土層中發現了墓葬，隨即報告給縣文化局和博物館。旋經市、縣博物館派專業考古工作者赴現場探測，查明漢墓羣共包括十一座墓葬。這次僅選擇對其中的六座墓葬（編號為M1——M6）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尚有五座墓葬未動，擬列入下一期發掘工程。這次發掘從二月底開始，於四月結束，歷時兩個月。

已發掘的六座墓葬，形製基本一致，均為長方形豎穴石坑，東西向。M3墓坑南北長6.4米、東西寬5.25米、深8米，兩壁有一條2.7米寬的斜坡墓道，是六座墓葬中規模最大，也是遭受破壞最嚴重的一座。M1為一棺二廂單人葬，棺蓋上方有50×50釐米的方形盜洞，棺內隨葬品已被盜竊一空。M2為單棺木槨墓，墓主人為一中年女性。屍身用素帛纏裹多層，其上又覆蓋繒繡絲胎被兩床。棺底散鋪“大泉五十”錢幣108枚。M4為男女合葬墓。M5為夫妻合葬墓，槨板已朽爛。棺的西南角有35×80平方釐米的盜洞，已基本無隨葬品。M6是六座墓葬中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豐富的一座。由槨、棺、廂組成，槨上橫鋪5塊頂槨板，其下有一層厚5釐米的排列有序的“天花板”，為連雲港地區稍有規模的漢墓中所常見。棺為東西向排列，男棺在北，棺身稍長，長2.28米，寬0.76米；女棺在南，棺長2.18米，寬0.75米；高度均為0.70米。槨室外側西部有一

足廂。據不完全統計，六座墓葬除出土木牘 24 枚、竹簡 133 支外，尚出土刺繡、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漆木器、錢幣等多種。

尹灣漢墓簡牘，除一枚木牘衣物疏是從 M2 號墓出土外，其餘二十三枚木牘和 133 支竹簡，均出土於 M6 號男棺中墓主人的足部。每枚木牘均為寬 6 釐米，長 23 釐米。竹簡中包括大簡 21 支和小簡 112 支，大簡每支寬 0.8—0.9 釐米左右，小簡每支寬 0.3—0.4 釐米左右，大、小簡長度基本一致，每支均為 22.5 釐米之間，約合漢尺一尺。因簡牘中明確載有“永始”、“元延”等年號，故知其為距今 2000 餘年的西漢後期成帝時物。根據從 M6 號墓出土的《君兄衣物疏》、《君兄繕方緹中物疏》、《君兄節司小物疏》等隨葬品遣策和十枚名詔中記載的內容，可以確定墓主人姓師，名饒，字君兄，生前官職為東漢郡功曹史。根據文獻記載，漢代的州、郡、縣等各級地方官府，均設置有功曹這一官署，由掾、史等負責職司選舉，兼參諸曹事務。官秩雖然卑微，僅為百石屬吏，但因其為郡太守親自辟除，故權力較重。

這批新出簡牘總字數約四萬餘字，雖為數不算太多，但內容非常豐富，殊足珍貴。據初步整理研究，大致包括：

- (1)、東海郡上計集簿（木牘一正、反）
- (2)、東海郡屬縣、侯國、邑吏員編制總簿（木牘二正、反）；
- (3)、東海郡吏員除官（任命）、升遷簿（木牘三正、反；木牘四）；
- (4)、東海郡吏員考績簿（木牘五正、反）；
- (5)、永始四年（前 13）武庫兵車器集簿（木牘六正、反）；
- (6)、贈錢名簿（木牘七、八正、反）；
- (7)、神龜占卜盜賊法、六甲占雨法（木牘九正）；
- (8)、占取（娶）婦嫁女、問行者、問穀（系）者、問病者、問亡者等的術數圖局（木牘九反）；
- (9)、元延元年（前 12）曆譜（木牘十正、反）；
- (10)、元延三年（前 10）五月曆譜（木牘十一）；
- (11)、君兄衣物疏（木牘十二正、反）；

- (12)、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節司小物疏(木牘十三正、反);
- (13)、名謁十枚(木牘十四——二十三);
- (14)、無名氏女性衣物疏(木牘二十四正、反)
- (15)、東海郡郡吏巡行起居記(含元延二年(前11)曆譜)(小號竹簡);
- (16)、刑德行時(小號竹簡);
- (17)、行道吉凶(小號竹簡);
- (18)、神烏傳(賦)(大號竹簡)。

其中的《神龜占卜盜賊法》等幾種數術資料和《神烏傳(賦)》等古佚書，都是前所未見的新發現。猶為珍貴的是，東海郡上計集簿；吏員編制總簿；吏員除官、升遷簿；考績簿；武庫兵車器集簿；郡吏巡行起居記、贈錢名簿以及名謁等行政制度文書檔案資料，詳細記載東海郡的上計和吏員設置、任命、升遷、考勤、巡行視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我國最早和較完整的一份郡級檔案，也是研究西漢地方行政制度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不僅可與《史記》、《漢書》等史籍互相印證，並能補載籍之缺。對檔案學、簡帛學、文獻學、秦漢史等學科，均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另外，簡牘中的隸書和草書，書法精美，亦是研究我國古代書法和文字發展史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尹灣漢墓簡牘始由江蘇省連雲港市博物館拍照，並進行過初步整理。從一九九四年九月份起，應連雲港市博物館的邀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協助該館和東海縣博物館整理編輯《尹灣漢墓簡牘》一書，擬於一九九六年由中華書局出版面世。

連雲港市博物館、東海縣博物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絲綢之路的防衛綫

——埋在其下的文字記錄·中國甘肅 簡牘暨古墓文物展

陳 波(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

由日本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中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絲綢之路的防衛綫——埋在其下的文字記錄·中國甘肅簡牘暨古墓文物展》，於1994年10月4日在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隆重開幕，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兼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館長大庭脩、中國甘肅省文化廳副廳長張正傑、日本每日新聞大阪本社事業本部部長鳥居宏司、日本每日放送文化事業部部長溫井甚佑等出席開幕儀式並為開幕剪彩，日本有關人士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李永良、前所長岳邦湖等亦出席儀式，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高島徹擔任司會。

相當數量居延新簡、敦煌漢簡、懸泉置漢簡等首次集中公開，引起日本各界矚目，短短42日間，累計3,673人前來參觀，其中書法團體來館者不佔少數，大阪、京都、奈良、兵庫、滋賀、和歌山以外，東京、九州、四國等地區也有來參觀者，甚至展覽結束後，還有來電來函詢問事情或購買圖錄資料等。關於漢簡與史學的關係，大庭脩館長撰文指出：將文字寫在本簡上，作為文化交流，或者說是留傳記錄，此種作法為世界上普遍現象。中國木簡在世間再次出現，出乎意料竟是本世紀初，1901年以英國斯坦因、瑞典斯文·赫定二人作為代表學

者，於中亞探險途中，一個月間在不同地點相繼發現木簡為開端，為本世紀增加了新研究材料。從這以後到今天為止，以甘肅省敦煌、居延等地為主，從漢代烽隧遺址所出木簡及中國各地由戰國秦漢晉墓所出木簡，粗分一下，前者數量是壓倒地多達五萬枚，後者約一萬餘枚。關於漢代關塞，不用說即是征服游牧匈奴之後得到絲綢之路，為制止匈奴反攻，在中國西北區域築起萬里長城，及溯長城沿線所置烽隧。關於關塞木簡，即為戍卒生活及防備等記錄文書。從漢簡為主的中國木簡所記載內容來看，以日常事項為記錄特點非常明顯，記載下來的人名，一般不合歷史文獻的人名而為庶民身份。由歷史文獻所遞傳的歷史，所敘述的歷史內容一般不含庶民日常事項，但是這些本世紀的新材料，並非是追述改寫歷史事實似的記錄，相反傳來了以往歷史過程中被埋沒的庶民戍卒生活氣息。從這個意義上，看到這一度失傳的庶民記錄，是新鮮，是驚嘆，為此對於那些在歷史上僅是小小存在的庶民戍卒，產生共鳴。漢簡正是這樣的資料。（《每日新聞》1994年9月26日）

每日書道會理事大平山濤氏就漢簡書法藝術發表評論：特別是1972年以後出土，基本上沒有公開過的約200枚展出木簡，面對這些從未見識的木簡，甚是興味深長，確信觀摩這些剛出土木簡，必將開拓新藝境。墨色鮮明保存良好的木簡，作為第一手研究資料是毫無疑問的，注視這些漢代文物，像是觸摸到了當時民衆脈搏的心情油然而生，經過長眠之後蘇醒的文物，為日中文化交流架起一座非常出色的橋梁。

此外，圍繞漢簡與漢代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民族等問題，多篇文章在《每日新聞》上發表，主要有：話說敦煌漢簡——對戍卒之刑罰 每日新聞編輯委員岡本健一；戍卒生活之再現 岡本健一；古代國家之重要文字 高島徹

展出漢簡等亦引起充分注意，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藤田豐、三宅正浩、藤永正明、一瀬和夫、栗山和之諸氏，相繼發表關於隧長病書冊、筆、候栗君所責寇恩事冊、居延右尉封泥匣、甲渠第四隧復原模型等介紹文章。

展覽期間，日本學術界、考古界、書法界人士應邀講演多次，其中有：

10月15日，實踐女子大學教授田中有氏《漢簡書法》；

10月23日，京都大學教授永田英正氏《長城守備隊之勤務》，在講演中，永田氏就漢簡研究方法談了見解，強調單用研究歷史文獻的方法來研究漢簡是不行的，必須看清漢簡所持性質。

10月29日，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平城宮遺跡發掘調查部部長町田章氏《古代中國花飾墓》；

11月12日，岡山大學教授狩野久氏《日本與中國之木簡》；

11月20日，迹見學園女子大學教授西林昭一氏《中國新出土文房具》，西林氏特別以西漢敦煌馬圈灣筆（《敦煌漢簡》上冊 圖203-1）敦煌懸泉置筆（《漢簡研究現狀與展望》144頁）、東漢武威筆，筆桿有“史虎作”銘（《武威漢簡》86頁）、東漢武威筆，筆桿有“白馬作”銘（《中國藝術》5〈甘肅專號〉79頁）及東漢居延筆（《居延木簡》111頁）等為例，就漢代製筆工藝，使用材料等發表觀點，漢簡之出色書寫與毛筆製造工藝發達分不開，漢代製筆技術及運筆能力極為成熟，並期望與中國學者多加磋商，探討一些不明瞭的地方，如兩漢毛筆的種類、形製及流通產地等。

此外內部學術交流活動也多次舉行，簡述如下：

11月8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雙全、王輝、龐述森氏應邀與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高島徹氏等六人就中日考古研究調查等進行座談，內容涉及中日墓葬制度、漢代郵置分佈及甘肅彩陶等。

10月29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藤田高夫、滋賀大學佐原康夫等六人，以展出的敦煌漢簡實物與《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版）所載照片進行對照，凡根據照片難以判斷的漢簡狀態，如材木質地，彎曲厚薄，殘缺裂紋，燒痕蟲蛀，釋文異同等逐枚校對一過，並一一記錄在案。

11月2日，日本秦漢史研究會第六屆大會假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大廳舉行，會長東京大學尾形勇氏作會務報告之後，何雙全氏應

邀就《懸泉置調查與漢簡》發表演講時指出：懸泉置遺址位於河西走廊西部戈壁荒漠之中，海拔1700米，南依三危山，北臨西沙窩，總面積22500平方米。這次發掘及有關簡牘之出土，確認此遺址在西漢時名為“敦煌郡效穀懸泉置”，關於其時代上限始於西漢武帝太始三年（B.C 94），經歷兩漢，下限可至魏晉，前後延續近400年之久。出土漢簡總數達15000枚，其中西漢昭帝至東漢光武帝時期的漢簡最多，且保存狀態好，大部份字跡清晰，一些記載內容為居延、敦煌漢簡所不見，居延、敦煌漢簡多為邊防屯戍記錄，而懸泉置漢簡則涉及邊郡行政、地方郵置及西域交流等內容，並有記錄敦煌郡宜禾都尉所屬候官、候長、隧長及效穀縣鄉亭里名稱，此對探索漢代驛站佈局等，具有重要史料價值。大會之後，何氏等三人應邀出席日本泰漢史研究會主辦的懇親會。

甘肅簡牘暨古墓文物被陳列在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特別展示廳內。該館由著名建築家安藤忠雄氏設計，為地上二層，地下一層的現代建築，以“平成之古墳”作為設計主題（平成為日本國明仁天皇年號，1989年即位），被稱為“曲線與直線之交錯，有機與無機之融合，古代與現代之混淆”的傑作。該館以日本古墳飛鳥時代為陳列專題，探索日本古代國家形成過程及國際交流為主調，位於史跡公園近之飛鳥風土記山崗上，周圍一須賀古墳羣中有102座古墳遺跡，其中四十座古墳已經整修。是處丘陵綿亘，松柏豐茂，間以農田果林，景色奇麗峻秀，被認為是探尋日本文化源流的最好去處之一。關於近之飛鳥稱謂，據日本《古事記》：靠近難波宮之飛鳥（即河內飛鳥）、稱近之飛鳥；遠離難波宮之飛鳥（即大和飛鳥），稱遠之飛鳥。難波宮是古代大阪市東區法丹坂町一帶皇居的總稱。河內、近之飛鳥一帶，在古代有眾多渡來人居住，是渡來文化最先流經之地。渡來文化之代表首推文字，探索漢字通過何種方式傳播以及日本古代律令國家形成過程同文字之間的關係等，亦是居延漢簡等在該館展出的背景之一。1994年6月16日，甘肅省文物局局長馬文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謝駿義、副所長戴春陽氏等四人在考察該館設施後，對大阪府教育長谷

口文夫氏說：該館有充分能力，為漢簡提供適當的溫濕度環境，居延新簡等文物在此展出感到放心。

該展出版圖錄一冊，開本 211×297 毫米，120 頁。主要目錄如下：

- 一、絲綢之路的要害 謝駿義
- 二、絲綢之路的攻防 大庭脩
- 三、展示品圖版
- 四、河西走廊與絲綢之路 大庭脩、高島徹等
- 五、副錄
 - 1、展品解說
 - 2、漢簡發現、發掘、研究史年表
 - 3、參考文獻目錄
 - 4、圖版目錄

根據此圖錄，與簡帛有關文物有：

漢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飭 居延甲渠候官

新莽塞上烽火品約冊 居延甲渠候官

東漢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冊 居延甲渠候官

東漢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府奉例冊 居延甲渠候官

西漢相利善劍冊 居延甲渠候官

東漢建武三年隨長病書冊 居延甲渠候官

東漢建武五年居延令移甲渠吏遷補牒冊 居延甲渠候官

西漢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冊 肩水金關

西漢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 肩水金關

西漢敦煌馬圈灣木簡十七枚（以照片為組）

西漢敦煌馬圈灣木簡十九枚（同上）

西漢敦煌馬圈灣木牘木簽十枚（同上）

西漢敦煌馬圈灣觚封檢五枚（同上）

漢敦煌懸泉置簡牘觚封檢十六枚（同上）

西漢敦煌懸泉置帛書

西漢敦煌懸泉置夏長私印 木質陰文

漢居延右尉封泥匣 肩水金關

西漢封榮 居延甲渠候官第四隧

西漢張掖都尉榮信 肩水金關

漢王杖詔書令冊 武威新華鄉纏山村漢墓

以上所列甘肅簡牘帛書等文物在圖錄中均有照片及釋文，但需要指出一點，敦煌馬圈灣漢簡展出實物中有一部份沒有編入圖錄，據關西大學漢簡研究會吉村昌之氏核對，下列編號有實物展出而圖錄中沒有照片，在此照錄，以備有興趣人士查閱。原簡編號：

(二八二) T5·243

(六〇) T5·21

(四三) T5·4

(四六) T5·7

(七四) T5·35

(六四) T5·25

(一〇四四) T12·87

(九一) T5·52

(二七五) T5·236

(一八六) T5·147

(一三五) T5·96

(二二四) T6·185

(三二三) T5·285

(三二九) T5·291

(一七二) T5·133

(五五) T5·16

(一〇五一) T12·94

(三二四) T5·286

(一二五) T5·86

(五六) T5·17

(二三) T4·2

(七九一) T9·23

(七九二) T9·24

(六九三) T8·40

(二九七) T5·258

(二九六) T5·257

(一〇四) T5·65

(六八) T5·29

(二三九A) T5·200A

(八二六) T9·58

(二〇四) T5·201

(二九三B) T5·200B

(三一八B) T5·280B

(三一八A) T5·280A

(三四九) T5·311

(三〇四) T5·266

(一〇二) T5·63

甘肅省文化廳、甘肅省文物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諸位先

生在日期間，考察參觀了奈良法隆寺（1993年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奈良東大寺和良公園、正倉院國寶展、大阪城、姬路城（1993年列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及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

展覽考察組與代表團還專程拜訪了大阪府教育長谷口文夫先生、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大庭脩教授，感謝他們為漢簡研究，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關於集中一定數量居延新簡等赴日展出，是大庭脩館長多年醞釀之事。早在1992年漢簡國際學術會前後，即與當時正在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訪問的何雙全氏多次商談過，近之飛鳥博物館高島徹氏亦參加了商談，並提出了實施的具體方案，請何氏回國之後轉告謝駿義所長，充分表明了他對漢簡研究及學術交流的重視。1993年8月末，應甘肅省人民政府邀請，大庭脩、高島徹氏等四人訪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謝氏等就漢簡等文物赴日展出及相關細節初步商談同意，並觀摩了展出品。隨後對展品或其它有商談餘地的問題，通過電傳等方式聯繫調整並取得一致。1994年5月中旬，在大庭脩陪同下，大阪府教育長谷口文夫在蘭州與甘肅省文化廳副廳長、甘肅省文物局局長馬文治分別代表日中雙方簽署有關展覽議定書，為此總數約200枚漢簡赴日展出之事，正式進入了籌備階段。在此次訪問中，大庭脩先生受聘為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在雙方努力下籌備進展順利，1994年9月末，大阪府立近之飛鳥博物館高島徹等五人與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謝氏等在北京中國文物交流中心（故宮武英殿）順利點交啓運。此展從籌劃到實施，整整歷時二年。全程翻譯為陳波。

該展於1994年10月4日至1994年11月20日為大阪展期。1994年12月22日至1995年元月10日在東京續展，東京展由每日新聞社、每日書道會為主辦者。東京展除頒佈大版展圖錄外，另刊一冊以漢簡書法為重點的圖錄。